中国社会科学院创新工程学术出版资助项目

世界社会主义研究丛书·参考系列76

Routledge
Taylor & Francis Group

五十年战争

世界政治中的美国与苏联

（1941~1991）

The Fifty Years War: The United States and the Soviet Union in World Politics, 1941-1991

〔英〕理查德·克罗卡特 著
(Richard Crockatt)

王振西 钱俊德 译
王振西 校



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
SOCIAL SCIENCES ACADEMIC PRESS (CHINA)

VISIT…

LANZAROTE Caliente.com

世界社会主义研究丛书・参考系列76

第二次世界大战后持续了 40 年的冷战到底是如何发生的？它给世界到底带来了什么影响？大量研究证明，每临历史关头，人们总是根据自己认识的世界而非真实的世界做出选择，那场冷战对当下中美关系及其未来走向会形成什么样的影响？这是当下中国读者比较关心的问题。

《五十年战争》是英国东英吉利大学美国史和国际政治教授理查德・克罗卡特（Richard Crockatt）的重要作品，对 1941~1991 年间世界政治中的美苏关系及其在世界地缘政治变化中的作用做了详尽、权威的研究，他引人入胜地描述了这五十年来美苏对抗的起因、发展及演变，既对所有重大国际事件进行了详略得当的介绍，又对两国决策层在这些事件中的博弈过程进行了洞幽察微的理论剖释，有助于思考当今国际政治力量的消长和重组，以及预测和面对未来国际格局的风云变化，对国际关系、国际政治、外交学等领域的研究者和有兴趣了解冷战史及后冷战时期国际关系变化的学者都有着重要的参考价值。

理查德・克罗卡特教授这部 1994 年出版的《五十年战争》的特点是什么？重读这部著作会给读者带来哪些教益和启发？我曾经就这个问题与现在美国哈佛大学任教的文安立（Odd Arne Westad）教授讨论过，他非常热情和肯定地介绍了《五十年战争》的学术价值和独到之处，我读过后也有同感。我本人最深的印象概括地说，就是从中发现了后来国际冷战史研究发展的诸多重要线索。仅此一点，就有理由将该书收入了解国际冷战史的重要图书之列，何况它还展示了作者强大的叙事能力和宽阔的视野，以及不少堪称睿智的分析和判断，尤其对历史研究者是很有启发的。

——牛军，北京大学国际关系学院教授，本书中文版序言作者

封面照片说明： 1962 年 10 月 25 日，联合国安理会在纽约总部召开紧急会议讨论古巴导弹危机，美国大使与苏联大使针锋相对，美国首次展示了苏联导弹发射场的照片证明。联合国图片 #77304

出版社官方微信

www.ssap.com.cn

ISBN 978-7-5097-7846-3

ISBN 978-7-5097-7846-3

定价：98.00元

世界社会主义研究丛书·参考系列

五十年战争

世界政治中的美国与苏联

(1941~1991)

The Fifty Years War:

The United States and the Soviet Union in World Politics, 1941-1991

〔英〕理查德·克罗卡特 著

(Richard Crockatt)

王振西 钱俊德 译

王振西 校

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
SOCIAL SCIENCES ACADEMIC PRESS (CHINA)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五十年战争：世界政治中的美国与苏联：1941～1991/（英）克罗卡特（Crockatt，R.）著；王振西，钱俊德译.
—北京：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15.10
（世界社会主义研究丛书·参考系列）
ISBN 978-7-5097-7846-3

Ⅰ.①五… Ⅱ.①克… ②王… ③钱… Ⅲ.①冷战-国际关系史-研究 ②美苏关系-研究 Ⅳ.①D819

中国版本图书馆CIP数据核字（2015）第167135号

世界社会主义研究丛书·参考系列76
五十年战争：世界政治中的美国与苏联（1941～1991）

著　　者／［英］理查德·克罗卡特
译　　者／王振西　钱俊德
校　　者／王振西

出 版 人／谢寿光
项目统筹／祝得彬
责任编辑／张苏琴

出　　版／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全球与地区问题出版中心（010）59367004
地址：北京市北三环中路甲29号院华龙大厦　邮编：100029
网址：www.ssap.com.cn
发　　行／市场营销中心（010）59367081　59367090
读者服务中心（010）59367028
印　　装／三河市尚艺印装有限公司

规　　格／开　本：787mm×1092mm　1/16
印　张：31.75　字　数：445千字
版　　次／2015年10月第1版　2015年10月第1次印刷
书　　号／ISBN 978-7-5097-7846-3
著作权合同登记号／图字01-2015-5551号
定　　价／98.00元

本书如有破损、缺页、装订错误，请与本社读者服务中心联系更换

版权所有 翻印必究

·国家社科基金特别委托项目·

本丛书由中国社会科学院世界社会主义研究中心编

Copyright© 1995 Richard Crockatt

Authorized translation from English language edition published by Routledge, part of Taylor & Francis Group LLC; All rights reserved.
本书原版由 Taylor & Francis 出版集团旗下 Routledge 出版公司出版，并经其授权翻译出版，版权所有，侵权必究。

Social Sciences Academic Press is authorized to publish and distribute exclusively the Chinese (Simplified Characters) language edition. This edition is authorized for sale throughout Mainland of China. No part of the publication may be reproduced or distributed by any means, or stored in a database or retrieval system, without the prior written permission of the publisher.
本书中文简体翻译版授权由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独家出版并在限在中国大陆地区销售。未经出版者书面许可，不得以任何方式复制或发行本书的任何部分。

Copies of this book sold without a Taylor & Francis sticker on the cover are unauthorized and illegal.
本书封面贴有 Taylor & Francis 公司防伪标签，无标签者不得销售。

序 言

牛 军*

《五十年战争：世界政治中的美国与苏联（1941～1991）》（以下简称《五十年战争》）是英国历史学家理查德·克罗卡特（Richard Crockatt）教授的名著。这部著作出版于1994年，后来由王振西和钱俊德先生翻译成中文出版，目前这个版本已是中文的第二版了。我很荣幸受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的邀请为新版写序，这对我也是一次再读国际冷战历史的机会，当然也是一种督促。

和所有的读者一样，我最初获知《五十年战争》要出新的中文版时，立即会问这是为什么。我认为首先是社会中有巨大的需求，即越来越多的人希望确切地了解二战后持续了四十年的冷战的真实历史，包括冷战是如何发生的，以及它到底给世界带来了什么影响。

"冷战"这个词是对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束不久由美苏两国对抗导致的国际体系的概括，这个"体系"一直延续到1991年，以苏联阵营崩溃和苏联解体而告结束。英国作家乔治·奥威尔（George Orwell）于1945年提出这个概念，尔后被美国政论家们当作专有名词广泛传播。奥威尔最初试图强调的是美苏对抗已很激烈，只是没有发生战争。不过随着美苏对抗的特殊状态的固定化，这个词中的

* 牛军，北京大学国际关系学院教授。

“冷”变得更重要了。因为美苏都认为自己在进行殊死搏斗，同时却一直维持着和平的状态。后来的发展证明，“冷战”非常准确地概括了那个新时代的本质特征，其影响之久远，即使在当今的诸多国际纷争中，涉入其中的各方通常还会用“冷战”“冷战思维”等互相指责，尽管多数人未必确切知道冷战的诸多特征。更为重要的是，这种话语的延续在深层次上反映了一个时代的影响，世界仍然没有完全走出冷战的阴影。

对于中国读者，还有一层更迫切的需要，即对当下中美关系及其未来走向的特殊关注和担心。自 1979 年中美建交，三十五年来两国关系获得前所未有的迅速和大规模发展，但双方目前正经历前所未有的困难，甚至被认为处于建交以来“最不好的状态”。一些所谓的“战略家”们如此经常和随意地使用诸如“遏制”“渗透”“核战略威慑”等冷战词语来界定中美两国的对外政策和战略选项。毫无疑问，这些话语未必能反映我们今天面对的事务的复杂性和新特点，但它们的确会导致人们越来越怀疑，中美是否正在滑向一场类似冷战的新的大国对抗。

我在一篇文章中曾经指出，大量研究都能证明，每当面临历史关头，人总是根据自己认识的世界而非真实的世界做出选择。20 世纪著名的学术理论家卡尔·波普尔（SirKarl Raimund Popper）对历史研究价值的论述指出了人类认知的这一特点。他说：“不可能有‘事实如此’这样的历史，只能有对历史的各种解释，而且没有一种解释是最终的，每一代人都有权形成自己的解释。他们不仅仅有权形成自己的解释，而且有义务这样做，因为的确有一种寻求答案的紧迫需要。”国际冷战历史就属于有“紧迫需要”寻求新解释的领域，它满足了成为历史研究者必须予以关注的两个基本条件，同时这也是促使读者发生兴趣的两个基本驱动力。其一是它的特殊重要性足以勾起人们的好奇心，使人们非常希望知道当时到底发生了什么并造成了什么后果。其二是它同今天的诸多事态有密切关联，人们渴望尽可能地搞清楚它对当今世界包括自己生活的影响及其达到了何种程度。

上述情况可以被中国图书界大量翻译介绍有关冷战的论著和国际

冷战史研究在中国方兴未艾的趋势所证明，从这股热潮中可以清楚地感受到，中国的研究者和读者对国际冷战历史日益增长的兴趣。尤其是近些年来，越来越多的冷战研究名著被翻译介绍到中国，包括最负盛名的著作，如约翰·刘易斯·加迪斯（John L. Gaddis）的《遏制战略：战后美国国家安全政策评析》《长和平：冷战史考察》；梅尔文·P. 莱弗勒（Melvyn P. Leffler）的《人心之争：美国、苏联与冷战》；文安立（Odd Arne Westad）的《全球冷战：美苏对第三世界的干涉与当代世界的形成》；梅尔文·P. 莱弗勒和文安立主编的三卷本《剑桥冷战史》；弗拉基斯拉夫·祖博克（Vladislav M. Zubok）的《失败的帝国：从斯大林到戈尔巴乔夫》，等等。还有很多从不同角度、针对不同专题、涉及美苏之外诸多国家的论著，在此不一一列出。这些译著同许多中国学者的论著一样，都已经成为中国的国际关系史、冷战史和世界史领域教学及研究的必读书。由此自然会产生一个问题：理查德·克罗卡特教授1994年出版的《五十年战争》这本书的特点是什么？重读这部著作会给读者带来哪些教益和启发呢？

我曾经就上述问题与在美国哈佛大学任教的文安立教授讨论过，他非常热情和肯定地介绍了《五十年战争》的学术价值和独到之处，我读过后有同感。我本人最深的印象概括地说，就是从中发现了后来国际冷战史研究发展的诸多重要线索。仅此一点，就有理由将该书收入了解国际冷战史的重要图书之列，何况它还展示了作者强大的叙事能力和宽阔的视野，以及不少堪称睿智的分析和判断，尤其对历史研究者是很有启发的。

与作者写作的时代（1989～1994）相比，国际冷战史研究最突出的进展，也是引起世人关注的最重要原因，是大量历史档案的发现、收集和整理，并为读者展示了太多闻所未闻的历史故事。它们结合在一起，组成了一幅丰富繁杂、波澜壮阔的难以想象的历史画面。从国家间的冲突与战争，到生态环境、公共卫生和移民潮等，无不被打上冷战的烙印。诚如这本书的作者在二十年前出版《五十年战争》时所做出的论断：冷战是那个时代最具影响力的、其他因素无法与之

相比的国际体系。

作者在全书的开始即坦承，他“主要依靠的是第二手资料”，也“参考了不少政府出版物、文件汇集、杂志、报纸和回忆录”，以及许多学者的论著。换句话说，发现和利用新发掘的历史档案不是这本书的特点，也不是目的，当然当时的条件也难以同今天相比。这本书最突出的特点也是最富有启发性的特点是“从全球角度论述1941～1991年期间美苏关系史”，以及“论述美国和苏联得以适应或者未能适应全球变化的原因”。

《五十年战争》分五个部分，加上结束语共十四章，涵盖了国际冷战史的大部分主要问题，可以说是一部对国际冷战历史全景式的叙事。作者在序言中清楚地告诉读者自己写作的初衷和论述的两个主题。他首先强调了冷战是美苏两个超级大国互动的产物，“必须把美苏关系看作一个互动的过程，而不是一方对另一方的行动过程”。这一判断对中国读者尤为重要。国际冷战史研究首先是也主要是在欧美学者尤其是美国学者中展开的，有关冷战的缘起及其整个过程的研究一直存在尖锐的争论，那时中国甚至都很少使用冷战这个概念，所以对有关研究所知甚少，人们通常是从反映官方观点的报刊宣传中了解有关事件，故对冷战进程复杂性的了解带有很大的局限性，因此很有必要从不断更新的历史研究成果中获取必要的知识。

在美国，第一代研究冷战的历史学家通常都将冷战的发生归咎于苏联，而美国的战略则是对苏联挑战的回应。这批学者被称为“正统派”。越南战争之后，美国新一代历史学家提出了相反的论断，他们被称为“修正派”。这派学者倾向于认为，苏联的政策更具有防御性，反而是美国的误判和扩张导致了冷战对抗。随着1980年代所谓“新冷战”的出现和苏联在第三世界咄咄逼人的扩张，有关谁对冷战负主要责任的争论再度激化，美苏双方的政策都被置于学界更加严苛的审视之下。值得深思的是，不论是在冷战阶段，还是在此之前，苏联学术界（如果有的话）都在相关的学术领域中缺席，他们的集体“失语”导致现在的研究者没有可以借助的来自当年苏联及其阵营的

研究成果，因而，重建作为冷战一方的苏联的历史，成了冷战后国际学术共同体的艰巨任务。

在冷战的年代，对于所有参与研究的历史学家来说，最大的难题是完全无法获得苏联及其阵营方面的档案资料。这种情况在冷战后一个时期有了非常大的改变，俄罗斯保存的大量苏联时期的档案和东欧国家的档案被挖掘和整理出来，历史学家们终于得以在来自“铁幕”两边档案的比较基础上，重新构建国际冷战历史的叙事。这些新的叙事有非常丰富的内涵，对于这本书来说，特别重要的是新的研究成果为冷战是“美苏互动的产物和过程”这一观点提供了强有力的论证，尽管它并非无可置疑。人们既不能简单地确认是美国发动了冷战，也不能简单地断定是苏联挑起了冷战。在整个冷战发生、演变的过程中，美苏的确存在对抗性的战略利益冲突，但并不能因此否认诸多它们难以掌控的重大事件（如 1971 年的印巴战争等）也产生了重要的影响，还有些重大事件则是由双方的战略误判造成的。诸多研究成果告诉读者，仅通过意识形态的透镜观察和解读像冷战这样复杂的历史过程，是非常不可取的，那样不仅会导致对世界政治的极为狭隘的理解，而且有可能导致悲剧性的战略错误。

第二个特点是从《五十年战争》中，可以比较清楚地看到结构现实主义理论的深刻影响。作者很明确地指出，他力图将整个叙事置于根据国际政治体系理论搭建的框架之中，将美苏对抗视为二战后国际体系导致的结构性对抗的结果。二战的结果之一是结束了多极体系，欧洲的衰落导致出现两个超级大国对抗的两极体系。作者认为，在所有影响世界政治进程的各种因素中，美苏对抗的冷战体系是压倒性的，严重影响了世界政治的各个方面和世界的各个地区。

作者从美苏对抗的历史根源开始叙述，将两国对外政策的历史传统作为分析体系性对抗的起点，叙述了在全球变迁的过程中，冷战是如何爆发的，“缓和”是如何出现的，又是什么导致了两个超级大国再度紧张对抗的“新冷战”，以及冷战最终因苏联解体而和平终结的过程。在宏大而有序的叙述中，作者显然试图在体系理论的导引之

下，揭示冷战体系的内在机理，包括美苏两国的国内政治结构和重要人物的作用，例如在第四章对美国和苏联两国国内体制的特征和领袖的素描式分析。要在一部历史著作中完成这样的任务并非易事，作者的尝试很有价值，尤其是还能使全书读起来相当引人入胜。

《五十年战争》试图“从全球角度”审视冷战体系，实际上不可避免地会将国际冷战置于全球进程的更大的背景之下。由此就有必要充分和系统地阐述冷战时代发生的、在冷战体系之外的、属于全球视野的各种事务，包括地区问题、第三世界、跨国因素、非政府行为体等的发展，与冷战体系之间的相互影响。如果将冷战体系置于影响全球进程的中心地位，就有必要进一步分析和探讨其他方面的重要性和意义，例如第三世界的影响。毕竟这个概念涉及幅员辽阔、国家和人口数量巨大，并且被证明影响力不断提升的重要地区。2010 年出版的文安立的名著《全球冷战：美苏对第三世界的干涉与当代世界的形成》在这方面是有开拓性的，他的研究证明，冷战时代第三世界中的各种力量和行为体的实际影响，比之前人们所了解的要大得多。显然，从全球进程中研究美苏互动这个命题，理应展示更为丰富的内容，以及产生更为深刻的见解。《五十年战争》能早在二十年前提出这方面的问题并做出独到的努力，是非常有意义的；读这本书对理解国际冷战史研究的进程也有特殊的价值。

《五十年战争》的确有很多值得推荐的内容，它会引起读者认真阅读和深刻思考。书中的叙事固然很有吸引力，很多素描式的论述会使读者比较容易地了解重点并留下印象，更重要的是书中的很多分析和判断会刺激读者不断诘问和思考。实际上作者在叙述冷战过程时，一直在不断地提问，也没立即做出回答，从而给读者留下很大的想象空间。总而言之，这本书对感兴趣的读者必定是开卷有益的，由此也证明了译者和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的见地，他们为这本书的再版所做的努力是非常有意义的。

2015 年 7 月于北京

本书献给

克拉拉、山姆、玛萨和约翰

前言与致谢

本书是从全球角度论述 1941 ~ 1991 年期间美苏关系史的新作。它既不是简单地论述两个超级大国的双边关系，也不是一部全面的世界史。其主题是论述美国和苏联得以适应或者未能适应全球变化的原因。

作者于 1989 年秋开笔，于 1994 年 1 月完成全书。毫无疑问，这些年间世界的风云变幻必然会在本书的各个阶段有所体现。朋友们问我是如何与事件保持同步的，我的答复像往常一样：共产主义的崩溃与冷战的终结与其说使我的任务更加困难，不如说更有利于打造本书的主题框架，我们终于可以用超脱的态度来评说战后年代了。冷战现在真的成了历史。

要通览许多学者和记者对冷战及其终结的评论文章是不可能的。这方面的书刊很多，而且还在迅速增多，任何人也不可能全部通读它们。我按照自己的希望做到了审慎地选择适用的材料。我在此书中不时地中断一些问题的叙述，以便讨论学者们对事件的解释有争议的文章，或者那些新的理解明显会改变对重大事件看法的文章。前一方面的例子是关于冷战根源的争论，后一方面的例子是古巴导弹危机。

尽管我主要依靠的是第二手资料，但也参考了不少政府出版物、文件汇集、杂志、报纸和回忆录。众多学者和记者就本书所谈问题曾发表过不少文章，在这里要特别感谢其中的两位：约翰·刘易斯·加迪斯和雷蒙德·加特霍夫。他们的文章实际上在每个关键问题上都使研究冷战的学者颇受启发。对研究冷战的历史学家来说，最有价值的

资料来源是华盛顿特区伍德罗·威尔逊国际研究中心的冷战国际史研究处。该处出版的工作文件和简报，通报了新近公开的苏联和东欧文献中的新发现。

我自始至终遵循了这样一条原则，即必须把浩繁复杂的事件归纳出一个头绪。首先想到两个重点。第一，必须把美苏关系看作一个互动的过程，而不是一方对另一方的行动过程。关于冷战时期美国政策的论著很多，关于苏联政策的论著却比较少，而力图同时论及两个超级大国政策的论著就更少。当然，关于苏联政策的资料相对来说比较少，关于美国政策的资料很丰富，也是造成这种不平衡的一个原因。即使现在，尽管关于苏联的新资料几乎每天都有，可是这种不平衡依然存在。尽管有许多令人触目惊心的事已经被揭露出来，但是要挖掘对美国有用的（假设它们存在的话）大量苏联资料仍需要若干年的时间。要对它们进行编纂需要的时间就更长。因此关于苏联政策的许多结论必然还是暂时的。

然而，这一缺陷不应当被用来当作对苏联政策——无论是其本身的政策，还是与美国关系方面的政策——研究不够的理由。苏联的行为是明摆着的，只是对它们的解释存在不同看法。对美国政策的解释同样存在巨大的分歧，尽管有丰富的资料。或者可以说，出现分歧的部分原因也许正是因为资料太丰富。这并不是说我们对苏联的决策过程知道得相对不多情有可原，也不是说第一手资料不重要，而是说，对历史事实的理解不能只根据资料。同样重要的是要做出一种判断，即人们会怎样理解和看待这些悬而未决的问题。博学广识的社会学家说："你站在什么地方，你就从什么角度看问题。"在很多情况下，历史学家尽管身不在华盛顿或莫斯科，倒也能够设身处地地去看问题。在本书中，我把自己置于这两个极端之间。我出生的时间和历史发生的时间使我更容易做到这一点，能够比 1989 年以前的历史学家更客观地看问题。

我的第二个重点是把历史学家和国际关系理论家的观点结合起来。在很大程度上讲，这两派观点是沿着不同的方向发展的，提出的

问题不同，使用的语言也不同。历史学家对理论家使用系统分析的方法表示怀疑，认为他们的方法是人为地把复杂纷繁的事实简单化。而理论家则对史学家苦心研究现象性的东西是否有意义提出质疑。理论家起码要问问史学家，他们的研究到底有多大价值，是否能够揭示国家之间的关系、战争的起源以及和平的条件等。

实际上，可以说这两种方法都吸收了彼此的做法。如果历史研究不把观点条理化，或者得出的结论与人们始终关注的哲学或社会问题毫不相干，那么这就不算是历史研究或者说不算是正确的历史研究。同样道理，如果理论家抽象出来的结论没有详细的史实做依据，不对现象性的东西进行研究，那么也毫无价值。这一点的确千真万确。但在很大程度上，史学家和理论家之间仍有分歧。这可能是因为史学家认为理论家无法对历史的变革做出解释，而理论家则认为史学家忽视了制定外交政策的结构性因素。冷战的终结无疑有助于缩小这种人为的分歧。看似稳定的国际结构突然之间解体了。这使我们能把关注的焦点准确地置于国际政治中变革与结构的关系上。

当然，本书没有在这方面对国际关系理论做出贡献，但它运用了一些理论方法，相信这些方法能为理解历史问题提供指南。具体说，这种从世界格局的角度考察问题的方法，有助于阐明美苏进行争夺的全球背景。如果跳出人们通常采用的只分析单个国家或美苏双边关系的方法，那么，对关于冷战起源等方面的重要问题就能得出新的观点。第一章、第四章第一节以及第十四章阐明了这些问题，并提出了贯穿本书的主要观点。为了阐明某些具体历史问题，我还在许多地方采用了其他的理论，如决策理论、“复杂相互依存”理论等。

我按上述方法打破史学家与理论家的界限，肯定会使二者都感到失望。但应该说明的是，我选用何种理论方法的标准是看它是否有助于理解历史的变革。

本书一至五章中对我的《美国与冷战，1941 ~ 1953》一书（1989 年由英国的美国研究协会出版）做了重大修改与补充。本书十四章中使用了我的《稳定理论与冷战的终结》一文中的某些资料。

该文被收入迈克·鲍克尔和罗普·布朗合编的《从冷战到苏联瓦解：1980年代的理论与世界政治》一书，由剑桥大学出版社1993年出版。我对上述两个出版单位表示衷心感谢。

在撰写本书过程中，我得到一些研究机构、朋友和同事的大力相助。东英吉利大学允许我休一个学期的学术研究假来撰写本书，而且多年来给我创造了发挥我对历史和政治科学兴趣的条件。我非常感谢后来几年的大学生选修我研究的冷战专题。感谢国际关系研究生班的大学生。我感谢宾夕法尼亚卡里斯尔市迪金森学院在1992～1993学年给我提供了非常合适的教学与写作环境，同时感谢富尔布雷特委员会向我提供赞助，使我得以在卡里斯尔待下去。

在知识方面给我最大帮助的是斯蒂夫·史密斯先生，他原在东英吉利大学任教，现在威尔士大学任教。在和他一起工作期间，我学到了很多东西，我们曾合作写过一本书，并曾一同在东英吉利大学攻读国际关系硕士学位。他仔细阅读了本书的大部分章节，并回答了我提出的许多问题。他是我最要好的朋友和同事。多亏他，我才得以涉足国际关系领域。

其他朋友也为本书花费了不少时间，并提出了不少建议。爱德华·阿克顿看了第二章，拉塞尔·博瓦看了第十三章，而迈克·鲍克则看了本书的大部分原稿。他们都是研究苏联/俄罗斯的专家，由于我学的是美国问题研究，因此发现他们的详细意见对我特别有用。鲁斯马利·福特和安德鲁·帕特莫尔都是研究超级大国在亚洲的政策的专家，他们分别看了本书的第五章和第十章。道格拉斯·斯图尔特是军备竞赛和安全政策方面的专家，他认真看了第七章和第十一章。他和拉塞尔·博瓦在迪金森学院政治科学系工作，他们总是乐于听取我的不成熟的想法，使我顺利完成了后几章的写作。我还要感谢那些读过初稿的朋友，特别是理查德·阿尔德里奇，他提出了许多很好的建议。当然，上述任何人都不对最后结果负责，本书所有不完善之处完全由我个人负责。

鲁特利吉大学的戈登·史密斯是一位令人鼓舞和有耐心的编辑。

我高兴的是，许多年以前将我们从安温－海曼带向不同方向的命运和分久必合的机缘，又让我们在鲁特利吉走到了一起。

感谢斯特凡妮·哈里在文字加工方面的帮助。感谢格拉斯迪·卡什曼帮助我准备手稿，他从来都是兴致勃勃地出现在迪金森大学的历史系里。

有些朋友很少看或者根本没有看过此书稿，但他们很关心它，给了我不少精神鼓励。他们是约翰·阿什沃思、勒格斯、奥利·诺兰、利迪·帕克斯顿、罗杰·汤普森和鲍勃·温斯顿，我对他们表示衷心感谢。格雷姆·温常常让我在他的寓所里进行不受干扰的写作。在写作的最后阶段，与莱奥尼德·戈兹曼的交谈很有用。20 多年前在苏塞克斯大学听迈克尔·邓恩的讲座使我受益匪浅，他在那里撒下的种子在第二章中开花结果。

克拉拉和我的三个孩子——山姆、玛萨和约翰——给了我极温暖的支持，没有这种支持这本书就写不出来。因此，愿将此书献给他们，以表我的爱心。

本书作者和出版商努力寻找并显示本书引用图表的版权所有者。每幅图的来源均显示在图的下方。此外，我们在此还想向下列人员表示衷心感谢：图 0.1 的作者图米什·哈米尔顿和 W. W. 诺顿；图 2.2、8.2 和 10.1 的作者诺顿；图 0.2 的作者巴塞尔·布莱克威尔；图 2.1 和 3.1 的作者 D. C. 赫斯；图 4.1 的作者 A. 及 C. 布莱克；图 5.1 的作者哈珀·柯林斯；图 8.1、11.1 和 11.2 的作者麦克劳－希尔。图 0.1 欧洲（1939 ~ 1940）资料来源是 R. 埃德蒙兹著《三巨头》（纽约：诺顿出版社，1993）。此处未提到的版权所有者，请与出版商联系。



图 0.1　欧洲(1939～1940)

资料来源:R. 埃德蒙兹:《三巨头》,纽约,诺顿出版社,1993。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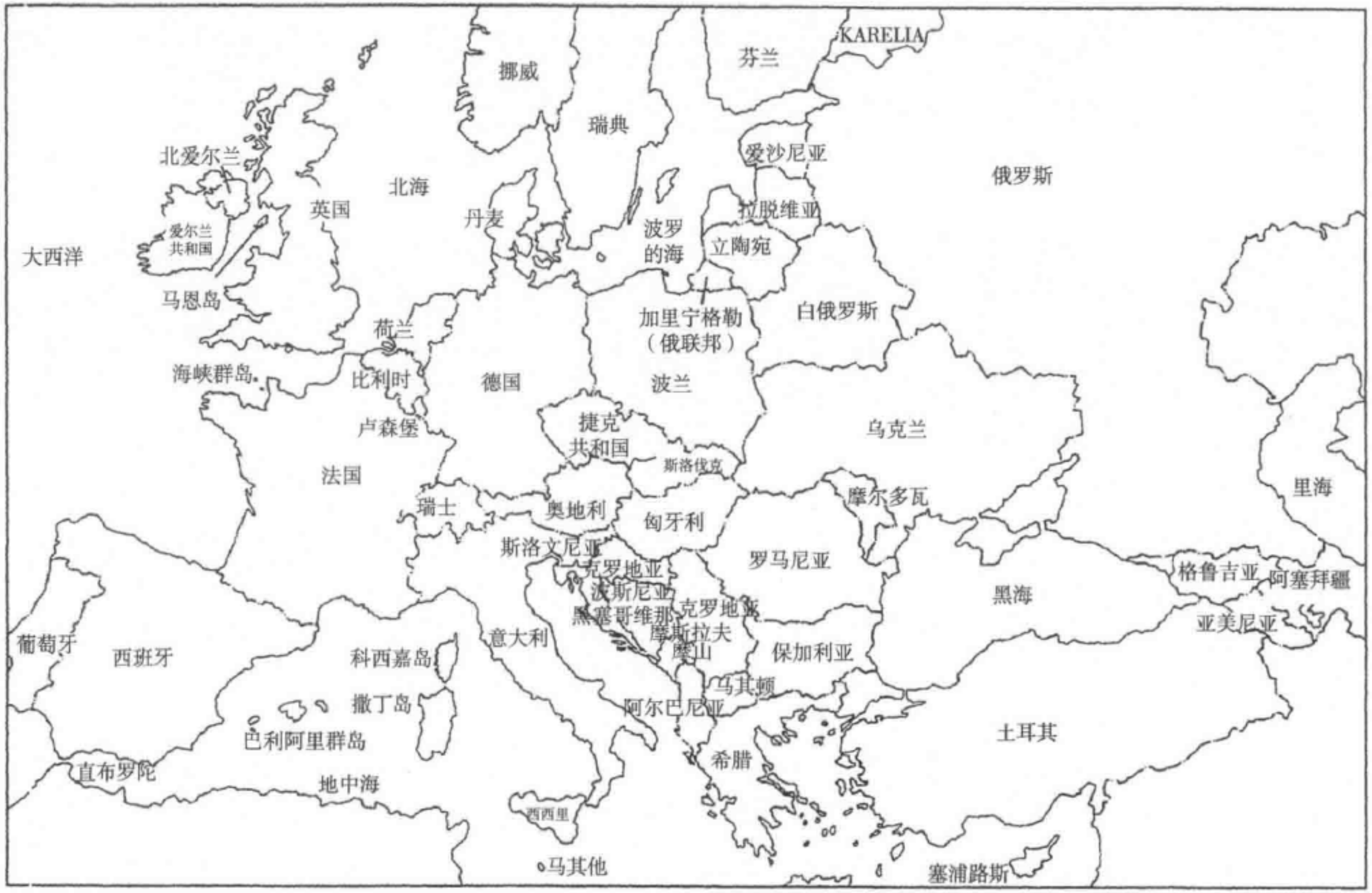


图 0.2　新欧洲(1992)

资料来源:J. 斯托里编《新欧洲:1945 年以来的政治、政府与经济》,牛津,布莱克韦尔出版社,1993。

目 录

前言与致谢 …… 1

第一部分 视角

第一章 导言：五十年战争 …… 3
比例尺问题 …… 4
冷战与国际政治 …… 8

第二章 美国与苏联的外交政策传统 …… 19
美国 …… 19
俄罗斯与苏联 …… 30

第二部分 两极世界的出现（1941～1953）

导 言 …… 45

第三章 第二次世界大战与为和平而斗争（1941～1946） …… 48
全球主义与力量对比的变化 …… 48

大同盟与欧洲战争 …… 52
战时联盟的解体 …… 57
联合国 …… 59
世界经济的重建 …… 61
波兰问题 …… 63
德国问题 …… 66
原子弹 …… 66
1946年：国内形势与国际冲突 …… 71

第四章 “两种生活方式”：欧洲的冷战（1947～1953） …… 78
冷战根源剖析 …… 78
东欧 …… 81
苏联的动机 …… 82
美国的动机 …… 85
遏制政策与杜鲁门主义 …… 88
马歇尔计划、德国，以及欧洲的分裂（1947～1949） …… 93
北大西洋公约组织、国家安全委员会第68号决议及遏制的军事化 …… 98
斯大林主义与国内外的冷战（1947～1953） …… 103
结论 …… 107

第五章 冷战：远东（1945～1953） …… 109
亚洲与欧洲相比 …… 109
超级大国在亚洲的利益 …… 112
麦卡锡主义与美国远东政策的变化 …… 115
中国与亚洲的动乱（1945～1950） …… 118

美国对日本的占领………………………………………………… 122
朝鲜战争………………………………………………………… 124
结论……………………………………………………………… 132

第三部分 全球主义与两极格局的局限性（1953～1964）

导 言………………………………………………………………… 137

第六章 和平共处与不可调和的冲突（1953～1964）……… 141
超级大国的经济状况…………………………………………… 141
非斯大林化与国际共产主义运动（1953～1964）…… 145
艾森豪威尔政府与苏联新领导……………………………… 153
走向日内瓦最高级会议………………………………………… 155
日内瓦最高级会议……………………………………………… 158
危机及其意义（1956～1961）……………………………… 160
肯尼迪与赫鲁晓夫……………………………………………… 163

第七章 核军备竞赛（1945～1963）……………………… 171
引言……………………………………………………………… 171
美国的核战略…………………………………………………… 174
苏联的核战略…………………………………………………… 184
裁军还是控制军备？…………………………………………… 189
古巴导弹危机…………………………………………………… 196

第八章 美国、苏联与第三世界（1953～1963）………… 207
依赖模式与独立模式…………………………………………… 207
超级大国与第三世界：基本估计…………………………… 215
中东：伊朗、苏伊士和黎巴嫩……………………………… 218

东南亚…………………………………………………………………… 227
拉丁美洲：危地马拉与古巴……………………………………………… 234
非洲：刚果………………………………………………………………… 244
结论………………………………………………………………………… 247

第四部分 缓和及其局限性（1965～1981）

导 言…………………………………………………………………………… 251

第九章 缓和的形成（1965～1973）……………………………………… 255
国际环境……………………………………………………………………… 255
缓和的国内因素……………………………………………………………… 266
缓和的理论…………………………………………………………………… 270
缓和的实践…………………………………………………………………… 276
欧洲的缓和…………………………………………………………………… 284
结论…………………………………………………………………………… 288

第十章 越南战争与超级大国的三角斗争………………………………… 289
引言…………………………………………………………………………… 289
越南与美国的国家利益……………………………………………………… 291
北越与中苏冲突……………………………………………………………… 300
美国向中国开放……………………………………………………………… 302
中国的动机…………………………………………………………………… 303
找到退出越南战争的方法…………………………………………………… 304
尼克松：个人因素…………………………………………………………… 305
越南：胜利的代价…………………………………………………………… 307

第十一章 压力下的缓和（1973～1981）………………………………… 310
引言…………………………………………………………………………… 310

美国：一个领袖受制约的国家？…… 312
苏联：一个领袖不受制约的国家？…… 315
军备控制与战略核论战（1974～1981） …… 319
欧洲进退维谷：西方与东方…… 328
控制不住的冲突：第三世界…… 341
安哥拉…… 343
非洲之角…… 346
阿富汗…… 350
伊朗革命…… 353
阿以冲突…… 355
古巴危机与尼加拉瓜危机…… 361
结论…… 364

第五部分　冷战与国际政治：结局（1981～1991）

导　言…… 369

第十二章　里根主义与共产主义幽灵…… 373
权力的过渡…… 373
超级大国的经济形势回顾…… 380
武器与人…… 386
烦恼不堪的西方盟国…… 397
超级大国、中东和中美洲…… 405
结论…… 412

第十三章　戈尔巴乔夫与世界新的动乱（1985～1991） …… 414
引言…… 414
苏联与共产主义的崩溃…… 417
东欧的革命…… 429

美国、苏联与冷战的终结………………………… 436
冷战终结与大千世界………………………………… 448

第十四章　结束语………………………………………… 451
稳定问题………………………………………………… 451
塑造未来………………………………………………… 454

参考文献………………………………………………………… 463

第一部分

视　角

第一章
导言：五十年战争

美国和苏联五十年的国与国关系，是国际事务中起决定性作用的因素。对德国的战争使美苏两国于 1941 年肩并肩站在了一起，结成了联盟。这一联盟对确保打败德国起了关键作用。但二战的胜利却最终促使双方分道扬镳，导致了一种持续的时紧时缓的对抗状态，我们将此称为冷战。尽管在这五十年的大部分时间里，美苏双方都剑拔弩张、针锋相对，仿佛在准备进行一场战争，但事实上双方并未发生公开的冲突。双方当年为对付纳粹德国而结成的短暂同盟，其实也并不牢固，其中充满了猜疑和不信任。这种互不信任随着对德国“热战”的结束让位于美苏间的冷战，而且显得愈加突出。美苏关系不但在反轴心国的同盟中发挥了关键作用，而且也对战后世界的重新整合发挥了关键作用。基于上述理由，我们将美苏置于同一框架内似乎并无不妥。简而言之，从国际地缘政治上来讲，第二次世界大战的剧变为冷战做了铺垫。

1991 年 12 月，随着中欧政治版图的重构，苏联最终土崩瓦解，冷战也随之结束。仅仅在一代人多一点的时间里，政治格局就经历了两次地震，其震中均位于欧洲，而欧洲自 17 世纪以来就是现代国际格局的中心地。

当冷战正在进行时，要想对上述的剧变给予充分解释是不可能的。

对美苏关系五十年间各个发展阶段的研究成果可谓汗牛充栋，已经到了令人难以把握的地步，与这些研究相伴的是对另一个同样紧迫问题的探寻：苏联为何解体。下面两个事实使上述问题更加紧迫和耐人寻味，即苏联政权瓦解之快令人困惑，而这又给所谓冷战体制具有稳定性的假设——一种明显的假设——带来了震撼。具有讽刺意味的是，很少有评论家预见到苏联会解体。面对苏联剧变及冷战结束这一系列宏大的事件，我们应在数量众多、含义不同的事实中探寻其背后的事实。

为此重温历史对人充满诱惑。在已知事件结果的情况下，我们容易倾向于构筑一种不可避免地会导致已知结论的历史。后见之明并非总是盲目和片面的。事实上，与历史事件的亲历者相比，后见之明是历史学家的一个重要优势。对冷战起源、发展和终结的恰当陈述，必须在后见之明和知晓事件的不确定性之间把握好平衡，后者正为当代人所亲历。这需要历史学家对这段历史既要近观，又要远看；既要超脱，又要深入。对于保持上述的平衡，此时似乎正当其时。因为一方面被讨论的历史事件在时间上离我们还不远，我们还能感受到这些事件的脉动；另一方面，由于苏联解体所产生的历史断层，这些事件在时间上又与我们保持着足够的距离，这有助于将它们作为历史，为我们所把握。正如前面所建议的，本书最大的预设前提就是，从 1941 年至 1991 年的半个世纪最好被作为一个整体去理解和把握。第二次世界大战在摧毁战前力量平衡的同时，也创造了条件，使美苏对抗逐渐成为世界力量新的平衡基础。对于在 1945 年至 1991 年间所发生的全球性的嬗变和剧变，美苏对抗是一个稳定且其间多数时间起着主导性作用的国际政治因素。这一概略性的判断无疑需要以事实来证明。本章的目的，就是概要说明本书创作的目的以及全书总体上所采用的论述方法，在全球政治变迁的框架内，给美苏关系勾画出一个总体轮廓。

比例尺问题

要理解刚刚逝去的过去，就像阅读一份没有比例尺的地图。一些

在当时看似严重的事件，在之后反观时经常被证明为无足轻重；而一些当时看似无足轻重的政治上的变化，随着时间的流逝，待其后果得以充分展示后，反而变得举足轻重。不幸的是，对历史学家来说，为这份国际政治地图提供一个恰当的比例尺，要比真正的绘图员提供一个比例尺难得多。绘图员只需要建立一个长宽尺寸固定而且可以通用的框架，要测量图上景物之间的比例关系，只要一把尺子足矣。

与之相比，历史学家的比例尺永远在变动之中。日期——历史学家唯一的固定参照点，可以标示出事件何时发生，但不可能精确地说明事件的重要性，因为对事物的判断会随着观察者的立场和经验的变化而发生变化。即使是最显而易见的全球性事件，例如第二次世界大战，其对各国的影响也是迥然不同，在一些情况下几乎完全相反。历史学家本人身在何方、身处何时，会对他将采用何种历史比例尺以及其最终制作的历史地图的特性产生重要影响。

让我们以不远的过去所发生的一系列事件为例，来说明上述有关比例尺的问题有多么重要。1980 年代早期，随着 1960 年代晚期超级大国间关系的缓和与 1970 年代双方关系出现裂痕，人们普遍开始谈论会出现“新的”（Chomsky *et al.* 1982）或“第二次冷战”（Halliday 1983）。每一个人都为美苏关系的低迷感到不安；“缓和”已经寿终正寝，这一点似乎显而易见。从 1975 年的安哥拉革命到 1979 年苏联对阿富汗的入侵，再到同一年尼加拉瓜桑地诺民族解放阵线（简称桑解阵）的胜利，以及苏联对非洲之角的干涉和萨尔瓦多的叛乱，这一系列危机似乎预示着美苏间的关系缓和对两个超级大国在第三世界的争斗并未起到多少缓和作用。上述事件，加之两国在欧洲部署新的中程核武器以及中止执行限制战略武器条约，表明美苏两国又进入了新一轮对抗时期，就对抗的广度和深度来讲，该时期完全可以与二战刚结束后的那段时期相比。缓和在卡特政府执政的后期就已经处于奄奄一息的地步，而到 1980 年里根当选总统时，它显然已经被埋葬了。里根总统对苏联采取了赤裸裸的对抗性的政策，其言

辞咄咄逼人的程度，自1950年代约翰·福斯特·杜勒斯以后无人能及。对这些事件的解读，还有许多讨论的余地，本书后面将涉及，但毫无疑问的是，美苏关系已经进入了一个新的危险阶段。西方的反核运动在沉寂很长一段时间后重新兴起，这从一个方面反映了公众对冷战政治故态复萌的关心程度。

然而，几年之内，这些事件却展现出了其截然不同的另一面。1987年，里根总统——这个曾在1983年把苏联称为“邪恶帝国”的美国总统却在美苏两个超级大国有史以来首次达成的“削减战略武器（而非控制武器）条约”上签了字，他已经与新上台的苏联领导人建立了一种友好关系，甚至是亲密关系。此时，在总体上，美苏之间的关系可能比1970年代初期双方关系缓和期间走得还要近。在此背景下，第二次冷战看来就像美苏两国关系变化曲线图上出现的一个小小的下滑，更多的是一种夸大的宣传而非确凿的事实，是一个被政治观察家们夸大了意义的普通事件而已。

如何解释这些截然不同的观点？或者去调和这些观点呢？很明显，这主要依评论者所采用的时间比例尺大小而定。从短期看，第二次冷战确实标志着美苏关系的新背离。举例来说，苏联入侵阿富汗，也与苏联在1970年代后半期不断强化的对第三世界事务进行全面插手的政策相一致。这些事态的发展，正如苏联海军和其他军事力量不断加强一样，确实是事实，而非夸夸其谈。而就美国一方来说，人们只需要留意里根政府国防预算实实在在的增长，就会清醒地意识到我们这里所谈的也是事实而非虚构。另外，美国的军备增长与美国国内政治明显右倾相关，它表达了对国内那种宽容的社会价值观的否定和对外妥协态度的不满。里根政府改变了对苏联威胁性质的看法，并采取了对应措施。里根摩尼教式的观点认为，世界秩序就是正义与邪恶较量的精神战场，而不仅仅是国家间开展竞争的竞技场，这种认识与缓和时代尼克松和基辛格对世界政治所采取的政策有较大的区别，后者对复杂的现实政治持另外的观点。简而言之，关于这段时间美苏两国关系发生了质的改变的说法，很值得商榷。这段时间两国的关系并

非与过去完全不同，因为它使人们想起了20世纪四五十年代的冷战态势，但它确实也与缓和时代的情况截然不同。

我们可以采取另一种方式来观察第二次冷战，这就是将它严格地放在美苏自第二次世界大战以来关系的总框架内。从这个视角来观察，两国关系在从对抗时期到缓和时期之间的摇摆就不那么重要了，因为对抗与缓和二者均源于从1940年代中期到80年代后期一直存在的美苏关系的基本模式和结构。这种结构是由地缘政治条件和二战后形成的两种意识形态对立确定的。欧洲被分割、北约和华约两个平行的联盟体系的加强、军备竞赛，以及超级大国间的竞争不断向第三世界扩展，这一切构成了一个冷战“系统”，这可以解释两个超级大国何以出现公开对抗的时期，同样，它也可以解释两个超级大国何以出现缓和时期（Cox 1990：30 – 1）。以这种观点看问题，缓和本身就是以冷战关系作为条件的；它是冷战的一个插曲，而不是冷战之外的什么东西。这种解释并没有否定1980年代初期两个超级大国国家行为上发生的明显变化，但它却对上述变化标志着构成两国关系的条件已经发生根本改变的说法提出了质疑。

如果我们再改变一下比例尺，把1989年以来共产主义在东欧和苏联的崩溃，而不是把1987年美苏中程核武器条约的签署作为基准点，那么第二次冷战看起来更不像是一次剧变——事件发生时它曾给人们留下此种印象。现在，共产主义在苏联已经寿终正寝，这令我们比以往任何时候都清楚地看到，冷战是美苏关系的决定性因素。正如流星在其焚毁之前发出最耀眼的光芒一样，第二次冷战也是整个冷战的衰亡阶段。

另外，1989年以来的剧变，使人们对“冷战”一词的理解产生了有教益的模糊认识，这有助于历史学家对整个战后时期进行全面观察。人们一直用两种截然不同的理解使用“冷战”一词。从严格意义来讲，“冷战”一词指二战之后的两个十年（大约），在此期间，美苏两国关系的轮廓建立起来，双方的公开对抗占主导地位。到1960年代后期，一些评论家开始探讨冷战还剩下多少这一问题，并

得出了冷战所余不多的结论（Thomas 1969；Buchan 1972：34－5）。把1980年代美苏的对抗称为第二次冷战非常准确，因为它令人回想起双方关系的上一个时期，而且它与1970年代的缓和迥然不同。

按照对“冷战”一词的第一种理解，冷战指一段特定的时期和一种特定类型的国家行为。它与缓和不同。对“冷战”一词的另一种理解是指构成美苏关系的根本条件，这种关系一直持续到所谓的“第二次俄国革命”（Roxburgh 1991）为止。当1980年代末期评论家们和政治家们开始谈论“冷战结束”这一话题时，他们所指的就是这种根本条件。自然，他们也指出美苏间逐渐淡化的对抗状态、不断升温的合作气氛。但是这种合作气氛与1970年代美苏缓和有所不同，它伴随着根本结构即战后早期所建立的整个地缘政治秩序的改变。而美苏1970年代的缓和则主要伴随着双方对战后欧洲现状的认可（包括东西德事实上的相互承认）。1970年代早期缓和的代价是双方正式承认欧洲的分裂。正如上面所述及的，这一点使1970年代的缓和被严格置于冷战的框架之内。

冷战与国际政治

上面所述的例子，可以说明那些试图理解这段刚刚过去的历史的历史学家所面临的一些选择。参阅某些国际关系学者的论著，会有助于人们用更长远的观点来观察这段历史。这些学者，比历史学家更直截了当地运用国际政治关系的根本原则思考问题。由于在本书中将引用这些原则，所以最好在这里对它们加以简单介绍。

在国际关系研究领域占主导性的理论观点是“现实主义”，它产生于战后早期。现实主义认为，研究国际政治关系的关键单元是民族国家。民族国家以一个具有凝聚力的、追求其理性的国家目标和统一的基本单元的形式出现在世人面前。现实主义还认为，基于国家利益矛盾的力量（特别是军事力量）冲突，为国际政治关系提供了驱动力。历史学家大都采用这种以国家为中心的观点，它们还采用现实主

义关于“力量平衡”的观点，“力量平衡”是现实主义最为关注的问题，也是现实主义的代表性观点。它认为在国际体系内，如果实现了力量平衡，国际政治关系就会稳定，否则国际政治关系就会失去稳定，陷入动荡。

历史学家通常只是研究某一地区或某单一国家的专家，因此他们倾向于将重点继续放在民族国家上。有些学者则将民族国家置于国际大背景之中，提出了研究这种国际大背景的新方法。在这方面有两个研究流派值得一提。第一个是“新现实主义”，正如其名字所暗示的，它是现实主义的派生物。新现实主义保留了现实主义关于民族国家是国际政治基本单元的观点，但却否认这些基本单元的性质会决定国际体系的结构和行为。新现实主义认为国际体系的功能并非取决于这些基本单元的能力，而是取决于基本单元在整个国际体系中所处的相互位置。换句话说，就研究国际体系的特性这一目的来说，可以把民族国家看作在本质上是相似的。用最著名的新现实主义学者肯尼思·华尔兹的话说：

> 界定一个体系结构，不需要考虑体系中基本单元是如何相互关联的（它们是如何相互作用的），而需要集中精力注意它们彼此之间所处的相对位置（它们是如何被安排和被放置的）。相互作用……发生在单元的层次上。体系中单元的相互位置，它们被安排和被放置的方式不是单元的特性，单元如何被安排是体系的特性。
>
> （Waltz 1979：80）

任何国际体系的特性都由两个基本的特征所决定：无政府状态和有极状态（多极或两极）。在国际政治关系中之所以存在无政府状态，是因为在国际体系中缺少一个能对体系中所有国家施加政治或管理影响的权威机构。换句话说，在国际体系中存在无政府主义，是因

为在该国际体系中，没有一个政体能起到像国家管理本国内部事务那样的管理职能。国际法和诸如联合国这样的机构的效力是很有限的。因为它受主权国家接受其管理的愿望的程度所限。迄今为止，还不能强迫主权国家接受国际法和联合国管理①。由于上述原因，国际体系仅反映一定的力量配置，它通常以多极格局或两极格局的形式出现。多极格局就是由若干强国组成体系权力的核心（如在两次世界大战之间所存在的那样）；两极格局就是在国际政治体系中有两个占主导地位的大国（如冷战大部分时期所存在的）（Hollis and Smith 1991：101－4）。

从表面看，如果采用最严格的国际体系理论形式，那就会把大部分外交史扔进垃圾堆。因为国际外交史是以下面的说法作为前提的，即民族国家内部运行的一套，如政策制定、国家性质、意识形态、民族传统等，是促成国际体系发生变化的根本因素。的确，对国际体系理论（至少是对最严格的国际体系理论）的众多批评中，有一种观点认为，它没有令人信服地解释清楚，没有民族国家内部运作的某些影响，国际体系内的变化怎么会发生（Ruggie 1986：141－52）。

然而，国际体系理论还是可以给历史学家提供很大帮助。国际体系理论最大的贡献，就是体系这一概念本身，因为它可以使我们理解国家的外交政策是由，至少部分地（这里我们将回到限制条件这个话题）是由国际政治关系中的力量配置所提供的制约条件和机会所决定的。例如，许多历史学家在撰写历史时，把冷战的起源解释成仿佛完全是由当事国家的主观意图造成的。这意味着这种解释还停留在将冷战归咎于两个超级大国的一个或另一个的水平。他们从自己的政

① 不言而喻，与国家法相比，国际法是一个复杂的事情。大量有关讨论环绕的问题是，既然国际舞台上没有任何凌驾于国家权力之上的“国外权力”，那么国际法究竟是否还能被称为是一种法律。从现实情况考虑，还没有解决这个问题的必要。我们只需要注意到国际法与国家法之间的这种基本区别，即实际上国际法背后并不存在一个国际政府给予支撑。对此问题及其有关问题的详细讨论情况见于1977年版的布尔的著作第六章。

治立场或国家立场出发，或是把苏联作为冷战的发起者，而把美国作为冷战的被动应对者，或是相反。冷战前20年间的历史学家尤其乐于采用这种看问题的方法。造成这种后果的原因，不单单是由于民族和意识形态的偏见，还由于研究方法本身存在问题，这种研究方法在设置研究框架时缺少联系的观点，研究民族国家时脱离了其赖以存在的国际大背景。

此外，国际体系研究法还能使人们深刻认识到不同的体系结构是如何产生不同类型、不同层次的国际冲突以及不同的国家联盟的。是多极格局还是两极格局更有利于国际稳定，对此，人们彼此唇枪舌剑、争论不休（Deutsch and Singer 1964；Waltz 1964）。但就目前来说，有一种重要的观点认为，是战后国际体系中的两极格局与核武器相结合，将超级大国锁定在紧张关系的中心，并将国际冲突扩展到国际体系的“边沿地带”。把这种情况称为稳定，既可行也不可行；毫无疑问这取决于评论者在国际体系中所处的位置。按照新现实主义的观点，两极格局比多极格局更不容易在超级大国间产生战争。

然而，上述结论只有在研究者假定国际体系结构可以决定国家行为的前提下才能成立。如果历史学家想利用这种体系研究法，就必须对其进行两点修正。第一点修正实际上来自肯尼思·华尔兹本人，他在对自己新现实主义理论的一次修正中承认，“对体系原动力方面的思考，并不能代替对体系中单元层次的分析，也不可能终结从原因到效果的研究过程”（Waltz 1986：344）。换句话说，华尔兹承认，为了了解国际体系的整个运行过程，就必须分析国家内部的运作过程。

对体系研究法的第二点修正与某些学者的建议不同，它坚持认为，把国际体系和民族国家两个层次的研究结合起来特别必要。“我们可以在一次研究中应用一个层次，在另一次研究中应用另一个层次”，戴维·辛格指出，“但我们不能在一次研究过程中改变研究方向和定位”（Singer 1969：28）。然而，历史学家会常常发现这种改变恰恰是研究所需要的。对研究国际关系史的历史学家来说，最重要的问题出现在国际体系和构成国际体系的国家发生交互作用之时，相当

重要的原因是民族国家的内部特性——它们的国家企图、国家政策、发挥影响的能力，显然是使国际体系发生变化的根本因素。如果没有研究德国1914年之前数十年追求成为世界霸主的野心及努力，并将其作为第一次世界大战爆发的主要原因；或者如果没有研究德国在1930年代再一次追求成为世界霸主的野心及努力，并将其作为第二次世界大战爆发的主要原因，那么，20世纪的国际关系史定会荒诞不经。我们需要研究国际体系结构，以便能理解事物如何会保持相对不变；同样，我们也需要研究民族国家，以便理解事物为什么会发生变化。

有关国际关系理论的第二个流派是“多元论”，或者叫“新自由主义制度论”。这种理论没有完全摒弃关于结构的概念，也没有完全摒弃把民族国家作为研究国际关系的一个焦点的做法。但它却在两个基本的方面对现实主义和新现实主义提出了质疑。其一，多元论者否认体系结构——两极格局或者多极格局——决定民族国家的行为，从而就从根本上否定了现实主义者认为国际大环境与民族国家的国内小环境分开是可能的观点。其二，多元论还对现实主义关于民族国家是世界政治关系的唯一重要行为体这一命题提出了质疑。

实际上，多元论把对国际政治关系的研究导入了两个新的方向。首先，多元论认为“非国家行为体”，例如国际组织和跨国公司，从其自身的作用来看，是重要的独立角色。跨国的政治运作与国家间的政治运作在国际政治关系中同等重要。事实上，民族国家越来越失去对自己国家命运的掌控。非国家行为体常常会对民族国家政治日程的安排产生重要影响。一个生动的例子就是国际货币基金组织，它为贷款国获得贷款设置了种种附加条件。另一个例子就是实力强大的跨国公司，它们以在有关国家设点建厂为条件，强迫这些国家的政府给予其特许经营权，从而对民族国家的税收和贸易政策施加影响。另外，现实主义认为，在民族国家政治中存在利益等级，国家安全和军事力量位于这个利益等级的最高层。对现实主义的这一观点，多元论也提出了挑战。多元论认为，经济、贸易、能源以及环境等在国际事务中

往往同样是非常重要的。多元论用“复合的互相依赖”概念取代现实主义者关于在相互竞争的主权国家中实现力量均衡的观点。用最著名的多元论学者的话说，采用“复合相互依赖”概念，“我们就可以构想这样一个世界，在这个世界中由各种行为体，而非国家，直接参与世界政治，在那里没有明显的等级区分，武力并非有效的政策工具”（Keohane and Nye 1977：24）。

多元论对国际关系理论及研究法所做的第二个修正是将关注的焦点重新调整到民族国家的内部运作上。与现实主义的看法相反，多元论认为在国际政治关系中民族国家既不是单一的行为体，也不是合理的行为体。政策多半是官僚政治讨价还价和党派政治博弈的结果，而不是有规则的理性运作的结果。因此，使用诸如“华盛顿”或者“莫斯科”这样的简称，甚至使用“美国”或者“苏联”这样的称呼，都是很危险的。从这个观点出发，可以导出国际关系理论的“官僚政治运作”模式。在本书第七章讨论古巴导弹危机时，我们将更详细地介绍这个问题。在这里，我们要先停下来，评估一下本书前面所述的理论观点对于理解和认识冷战历史的意义。

读者在此自然会提出这样的疑问：应用一大堆常常是对立的观点怎么会得出关于国际政治的一致的解释呢？对此问题，我们可以首先回答读者的是，上面述及的学者中没有任何一个人宣称其理论可以诠释国际政治的方方面面。新现实主义和多元论提出了国际政治的模式或者叫“观念类型”，只是试图从那些被认为对国际政治产生显著影响的因素入手，对国际政治的现实进行诠释。实际上，这正是问题的关键。这两种理论分别关注国际政治的不同方面，在它们试图给出诠释的国际政治现实领域里，它们都经过检验被证明是正确的。这里特别要提出的是，新现实主义有关美苏两极格局以及有关国家安全考虑的主要内容，其在国家政策制定中占据首要地位的独到见解，最能说明冷战体系的动因。然而，多元论却对世界资本主义扩张给出了最好的解释，它认为世界资本主义伴随着冷战体系不断发展，但又不与冷战处于同一范围。多元论产生于1970年代绝不是偶然的，那时，美

苏关系可以说受到了来自错综复杂的国际压力的影响。所谓的“缓和”时代体现了美苏两个超级大国在出现“复合相互依赖”的背景下，重塑两国关系的一种尝试和努力，它们只取得了部分成功。这一点我们后面还要谈到。总之，二战以来国际关系理论的发展，切实反映了国际政治的深刻变化，即从美苏对抗所主导的以安全为核心的两极格局，向具有日趋复杂、多层次相互作用特点的多极格局的转变。尤其值得指出的是，美国和苏联以极为不同的方式经历了这些转变。我们将对冷战全景进行勾勒，以结束本章。

第二次世界大战的决定性影响就在于它打破了以不断变换面目出现的多极力量平衡。自17世纪以来，这种以不同形式存在的多极力量平衡一直是国际体系的基本特征。第二次世界大战的结束，使世人认识到战前的格局已经过于陈旧，根本无法维持当时的国际政治架构，重新成长起来取而代之的是一种新的以美苏两强为主导的两极格局。在15年或更长的时间里，由美苏两强支配掌握的与其他国家相比大得不成比例的经济、军事和政治力量深深地影响了——即使不能说完全决定了——世界其他国家的政治取向。这一段激烈的冷战期过后，随之而来的是一段过渡期，在此期间，两个超级大国都经历了相对的经济衰退，而欧洲和日本则从战争的破坏中恢复过来，另外，非殖民化的进程使国际体系中出现了大量的独立国家。其结果是到1960年代末，两极格局趋于衰落，而一种更加复杂的多极格局出现了，在这种多极国际体制中，跨国经济力量和机构开始扮演越来越重要的角色。当然，这并不是一个始终如一的过程。明显是以核武器为基础的军事两极格局，在世界经济新的力量中心成长起来之后还持续了很长时间。我们以后还要谈到这一点。

如前所述，美国和苏联各自的强弱点不同，因而两国经历上述变化的方式也不同。实际上，从冷战的最初几年开始，在美国和苏联之间就存在着根本的不对称。冷战从来就不是一场对等的较量。即使在20世纪40年代末和50年代冷战“高潮”期间，也表现出了美苏两强根本不对称的特征。在双方的不对称中，最突出的是经济。这包括两

个方面。首先，很明显，苏联的经济比美国落后。苏联只能通过维持强大的军事力量以及由此产生的干预能力——确保其战后在东欧所建立的势力范围保持政治和意识形态上的一致性——来弥补这一弱点。由于缺乏能使经济发展因而具有吸引力的社会经济体系，莫斯科只得使用高压手段，来确保东欧国家在政治和意识形态上对莫斯科俯首帖耳。其次，事实上，苏联和东欧集团是在与资本主义占主导的全球经济隔绝的情况下追求其经济增长的。在苏联当局将革命红旗插遍全球的共产主义理想没有实现的大背景下，无论如何，经济上的自给自足是苏联根深蒂固的传统，究其原因，部分是由于资本主义列强逼迫的结果，部分是出于莫斯科当局的主动选择，目的是防止来自外部资本主义世界的渗透，保卫苏联布尔什维克革命的胜利成果。

冷战初期，力量平衡产生稳定因素。就这一点而论，在美苏不平衡的框架下，互补性的不平衡产生了稳定因素，但是很明显，无论如何这也是不平衡[①]。只要苏联能够在自给自足和计划经济的基础上维持发展，那么它就可以一方面维护东欧集团的团结统一，另一方面对西方构成有效的军事和政治威慑。在一段时间里苏联确实做到了这一点。1950 年代末，当苏联的经济增长率一度超过美国时，无论是苏联的敌人还是苏联的朋友仿佛都预见到苏联的经济成就将会超过西方。伊萨克·多伊奇在 1960 年写道："斯大林的孤立主义、保护主义和铁幕"，就是用来"使苏联人民免受西方更高的效率和更高的生活水平冲击的"。然而，资本主义已日暮途穷，在 10 年内苏联集团将生产"世界工业产量"的一半，并且将与资本主义国家站在同一个水平线上竞争（Deutscher 1960：90）。

不用说，上述估计过于离谱。苏联不仅未能保持其 1950 年代的经济增长率（考虑到苏联经济的低起点以及苏联农业、消费品工业

① 关于第二次世界大战后国际关系的稳定问题在约翰·加迪斯 1986 年发表的一篇至关重要而引起广泛讨论的文章中得到了充分的论述。但他轻视美国与苏联关系中存在的不调和因素，为了对他这种偏向进行批评，出现了说明国际关系存在不稳定因素的论述，此情况见于克罗卡特 1993 年发表的作品。

的长期疲软，这并不令人难以理解），而且在此之后，苏联在经济上与西欧和美国的差距越来越大（Kennedy 1988：329－32）。1950 年代末和 1960 年代，苏联在重工业生产和导弹及空间技术上所取得的成就，使人们产生了苏联总体经济运行情况良好的错误印象。到 1960 年代末，苏联的经济开始为其低效率和与世界经济的隔绝付出代价。从下述事实中人们可以获知苏联人已经认识到他们所付出的代价，即在 1960 年代末，苏联政府把寻求与西方扩大贸易，特别是加强西方新技术的引进，作为它与西方实现缓和的部分目标。

到了 1980 年代，人们才真正意识到了苏联实力脆弱的全面含义。此时非常清楚的是，军事力量已不再能弥补经济的软弱，也不能弥补共产主义意识形态对苏联本国及东欧集团人民控制力的减弱。苏联的计划经济被证明对 1970 年代、1980 年代的高技术工业革命非常不适应，冷战体系随即开始走向瓦解。从 1970 年代初开始，美国也遇到严重的经济问题，但由于美国经济一直与世界经济紧密联结在一起，事实上，美国在战后长达二十年的时间里一直在世界经济中起着主导作用，因此，这些经济问题没有在美国国内引发动荡。换句话说，经济危机没有在美国国内引起严重的政治危机。对此，用另一种表述方式来说就是，由于美国完全融入了与冷战体系截然分开的世界经济体系，因此它拥有市场经济的优势。与美国相反，苏联则被限制和封闭在冷战体系内。苏联主要是依靠其军事实力获得所谓超级大国地位的。用保罗·迪普的话说，苏联只是一个“不完全的超级大国”（Dibb 1988）。

上面的叙述显然忽略了许多东西，其中最明显的是苏联在推行共产主义或者至少是反西方主义方面所取得的胜利堪为第三世界发展的榜样。其次，也不能完全用经济的观点来解释冷战的结束。上段叙述的用意只是想在人们试图将美苏关系与世界秩序的变换相联系的时候，将某些不容忽视的差别突出出来。其中，最主要的差别是冷战体系与世界体系的差别，即使在冷战达到高潮的时候——此时两个超级大国的双边关系在国际政坛中的决定作用达到最大点——这两个体系

也并未完全处于同一范围。美国从一开始就具备在国际舞台上表现自己的超凡能力。美国在战后所建立的世界主要经济机构中——其中尤为突出的是国际货币基金组织和世界银行——占有最大的投资份额，发挥着支配性的影响，而苏联却没有参加上述两个经济机构的任何一个。美国虽然具有明显的经济优势，但仍不足以确保将苏联力量遏制在欧洲的范围之内。如果不是考虑到这一点，那么这样的说法，即冷战最初阶段的世界体系可以称为单极世界，也不是没有道理的。美国在实施对西欧进行经济援助的马歇尔计划（1948～1952）后，很快又以缔结军事同盟——北大西洋公约组织——的形式（北约，1949）来补充马歇尔计划，其原因部分是美苏关系中存在着根本的不对称，而此处所谈的不对称对苏联一方有利，即苏联距离潜在的军事冲突的战场较近，并且苏联在常规部队方面具有优势。

简而言之，美苏双方特有的实力并没有自动转化为明显的政治优势。对于看起来是自己一方最具优势的某一特定层次的力量，美苏双方在运用时都极为小心谨慎，谁也不敢轻举妄动。这就起到了这样的效果——将两个超级大国彼此锁定在紧张的关系中。从这个意义上讲，正如美苏双方因存在差异而分开一样，双方也因存在差异而被拴在了一起。

很明显，冷战体系——美苏双边关系的表现形态——最初对国际体系产生了显著影响，这种影响至少一直持续到1990年代初，它吸引了美苏双方外交政策制定者们的主要注意力。当更加复杂的国际政治模式出现时，冷战的两极体系并未完全消亡，它在两个超级大国的核关系上、在分割欧洲（直到1989年）的地缘政治上，以及在第三世界各地所发生的对抗上，都得以继续维持。

美苏双方彼此都深陷于冷战体系之中，它们都为此付出了相当大的代价。冷战政治使美苏关系僵化，阻碍了双方创造性地应对世界体系内日益丰富的多样性。不过有证据表明，苏联在此方面付出了比美国更大的代价。最后，在相互依存度不断增加的世界上，苏联试图走独立发展的道路被证明是行不通的。

上面对美苏关系的大致勾勒使我们清楚地看到，两个超级大国的双边关系，只是本书所要陈述的部分内容。本书的主题是探讨美苏关系与世界大的政治运动之间的相互影响和相互作用。在下面的章节里，我们将要在若干个诠释这段历史的叙述框架内——各框架分别与1941年以来美苏关系发展的各阶段相对应——给出有关历史的详细论述。在美苏关系史上，有一些成系列的事件构成了全球体系和美苏关系的重要转折点，本书刚才谈到的对美苏关系发展阶段的划分正基于此。但是，在对美苏关系发展的各阶段展开论述前，我们不妨先讨论一下美苏两强在外交政策上的传统。因为这些传统不仅为超级大国采用何种国家行为，也为战后国际体系采用何种形式提供了基本的线索。

第二章
美国与苏联的外交政策传统

众所周知，每个国家在国家体系中均占有一定的位置，而国家体系的性质会直接影响其外交政策的制定。但是，国家行为方面的局限性和国家所面临的机遇也受长期的历史经验的影响。人们不能完全参照那些直接促成了冷战的事件来解释冷战的起源。美国和苏联两国都用源于其建国经验的整套设想和惯例来处理这些事件。正如最近麦克尔·霍华德所提醒我们的那样，应该牢记，研究世界事务时，应探讨国际关系，而不仅仅是探讨国家之间的关系。国际关系就是研究各国如何应对外国的文化，研究那些语言不同、意识形态不同并采用截然不同的方式来应对共同挑战的国家（Howard 1989a）。

本章旨在探讨那些构成第二次世界大战以来美国和苏联外交政策主要原则的历史渊源。

美　国

我们对美国在世界政治中的支配地位已经习以为常，但事实上美国在其历史上的大多数时间里，一直宣称孤立主义为其外交关系的主要原则。人们经常将美国 20 世纪的外交政策描述为参与政策最终战胜了孤立主义。美国在终于认识到自己将命中注定要扮演一种与其巨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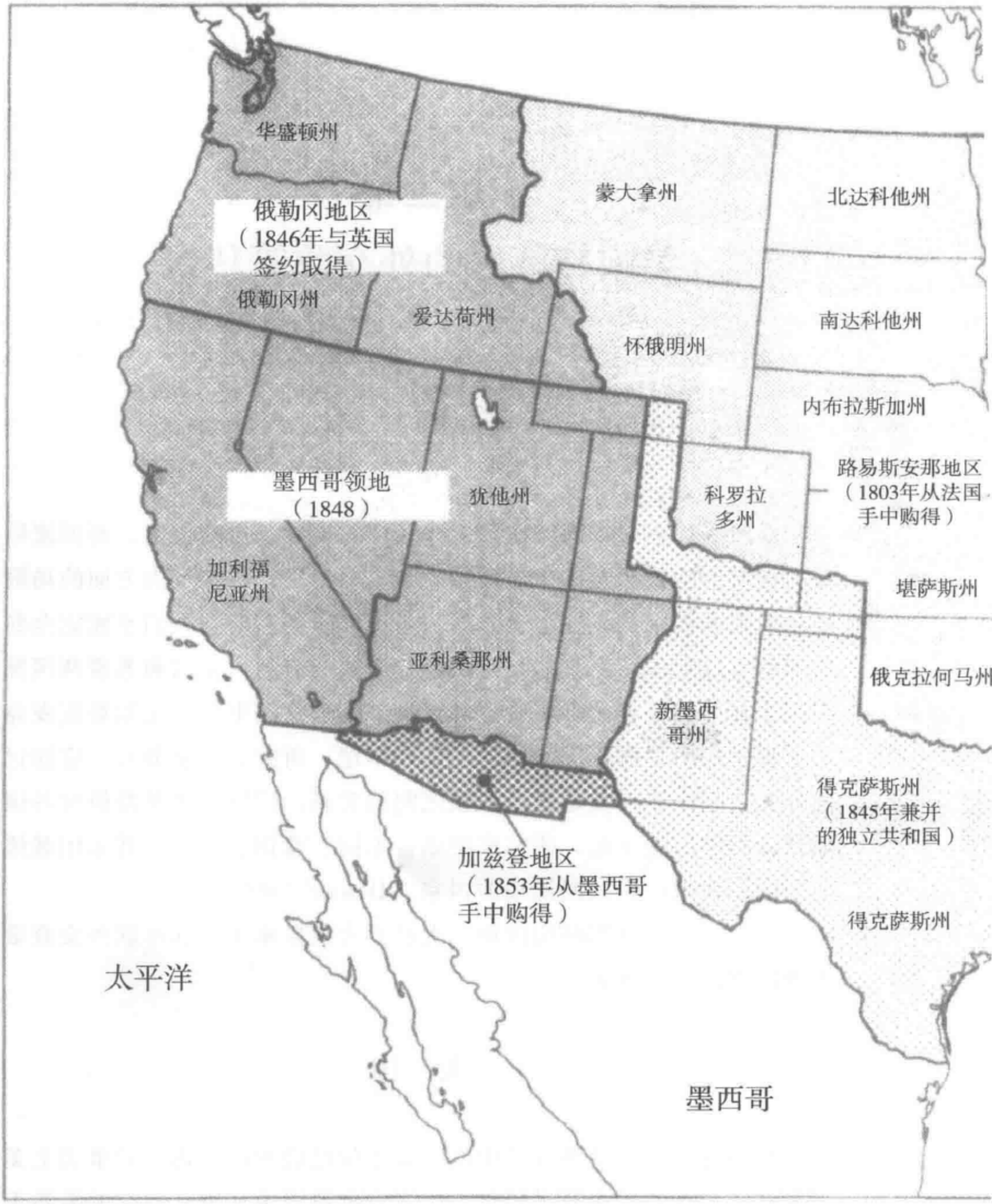


图2.1　美国领土扩张图

资料来源：布瓦耶著《持久的想象力：美国人民史》。



缅因州
佛蒙
新罕布什尔州
马萨诸塞州
康涅狄格州
罗得岛州
纽约州
威斯康星州
明尼苏达州
密歇根州
艾奥瓦州
宾夕法尼亚州
新泽西州
伊利诺伊州
印第安纳州
俄亥俄州
特拉华州
西弗吉尼亚州
马里兰州
弗吉尼亚州
密苏里州
肯塔基州
最初的美利坚合众国
（按1783年与英国签订的条约）
北卡罗来纳州
田纳西州
最初的13块殖民地
阿肯色州
南卡罗来纳州
大西洋
密西西比州
亚拉巴马州
佐治亚州
路易斯安那州
1810，1813年
从西班牙手中夺得
佛罗里达地区
（1819年与西班牙签约取得）
佛罗里达州
墨西哥湾
0 200 400Miles
0 200 400 Kliornetres

大的经济实力相匹配的国际角色后，才非常不情愿地被拽入了第一次世界大战，虽然此后又于1920年代和1930年代“重新退回孤立主义”，但1941年为恢复全球力量平衡，美国再次被迫参与了另一场世界大战。从1945年起，再次退回孤立主义已无可能。这就是人们对美国外交关系的基本描述。

但这种描述有两个问题。首先，尽管美国在19世纪自称奉行孤立主义，但它显然是一个执行扩张主义政策的国家。1803年，美国从法国手中购得路易斯安娜地区，从而，将其领土从密西西比河沿岸一直扩张到落基山脉；1819年从西班牙购得佛罗里达，领土又扩张到墨西哥湾；1840年代从英国手里获得了俄勒冈地区；通过1846～1848年的战争从墨西哥手中攫取了加利福尼亚和北美西南部地区，并且还不时有人大声疾呼，要将美国领土扩张到墨西哥、古巴，甚至加拿大。同样令人瞠目结舌的是，1898年通过兼并夏威夷，以及在1898年与西班牙的战争后相继吞并了菲律宾、波多黎各、关岛和其他太平洋岛屿，美国首次在北美洲以外的地区获得了领土。即使有人认为多数新获得的领土只不过使美国将其疆界扩张到其大陆的自然极限而已——为这一扩展行动进行辩护的人往往声称此举是正当的，但必须承认，美国向外扩张的劲头有悖于它自称所奉行的孤立主义。那么第一个问题就必须说清楚这两种显然相互矛盾的动机之间的联系。

上述描述的第二个问题是，虽然美国显然在20世纪期间卷入了世界政治，但孤立主义情绪仍然是一股强大的力量。一位研究孤立主义的著名历史学家于1956年撰写了一份研究报告，报告的结论充满了这种矛盾的调子。他写道，截至1945年，“真正的孤立主义已经不复存在”，但他也特别提到，任何可能在外国发生的灾难，无论数量多少，都会再次使孤立主义成为一种可行甚至是吸引人的政策。美国在国外的经济和军事义务遭到国会不少人的强烈反对，例如有人称“如果孤立主义者得以重新控制共和党，他们就可以在那些愿意利用对外援助问题生事的地方民主党人（南方保守的共和党员）及其他民主党人的协助下，使狭隘的孤立主义传统死灰复燃”（Adler 1961：

428，432）。此后，在冷战时期的各个紧要关头，特别是越南战争后，评论人员表达了对“新孤立主义”兴起的恐惧。当然孤立主义也不是右派独享的看家本领。它在那些对美国在世界各地蛮横无理地扩充自己势力悔恨不已的左派人士中，也有长期连续不断的影响（Paterson 1988：Ch. 11）。

显而易见，一旦我们试图用它来评述美国的发展，孤立主义就不只是一个简单的概念而已。此种政策而不是这个术语，源于乔治·华盛顿1797年的“告别演说”。他在演说中如此谆谆教导未来的美国行政部门，“我们与外国打交道的行为准则是，在扩大我们的贸易关系的同时，尽可能少地与它们保持政治联系”（Fitzpatrick 1940，Vol. 35：233）。4年之后，托马斯·杰弗逊遵循这一教导，敦促“平等公正地对待所有人，无论其贵贱，无论其宗教或政治立场；与所有国家建立和平、进行贸易和发展真正的友谊关系，但不与任何国家结盟”（Padover 1943：386）。这些声明不仅是感情的流露，而且阐明了当拿破仑统治下的法国正在欧洲大打出手之际，美国人为巩固美国的独立而实际制定的那些政策。起初，孤立主义只是一种生存策略，因为在当时的世界里，世界冲突随时可能将美国卷入其间。果然，11年后，当英国破坏了美国的中立时，被激怒的麦迪逊总统对英国宣战。1812年的美英战争经验进一步巩固了美国不参与的原则，并确立了一切要从美国本国利益出发，尽量不介入世界问题的态度。美国坚持认为，美国与其他国家不同，美国是一个建立在新的个人自由和共和政府基础上的国家。欧洲的外交方式以那些不顾本国人民死活的领导人之间的肮脏交易为基础，只能带来战争。美国共和政体的外交体现了和平原则，是建立在亚当·斯密的《国富论》中所表达的信念上的，即与政治交往不同，贸易有助于和其他国家的友好关系。即使这意味着美国不得去支援其他那些寻求摆脱帝国统治而独立的国家，那也只好如此。1820年，国务卿约翰·昆西·亚当斯拒绝了为争取脱离土耳其而独立的希腊起义分子所提出的援助要求，他在为自己的决定进行辩护时宣称，美国“不参加灭妖行动”（Seward 1849：132）。

于是，作为一项专门用来应对特殊情况的政策，孤立主义问世了，并成为一种信条。但如果美国没有得天独厚的地理位置，孤立主义很可能难以为继。约22000多公里的海岸线为美国带来的是它的领导人单凭良好愿望所难以企及的好处：在美国与危及其和平的主要危险根源之间提供了一个距离和时间的缓冲。另外还有三个有利条件有助于美国将孤立主义政策提升为一种信条。第一是地利，美国拥有广袤的土地和丰富的自然资源，使美国在许多必需品方面能够基本做到自给自足。第二是天时的幸运，从1815年到1914年的百年间，欧洲无大战。19世纪的“长久和平”恰好是美国致力于国家建设的时期。美国在1861～1865年的国内战争中几乎摧毁了自己，但却没有遭到来自外国的毁灭性干涉，部分原因就是欧洲当时处于相对和平的状态。第三，19世纪美国收容了大量移民，形成了一个特别容易受到种族分裂伤害的社会，这使其领导人必须小心谨慎，不敢贸然采取可能会导致此种分裂的外交政策。虽然在20世纪，国内种族利益有时对外交政策产生重大影响，但在19世纪，上述另外两个有利条件使得这一可能左右美国外交政策方向的种族因素没有冒头。

这些有利情况最终导致了一种包含两个显著特点的心态：一是相信美国能够在经济上与世界大家庭保持联系，在政治上则置身其外；二是相信扩大美国影响是一个任何思想健全的人都不能反对的良好而自然的过程，即使这个过程包括摧毁或将土著美洲人驱赶出其世世代代居住的土地，以及吸纳墨西哥人和其他种族的人进入这个不断扩大的共和国，人们也将其视为美国文明使命的自然而然和不可避免的结果。民主和经济的发展有其自身的合理性，正如一位报纸编辑在1840年代所言，将自由扩大到力所能及的地区，是美国的“天命”（Merk 1966：Ch. Ⅱ）。麦克尔·亨特在其关于美国外交政策思想的颇具说服力的论述中指出，为了形成强大的扩张势头，需要推行“种族等级制度”，并“在促进自由的同时积极寻求国家的强大”。第三个有利条件——怀疑革命运动不适于美国——“确定了可以接受的海外变革的限度”，这在20世纪变得特别重要（Hunt

1987：17－18 and *passim*）。这一点将在下文中讨论。在这里强调国家建设期间文化方面的假设与进行扩张时的国际背景之间的联系就足够了。

简而言之，孤立主义和扩张主义是两项相辅相成而非互相抵触的原则。事实上孤立主义主要表示的不是对世界的排斥，而是一种信念，即美国可以在追求自己合法利益的同时，既不会损害自己的价值观，也不会引起其他国家，特别是欧洲大国令人讨厌的关注。

20 世纪的情况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美国的外交策略在此期间所取得的成果也截然不同。首先，美国的自身利益随着本国经济的发展而扩大。仅用一项指标就可说明这一点：1910 年，美国的钢产量已经超过英国和德国的总和。尽管与其他工业化国家相比，美国对进口的依赖较小，但却需要为自己的出口商品寻找出路。这样就不可避免地导致美国与其他大国间的竞争。这种竞争在中国表现得最为明显，美国 1899 年提议，在中国应坚持奉行为所有有关大国的商品“开放门户”的原则。第二个与此密切相关并影响 19 世纪末 20 世纪初美国外交政策的因素是，随着通信和交通的改善，世界变小了。大西洋再也不能有效地将美国与欧洲的纠纷隔离开来。不管你喜欢不喜欢，美国都正在变成维持欧洲力量平衡的一个砝码，在太平洋和远东地区也是如此。20 世纪美国外交的任务是，尽可能以符合其传统的方式来应对这些新的情况。

拉丁美洲是美国利益受到最实在的威胁的地区，而门罗主义被证明是一项迎接挑战的非常灵活的工具。门罗主义产生于 1823 年，旨在警告欧洲大国不要企图进一步在拉丁美洲搞殖民化，也不要企图对新独立的国家重新搞殖民化。门罗主义之所以得以推行，是因为它同时也符合英国的利益，可以阻止法国和西班牙重新攫取它们的前殖民地。在 19 世纪的大部分时间里，英国的海上力量是门罗主义的后盾。但是在 19 世纪和 20 世纪相交之际，随着与西班牙争夺古巴的战争结束，以及正在挖掘的那条贯穿巴拿马地峡、具有重大战略意义的运河的前景看好，门罗主义这项“请勿插手”的消极外交政策变成了美

国意欲保持拉丁美洲“稳定”的积极主张。

1904年，西奥多·罗斯福总统在对门罗主义加以引申，后来被称为罗斯福推论的讲演中，以明白无误的帝国主义语言宣布，“长期的胡作非为或无所事事，导致了文明社会纽带的普遍松懈，并可能终将需要某个文明国家像对其他国家一样来对美洲进行干涉，而一旦西半球出现此类胡作非为或无所事事的情况，则可能迫使美国在无论多么不情愿的情况下，也要去行使国际警察的义务”（Smith 1964，Vol. 2：350）。尽管美国国内出现了反对帝国主义的运动，但无论是在当时还是之后，认为美国在该地区负有特殊责任的想法从来没有受到美国决策人的质疑。孤立主义从来就没有被用在拉丁美洲。

然而，吞并夏威夷、攫取波多黎各和菲律宾（西班牙前领地），以及1898年美西战争后美国对新独立的古巴所实施的严厉监控，就很难证明其正当性了。这不正是名副其实的帝国主义吗？然而，从此以后的历届美国政府都声称并非如此，它们认为，允诺夏威夷最后成为美国的一个州以及答应古巴和菲律宾获得独立，正好使人们不会对美国的政策像对帝国主义那样憎恶。不管这些理由如何正当，关键的问题是这些扩张行为与19世纪期间美国发展的联系程度。美国宣称自己不搞帝国主义，此举有利于发展其未来在全世界的利益，而这正暴露出它既不愿承认将自己的力量强加于人，也不愿承认那些不符合美国模式的独立运动的合法性。

在美国于1917年参加第一次世界大战时，放弃神圣的不参与原则就带来了更大的问题。伍德罗·威尔逊宣布美国决定参加一战，并实际上领导了获胜后解决战争与和平问题的和平大会。看来不参与原则和孤立主义在美国已经寿终正寝。

然而，表面现象往往具有欺骗性。美国参战的条件是精心设计的，即与盟国保持一定的距离。美国是作为“相关国”而非“同盟国”参战的，也不存在任何统一的军事指挥的问题。而事实证明有关统一指挥的问题正是导致参战国之间冲突和挫折的重要根源（Kennedy 1980：170ff.）。更重要的是，威尔逊在界定美国参加战争

的目的时，字斟句酌地将美国的目的与盟国的目的区别开来，并保持美国的行动自由。“为使世界安全以确保民主”，威尔逊在其向国会要求对德国宣战的信件中写道，“我们没有任何自私自利的目的。我们不想征服别国，也不想要领地。我们不会为自己慷慨做出的牺牲去寻求恩惠或任何物质补偿。我们只不过是人类正义事业的斗士之一”（Wilson 1983，Vol. 41：525）。

美国到底为什么参战？人们众说纷纭，这里不可能详细讨论。只要说它参战是为了维护中立国自由贸易的权力就够了。我们需要讨论的重点是重现那种可追溯到1812年战争，乃至华盛顿和杰弗逊的声明的设想，即美国应该有能力在不付出任何政治代价的情况下寻求自己的经济和贸易利益。然而在1917年这一设想显然已经破灭，但美国仍有必要根据最初原则中所剩的某些东西来为参战寻找正当理由。解决这一问题的办法是，在道德上采取高姿态，不仅将自己参战的目的与英国和法国的区别开来，并且明确批评正是它们使战争美国化。不参与政策和孤立主义并未被完全抛弃，只不过转化成了单边主义。

同样的冲动在威尔逊对未来和平的憧憬中昭然若揭，1918年1月，他提出“十四点和平原则”。这些条款中包括公开的外交、海上航行自由、自由贸易、民族自决、公正解决殖民地等问题，而最为关键的是成立国际联盟，将其作为世界新秩序的框架结构。这些原则中的任何一项，甚至成立国际联盟，都不是伍德罗·威尔逊的发明，其中许多是从亲英的威尔逊所青睐的英国19世纪自由议程中借鉴而来的。但从总体上看，考虑到1918年的大环境，它代表了一种希望由美国来确定世界新秩序的呼唤。

1918年国际大背景的一个重要特征，就是前一年在俄国发生了布尔什维克革命。事实上威尔逊的“十四点和平原则”是在布尔什维克公布了“秘密协定”的触动下才发表的，因为该秘密协定表明，欧洲列强之间正在讨价还价，准备瓜分德国的前殖民地。威尔逊被激怒了，发誓要将美国从旧世界的肮脏外交中解脱出来，但颇具讽刺意

味的是，他发现自己在这一问题上与列宁站到了一起。杰弗里·巴勒克拉夫指出，这两位领导人采用了一种新的民主外交手段，越过政治家而直接求助于其他国家的人民。两位在竞争“人类的选举权”（Barraclough 1967：120，118）。他们的竞争当然代表不同的意识形态，但必须指出的是，人们可以从冷战的这个前兆中发现，奇怪的是美国和俄罗斯都决心要从以往的欧洲大国手中夺取政治和道德上的主动权。但两位领导人此时都无法拿出正当理由来赢得世界人民的理解和支持。正如我们随后看到的那样，俄罗斯是无力做到这一点，美国则是因为不愿意这样做。美国参议院之所以反对凡尔赛和约，主要是因为威尔逊拒绝在是否将国际联盟写进该和约这一问题上做出妥协。由于参议院的反对，人们只好在没有美国参与的情况下继续威尔逊所憧憬的世界新秩序。

1920 年代和 1930 年代，美国仅仅是部分“重返孤立主义”，而且在许多重要方面并未奉行孤立主义。大体上的情况是，美国继续设法以最小的政治代价来寻求最大的海外经济利益。美国所承担的国际义务，例如 1921～1922 年的华盛顿海军裁军会议和凯洛格—白里安 1928 年非战公约书，几乎并不需要负多大责任。两者所表达的是对上一场战争悲剧感到深恶痛绝，但却没有实际考虑通过法律命令来防止下一场战争。更重要的是，1920 年代美国的海外投资，特别是在欧洲和拉丁美洲的投资剧增。人们一直将这十年看作跨国公司的孕育期。此外，美国恪守自己主要信条的那种坚韧不拔的精神在 1930 年代表现得尤为淋漓尽致。由于德国重振军备和日本不断进行扩张，1930 年代中期，国际形势开始急转直下，并向爆发新的世界大战转化，因此凡尔赛和约终于分崩离析。美国因而通过了一系列旨在使自己远离这些事态发展的中立法案。其中一项法案包含了这样一条重要规定，即如果交战国用自己的船只运送货物并“点货支付现金”，则与交战国进行的贸易是可以允许的。正如一位历史学家指出的那样，这些法案反映了“美国人民经济上参与世界但政治上脱离世界的矛盾愿望”（Divine 1965：37）。

简而言之，虽然已经成为一个经济大国，但美国仍认为没有理由放弃那种在过去一个半世纪里给自己带来大量好处的孤立主义，即政治上的独立自主。面临20世纪中期及即将爆发的世界大战，美国仍然用18世纪的眼光来眺望整个世界。然而国际形势已经发生了巨大变化。美国在全球已无所不及，早已使那种用18世纪的花言巧语来领悟现实世界的能力相形见绌。但保留一些狡辩术仍非常重要，可以用于解决国内政治纷争。富兰克林·罗斯福被迫在1940年的总统选举中保证，他绝不会派美国人到海外打仗，而此时此刻，他对英国的援助政策以及对日本的扩张行径所采取的日益强硬的态度已经开始动摇孤立主义的根基。

如果这样就能说明美国不断增长的影响世界政治的能力与它对自己在世界体系中的角色的看法之间的差距，那么我们对美国外交政策的假定进行的回顾就已经达成目的。美国的能力是建立在纯粹的经济实力基础之上的，美国认为这种实力基本上是仁慈的，没有受到欧洲大国的帝国野心的玷污。所谓的美国“原则外交”，只不过是将政策隐含在理想主义的辞藻之中而已（Spanier 1977：Ch. 1；Kuniholm 1987：51 -4）。它是那种将所经历过的革命和国家发展当作一个自然过程的文化产物。正如路易斯·哈茨所评述的那样，美国未经严重的阶级动乱便完成了革命（Hartz 1955：Ch. 1）。它在未曾与欧洲列强发生伤筋动骨的冲突的情况下，便将自己的领土扩张到了整个北美大陆。它坚信自己是通过市场的自然运作而实现经济发展的，因此可以理所当然地认为，对所有国家来讲，有了自由民主和自由放任型经济，以及建立在不言而喻的原则基础上的外交就足够了。从美国的传统出发，就不难看出美国究竟为什么难以接受20世纪的革命结果：这不仅仅因为这些结果常常利用的是那些与美国传统相抵触的思想，而且还因为它们不具备以一种循序渐进和以非强迫的方式来进行国家建设的选择余地，而美国一直拥有这种选择的余地。在以前的殖民地寻求国家独立和巩固政权，经常导致国家间和国家内部的政治动乱和地方性战争。

美国的发展产生了一个奇怪的结果，即人们深信它没有任何意识形态。著名的自由派知识分子亚瑟·施莱辛格认为，美国“一直非常幸运，没有成为一个意识形态社会”；在其“辉煌时期”，美国追寻的是“理想”而不是意识形态；从这一点来讲，美国的世界角色与苏联和德国等在20世纪中期的动乱中受意识形态驱动的大国相比，有着天壤之别（Schlesinger 1963：533－6）。根据这一观点，由于没有那些更为武断的大国所具有的破坏性野心，美国被拉入国际冲突反倒可以“遏制”那些侵略成性的国家的野心。从约翰·昆西·亚当斯声明“美国不参加灭妖行动”，到伍德罗·威尔逊声称“美国没有任何自私的目的”，再到哈里·杜鲁门1947年宣称“事态的迅速发展赋予我们重大的责任”（Truman 1963：180），尽管世界形势发生了巨大变化，但美国的外交政策有很强的连贯性。这种连贯性表现在他们相信那些可能将美国卷入其中的事件的发源地都在世界的其他地方。因此美国经常宣称其他国家根本不用担心美国会运用力量，也因此美国对于俄罗斯建立了一个受意识形态驱动的社会反应十分强烈，因为这个社会的原则显然有悖于美国的原则。可以说，在与苏联的对抗中，美国的理想显而易见地变得意识形态化了。

俄罗斯与苏联

人们常常注意到，美国的发展和俄罗斯的发展之间存在某些类似的东西。两国都在各自所在洲的大陆上四处扩张，最终都将各自的领土扩展到了太平洋；在推进定居地疆界的过程中，两个国家都曾接纳或消灭土著人口；两国也都曾面临随着新领土不断扩大，中央政府适当下放控制权的问题。俄罗斯的农奴制度与美国的黑奴制度相对应，两者都一直持续到19世纪中叶，并在相距两年的时间之内（1861年和1863年）被废除。两国都具有深厚的欧洲文明渊源，但也都发展了强大的太平洋和远东利益。这样，地理条件加上强大的民族主义动力，确定了两国都将成为全球性的大国，而且当一个向东、一个向西

推进时，它们会迎头相撞。当它们于19世纪初在美国濒临太平洋的西北地区和阿拉斯加地区遭遇时，双方并未恶言相加就解决了已存在的利益冲突。正如一位历史学家所指出的那样，美国和俄罗斯之间早在一直延续到1860年代后期才结束的拿破仑战争期间，就形成了一种“合作习惯”，当时美国从俄罗斯手中购得了阿拉斯加（Gaddis 1990a：8）。

然而，19世纪上半叶俄罗斯与美国之间的和谐关系并未能掩盖它们在政治和社会制度方面的根本分歧。除了历史起点明显不同之外（例如俄罗斯文化和制度早在美国建国之前就已经根深蒂固），两国的成长过程也存在重大不同，例如俄罗斯社会相对贫穷，土地贫瘠，大部分资源不得不用来防御野心勃勃的邻国。俄罗斯没有什么自然优势。因此与美国相比，俄罗斯扩张的速度慢、难度大。“俄罗斯用了六个世纪的时间才扩张到乌拉尔山脉”，A. 罗巴诺夫—罗斯托夫斯基指出，“然后又用了一个世纪才到达太平洋。原因是亚洲对俄罗斯的侵略进行了强烈反抗，而这些反抗像粉碎机一样吞没了俄罗斯人或阻碍了他们的前进，而美国向西扩张时，最大的反抗仅仅来自当地的印第安人部落”（Lobanov - Rostovsky 1965：82）。

由于长期以来既要向东扩张，又必须对付来自亚洲的源源不断的入侵，因此俄罗斯建立了强大的中央集权统治。推翻了从13世纪到15世纪一直统治俄罗斯的蒙古人之后，一个以莫斯科为首都的俄罗斯国家于1480年代在沙皇伊凡三世的领导下得到统一，后来又于16世纪中叶在伊凡雷帝的率领下扩张到伏尔加河。虽然现代历史学家往往尽量缩小蒙古人入侵和占领对形成俄罗斯专制制度的影响，但必须承认“推翻蒙古人统治的迫切要求有助于强化诸侯间的团结愿望”（Acton 1986：10）。在反抗蒙古人期间，莫斯科公国的地位在俄罗斯各公国之间不断上升，这一点为它在蒙古人之后的统治奠定了基础。在保持这一统治并扩大莫斯科公国统治范围的过程中，形成了俄罗斯集权统治的一些特点：高度中央集权的君主制、教会对国家的依赖越来越大、相对依存的贵族，以及农奴制（Acton 1986：Ch. 2）。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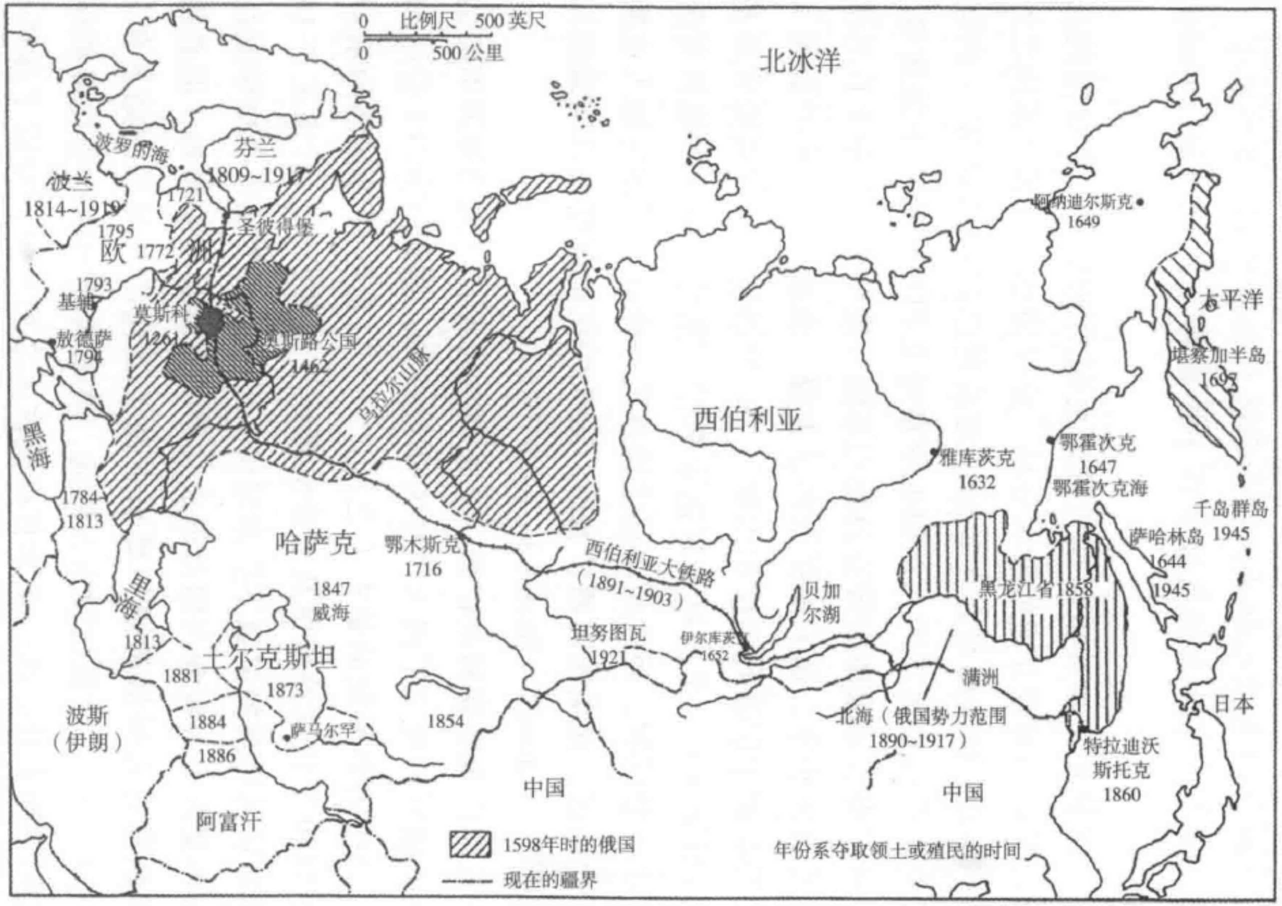


图 2.2 1917年前俄国扩张图

资料来源：W. 拉夫柏：《美国时代》，纽约，诺顿出版社，1989。

与扩大莫斯科统治的早期斗争相比，征服西伯利亚则相对容易些，虽然由于距离十分遥远并且通信和运输非常困难使得征服过程较慢。哥萨克冒险家1640年前就已经到达太平洋及与中国之间的界河。18世纪中叶之前，西伯利亚就已经被用作流放地。1890年代，穿越西伯利亚的铁路建成后大规模定居得以开始。然而，俄罗斯远东地区的发展引起了与亚洲邻国新的冲突。中国清王朝的软弱，使俄罗斯在1890年代实际上吞并了满洲地区。然而在与日本的较量中，俄国则在1905年的日俄战争中遭到了惨败。虽然1905年俄罗斯的惨败暴露了沙皇统治的脆弱性，但俄罗斯并未丧失领土。尽管进一步的扩张被阻止，但俄罗斯在与日本的战后协定中仍保持住了其在远东的势力范围，包括满洲北部、蒙古和战略要地库页岛的部分地区。在20世纪的动乱中，这些地方的每一处都是苏联领导人考虑的重点。

俄罗斯的帝国野心不仅向东窥视，同时也觊觎着西方。俄罗斯国家的建立不仅得益于向远东进军过程中的争斗，也得益于与西方大国间绵延不断的战争。俄罗斯西部边界的北翼是瑞典和波兰。18世纪中叶，彼得大帝发动的战争所造成的严重威胁，有效地制服了这两个国家。随后波兰国家的解体既满足了俄罗斯的帝国野心，又满足了普鲁士和奥地利的利益，因为普鲁士和奥地利也希望波兰虚弱不堪。俄国南边则是奥斯曼帝国，该帝国对俄罗斯的领土扩张和东正教的发展均构成了障碍。亚当·乌拉姆指出，“早在彼得大帝统治时期之前，甚至可追溯到古罗斯国建立初期，就曾有这样一种观念，即俄罗斯民族的历史使命是担当反天主教，特别是反伊斯兰教的东方基督教的代表和卫士。这一使命的具体表现就是最终要将土耳其驱逐出欧洲并为基督教徒收复君士坦丁堡和海峡”（Ulam 1968：4，5）。19世纪，俄罗斯从巴尔干地区的斯拉夫人（其中许多人生活在奥匈帝国或土耳其的统治下）高涨的民族主义中获益，使沙皇得以满足俄罗斯内部日益高涨的泛斯拉夫情绪并扩大俄罗斯领土的利益。然而，在这一点上俄罗斯的野心与奥匈帝国发生了尖锐冲突。

19世纪末，欧洲大国间的关系发生了重大调整。“东方问题”的

发展超出了俄罗斯与奥地利和普鲁士之间历来在遏制波兰民族主义上的重大共同利益。1871 年统一后德国国力的发展、奥斯曼帝国实力的衰落，以及奥匈帝国和俄罗斯在巴尔干地区日益膨胀的野心，这一切迫使俄罗斯不得不在西方寻找新盟友，即法国和英国，但这两个国家都曾是俄罗斯的宿敌。

俄罗斯国家发展历程中有三个突出特点。第一，这一发展过程与维持专制统治紧密地联系在一起。沙皇的历史使命与国家使命的联系密不可分，反对沙皇的统治就必然会反对俄罗斯的帝国扩张，哪怕只是出于权宜之计。列宁 1905 年和 1917 年提倡“革命的失败主义”，就是要粉碎沙皇集权统治的一个必然结果。

俄罗斯发展的第二个特点是它对西方的矛盾态度。彼得大帝倡导的西方化政策根本没有消除东方对俄罗斯社会和文化打下的深刻烙印。启蒙运动在俄罗斯社会根基很弱，只是在知识分子中间产生了少许影响，知识分子不仅人数很少，而且相对孤立于占俄罗斯人口主体的农民大军之外。或许更重要的是，人们清楚地看到西方与俄罗斯的经济发展之间存在着差距。彼得大帝的雄心壮志是要弥补这个差距，但是他没有成功，只不过是替以农民为主体的经济添加了一个小规模的制造业。而政府对制造业和贸易的控制，又严重限制了个体企业的经营规模。

俄罗斯于 19 世纪后期开始工业化，但它是在一个陈旧的社会和政治体制框架内实施工业化的，这便导致了新旧事物之间的严重矛盾。

这种对西方和现代化所持的矛盾态度，在最终推翻沙皇统治的革命运动中表现得最为明显。伯特伦·沃尔夫指出，革命运动各阶段众多派别之间的冲突，不断“改变着西化派与斯拉夫派之间变化多端的斗争形式。其中一派主张采用以民主方式组织起来的西方式的政党和工会……另一派则是一帮自选的、严格集中的、严守秘密和诡计多端的革命知识分子，在一名自封的领袖率领下，集中精力搞阴谋和造反活动”（Wolfe 1964：160－1）。至于布尔什维克党是否在整个革命

期间采用了这两种主张，并且只是在后来巩固苏维埃国家的过程中才将其喜欢搞阴谋的“斯拉夫”性格发扬到了极致，这一点还有待讨论。但无论如何，苏联后来的历史表明，西化派与斯拉夫派之间变化多端的斗争并没有就此停止；可以说这就是米哈伊尔·戈尔巴乔夫努力对苏联进行改革时产生动乱的根源（Roxburgh 1991：81）。

俄罗斯发展的第三个值得注意的特点是，强烈的扩张愿望与害怕遭到攻击之间那种紧张的情绪。蒙古可汗长达两个世纪的统治使俄罗斯领导人和俄罗斯人民对掠夺成性的邻国感到深深的疑虑，说得更恰当一点就是怀疑任何一个邻国都掠夺成性。从这一点来看，扩展国家的疆界是一种必要的防御举措，而不是一种侵略行为。俄罗斯势力范围越大，可能对其造成威胁的国家就越多。这样，害怕被包围就形成了20世纪苏联外交政策中一个非常显著的特点，而且这种恐惧由来已久。结果是，虽然俄罗斯到处扩大其统治的“使命”常常导致其采取胆大妄为的外交政策，但害怕被包围也同样常常使其谨小慎微。苏联的外交政策同时存在这种二元性。

当说到俄罗斯的外交政策转到苏联的外交政策时，人们往往认为后者只不过是前者的继续。照某些历史学家的说法，1917年真正改变了的只是克里姆林宫内的人员。文化上的封闭性与侵略性、中央集权与个人独裁统治、对个人权利的否定和对西方民主思想的抵触、政治压迫和文化审查机制，以及向外扩张的推力与对被包围的恐惧，等等，所有这一切在苏联的发展过程中，特别是在斯大林统治时期（1928～1953）都重新显露无遗。的确，由于俄罗斯历史与苏联历史之间存在众多的延续性，只有准确鉴别两者之间的界限，才能看清属于苏联的新东西。

为了充分说明这一延续性，请看斯大林在1931年的一段讲话，他说：

> 旧俄罗斯历史的一个特征就是它因为落后而屡受欺负。它被蒙古可汗欺负过，被土耳其权贵欺负过，被瑞典封建领主欺负

过，被波兰和立陶宛贵族欺负过，被英国和法国资本家欺负过，被日本武士欺负过。所有人都欺负它——因为它落后，军事落后、文化落后、政治落后、工业落后、农业落后……而这就是我们绝不能再落后的原因。

（Daniels 1985，Vol. 1：230）

三年之后，斯大林又进一步声称，“保卫祖国是最高的生活法则”（Daniels 1985，Vol. 1：243）。看来俄罗斯的民族主义已经超越了马克思的国际主义。不仅如此，在两次世界大战之间的时期有许多实例证明，苏联显然推行的是由自身利益和生存动机驱动而非意识形态决定的务实政策。其中最引人注目的是1939年8月与纳粹德国签订、1941年6月德国入侵苏联时终止的昙花一现的互不侵犯条约。苏联抓住这一为期两年的喘息机会，兼并了波兰和波罗的海国家并进攻芬兰，表明苏联恰好是一个根据自己国家利益行事的传统大国。

但苏联的外交政策，也具备一些带有马克思主义观念和苏联建国时具体情况烙印的重要特征。苏联外交政策的关键，是将马克思和恩格斯的原理与苏联诞生和发展初期的内外情况相结合。马克思主义的最初形式是国际主义，认为国际无产阶级的共同利益是推翻资本主义，但马克思并未提出实现这一目标的手段。据称革命将首先在最发达的资本主义国家内发生，并且当其他国家发展到一定阶段时，即资本主义的矛盾出现危机之际，革命将传播到这些国家。马克思对国际关系谈得很少。他认为，阶级斗争而非国家间的斗争是历史发展的主要推动力。他还设想资本主义强国无意互相发动战争，因为各国内部统治阶级的共同利益是要增加经济财富和压榨各自国家的无产者（Ulam 1968：13－14）。

随着1870年代以后国际社会主义运动的发展，特别是俄罗斯革命运动的发展，马克思主义的国际主义内涵获得了更清晰的定义。列宁和托洛茨基在1917～1918年间认为西欧即将发生革命，布尔什维

克革命的胜利在很大程度上取决于这些主要国家社会主义革命的胜利。但列宁不准备碰运气。如果说马克思主义的国际主义一直是支撑布尔什维克主义的主要知识力量，那么它在组织上则多亏了列宁自己的独特贡献。

列宁进行了双重创新。首先他提议并推行了一套在不同于马克思指定的条件下建立革命政权所需要的机制。在并未放弃马克思关于革命不可避免并终将战胜资本主义设想的情况下，列宁重新设计了实现这一目标所需要的手段。他提倡组建一个由具有献身精神的职业革命家组成的先锋党，党的职能是唤醒无产阶级的革命觉悟并指导它认识到自己的切身利益。如果说这个先锋党是革命的工具，那么马克思主义，由于它坚信革命不可避免并终将在随即到来的资本主义与社会主义之间的战争中获胜，就是先锋党向其追随者所推崇的信仰的理论和感情核心。从这个意义上来讲，列宁是在运用马克思主义为革命目的服务，而不是相反。

列宁的第二个创新是阐明了帝国主义战争与革命在各国的进展之间的联系。1914 年资本主义大国间爆发的战争成为这种对马克思思想进行修正的催化剂。在列宁看来，世界大战证明在以金融和工业垄断为特征的资本主义高级阶段，垄断资本家将寻求通过利用世界欠发达地区的机会来扩大他们的市场。在这些地区里，资本家之间的利益将不可避免地发生冲突。资本主义国家内部的阶级斗争因此被输出到发展中国家，从而，使发展中国家变成资本主义与国际工人阶级之间的主战场。

这两项列宁主义原则表明，必须立即发动并在可能的地方扩大革命。第一项原则阐明了布尔什维克政权的生存与国家生存之间的重要联系。俄罗斯新政府不仅在内战中受到削弱，而且还于 1918 年 3 月与德国签订了丧权辱国的《布列斯特—立托夫斯克和约》，根据这个条约，俄罗斯拱手让出了乌克兰、芬兰、波罗的海各国、高加索、白俄罗斯和波兰，其面积占俄罗斯欧洲领土的三分之一强（凡尔赛和约废除了《布列斯特—立托夫斯克和约》后，除了波罗的海国家、

芬兰和波兰外，其他所有领土都归还给了俄罗斯）。此外，1918～1920年间，协约国对俄罗斯的干涉只能被布尔什维克人视为这些国家企图将俄国革命扼杀在摇篮中。在此情况下，特别是当德国和匈牙利曾取得短暂胜利的革命运动最终失败之后，如果没有坚强的意志，就根本不存在什么革命进程的"不可避免性"。后来在斯大林领导下被称为"社会主义在一国获得胜利"的理论，是新政权迫于形势而不得不采取的策略。这些形势也为布尔什维克人掌权的合法性提供了强有力的证据。由于布尔什维克政权产生于战争中，所以它又利用战争工具，即在一个组织严密的中央机构指导下对群众进行动员，将自己严密防护起来。这样，苏维埃政权在列宁统治时期（1917～1924）就把保卫国家、保卫革命和保卫共产党联结成了一个统一体。如果说斯大林后来又有自己的创新，那么这个创新就是将这个统一体扩大到了保卫他自己的个人统治。列宁关于国际资本主义与国际革命之间联系的第二项原则，确定了苏联促进全球共产主义事业的长远目标。在此情况下，1919年成立的第三共产国际成为实现这一目标的工具。共产主义的最高纲领在列宁毫不妥协的声明中得到了充分说明，"只要资本主义和社会主义存在，我们就不可能有和平。其中终将有一个会取得最后胜利"（Lenin 1925：398）。但列宁没有为实现这一目标规定任何时间表。那些完全按照列宁的声明来解读苏联政策的西方政治家（和历史学家）受到了双重欺骗：一方面，1920年代和1930年代期间，苏联缺乏有效扩大共产主义势力范围的能力（蒙古国是两次世界大战之间一个成功例子）；另一方面，它准备在意识形态方面做出让步，以促进发展中国家的反西方运动。

现在让我们回过头来重新看一下苏联外交政策中颇具扩张性的长期意识形态目标与苏联全神贯注寻求的国家利益是怎样结合在一起的。两次世界大战之间的形势是，苏联作为一个共产主义国家被孤立，扩大自己实力和影响的能力又十分有限，因此它不得不采取谨慎务实的政策，同时又不放弃意识形态方面的斗争。后者对于维护国内的稳定团结和促进国外的革命来说，同样必不可少。斯大林将国内所

有的反对意见都归咎于国外企图消灭苏联的阴谋，在1930年代的大清洗中，他只不过将“通过编造来自外国的威胁来解决国内麻烦”这一古老的治国原则运用到了残酷的顶点而已。但无论如何，从西方的观点来看，结果是苏联的政策呈现出了一种令人迷惑不解的两重性。事实上这种两重性从一开始就存在。列宁这位最先号召誓死与资本主义斗争到底的人，同时也是“和平共处”一词的创造者。

人们很可能得出这样的结论，即分清楚苏联国家利益和苏联意识形态之间区别的企图注定要失败。毫无疑问，苏联的外交政策继承了沙皇俄国的许多东西，这一点正如人们可预见到的，布尔什维克领导阶层没有那种通过发号施令来改变国际体制的实力。苏维埃国家作为国际体制中的普通一员，加入了这个既有约束又提供了机会的体制。但它加入这个体制的方式违背了其革命传统。弗雷德·哈利迪指出，“所有的革命国家都一直想方设法去促进国外的革命，去‘输出’革命”（Halliday 1990b：215）。它们可能不会总是成功，苏联在两次大战之间的岁月里就未获成功，但它们通过推进新的政治组织原则，对现存的国际秩序形成了挑战。内部和外部力量相依为命。

荒谬的是，在两次世界大战之间的岁月里，布尔什维克革命对国际体制的影响在苏联与德国的关系中表现得最为明显，而德国是一个表面上与苏联几乎没有任何相似之处的国家。在两次世界大战之间的大部分时间里，两国都遭到欧洲大国的遗弃：德国是作为一个战败国，因发动第一次世界大战而受羞辱；苏联则是推行好战和颠覆政策的国家的化身。苏联和德国最初于1922年在拉帕洛，后来又于1939年，在截然不同的情况下签订了无视其他欧洲大国的条约。很难想象，假如没有发生布尔什维克革命，这两个国家会考虑或希望进行这些合作。虽然苏联的外交政策可能不会遵循马克思主义的原则（如果在现实世界中可以这样想象的话），但苏联的政治选择，与国际体制一样，均受到了革命和革命理论的决定性影响。

比较美国和苏联的建国过程，使我们看清了许多重要的不同点，这些不同点在第二次世界大战后的两国关系中将会发挥决定性作用。

20世纪，美国不仅拥有巨大并越来越强的影响全球局势的能力，而且拥有一种信念，即它在运用这一能力的同时，认为这种政治实力是其经济和文化活力自然和良性的延伸。用马克思主义的话来讲，美国的自我感觉是一种典型的“虚假意识”：倡导一种仿佛是放之四海而皆准的狭隘和利己主义的世界观。严格说来，美国的理念从一开始就是一种意识形态，是自我欺骗的产物。毫无疑问，所有强国（和个人）都在尽力进行自我辩白。从国际作用上来看，美国在这方面的显著特点是它将实现变革的能力与所拥有的、据称可作为普遍原则的“革命”传统有效地结合了起来。事实上这些原则的根源可追溯到18世纪，它们使美国在20世纪成为一个政治上“保守的”强国，尽管它的经济和文化活力有助于改变全世界的社会和经济状况。然而所有这些因素并未保证美国的影响自动转化成政治上的收益。的确，对力量的幻觉可能会轻而易举地导致失败，例如在越南。越南的例子说明，认为适合堪萨斯城的东西肯定也适合西贡或河内，那是异想天开。

苏联则正好相反，它将那些比美国阐述得更加明确的政治革命原则，与它对世界所采取的那种频繁遭到围攻的姿态结合了起来。在革命成功后马上开始的那段时期里，经济和军事上的相对弱势，迫使苏联领导人不得不利用宣传作为政治实力的主要工具。大约在五十年前E. H. 卡尔就曾指出，“苏维埃俄国是第一个鼓吹国际主义并保持了一个有效的国际宣传机构的国家”（Carr 1942：175）。不像美国，美国能够在相对不受外界压力的情况下来巩固革命成果，而苏联则肯定会排斥现存的国际秩序并试图改变它。20世纪苏联曾有两次机会来促成这种变革：一次是1930年代的经济大萧条，另一次是第二次世界大战后风起云涌的殖民地独立运动。在第一种情况下，资本主义危机的主要受惠者有两个：一个是法西斯主义，另一个是社会民主主义。在第二种情况下，虽然取得了明显的成效，但苏联模式在指引第三世界的改革路线方面并没有获得比“威斯敏斯特模式”（两院模式——译者注）更多的成效。诚然，苏联能够充分利用第三世界各

种反西方（与共产主义相对而言）的运动，但却很少达到使第三世界国家持久俯首听命的结果。从这个意义上来讲，苏联自己的内部发展状况和国际政治条件都限制了苏联的实力。

两场革命、两个主要原则得失攸关的国家、两个带有扩张倾向的民族：所有这些并没有自然而然地导致冷战。虽然早在 1917～1920 年间就可看到冷战的端倪，但只是当爆发了另一场世界大战并且美国与苏联结盟以后，才点燃了冷战的战火。在两次世界大战之间的岁月里，国际关系中的决定因素是德国和日本竭力在各自的势力范围内重塑有利于己的力量均势。1930 年代末以前，美国在世界舞台上只是个次要角色，苏联由于受到德国复兴所造成的更加直接的威胁而试图采取牵制行动：首先想通过国联来促进集体安全；其次是当此举失败后，1939 年 8 月与德国签订了互不侵犯条约。在整个 1930 年代，虽然美国在富兰克林·罗斯福任总统期间在外交上承认了苏联，但美国与苏联的关系淡漠，美苏关系也非常疏远，两国之间既没有重大的共识领域，也没有迫在眉睫的利益冲突。

第二次世界大战彻底改变了这一景象。"大同盟" 内部在打败德国这一目标上的共识（苏联直到 1945 年 8 月才对日本宣战），以及 1945 年 5 月这一目标的实现，将欧洲置于战胜国的股掌之中。但如果要想顺利进行战后安排，就必须强调保持团结。然而众所周知，大国的团结分崩离析，冷战成为第二次世界大战的后果。第二次世界大战期间和战后对美国和苏联提出的合作要求，反倒强化了源于 1917 年的意识形态方面的对抗。关于这一点我们在后面还会谈到。

第二部分

两极世界的出现（1941~1953）

导 言

争取世界和平与国际和谐最具雄心的计划往往起源于战争的深渊之中，第二次世界大战也不例外。虽然在 1953 年世界的分裂已成定局（这无疑是此次战争期间和战后所做的各种决策的结果），但盟国领导人仍宣称他们打算在战后时期继续保持盟国的团结。

美国人这种思想的一个象征是 1943 年出版了一部名为《和平的开端》的书。这部书分为四卷，收集了美国著名政治家的议论摘要。尽管它不代表官方立场，但却是美国官方对战后世界看法的一个重要思想流派。1940 年美国总统大选的共和党总统候选人温德尔·威尔基、前总统赫尔伯特·胡佛、在任的副总统亨利·华莱士、副国务卿苏姆勒·威勒斯都强调在战争中规划和平的必要性。尽管他们各人强调的重点不同，但对以下两点持相同的看法：第一，美国不应重复 1919 ~ 1920 年的错误，美国当时退出了国际联盟，他们还确信经济上的考虑同政治一样是构成世界新秩序的重要组成部分（这一点在凡尔赛和约中被完全忽视了），广义地讲，这意味着美国必须参加当年的一个新的国际政治组织；第二，用亨利·华莱士的话说，美国必须与世界其他国家合作，使具有创造力的资源得以充分发挥作用（Wallace 1943：415）。政治上和经济上的国际主义，随后被具体化为建立联合国组织和召开布雷顿森林会议。布雷顿森林会议做出了安

排：成立国际货币基金组织和国际复兴与开发银行（通称世界银行）。

当然，甚至在此阶段，人们还是能判断出这些提议所包含的自私自利的动机。在美国决心对世界新秩序打上自己的烙印中不难发现冷战的种子，对于历史学家来说，论证这一观点并不困难。但是，这是对历史的过度解读。布雷顿森林会议的讨论记录表明，英国对美国动机的怀疑与苏联一样深重（Hathaway 1981：Chs 2 and 10）。此外，对“一个世界”的积极渴望因为一个同样有力的消极因素而得到加强：人们担心分为两个敌对阵营的世界在本质上是不稳定的，并有可能导致战争。国际主义者的主张不只是美国理想主义或美国追求霸权的反映，它也反映了一种观点，即未来的和平和繁荣有赖于盟国之间保持战时的团结。联合国组织就是为延续战时联盟精神和名称而设计的。“联合国”这个词就曾被用于形容战时联盟（Edmonds 1991：208，550 n. 2）。

苏联的言论也表达了相似的渴望。斯大林在1944年曾说过，唯一能阻止德国再次侵略的方法是“建立一个由爱好和平的国家的代表组成的特别组织，以保卫和平和确保安全。这一组织不应是‘给人留下悲惨记忆的国际联盟的复制品’，而应是一个新的、特别的、拥有在必要时保卫和平与防止侵略的一切手段的组织”。他断定，“只有承担反希特勒战争重任的各大国继续以友好与和睦的精神保持合作，这一组织才能有效地运作”（Daniels 1985，Vol. 2：128）。

可以肯定，苏联也是从自己的角度来考虑这个问题的。它更多地关注德国东山再起的可能性，而对国际组织的价值则将信将疑。这一点与美国不同。斯大林同丘吉尔一样更倾向于信赖大国的领导，而不是一个未经考验的组织。另外，美国领导人也过于相信苏联放弃了传播共产主义的目标。不过，没有理由怀疑，在此次战争的最后一年，苏联确实是真诚地希望参加新的国际组织并以其成员国的身份得到好处。

在下述三章中将要回答的宏观问题是：对二战时的国际主义的盼

望是如何在战争结束才两年的时间内就演变成“两种生活方式”（杜鲁门语）和“两个阵营”（日丹诺夫语）对抗性的情况。至于冷战起源可以说包括两个截然不同但又紧密相关的问题：为什么战时联盟会瓦解？为什么联盟的分裂在全球范围形成一种态势？关于第一个问题，我们可以回顾联盟自身的性质（在第三章进行讨论）。关于第二个问题，我们可以追忆在取得军事胜利后主要大国所处的环境（第四章和第五章的内容）。

第三章
第二次世界大战与为和平而斗争
(1941～1946)

全球主义与力量对比的变化

第二次世界大战在军事冲突的地理范围和对非主要敌对国家的影响方面比第一次世界大战更具全球意义。尽管在两次世界大战中，欧洲都是主要战场，但在第二次世界大战中，由于日本的侵略，远东成为仅次于欧洲的重要战场（在一些美国人的眼里，其重要性还超过了欧洲）。1914 年，日本加入同盟国一方参加第一次世界大战，其目的主要是牺牲中国和德国的利益来追求自己的利益。在凡尔赛和会上，日本成功地获得了德国在远东的殖民地，并迫使中国做出重大让步。但是，在主要大国看来，这些事都只不过具有地区意义而非全球意义。在第二次世界大战中，情况就截然不同了。日本 1940～1942 年的大肆侵略动摇了西方在远东对殖民地的统治（至少暂时如此）。这些殖民地包括法属印度支那、中国香港、马来西亚、新加坡、英属波罗州、缅甸、荷兰属印度、菲律宾和西太平洋上的一些小岛（大都属于美国）。日本最后战败并没有阻止反而刺激了这些殖民地独立的愿望。日本参与第二次世界大战的最后结果是引发了亚洲政治版图的重新整合。

两次世界大战的第二个重要区别在于美国和苏联参战的性质。在

第一次世界大战中，尽管美国的生产力在确保击败德国和同盟国方面发挥了重要作用，但在军事上，美国起的作用较小，只是在战争结束前六个月美军的作用才显出了效力。与此相反，自第一次世界大战开始就参战并在对德战争中付出巨大代价的俄国在1917年的革命中崩溃了，新的布尔什维克政府于1918年年初宣布退出第一次世界大战。尽管美国希望在缔造和平方面充当战胜国中的道德领袖，但这一愿望并未转化为政治力量，其原因我们已进行了讨论。世界格局的政治重心仍然是在欧洲，尽管第一次世界大战给欧洲的经济造成了毁灭性的影响。

在第二次世界大战爆发初期，美国和苏联这两个未来的超级大国都袖手旁观，这一局面持续了将近两年，直到希特勒1941年6月入侵苏联，日本于同年12月袭击珍珠港，才不可改变地将两国拖入了战争。在很短的时间内，苏联和美国对击败德国所做出的贡献就使大不列颠帝国相形见绌。大不列颠帝国在法国于1940年沦陷后一直是德国的唯一对手。第二次世界大战完成了从第一世界大战开始的世界格局中心转移出欧洲的过程。

美国和苏联并不是在打一场同样的战争。美国从二战一开始就被迫采取全球视野，因为它不仅要与德国而且还要同日本作战。苏联在二战中一直保持对日中立，只是在美国于1945年8月6日在日本广岛投下原子弹后才对日宣战。尽管共同目标是打败法西斯德国，但是美国和苏联的战争目的与战略有明显的不同，其主要区别也许可以称作美国的目的“广泛”，而苏联的目的“专注”。德国入侵苏联所造成的灾难性后果使苏联的战争努力专注于国家的存亡，这使苏联领导倾向于用领土的得失来评估胜利。美国领土上的珍珠港海军基地也受到攻击，但日本不可能占领夏威夷，更谈不上占领美国本土。除了要实现使德国和日本无条件投降这个当前目标外，美国还企图建立一些国际行为的原则，这些原则在大西洋宪章里得到了明确的阐述。

对大西洋宪章存在着许多争论。大西洋宪章是在美国参战前数个月由丘吉尔和罗斯福起草的。在该宪章中，两国都宣布遵守一系列明

确的原则：两国均不奉行领土扩张、任何领土的变化都应反映相关人民的利益、所有民族都有权选择自己政府的组成形式、所有国家都享有自由贸易和海上自由航行的权利。此外，美英两国还希望所有国家进行合作，实现经济增长和社会福利。美英两国还重申它们放弃以使用武力作为解决国际争端的手段，并建立一个“更广泛和永久的普遍安全体系”，以足够的力量强迫解除威胁和平的国家的武装。人们难免将其与威尔逊总统1918年提出的“十四点和平原则”相比较，结果发现一个突出的区别在于大西洋宪章有赖于联合的而非单边的努力。

然而，罗斯福和丘吉尔对于他们做出的承诺在具体理解上却存在着许多问题。斯大林随后对该宪章的认同使这些问题更加模糊而不是清晰了。每一方都有重大保留，反映了他们对各自利益所在的认识。在该宪章的起草阶段，丘吉尔就设法对措辞进行改动，以保卫大英帝国的国际贸易。斯大林也同样急于保护苏联的利益，尽管他用更加宽泛的词语掩盖了他对该宪章的保留。他宣称，宪章原则的实际应用必须与各自国家的具体情况、需要和历史特性相适应（Taubman 1982：47）。出于对美国国内孤立主义情绪的担心，罗斯福总统对丘吉尔起草的建立新的国际安全框架的条款进行了淡化处理。当国会和公众舆论表示接受国际主义时，罗斯福的疑虑便打消了。可以说，在这三位领导人中，罗斯福是最专心致志于大西洋宪章的普遍适用性的。

人们总是倾向于认为宪章的大原则只不过是空洞的措辞而已，一些英国官员还对此表示了不满。如同他们在宪章通过之前和之后一样，他们对美国总是唱高调表示不满（事实上，这些高调大部分是丘吉尔的大作，他可是一位著名的修辞家），这表明他们对宪章一经签署便会产生巨大影响估计不足。可以肯定，罗斯福和丘吉尔1941年8月在阿真舍湾开始举行会晤并不是为了公布一份有关战争与和平目标的声明。丘吉尔会见罗斯福的主要目的，用罗伯特·谢尔伍德的话说，是为了“确立抵抗日本进一步侵略的共同政策”（Sherwood 1948：350）。丘吉尔虽没有达到这一目的，但他确实与罗斯福建立

了亲密的私人关系。宪章本身就是一个明确的例证。从长远看，这种关系比就一个特定政策达成协议更加重要。

在丘吉尔看来，宪章是在美国参战这一重大事件前规定了内容广泛的议事日程。美国的参战，在丘吉尔看来是不可避免的，也是他非常盼望的。最早提议发表联合声明的罗斯福总统也很关心加强与英国的关系。美国已经开始充当“民主国家的兵工厂”，通过租借法案和其他措施对英国的战争努力提供大量的资源。在宪章中没有提到但却具有重要意义的另一点考虑对大西洋会议产生了影响，那就是罗斯福和丘吉尔共同认为，美英应向苏联提供援助，苏联此时在德国长驱直入的侵略面前岌岌可危。总之，反轴心国战争联盟的组建模块在大西洋会议上已经形成了。

把大西洋宪章视为盟国目标的交汇点和盟国差别的焦点，将对我们分析问题大有益处。大西洋宪章是贯穿战争始末的一个重要的参照点。宪章的许多条款被原封不动地移入《联合国宪章》，并在战争后期就如何处理欧洲和远东解放地区而产生的争端中也常被引用。我们回头将讨论这一问题。总之，宪章表明了力图承认战争带来的全球力量对比的巨大变化，此外它更表明了一种决心，就是要确定未来全球力量对比的态势。我们可以把宪章和随后的联盟视作达成大国协调一致的基础，也可以作为形成战时战略和世界新秩序框架的基础。

最重要的一个背景是德国、日本伙同意大利摧毁了战前的力量平衡。具有讽刺意味的是，正是轴心国使世界格局开始出现两极化。斯大林在 1942 年纪念布尔什维克革命胜利 25 周年的讲话中谈到了这一点，他说：“世界现在分为两个阵营”（这一措辞与 1947 年“杜鲁门主义”演说的措辞惊人地相似）。

> 德意联盟的行动纲领可以概括为下列几点：散布种族仇恨；建立“优等”民族的统治；征服其他民族并侵占他们的领土；在经济上奴役被征服民族并掠夺他们的财富；消灭民主自由；普遍建立希特勒制度。英苏美联盟的行动纲领则是：消灭种族特

> 权；维护民族平等及其领土的不可侵犯性；解放被奴役的民族并恢复他们的主权；主张各民族有权根据自己的愿望处理自己的事务；在经济上援助受战争破坏的民族，并帮助他们获得良好的物质生活条件；恢复民主自由；消灭希特勒制度。
>
> （Daniels 1985，Vol. 2：122－3）

毫无疑问，在战争期间，领导人用这种两极格局来描述冲突并不令人感到惊讶。出于把敌人说成魔鬼，并证明自己事业的正义性的双重需要，必然要采用这种方法。但是联系到同盟国一致同意的重要战略目标——轴心国无条件投降，同盟国对这一新的大国一致的承诺使盟国团结的决心背上了重负。轴心国无条件投降将使同盟国拥有全权来决定如何填补由此而出现的权力真空的问题。在同盟国与轴心国的冲突概念中明确的意识形态冲突占有重要位置。从更全面的角度来说，与第一次世界大战相比，第二次世界大战是一场要“使世界更加民主”的战争，然而战后盟国之间对“民主”概念的理解有很大的不同。这一因素又使建立世界新秩序的问题复杂化了，这是因为，世界新秩序的成功必须依赖于具有不同利益和价值观的国家达成意识形态的共识。总而言之，冷战的结构和思维是由轴心国的战争挑衅和同盟国做出的反应所启动的。从这个角度来说，德国和日本至少是冷战的共同作者。

大同盟与欧洲战争

大同盟的合作程度如何？可以肯定，罗斯福政府为了使苏联给美国公众舆论留下好印象做了大量的工作。尽管他公开表示不赞成在电影和报纸中把苏联描述为“我们勇敢的同盟者”这样极端的宣传，但罗斯福赞同在美国自由派精英中流传的普遍观点：苏联发展的趋势是在向西方民主靠拢（Gaddis 1972：41）。正像我们所看到的，租借

法案在美国自己参战之前就用于苏联了。此外，在 1943 年和 1945 年，罗斯福两次冒着自己健康和安全的很大风险做长途旅行去德黑兰和雅尔塔与斯大林会晤，因为斯大林坚持他本人必须待在国内或俄罗斯邻国的领土上。除了这些，罗斯福还多次表示他愿意在政治和军事领域与苏联合作。罗斯福做出欧洲第一的战略决策，而不是集中力量打败攻击美国的日本，就是因为他意识到苏联承担着对德战争的主要军事和民事重负。最后，罗斯福还努力发展自己与斯大林的个人关系，不管是通过代表总统经常访问莫斯科的总统特使哈里·霍普金斯，还是通过他与斯大林本人的直接会面。

斯大林也曾表示，他重视与罗斯福的个人关系。斯大林在 1944 年说，罗斯福是个他能打交道的人。罗斯福总统于 1945 年 4 月逝世之后，苏联领导人与杜鲁门总统生硬的外交风格的首次碰撞使苏联外交部部长莫洛托夫感叹道："如果罗斯福总统在世的话，关于东欧的争端是不会发生的。"类似观点在赫鲁晓夫的回忆录和后来的苏联评论家的文章中都可以看到。这显然代表了苏联官方的观点（Gaddis 1972：205；Khrushchev 1990：82；Arbatov 1983：66）。美国外交政策的"修正主义派"历史学家也持相似的观点，这并不令人感到意外（Horowitz 1967：chs 1 – 3）。

然而斯大林是否同罗斯福一样很重视个人关系，关于这一点尚存在着疑问。同样也不清楚的是，如果罗斯福在 1945 年 4 月后仍在世的话，冷战是否能够得以避免。历史学家经常引用罗斯福致丘吉尔的最后电文："我将使苏联问题尽可能的缩小化。"但必须将这一电文与罗斯福致斯大林的最后电文对照着来理解，在后一个电文中罗斯福报怨苏联未能遵守在雅尔塔会议上就波兰民主化进程所做的承诺（Kimball 1984，Vol. 3：630；*FRUS* 1945：194 – 6）。此外，人们必须考虑到这样一个事实：杜鲁门总统是在波兰等问题进入后期和更艰难的阶段后才被迫对这些问题做出反应的。当需要很迫切的时候，国际政治家之间在当时和以后的个人接触肯定有助于加强双边关系。然而当两国的利益出现巨大分歧的时候，政治家之间的个人接触很少能防

止两国关系出现裂痕。正像丘吉尔的一名助手在丘吉尔与斯大林在1942年8月举行会议后所说的那样，“我得说，与斯大林交朋友就相当于同大蟒交朋友，首相与斯大林的关系只有在斯大林认为他的利益得到满足的时候才会变得亲密和个性化”（Edmonds 1991：303）。

正如所发生的那样，在战争期间，斯大林确实在向他的战时盟国做出和解行动方面存在着迫切的需要。在早期阶段就明确表示希望战后在俄国西部边境出现“友好政府”的同时，斯大林至少在名义上表示同意大西洋宪章和以后的解放欧洲宣言（1945），这些文件中的一个重要条款是各民族自决。1943年苏联做出的解散共产国际的决定被西方认为是一个友好姿态，暗示着苏联中止了传播共产主义意识形态的目标①。最后，斯大林在德黑兰会议上宣称，一旦欧战结束，他将对日宣战。在雅尔塔会议上，这一点变成了坚定的承诺。

盟国之间利益的分歧甚至在它们相互做出的承诺中都明显可见，在这方面有两点显得非常突出。第一点，斯大林要求盟国承认苏联在东欧的重要利益（主要是斯大林1939年在苏德条约中所获得的利益，首先是波罗的海国家和波兰东部）。西方盟国在联盟刚开始时拒绝就此做出明确的承诺。斯大林在获得西方国家将尽快在欧洲开辟“第二战场”的保证后，同意将此问题推后解决。而开辟第二战场问题随之成为盟国之间的第二个分歧点，斯大林希望盟国在西北欧发动大规模攻势，但却多次被推迟，主要是丘吉尔反对。1942年7月丘吉尔和斯大林在莫斯科会晤时，两人大吵了一场。丘吉尔称，今年不可能开辟第二战场了。斯大林则指控说，英国首相再一次向我们证明，英国不打算做出人力方面的牺牲（Deutscher 1960：478）。斯大林还对罗斯福做出了同样的指控，这一指控有一定的道理。尽管罗斯福急于使用美军部队打击德军，但他却向丘吉尔做出了让步。丘吉尔坚持

① 虽然当时已解散了第三国际，但显而易见斯大林关切的是要给国外共产党人，同样也给盟国的领导人发出一个信息，那就是斯大林深信，直接联系各国共产党比通过第三国际这个累赘的组织更便利于控制外国的共产党。

认为，过早地攻击“欧洲堡垒”不可能成功，并将付出巨大的伤亡代价。西方盟国转而于1942年发起北非战役，接着于1943年发起了在西西里岛和意大利本土的登陆战役。

尽管斯大林对盟军1944年6月的诺曼底登陆进行了赞扬，但西方盟国多次推迟开辟第二战场的做法给盟国关系造成的破坏是巨大的。苏联认为，丘吉尔的战略是受政治支配的。丘吉尔1942年7月离开莫斯科时（当时正逢具有决定意义但代价巨大的斯大林格勒战役开始），据报道，斯大林说，“一切都清楚了，他们要在非洲、意大利发起战役。他们只是想第一个到达巴尔干。他们想让我们把血流干，以后好将他们的意愿强加于我们。他们的阴谋不会得逞，斯拉夫人将与我们在一起……他们希望我们失去斯大林格勒，失去一个反攻的跳板”（Deutscher 1960：479）。即使有些过分深究丘吉尔的动机，斯大林对丘吉尔和罗斯福背着他讨论问题的怀疑被证实是盟国间不信任的重要原因（在研制原子弹的问题上，斯大林怀疑盟国的诚意是有根据的）。

事实上，罗斯福一直非常清楚苏联承担着对德战争的大部分重担，这使他在战争后期不惜花费很大努力与斯大林达成妥协，也使他不愿意与丘吉尔的地中海战略联系过分紧密。在1943年年底德黑兰会议召开的时候，正如基特·塞恩斯伯里观察到的那样，联盟内部出现了一个转折点，它与英美联盟内的军事力量重心向美方转移相巧合。这一转折点是：美国将它在联盟内的主要注意力由英国转向苏联；同时西方的战略方针由英国人主张的以地中海为中心转变为主要是美国人主张的以西欧为中心（Sainsbury 1985：307）。

尽管斯大林对西方盟国多次推迟开辟第二战场非常不满，但从长远看，西方盟国的这一做法使斯大林获得了决定性的政治优势。它确保了东欧的大部分将由苏联红军来解放。这一点与罗斯福的战争胜利后再考虑政治问题的倾向结合在一起，就形成了一个模式。在这个模式中，军事胜利具有重大的政治影响。罗斯福也因此一直被指责为在政治上太天真，其言外之意是，如果在战争早期就采取更加强硬的措

施，使斯大林受制于被解放国家未来政府组成的协议的话，那么就可以防止或者至少减弱整个东欧随后的苏联化。这一观点在苏联外交官马克西姆·利维诺夫 1945 年 6 月与美国记者爱德加·斯诺坦率的交谈中讲得很清楚“为什么你们美国人一直等到现在才开始在巴尔干和东欧反对我们？你们早在三年前就该这样做了。现在你们这样做太晚了，你们的抱怨将只能引起苏联的疑虑”（Mastny 1979：218）。

但是，如果当时罗斯福向苏联施加强大压力的话，那么很难相信西方还能与苏联保持联盟。罗斯福当时非常担心在没有美国有力支持的情况下，斯大林可能会与德国单独媾和。事实上，苏联 1943 年在斯大林格勒取得对德战争的决定性胜利后，斯大林确曾考虑过与德国单独媾和的问题（Mastny 1979：73ff）。要求斯大林提前就东欧国家的政府组成和边界问题达成协议，并以此作为联盟的条件，可能只会促使斯大林与德国单独媾和。事实上，罗斯福关于在德国投降在望之前搁置详细讨论领土问题的主张是有非常清楚的政治动机的。其中一个主要的动机就是罗斯福确信战后重建的最好基础在于大国团结的继续，而在他看来，这取决于迅速胜利地结束战争。过早地讨论领土问题，特别是东欧的领土问题将冒暴露西方盟国与斯大林之间存在严重分歧的风险，不管怎样，罗斯福对苏联谋求在其西部边界建立友好国家的努力并没有多少异议。当然，如果他能够偷听到斯大林 1945 年年初与米洛万·吉拉斯交谈的那句名言：“这次战争与以往不同：占领他国领土的国家也将把本国的政治制度强加到本国军队所到达的领土之上”（Djilas 1962：114），那么他对避免苏联全盘占领东欧的机会就不会抱什么幻想了。

从本质上说，斯大林的这句话是正确的。当罗斯福、丘吉尔和斯大林 1945 年 2 月在苏联克里米亚半岛的雅尔塔开会，讨论在对德战争即将胜利情况下产生的主要议题时，被解放领土安排的大框架已经由军事力量态势决定了。美国部分出于军事原因，部分出于政治原因做出的不与苏军抢占柏林和布拉格的决定，更强化了按占领区划分责任的模式。西方盟国早在意大利就已开了先例。意大利盟国控制委员

会中的一名苏联代表只获得顾问的头衔，真正的权力掌握在西方盟国占领军指挥官手中。同样的情况是，负责对被解放领土全面监管和军事、政治控制的欧洲顾问委员会对东欧被解放地区进行联合管理的权力也受到了限制。

战时联盟的解体

从某种角度来看，战时联盟的解体毫无神秘性可言。战时结合在一起的盟国一旦度过危机就很自然地追求各自的利益。战前，美国和苏联没有什么共同之处，“但却有许多使它们分离的东西”，从长远的角度来看，结盟只是它们关系中一时的越轨。马丁·怀特写道：“政治联盟总是为了对付第三方才结成的”（Wight 1979：122）。第三方（在本例中是轴心国）的毁灭将“不可避免地暴露出组成联盟的实利主义目的”。此外，为了讨论冷战的开端，让我们先看一下历史记录所表明的一个常识：在国际格局中如果存在两个占统治地位的大国，它们就会走向两个相反的极，在这两个大国周围则围绕着众多小国。正如理论家们所说的那样，大国按自己的方式寻求霸权，其中包括在整个国际格局中追求霸权，这种野心将受到其他追求同样霸权的大国的制约。

从这种角度看，联盟的解体和冷战的开端可以用以下两个因素来解释：（A）联盟政治的运作方式；（B）在包括两个可能的霸权大国在内的国际格局中权力的运作方式。

这些观点尽管很有用，但它们不能包括我们所关心的联盟解体实际过程中的所有复杂事物。首先，联盟的西方支柱不是单一的、统一的一极。战争中一个重要的局部主题是西方的经济、军事和政治力量中心已由英国转移到了美国。再次引用马丁·怀特的话说，英美关系是比正式联盟更深的大国合作关系，关系的基础在于友好、传统及利益，这种关系也不具有很多自然的自利目的（Wight 1979：123）。然而，这并不能保证英美关系完全没有冲突。相反，它使美国承担全球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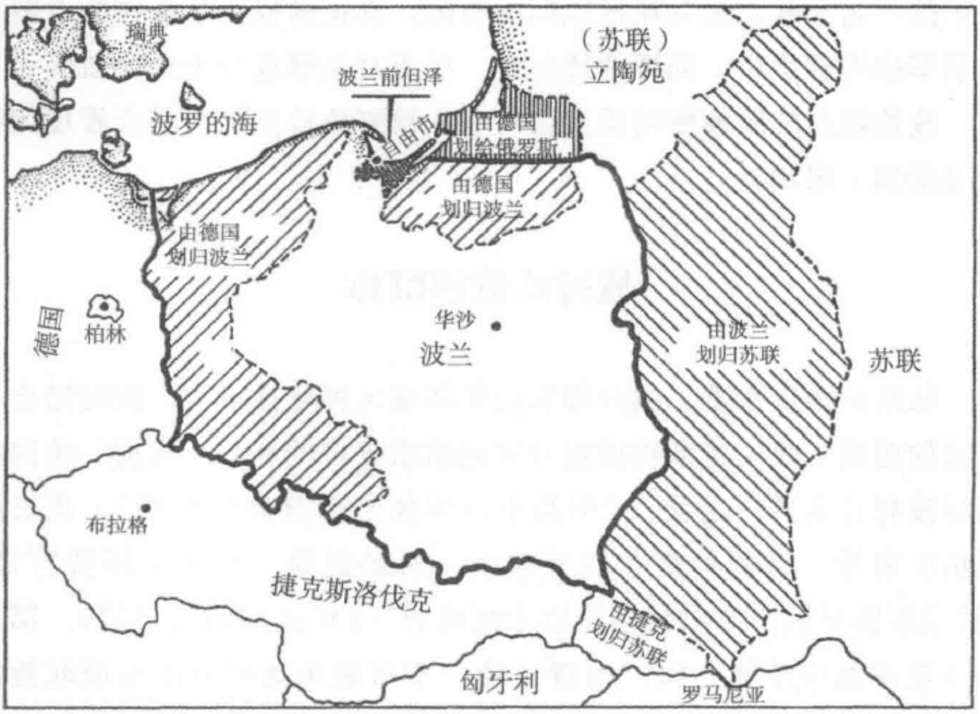


图 3.1　新波兰（1945）

领导角色更加困难，因为这将不可避免地与英国保留其前全球领导遗产的利益发生冲突。如果我们向前解读战时历史而不是向后看冷战的历史，很显然，美国当局当初并没有想到它后来会在欧洲或世界其他地方承担遏制苏联的前沿政治和军事角色（Leffler 1992：16）。罗斯福在雅尔塔会议上曾表示，美国计划在两年内撤出驻欧洲的占领军。在战争后期直至 1946 年中期，苏联视英国而不是美国为主要对手（McCagg 1978：255）。正如罗斯福在雅尔塔会议上所做的那样，美国视自己为英国和苏联之间的调停者，尽管这一认识在 1946 年后逐渐被放弃了。总之，在联盟的西方国家之内，一个微妙的过渡阶段正在发生。在此可引用迪安·艾奇逊的一句话来形容英国战后的两难处境："1944～1945 年，美国发现自己拥有新的力量，但却没有进入能发挥力量的角色。"

上述国际关系理论对战时联盟解体的第二种解释是，战时联盟包

含了两种可能的国际格局的种子。一种主要是美国主张的全球主义，苏联和英国对此只是名义上给予承认。罗斯福总统的战时国务卿科德尔·赫尔对此进行了最好的阐述。他在评论1943年在莫斯科签署的四大国宣言时称，四国宣言的签署表明再不需要势力范围、同盟、力量平衡或其他的特别安排了。在过去，各国都试图通过这些方式来保证自己的安全或促进自己的利益（Sainsbury 1985：117）。另一种在战争中显露出来的可能的世界格局正是赫尔希望通过战时协议排除在外的：这一格局的基础是传统的力量平衡和势力范围的安排。然而，战争的结局没有形成上述任何一种格局，而是形成了两种格局的独特混合体。从信念和经济实力来说都是全球主义的美国，在1940年代末被拖入了势力范围的安排。出于安全和政治原因，想在欧洲建立势力范围的苏联在战后却成了双重意义上的世界大国。这一方面是由于它的意识形态，另一方面是由于它承诺与战时盟国联合重新建立世界秩序，尽管这种承诺只是名义上的。

在战争的最后一年与“和平”的第一年这样的关键时刻，存在着破坏和维持联盟作为世界新秩序基础的两种力量间的脆弱平衡。我们可以在1945～1946年占重要议事日程的五大问题中观察到这些力量的相互作用。这五大问题是：（1）联合国的成立；（2）世界经济的重建；（3）波兰和东欧各国边界的重划和新政府的成立；（4）德国问题的处理；（5）原子弹和核能问题。在1946年中期，这些力量相互作用的结果使西方盟国与苏联之间谈判的最好结局只能是达成脆弱的协议，最坏的结局则是根本无法找到共同之处。

联合国

从表面上看，联合国代表着战后岁月盟国合作的成功结晶。曾于1919年不接受威尔逊总统珍视的国际联盟的美国，此时下定决心要在新的国际组织中发挥领导作用。国会两党对参与国际组织的支持和公众赞成国际主义的普遍情绪对罗斯福下此决心起了决定性

作用。到1942年夏季，3/4的美国人赞成美国参加某种集体安全组织（Gaddis 1972：26）。但这并不意味着对1919年威尔逊理想主义的回归。罗斯福确信国际联盟的失败在于它是基于所有国家在决策中都享有平等的权利这样一个不切实际的假设之上的，所以他赞成大国在国际组织中享有主导地位。大国优先原则在1944年的敦巴顿橡树园计划中得到了体现。按照该计划，联合国安理会及其五个常任理事国——美国、苏联、英国、法国和中国——享有主导权力，而联合国大会则保留了旧的国际联盟的普遍原则。斯大林尽管不怎么倾向于将苏联的利益托付给一个国际组织，但他准备赞成这样一种国际机构的组建计划：它承认一些国家比另一些国家更为重要的事实。

起初，就程序问题和苏联以其16个加盟共和国为由要求在联合国大会获得16个席位（这主要是为了与英联邦国家享有的独立席位相对等）的问题，盟国之间发生了分歧。就这些问题达成的协议几乎没有解决联合国的致命弱点。1945年4月在旧金山举行的联合国成立大会使人们清楚地看到了这些弱点，美苏之间发生了严重分歧：美国要让在战争期间亲纳粹的阿根廷加入联合国，而苏联则要求让由苏联扶植的“卢布林”政府统治下的波兰也加入联合国。联合国安理会五个常任理事国享有的否决权（美国和苏联都想要这种权力）意味着每一方都能否决被认为是有违本国利益的决定（Sherwood 1948：854）①。

由于联合国的有效性要依靠大国的团结，大国在重大议题上的分歧将破坏它采取行动的能力。事实就是这样。联合国成了大国间日益不团结，特别是苏联与安理会其他常任理事国以及它们各自的附庸国和支持国之间分歧的一面镜子。此外，在美国领导人中也有人对联合国的作用持怀疑态度。1945年任助理国务卿后出任国务卿的迪安·

---

① 在朝鲜战争期间，联合国通过了“为和平解决而联合”的决议，此决议旨在设法利用联合国大会的决议来压制联合国安理会的否决权。

艾奇逊曾代表政府劝说参议院批准《联合国宪章》。他在回忆录中称，“我认真并成功地尽了我的职责。但我总是认为，宪章是不现实的”（Acheson 1969：111）。尽管随后的政府都非常小心地确保其提出的主要提案（如杜鲁门主义和北大西洋公约组织）与《联合国宪章》相符合，但是事关重大利益的事根本就不会拿到联合国去讨论。联合国作为集体安全组织在战后初期所取得的唯一成功“就是联合国安理会批准了美国1950年6月提出的抵抗北朝鲜入侵南朝鲜（保留作者的语言风格，后同——编者注）的决议”，安理会之所以能够做出这个决定，只是因为当时苏联为了抗议联合国拒绝接受毛泽东的政府作为中国合法政府而拒绝参加会议（蒋介石的国民党政府在1949年被共产党推翻，并被驱赶至台湾岛）。

世界经济的重建

实践证明合作建立新经济秩序更加艰难，尽管最初存在着取得进展的迹象。罗斯福政府确信，两次世界大战之间政治动荡的根源在于经济上的民族主义，这也是第二次世界大战的一个主要原因。罗斯福最密切的顾问们认为——用财政部官员哈里·德克斯特·怀特的话说，“主要国家间缺乏高度的经济合作，将不可避免地在未来的十年里导致经济战，而经济战则是更大规模战争的序曲和刺激因素”（Pollard 1985：8）。这种观点产生的结果就是1944年在布雷顿森林会议制订的计划，该计划要求促进国际贸易向穷国提供国际货币稳定支持和发放贷款。就美国而言，这项计划的一个重要原则是其全球开放性，对资本主义、社会主义以及发展中国家都适用。美国设想这一计划将受到来自英国，而不是来自苏联的更多阻力，因为英国此时正满怀嫉妒地守卫着它的帝国优惠制。英国是在美国承诺将向其提供战后贷款后才同意签署布雷顿森林协议的（Pollard 1985：67－8）。苏联则主要寻求政治目标，如对其大国地位的承认、用最小的代价获得在国际货币基金组织和世界银行的最大影响力和确保布雷顿森林体系

不干涉其国内政策（Pollard 1985：15）。最后制定的条款赋予苏联与它的国际贸易额不相称的投票权，这表明各方都有意妥协。正如向英国做出的援助承诺获得了英国对协议表示同意一样，向苏联做出的战后贷款承诺为苏联通过协议铺平了道路。就美苏关系而言，布雷顿森林会议是在相当友好的氛围中落幕的。

毫无疑问，经济上的自利目的是美国倡导布雷顿森林体系的一个重要因素。作为建设之中的国际货币基金组织和世界银行的最大出资者，美国可以确定这些新机构的组织形式和运作方式。作为第二次世界大战的一个结果，世界金融和贸易的重心已决定性地转移到了美国，因此在战后重建期间对美国出口物资日益增长的需求将使美国获益匪浅。美国还设想，这些新的机构能够防止为其他国家战后重建而要求美国提供大规模贷款。事实上，美国所以能成为世界经济和金融大亨，一个简单的事实是，美国在战后成为一个占统治地位和不断扩展的经济强国，主要不是由于布雷顿森林体系的建立，而是由于世界其他大多数国家糟糕的经济状况不可能在短时间内因羽翼未丰的布雷顿森林体系的建立而有所改善。尽管美国在战后立即向英国和其他国家提供了短期贷款，但显然需要提出更大的计划，这就是后来为欧洲提供援助的马歇尔计划和为发展中国家提供援助的“第四点计划”。

苏联在 1944 年表示赞成布雷顿森林协议，但却未能在协议规定的最后期限（1945 年 12 月 31 日）之前批准该协议。苏联这么做更多是由于与美国在其他问题上有分歧，而不是出于对该协议本身的反对。美国拒绝在没有严格监管的条件下向苏联发放战后贷款，加之美国 1945 年 5 月突然中断租借法案援助，这些因素都使已因东欧问题而恶化的美苏关系雪上加霜。从这个意义上讲，正如约翰·加迪斯所说，“苏联退出‘布雷顿森林体系’是冷战的一个结果，而不是冷战爆发的原因”（Gaddis 1972：23）。不管怎么说，苏联退出布雷顿森林体系这个结局有利于建立与正在迅速出现的政治分裂相对应的独立的经济集团。

波兰问题

在波兰及其他东欧国家的边界划定和新政府组成方面的冲突是盟国间一系列问题的根源。事实上，盟国就东欧问题曾达成过某些协议。双方爆发冲突的原因，一方面是由于对已达成协议的解释和贯彻落实有不同认识，另一方面也是由于这些协议本身存在问题。雅尔塔会议就东欧问题进行讨论的一个重要背景是斯大林与丘吉尔1944年10月达成的所谓“百分比交易”。根据丘吉尔在半张纸上匆忙写下的安排，苏联和西方在巴尔干国家和匈牙利的责任区分配如下：罗马尼亚：俄国90%，其他国家10%；希腊：英国和美国90%，俄国10%；南斯拉夫：双方各占50%；匈牙利：双方各占50%；保加利亚：俄国75%，其他国家25%（Churchill 1953：227）。

这种安排存在两个问题。为什么一直强烈反布尔什维克的丘吉尔准备在东欧问题上向斯大林做这样大的让步呢？丘吉尔本人对此问题的解释是：这一方案只是一个临时的战时过渡性安排，永久性的安排将在以后的和平会议上讨论（Churchill 1953：227）。但是，丘吉尔之所以同意这样的方案，可能是因为他认为根据当时的军事态势，这是西方事实上可能得到的最好结果。此外，他认为必须保卫西方在希腊的利益。丘吉尔决定在德军从希腊撤军后向希腊派出伞兵部队，以确保在这个极端分裂的国家内实现有秩序的权力过渡。结果，希腊爆发了内战，一方是曾领导抵抗德国侵略并得到共产党支持的力量，另一方是企图恢复君主政体的右派力量。令人感到惊讶的是，罗斯福同意英国支持右派力量的政策（英国的这一政策在美国自由主义占主导的公众舆论中极不受欢迎）（Gardner 1993：194－6），于是引发了有关“百分比交易”的第二个重要问题，即罗斯福对这一方案的态度。

势力范围并不是罗斯福让美国大众所期待的东西。一位英国官员评论说，“美国人对‘势力范围’非常厌恶”（Gardner 1993：

188)。美国人对丘吉尔和斯大林1944年10月的会谈持非常怀疑的态度，认为丘吉尔会做出可能束缚西方手脚的承诺。事实证明，美国的担心是有一定根据的。因此，美国人要求在莫斯科会议上应有美国的观察员。尽管观察员并没有参加丘吉尔和斯大林的会谈，但他们之间会谈的内容向观察员做了充分的通报。总之，罗斯福肯定知道“百分比交易”的要点。最后，考虑到与欧洲未来政治安排相关的其他问题，罗斯福虽对势力范围的划分抱有理性的反对态度，但这并没有妨碍他当时接受现实。他希望势力范围的安排将在以后得到解决。影响对“百分比交易”持肯定或否定态度的重要因素是斯大林和既成的军事态势。用一份近期有关战时外交研究报告的话说，“百分比交易”“给反对俄国人支配波兰的要求投下了阴影，可是丘吉尔和罗斯福还一个劲地维持欧洲没有被三大国瓜分的假象”(Gardner 1993：206)。

关于波兰边界划分的漫长和痛苦的争端被斯大林解决了，他将“军事上的既成事实”强加给了西方盟国。波兰的领土向西移了150英里（保留书中原用的度量单位，后同——编者注），苏联获得了波兰的东部地区，波兰则从德国那里获得了相同的领土作为补偿。数百万德国人被迫从原属德国而现在成为波兰的领土上迁移出去。这一安排是为了让波兰更加依靠苏联的保护，以防止将来德国可能提出归还前领土的要求。

西方国家默认了这些安排，但并没有表示同意斯大林的波兰新政府组成计划。丘吉尔和罗斯福都各自提出强烈理由，坚持建立一个与大西洋宪章和雅尔塔会议的自由欧洲宣言相一致的民主波兰。保卫波兰是英国于1939年对德宣战的直接理由，而罗斯福则念念不忘美国国内的500万波兰裔选民。在雅尔塔会议上通过的条款就建立波兰新的临时政府做出了规定。新临时政府将以现有的苏联支持的“卢布林”政府为基础，但新政府要增补波兰和海外波兰人的民主领袖。一旦军事形势允许，就应随后举行自由选举和组成一个拥有全部权力的政府。然而甚至在罗斯福于1945年5月8日逝世前，

就遵守此协议一事就发生了争吵，苏联清楚地表明，它不准备让非共产党人士享有任何真正权力，同时也不准备举行能满足西方要求的自由选举。罗斯福的继承者哈里·杜鲁门在对苏关系中采用了更具摩擦性的外交政策，但实质上，他想继续罗斯福所采取的与苏联单独打交道的做法，而不是使美国受制于英国的政策，引发斯大林关于西方集团联手反对苏联的怀疑。杜鲁门1945年5月派哈里·霍普金斯前往莫斯科劝告斯大林遵守他在波兰问题上的承诺。在会谈中，苏联做出了很小的让步，但这一让步已足以使美国于当年夏季承认波兰政府。其实，苏联在波兰问题上的态度没有什么变化。事实是，杜鲁门总统只剩下这两个选择：接受一个不满意的协议或者挑起与斯大林的公开决裂。

随后在罗马尼亚和保加利亚问题上也采用了相似的模式。在1945年年末举行的一系列外长会议上，斯大林充分利用美英之间的分歧，就解决保加利亚和罗马尼亚问题建立了一个框架，提供了一个只是名义上的自治政府，而不是真正的民主政府。事实上，苏军于1944年夏季进入这两个国家数月后，共产党人就掌握了全国政权（Taubman 1982：75）。只有在捷克斯洛伐克和匈牙利，非共产党人仍然掌握着真正的权力。但随后的事件表明，西方大国在这两个国家内如同在保加利亚和罗马尼亚一样，没有多少影响（我们将在第四章讨论这一问题）。

关于东欧问题的谈判错综复杂，而且经常发生激烈争吵。谈判的一个重要结果是，推动了美国和英国关系的进一步密切。英国反对美国国务卿詹姆斯·贝尔纳斯不惜付出高昂代价与斯大林达成协议的做法（鉴于丘吉尔与斯大林在莫斯科达成“百分比交易”，英国的反对颇具讽刺意味），加之美国国内对有关保加利亚和罗马尼亚协议的批评，引发了美国对其对苏政策的重新评估。到1946年年初，一个新的更加强硬的对苏政策出台了，其特点是美英之间加强了伙伴关系。更确切地说，美国和英国进一步远离莫斯科，美国开始担当英美伙伴关系的领导角色。

德国问题

在德国问题上，美国的政策最初是企图在政治和经济上全面削弱德国，后来转变了这一主张，认为一个贫穷的、满怀仇恨的德国将是欧洲无穷动乱的根源。苏联和法国最关心的是防止德国东山再起，并获得德国的战争赔款，这与美国主张“恢复”而不是“压迫”德国的政策背道而驰（Gaddis 1972：Ch. 4）。联合控制德国的问题再次成为争论的焦点。1944 年，盟国就各国在德国占领区的范围达成了协议，但这一协议的大框架是盟国作为一个整体对德国进行联合监管。随后两年内发生的事件使这些临时的占领区变成了固定的边界。

在许多有争议的问题中，赔偿问题难度最大。苏联在对德战争中承受了巨大的人力和物质牺牲，现在估计，苏联军民的伤亡高达 2700 万人（Volkogonov 1991：505），因此，这一问题对苏联有着重大的利害关系。苏联在雅尔塔会议上提出，如果盟国对德国提出的战争赔偿以 200 亿美元为基准的话，其中半数应归苏联。美国由于担心德国经济出现崩溃和一旦公布德国重建的账单而增加美国纳税人的负担，遂于 1945 年 7 月的波茨坦会议上提议，各占领国应从各自的占领区得到赔偿。这一决定的后果是实际上分割了过渡时期的责任。同其他领域的协议一样，临时的过渡性的应急之策成了一项永久安排的基础。盟国间在德国非纳粹化政策问题、占领国对各自占领区的权益问题、占领区间战争赔偿的转移等问题的争端搞得盟国对德控制委员会焦头烂额，它根本无法对德国进行联合控制。尽管美国和苏联都继续支持一个统一的德国——苏联坚持这一政策的时间要比美国长，但双方都不愿意冒其潜在的风险：统一后的德国加入对方的阵营。

原子弹

有关美国 1945 年 8 月 6 日和 9 日对日本广岛和长崎使用原子弹

的争论几乎在原子弹投下之时就开始了，争论之声一直没有减弱。美国官方对使用原子弹的解释是，现实军事形势的需要是动用原子弹的主要原因。美国官方认为，用传统的手段击败日本将需要对日本本土进行一场代价高昂、伤亡惨重的入侵。尽管苏联将很快对日宣战（苏联在雅尔塔会议上做过承诺），但看上去日本投降的前景仍不在眼前。杜鲁门总统在他的回忆录中写道，“对此不要产生什么误解，我视原子弹为一种军事武器，对它的使用从来没有什么怀疑。总统的最高军事顾问建议使用原子弹。当我与丘吉尔就此交换意见时，丘吉尔毫不迟疑地告诉我，如果原子弹有助于结束战争，他赞成使用”（Truman 1955：419）。为支持这种说法，人们还可以补充说，搞曼哈顿工程（研制原子弹工程的代号）就是为了制造一种可用的武器。无情的技术和军事逻辑推动着这一进程。正如一位历史学家所说的那样，“之所以使用原子弹是因为拥有原子弹”（Ambrose 1988：51）。严重的是，杜鲁门身为罗斯福的副总统，却对曼哈顿工程一无所知。因此在他面对使用原子弹的决策时，没有多少时间可用来考虑使用核武器会带来的广泛影响。不过，如果杜鲁门总统早一点得知曼哈顿工程，他做出的决策可能也不会有什么改变。虽然如此，他不了解早期关于原子弹的决策过程，这一点肯定进一步促使他视原子弹的使用只是一个军事问题。

但是，当时的评论家或以后的历史学家中很少有人对如此简单的解释感到满意。学者们提出了许多问题，如是否真的需要使用原子弹来迫使日本投降？是否可采用显示原子弹试验情况的方式，使日本确信其巨大威力？是否有迹象表明日本有意于8月初，特别是在第一枚原子弹投下后举行和平谈判？学者们曾认为，日本的投降可能更多的是由于苏联于8月8日对日宣战，而不是由于使用了原子弹。毕竟，第二枚原子弹的使用离日本投降的日期只有5天，而此时苏军已在中国东北地区长驱直入了。此外，有证据显示杜鲁门夸大了美军入侵日本本土作战时估计的伤亡数字。杜鲁门估计美军可能伤亡50万人，而战时的军事计划人员则认为美军的伤亡不会超过46000人。这给使

用原子弹是为了挽救美国人生命的说法蒙上了一层疑云。甚至杜鲁门总统私人日记中的一些证据（人们得承认，这些证据是相互矛盾的）显示，杜鲁门认为可能不必要使用原子弹就可以结束战争（Walker 1990：103－5）。不管怎样，虽然有些说法有事后聪明的味道，一些历史学家仍然确信，存在着除使用原子弹以外的其他选择。人们可以得出这样的结论：当时，在道德、军事、外交和政治方面没有任何谋略足以阻止使用原子弹，并能获得与使用原子弹一样的军事和外交效果（Walker 1990：111）。

如果军事需要不是使用原子弹的唯一因素，那么什么是预计之中的使用原子弹的外交收益呢？尽管历史学家们对使用原子弹所造成的外交影响看法不一，但多数人认为，对外交影响的考虑是做出使用原子弹决策的一个重要因素。事实上，当做出不让苏联人知道曼哈顿工程的决定时，政治考虑就已经在发挥作用了。正如马丁·舍温指出的那样，随着战争的进展，“研制原子弹的外交影响正在逐步走向前台”。罗斯福和陆军部部长史汀生“变得越来越急于将此转换成外交优势”。1944年12月，他们谈到用原子弹的“秘密”作为从苏联获得相应对等物的手段（Sherwin 1977：5）。此外，美国希望通过展示原子弹打败日本所发挥的巨大威力，使苏联在政治和领土问题的谈判中更加合作的意图也很明显。据报道，1945年7月底，正在波茨坦开会的杜鲁门总统接到原子弹首次试验成功的消息后，他不屈服于苏联在保加利亚和罗马尼亚政府组成问题上施加的压力的决心变得更加坚定。

虽然有证据说明美国政府在做出使用原子弹决策时考虑过相关的政治问题，但这并不能证明一位修正主义历史学家关于杜鲁门总统在他于1945年4月就任时就开始采用预定的“核外交”战略的观点。按照此人的观点，杜鲁门总统采取了“推迟摊牌”的战略，其目的是拖延与苏联的谈判，并确保在苏联对日宣战前制成并使用原子弹（Alperovitz 1985：103－9）。很少有学者认同这种绝对的结论，因为在这方面相关证据非常复杂，而且经常是互相矛盾的。用一位现在的评

论家的话说，目前看来，尽管对某些特殊问题有不同看法，但大致的共识是："使用原子弹的主要原因是军事因素，次要原因是外交因素"。

如果说使用原子弹的决策有什么问题的话，那就是杜鲁门总统对使用原子弹的政治影响考虑不周。其他有关组织——包括曼哈顿工程芝加哥实验室科学家小组在内——对此问题进行了思考，尤其是考虑到了无限制的核武器竞赛的危险，认为对日本使用原子弹不应予以宣布。1945 年 6 月的"法兰克报告"被杜鲁门政府完全忽视了，这一报告预见到了以后发生的事，即实现国际控制原子能努力的失败和核武器竞赛的出现（Sherwin 1977：210－19）。

不管美国政府在多大程度上认为拥有原子弹会使苏联的态度变得更为顺从一些，这种希望无论如何看上去都落空了。在美国的核垄断面前，苏联在东欧问题上的立场并没有出现任何松动的迹象（Taubman 1982：110）。

美国拥有原子弹的事实并未能使苏联人屈服，这可能有以下几个原因。首先，由于苏联成功地对曼哈顿工程进行了渗透，苏联领导知道美国在这方面所取得的进展。根据一位权威人士的说法，苏联科学家早在第二次世界大战前就认识到利用核物理来制造原子弹的可能性，在战争结束前，他们已经恢复了研制核武器的工程。至少，当杜鲁门在波茨坦会议上告诉斯大林美国已研制出一种威力巨大的新型武器时，斯大林没有表现出一点奇怪或惊慌的神色。他只是回答说，他希望这个武器能用于对日作战。毫无疑问，杜鲁门说这番话时有恐吓的味道。而斯大林不是一个容易暴露自己弱点的人，即使他处于劣势时也是如此。美国核试验成功的主要影响可能是推动苏联加速实行自己的核计划。

美国决策者面临的第二个问题是将原子弹作为逼迫苏联就范的工具在道德上和政治上都是不合理的。在美国正努力与苏联在其他方面达成协议之际公开使用核胁迫或核讹诈显然不是一个可取的方案，更不用说人们已广泛认识到了原子弹这种新型武器可怕的毁灭力。政府内部和公众舆论要求对核武器实行国际控制的压力非常大。意识到将

苏联排除于曼哈顿工程之外肯定会使苏联产生英美合伙反对它的怀疑，副国务卿迪安·艾奇逊建议，如果要避免核武器竞赛的话，就应与苏联合作实行对核能源的国际控制。他认为，由于核科学无法保密，所以必须达成某种协议（Gaddis 1972：251－2）。

影响美国核能政策的第三点考虑正好与第二点考虑的方向相反：尽可能长时间地保持美国的核优势。甚至那些赞成对核能建立某种国际控制的人也不会因为美国核能发展明显领先就设想向苏联公布所有的核秘密。对美国能够保持多长时间的核优势，存在各种不同的估计。许多科学家认为美国最多领先4年，而反对与苏联合作的国务卿贝尔纳斯和曼哈顿工程的主管格罗维斯将军等人的估计则相反，他们乐观地认为美国的核垄断将持续10～20年（Herken 1980：98－100）。尽管他们的估计被事实证明是非常不准确的（苏联于1949年进行了第一次核试验），但却对原子能谈判起了非常大的影响，使美苏合作的气氛在战后第一年就恶化了。其中影响很大的事件是当年年初美国破获了一个苏联经营的收集核机密的加拿大间谍团伙。

1946年夏季，联合国原子能委员会就核能源国际控制问题辩论的结果表明，美国政府内部的强硬派逐渐占了上风，而苏联对任何原子外交的暗示都继续持抵制态度。所谓的“巴鲁克计划”（以美国驻联合国原子能委员会代表的名字命名）提议建立一个国际性的组织来监管核能开发的所有阶段及其使用。核检查和控制条款是这一计划的重要组成部分。美国坚持的只有在核控制机制就位后才考虑停止制造核武器并销毁核武库，也是该计划的重要组成部分。作为回应，苏联不仅反对实地核查，而且要求在核控制机制就位之前就销毁现有的核武库。谈判随之陷入了僵局，结果美苏两国开始竞相发展原子武器。从表面上看，美国核垄断期间（1945～1949）是美国核外交最可能获得成功的时期。而事实证明，原子弹是一种非常生硬的外交工具，而将其作为战争武器使用的意愿也可能因为对日使用了原子弹而减弱了。

最后一点也值得一提。在原子能问题上，美国同苏联的合作日益

减少，同英国的合作也是如此。英国曾全面参与过美国的曼哈顿工程，但由于1946年通过的《麦克马洪法案》，英国被禁止与美国在原子能领域互相交换情报。美国军方和其在国会的支持者力主增加美英双方核能合作的立法规定，作为其同意由文官当局控制原子能的条件。议员们并不在意《麦克马洪法案》违反罗斯福与丘吉尔就未来原子能的联合研制达成的战时协议的精神与条款，因为他们对美英两国达成的有关原子能的协议几乎一无所知。尽管对合作的禁令随后被部分解除，但在1946年的氛围中，它清楚地传达了一个信号：当美国认为其自身利益与战时形成的“特殊关系”相矛盾时，美国是不会放弃自身利益的。同样重要的是，这一事件表明，美国行政部门在决策过程中占主导地位数年之后，美国国会正想重新发挥自己的力量。在美国和苏联国内，国内政治在战后重新复活，并对外交产生了重大的影响。

1946年：国内形势与国际冲突

1946年发生的决定性变化是美苏双方国内的公众越来越认识到战时的大同盟正在垂死之中。这一变化不是立即发生的，在美国国内，1946年年初明显存在着两种互相冲突的公众舆论。一方面，公众舆论对杜鲁门总统“软弱”的东欧政策提出了批评，批评的矛头指向就保加利亚和罗马尼亚问题与苏联进行谈判的国务卿詹姆斯·贝尔纳斯。而贝尔纳斯自己也因时而变，他于1946年2月初承认美国和苏联存在着巨大分歧，表明了新的强硬路线。另一方面，美国公众舆论的不确定性在公众对丘吉尔3月初在密西西比州福尔顿发表的“铁幕演说”的反应上也很明显。丘吉尔对瓜分世界的设想、对共产主义的满腔仇恨及演说的好战腔调引发了美国公众舆论很大的愤怒。杜鲁门总统和他最亲密的顾问们并没有对丘吉尔的演说发表什么异议，因为丘吉尔的感受与杜鲁门政府官员的感受相似。经常被忽视的是丘吉尔在演说中对“英语国家兄弟合作”的呼吁。由于这看上去

含有故意漠视联合国的意思，于是引发了来自美国的国际主义者和苏联同样的尖锐批评。

就杜鲁门政府内部的观点而言，2月收到的来自美国驻莫斯科高级外交官乔治·凯南的所谓“长电报”非常能说明问题。这份文件给苏联画了一幅黑暗的图像：“苏联正疯狂地致力于这样的信念：就与美国的关系而言，不存在永远的妥协。如果要保持苏联政权的安全，就必须破坏美国社会的内部和睦、毁掉美国人的传统生活方式、打破美国的国际权威”（Jensen 1991：28）。凯南的这些话道出了杜鲁门政府还没有来得及说出的真实想法，这使他很快进入了应对的决策中心，但他后来很快又退出了。凯南的评估是按照美国国务院的要求并根据斯大林2月初发表的一次讲话解读苏联政策而做出的。尽管斯大林这一讲话是向国内听众发表的选举演说，但讲话中对资本主义的严厉批判，关于战争是帝国主义阴谋产物的观点，以及战争证明苏联的社会制度是最好的说法，等等，显然无助于苏联与西方加强合作和加深理解（Daniels 1985，Vol. 1：259）。美国认为，这是苏联的冷战宣言。

随后的国际事件证实了杜鲁门政府最担心的事情。3月，伊朗发生了危机。苏联推迟从伊朗撤军（战争期间，苏军同英军一起被部署在伊朗，以防止伊朗的油田落入轴心国之手）并企图吞并伊朗北部的阿塞拜疆省，美国对此反应强烈。它不满足于通过双边谈判来解决这个问题（谈判在3月末已接近成功），坚持要将此问题提交联合国安理会讨论。结果，苏联虽然做出了让步，但对美国刻意炒作，以便引起公众对此问题的关注深表不满。

在杜鲁门政府内部，官员发表各自看法的自由在1946年呈现受到限制之势。限制程度可以从对商业部部长亨利·华莱士9月一篇讲演的反应来判断。华莱士在讲演中称：“我们现在真正需要的和平条约应在美苏两国之间签署。”他接着说，虽然美国并不喜欢在东欧发生的事情，但我们必须认识到东欧的政治事务与美国没有关系，正如拉丁美洲、西欧和美国的政治事务与苏联无关一样（Siracusa 1978：

210）。这种各打五十大板的做法是美国政府所不能接受的，华莱士被迫辞职。他的错误在于认可苏联在东欧的“势力范围”。事实上，除了战争，美国没有别的办法反对苏联对东欧的统治。但是由于以下几个原因，形势令人担忧：刚刚从纳粹统治下解放出来的国家将再次处于另一种形式的专制统治之下；存在着让很大一部分东欧裔美国人疏远政府的风险。杜鲁门和他的顾问们也不相信苏联的野心会仅限于东欧。一个不祥的兆头是法国和意大利的共产党势力很强大，而且可能从战争造成的经济和社会停顿中获得好处。当华莱士把苏联在东欧的地位等同于美国在拉美的地位时，他就犯下了一个更大的错误。尽管如爱德华·马克指出的那样，杜鲁门政府也许曾愿意赞成苏联在东欧“公开”的势力范围（如同美国在拉丁美洲的“良好”影响一样），但事实已冲走了这些愿望，东欧的现实是苏联的统治。在杜鲁门看来，华莱士的讲话故意无视这一现实（Mark 1981－82：316－36）。

华莱士1946年9月的被迫辞职表明了美国公众情绪的重大变化。在他辞职的一个月内，国会中期选举使共和党在国会两院都占据了多数地位，民主党在国会16年的统治地位就此终结。一大批新的国会议员进入国会，他们中的许多人都是老兵（理查德·尼克松和约翰·肯尼迪就是其中的两位）。他们从战争中吸取了“绥靖”政策的教训，并很快将对希特勒独裁主义的痛恨转向对斯大林版独裁主义的痛恨。哈里·霍普金斯——罗斯福维持大同盟希望的化身——于1946年1月逝世，这象征着战争回声的结束。1946年年初在加拿大发现的苏联间谍团伙使美国人对共产党颠覆的威胁变得更加敏感。距总统选举只有数月之时，在为所有联邦政府雇员制定“忠诚法案”一事上，杜鲁门受到了公众的巨大压力。这些事态的发展为国会非美活动委员会和参议员约瑟夫·麦卡锡的活动提供了丰富的土壤，使美国公众舆论的注意力像关注海外冲突一样——如果不是更多的话——一下子关注起国内的冷战来了。

研究美国政策的历史学家们经常忽视的一个事实，就是苏联国内

也在进行着类似的演变。战争期间对共产主义意识形态的低调处理和对俄罗斯民族传统尤其是军事传统的提升，在打败德国后很快又被颠倒过来了。正如一位英国外交官当时在莫斯科观察到的那样，1946年2月的苏联最高苏维埃选举，也“包括正统马克思主义意识形态的巨大复兴，它强调一种观念，即苏联人民是优秀的人民，它们被由反动资本家及其御用工具社会民主运动组成的敌对世界所包围”（Jensen 1991：40；and see Volkogonov 1991：503）。由于担心苏军部队在西进中受非共产主义欧洲的影响，苏联的安全部门对那些曾在国外短期居住或关押过的人进行了严格审查，这些人被送往劳改营或干脆被处决。一位历史学家写道：“与外国的接触引起了道德发酵……这是一种新的对自由的渴望和对外部世界的好奇。”军队作为能够将“新的发酵物转化为政治理念”的唯一组织，尤其引起了斯大林的怀疑。许多民族英雄，如苏联军事胜利的设计师朱可夫元帅在战争结束数月后就被降职。到1948年，《真理报》在庆祝柏林战役胜利三周年的时候连朱可夫元帅的名字也不提了（Deutscher 1960：560－2），朱可夫后来在赫鲁晓夫时期获得了平反，并出任国防部部长。更为广泛的运动是苏共在安德烈·日丹诺夫领导下展开的“文化斗争”运动，其目的是在文化、艺术、电影和学术领域中清除“非进步思想的”所有残余（Hosking 1985：305ff）。战争期间，这些领域都存在某种程度上的自由。尽管战后的清洗比1930年代的大清洗更具有选择性，但仍然是非常残酷的。这暴露了斯大林将意识形态的一致性强加于苏联社会生活并使苏联与所有可能的外部影响绝缘的决心。

同样具有重要意义的是苏联驻华盛顿大使馆一位官员致莫斯科外交部的一封电文，这封电文在许多方面与凯南的“长电报”相类似。尼古拉·诺维科夫在1946年9月写道，美国企图“统治世界”；反动分子取代了民主党内那些支持与苏联合作的人；正在发展的遍及全球的军事基地体系反映了美国战略的“进攻性”；美国和英国正在“相互让步”的基础上建立瓜分世界的共同统治权。诺维科夫认为，由于英美关系存在着内在矛盾，两者的关系不会持久，但这并不能

让人放心，因为美国的力量已占主导地位。美国媒体所谈及的“第三次世界大战”即反苏战争和公众舆论对“战争精神”的倡导，使美国政府能够更加容易地实现其军国主义的目标。在这漆黑一片的图画中唯一的亮点是“目前苏联的国际地位比战前更加强大”。在这种气氛下，苏联巩固其在东欧的地位就变得更加重要了（Jensen 1991：3－16）。

形势的这些发展对国内政治与外交政策之间的关系提出了许多重要问题。到1946年年末，如果说冷战“思维”还没有完全成熟，那么冷战的轮廓已开始在美苏两国出现。这包括将一切阴谋诡计归咎于对方、官方圈子内部对不同意见的容忍度下降、简单的二分法思维方式日益盛行。在美国，以下两个因素使情况变得更加复杂，这两个因素是：两党政治的重新兴起；“回归正常状态”的愿望与美国发挥主要和永久性国际作用的压力之间的冲突。这两个因素对斯大林没有多大影响。

两党政治的重新兴起在1946年的国会选举中表现得很明显。共和党人的胜利不仅显示了对杜鲁门领导能力的攻击，而且也是对福兰克林·罗斯福“新政”改革的所有遗产的攻击。这迫使杜鲁门（他本人是因罗斯福逝世而当上总统的，并且面临着1948年的总统大选）面临这样的任务：在不放弃民主党的改革传统的情况下证明自己有能力应对苏联人。杜鲁门对坚持民主党的改革传统非常坚定。共和党的策略暗示，新理想主义是危险的社会主义，从而把民主党人、工会和自由知识分子置于防御境地。到1950年，尽管民主党人重新夺回了国会，杜鲁门也在1948年的总统大选中获胜，但共和党人和民主党保守派已成功地将国内政治事务的方向转向反共和反对按新政路线进行任何新的改革。

杜鲁门政府面临的第二个困难是就美国所发挥的主要国际作用达成共识。荒谬的是，许多赞成对苏联采取强硬立场的共和党内和民主党内的保守分子都持孤立主义的倾向。他们对拨出大量款项用于国防或向贫困国家提供援助非常不情愿。对共产党在美国国内进行颠覆活

动的担心来源于一种认识，即共产党在国外的胜利是由于国内存在着第五纵队。这一担心很快变成了一种迷念。杜鲁门一方面因采取对苏强硬立场疏远了自由民主派，另一方面因未能镇压国内的共产党而疏远了保守派，他只能在两难之间走一条狭窄的道路。

关于杜鲁门本人在多大程度上造成了反共思潮泛滥的问题，社会上存在着许多争论。历史学家能毫不困难地指出杜鲁门为了取得对苏强硬路线的共识做出了巨大的努力，他参与了对亨利·华莱士等评论家进行的批判活动。他对复杂问题给出简单回答的倾向经常导致公众争论的温度升高（Paterson 1988：Chs 1－3，5 and 6）。正如林登·约翰逊总统在以后的越南战争中所发现的那样（尽管这两种情况的结果是非常不同的），杜鲁门是在两条战线上作战：一条是与苏联，另一条是与美国的公众舆论。杜鲁门认为需要说服美国的公众舆论认识到苏联威胁的存在。在这种情况下，杜鲁门参与制造这种共识，就是推动冷战思维的形成。当然，这不是说苏联的威胁是杜鲁门想象出来的，或者说他故意夸大了这种威胁。事实上，杜鲁门当时处于多重压力之下：苏联在东欧的活动（他认为是具有侵略性的），英国要求在苏联不妥协态度面前实践美国对保持西欧稳定的承诺，法国和意大利共产党势力的强大，以及对国会和美国公众证明美国在国际事务中发挥前所未有的积极作用的需要。不过没有明确的证据表明，他应当担负煽动国内反共思潮的主要责任。出台“忠诚法案”的要求是国会提出的，杜鲁门的建议是在国会保守派提出更为严厉计划的情况下提出的。

正如我们所看到的，苏联在从战争到和平的过渡期间国内也经历了重大的变化。同美国一样，这些变化来自国内外压力。斯大林也得在其国内战线“作战”。由于与前盟国在外交领域有一系列分歧，斯大林可能低估了他的作战方法在国外被误解的程度。事实上，大多数人通过对1943～1948年斯大林外交政策的全面研究认为，斯大林对其国内地位的焦虑源于他对外部世界的看法（McCagg 1978：14）。毫无疑问，苏联的疑虑也是由于美国在伊朗危机中的行动所引起的，

苏联认为美国正在向它施加经济和原子弹压力。丘吉尔的“铁幕”演说也是引起苏联疑虑的一个原因，这次演说重新点燃了苏联对两次大战之间的西方“包围”的担心。同美国一样，国内和国外事件互相影响，其结果正如1949年美国驻莫斯科大使沃尔特·比德尔·史密斯所观察到的那样，“外交和国内事务可以被认为是互相独立并截然不同的时代已经一去不复返了”（Smith 1950：327）。

史密斯说这番话的原意是美国应集中其全部的国内资源与苏联进行长期的斗争，但他的这番话存在着比其本意更广泛的含义。外交和国内事务之间的界线模糊导致外交斗争赌注的显著增加，使冷战不仅是国家之间，而且还是文化之间的冲突。英国外交部的一位官员于1948年写道：“冷战已经真的变成了保卫西方文明的大事了”（Gaddis 1987：46）。在美国，阿诺德·托因比的《历史研究》（1947）（这本书对世界历史各种文明的衰落进行了广泛的考察）删节本的出版触到了美国神经的痛处。正在寻找能对抗马克思主义学说的美国知识界立刻吸收了托因比在书中表达的西方只有通过精神复兴的方法才能避免重蹈罗马帝国覆辙的信息。在苏联也能找到类似的危机感。安德烈·日丹诺夫1946年写道，苏联作家的任务不只是针锋相对地“回击对我们苏联文化和社会主义的攻击，而且还应该批判和攻击已处于虚弱和堕落状态的资产阶级文明”（Daniels 1985，Vol. 1：300）。最后，战后初期美苏关系的突出特点是双方都敏锐地感到自己的虚弱性，同时双方都不理解对方的恐惧和利益之所在。

在战后的第一年，战时形成的联盟已经解体，但是冷战还没有全面爆发。这段时期也许可以被称为冷和平，因为战争已结束，但却没有一个全面的和平安排。不过，双方都已拟定了关于谁应对东西方越来越大的分歧负责的答案。半个世纪以来，随着形势的发展，历史学家们对此进行了热烈的讨论。我们将在第四章讨论这一问题。

第四章
“两种生活方式”：欧洲的冷战
（1947～1953）

冷战根源剖析

冷战是否不可避免？它是不是二战结束时期国际环境的必然产物？如果不是，那么哪一方该为此承担责任？是哪些决策左右了事态的发展方向？领袖人物的个性是否起到一定作用？具体而言，到底谁该为欧洲的分裂负责？西方在雅尔塔会议上是不是放弃了东欧？美国和苏联在二战末期的确切目标又是什么？以上种种疑问及其相关问题的答案在前一章中已有所暗示，但为了阐明其中究竟牵涉哪些问题，在此不妨做一直接探讨。

从有关冷战根源的文字记载中可以看出，要想对事态发展做出全面解释是多么困难。譬如，简单地把责任归于此方或彼方，往往会低估某些因素的影响，而单个决策者也许很难控制得住这些因素。我们总认为个人（延伸一点甚至可以说国家）是按自由意志行事的道义捍卫者，所以事情本来可能会朝着另外的方向发展。追究责任的做法虽然符合我们这种心理倾向，但很少有历史学家不明白这一点，即决策者在某一具体时间有哪些选择是由环境所决定的。这里所说的环境，包括以前的决策所产生的影响，也就是说，事态的发展至少在一定程度上是确定的。但确定的成分到底有多大呢？纯决定论者与倾向

于追究责任的纯唯意志论者看法极端不同。一位历史学家写道：“如果把一只蝎子和一只狼蛛一起放进一个瓶子里，自我保护意识会驱使它们相互厮杀，斗个你死我活。”从这个观点出发，这位历史学家宣称，“冷战是历史发展的必然结果”（Halle 1967：xiii，12）。

大体而言，第一代冷战历史学家（常被称为“正统论者”），即在冷战的高潮时期撰文著述者，均把冷战的责任归咎于苏联，认为美国所奉行的政策是对苏联挑衅的正当反应。而第二代冷战历史学家（通常被称为“修正论者”）受反越战思想的影响，所持的观点却大相径庭。他们认为，苏联的政策本质上是防御性的，而且是限制在一定范围内的，而美国奉行的则是不肯妥协的扩张政策。修正论者这一立场与苏联研究冷战的历史学家著作中的观点非常相似。

即便是在这些流派内部，强调点也有诸多不同，而且这些看法也不单是作者所处历史背景的反映；冷战历史的编纂一直在进行之中，其间参与者的数量增加了，意见也多了起来，而且先前不同观点的争论也没有偃旗息鼓①。然而，正统论者与修正论者的观点虽然明显不同，却有一个很重要的共同点：双方都倾向于按照唯意志论去解释问题，认为冷战从本质上讲是一个或另一个大国单方面行动的结果，因此，冷战是一场不可避免的悲剧。的确，自1970年代初以来，随着越南战争的落幕和缓和阶段的开始，有关意识形态的争论也有所降温。此外，美国新近又公布了一些文件，二战结束后头几年独立行事的欧洲国家也引起了新的关注。这几项因素加在一起，使历史研究的焦点有所扩大，也使先前的解释者给出的美苏关系框架变得模糊起来了。历史著述方面这个所谓“后修正论”阶段的出现，使得关于历史问题的争论更加宽泛繁杂。

---

① 有一篇杰作说明了修正论者之间如何以一种新的形态继续展开争论，这就是梅尔文·拉弗勒所写的一篇文章。与此相应的有约翰·加迪斯和布鲁斯·库尼霍姆的著作。拉弗勒通过对杜鲁门政府深入研究而得出的观点可以被称为是新修正论者的一种观点，如加迪斯与库尼霍姆的观点一样保留了一些正统派的因素。

参与冷战问题争论的另外一部分重要著述，通常出自对认识、误解与信念方面的作用感兴趣的心理学家与政治学家之手（Larson 1985；Jervis 1976）。这些著述以清楚的证据证明，文化碰撞过程中存在着认识差距，并表明了这些差距在决策过程中所起的作用，以及人们在多大程度上往往是在根本误解对手意图和动机的基础上做出决定的。群体心理学方面的一些研究，说明了“群体思维”（决策群体力图达成一致意见，限制对可供选择的方案加以考虑）所起的作用（Janis 1972）。这种心理学研究方法在对特定的决定进行个案研究，以及对特定决策者的文化前提与思想倾向进行分析时证明最为有效。然而，说明心理因素的重要性并不难，难的是确切判定这些因素对国家而不是个人行为做出解释的程度。心理学的分析方法倾向于以单个国家及其决策人为着眼点——这个国家通常是美国。如此一来，便助长了许多冷战历史论述中偏重单个国家的倾向。现在的问题仍然是要找到一种方法，用于了解美苏两国利益与国际体系的关系。

为了阐明这一点，我们不妨从欧洲的分裂入手，具体讨论一下东欧在美国和苏联政策中的地位问题。有这么一个值得商榷的观点认为：如果美国早做好把东欧拱手让给苏联的准备（不妨把它看作苏联版的美国“门罗主义”），那么冷战的紧张和对抗状态就没必要出现了。如果事实果真如此，那么美国在东欧的利益何在呢？持修正论的历史学家认为，美国虽然当时在东欧几乎没有多少投资，但它也不愿意看到被剥夺未来投资机会的情况出现。有一种说法称，美国的战后计划是以资本主义扩张为目标的（部分是由于对战后经济萧条的恐慌而致），根本不能容忍被排除在一个潜在的重要市场之外。另外还称，苏联刚打完二战后并不是“决意要接管东欧，之后便与美国展开冷战”（Williams 1972：228）。1947 年之后苏联加紧了对东欧的控制，只是为了回敬美国企图在东欧站稳脚跟所采取的一系列行动——尤其是提出通过马歇尔计划向东欧国家提供援助，企图把这些国家从苏联那边拉过来（Williams 1972：272 - 3）。据认为，在 1945～1947 年这段关键性的转折时期，苏联主要关注的是重建遭到

重创的经济和与美国达成妥协。相比之下，美国却“把争议减少到最低程度，大踏步地”将其一贯主张的门户开放扩张观转化成了“一系列结果只能导致冷战的行动与政策”（Williams 1972：229）。

如果这种关于美苏动机与政策的独特假设可以被接受，这一解析方法在逻辑性与一致性方面便不无长处。也许有人考虑到它与持正统论的历史学家观点大相径庭，所以会对其可取性表示怀疑。持正统论的历史学家认为，苏联的政策贯彻执行迅速，又无妥协性，而美国决策者却迟迟意识不到来自苏联的威胁，虽然在最终认识到威胁的程度之后态度比较坚决。不过，一种解释未必仅因为它是片面的就一定是错误的，因为事件本身也可能具有片面性。要想避免片面性，就必须变换判断的依据。为此，我们必须对三个方面的问题加以讨论：（1）东欧的状况；（2）苏联政策的动机；（3）美国政策的动机。

东　欧

历史学家专注于超级大国的政治，从而忽略了东欧国家内部状态在一定程度上导致欧洲分裂的情况。从中世纪后期开始，这个后来形成苏联集团的地区就一直是其东边的俄罗斯、西边的日耳曼帝国和东南边的奥斯曼帝国发生冲突的场所。在后来加入苏联集团的国家中，只有罗马尼亚和保加利亚在19世纪末是独立国家（分别独立于1877年和1878年）。波兰在18世纪后期被瓜分。匈牙利于16世纪并入哈布斯堡王朝，1867年在奥匈“二元帝国”统治之下被准予部分自治，直到第一次世界大战后才完全独立。第一次世界大战后新生的南斯拉夫和捷克斯洛伐克是从前奥匈帝国的版图上分裂出来的。在两次世界大战期间的大部分时间里，除了捷克斯洛伐克，所有这些国家不是被专制的君主国所统治，就是被实质上的独裁者所把持，只是把民主当儿戏浅尝辄止。第二次世界大战期间，匈牙利、罗马尼亚和保加利亚站在了轴心国一边，结果全都被苏联入侵，沦为战败国。

显然，苏联在整个东欧的军事存在对共产党在东欧占据统治地位

起了重要作用。但是，正如雅克·鲁普尼克所述，“把这些国家抵抗共产党夺权的力量较弱的原因仅仅归咎于苏联在东欧的存在，并不能令人满意”：

> 这个问题的答案因各个国家的政治文化背景不同而不同：有的是因为还留有战前那种独裁统治模式的残余，有的是因为社会文明程度相对较低，还有的是因为马克思主义意识形态在知识分子中很有吸引力（或者说保守主义与自由主义不足为信），当然，有的本来就是共产党的基地。但是关键的因素还是战争本身对这些社会的冲击。纳粹的占领以及为争取解放所经历的磨难，从根本上打破了原有的社会与政治结构，为战后共产党的夺权创造了条件。
>
> （Rupnik 1989：76）

总之，在东欧的非共产党人当中，虽然很少有人对 1948 年牢固建立的政权寄予热望，但也很少有人愿意时光倒转，恢复战前的政权。最近有文章认为，在导致苏维埃化的事件中，东欧人并非全都是被动的。除了苏联的武力与这些国家结构上的弱点这两个因素之外，东欧人也犯了关键性错误。相比之下，与其他东欧国家部分状况相同的芬兰却设法抵挡住了苏联的势力（Schöpflin 1993：Ch. 3）。此外，如一名美国记者当时所述，东欧各国的共产党努力处理了当务之急。约瑟夫·哈施在 1950 年写道，“铁幕政权的力量并不在于他们有共产主义，而在于他们夺取政权之后手头有诸多国事要处理，一些改革早就该进行了，他们没有放过这些机会”（Harsch 1950：47）。这些内部状况和苏联的欲望加在一起，注定了东欧会有这样的命运。那么苏联的欲望是什么呢？

苏联的动机

持修正论的历史学家曾经指出，东欧国家一开始并没有立即实行

完全苏维埃化，这一点非常正确。1948 年捷克斯洛伐克发生共产党政变后，完全苏维埃化才开始大规模展开，虽然前一年负责协调苏联集团内部政策的共产党情报局的成立已经发出了明确的信号。然而，实行完全苏维埃化之前发生的一些事（有的甚至可以追溯到战争时期）表明，在完全苏维埃化与某些东欧国家 1945～1948 年间所处的易变状态之间，并没有特别明确的界线。起码在波兰，苏联的意图非常明显，甚至在德国入侵苏联之前就显露出来了。德军在向前推进途中就曾在波兰的卡滕发现过大片墓地，里面埋葬着 1940 年遭到屠杀的 1.5 万名波兰军官。苏联政府现已承认，大屠杀是苏联军队所为。他们的意图很明确，就是要消灭波兰军官阶层（Remnick 1993：Ch. 1）。

后来在 1944 年，正当华沙人民举行反德起义之时，苏联军队却在华沙城外止步不前。西方国家请求使用苏占区的机场向华沙运送救援物资，却遭到苏联的拒绝，直到华沙起义被彻底镇压也没能办成此事。再者，尽管苏联声称，他们没能向华沙起义者提供援助，是因为后勤和供给上出了问题——当时丘吉尔也接受了这一解释，但也很可能是他们另有同等重要的企图，那就是借德国人之手，摧毁华沙抵抗力量中最活跃的分子。有人指出，虽然从军事上看，这是一次反德起义，但“从政治角度看，（它）是一次反苏起义”（Edmonds 1991：385）。1944 年 7 月，苏联军队在推进途中成立了所谓的“卢布林委员会”，随后苏联于 1945 年 1 月（雅尔塔会议前一个月）正式承认卢布林政府为波兰临时政府，此事亦表明苏联决意在波兰抢先一步。鉴于这种情况，西方在雅尔塔会议上其实也没“让出”什么，因为早就被人拿走了。

有人把这些事件归因于战争的需要，还说因为波兰北部平原在历史上曾是西方国家（拿破仑于 1812 年，德国于 1914 年，德国再次于 1941 年）入侵苏联的必经之路，所以苏联在波兰建立统治尤其重要。可是，苏联在其他东欧国家的行径，却与它在波兰的所作所为大同小异。苏联把持着各个国家的“盟国管制委员会”（正如西欧由西方盟国控制一样），对委员会的日常管理工作严加控制，特别是把经济大权牢牢抓在手中。1946 年年初，保加利亚和罗马尼亚已经成立了由共产党占统治

地位的政府，而匈牙利则有好长一段时间都实行多元主义。在1946年举行的选举中，共产党人只赢得了17%的选票。不过共产党控制了好几个部门（最关键的是内政部和商业部），并掌握着警察部门和工会。

即便在捷克斯洛伐克也是这样，1948年前，非共产党人虽然在政府中占据了大多数位置，但是内政部、警察部门和工会的领导人都是共产党人。捷克斯洛伐克之所以有三年的喘息时间，部分可归因于1938年慕尼黑协定的残余影响。英国和法国在慕尼黑对德国吞并捷属苏台德区（当地居民都是德裔）表示了认可，所以第二年希特勒入侵捷克斯洛伐克时，英国和法国就袖手旁观。如此一来，捷克斯洛伐克便对西方国家失去了信任，转而寄希望于同苏联达成和解。于是，捷克斯洛伐克这个在1945～1948年间“最自由”的东欧国家，也一步步成了最亲苏的国家。至于在南斯拉夫，苏联就没必要再谨慎从事了，因为铁托政府铲除非共产党人的决心比斯大林还要大，先是从战时抵抗运动中，然后是从战后政治舞台上把他们全部清除出去了。对于南斯拉夫的清洗运动，甚至连斯大林都产生了疑惑，他1942年曾思忖：“南斯拉夫除了共产党及其同情者外，难道就真的没有其他爱国者了吗？”（Rupnik 1989：79）。斯大林之所以没有冲铁托发火，并不是因为他是个完全可靠的共产党人。恰恰相反，在东欧国家里，南斯拉夫是唯一没有依靠苏联红军而赢得解放的国家，因此便得到了一定程度的自由（至少在对苏关系方面），这种自由是其他东欧国家望尘莫及的。斯大林满心希望南斯拉夫乖乖就范，铁托却针锋相对。1948年，两国关系终于破裂。有关这一问题，稍后将进行专门讨论。

这样，在东欧国家实行一定程度的多元化统治与完全采用苏联式统治之间就有一段时间，这不单单是斯大林允许东欧国家自由还是对其加以统治的问题。事情的发展需要有一个过程，这个过程有时被称为“萨拉米香肠战术”，也就是说，控制是根据各个国家的国情逐步建立起来的。我们也不必把它只看作共产党急于普及其意识形态的结果。对于斯大林而言（有人说对列宁也是如此），共产主义与其说是一种意识形态，倒不如说是一种组织。了解了这一点，我们就可以理

解为什么斯大林有保留地允许在东欧大部分国家进行权力分享，为什么他对某些可能要闹独立的共产党政权（如南斯拉夫和后来的中国）怀疑很深。只要控制牢固，东欧国家内与非共产党人分享权力的现象便可以容忍；一旦出现麻烦，就得采取必要的组织措施。

我们可以认为斯大林在东欧的行为动机是为了确保控制牢固，却不必认定他要蓄意挑起冷战。他既害怕美国，又决意要在东欧维持“友好的”政府。赫鲁晓夫在回忆录中记述了斯大林谈论这两方面问题时用力的样子。他描述了斯大林在谈到未来与美国交战（苏联领导人相信苏美之间必有一战）的问题时是如何“颤抖”的。在与“兄弟国家”的关系问题上，赫鲁晓夫回忆说：“斯大林是这样理解与其他国家的友好关系的：苏联占据领导地位，其他国家俯首听命”（Khrushchev 1990：100，102）。斯大林在扩大控制范围时谨慎从事，这本身就表明他害怕美国，担心美国会削弱苏联在东欧的地位；但他又从没放弃这方面的努力，说明他决心采取一切必要行动，捍卫苏联的领土和利益。

美国的动机

本章稍后将对美国的“遏制”政策——具体表现为杜鲁门主义、马歇尔计划和北大西洋公约组织——详加论述。在此，我们仅从欧洲分裂的角度对美国的行为动机这个概括性的问题做一探讨。为什么美国反对（至少是在口头上）苏联对东欧的控制呢？关于这个问题在前一章已给出了部分答案：美国政府曾向本国舆论保证建立以民族自决为基础的世界新秩序，以及以延续战时盟国友好关系为基础的集体安全，而欧洲的分裂使这些承诺都落了空。美国人对苏联政策的反应也源于幻想的破灭，而罗斯福政府苦心构筑的这种幻想也许注定要破灭。他们曾寄希望于在雅尔塔达成的协议，以为有了这些基础坚实的协议，战后美苏之间便能保持友好关系。罗斯福从雅尔塔一回来就告诉国会与公众，“在每一点上都达成了一致意见”。可如今，面对已露端倪的未来两国敌对状态，他们只能感到迷惑与失望。

并不是所有的美国人都对局势的发展感到惊讶。乔治·凯南，这位美国外交界在苏联问题上最有发言权而且战争期间常驻莫斯科的人物，从战争中期就开始提醒美国国务院注意苏联的特点，却一直没有引起当局的注意，因为凯南提供的信息不是罗斯福和他那些最亲密的幕僚想要的，或者说不是他们愿意听到的。不管怎么说，罗斯福已习惯于绕过政府部门，特别是国务院，个人独揽决策大权。就连他的副总统杜鲁门，对曼哈顿工程的存在都一无所知。结果，他猝然逝世后就出现一个政策真空。杜鲁门一边倚着自己率直的作风，一边仗着在许多事情上对美苏能否合作抱怀疑态度的人的辅佐，填补了这一真空。这倒不是说杜鲁门像有些人所说的那样，在许多问题上与罗斯福背道而驰。但确实意味着他无意去体会罗斯福对外政策的微妙之处。有位历史学家把罗斯福的对外政策称为双重对外政策："对外"的对外政策带有现实主义色彩，用于谈判场合；"对内"的对外政策带有理想主义色彩，用于对内宣传（Yergin 1980：68）。

这些事向我们展示了当时的时代特点以及从战争走向和平这一过渡时期组织机构和人事变动所具有的重要意义，但它们本身并不表明政策的具体发展方向。美国对苏联在东欧所执行的政策不满，这一点明显看得出来，但除此之外，不清楚美国是否还有一套连贯的东欧政策。一位历史学家因此称其为"不成其为政策的政策"。

美国在欧洲大体上有什么目标呢？首先，美国似乎并不打算在欧洲重建结束后继续在欧洲长期保持政治和军事存在。关于这一点有两件事可以证明：其一是罗斯福曾在雅尔塔会议上告知斯大林，美国预计在两年内从欧洲撤军；其二是美国国会起初讨论时不赞同通过拨款实施遏制政策，这一点我们在后文将会谈到。

其次，与这些预期打算相对应的是，美国希望欧洲（至少是西欧，有可能的话，也包括欧洲其他部分）一旦重建完毕，将成为介于美国与苏联之间的"第三势力"。最后，美国的决策者确实打算不仅要在欧洲，而且要在全世界大力拓展美国的经济利益。但是，实现这个目标的前提是把政治与军事代价降到最低程度——这与美国一贯

奉行的对外政策非常吻合。那些持修正论的历史学家对美国希望打开经济之门这一点加以强调是正确的，不过后来修正论者约翰·加迪斯（1972）等强调过渡时期美国政策出现了模糊性，这也没有错。两个派别都分析出了美国政策的两个基本要素：经济上的活力与政治上的谨慎。但是一旦到了单靠外交手段似乎难以实现美国所设想的开放型世界秩序的时候，政治上的谨慎——也可说是孤立主义的残余——便会被放弃。1947 年，杜鲁门主义便露出了马脚，马歇尔计划的制订和北大西洋公约组织的成立（分别于 1948 年和 1949 年），则更加证实了这一点。

具体而言，美国对东欧苏维埃化的忧虑与它对西欧稳定及其抵抗共产主义侵蚀能力的担忧是密不可分的。1940 年代后期，美国最担心的不是苏联入侵西欧（连美国的军事领导人也估计不大会发生这样的事），而是法国和意大利共产党实力的不断增长，以及战后西欧经济与社会的分崩离析通常会给共产主义思想提供不少乘虚而入的机会。对西欧是否有能力靠自身力量进行重建的怀疑，把一个既是经济性又是政治性的难题摆在了美国面前。此外，驱使美国填补西欧势力真空的压力不但来自美国决策机构内部，而且来自欧洲本身。正如一位研究法国对外政策的历史学家所写的那样：“1945～1954 年间，法国方面的拉力，而不是华盛顿方面的推力，构成了美国在外交、经济、政治和军事等各个方面卷入法国的特点。”即便真如其言，法国人也是刚刚把美国人请进门，“就对客人所带来的一切表现出了不满”（Wall 1991：300），当时的这种情况和东欧与苏联之间的情况类似：美国势力在西欧的巩固只能从美国的野心及欧洲内部的状况去解释。

在战后世界格局中，影响美苏政策的关键因素不只是它们作为超级大国的崛起，也不只是两极格局的形成，还包括两个国家所拥有的力量类型有别和优先目标不同。两国对彼此目标的误解肯定对相互关系有所影响，但这不是主要问题。首要的问题是它们都想以最快的速度，在自己拥有最大优势而对方却无法对抗的地区，最大限度地推行自己的政策目标。对苏联而言，这意味着对东欧进行军事与政治控

制；对美国而言，则意味着凭借强大的经济力量和能力将自己推向全球。为了尽力弥补不足，赶超对方的实力，两国奉行的都是会导致在全球确立它们之间对立状态的政策，结果便催生了冷战。

遏制政策与杜鲁门主义

1945年2月，从雅尔塔归来的罗斯福在向国会提出的咨文中（借用科德尔·赫尔的话）宣称，会议所签署的协议“将能终止单方面行动、排他性联盟、势力范围、力量平衡以及所有其他被人们尝试了多少个世纪但总是遭到失败的权宜之计”（Siracusa 1978：34）。正如我们所看到的那样，罗斯福希望美国留下一段清白的历史，但他的愿望很快就因1945～1946年间所发生的事而破灭了，美苏之间的关系仍然处于不稳定状态。两国从1946年谈到了1947年，旨在确立一种实在的形式，以体现彼此合作的愿望。如此这般努力了一番之后，到头来还是启用了不光彩的老一套政治手段——势力范围、排他性联盟，等等。到1950年，这些手段都已牢固确立，两国间的合作最终被对抗所取代。

“遏制政策”为杜鲁门政府的新方针提供了哲学依据，并由乔治·凯南在其匿名发表的《苏联行为的根源》（《外交》季刊，1947年7月）一文中进行了经典阐释。实际上，这篇文章是凯南于1946年发回美国的一个“长电报”的公开版。这两篇文章都概括阐述了凯南多年来对苏联所形成的看法（Kennan 1967：246－51）。正如凯南在他的回忆录中所言，“长电报”和其后署名“X”的文章之所以能产生影响，关键在于时机的选择（Kennan 1967：295）。第一篇文章在关键时刻（当时决策者们正为在东欧问题上未能与苏联谈妥找说法）被政府圈内的人看到了。第二篇文章为早已开始执行的遏制政策（具体表现为杜鲁门主义）提供了社会舆论的依据。

凯南当时并不认为苏联有马上实现其意识形态目标的决心。依据苏联的意识形态，资本主义是注定要灭亡的，克里姆林宫当时并没有

为此制定时间表。苏联做好了打持久战的准备。苏联领导人认为克里姆林宫一贯正确，并有共产党铁的纪律在手，他们“随时可以为了策略目的提出对其事业有利的理论，并要求整个运动的成员都无条件地坚决接受”这些理论。考虑到苏联政策具有慎重性与坚定性，美国必须相应制定“在目标的坚定性、措施的多样性和得力性方面不亚于苏联的政策”。这样，美国就必须设法“从一系列不断变换的地理和政治角度，巧妙而机敏地运用反击力量”来遏制苏联的力量（Kennan 1947：573，575，576）。

凯南为美国政策开出的处方似乎带有明显的全球化倾向，并含有强烈的军事意味。虽然在人们的想象中凯南是遏制政策的设计师，但实际上他对贯彻这一政策在许多方面都有不同看法，到后来竟至批评杜鲁门主义和北大西洋公约组织。因为他在这些年的决策过程中所担任的角色既重要又微妙，所以我们不妨通过他在文章中所表达的观点来看一看冷战是如何形成的。

在凯南为遏制政策冠名之前，这一政策早就以杜鲁门主义的形式登场了。1947 年 3 月，英国宣布它再也无力在希腊内战中继续向希腊政府提供援助了。自从 1944 年希腊挣脱德国统治的枷锁之后，那里便时有内战发生。希腊是斯大林在 1944 年 10 月与丘吉尔签署分赃协定时作为西方的势力范围让给英国的。如今看来，斯大林显然是遵守了这一协定，不但对希腊共产党不予支持，而且对于可能会因希腊内部情况引发共产党革命感到忧心忡忡。对这些变化，美国领导人几乎浑然不觉，他们只是看到，苏联在武器从南斯拉夫和阿尔巴尼亚流入希腊的过程中插了一手。土耳其的情况与希腊相似，虽然国内局势没有乱到希腊那种程度，但苏联向其施加压力，希望控制黑海海峡。由此可见，苏联不但意在对土耳其施加影响，而且想拿它作为垫脚石，进一步在中东获取利益。

英国宣布从希腊撤军后，美国做出了相应的反应，决定向希腊和土耳其提供军事和经济援助。但实际上做出决定还不是它最突出的反应，最突出的反应当属杜鲁门那股卖力劲儿，他的目的是力争大家赞

同美国的基本政策导向。他提出了两种明显不同的生活方式供选择，“一种以大多数人的意愿为基础，另一种则以把少数人的意志强加在大多数人头上为基础”。他在1947年3月12日向国会发表的演说中宣称，“美国必须奉行这样的政策，那就是支持自由的人民，抵抗少数武装者的征服和外来的压力”（Truman 1963：178－9）。

正如历史学家所示，似乎可以肯定地说，杜鲁门在其咨文中如此大唱高调，目的之一是让关注经费开支的国会和尚未完全认识到美国的作用已经扩大的美国公众舆论相信，美国在希腊和土耳其可获得如他所言的重大利益。不过，杜鲁门和他的顾问们也发自内心地相信，这场危机的影响面要比希腊和土耳其的局势大得多。因此，正如丹尼尔·耶金所指出的那样，虽然杜鲁门给国会的咨文被人看作在“搞推销”，但它不是一个无所顾忌的花招（Yergin 1980：283）。杜鲁门主义的提出，还出于另外一种考虑，即美国需要“避免在中东以伦敦后继者的面目登场，好像只是为了把一向由英国承担的责任兜揽过来”。对希腊和土耳其的援助必须上升为美国的一项政策，其出发点是为了维护美国本国的利益，而不是“再次为英国火中取栗”（Hathaway 1981：303）。在这种情况下，有必要对美国特有的目的做一次全面阐述。

在国会就《希腊和土耳其援助法案》所举行的听证会上，政府面对美国承担义务的程度这个问题颇感窘迫。大家担心杜鲁门主义有可能成为一张在其他类似情况下随意支取的空白支票。副国务卿迪安·艾奇逊试图消除这方面的顾虑，但收效甚微。他说，政府对每一件事都要具体情况具体分析，但有一个事实他无法掩盖，即对每一种情况的判断均需要在杜鲁门这篇讲话所确立的框架内进行，这一点在他与范登堡参议员的对话中已暴露无遗。范登堡是共和党参议员中的头号人物，他对这项政策以及其他关键性政策的倡议所产生的影响，为杜鲁门赢得两党的支持奠定了基础。

> 范登堡：……换句话说，我认为你的意思是说，无论在哪个

地区，当我们发现自由人民在维护自由制度以及抵抗旨在向他们强加极权统治的侵略行动中遇到困难时，我们都要有所表示，虽然所采取的方式不尽相同。

艾奇逊：我认为你所言极是。

（Jones 1955：193）

凯南不但对这篇咨文的普遍适用性表示强烈反对，而且尤其反对援助希腊和土耳其计划。他反对向土耳其提供任何援助，还认为对希腊的援助计划过于偏重军事方面（Kennan 1967：314－17）。反观凯南在他署名为“X”的文章中明显流露出的全球主义及所使用语言的军事术语化（“巧妙而机敏地运用反击力量……”），他的变化不免让人感到迷惑不解。凯南在回忆录中坦承自己在阐述遏制的概念时存在以下严重不足：没有言明遏制主要是指政治与经济方面，也“没能明确区分各个地理区域，没有阐明我所说的‘遏制’并不是一项在任何地方都能够成功推行并有必要推行的政策”（Kennan 1967：359）。关于是否能对凯南事后就其署名“X”的文章所做的“更正”信以为真，众说纷纭。至于争论结果如何，这里没有深究的必要。在此提及一点足矣，那就是凯南的主要意图显然是想强调苏联威胁的严重性，因为他感觉大家对这一点重视不够。自1947年担任国务院政策研究室主任一职后，凯南在撰写其他文章时，对苏联的挑战和美国可以做出的选择自然有了更精细、更注重实效的领会（Gaddis 1982：Ch. 2）。在1947年7月撰写的文章里，也许是太急于推出其中的要点，凯南高估了自己手中的牌，结果公众的注意力被转移走了，没有注意到或许是他最重要的建议。他认为，“苏美关系问题，从本质上讲是对美国作为一个国家的总体价值的检验”（Kennan 1947：582）。再扩展一点说，在与共产主义的冲突中，西方手中最厉害的一张牌是它健康而有活力的民主传统和价值观念。这一观点后来成了马歇尔计划的中心内容。凯南自己也感到这其中不无嘲讽，他的名字竟然与自己持重大保留意见且极少参与的杜鲁门主义联系在了一起，而不是和

马歇尔计划紧密挂钩。在马歇尔计划中，他才是核心人物，尽管主要是一个幕后推动者（Kennan 1967：361）。

杜鲁门主义之所以意义深远，主要有以下几个方面的原因：首先，它为超级大国的决策者在冷战的框架内审视所有全球性冲突开了先河。两极格局不仅仅是一个国际关系的架构问题，它还代表着一种心态。人们在思考与行动时，惯于采用简单的二分法，这已经成为第二天性，即便是实际的冲突——比如中东那类冲突——套用这种模式非常勉强。从某种角度上看，这是一个措辞问题，也就是有必要将复杂的现实简而言之，让本国人民理解那些所要承担的陌生的义务。不过，光是措辞恰当还不够，因为在战争结束后，美国和苏联左右其他国家命运的力量的确是太大了。那些条件不大优越的国家确实想仰仗超级大国，尤其是美国，实现它们渴望达到的目的。胡志明就曾于1945年寻求美国对越南独立的支持，西欧国家也为经济复苏寻求过美国的援助。这其中存在一定的幻想成分，总以为其他国家想要什么，美国就能而且会提供什么，直到二战结束后初期那几年非常时期过去之后，人们才完全认清了这些希望不切实际。在各方基本利益正巧一致的情况下，幻想有得以实现的现实基础，美国和西欧之间大概就是这种情况。但随着时间的推移，各方利益出现了冲突，幻想也就失去了可依托的现实。然而，在越南和其他许多前欧洲列强的殖民地国家，幻想与现实之间很快就出现了差距。尽管美国势力强大，但它也不是任何时候都有能力去控制第三世界和其他地区的事态发展。然而也正是因为美国自恃力量强大，才一直相信自己有能力随心所欲地控制任何局面。

杜鲁门主义的第二个重要特征在于它与联合国的关系。许多国会议员和评论家都不理解，为什么美国政府没有通过联合国来解决希腊、土耳其危机。杜鲁门曾在向国会提出的咨文中声称，“在帮助自由和独立的国家维护其自由的过程中，美国会一直执行联合国的方针”。但是杜鲁门没有冒险去依靠联合国实现这些目标。他从实用主义出发，采取了单边行动，其理由也很明确：苏联肯定会使用其否决

权。不过这样一来，最初想以集体安全作为国际新秩序基础的热望就变得一文不值了。

最后，还有一点值得一提，那就是美国政策的这次重大偏离不仅关系到欧洲中心地带，而且涉及其东南边缘地区。结合 1946 年的伊朗危机事件可以看出，这个被称为中东“北部纽带”的地区对超级大国的冲突多么敏感（Kuniholm 1980：xv－xxi）。情况何以至此呢？原因不难找到：那就是土耳其和伊朗与苏联接壤，希腊与苏联集团（如保加利亚、南斯拉夫和阿尔巴尼亚）的领土交界。苏联势力在中东充分扩张的可能性，也是美国担忧的一个原因，尽管这种担忧推迟了几年才化为现实。美国还毫无根据地担心，苏联会在 1948 年以色列建国这一问题上站在阿拉伯一边。实际上苏联很快就承认了这个新国家，并且在 1948～1949 年第一次阿以战争中的一个关键时刻给予以色列可观的军事援助。而苏联在 1950 年代初转而坚决支持阿拉伯民族主义事业，正是由于美国日益拉近与以色列的关系所致（Saivetz and Woodby 1985：25－6）。其间，美国和苏联在 1947 年都越发专注于欧洲事务。杜鲁门主义仅仅是遏制政策发展中精心策划的开局一招而已。

马歇尔计划、德国，以及欧洲的分裂（1947～1949）

从表面看来，马歇尔计划并不是为分裂欧洲而拟订的，但它与苏联的行为结合起来，却导致了欧洲的分裂。马歇尔计划加速了可耻的“势力范围”的发展，德国的分裂和北大西洋公约组织的成立更是起到了巩固这一局面的作用。此时，凯南再次担当了指导性角色。乔治·加迪斯提醒人们注意凯南和国务院另一位主要苏联问题专家查尔斯·波伦 1945 年年初的来往书信。凯南在信中表述了这种看法：考虑到苏联统治东欧的决心，“我们为什么不能体面地做出一定的妥协——干脆把欧洲划分为势力范围，两国各占各的，井水不犯河水

呢?”波伦和凯南一样，也认为苏联是绝不会做出让步的，但他在回信中说，“民主国家不能制定那种外交政策……只有极权主义国家才能制定和执行这样的政策”（Gaddis 1987：48，49）。结果，美国在制定政策时把这两方面的看法都考虑进去了，出台了一项具有双重性的政策。雅克·鲁普尼克将其描述为，“口头上拒绝接受欧洲东部与中部苏维埃化，但并没有什么具体措施或决心切实表示反对”（Rupnik 1989：67）。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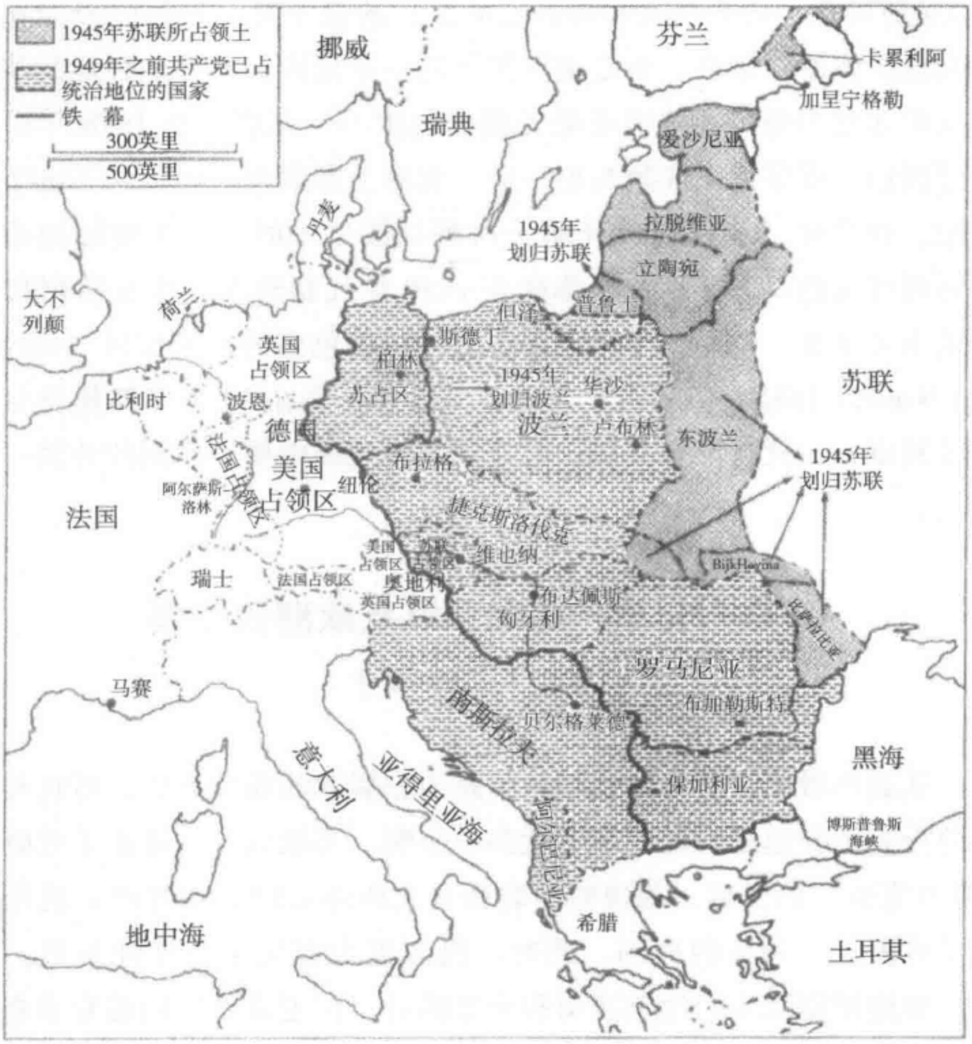


图 4.1　1949 年欧洲分裂形势图

资料来源：P. 黑斯廷斯：《冷战：1945 年至 1969 年》，伦敦，欧内斯特贝恩出版社，1969。

在杜鲁门主义尚处于构想阶段时，欧洲复兴计划就已经拿到桌面上讨论了。实际上，在杜鲁门政府看来，这两项政策从一开始就是相互关联的，用杜鲁门的话说，是“一个核桃的两半”。美国之所以会重新考虑对欧政策，是基于三方面的因素：东欧政府中共产党力量的稳固令美国日益沮丧；在德国问题的安排上没有达成一致意见；西欧经济秩序的混乱显然威胁到了政治的稳定，其中法国和意大利的情况最为糟糕。

最后一个问题也是最为紧迫的问题。1947 年 5 月，主管经济事务的副国务卿威廉·克莱顿实地调查回来后宣称，“现在看来，我们显然是低估了战争对欧洲经济的破坏程度……欧洲的局势正在持续恶化”。然而，欧洲的境况不是他唯一关注的问题。他写道，欧洲崩溃除了会牵涉未来的世界和平与安全之外，“它也将给我国经济带来灾难性的直接影响，如剩余产品市场的丧失，失业，经济萧条和巨额战争债务所导致的严重入不敷出。我们绝不能允许这些情况发生”。因此，他认为，美国必须制订一个实质性的援助计划，并强调说，“美国必须出面来总揽全局”（*FRUS*：230，231，232）。

克莱顿代表了马歇尔计划务实的一面，即对基本经济情况的考虑。而以乔治·凯南为首的国务院政策研究室对欧洲经济衰败给美国经济带来的后果却不大注意，他们所强调的是如何帮助欧洲恢复对未来的信心。凯南在马歇尔 6 月公开宣布欧洲复兴计划时大量引用的一份文件中煞费苦心地强调，“美国援助欧洲不应该旨在与共产党做斗争，而应该致力于恢复欧洲社会稳定而有活力的经济秩序”。他还认为；这一倡议必须由欧洲提出，而且所有参加国都要参与谋划（*FRUS* 1947：225，226－227）。因此，这个构想不仅是一个促进欧洲经济复苏的计划，而且也是推动欧洲团结的计划，它的总体目标是建立稳定而独立的欧洲集团。

但是，这个计划涉及多少个欧洲国家呢？国务院政策研究室主要考虑的是西欧，但为了避免欧洲复兴计划被人指责为反共策略，他们

认为也有必要考虑苏联和东欧参与的可能性。他们对苏联集团的参与问题进行了讨论。但这一讨论反而暴露出他们既不真心希望与苏联集团合作，也不真正期望他们会参与。凯南认为，欧洲普遍合作倡议必须得“搞成这样：苏联的卫星国要么因不愿意接受提出的条件自行将自己排除在外，要么就得抛弃其经济上的排外倾向”（*FRUS* 1947：228）。苏联不愿意向西方的经济渗透敞开大门，所以不会接受这些条件，这一点并不令人惊讶。尽管苏联应邀参加了在巴黎举行的欧洲复兴计划会议开幕式，但一俟明确了参与的条件，苏联便撤回了其参加会议的代表，并向波兰和捷克的代表施加压力，要求他们也步其后尘。

如此一来，人们便只能去猜测，如果苏联接受美国的挑战，同意加入欧洲复兴计划，结果会是怎样。人们把苏联的决定称为“一个重大的错误”（Nogee and Donaldson 1988：86）。但有一点很明确，那就是，如果欧洲复兴计划以令苏联满意的方式运作，那么欧洲的状况就会大不相同。苏联人偏好签署一系列的双边条约，他们对美国人所中意的协作计划不感兴趣，美国构想的核心是建立单一欧洲市场。虽然这个目标由于英国工党政府坚决反对，只得以部分实现（Pelling 1988：98－102），但欧洲复兴计划还是对欧洲煤钢共同体（欧洲经济共同体的前身）的成立（1951）起到了巨大的推动作用。无论如何，有一点让人怀疑，那就是美国国会是否会批准一个符合苏联的思路却会使欧洲深受政治排他主义之害的计划。马歇尔计划虽然名义上是一个经济计划，但它与导致欧洲分裂的政治动因密不可分，这一点明显地体现在苏联撤回其参加欧洲复兴计划会议代表之后所采取的一系列行动方面。

苏联外交部部长莫洛托夫从巴黎归来四天之后，宣布设立共产党情报局，旨在加强苏联对东欧的控制。在匈牙利，政府中的非共产党人士被清除。共产党情报局的领导人安德烈·日丹诺夫还发起了一场诋毁西方意识形态的运动，其中包括号召法国和意大利共产党煽动分裂，将他们国家的非共产党左翼分子全部清除出去。这些行动在人们

看来究竟是对西方蚕食东欧感到的威胁进行还击，还是有意破坏西欧稳定的局面，其实都无关紧要，这无碍于人们对一个根本点的认识，那就是：马歇尔计划迫使斯大林重新定位自己对东西欧的态度（Taubman 1982：172－3）。

在这一过程中，最富有戏剧性的当属捷克斯洛伐克 1948 年 2 月发生的共产党政变，东欧最后一个非共产党领导人从此被赶下了台。自 1945 年以来，贝奈斯总统便一直在小心翼翼地走一条中间道路，既要与苏联保持良好关系，又要抵制共产党的控制。贝奈斯政府迫于苏联屯兵捷克边境的压力而倒台，加之其外交部部长让·马萨里克可疑的自杀，使得西方国家大为震惊。它对美国所产生的直接影响是加快了国会投票通过搁置数月之久的对马歇尔计划的拨款。杜鲁门怀着对战争的恐惧，到国会向立法委员表明，自由已经危在旦夕了。

德国问题与马歇尔计划同样密不可分。1947 年 1 月，英美两国正式合并了各自在德国的占领区，这等于承认四国对德国实行管制这一安排行不通，也不可能行得通了。如今美国便可堂而皇之地以重建德国经济为政策目标了。马歇尔计划的一个重要目标是平息法国人的恐惧情绪，他们担心西德被纳入欧洲范围的体系后会导致德国东山再起。美国辩称，德国的复兴对欧洲经济的健康发展至关重要。随后，美国与西欧五国于 1948 年 2 月在伦敦召开会议，迈出了重要的两步：一是决定在德国西部流通新币，在财政上为经济复苏提供稳固的依托；二是向西德立国迈出尚属尝试性的一步。这一来法国又开始为德国的复仇主义而忧虑了，直到美国答应在欧洲无限期驻军，法国才放下心来。虽然美国屯兵的目的在于遏制德国而不是苏联，但这一决定的做出却恰巧与建立北大西洋公约组织的讨论在同一时间发生。1947～1948 年间做出的政治与经济决定，必然会导致遏制政策的军事化。

苏联对西德（包括柏林在内）流通新币的反应，更促成了这种必然结果的发生。新德国马克头一天进入流通领域，苏联第二天就切断了德国西部地区与西柏林之间的陆路交通。始于 1948 年 6 月 24 日的柏林封锁持续了将近一年之后，美国和英国对柏林的空运才令苏联

意识到：如果不接受西方在苏联占领区的腹地拥有飞地这一“不合逻辑的现象”，那就得发动战争。的确，自1945年二战结束以来，还没有哪个时候比当时火药味更浓。正如一位历史学家所言，在苏联延长封锁的同时，“美国空军的60架远程轰炸机悄无声息地越过大西洋，来到了不列颠群岛”，它们将留在那里等待随后的增援（Halle 1967：164）。根据1949年5月通过的一项宪法，德意志联邦共和国得以成立，如此这般地“解决”了德国问题，尽管柏林问题不包括在内。苏联也不甘落后，到年底便成立了德意志民主共和国。

这些事件构成了一个行动与反行动的循环，要从中看出美苏两国这么做的根本原因是很不容易的，也许根本就是不可能的。比较突出的一点是，美国在建立正式机构方面要比苏联快。马歇尔计划的制订、德意志联邦共和国的建立以及随后北大西洋公约组织的成立，都先于苏联采取的与之相对应的举措——经济互助委员会（经互会）、德意志民主共和国以及华沙条约组织的建立，所以可以说是美国推动了这一局势的形成。而这一切，在一定程度上也可以说是由美苏两国政治风格的不同所致：西方的民主注重征得同意后做出决议，且通过正式文件与机构加以批准。相比之下，苏联采取这些举措之前已经通过共产党以及政治与军事占领，对其集团内的国家有了实质性的控制。从这个观点来看，苏联把其控制正式确定下来，是为了与西方的做法相对应，也使其在东欧的统治合法化，就像在苏联集团内部那样。不过，在之后的几年里，有不少人指责美国为了在西欧迅速组成稳固的西方集团而匆忙行事。

北大西洋公约组织、国家安全委员会第68号决议及遏制的军事化

丹尼尔·耶金发现，战后十年间，美国国内的“国家安全形势”进一步改善——有了“为持久的对抗与战争”所设立的组织（Yergin 1980：5）。1946年年中，正当美国快速进行军队复员的时候，杜鲁

门的特别顾问克拉克·克利福德为他起草了一份文件。克利福德在文中对从欧洲和远东“把孩子们撤回家”的主张可能产生的后果持完全不同的看法。他写道，“在遏制苏联的过程中，美国必须做好打核战争和生物战的准备。一支高度机械化的部队，要既能从海上走，也能从空中行，还要能占领并据守战略要地，因此必须有强大的海军和空军支援”（Etzold and Gaddis 1978：66）。一年之后，随着新防御法案的颁布，综合性更强的防御组织应运而生了，包括由单一的国防部代替了各军种分散管理的部门，成立了国家安全委员会，负责协调所有安全规划工作；此外，该法案还规定设立中央情报局（CIA），以代替战时的战略情报局（OSS），集中负责情报收集工作，增强反情报能力。1948年3月捷克政变之后，杜鲁门请求国会通过一项法案，规定进行普遍军训并恢复选征兵役制。美国制订了战争计划，以备欧洲铁幕被冲破时与苏联打仗（Leffler 1992：221－6）。

然而，当时在是否愿意或有必要对西欧防御承担广泛义务这一问题上，不用说整个国家，就在国会内部也尚未达成一致意见。美国的决策者在向国会提出请求时，必须考虑到孤立主义的残余影响，尤其是在涉及和平时期承担政治和军事义务问题时。此外，美国人中还有一种看法，认为应当让欧洲人自愿拿出资源来用于自身防御，而不是把一切都推给美国。事实上，西欧防御组织的雏形已经存在，英国、法国和比、荷、卢（比利时、荷兰和卢森堡）经济联盟国家于1948年共同签署了《布鲁塞尔协定》，并按照这个协定组建了西欧联盟。可以想见，这个后来有美国加入并提供军事援助的组织本来有可能成为西欧防御的主要工具。但它实际上并没有起到预期的作用，后来建立欧洲内部防御体系的努力也宣告失败。这在很大程度上既说明了欧洲内部的分裂状况，同时也表明了当时美国与欧洲的关系状况。

首先，美国军事计划制订者认为，西欧联盟的结构有很大的局限性，远不能抵抗苏联的侵略。有位美国官员声称，“如果没有亚速尔群岛（葡萄牙的领土）、冰岛和格陵兰岛，足量的支援就抵达不了欧洲”，这便意味着至少也要把冰岛、丹麦和葡萄牙纳入组织之中。此

外，美国国会也不会甘心只当欧洲组织的普通成员，却要负担大部分的经费开支。总之，西欧联盟“一方面是太‘欧洲化’了，美国孤立主义者接受不了；另一方面它又太小了，根本无力阻挡苏联的入侵”（Kaplan 1985：115）。迈克尔·霍华德指出，最后只能带来一种很矛盾的结果：“美国坚持主张，这个组织应该是一个大西洋国家的实体，它不仅仅属于欧洲。这一主张被欧洲主要参与国勉强接受了，美国人本来可以不出美国本土，只需与几个国家联合的组织打交道，但实际上却更深地卷入了欧洲的防御”（Howard 1985：18）。

美国国会关于北大西洋公约组织的争论，反映了美国人对于为欧洲承担义务的矛盾心态。虽然许多美国人都认为美国需要与西欧国家一起参加某种安全条约，但却对在欧洲长期大量驻军不感兴趣。当有人问及美国政府是否计划派遣“相当”数量的军队去支持欧洲防御时，迪安·艾奇逊向参议院保证：“那个问题的答案……显然绝对是‘不’”（LaFeber 1993a：83）。参议院还同样获得了这样的保证：没有制订重新武装德国的计划。北大西洋公约组织是美国政府设想用于帮助欧洲树立起信心（至少公开宣传中是这样说的），使其不至于迫于苏联的压力在政治上屈服而走向绥靖与中立。

北大西洋公约组织的概念之所以会发生重大变化，起因是美国于1949年9月探测到苏联在进行原子弹试验。这一消息打破了美国人对自己核垄断地位持续时间的乐观估计。在此之前，杜鲁门的科学顾问们估计美国的核垄断地位可能持续5年，一些政府文官的估计是20年（Bundy 1988：199；Herken 1980：98－9，301）。这个消息也引发了一场大规模调查叛徒的行动，他们认为苏联只有依靠美国叛徒的帮助，才能以如此快的速度拥有自己的原子弹。调查结果发现，克劳斯·富克斯（此人曾效力于曼哈顿工程，后加入英国籍，于1950年3月被英国抓获，并被判犯有间谍罪）和罗森堡夫妇（也是在1950年年初被判犯有间谍罪，随后被处决）就是这种叛徒。历史学家一直认为——不过没有确切的证据证实——也许富克斯和罗森堡夫妇所提供的情报的确加速了苏联原子弹计划的实现，但是没有这些情

报，苏联也会很快制造出原子弹（Gaddis 1992：98）。这一结论后来有一部分得到证实，但另一部分却被1993年公布的证据所否定。这些证据表明，苏联的第一颗原子弹实际上是根据富克斯所提供的美国第一颗原子弹的草图复制而成的（《纽约时报》1993年1月14日）。

核垄断时代结束的军事与战略意义对美国决策者的分析思考产生了深远的影响。1949年，美国“失去了”中国，约瑟夫·麦卡锡开始抨击杜鲁门政府对共产主义的威胁反应软弱，以及苏联核试验成功的消息，这三方面结合起来产生的压力迫使美国开始对其战略目标进行全面的重新评估。重新评估产生的直接结果是，杜鲁门下令制订一个应急计划，发展氢弹或称热核弹。此外，1950年起草的一份对安全政策的全面检讨性文件，也对未来的情况具有同等重要的影响。那就是人所共知的被历史学家普遍认为与那篇杜鲁门主义讲话具有同等意义的国家安全委员会第68号决议（也称NSC68号决议）。

NSC68号决议阐明，在冷战的关键年代，军事与意识形态考虑是密不可分的。它认为苏联的挑战既是道义上的，也是物质上的。两年前捷克斯洛伐克失去了自由，“我们也在价值观念上承受了难以估量的损失，它要比我们在物质上早已承受的损失更具破坏性”。为了使苏联相信美国维护自由观念（“历史上最富感染力的观念”）的决心，美国就必须具备与其意图相匹配的能力。“如果现有的和能随时动员的总体军事实力不高出一筹，那么‘遏制’政策（事实上是有计划的、渐进式的强制政策）不过是一项虚张声势的政策而已”（*FRUS* 1950：240，239，253）。国家安全委员会第68号决议所依据的理论没有多少新东西；它的基本内容是国家安全委员会1948年一份文件的翻版（Leffler 1992：355－6）。然而，全球形势的变化，尤其是苏联拥有原子弹一事，迫切需要美国采纳NSC 68号决议中的主要建议，即一定要在如今被人们习惯称为“自由世界”的地方快速积聚起政治、经济和军事三方面的力量。

国家安全委员会于1950年1月受杜鲁门的委托起草了NSC68号决议，4月将其呈送给杜鲁门总统，9月，该决议获得批准。同年6

月，朝鲜战争爆发。这场战争对这份文件由积聚足够军事力量的计划向切实可行政策的转化起了至关重要的作用（我们将在第五章讨论这个问题）。北朝鲜的进攻不仅证实了 NSC68 号决议提出的共产主义威胁论，而且也为美国按照决议投入新的军事经费提供了正当理由，从而为决议的执行扫清了道路。“正当我们为 68 号决议焦急不堪的时候，”艾奇逊的一个助手回忆道，“感谢上帝，朝鲜冒了出来”（Whelan 1990：74）。如果共产党打算突破南北朝鲜分界的三八线，那么谁能保证他们在欧洲就不照此办理呢？朝鲜事件一开始，美国决策者们就着手加强西欧的防御了，具体措施包括：将军事援助增加四倍；在马歇尔计划规定的援助到期后继续延长对西欧的经济援助；还有就是扩充美国军队，足额补充国防预算。此外，美国还不顾法国的反对，开始参与促进西德重整军备这一棘手的事情（Leffler 1992：383－90）。

首要的一点是，NSC68 号决议所涉及范围是全球性的，在具体应用方面则是军事性的。美国没有放弃与苏联谈判的打算，但却小心翼翼地采用了军事要务先行的策略。正如 NSC68 号决议的起草者所言，“谈判不是一种孤立的方案，而是一种赢得支持的手段，我们可以借此实行积聚实力的计划，而且如果有必要，且大家也有这种愿望的话，我们还可以把它作为一种记录冷战进展的工具”（*FRUS* 1950：276）。总之，随着 NSC68 号决议的具体实施，凯南的主张，诸如美国要有选择地承担义务，政治要先于军事，以及在制定政策时要以苏联的意图而不是其能力为依据，等等，所有这一切都被抛在了一边。

NSC68 号决议标志着遏制政策开始走向军事化，但它也不乏灵活性。不过，它的确没有为采取军事行动制定明确的准则。“记录冷战进展”是一句模棱两可的套话，只是为美国易遭抨击的立场进行战略性后退留出了余地。同样，如果决策者们认为从维护本国利益出发，需要在可以接受的范围内付出一定代价，那么 NSC68 号决议也能为美国的行动提供足够的理由。苏联在 1949～1953 年这关键的几年里所执行的政策，也明显存在着好战性与机会主义相结合的特点。

斯大林主义与国内外的冷战（1947～1953）

1947年共产党和工人党情报局的成立导致了东欧的斯大林化。在政治方面，东欧各国都不得不按照苏联模式制定新宪法，规定除共产党之外的所有政治派别都是非法组织。挑选领导人也是以对克里姆林宫的服从程度为依据的，所有持不同政见者和其他方面的可疑分子都遭到了无情的清洗。国内安全部队均采用苏联模式，并接受苏联的持续监督。在经济方面，苏联把中央集权和国有化制度强加于东欧国家，并通过极不平等的安排把它们与苏联紧紧地拴在一起，借此从东欧攫取货物及原材料，给自己带来可观的好处。对东欧主要工业的直接控制则是通过在东欧成立股份制公司来实现的，苏联在其中占有大部分股份。苏联的农业集体化模式也强加给了这些国家（波兰除外）（Gati 1990：9－23）。

斯大林曾考虑过把东欧集团国家纳入苏联的版图，但后来又明白，不用这么大折腾，同样可以不付出任何代价捞到同等好处。不过，在这里有一点值得一提，那就是苏联与东欧集团关系方面的事务不是由外交部负责，而是由一个专门负责与人民民主国家关系的特殊部门掌管。如此一来，苏联与其所谓的兄弟国家的关系便既不是正式的帝国统治关系，也不是同志式的合作关系，而是介于二者之间的一种不伦不类的关系。

斯大林化给东欧国家带来了巨大的恐怖，其范围与强度可与苏联国内1930年代的大清洗相提并论。此处仅举一例说明：1950～1953年间，据估计匈牙利有38.7万人因为反对或涉嫌反对匈牙利政权而被捕入狱，约占匈牙利总人口的5%（Brzezinski 1989：110）。然而，在对匈牙利和其他国家实行苏维埃化的过程中，这些国家内的大批共产党人却似乎怀着“对斯大林领袖气质不可动摇的信心与景仰”，一直扮演着同谋的角色，给予其支持（Gati 1990：26）。同样，苏维埃

化也迎合了东欧国家农民和工人的利益，他们从战前的政权那儿几乎没得到什么东西，所以态度非常激进（Brzezinski 1989：108）。不过，强行实施苏维埃化统治，虽然给东欧国家带来了短时间的稳定，但它们也为此付出了代价，其中尤为典型的是，它们明显依赖莫斯科的共产党政权而没有获得自己独立的合法地位。到 1953 年斯大林逝世之际，已经有好几个东欧国家明显地不再效忠苏联。将在第六章讨论的 1953 年的东德起义和 1956 年的波兰、匈牙利起义，是这种普遍不满体现得最为明显的几例。

唯一逃脱了这一模式的东欧国家是南斯拉夫。南斯拉夫在 1948 年被开除出共产党和工人党情报局，起因就是苏联试图决定南斯拉夫领导的人选。斯大林想施展策略把铁托赶下台，南斯拉夫领导人却牢牢把权不放，因而发生了抵触。南斯拉夫在战时几乎没有依靠苏联就从德国的占领下获得解放，而且战后铁托也在南斯拉夫建立起了强有力的共产党政府，他掌握政权的牢固程度不亚于斯大林对苏联的领导。在与斯大林公开决裂之时，铁托尚未宣称要走自己的社会主义道路，但他很快就宣布了几项措施，这些措施推动南斯拉夫的国家体制向地方分权及经济自治的方向发展，但同时仍坚持主要企业国有化的原则，并保持共产党的领导地位（Nogee and Donaldson 1988：221－2）。

用苏联的术语来讲，铁托的罪名是“民族主义”，或者说是背离了“国际主义”，后者是苏联在国际共运中领导地位的代名词（Lowenthal 1964：6）。然而，与对苏联的不忠相比，铁托的其他做法更成问题。南斯拉夫在巩固其社会主义国家独立地位的同时，还形成了自己的一套思想，这种思想认识的基础是，苏联控制邻国的强烈欲望来自它的官僚化和在苏维埃体系内部实行镇压。于是，铁托向苏联提出了理论上的挑战，这一举动威胁到了国际共运在意识形态上的凝聚力。因此，苏联领导人拿“铁托主义”当替罪羊，杀一儆百，借以维持东欧集团行动的一致也就不足为奇了。苏联尤其担忧的是铁托想打开国门，与资本主义国家进行贸易联系，这直接违背了斯大林有

关国际关系的两大阵营理论。如果其他东欧国家纷纷效仿铁托的做法，那么东欧集团的安全以及意识形态上的凝聚力就会受到明显的威胁。

NSC68号决议的起草者曾做过估计，到1954年，苏联可能会具备投送原子弹的能力，也可能会生产出热核弹（氢弹）。鉴于这一潜在的“危险形势”，美国必须“着手壮大实力，以便为挫败克里姆林宫企图的坚定政策做后盾”（*FRUS* 1950：287）。具有讽刺意味的是，根据捷克斯洛伐克国防部部长的记述，在1951年1月举行的苏联集团领导人会议上，斯大林也做过类似预测：

> 没有一个欧洲国家的军队具备与苏联军队相抗衡的实力，人们甚至可以认为这些国家压根就不会进行抵抗。美国现有的军事力量还不够强大，因此苏联阵营在这一领域具有暂时的优势。但这种优势也仅能维持三四年而已，其后美国将借助快捷的交通手段把军队运送到欧洲，并将充分利用其核优势。因此，我们有必要充分利用这几年的时间，动用我们所有的经济、政治和人力资源，帮助军队完成系统性的准备工作。在未来的三四年里，我们所有的国内和国际政策都将服从于这个目标。我们只有动员起全部的力量，才能抓住这唯一的机会，让社会主义扩大到整个欧洲。
>
> （Rupnik 1989：127）

如果过分强调这个文件，只以它为指南研究斯大林1950年代初的政策，那将是愚蠢的。仅仅在6个月以前，斯大林还曾决定，不对南斯拉夫发动以驱逐铁托为目的的军事入侵，理由是美国曾对北朝鲜入侵南朝鲜做出迅速反应，而这一幕有可能在欧洲重演（Charlton 1984：77）。1951年1月，斯大林又对苏联和美国的相对军事实力做出了大不相同的估计，这同样与朝鲜事态的发展有关。此时，随着中国的参战，局面开始向不利于美国的一面转化，于是斯大林也对利用这个机

会向欧洲施加压力增强了信心。说来也巧，恰恰在这个时候，美国正根据国家安全委员会第68号决议做出决定，扩充驻欧洲陆军和空军的兵力，到1952年年底，由1950年的1个步兵师、3个装甲突击团和两个战斗轰炸机大队增至5个步兵师和7个空军联队（Wells 1985：189）。

斯大林1951年1月声明的重要意义，不仅仅在于证实了美国人对最坏情况的担心（如果他们有这个担心的话），而且还在于：如果与斯大林在其他场合的谨慎表态联系起来看，这表明苏联人在了解西方国家的强势与弱势之后，改变了策略。斯大林在1948～1953年间所采用的主要对外政策举措是促进世界范围内的“和平运动”。1948年，正当西方国家酝酿成立北大西洋公约组织时，苏联通过法国和意大利共产党发起了和平运动。推行这个运动的最初结果是共产党在西方更加孤立了，尤其是在法国共产党总书记发表了一项声明之后。他在声明中称，如果苏联进军西欧，他定会给予支持。斯大林采用激进的政策没能成功阻止北大西洋公约组织的成立，于是他改变立场，开始利用和平运动去迎合西方自由主义者的“布尔乔亚”特点——事实上是复兴了战前的“人民阵线”。抱着利用西方公众在原子弹问题上有意见分歧而大做文章的希望，苏联主持召开了世界和平大会，并起草了“禁止原子弹”请愿书，据说征集到了5亿多人（大部分是苏联集团的公民）的签名。虽然和平运动赢得了一些西方著名自由主义人士的拥护和支持，但还是没能制止住西方国家的军事动员（Shulman 1963：54－61，91－100）。

在外交战线上，苏联也同样在两种策略之间来回变换，忽而采取毫不妥协的好战态度，忽而改用缓和的安抚之举。正如马歇尔·舒尔曼所述，苏联对朝鲜的政策是随战争进程而变换的，共产党的军队处于优势时，斯大林在朝鲜问题的解决方案上便持强硬态度，而当美国赢得主动权时，他又变得随和多了（Shulman 1963：158－75）。

斯大林在1952年提出的解决德国问题的建议，即他在1953年3月逝世之前所提出的最后一个重大政策性倡议，更加让人迷惑不解。在一系列致西方的备忘录中，他建议让德国重新统一，允许它在保持

永久中立的条件下拥有自己的军队。这是否如西方（包括西德）领导人所认为的那样，是斯大林在利用西方国家内部在拟议重整西德军备这一问题上的分歧，达到破坏西德的稳定、削弱西方国家的防御计划这一目的呢？还是斯大林真的有意通过双方的让步来解决德国问题呢？——譬如说，苏联愿意“为了实现阻止德国重整军备这一更大目标，而牺牲共产党统治下的东德”（Nogee and Donaldson 1988：99）。对此，没人能做出确切的回答，但可以肯定这两个方面的动机都存在。值得注意的是，在斯大林的最后一个有生之年，有两件事恰巧同时发生，那就是“和平共处”在苏联政策中的地位日益突出与格奥尔基·马林科夫在苏联领导层的崛起。斯大林逝世后，马林科夫即成为苏联统治集团内举足轻重的人物，并担任和平共处政策的主要发言人，不过时间比较短暂。根据这些情况判断，苏联提出有关德国问题的建议，的确是在努力与美国达成和解。当然，这与苏联扰乱西方防御计划的目的是一致的。

结　论

历史学家常常不愿意使用“力量均势”这个术语来形容冷战时期的美苏关系，因为这个词会让人太多地联想到欧洲内阁施展外交手腕，联想到外交人员通过暗箱操作、无所顾忌地操纵他国命运的不齿行径。它尤其让人感到，把冷战描述为力量均势冲突，使人不能对东西方冲突中政治原则与伦理观念的强烈冲突做出适当的评价。有趣的是，持修正论的历史学家拒绝接受力量均势这一概念，或者“现实主义者”对冷战的诠释，其坚决程度不亚于最嚣张的美国政策辩护士。那么，这种把传统的力量均势政治与冷战政治严格区分开来的倾向从何而来？这样做是否有道理呢？

这种区分的产生部分源于冷战本身对意识形态的强化，同时也源于美国人头脑中长期以来所存在的一种思想倾向，即认为美国代表着不同寻常的反欧洲原则。但是，鉴于到 1947 年布尔什维克革命已有

30年的历史，而且大部分美国人从一开始就坚决反对它，那为什么我们不能自然地把冷战的开始时间确定为1917年呢？如果意识形态是冷战的主要因素，那么1917年就是合乎逻辑的冷战起始日期。人们一般把1947年，而不是1917年作为冷战的开始日期，原因在于国际格局即力量对比的变化①。直到1945年，世界主要强国的格局还不足以使美苏之间的对抗成为国际关系的决定因素。第二次世界大战的决定性结果是破坏了德国作为世界大国的地位，如何在中欧和东欧创造与维持安定局面这个老问题需要有一个新的解决方案。从历史上看，这个地区一直是德国（包括奥匈帝国）与俄罗斯实现野心的必争之地。随着德国的分裂与英法两国国力的削弱，除了美国之外，欧洲大陆上没有哪种势力能遏制住苏联的势力。如此看来，意识形态的对抗是两极冷战结构的结果，而不是其产生的原因。1945年后，力量均势便以一种特殊的形式——两极格局——而存在，两极格局就是一个只有两位主赛手的均势格局，它加剧了从1917年就开始存在，但一直处于蛰伏状态的意识形态分裂。

从战后国际格局的结构上，我们尚不能完全认清冷战的性质，但它界定了政府运转的基本环境。冷战本可以不呈现这种形式，但是美国在欧洲均势中的一些参与形式，无疑是苏联在东欧参与活动的增强版。当然，意识形态的冲突使冷战具有近乎宗教式狂热的特征，但是退一步讲，即使美苏两国拥有相同的政治体系和社会价值观念，也难以相信它们之间不会发生冲突。总之，借用肯尼斯·华尔兹的话概括地讲，超级大国的角色总体上已经在1945年由它们各自在国际格局中所占的位置决定了，其中主要的是它们过于强大的力量和影响（Waltz 1979：80）。

到1953年，欧洲的冷战已经达到了一定程度，甚至陷于僵持状态，不过在整个1950年代欧洲的形势始终很紧张。亚洲的情况则不同，那里冲突的方式更为复杂多变，而且亚洲国家也不大听超级大国的话。关于这一点，我们将会在第五章看到。

① 雷蒙德·加特霍夫在其著作中也表达了上述这种观点。

第五章
冷战：远东
(1945～1953)

亚洲与欧洲相比

对美国和苏联的决策者而言，界定自己在欧洲的利益相对要容易一些。1948 年，两国终于放弃了共同争取全面解决欧洲问题的努力，转而寻求在各自的利益范围内巩固其势力影响。它们各自的控制手段相去甚远，但鉴于地理环境、历史条件和当时的需要，对欧洲分而治之至少要比公开冲突好得多。“铁幕”不但妨碍了国与国之间的政治交往，也在人们的心理上造成了同等程度的隔阂。“铁幕”明确限定了双方的行为，尤其是苏联拥有原子弹之后。原子弹加大了任何一方冲破这道屏障所需的代价，于是双方的对抗由此转变为核军备竞赛、宣传战和间谍战。

中心政治舞台上一出现僵局，各个与之密切相关的冲突领域随即纷纷活跃起来，进而产生了一个深深嵌入西方文化的对抗性思维模式。对原子战的恐惧导致了裁军文学的萌芽以及一批预示未来灾难的小说和电影的兴起。较之先前朱尔斯·凡尔纳和 H. G. 威尔斯的同类作品，这些以预告未来灾难为主题的艺术作品更令人感到灾难的现实性和紧迫性。对共产主义的恐惧，使表现反颠覆斗争的揭露性文献电影在 1950 年代大为流行。好莱坞的科幻电影也非常火爆，它们的中

心内容是：人类受到来自外层空间的无名威胁，只有坚定西方价值观念，运用大量技术手段，方能将之击溃。间谍小说和间谍电影采用侦探小说的手法披露背叛与告密事件、揭露间谍技术，表现出了现实生活中人们内心的战栗。尽管这些文艺形式的繁荣的确靠的是外表的欺骗性、潜伏的危险和可能发生的毁灭，但恐惧的根本原因不难找到，那就是国际共产主义的图谋。具体而言，欧洲的僵局为国民的恐惧情绪提供了国际背景。这已成为国际舞台上不争的事实，成为加强西方文化一致对抗“东方”文化的焦点。

然而，在真正的东方（多少个世纪以来西方人一直把它与“东方国家”混为一谈）用于理解欧洲形势行之有效的方法却不大管用。在亚洲，无论是在地理意义上，还是在政治意义上，敌对地区与友好地区之间的界线远不像在欧洲那么清晰。在亚洲，不存在与欧洲的“铁幕”那样一个单一的“竹幕”。虽然划分南北朝鲜的三八线和分隔共产党中国与国民党中国的台湾海峡在亚洲起到了共产主义与资本主义分界线的作用，但是在亚洲其他许多地方，界线却远没有这么清楚。设立同样界线的尝试不是没有，例如有人以北纬 17 度线为界，把越南也划分成了南北两个部分，结果却证明这样的局面根本不可能维持下去。在印度支那和亚洲其他地区，只要国内形势的发展存在陷入冷战的可能，就会发生形形色色的冲突，其性质的多样性并不亚于国家性质的多样性。这种多样性与西方国家，尤其是美国把亚洲冲突改变为冷战模式的企图是相抵触的。

斯大林逝世之后，苏联奉行的路线更加灵活，苏联经常对反西方的和不结盟的非共产党国家或其内部的非共产党组织提供援助，这样做部分缘于它把触角伸向全球的能力相对不足，部分缘于它一直存在的实用主义思想。但不管怎样，在把针对欧洲问题制定的政策推向亚洲及第三世界时，两个超级大国都遇到了困难。根据地缘政治学制定的解决欧洲冲突的政策，对利益的集中是留有余地的，更确切地说，是鼓励利益集中的；而在亚洲，地理和政治因素的多样性却产生出了多个利益范围，因此两个超级大国都面临着如何在这些利益范围之内

达成协调的问题。

这些问题的根源，是亚洲内部存在着要求彻底政治变革的压力。前欧洲殖民地国家独立运动的日益兴起，使亚洲局势最终和两次世界大战之间中欧与东欧的局势十分相似：越来越多局势不大稳定的国家不同程度地服从于超级大国出于自身利益建立新秩序的愿望。亚洲战后时期的不同之处，不仅在于已经独立或即将独立的国家的数量，更在于它们与超级大国历史联系的性质，以及寻求独立时所处国际环境的性质。无论殖民地国家的文化和价值观念多么成功地抵制住了西方的冲击，但殖民地的依赖性却不能为殖民地国家的政治活动提供舞台，因此非殖民地化必须走过一个重新建国的过程，这便意味着，这些新兴国家在面对国际经济和政治力量从外部施加的压力时，必须集中力量保持内部稳定。这些力量交织在一起，影响举足轻重。在这种情况下，国内政治冲突经常使亚洲和其他第三世界国家成为超级大国竞争的场所。导致这种情况的一个相当重要的原因是许多革命运动都以共产主义或共产主义的各种翻版为指导思想。

亚洲国家在经济上的首要任务是实现现代化。这一点必须做到。一位西方自由主义经济学家曾于1955年写道："因为在西方的影响下，旧的经济制度已经土崩瓦解，人口出生率也大大增加。摆在这些国家面前的选择是：要么搞现代化，要么灭亡"（Ward〔1955〕1962：57）。但走哪条道路才能通向现代化：是走资本主义道路还是采用苏联的共产主义模式呢？许多亚洲领导人倾向于苏联模式，这不仅是因为苏联与西方帝国主义的遗产毫无瓜葛，而且因为它也提供了一个样板，它向世人展示了"一个国家如何才能自力更生地建设自己的国家……既不受西方的干预，也不依赖西方的帮助"（Ward〔1955〕1962：73）。但是，苏联模式的适用性也是有限度的。无论苏联通过实施五年计划在加快工业发展步伐上取得怎样的成功，它的农业问题始终是经济领域的顽症，这就很难给亚洲国家以农业为主的经济提供成功的范例。此外，连中国这类真正采用共产主义作为国家意识形态的国家，也以自己的方式发展了这套体系，并最终为第三世

界国家树立了一种与苏联不同的共产主义模式。最后还有一些前殖民地国家，如印度，由于其领导人很多都在英语国家受过教育，出于经济以及政治、社会方面的原因，他们拒绝接受共产主义。

第三世界国家所面临的首要困难是必须建立稳定的政治基础，以便为经济发展提供保障。在新独立的国家里，地域、伦理以及宗教上的分歧阻碍了国家发展所依赖的统一意志的形成，内战爆发的可能性始终存在。理查德·巴尼特评述说，1945 年以来，大部分令人类社会群情激昂的政治暴力都有一个共同的特征：

> 它的根源不是国家之间的冲突，而是国家内部的冲突。在我们这个时代，对领土、原材料和殖民地的争夺或维护国王的荣誉问题都不是战争的原动力，虽然在某些时候这些因素也起一定作用。当代战争本质上是前欧洲殖民主义列强附庸国国内五花八门的政治集团为获取权力所进行的斗争，目的是夺取政权并按照自己的主张行使权力。
>
> （Barnet 1972：15－16）

有必要补充说明的是，"按照自己的主张行使权力"不仅受到内部冲突的限制，而且受到前欧洲殖民主义列强和超级大国野心的限制。新独立的国家既没有一个缓冲的时间，也不能像美国建国时期那样享有距离上的优势。因此，全球观念（即从全球角度看问题——译者注）就成了亚洲和第三世界国家兴起时期无法摆脱的条件。

超级大国在亚洲的利益

正如我们在前文中所述，美国国家安全委员会第 68 号决议是以全球为着眼点的，但由于资源有限且这一阶段的主要关注点是欧洲，所以美国的决策者心目中实际上有个利益顺序。朝鲜战争爆发之前，亚洲远不是美国优先考虑的对象。在参谋长联席会议 1947 年 4 月就

“美国站在维护国家安全的立场上对其他国家提供援助”问题所发的一份文件中，美国根据“对美国安全的重要性”和“需要的紧迫性”这两个标准，把计划援助的国家进行了先后排序。如果分别考虑两个标准，那么按照第一个标准，排列顺序如下：

1. 英国	7. 意大利	12. 西班牙
2. 法国	8. 加拿大	13. 日本
3. 德国	9. 土耳其	14. 中国
4. 比利时	10. 希腊	15. 朝鲜
5. 荷兰	11. 拉丁美洲	16. 菲律宾
6. 奥地利		

（Etzold and Gaddis 1978：79）

如果把两个标准结合起来考虑，日本就会上升到第8位，其他国家大致保持原位。

这个文件中有两点很重要：一是在参谋长联席会议看来，日本在亚洲国家中高居首位；二是根据美国国家安全这一标准衡量，朝鲜和中国在重要性上排位很低。关于朝鲜，文件认为：“如果目前外交上的意识形态战转化为武装战争，朝鲜几乎或根本不能对维护我们国家的安全有所裨益。因此，从这个观点出发，首先要对那些具有头等重要性的国家提供援助，确保它们保持独立，与美国保持友好关系，并完成经济复苏。在尚有余力的情况下，我们才可以考虑对朝鲜援助。”至于中国，文件上是这样说的：“共产党中国一定会成为严重问题，即便与苏联开战也是如此，但我们还是有可能通过对中国实行经济封锁在远东孤立共产主义”（Etzold and Gaddis 1978：78－9）。

当然，这份文件所依据的主要假定是，对共产主义之战即意味着对苏之战，这表明美国在该阶段关于亚洲的考量是受欧洲局势左右的。在随后的三年里，中国革命和朝鲜战争的爆发使美国人的看法发生了决定性的转变。美国人开始认识到，对共产主义的战争不一定非

得从欧洲这个中心战场开始，然后向外围扩展，也可能直接发端于外围。这并不排除在欧洲尽可能建立最强防御的必要，但它的确是扩展了美国利益与义务的范围。我们随后很快将会看到，1945～1950年期间奉行的“欧洲第一”政策，实质上是美国二战期间欧洲优先政策的延伸。冷战蔓延至亚洲后，这一政策遭到了来自美国国内的猛烈抨击。

只要能搞清二战刚结束那个时期苏联在亚洲的利益所在，似乎就可以发现，在日丹诺夫1947年发表“两大阵营”演说之前，苏联在向共产主义运动提供支援时一直谨慎从事，但自此之后，便开始毫不含糊地公开表示，不相信前殖民地国家在反帝斗争中能够保持中立。它竭力敦促亚洲各国共产党采取反对派的立场，不与独立运动或刚独立国家政府内的非共产党民族主义者组成联合阵线。苏联之所以这样做，部分缘于对共产主义运动在中国取得胜利越来越有信心，部分缘于欧洲冷战的爆发。但是这一政策同时也说明，斯大林仍然对1920年代他支持中国国民党的非共产主义运动一事记忆犹新，那段经历曾被形容为“灾难性的经历”（Nogee and Donaldson 1988：149）。在共产国际的指导下，中国共产党曾于1925年与蒋介石领导的国民党搞联合，蒋介石当时正力图把全中国置于自己的统治之下。然而，1927年，就在胜利在望之际，蒋介石却背弃了共产党，屠杀了数以千计的共产党党员。

斯大林对这段经历耿耿于怀，这就决定了他一定会敦促亚洲各国共产党对“资产阶级”的统治进行毫不妥协的斗争。在这个背景下，菲律宾、缅甸、印度尼西亚和马来亚于1940年代末及1950年代初都发动了共产党起义，当时正是这些国家获得独立或者向独立迈进之时（它们赢得独立的时间分别是1946年、1948年、1949年和1957年）。有一种看法认为，这一政策使斯大林陷入了“与首批新诞生的国家毫无结果的冲突之中”，其中也包括印度，尼赫鲁在朝鲜战争中的调停努力显示了该国独立于西方的精神。这一看法似乎无可辩驳（Lowenthal 1964：326）。

最后，这一政策不攻自破了。斯大林逝世后，它被扔进了历史的垃圾堆。然而，在与美国关系处于关键时刻之际，奉行这种政策却收到了抬高冷战赌注之功效。它使美国看到了在亚洲所有的起义运动中都有苏联在背后操纵。它促使美国更多地从东西方全球性冷战的角度，而不仅是从对其安全的威胁这一角度去理解亚洲的冲突。显然，这两个方面是密切相关的。但是，美国二战后对亚洲政策的一个显著特征是，由于有些国家对美国的安全并不构成明显威胁，所以在对这些国家实施军事干涉时，决策者在寻找正当理由方面颇费周折。越南就是最为典型的一例，当然这是后来的事了。在此之前，美国 1950 年注意的目标仍是东北亚——中国、日本和朝鲜。

麦卡锡主义与美国远东政策的变化

在 1950 年的头几个月里，杜鲁门在政治上极易遭受攻击。苏联原子弹爆炸试验及中国革命成功的双重打击动摇了公众对美国政府政策的信任，他们指责政府疏于职守或者比这更糟糕。1950 年 1 月，阿尔杰·希斯被判犯有做伪证罪。这一事件似乎证实了人们的怀疑：杜鲁门和罗斯福政府的关键决策部门内藏有间谍。希斯在 1930 年代曾供职于美国国务院，曾作为美国代表团成员出席过雅尔塔会议，二战后被任命为卡内基国际和平基金会主席。对希斯的具体指控是他曾对众议院非美活动委员会做伪证，否认 1937～1938 年在国务院任职期间曾向俄国人提供过情报（幸亏有“时效法”，他才没能被指控犯有间谍罪）。事实上，希斯所犯罪行并不严重，但这一案件却给杜鲁门政府的批评者提供了便利的借口，他们可以由此对政府进行一系列的非难，直至谴责罗斯福—杜鲁门执政时期的整个对外政策。

对于在希斯案之后声名鹊起的参议员约瑟夫·麦卡锡之类人物而言，有了这个事件，就可以为美国在冷战当中所遭遇到的一系列失败

找到解释了。这些失败以美国在雅尔塔会议上把东欧“出卖给”苏联为开端，以“失去”中国为高潮。麦卡锡在他的演说中强调最多的是，他认为美国在共产主义面前“软弱无力”，“我们在华盛顿的空气中都能嗅到美国的软弱”。出现目前这种情况只能有一种解释，它是“一个大阴谋，一个令人类历史上所有类似冒险相形见绌的特大阴谋”的产物。阿尔杰·希斯是一个举止文雅又很有教养的人，他与美国东海岸自由主义精英们的联系，以及他与罗斯福“新政”的关系之深，这一切为共和党谴责对真正美国精神的叛逆提供了攻击目标，也造成了两党在国会共同支持对外政策时代的结束。继乔治·马歇尔之后担任国务卿的迪安·艾奇逊，在他的老朋友希斯被判有罪之后，公开宣称“我不会背弃阿尔杰·希斯”。这一做法把民主党的形象抹得更黑了。麦卡锡说，通过此番表白，“这个自负而拘谨、说话装出一副英国腔的外交家……唤醒了美国人民心中潜藏的愤慨”（Matusow 1970：22，59，26）。在四年的时间里，麦卡锡竭力推销他的观点，置政府于被动之境，导致共产党问题成为当时美国国内事务议程的主题。

麦卡锡并不是反共产主义思潮的创始人，他的能耐表现在他能把这件事闹大。通过巧妙的自我宣扬，加上肆无忌惮地利用媒体对轰动性新闻题材的偏好，他在反共产主义方面打上了自己的烙印。他蓄意攻击的目标很多——先是国务院和民主党，接下来是军队，乃至于总统，到 1954 年，连他自己所在的党都把他看成累赘了。那些起初愿意和他一起攻击民主党的共和党人，尤其是攻击民主党处理朝鲜战争的方式的共和党人，都因他发展到日益不分青红皂白地指控军队以及（现为共和党的）总统直属机关这样神圣的机构而与他决裂了。1954 年，麦卡锡遭到参议院的公开谴责，从此无声无息。没过三年，他便酗酒成性，颓丧潦倒而死。

关于麦卡锡和麦卡锡主义，可以放到许多背景下去看。麦卡锡被参议院公开谴责后没几个月，围绕着美国因共产主义而焦虑的政治及社会根源问题，涌现出了大量相关资料。然而，从对外关系的角度

看，麦卡锡其人职业生涯的重要意义在于他恶名远扬的那一小段时间，正是美国把注意力从欧洲转向远东之际，麦卡锡的所作所为对这一转移起到了推动作用。在麦卡锡所列出的叛国者名单上，有两个人的名字反复出现——一个是乔治·马歇尔，他曾于 1946～1947 年间斡旋于中国国民党与共产党之间，试图促使双方达成停战协议；另一个是欧文·拉铁摩尔，此人是远东问题专家，也曾在二战期间当过蒋介石的顾问。据称，在这两个人的推动下，美国形成了一项灾难性的政策，拒绝对蒋介石领导的国民党政府提供足够的支援，这就为共产党 1949 年的胜利铺平了道路。也有人认为，在 1945 年后关键性的几年中，如果杜鲁门政府对远东共产主义的危险给予应有的重视，而不是把资源投入欧洲，朝鲜战争绝无爆发的可能。

"亚洲第一"论同样也不是麦卡锡首倡的。它发端于围绕美国二战时"欧洲第一"战略所展开的争论，在二战刚结束那几年，"亚洲第一"论得到了国会内及著名出版商和商人中一些很有势力的人物的支持。《时代》与《生活》杂志的出版商亨利·鲁斯就是其中的一个，他热心支持中国国民党，对杜鲁门的政策持批评态度，因为杜鲁门试图把中国国民党和共产党两党拉到一起解决内战问题。在中国革命胜利前后的一段时间，信仰基督教并与美国一些商人和议员保持密切联络的蒋介石夫人，也曾为了国民党的事业四处游说。美国国会参议员诺兰在蒋夫人游说的过程中鼎力相助，所以在国民党逃往福摩萨（中国台湾）之后，诺兰便被人冠以"福摩萨参议员"的雅号。"亚洲第一"论者和国民党院外活动集团设法将共产党在亚洲的威胁与其在美国国内造成的威胁联系起来。此举对美国后来干预远东的问题产生了深刻的影响。这意味着美国在未来很长一段时间将不考虑在外交上承认共产党中国。事实上，直到 1978 年美国才同共产党中国建交。在中国革命胜利后发生的净化美国国务院事件中，美国各部门顶尖的中国问题专家均被解职。此外，美国人也因此变得越发敏感，唯恐再次发生对付共产主义不力而遭受损失的危险。自此以后，向亚洲共产主义做出妥协或让步便被视为卑鄙的投降行为。

中国与亚洲的动乱（1945～1950）

“亚洲第一”论者认为是杜鲁门政府把中国丢掉了。这种论点只在一种情况下才能站得住脚，那就是人们首先要接受他们的假设——美国有资格谈论丢掉中国的问题。这种观点产生的基础是一种没有事实根据的假想：美国一贯对中国很亲善。该想法源于1899年“门户开放”政策。当时欧洲国家想把中国纳入自己经济利益的轨道，美国对此表示反对。美国的这一举动给人留下了关心中国领土完整的开明印象。虽然中美之间的确存在着广泛的文化与教育联系，但实际上美国并没有怎么执行门户开放政策，因为这样做无论如何都会被人看作一个迟到者在自私地向中国索取经济利益。在其他方面，美国也没有做出什么可让中国感恩戴德的事情。歧视性的美国移民法和对在美华人的虐待，自19世纪80年代以来就一直是两国关系摩擦不断的根源。当日本在远东称霸的欲望日渐强烈之时，美国政府对中国的援助也不是太多。在美国的支持下（诚然有些并非出自本愿），日本通过有损中国利益的凡尔赛和约（1919）获得了在中国山东半岛的特权；1931年，日本入侵满洲（中国东北地区），美国也只是在口头上提出了抗议；后来，1937年中日战争全面爆发，罗斯福袖手旁观，并没有对日本进行制裁。

随着1940～1941年美日关系的恶化，美国对华政策才发生了根本性变化。实际上美日关系恶化的起因是日本对中国和东南亚的不断蚕食。从这个意义上说，美中之间的“特殊关系”建立得未免迟了些；考虑到中国内有国共两党之争，外有中日两国之战的困境，可以说这种关系来得太迟了。一旦决定把中国纳入反轴心国国家的各个委员会，使其逐步强大起来，美国就面临着是否支持蒋介石这位领导人的问题，后者对政权的把持显然不大牢固。在第二次世界大战时和战争刚结束那几年，美国决策者所面临的中心问题是他们对中国国民党与共产党的关系该持怎样的态度。

在第二次世界大战即将结束之际，华盛顿从中国收到一些内容相互矛盾的建议。赫尔利大使（1945 年 1 月被任命）建议毫无保留地支持蒋介石。如果说赫尔利也承认该让共产党发挥点作用，那也是按照蒋介石的条件。与此同时，美国驻中国大使馆的几位参赞，如约翰·斯图尔特·塞维斯和约翰·佩顿·戴维斯，都对蒋介石是否有能力建立一个稳固的政府表示怀疑，并对他独断专行的作风持批评态度。具有讽刺意味的是，与其他许多老资格的“中国通”相比，为麦卡锡所厌恶的欧文·拉铁摩尔却更看好蒋介石。这或许是因为他在战争期间曾做过蒋介石的政治顾问（不过，麦卡锡所言并不正确，拉铁摩尔从没在国务院供过职，而且在战争期间，从蒋介石那里卸任之后，他也主要是通过撰文著述向蒋介石施加影响的）。拉铁摩尔 1945 年出版了一本书，读者甚众。书中说，蒋介石目前没有对中国局势“失去控制”，不过他感觉在国共两党之间存在着政治妥协的可能。他写道，共产党“在其控制区内做得相当不错，堪与国民党相媲美”（Lattimore 1945：122）。赫尔利将此看作美国使馆工作人员中有人搞亲共活动，因此十分愤怒，随后于 1945 年 11 月 26 日提出辞职，以表抗议。他在给杜鲁门的辞职信中写道，“这已不是秘密，我们的专业外交人员竟然站在中国共产党一边……我们的外交官不断地告诉共产党人，我为阻止国民党政府垮台所做的努力不代表美国的政策”（Kahn 1975：174－5）。

其实，美国政府的外交政策比赫尔利认为或希望的要暧昧得多。美国政府虽然明确倾向于国民党，但基本上还是持一种“观望”态度（Stueck 1981：36）。1946 年，马歇尔将军受杜鲁门的派遣前往中国。他此行的目的据称是调解国共两党之间的关系，促进联合政府的成立。他在中国的努力基本上是劳而无功。一年之后，马歇尔两手空空返回了美国（他因付出的这些努力，后来与约翰·佩顿·戴维斯、约翰·斯图尔特·塞维斯以及其他国务院的中国问题专家一道，统统栽到了麦卡锡手里，麦卡锡 1951 年以洋洋洒洒的长篇讲话在国会向马歇尔发起了攻击，麦卡锡的发言后来出版成书）。到 1947 年，美国

采取了支持国民党政府的方针，给它提供了相当多的军事和经济援助。随着中国内战战火的蔓延和中国共产党的节节挺进，美国相应减少了对华援助，并于 1949 年 1 月撤回了美国军事顾问团。中国的内战达到高峰之时，正值苏联在柏林实施封锁之际，共产党在中国取得胜利的前景还不足以使美国下决心把大量军事资源分配给中国（Dulles 1972：31 –2）。

到 1949 年春天，共产党似乎已胜利在望，恼怒的共和党人在国会搞了一份联名声明，指控艾奇逊对他的中国政策“不负责任”，接着便在国会通过了一系列援助中国法案，目的在于压政府采取行动。这些努力只取得了部分成效，因为政府按马歇尔计划继续向欧洲提供援助一事尚且需要国会的支持。因此，作为对欧洲援助法案的一种修正，适度对蒋介石援助的一揽子计划得以通过。不过，到了那年年中，政府似乎已基本接受了共产党在中国取得胜利这一现实，正在加紧为美国国内不可避免的反应做准备。8 月，国务院发表了一部很长的《美国与中国的关系白皮书》，它既是一个历史记录，也是对美国政策的辩护，并含有大量的书面证据。附在其后的艾奇逊致杜鲁门的信辩称，“中国内战的不祥后果不是美国政府所能避免的”（Department of Stale〔1949〕1967，Vol. 1：xvi）。这句话使批评政府的人听了大惊失色。杜鲁门的反对者们并没有因为信中所言与事实几乎没有出入而态度缓和下来，他们认为那种对支援蒋介石大加限制的政策必然会自食其果。于是，围绕着两个相关的问题，即是否承认毛泽东的中国以及美国对当年年底逃到中国台湾地区的国民党政权采取何种态度这两个相关的问题，又形成了一系列新的论战。

谁也没有想到，结局竟然是美国不承认毛泽东政府，反而明确无误地支持蒋介石政府。之所以出乎意料，首先是因为支持蒋介石会有引发战争的危险，更何况杜鲁门和参谋长联席会议又都不赞成这个方案。国务院内部有一股强大的势力认为应采取“现实”政策，谁当权就承认谁（英国在 1950 年承认了毛泽东政权，但是没有向中国派遣大使，只派了一个代办）。然而，正如我们在前文所看到的，在麦

卡锡和“亚洲第一”论者的影响下，杜鲁门逐渐不再倾向于从中国冲突中脱身。不过形势发生逆转的更重要原因是受1950年所发生的一系列国际事件的影响，包括1月中苏签订友好同盟互助条约、6月北朝鲜进攻南朝鲜，以及10月中国出兵朝鲜。

从美国的观点来看，上述第一个事件证实了关于共产主义会给西方带来怎样威胁的最坏担心。不过，事实上，中国革命胜利前后那段时间，中苏关系远比美国所能想象的要复杂得多。其一，自1945年以来，苏联在对毛泽东领导的共产党的支持上表现得非常冷淡，迟至1949年年中，苏联仍承认国民党政府是中国的合法政府。苏联之所以执行这样的政策，显然是基于对毛泽东是否有能力把全中国统一到共产党领导之下表示怀疑，另外也许是高估了国民党的实力以及美国对它支持的程度。此外，还认为没有中国共产党的帮助，苏联也能够在中国实现重要的领土野心。在雅尔塔会议上，以及随后与国民党中国签订的条约中，苏联重新获得了1904年日俄战争之前其在中国拥有的权益，其中包括对商业港大连的使用权、对黄海北部位于朝鲜半岛与中国大陆之间的旅顺港海军基地的使用权，以及对连通苏联与其太平洋沿岸地区的南满铁路和中长铁路的控制权。国民党管理下的中国就这样为苏联提供了一定的好处。

最后要提到的一点是，据一份记述称，即便是1949年年中已做出要对毛泽东进行有力支持的决定之后，苏联“仍煞费苦心地想要否定毛泽东是中国战略缔造者的地位”（Nogee and Donaldson 1988：94）。考虑到苏联有过与铁托打交道的经验，可以设想斯大林一定会怀疑中国将成为一个庞大而独立的共产党势力中心。当然以后的事实表明，苏联对中国共产党的友好表示也仅此而已。当毛泽东赴莫斯科谈判《中苏友好同盟互助条约》事宜时，到车站迎接他的不是斯大林，而是莫洛托夫。经历过中国革命及联盟谈判的中国，肯定是一个不可小视的国家，但它在苏联面前，绝对是晚辈后生。毛泽东似乎也承认这个现实，所以他在1949年7月发表的讲话中称“苏联共产党是我们最好的老师，我们必须向他们请教”。但是，就苏联而言，它

可以对东欧国家颐指气使，却不可能在中国处于同样的地位（Daniels 1985，Vol. 2：183）。

1950年2月签订的《中苏友好同盟互助条约》的条款是经过巧妙平衡的。斯大林一方面答应把他在雅尔塔会议上得到的对旅顺港、大连和南满铁路的控制权交还给中国，另一方面又不马上交出控制权，还要等待中国与日本签订条约的结果而定。另外，毛泽东虽然也从苏联那里得到了一些经济援助，但数量没有他希望的那么大。不过，条约规定，如果日本“或其他任何国家以任何方式与日本共同发动侵略”（Text of Treaty in Grenville and Wassevstein 1987：165），双方将相互保证安全。在这个条约中，也许只有这一条最重要。有人称这个条约“实质上是一个用来对日本军国主义复活的危险进行声讨的宣传工具”（Lowe 1986：121）。毫无疑问，苏联之所以在领土问题上做出让步，主要是为了加强共产党在远东地区的政治和军事力量，以对抗美国势力在日本的巩固。在探讨朝鲜战争是如何影响大国的决策之前，我们必须先对日本1945年以后在美国政策中所扮演的角色做一说明。

美国对日本的占领

从许多方面可以看出，日本在美国亚洲政策中所占的地位与德国在美国欧洲政策中所占的地位同等重要。早期提出的对战败国的惩罚性安排，由于共产主义在亚洲蔓延趋势的明朗，很快就被搁置一旁了。起初，重建日本所依据的是：必须铲除那些曾在1930年代推行军国主义的根深蒂固的实力集团和机构；实行政治制度民主化、打碎家族式工业垄断（或称财阀）以及解除日本生产重工业产品（当然包括战争物资）的能力。这一切统统都是以根除专制主义、鼓励财富和权力在更大范围的分配为目的。这些政策都得到了一定程度的执行，但是正如迈克尔·沙勒所评述的那样，它们逐渐“减弱了势头或者在1948年改变了方向”（Schaller 1986：51）。从根本上讲，解散财阀的努力并没有消灭财阀。新宪法虽然正式确立了民主政体和自由主义方针，但仍

然允许统治阶层的保守主义者继续保持他们的地位。解除日本工业生产能力的计划根本就没能执行，因为不久即表明，同德国一样，日本的软弱和动荡会招来共产主义的侵袭，损害美国在亚洲建立抗衡共产党的力量这一更广泛的目标。巧合的是，对日政策的变化与马歇尔计划的上马以及杜鲁门主义的出台发生在同一时间，日本由此成为美国遏制政策在亚洲的拱顶石。

对日占领政策的演变与美国政府不愿意太深地介入中国内政有关。美国能在一定程度上控制日本局势，但在中国却做不到这一点。事实上，美国从一开始就坚持苏联在占领日本中只起名义作用。苏联人充分利用这一点，要求美国在巴尔干半岛和东欧也扮演同等角色（Schaller 1986：58－61）。有人说，在美国政府看来，中国是可以牺牲的。如果这样说有些过分的话，日本被看作美国在亚洲地位的战略关键，这却是事实。从国务院政策研究室和国家安全委员会1948～1949年间出台的文件中可以看出，制定政策时就预料到了国民党政权会垮台，而且在文件中反复出现这样一种说法：如果美国为了防止国民党政府被打垮而广泛承担义务，那将是十分危险的（see documents 25－34 in）。

1950年1月，迪安·艾奇逊公布了美国在亚洲必须准备守卫的“防卫圈”，这个“防卫圈”不仅不包括中国台湾地区，而且把朝鲜也划在了圈外。美国在亚洲的政策是一项近海政策，它反映了美国人所普遍具有的传统看法：美国应该防止被拉入亚洲的陆地战中。结果，北朝鲜的进攻不但动摇了这项政策的基础，而且扫除了与日本签订和约的所有障碍，为正式结束美日敌对状态和确定日本独立铺平了道路。正如沙勒所指出的那样，具有讽刺意味的是，北朝鲜的进攻“为结束美国对日本的占领创造了条件”（Schaller 1986：290），与日本单独讲和的疑虑一扫而光。虽然条约是1951年9月在旧金山打着国际会议（苏联也参加了这次会议）的名义签订的，但它的条款——包括一项安全协定和授予美国军队基地权——在很大程度上反映了美日双方的利益，所以苏联拒绝在条约上签字。

朝鲜战争

朝鲜战争的爆发问题一直萦绕着重重迷雾，其中最为难解的是苏联的动机问题。西方观察家估计，北朝鲜的军事进攻是苏联人一手策划的，目的在于鼓动北朝鲜领导人金日成通过武力达到朝鲜1945年被临时分割后通过谈判一直达不到的目标——重新统一朝鲜（Foot 1985：58－9）。赫鲁晓夫在他的回忆录中声称，“开战不是斯大林的主意，是金日成要这么干的”，不过，斯大林“并没有设法劝阻他”（Khrushchev 1971：368）。最近依据苏联档案中新发现的证据所做的研究证实了这种看法：入侵的想法是金日成先有的，但这位北朝鲜领导人曾积极向苏联寻求支持，而且也的确得到了苏联的赞同。虽然迄今为止仍没有有说服力的证据来解释苏联为什么做此决定，但有一个动机似乎显得很强烈，那就是苏联人不想让人认为他们在推动远东的革命事业方面不如中国人。有人指出，如果斯大林拒绝帮助北朝鲜，那么他“在共产主义阵营中的领导地位将被削弱，而毛泽东（显然机会倒向他）的威望……则会上升”。不管怎么说，金日成通过武力重新统一朝鲜半岛的政策代表着一种更为强硬的立场，这是斯大林所不愿看到的。在这里要特别提及的一点是，斯大林很关注美国会对此做出什么反应。据传，斯大林“在确信美国不会干预这场冲突后”，才同意了金日成的计划（Weathersby 1993：30，31－2）。美国后来却进行了干涉，这一点也意味着苏联所要承担的义务比预期的要大得多。

还有一个令人不解的问题是，苏联为什么在6月底的关键时刻抵制联合国安全理事会的会议。这次安理会会议决定把北朝鲜列为侵略者，并决定支持美国采取军事行动击退北朝鲜的入侵。关于这个问题，目前有好几种解释，但都或多或少有些让人难以捉摸。一种解释说，斯大林可能早就想使美国卷入与中国的冲突，从而排除共产党中国被联合国接纳的可能性。从这个观点看，苏联是担心出现一个与之相竞争的大国才推出这一政策的。这一解释所存在的疑点是，苏联从1950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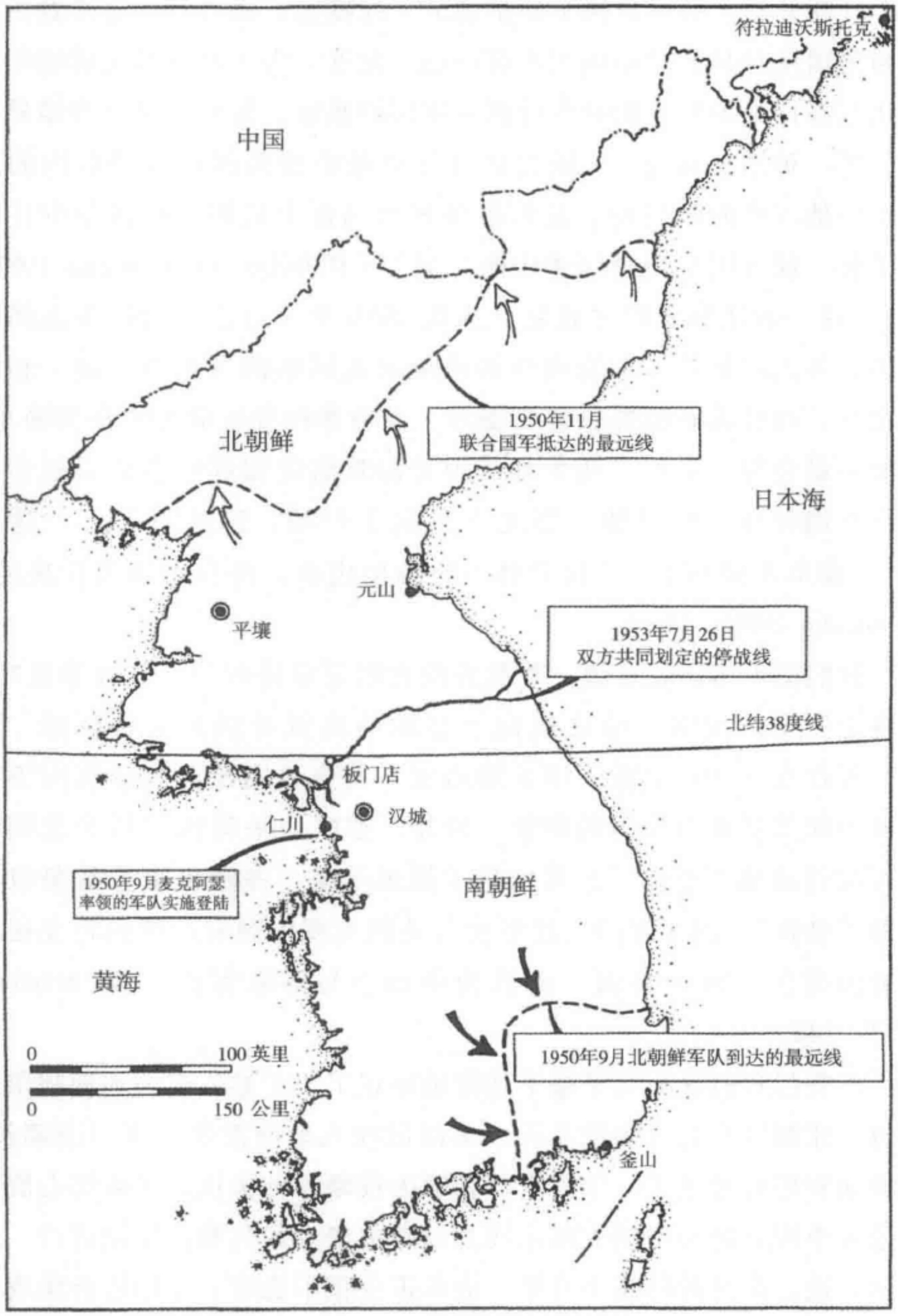


图 5.1　朝鲜战争军事阶段示意图

资料来源：R. H. 费雷尔主编《处于分裂世界中的美国（1945～1972）》，纽约，哈珀与罗出版公司，1975。

年1月就开始了对联合国至少是名义上的抵制，而之所以这样做正是因为美国反对共产党中国加入联合国。此外，六个月前斯大林刚刚与毛泽东签订了条约，此时奉行孤立中国的政策，似乎显得有些怪异。

另一种意见认为，“斯大林也许早就希望美国打着联合国的旗号干涉他国内政的行动，从而毁掉联合国这个组织，或者至少让世人了解，联合国只是美国手中的工具”（Halliday and Cumings 1988：78）。这一看法的矛盾之处是，苏联1950年8月已派遣代表返回联合国，并正在利用其在安理会的地位对美国的倡议加以阻挠。相比较之下，时任苏联副外长的安德烈·葛罗米柯提出的解释最为简单，也似乎最合理。据传，斯大林认为美国政府就朝鲜问题致安理会的信具有侮辱性，所以他一怒之下采取了行动，仅此而已。“这一次”，葛罗米柯写道，“斯大林一时感情用事，没有做出最佳决定”（Gromyko 1989：102）。

我们似乎可以这样说，苏联并没有制定总体规划，其政策是“现用现定”的。美国反应之敏捷令苏联的决策者感到有些困惑。毕竟，仅仅在六个月之前，国务卿迪安·艾奇逊刚给人造成美国不把朝鲜当作关键利益地区的印象。另外，苏联似乎很快“就为北朝鲜的入侵行动感到遗憾了，所以急于摆脱干系，并积极阻止战争以任何形式蔓延”。毫无疑问，这里也有美国无视中国有可能自行支援北朝鲜的原因，因为美国一向认为中国会与苏联保持一致（Hastings 1987：142）。

杜鲁门政府这次几乎毫不犹豫地修正了关于卷入亚洲地面战争的设想。北朝鲜发起进攻没几天，美国就投入地面部队去保卫南朝鲜，并推动安理会通过了一个指责北朝鲜为侵略者的决议，还将第七舰队派遣到中国台湾与中国大陆之间，以防中华人民共和国发动进攻。从军事上说，在开始的几个月里，战争进程很不稳定。北朝鲜首轮攻势凌厉，9月中旬已突入南朝鲜纵深地带，朝鲜半岛只剩下一隅之地不在其掌握之中。时任日本占领区司令官的麦克阿瑟将军临时受命，在朝鲜西海岸中间的仁川港率军队实施两栖登陆，从侧翼迂回北朝鲜军

队，不到一个月便收复汉城，把北朝鲜军队赶回分隔南北朝鲜的三八线以北。麦克阿瑟在军事上取得的胜利，引发了一个政治目标方面的问题——该怎样处理朝鲜问题，是恢复战前的原状还是用重新统一朝鲜来改变它？

1945 年以来，朝鲜的南北分割一直沿用德国的模式——在日本战时占领军撤出后维持临时分割状态；美国和苏联在重新统一的方式上没有达成一致意见；南北朝鲜分别建立了政府。联合国起初就朝鲜战争所通过的决议，只涉及三八线的恢复，但麦克阿瑟北进的成功把通过武力完成朝鲜南北统一的诱人前景展现在了人们眼前。当杜鲁门支持在三八线以北采取军事行动并征得了联合国的认可时，"击退"观的势头似乎要压倒遏制观。在这个关头，战争的性质发生了变化。此前中国人就曾发出过誓言，如果美国人继续北进打到中朝边境，他们一定会出兵干涉。麦克阿瑟无视中国政府的警告，于 1950 年 10 月底把战火烧到了鸭绿江边。美国人显然根本没有料到，中国人会履行诺言，派兵入朝作战，并在年底之前迫使联合国军仓皇撤退到了三八线以南。

中国人下决心与北朝鲜人并肩作战，似乎主要出于三个方面的考虑。第一个比较简单，就是考虑到朝鲜若在西方的支持下重新统一，将有可能威胁中国边境的安全。第二，在国共两党内战期间，曾有数千名北朝鲜志愿者与毛泽东的军队并肩作战，1950 年中国对金日成的支持可以被看作毛泽东对这一援助的回报。至于第三点，曾有人说，是毛泽东认为可以借此机会压倒苏联，增强中国对朝鲜的影响，建立中国在这一地区的大国地位（Halliday and Cumings 1988：113）。毫无疑问，在这些原因中，第一点是最重要的。从战争爆发之初，无论是在公开讲话中，还是通过驻北京的印度大使，中国人就一直在警告美国，他们不能容忍敌军在离他们边境如此近的地区存在。美国对这些警告的漠视，以及之后一些美国人关于跨过鸭绿江打进中国的说法，只能加重中国人的忧虑。中国人似乎并不渴望参战，部分原因是在苏联不给予大量军事援助的情况下，他们打不赢这场战争，参战只

会加重对盟友的依赖。考虑到这一点，人们可能会对中国参战的目的是要代替苏联在北朝鲜的影响这一说法产生怀疑。

中国参战之后，杜鲁门的反应是高声叫嚣与战略退却相结合。他一方面口喊进攻中国——包括暗示美国保留使用原子弹的权利，一方面却把战略目标恢复到了最初划定的三八线。杜鲁门攻击性的言辞在联合国的盟友间引起了深深的忧虑。英国首相艾德礼于12月初匆匆赶往华盛顿，表示他对美国的政策走向感到不安。在与杜鲁门的一系列谈话中，艾德礼敦促他与北京进行谈判，以避免与中国进行全面战争。虽然杜鲁门政府自此不再公开发表有关原子弹威胁的言论了，但是艾德礼并没有能使杜鲁门和艾奇逊相信：对中国采取稍微缓和一点的政策将有可能使朝鲜局势冷却下来，甚至有可能导致北京与莫斯科发生分裂。美国当时受蒋介石的连累太深，无法摆脱这种看法：在一个领域迁就共产主义就意味着到处都得投降，因而认为艾德礼的观点是不能接受的。

然而，事实上杜鲁门也跟艾德礼一样，对避免与中国全面交战一事十分关注。他虽然不愿承认艾德礼所言与中国和谈可能会给整个亚洲带来好处的观点，却承认存在与中国发生全面战争的危险。在具体实施这一政策的过程中，麦克阿瑟将军是个很大的障碍，他的好战言论以及明显想把战火烧到中国的意图，令杜鲁门十分伤脑筋。不过，平心而论，麦克阿瑟并没有过火行动，他只是在按向三八线以北推进这一决定的思路行事。但在中国人入朝作战之后，杜鲁门认为执行这个政策所需的代价未免太大了。1951年4月，麦克阿瑟虽已撤回三八线，但他时刻梦想着再次跨过三八线，继续向北挺进。正在此时，杜鲁门把他调回国内。遏制政策又恢复了主导观念的地位。

杜鲁门排除了与中国全面交战的可能性，总算躲过一劫，却不料按下葫芦浮起瓢——美国国内抗议他解除麦克阿瑟职务的吼声风起云涌。正当杜鲁门遭到参议员麦卡锡最为嚣张的攻击之际，麦克阿瑟如同一位被剥夺了战利品的得胜英雄，在国会和公众舆论的一片赞扬声中回到了美国。这些抗议者是否真的希望与中国开战尚待讨论，但麦

克阿瑟的确为公众提供了发泄战争失败感的渠道。在朝鲜战场，交战各方在遭受巨大人员伤亡之后，把战线稳定在三八线附近，军事僵持就此开始。由于归还战俘问题，谈判一拖再拖，两年之后才终于为这场冲突画上句号。

朝鲜战争给杜鲁门及其政党带来了重大政治损失。军事上的僵局预示着在1952年的总统选举中，必将有部分论战围绕着此次战争问题展开。民主党在总统职位与国会席位上败得很惨，共和党候选人德怀特·艾森豪威尔却利用他军事领导人的巨大声望占尽了便宜。他在竞选总统运动中宣称，一旦当选，“我将前往朝鲜”，并说他有能力让人相信，只要他一露面，战争就会结束。

事实上，从1953年1月艾森豪威尔宣誓就职到同年7月底签订停战协议那段时间，有些战斗是这场战争中最为艰苦卓绝的。双方各要花招阻挠和谈，南朝鲜领导人李承晚尤其卖力，战争因此不断延续。人们经常把停战协议的签订归结为美国的威胁所致。这一威胁是新任国务卿约翰·福斯特·杜勒斯发出的，通过印度总理转告给了中国。他声称，如果北朝鲜方面不准备签订和平协议，美国就要使用原子弹。毫无疑问，这一威胁确实起到了一定的作用。不过，1953年3月斯大林逝世之后，更容易打交道的马林科夫当政，也是促成签订停战协议的一个同等重要的因素。在斯大林的葬礼期间，中国、苏联和北朝鲜领导人讨论了打破战俘交换僵局的问题。美国对李承晚施加的压力越来越大，也起到了一定作用，但到头来李承晚还是极尽破坏谈判之能事，并在缔结停战协议时断然拒绝签字。有些“亲西方”的领导人往往一再利用美国人的反共情绪达到自己的目的，李承晚就是其中一例。这件事也迫使美国人做出选择：要么死抱住那些作用有争议的政治领导人不放，要么绕过他们，自己直接承担遏制义务。这一次，美国选择了直接承担大量义务。从长远的观点看，其结果是朝鲜形成了一种稳定的局面：南北分治。但这种稳定不是由南朝鲜政府的性质所能决定的，它更多地操纵在美国、苏联和中国这些各有理由维持现状的国家手中，这与

欧洲的局面何其相似。不过，这种局面形成的最主要原因被认为是，任何试图改变现状的举动都有可能引发大规模战争。我们将在第十章看到，为什么在印度支那就不存在这种情况。

要想理解参与这一系列复杂事件者的政策和利益是不容易的。朝鲜战争已被冠以"有限战争"之称，并已成为实行遏制政策的一个范例。但是，正如我们所看到的那样，它也说明在美国的遏制与击退政策之间存在着细微的差别。沃尔特·李普曼用于描述苏联在冷战中的企图的话，似乎也可以拿来形容美国在朝鲜的情况，他说："如果力量对比允许，那他们就扩大革命的范围；如果力量对比不允许，他们就尽量为苏联和苏联政权获取最佳解决方案"（Blum 1985：505）。美国人在朝鲜所能得到的最佳结果，就是回到1950年的防线上去。不过，并不是所有方面都回复到原来的状态，因为美国对总体上维持亚洲现状所承担的义务更重了。那些导致在欧洲执行遏制政策的地缘政治和战略因素以及意识形态方面的臆断也被全盘照搬到了亚洲。这些臆断包括"多米诺理论"——一个国家倒向共产主义就会在它的邻国引起连锁反应，另外还包括一种看法：无论所走的道路多么迂回曲折，都可以发现共产主义的所有表现形式都发端于克里姆林宫。

当然，也有证据表明，美国政府内有一些人当时已意识到，也许可以利用北京和莫斯科之间的分歧为美国谋利。或许可以把毛泽东看作更有力的"亚洲铁托"。当人们普遍认为美国的决策者把苏联和中国看作铁板一块的时候，有人却认为实际情况恰恰与此相反，美国人奉行的是"靠压力楔入"战略，为的是在两个共产党大国之间挑起分裂。据说，美国对中国施加压力，目的是迫使中国向苏联提出苏联不会答应的援助要求（Gaddis 1987：152－94；Foot 1985：237－8）。这也许是一个长期性的目标，但也有人认为，这项战略在短期内引起了相反的效果。此外，《中苏友好同盟互助条约》的签订与中国人朝参战这两件事，似乎明显坚定了美国舆论界而不是政府圈子内关于共产主义是铁板一块的看法。总而言之，在美国看来，朝鲜战争进一步强化了在美苏两国在欧洲对抗中产生的两极世界观。

这场战争也加深了美国人对共产主义的诱惑性与颠覆性的忧虑。有相当多的美国战俘在成为共产党的俘虏后被“洗脑”，这一情况在美国人中引起了两种不同的反应。一部分人对共产党，尤其是亚洲共产党恶魔般残忍的本性越发恐惧；另一部分人则针对美国年轻一代固守自己那种价值体系的肤浅行为进行了大量深入的反省。美国人似乎缺乏信仰的坚定性，所以他们经不住质疑所产生的压力。两种反应方式都表明美国人对意识形态的热情更进了一步。美国学校的孩子们每天早晨都要集合，举行向国旗宣誓仪式。在艾森豪威尔当政时期，“在上帝保佑下”这个字眼被加进了宣誓词中。由于这场战争的军事结局性质不明确，本来就不能把它等同于传统意义上的军事胜利，有两件事更是把围绕这场战争所展开的道义争论搅成了一潭浑水。第一件事至今悬而未决，那就是美国在朝鲜战争中是否使用过细菌武器；第二件事是有证据表明，不仅在中国与北朝鲜一方，而且连美国都有虐待战俘的问题（Halliday and Cumings 1988：174－86）。朝鲜战争是冷战时期的第一次重大军事冲突，战争中的道义问题不可能像对德、对日战争那么简单，尽管有人也努力尝试使其简单化。围绕朝鲜战争这一题材，没有出过多少以歌颂英雄为主题的电影和小说。摄于越战时期的电影《陆军野战医院》以及随后拍摄的同名电视连续剧，虽然是描述朝鲜战争的主要影视作品，但却极少涉及朝鲜战争本身的真实情况。从朝鲜战场归来的老兵也发现，他们的同胞对他们在战争中的经历并不怎么感兴趣。马克斯·黑斯廷斯曾这样写道，“这场战争，似乎是既不得人心又不体面，所以也是不受欢迎的一段记忆”（Hastings 1988：409）。此外，正如我们前文所言，这场战争最终给杜鲁门和民主党带来了灾难性的打击。如果说朝鲜战争代表西方的胜利（考虑到遏制共产主义的初衷，有人会这么说），那这无论如何都是一种非常含糊其辞的说法。

这场战争也给苏联带来了重大消极影响。北朝鲜的进攻不仅使西方对朝鲜本身做出了强烈反应，而且也使美国加强了对日本和中国台湾安全的义务。这三年的战争还导致美国在西欧的军事力量有了决定

性的增强，从而为西德重整军备铺平了道路。要求与美国对日本和德国二战后的安排这一悬而未决的问题重开谈判的情况随之减少。中华人民共和国声望的提高给苏联带来的也不完全是喜悦。虽然中国在人员和物资方面遭受了巨大的损失，但战争结束后，中国与苏联对垒的实力得以增强，它可以向苏联提出履行中苏1950年条约的要求了，首先是要求苏联军队撤出旅顺港海军基地（Low 1976：66）。中华人民共和国重获自信，其表现就是越来越倾向于独立行动，无论是在向台湾施加压力问题上，还是争取在不发达国家扩大影响上。尽管中苏两国之间的分歧在战争结束好几年之后才发展成为公开的决裂，但有人说，朝鲜战争是“削弱北京与莫斯科关系的关键因素”（Foot 1985：27）。

如果朝鲜战争中有“胜利者”的话，那就是南朝鲜、北朝鲜和国民党台湾三方的领导人。前两者在战争中遭受了巨大损失，而最后一方实际上并没受损失，但由于超级大国从各自的利益出发想维持现状，所以三方领导人都获得了继续高居统治地位的保证（Halliday and Cumings 1988：202－3）。朝鲜的局面稳定后，持续的时间出奇地长，竟然延续到了欧洲的冷战结束之后，尽管其间也发生过重大的变故，其中包括南朝鲜与北朝鲜1972年曾就和平统一问题签订的一项至今未能兑现的协议。

结　论

冷战向亚洲的延伸，如其在欧洲一样，是二战后力量对比发生变化的结果。它是一个多层面演变的过程，在格局层面和民族国家层面都引起了根本性变革。日本势力在1940年后的急剧扩张，彻底扫荡了欧洲殖民主义，它在1945年的突然衰落，又使经常争斗的力量只剩下了三股：超级大国、独立运动和相当重要的前殖民主义列强——主要是英国、法国和荷兰，它们的目的不是重新建立殖民统治，就是想控制殖民地的独立，以便使其朝保证它们自己利益的方向发展。

在这个大背景下，朝鲜战争中阵线的划分，比如与在法属印度支

那相比，就显得相对清晰了。朝鲜在1911～1945年间被日本占领，所以它的解放没有直接涉及欧洲列强。发生在朝鲜的冲突是以东西方对抗的形式出现的，所以它的解决方式与欧洲冷战采取的方式相同，基本上是势力范围的划分问题。地理因素在超级大国考虑它们在朝鲜利益的过程中起了很大的作用。路易斯·哈雷曾写道："美国在接受日本防御这副担子的同时，也把该防御所涉及的冲突包揽下来了。"其中包括朝鲜，因为它既靠近日本，又靠近中国，所以"几个世纪以来"朝鲜在这两个亚洲强国的历史性冲突中"都是最为敏感的战略要地"（Halle 1967：192，193）。

苏联的利益没有这么明确，但考虑到它与中国在意识形态上的盟友关系以及因无法干预日本问题所产生的怨愤，苏联在"遏制"西方在朝鲜的势力过程中也有利益可谋。从这个意义上讲，朝鲜可谓亚洲的冷战前线。

然而，在那些曾屈服于欧洲殖民统治的亚洲国家当中，所受到的压力也是不一样的。东西方分界的突破，首先是因为前殖民主义列强重新发挥其影响，在西方阵营引起了冲突；其次是因为强大的独立运动在热切寻求摆脱超级大国影响的手段。在亚洲，更普遍地讲就是在后来为人们所知的第三世界，冲突并没有完全限制在冷战的框架之中，尽管超级大国有此愿望。在许多情况下，对于新独立的国家和即将独立的国家而言，"敌人"并不是这个或那个超级大国，而是冷战方式本身。

第三部分

全球主义与两极格局的局限性（1953~1964）

导 言

在第二次世界大战后美苏关系的各个阶段中，1950 年代中期到 1960 年代中期这段时间的状况最难予以评论和定位。有人认为，这一时期的特点是“震荡性对抗”。这种说法虽然说明了这一时期事件与局势的对抗性发展动态，但同时也为我们理解这一时期事件左右局势发展的动因留下了问题（Halliday 1983：6）。艾森豪威尔/肯尼迪—赫鲁晓夫时代，既不同于之前的冷战形成时期，也不同于之后冷战向缓和转化时期，要对它进行归纳总结并非易事。

例如，就个人而言，艾森豪威尔与赫鲁晓夫在不同时期及其政策的不同侧面，均会以显然矛盾的面孔展示在世人面前。身为“和平人物”，曾预言军工联合体（军工联合体由政府中的军事部门和军需供应部门联合组成，控制美国的经济和外交政策——译者注）具有危险性的艾森豪威尔，也会提倡把核武器放在重要地位的防御政策。同样，他虽然谨慎从事，力避卷入可能导致美军在海外广泛承担义务的事件，但却亲自掌管中央情报局，使之发展成为实施秘密对外干预的常规工具。

赫鲁晓夫也同样明显具有两面性。他一面大力鼓吹“和平共处”，一面却又煞有其事地发表寻衅性声明，宣扬东西方冲突的不可调和性，并洋洋自得地夸耀苏联的成就，比如 1950 年代中期苏联经

济增长很快和人造卫星发射成功，等等，似乎表明苏联完全有能力击败西方。此外，在苏联共产党 1956 年召开的党代会上，赫鲁晓夫语出惊人，宣布斯大林犯了严重错误，必须对他所遗留下来的大部分东西予以批判。同年晚些时候，赫鲁晓夫命令苏军开进匈牙利，镇压那里的起义。其实，那场起义正是在他非斯大林化言论的煽动下才出现的。总而言之，赫鲁晓夫和艾森豪威尔这两位领导人在公开场合的表现，既有挑衅性的一面，又有和谐的一面。

这一时期，整个美苏关系的特点可谓阴晴不定。一些缓和迹象，如搁置已久的《重建独立和民主奥地利的国家条约》于 1955 年最终签订，同年日内瓦首脑会议（自 1945 年《波茨坦公告》发表以来美苏领导人首次会晤）的举行，以及 1963 年《部分禁止核试验条约》的签署等，与笼罩在柏林与古巴上空的严重危机和核军备竞赛势不可当的发展呈并存之势。双方首脑会议的举行也并不意味着双方在第三世界的竞争就此中止。事实上，这些年的一个突出特点，就是第三世界充当了超级大国冲突的主战场。

单纯列举一些互不相干的事件和局势显然是不够的。人们到底有多少把握将这些年划为一个特定时期？虽然人们将其划分为一个时期未免有一些武断，但客观上确实存在某些标志点。两个超级大国领导人的更迭即可在一定程度上把这一时期的情况串联起来。这一时期始于艾森豪威尔的就职演说（1953 年 1 月）和斯大林的逝世（1953 年 3 月），止于赫鲁晓夫下台（1964 年 10 月）和约翰逊当选总统（1964 年 11 月）（约翰逊是在 1963 年 11 月肯尼迪被暗杀后接任总统的，但他正式就任总统的日期应该从 1964 年他的当选起算最为恰当）。朝鲜战争结束的时间（1953 年）和美军地面部队根据 1964 年的决定开始大规模投入越南的时间，恰好与这些界标性的起止时间是重合的。

然而，此种划分的道理还在于这一时期两个超级大国关系具有的特点。前面所提到的事件的震荡性发展标志着一个特殊关系阶段，在此阶段，既有一些相对稳定的方面，如欧洲分裂的状况已被广泛

接受；也有一些极度动荡的方面，且围绕核军备与第三世界所展开的竞争呈突出之势。在技术与政治动因的驱动下，两个超级大国都以发展核武器为途径不断寻求更大范围的安全，因此冷战竞争也愈加激烈。而随着竞争舞台向国际体系“外围”的扩展，冷战竞争也愈加广泛。虽然双方采取的控制措施没有使起于“外围”的紧张状态进一步扩大，但发生危机可能性的增大也为危机的管理和控制带来了压力，所以人们才努力尝试借助谈判手段来解决超级大国之间的矛盾。

具体而言，我们可以把超级大国的矛盾划分为三个领域，在后面的三章中，将对这些领域逐个进行探讨。第一个是起支配作用的意识形态领域的冲突，这方面的冲突主要集中在欧洲和 1955 年日内瓦会议提出举行最高级会谈的过程中。美国和苏联虽然继续领导着相对立的两大阵营，但在各自阵营内部，控制的方式却越来越变化多端。共产主义集团内的“多中心主义”，以及不大引人注意的欧洲经济复苏和欧洲经济共同体的成立，这几个因素所产生的压力虽然冲击了两极冷战格局，但却未能有效地消除这一格局。

在第二个领域，即核武器与战略方针方面，两极格局仍占主导地位，尽管英国和法国已拥有有限的核能力。1953 ~ 1963 年这十年（其间《部分禁止核试验条约》得以签署），人们是在对核战争的极度忧虑中度过的。此种忧虑后来仅在 1980 年代初出现过。虽然在这个十年将尽之时，两个超级大国都认定应把避免核战争放在第一位考虑，但在军备竞赛方面却谁都不肯松劲。苏联在导弹危机中明显暴露出的核劣势刺激下，在此后的几年里大规模增强军备，到 1969 年已经为全面军备谈判准备好了与美国大致对等的必要条件。这一过程与其他方面的进展相结合，为缓和奠定了基础。关于这一点，将在第四篇结合缓和本身详细论述。

竞争的第三个领域是第三世界，这方面却较少服从于超级大国的直接控制。这种局面主要是非殖民化国家与新独立的国家努力中立于超级大国集团之外造成的。虽然这种努力只获得了部分

成功，但弱点有时也可以成为强点，因为第三世界国家可以让超级大国相互对对方的野心感到忧虑。我们从这里和第三篇所讨论的其他问题中可以看出，超级大国对国际格局的控制是有限度的。虽然在此谈及多极世界为时尚早，但它的轮廓已隐约可见。在国际格局中，没有哪个领域比经济领域的变化更大，所以第六章将从此问题谈起。

第六章
和平共处与不可调和的冲突
（1953~1964）

超级大国的经济状况

1950年代，全球经济不但从1930年代的危机和第二次世界大战的破坏中恢复过来了，而且进入了一个持续增长的时期。在1953~1963年这十年间，世界工业产值翻了将近一番，在之后的十年里也是如此。同样重要的是，直到1970年代初，随着全球经济的增长，工业生产的年平均增长率实际也在增加——这标志着产品、生产力和消费能力已经达到了一个相当高的水平。当然，各地区的增长速度是不一样的，但即使是在所谓的欠发达国家，也出现了一定程度的经济繁荣景象（Kennedy 1988：413－16）。

那么，美苏两国相互之间以及与其他国家之间的关系又如何呢？这个问题的答案很重要，因为两国领导人虽然都在公开讲话中对道德标准大加强调，但他们也以不同的方式表示了对唯物主义历史观的赞同。在冷战过程中，想要在“大炮与黄油”之间达到平衡，就需要有高水平的产品和生产力作为保障。从某种意义上说，美国所面临的困难比苏联大，因为在和平时期，与苏联相比，美国在政治上对民用产品向军用产品的生产能力转化有限制，关于这一点，1958年出版的洛克菲勒基金会报告有所谈及：“虽然这些国家（共产党集团）的

经济增长率也许会降低，但如果我们所付出的努力只能维持现有水平的话，西方的经济优势在军事方面的表现会越来越无足轻重。苏联通过牺牲民用经济的发展，已经在主要技术领域赶上了美国”（Rockefeller 1958：16）。

上述说法指出了美国为什么不能满足于表明西方经济有显著增长的原始统计数字。无论如何，这些数字的确惊人，但它们同时也说明，其他西方国家的经济增长速度比美国要快。以绝对值计算，美国的国民生产总值从1950年的3553亿美元（按1958年的不变值计算）增加到了1960年的4877亿美元，也就是说，年平均增长率为3.2%。而日本和西德同期的年平均增长率分别为9.5%和7.8%（Roskamp 1977：58；Van der Wee：1987：50）。同样说明问题的是，美国在世界国民生产总值中所占的比率却从1945年的约50%下降到了1960年的25.9%（Kennedy 1988：432）。显然，随着欧洲与日本遭到战争破坏的经济日见复苏，美国在世界生产总值中所占的比率肯定要相对下降，但当时还不清楚日本和西欧的竞争力到底有多大。美国的经济总值仍以绝对优势高居世界首位，虽然在1950年代和1960年代初出现过阶段性的小规模经济萧条，但在1960年代，直到1968年之前，经济增长势头甚至持续维持在更高水平。然而，一个重要的结构性变化却在发生。虽然美国资本和商品的出口有显著增加，但进口也在显著增加，美国有史以来第一次出现了收支平衡的情况。当代一位杰出的经济学家写道，美国正变得“更加日益依赖外部世界——尤其是原料生产国”。无论是从政治远见，还是从自身经济利益出发，美国都应当增加出口，而要做到这一点，只有通过促进“原料生产国的经济快速增长——特别是工业的快速增长”才能办到（Drucker〔1956〕1971；557，561）。经济孤立走到了尽头，或者如后来的分析家所言，相互依赖正在成为一种无法改变的事实。无论美国的决策者对这些新出现的情况有何担忧，与对苏联的忧虑比较起来，就不过是小巫见大巫了。不管怎样，资本主义经济的繁荣毕竟可以为美国的商品提供市场，进而增加贸易机会。共产主义经济的繁荣和新地区的苏维埃化，

不但不能给美国带来好处，而且意味着世界自由贸易区有可能会缩小。在美国看来，苏联经济存在着严重问题，这是事实，而且是从总的统计数字中看不出来的事实。但认识到下面这一点更为重要：苏联是一个正在扩张的经济大国，因此其政治与军事威胁也会越来越大。虽然西方观察家对苏联经济统计数字的可靠性不无怀疑（Nove 1970：Appendix），但在表面上，苏联 1953～1958 年间的国民生产总值年增长率为 6.7%，超过了除德国和日本之外所有国家的增长率，而在 1958～1965 年降至 5.2%（Munting 1982：132，137）。这些数字的背后，是技术革新和新产品发展速度的缓慢，还有生产的无效率，尤其是重工业与消费品增长比例的失调（Munting 1982：133）。另一方面，苏联将 20%～23% 的国民收入用于投资，而美国的这一数字只占 12%～13%（Mosely 1960：416）。在军事和航空航天领域，苏联至少证明了自己有能力取得显著进步，1957 年人造地球卫星的发射成功就说明了这一点。美国估计苏联的经济会呈增长势头，在某种程度上，事实也的确如此。

忧心忡忡的艾森豪威尔于 1955 年 12 月致信国务卿约翰·福斯特·杜勒斯，信中提到苏联显然已放弃斯大林的那套策略，不再依靠使用武力来达到目的，而是转向了经济领域，所以“我们似乎在自己最具实力的领域受到了挑战”（Ambrose 1984：283）。六年之后，赫鲁晓夫在他对苏共二十二大发表的一篇著名讲话中援引了列宁提出的公式，“共产主义就是苏维埃政权加电气化”，接着他预言，“在这个十年（1961～1970）里，苏联将在人均产量上超过最强大、最富有的资本主义国家美国，为共产主义的实现创造物质和技术基础”（Daniels 1985，Vol. 1：339）。

现在我们已经知道，苏联经济在 1970 年代和 1980 年代停滞不前，又在 1990 年代有过灾难性的衰落，要想恢复到 1950 年代的状况似乎确实有些困难，但在那个时期，共产主义看上去真是西方资本主义的对手。共产主义集团当时似乎没有因独立于全球资本主义体系之外而遭受过度的损失。相反，苏联集团因为具备激发经济活力的能

力，所以根本不受西方经济压力的影响。

杜鲁门与艾森豪威尔时期的美国政策，事实上加剧了两大体系的分离。总统采取的一系列行动，其高潮是1951年通过了《共同防御援助管制法》（俗称“巴特尔”法），它不仅禁止向苏联集团出口战略物资，而且要求总统“终止对那些向共产主义国家出口美国禁运商品的国家提供援助”。后来由于英国不大主张用经济战达到意识形态方面的目的，艾森豪威尔政府迫于英国的压力，不得不适度放宽了这项政策的执行标准，仅保留了禁运制度的基本要素。即便是支持更为宽松政策的肯尼迪总统，也发现国会坚决反对放宽禁运法案中具有高度约束性条款的限制。美国策划在猪湾发动进攻将菲德尔·卡斯特罗政权赶下台的企图失败后，美苏关系在1961年急剧恶化。直到成功地解决了古巴导弹危机及签订了《部分禁止核试验条约》之后，肯尼迪才能得心应手地向国会内的保守派发起挑战，并最终放宽了战略禁运政策。美苏随即签署美国向苏联出售小麦的协定，宣告了美苏经济关系总体框架的重大转变。虽然美国对苏物资出口并没有显著增长，但是正如艾伦·多布森所言，“人们已普遍认识到……美国自身受禁运政策之害的程度要大于苏联”。多布森总结说，从那时起，直到1970年代后期，“行政部门的工作重点从不得不找理由从禁运表上拿掉一些项目，转移到了为保留一些项目找根据”（Dobson 1988：601，603－5，613－14，615）。

后来两国相互依赖的因素不断增加，但在此之前，即1950年代中期，两个超级大国就像两个拳击手，一面互相抓着对方准备进行搏斗，一面相互谩骂，其目的无非是让公众和对方相信自己的竞争实力和决心。在这两个大国中，苏联所要克服的困难更大一些。1953年3月斯大林逝世之前，苏联只经历过一次领导人的更迭——列宁逝世之后斯大林当政，后来所发生的一切表明，他的执政是一个既混乱又冗长的过程。斯大林花了四年的时间（1924～1928）才获得了无可争议的权力。但在随后的岁月中，他在苏联生活的方方面面都打上了自己的烙印。“斯大林主义”不只是斯大林个人统治的一个

代名词，它代表着在他的领导之下共产主义意识形态所呈现的形式。斯大林逝世之后，共产主义意识形态在苏联的继续以及国际共运的团结都成了问题。事实证明，非斯大林化是一个与斯大林化同等重要的过程。

非斯大林化与国际共产主义运动（1953～1964）

从1947年共产党和工人党情报局成立到1953年，除南斯拉夫之外的东欧国家都经历了一个彻底斯大林化的过程。斯大林逝世后，他管理苏联帝国内外事务的一套做法也随之灰飞烟灭。虽然赫鲁晓夫上台三年后才在1956年召开的苏共二十大上向斯大林主义及个人崇拜问题发起具有重要意义的攻击，但从苏联新领导一上台，斯大林主义大厦就明显有了裂痕，开裂的原因是新领导层内的权位之争。两年之后，赫鲁晓夫主要凭借对党的严密控制，最终成了头号人物。不过一直到1957年粉碎了“反党”集团之后，他在苏联国内的地位才相对稳固起来。在权力纷争中，许多人纷纷落马，其中包括主管内务部和负责人民内务委员会（克格勃或秘密警察机构的前身）的拉夫连季·贝利亚。他在1953年7月被强行免职并被处以死刑。贝利亚之死标志着苏联不再执行斯大林的镇压政策，同时也引发了“潮水般的呼声：要求为斯大林恐怖运动的受害者及因此被关押的人员恢复名誉”（Medvedev 1982：67）。

部长会议主席（或总理）格奥尔基·马林科夫起初似乎是斯大林的主要接班人，他被迫退出的内情则更为复杂。他确因与贝利亚过从甚密染上了污点，但就赫鲁晓夫而言，更重要的是马林科夫是所谓经济改革“新路线”的主要倡导者，他建议把经济重点从重工业转向消费品的生产。赫鲁晓夫耿耿于怀的并不是这一政策本身，而是马林科夫在改革中的领导地位。赫鲁晓夫的策略，说到底就是首先反对新路线，然后运用他对党的影响力，并借提高党的威望、净化党的队

伍之名，设法解除马林科夫的职务，然后再把实际上是马林科夫的许多政策推出来（Crankshaw 1966：192－7）。

到1955年头几个月，赫鲁晓夫施政新规划才有了一个清晰的轮廓。他采取的政策是适度放宽政治和经济方面的限制，并让人民民主国家也跟着受益。这并不是说东欧集团的领导人都认为这种政策对他们有好处。这些人大部分都是得力于斯大林主义上台的，对斯大林主义抱有一份忠诚。另外他们还发现，新政策促使国内产生的不同政见，反而削弱了他们的权力（Fejtö 1974：33）。但不管怎么说，人民民主国家出现了一种新的发展模式：名义上实行党政分离制（落实集体领导与结束个人崇拜的关键）；经济重心从重工业转向消费品生产；为前斯大林主义的反对者恢复名誉。先前为融合苏联和东欧经济成立的股份公司很令人反感，随着这些由苏联控制的股份公司的关闭，莫斯科对东欧国家的经济控制也松了下来。

苏联的情形如同走钢丝。朝这个方向走得太远或者太快，都会有动摇东欧政权的稳固及切断莫斯科与人民民主国家之间纽带的危险。但是，不执行莫斯科的既定方针，又可能会引起挫败感的爆发，同样会产生动摇政权稳固的后果。再加上东欧集团各个国家的情况千差万别，问题就更加复杂了。譬如说，与保加利亚或阿尔巴尼亚相比，波兰和匈牙利的自由化倾向根基要深得多。一帖良方不能包治百病。因此，东欧集团的危机接二连三地爆发。尽管大体上目标是一致的，既要进行变革，又要延续苏维埃制度，但危机还得逐个解决。

莫斯科关于优先考虑事项的安排具有潜在的矛盾性，这一问题在它对东德与南斯拉夫的政策上首先暴露了出来。东德在冷战地缘政治前线所处的位置十分重要，不容许其内部发生一点异议。1953年，柏林爆发了一场反对乌布利希政权实行镇压政策的工人起义。苏联出动坦克将起义镇压了下去，不过莫斯科同时也要求乌布利希从此“紧跟新路线，通过自我批评认识自己的错误”（Fejtö 1974：37）。南斯拉夫的情况则相反，它呈现在世人面前的是一个独立的共产主义权力中心，要让它忠于莫斯科，只能通过安抚手段。1955年，赫鲁

晓夫出访贝尔格莱德，亲自为铁托恢复了名誉。此事发生于苏美的冷战关系趋向缓和，英、美、法、苏与奥地利签订和约与日内瓦最高级会议开幕之间。在到达贝尔格莱德后发表的演说中，赫鲁晓夫把1948年苏南两国令人遗憾的分裂归咎于贝利亚和“其他已暴露出来的人民公敌”所搞的阴谋诡计（Daniels 1985，Vol. 2：223）。

然而，尽管双方有意修补裂痕，但谁都想得到对方所不能给予的东西。苏联一面用一只眼盯着中国，一面重申要确立苏联的领导地位，并强调共产主义意识形态集团从根本上是不可分割的，不过苏联也承认斯大林式的严格控制在已经获得独立的国家再也行不通了。

铁托则坚称他不能认同苏联关于共产主义意识形态集团的概念。南斯拉夫的党报在赫鲁晓夫访问期间发表社论称，“把世界分成不同的意识形态集团……不是通往和平之路”。理查德·洛温塔尔指出，透过这个声明，可以发现南斯拉夫和苏联在与非共产党政权“共存”的含义上存在着分歧：依照苏联人的概念，“因意识形态分歧而相互对立的国家暂时休战谓之共存”，而南斯拉夫的共存概念则意味着“积极共存”，或“所有国家之间的积极合作，而不管其内部制度的差别有多大”（Lowenthal 1964：15）。有分歧便不可能真正达成任何共识，因此苏南休战仅仅维持了两年。其间，赫鲁晓夫于1956年2月在苏共二十大上所做的“秘密报告”在整个东欧引起了爆炸性反应，它助长了集团内部的分歧（后来被称为“多中心主义”），不过却没有给予其明确的界定。

赫鲁晓夫做此报告的主要目的，一是巩固自己在苏联领导层中的改革者地位，二是让以外交部部长莫洛托夫为代表的斯大林主义残余势力威风扫地。做这篇报告其实也有相当大的风险。赫鲁晓夫毕竟与斯大林主义有很深的渊源，因为他就是在1930年代的大清洗期间从党内一级级升上来的。如果过分热衷于揭斯大林主义的盖子，就有可能使苏维埃制度本身的弊病暴露无遗。

赫鲁晓夫采取了分两步走的策略。他首先是把对斯大林主义的攻击个人化，将斯大林政权的暴力、非法行为与镇压行为统统归咎于对

斯大林的“个人崇拜”。报告的内容一公开，本身就会令当场的听众乃至共产主义世界感到震惊。他说，斯大林首创了“人民公敌”这个概念，并以这个概念为工具进行“最残酷的镇压，违背了革命法规的所有准则”，把数千名忠诚的党员投入监狱或处死了。斯大林置1941年6月德军的入侵于不顾，用犯罪性的手段诛杀了大批红军军官，致命地削弱了苏联的力量。赫鲁晓夫把苏联农业的糟糕状况、与铁托的决裂和其他许多苏联对内对外政策方面的失误，统统归到了斯大林头上。他毫不留情地详述细节，口气慷慨激昂，人们当时也许一时还反应不过来，这些指责是严格限制在一定范围内的。关于1928～1933年农业集体化以及集体化过程中消灭富农一事就只字未提。尽管赫鲁晓夫深刻揭批了1930年代对党员和老布尔什维克的清洗，但却没有把话题扩展到对苏联普通民众所采取的恐怖行动方面。

如果结合对赫鲁晓夫自身地位的威胁和对苏联制度本身的损毁来考虑，就不会对赫鲁晓夫有一定限度地揭露斯大林主义感到惊讶了（Medvedev 1982：88－9）。但不管怎么说，他的所作所为足以令全世界的共产主义国家和共产党不寒而栗。他必须掌握一种平衡，既要达到攻击斯大林主义的目的，又要恢复经过净化的、非斯大林主义的马克思列宁主义的合法地位。接下来便是赫鲁晓夫策略的第二步：把列宁主义当作苏联共产主义的真正源泉——几十年后米哈伊尔·戈尔巴乔夫执政头几年采取的也是同样的策略。赫鲁晓夫宣布，“有必要彻底恢复苏联宪法所规定的、以列宁主义为指导的苏联社会主义民主原则，以防止个人滥用职权”（Daniels 1985，Vol. 1：323，327）。

赫鲁晓夫的报告很快便在整个东欧集团内引起了反响，尤其是在波兰和匈牙利两国的反响最为强烈。这两国内部斗争的力量格局非常相似，但斗争的结局却大不相同。当时在其国内斗争的三方是：奉行斯大林主义的领导人、赫鲁晓夫2月讲话后恢复名誉的自由主义反对派领导人，以及在著名知识分子支持下的工人和学生运动。起初，两个国家事态发展的模式颇为相似：开始是公众示威游行，之后游行被军队血腥镇压，接着奉行斯大林主义的领导人面临被迫辞职的压力。

然而，在波兰，新任“自由主义”领导人弗拉迪斯拉夫·哥穆尔卡，虽然很勉强，但仍能维持对民众运动的控制，避免苏联对其国家进行武装干涉。这一方面是因为哥穆尔卡在党内和工人中比匈牙利领导人伊姆雷·纳吉有更牢固的支持基础（Fejtö 1974：95）；另一方面是因为匈牙利的新任领导人企图领导自己的国家摆脱苏联的控制，而哥穆尔卡却没有显露出与此相似的迹象。此外，由于战后边界的改变使得波兰尚须依赖苏联保障自己的安全，所以谋求与苏联脱离关系也是不现实的。最后，波兰在1956年10月末自行解决危机之时，正值苏联军队在布达佩斯镇压叛乱之际，这也等于是在用实际行动告诫波兰领导人，如果控制不了民众运动，其下场就会跟匈牙利一样。

纳吉上台时面临的情况是匈牙利起义达到高潮，共产党成为叛乱者的主要攻击目标。他于10月23日被任命为总理后，也曾试图坚持不答应叛乱分子比较极端的要求，但没能成功，于是就任没几天便顺应了革命势头，宣布建立多党制，退出仅仅一年前才成立的华沙条约组织，匈牙利彻底独立并保持中立。如此一来，其后果就是不可避免的了。11月4日，苏联的坦克开进了匈牙利。“走不同的社会主义道路”绝不意味着可以彻底背叛社会主义。即便是中国，在纳吉宣布彻底非苏维埃化计划之前虽曾支持过他，但面对他在匈牙利实行议会制式“中立”的想法，中国也表现出模棱两可的态度。一年前奥地利的中立表明，这种中立的结果只能是倒向西方。更令人惊讶的是，铁托起初赞同苏联的干预，这是赫鲁晓夫求之不得的。苏联与南斯拉夫的再度分裂，直接起因不是苏联采取的行动本身，而是后来苏联对纳吉的处理方式。纳吉先是在布达佩斯的南斯拉夫大使馆寻求避难，后来欲飞往贝尔格莱德，在乘车前往机场途中被苏联特工人员抓走了。在南斯拉夫的抗议下，纳吉才被送到法院，但审判后被枪决。罗伊·麦德维杰夫写道，“这一可悲事件……导致了苏南关系进一步恶化”（Medvedev 1982：109）。

这些事件在波兰与匈牙利所导致的后果有些荒谬。苏联将这两个国家纳入了多中心主义的范围之后，实际上也是向其他想走同样

道路的国家发出暗示之后，却允许（事实上是鼓励）波兰和匈牙利建立所有东欧国家中最自由化的经济与政治制度。正如弗朗西斯科·费伊特所指出的那样，在匈牙利"虽然明显使用了斯大林式的压制手段，但并没有重新确立斯大林主义的地位，而是建立了一个与哥穆尔卡政权相类似的赫鲁晓夫式政权"（Fejtö 1974：122－3）。东欧国家中实行压制政策最厉害的国家是阿尔巴尼亚、罗马尼亚、保加利亚和捷克斯洛伐克，它们是最不需要苏联协助实施压制政策的国家。从后来事态的发展看，这未必完全是苏联之幸事。虽然出于历史原因，保加利亚仍是莫斯科最忠实可靠的盟友，但在捷克斯洛伐克，非斯大林化并没有完全终止，只是推迟了一段时间，1968年所发生的事件即是明证。阿尔巴尼亚和罗马尼亚则利用苏联与中国1957年后出现的裂痕，想方设法使自身处于更为独立于莫斯科的地位。从赫鲁晓夫1956年发表"秘密报告"到他1964年离开克里姆林宫，苏联与共产党中国的关系问题在他的政治议程中一直排在比较靠前的位置。

事后看来，中国和苏联在历史、文化和地缘政治利益方面的差异那么大，居然有人相信这样两个国家根本不会成为对手，这似乎令人难以置信。然而，要想完全了解中苏分裂的原委，就必须，哪怕是暂时性地抛开那些后见之明，去理解当时那个年代人们的观念与渴望。按照西方，尤其是美国的观点，任何关于有可能在中苏这两个共产党国家之间造成裂痕的建议都无法回避一个现实的情况，那就是，两国渴望在国际共运中团结一致，而且在西方仍尽量试着理解中国革命含义的关键时刻，两国签订了共同防御条约。即使在1950年代后期中苏裂痕不断扩大，甚至在1960年代初走向公开化之后，除学术专家之外，大部分人还都把它看作"幕后音"，是东西方冲突这出中心舞台剧中的一项穿插表演。

只把中苏两国分裂看作纯意识形态领域的冲突是错误的，但把它简单归结为国家及地缘政治利益抵触的结果，同样也不正确。这两方面的因素是不可分割的。从1950年代末开始，中苏两国斗争在意识

形态方面的激烈程度就有些类似于神学争论，双方都认为对方对马克思列宁主义的诠释属于异端邪说。另一方面，正如我们在第五章中所看到的那样，早在朝鲜战争时期，中苏双方在有关决策的问题上就存在明显分歧。随着中国革命力量的壮大，中国热切希望在世界共产主义运动中占有一席之地，于是这种分歧便愈演愈烈。事实上，中苏两国各自的意识形态和国家利益促使它们致力于实现这样的目标："即便不能在世界共产主义运动中起决定性的作用，也要居于领导地位而施加最大影响"（Low 1976：25）。

如果说两国分歧的明朗化是某个事件所致，那就是毛泽东1958年发动的反对苏联"修正主义"运动。所谓修正主义，实质上是与苏联对内实行非斯大林化、对外实行和平共处相关的所有一切。毛泽东发起这场运动，意味着他从早些时候发动的"百花齐放"运动来了个急转弯，后一运动与苏联的自由主义化基本一致。这个转变最初是出于国内因素，主要是因为党内和国内对农业集体化的不满不断滋生，而这种不满情绪正是他的"百花齐放"政策所允许的（Deutscher 1970：144－9）。1958年的"大跃进"运动，既是为了恢复毛泽东对党的控制，也是为了以公社为基础，建立一种新的农业组织形式，一种超出了斯大林的集体化模式的兵营式的严密控制体系。更重要的是，毛泽东的新路线从理论上偏离了苏联对马克思列宁主义的正统诠释。毛泽东声称，在通往共产主义的道路上，中国可以越过社会主义这一中间阶段，直接迈向共产主义。此外，正如克劳斯·梅纳特在其分析中苏分裂问题的长篇论述中所言，"借助'大跃进'运动，北京终于可以扬眉吐气，补偿刚刚过去的岁月里所受的罪了。在那些日子里，它不得不在共产党集团屈居第二，还得毕恭毕敬地在傲慢自大的俄国人面前当小学生"（Mehnert 1964：384）。

在之后的四年里，共产主义学说精髓部分所出现的大爆炸余波不断，1962年年底，国际共产主义运动的外壳终于开裂。这个过程大部分发生在共产党的党代会和苏中两国双边会谈上，外界对此只能看

到一星半点。此外，在双方斗争的大部分时间里，使用的都是一些代名词，因为谁也不想造成不可挽回的彻底分裂。赫鲁晓夫严词谴责“教条主义”（指毛泽东认识不到现实在不断地变化），毛泽东则攻击“修正主义”（指赫鲁晓夫对革命的马克思列宁主义的背叛）。双方都把攻击的矛头转向第三方：毛泽东对准铁托与铁托主义，赫鲁晓夫对准阿尔巴尼亚。1960年，阿尔巴尼亚脱离东欧集团，向中国这边靠拢（Crankshaw 1963：66－7）。

在国际政策方面，中苏两国经历了一个逐渐变化的过程。在1957年发表的“莫斯科宣言”中，两国都毫不含糊地声明要团结一致，把为和平而战作为共产党的“首要任务”（Daniels 1985，Vol. 2：249）。没过多长时间，毛泽东即认为，赫鲁晓夫与美国和平共处并举行最高级别会谈，是对帝国主义的姑息行为。实际上，按照一位历史学家的观点，中苏分裂的根源在于毛泽东害怕“苏美两国的和解会（对中国）造成损害”（Zagoriu 1967：21－2）。争端的具体起因是苏联拒绝帮助中国发展自己的核武器，而按照赫鲁晓夫的观点则是，毛泽东在关键性的国际问题上越来越倾向于站在苏联的对立面，毛泽东反对赫鲁晓夫1959年为结束阿尔及利亚战争突然转而支持戴高乐，就是其中一例；另一个例子是毛泽东抨击莫斯科在印度与西藏的冲突中支持尼赫鲁，而这场争端也直接涉及中国本身的利益。概括一点说，只要那些“资产阶级”领导人在冷战中信守中立，苏联就甘愿支持他们，而这时中国总是不断地在第三世界发扬共产主义的斗争精神（Crankshaw 1963：91，126－7；Deutscher 1970：263）。总之，无论是在与西方的关系这个中心问题上，还是在第三世界的冲突中，中国都对苏联在国际共产主义运动中的领导地位形成了公开挑战。尽管中国有时也做出一些和解的努力，但到1963年年初，双方都公开承认相互间出现的分裂，各方都声称自己是马克思和列宁的真正继承者（Crankshaw 1963：136－7）。如果西方对国际共产主义运动中这场大地震的含义不大理解，那原因就在于它固执地认为共产主义都是一回事，无论它出现的时间和地点有何不同。

艾森豪威尔政府与苏联新领导

在美苏关系史上，发生了许多富有讽刺意味的事情，其中之一便是正当美国新的领导人计划在冷战中采取更为激进的态度时，东欧集团却开始了后斯大林时代的自由化运动。艾森豪威尔的国务卿，意志坚定、出言直率的约翰·福斯特·杜勒斯，曾在新政府执政之初表示，他对从杜鲁门那里延续下来的遏制政策持郑重保留态度。在参议院批准他就任国务卿的听证会上，他谈到有必要把东欧“受奴役的人民解放出来”。一年之后，他提出“大规模报复”概念，将其作为威慑潜在侵略者的手段。他说：“制止侵略的办法是自由社会愿意并且能够在自己选定的场所、用自己选择的方式有力地做出反应。”上述这两个重要的思想是构成艾森豪威尔政府“新面貌”政策的支柱，提出这种思想是基于这种看法，即认为杜鲁门的遏制政策存在着令人不满意的消极性与被动性。从遏制政策那里，人们看不到共产主义退却或和平降临的希望：“只要世界上还有三分之一的人处于苏联共产主义的控制之下，我们就永远不会拥有可靠的和平或者是幸福的世界。”遏制政策也不能使西方在冷战中掌握主动权，因为它只是指“在敌人的逼迫下所采取的重大应急行动中掌握主动权”（Smith 1964：648，650，651）。

从表面上看，“新面貌”政策代表着与杜鲁门时代的彻底决裂。我们将在第七章看到，从核政策方面看，这个观点可以找到被接受的依据，虽然其中也有很强的连续性成分。在美国与共产主义世界的关系方面，虽然杜勒斯发出过不少豪言壮语，但事实证明，他所说的把东欧“受奴役的人民解放出来”，这根本就无法付诸实施。当苏联的坦克隆隆开进布达佩斯的时候，美国虽然提出了强烈抗议，最后只不过是接收了数千名匈牙利难民而已。无论怎样修改遏制政策，它仍是美国政策的柱石。

假设果真如有人最近所言，1953 年标志着结束冷战“机会的丧

失”（Bialer and Mandelbaum 1988：41ff.），那么当时人们为什么没有抓住这个机会呢？首先，情况与几十年之后戈尔巴乔夫执政之初相似，美国人怀疑苏联人本性难移，而且苏联人也不见得愿意结束冷战。此外，美国对苏联的新领导人不甚了解，所知道的情况也并不令人鼓舞。东欧实行苏维埃化时期斯大林最亲密的助手莫洛托夫这时仍担任外交部部长一职。早期发生的一些事件，如斯大林逝世后几个月苏联对东柏林起义的镇压，也让世人对苏联新政权的自由主义性质产生了怀疑。

第二个方面的因素源于美国国内的问题。美国 1952 年的选举政治决定了共和党必须与民主党的对外政策议程保持距离。此外，在 1952 年的美国国会选举中，共和党在参众两院都恢复了多数党地位，在某些共和党领导人看来，这似乎为扭转西方在冷战中遭受“损失”的局面提供了机会。艾森豪威尔上台后的第一个月，共和党就敦促国会通过了一项否认雅尔塔协议的决定，随后又采取行动，想让东欧人民获得自由，此举使人联想到了“共和党老卫兵”这个称呼。艾森豪威尔反对这一行动，因为他觉得这会在对苏谈判中束缚他的手脚，促使苏联人阻碍一些悬而未决的问题的解决，如奥地利中立与德国问题。不管怎样，随着斯大林逝世，这项决议也寿终正寝了，但它却让艾森豪威尔预先品尝了一下与国会内共和党以及民主党保守分子斗争的滋味，这种斗争在他整个任职期间一直存在（Ambrose 1984：65－7）。与赫鲁晓夫一样，艾森豪威尔在谋划对外政策的方法时也不得不瞻前顾后。

美国决策者所受的第三方面限制，与他们处理对苏关系的心态密不可分。冷战开始阶段形成的有关全球意识形态冲突的观念不是随手就能丢弃的。心理学家已经证实，成见对现实世界中经验主义的变革阻力很强，结果便会产生一种或许可以叫作“观念形态滞后”的现象；即对那些可能否定原有成见的变化不能及时做出反应。当然，这一点也同样适用于苏联决策者。用杜勒斯的话说，苏联人所能看到的，只有那些能够证实美国具有侵略性的东西。

最后一点要考虑的是影响冷战对抗的组织结构或系统状况。如果存在什么差别的话，那就是由于经济的增长和核武器的发展，1950年代中期苏联对美国构成的威胁要比1945年时大得多。中国1949年加入共产党集团，使冷战的天平上又添了一个很重的砝码，不仅如此，美国还受观念形态滞后的影响而对中苏之间分裂的形成及其意义认识迟缓。1950年代和1960年代初，可以说，冷战已逐渐程式化，其形式表现为：因地缘政治因素而引起的欧洲分裂、同盟体系、军备竞赛以及由这些中心点向全球蔓延的思维习惯。

以上所列因素无一意味着美苏关系没有改变的余地。任何一种停滞或平衡趋势总要被事态发展的变化所打乱，而且在整个系统所限定的范围内活动，单个政策和决策者也可以起到重要作用。赫鲁晓夫敢作敢为的个性，加上他义不容辞地打破对内对外政策中斯大林模式的做法，无疑在这一时期达成与美国的和解过程中起到了推动作用，但他的莽撞也曾导致严重的危机。至于美国方面，杜勒斯那种威尔逊式的道德主义和动辄言辞激烈的倾向，与艾森豪威尔总的来说比较注重实效的作风相得益彰，尽管后者和赫鲁晓夫一样，同样擅长大作大为。此外，最近学术界对艾森豪威尔的研究成果表明，不管表面上看起来如何，艾森豪威尔其实一直在牢牢把持着对外政策，而且与他的国务卿一样，艾森豪威尔也是一个冷血斗士，只不过他有自己的方式，在公开场合表现得不像杜勒斯那样咄咄逼人（Greenstein 1982：89；Ambrose 1984：442，Rabe 1988：174）。

走向日内瓦最高级会议

1955年7月日内瓦最高级会议的召开，与其说是和解精神突现的明证，倒不如说是表明了事态发展的某种必然结果。这中间既有积极因素，也有消极因素，但所有因素似乎都表明，冷战的氛围已发生了某些重要变化，这些变化有必要在高层获得认可。

有三个方面的事态发展对了解最高级会议的背景很重要。第一，

斯大林逝世之后，苏联在外交上气象更新，表现得更为灵活，这不仅在欧洲，而且在亚洲和非洲都引起了一定反响。在对外政策方面，赫鲁晓夫从三个方面发动了一场与国内非斯大林化相呼应的攻势，其基本出发点是：实行“和平共处”，放弃与资本主义的战争不可避免论，以及通过和平手段促进第三世界爆发革命。正如罗伯特·塔克所指出的那样，所有这些都表明这种新的外交方式“极其强调说服的作用”，而不是武力的作用（Tucker 1972：238）。

在亚洲，苏联向北朝鲜施加压力，对1953年7月停战协定的缔结起了一定作用。在1954年召开的关于印度支那的日内瓦会议上，苏联（和中国）施加的压力再次对越南停战协议的签订起到了推动作用，该协议使越南停了火，尽管只是暂时性的。在欧洲，苏联推行的新外交政策也结出了硕果：1955年5月，苏联同意结束对奥地利的四方占领，允许它建成一个中立的独立国家。奥地利问题上的外交僵局，如汤森·胡普斯所述，“显然是几年来美国对苏联良好意愿的检验”，这一僵局的打破扫除了阻碍最高级会议召开的一大障碍（Hoopes 1974：293）。

第二个与日内瓦最高级会议召开有关的重大事态发展是共产党集团内部不断走向团结，尽管后来的事实证明这种团结是短暂的。斯大林一向有不愿意离开苏联本土的习惯，赫鲁晓夫则与他显然不同，他于1954年9月访问了中国。访问过程中，赫鲁晓夫将旅顺港和中东铁路的使用权归还给了中国，并通过谈判达成了向中国提供大量资本和货物的协议。1955年5月，他赴贝尔格莱德进行了改善两国关系的访问。总之，到了1955年中期，共产党集团看上去团结一致、蒸蒸日上。此外，赫鲁晓夫已在这一年的早些时候撵走了马林科夫，巩固了自己的领导地位，觉得完全可以采取重大的外交行动了。至于美国人，他们当然有兴趣准确认定谁是苏联的掌权人，并检验一下苏联对解决美苏分歧的兴趣有多大。在最高级会议上，艾森豪威尔特别注意对这些问题的探究，最后的答案令他满意，赫鲁晓夫的确在政策方面说了算，他对向美国靠拢当真感兴趣（Ambrose 1984：262－6）。

影响最高级会议的第三个方面，也许是最重要的方面，是与核军备竞赛及欧洲安全相关的问题。苏联 1949 年 8 月进行了原子弹爆炸试验之后，制造氢弹或热核弹的竞争因之接踵而起。按照苏联科学家最近的说法，他们先于美国在 1953 年 8 月成功地进行了氢弹试验，因此，他们是热核竞赛的赢家。有人指出，1952 年美国进行的热核弹试验，爆炸的不是真正的热核弹，只是一个“装置”（Khariton and Smirnov 1993：29）。不管怎么说，等待人们的都将是不断急剧扩大的军备竞赛和战略僵局。

在这种情况下，和平大概不是一种奢望，而是一种迫切的需要了。且不说艾森豪威尔和赫鲁晓夫都对核武器的破坏力怀有真正的、几乎深入肺腑的厌恶，就经济因素而言，他们也有理由制止军备竞赛。艾森豪威尔是个坚定不移地要求平衡预算的人，为了限制国防开支，他持续不断地与美国国防部和参谋长联席会议做斗争。在这方面，他可以说基本获得了胜利，但令人啼笑皆非的是，这种胜利是用对核武器的过度依赖换来的。他的一个助手曾说，核武器提供了“花钱换得的更大价值”。赫鲁晓夫则需要大量的常规部队来维持东欧集团的秩序和保卫本国边境，所以他需要减少开支，拉动国内经济改革。核军备竞赛很有可能使他优先考虑的事情落空。

当时欧洲的形势，尤其是德国的形势，是进一步促进一些协议达成的一个因素。1954 年，尽管艾森豪威尔政府为了表示大西洋主义者对北大西洋公约组织的重视，不遗余力地促进欧洲独立国防支柱的建立，但“欧洲防务集团”计划还是由于法国的反对而失败了。建立欧洲防务集团的初衷，是想通过它促进欧洲一体化（包括重整军备后的西德在内），并鼓励欧洲对自己的防务承担更大的责任。法国拒绝这一计划之后，杜勒斯曾威胁说要对美国在欧洲的义务进行“令人痛苦的重估”，但法国之举的主要影响却在于，美国更坚定了让西德重整军备并将其纳入北大西洋公约组织的决心（Cromwell 1992：7－12）。美国与法国展开了旷日持久、争论激烈的谈判。法国担心德国东山再起后自身安全无保障。为了解除法国的后顾之忧，

美国答应承担在西欧永久性大量驻军的义务。法国最终被说服之后，德意志联邦共和国于1955年5月加入了北大西洋公约组织，并开始着手重整军备。这个结果恰恰是苏联试图通过外交途径防止发生的，但因为未能成功，所以苏联几乎没有什么选择的余地，只有接受这一事实。于是它以牙还牙，也于1955年5月成立了华沙条约组织，把东欧的防务以华沙条约组织的形式正式确定下来了。这意味着德国重新统一（名义上双方仍奉行此政策）问题出现重大进展的希望很小，至少说明双方的分界线已清楚地划分出来。

鉴于那些表明苏联意图的证据自相矛盾，所以艾森豪威尔的顾问不大愿意参加对苏谈判并不奇怪。杜勒斯在最高级会议召开之前就对它的作用持怀疑态度，会议召开后依然如此。艾森豪威尔也有疑问，但或许是出于核问题方面的考虑，他不得不同意参加会议。将在5月举行大选的英国也向美国施加了强大的压力。继丘吉尔之后担任英国保守党领袖的安东尼·艾登希望通过促进和平为竞选打基础。胡普斯评述道，“艾森豪威尔愿意帮助艾登是华盛顿最终决定参加最高级会议的关键因素”（Hoopes 1974：287）。

日内瓦最高级会议

此次最高级会议本身也许不可避免地暴露出了东西方在德国这一关键问题上的分歧，笼统地说，是暴露出了共产主义和资本主义在意识形态领域的分歧。艾森豪威尔在会议开幕讲话中提出了德国重新统一、实行自由选举及有权选择德国自己的安全方式等建议——最后一项建议是指德国可以加入北大西洋公约组织。他还有意提出了苏联未能履行雅尔塔协定的问题，虽然他内心也明了苏联甘心做出让步的希望很渺茫。他以其精心设计的方式直言批评苏联在全世界传播共产主义的做法，他没有拉开真要谈判的架势，只是陈述了西方的最高要求。赫鲁晓夫也有类似表现，他倡议建立一个非军事化的、中立的德国，拒绝了所有关于此次会议可以讨论苏联“内部事务”（意指东欧

状况）的建议（Eisenhower 1963：515－16；Ambrose 1984：264）。到头来，会议的最后公报对所存在的分歧只字未提，关于德国问题，则提出了一个似乎表明大家在自由选举原则上已达成一致意见的方案。但是，会议却没有制订实现自由选举的具体步骤。考虑到会议之前采取的加剧德国东西之间分裂的举措——东德加入华沙条约组织，重整军备后的西德被纳入北大西洋公约组织，可以说公报内容措辞含糊，跟现实情况大相径庭。

然而，人们对日内瓦最高级会议的普遍记忆，不是因为它对欧洲分裂与德国分裂状况的实际认可，而是因为艾森豪威尔在会上提出了惊人的“开放天空”计划。该计划出台的背景是，在关于将双方互相检查对方军备作为裁军和缓和军事紧张状态的一个措施这个问题上出现了僵局。苏联提出把检查范围局限在几个固定的地面检查点，但正如艾森豪威尔所指出的，若是就这么几个点，很容易出现地面和空中错检的情况。艾森豪威尔说，为什么双方就不能达成一致意见，一方面实施空中检查，另一方面互相交换标明境内和海外基地所有军事设施特性和位置的地图呢？关于空中检查的飞行高度、路线和飞行次数，也要做出具体规定。他还提出了一点也许是这个计划里最为大胆的建议，“每架检查飞机的机组人员中可以有一名或一名以上被检查国的代表”（Eisenhower 1963：520）。

艾森豪威尔期望他的建议能最大限度地达到惊人的效果，他无疑如愿以偿了。他的建议博得了与会者的掌声，并很快得到了英国和法国的赞同。苏联的反应起初也很令人鼓舞，苏联部长会议主席布尔加宁认为这个计划“确有价值”，因此向会议保证，他的代表团将本着支持的态度对计划进行认真考虑。然而，在休会期间，赫鲁晓夫却告知艾森豪威尔，“我不同意部长会议主席（布尔加宁）的意见”。这个答复让艾森豪威尔明白了谁才是“苏联代表团中说了算的人物”。“开放天空”计划没有任何进展，在会议的最后公报中，与会代表团只是同意“通过联合国裁军委员会的小组委员会共同制定出一套能为大家接受的裁军制度”（Eisenhower 1963：521，527）。

如果以是否签订明确协定这种实际结果为标准来衡量会议的价值，那么这次会议几乎不能说是一次成功的会议。但如果把它看作对话的开始，认为其意义就在于对话本身，那么就可以说会议达到了缓和紧张状态的目的。从"开放天空"计划可以看出，步伐迈得太大太快既具诱惑力又有危险性。虽然似乎没有理由怀疑艾森豪威尔提出此计划的诚意，但他和赫鲁晓夫不可能不注意到，美国在空中检查技术领域居领先地位。U－2"间谍飞机"已进入高级发展阶段，可以在70000英尺的高空飞行，以当时的防空技术，它是不会受到任何攻击的。从这个方面看，"开放天空"计划与冷战转变时期双方军事技术发展速度的不平衡状态是不相适应的。不出两年，苏联人造卫星的成功发射也同样会使美国不大情愿参加减缓军备竞赛的谈判。禁止核试验谈判的记录证明，只有经过长期艰苦的准备，且在精心限定的领域内，这样的协定才有达成的可能（这些将在第七章讨论）。

危机及其意义
（1956～1961）

以1950年代的后五年和1960年代初的观点来看，1955年似乎是格外平静、充满希望（也许是并不现实的希望）的一年。但没过多久，超级大国竞争的动机便故态复萌，随着一系列事件的发生，"危机"一词被赋予了新的含义：1954年和1958年在中国近海岛屿金门和马祖发生危机，1956年匈牙利起义被镇压，苏伊士危机，1957年苏联人造地球卫星发射成功，1958～1959年的柏林危机（肯尼迪就职后的头一年再度爆发），1959年的古巴革命及后来的猪湾入侵（1961年）和导弹危机（1962年）。考虑到日内瓦最高级会议的议程——德国与欧洲安全问题、核军备竞赛问题和促进东西方对话的问题，以上提到的事件似乎表明，减少紧张局势的努力已告全面失败。为什么日内瓦最高级会议所显示的缓和形势的推动力如此脆弱呢？

对高层领导个人的外交效力寄予过高的希望是必定要付出代价

的。人们本来就不该对继波茨坦会议之后初次尝试举行的最高级会议要求过高，它所能起到的作用不过是澄清大国间的分歧之所在。会议之后所发生的一系列危机表明，这一时期在急于缓和紧张状态与希望在超级大国激烈竞争中为本国谋取最大利益之间，存在着复杂的辩证关系。此外，超级大国再也不能指望去处理那些日益脱离它们直接控制的一系列问题了，尤其是第三世界的问题。直接属于它们自己领域的问题，如军备竞赛和德国问题，已经够让它们头疼了。双边关系越来越多地受制于多方面的交叉压力。这些压力加大了冷战的危险，却未必给超级大国提供了相应的解决手段。

“日内瓦精神”包含了很大的幻想成分，但双方仍然热切希望把这种幻想维持下去。至少日内瓦会议树立了一个原则：高层的接触还是有一定价值的，它可以证实双方都有意避免彼此之间紧张状况有可能导致的最坏结果——核战争。艾森豪威尔和赫鲁晓夫接着于 1959 年在华盛顿附近的戴维营再次会晤，其间双方不但为次年将在巴黎举行的最高级会议打下了基础，而且还在看似友好的气氛中共同回忆了各自的战时经历。

然而，巴黎最高级会议最终却证明，无论出发点有多么好，依赖个人外交都是不可靠的。临开会前几天美国 U－2 飞机在苏联上空被击落一事破坏了这次最高级会议，使人们对美苏两方的诚意发生了怀疑。艾森豪威尔为什么会在这个关键的时刻批准 U－2 飞机做这次注定要挑起争端的飞行，而且在飞机被击落之后，为什么没有利用赫鲁晓夫为他提供的解释机会，说自己对飞行根本一无所知呢？至于赫鲁晓夫，他为什么要把飞机击落呢（以前也有过多次这种飞行）？又为什么在事件发生后将消息扩散到全球，使美国难堪无比呢？

赫鲁晓夫在这次事件中的动机不大明确。有一种似乎合理的解释是，他的行动与中苏之间越来越激烈的争论有关。在 1960 年的头几个月里，随着在北京大张旗鼓地公开发表一篇题为《列宁主义万岁》的文章，中苏之间的论战显著升温。该文章几乎毫不掩饰地抨击了苏联“修正主义”。或许是考虑到与中国决裂将在整个共产主义集团造

成损失，赫鲁晓夫经过权衡，认为在这个节骨眼上对美国采取强硬政策也许更划算一些。这种可能性似乎是存在的，尤其是在赞成爱德华·克兰克肖判断的人看来是如此。这一判断认为，“从1960年直到赫鲁晓夫政治生涯结束，他一直将苏联与中国的争端视为压倒一切的首要问题”（Crankshaw 1966：272－3）。

另一个对赫鲁晓夫的行动产生重要影响的问题，也许是对国内压力的忧虑，尤其是来自他手下那些将军们的压力。他们很担心赫鲁晓夫企图与美国达成和解，担心有人提出的削减苏联常规部队的建议会削弱苏联的国防能力。赫鲁晓夫在这次U－2飞机事件中持强硬态度，就是出于抚慰批评者、稳固个人政治基础的目的（Beschloss 1986：376－7，381）。至于艾森豪威尔，很显然，他是在国防部部长和中央情报局局长等官员的建议下才在此关键时刻做出派U－2飞机的决定的，而在这些官员眼中只有军事利益，往往不考虑这种收集情报的方式可能会对美苏政治关系产生什么样的影响。艾森豪威尔后来承认，这是他个人判断上的失误（Beschloss 1986：370）。

通过对U－2飞机事件的全面考查，迈克尔·贝施罗斯认为，两国政府都对“破坏缓和”负有责任。他们对U－2飞行任务的意义在认识上的根本差别是问题的关键。艾森豪威尔认为苏联对U－2飞机飞越其领空毫无办法，只好接受现实，所以再批准一次这种飞行也未尝不可。此外，他也不能利用赫鲁晓夫为他所提供的当面解释机会（即不承认U－2飞机是间谍飞机，此次飞行没有得到他的批准）来为自己开脱，因为那样做便意味着他控制不了国防政策。而赫鲁晓夫却一直认为：这种飞行是一种入侵行为，它暴露了苏联的易遭攻击性；凡是能降低这种易遭攻击性的行动，苏联都可以采取，而且应当采取。虽然没有确切证据证明艾森豪威尔或赫鲁晓夫在故意挑起事端，破坏巴黎最高级会议，但从双方的做法上看，却似乎是在有意激怒对方（Beschloss 1986：371－2，376－7）。从这个角度上看，U－2飞机事件集中体现了美苏双方在其他问题上的对抗状态，如德国和军备控制问题。不管怎样，艾森豪威尔卸任时美苏关

系一团糟，美苏和解的目标似乎跟他执政期内其他时候一样遥不可及。

肯尼迪与赫鲁晓夫

众所周知的“导弹差距”问题在肯尼迪竞选总统时就是个中心议题。从那时开始，肯尼迪就给冷战注入了新的活力。1957 年，苏联人造地球卫星发射成功，使美国陷入了深深的忧虑之中，因为这标志着苏联在导弹技术领域走在了前头。U－2 飞机被击落事件，进一步证明了苏联在火箭技术方面取得了进展。实际上，这些引人注目的情况都是与现实情况相背离的，两国之间的确存在差距，但到 1960 年美国总统竞选时，遥遥领先的一方是美国，对此艾森豪威尔已通过中央情报局的间谍了解得一清二楚。但是他拒绝提供确凿的证据，因为这样做会泄露 U－2 计划的内容，而且还得将有关照片公之于世（Ambrose 1984：562）。在艾森豪威尔的第二个任期，公众就开始为苏联在军备竞赛中的领先地位感到忧虑，肯尼迪又借此事件将这把焚心之火煽得更旺了。

事实上，这个问题远不只是导弹数量的问题。在 1960 年的美国总统竞选中，发生了与 1952 年总统选举时惊人相似的一幕，当届政府被指控在冷战中丧失了主动权，而挑战党——具体说是民主党——则标榜自己才是充满活力、能领导变革的政党。1960 年 3 月，几年后将成为越战主要反对者的参议员富布赖特发表了一篇讲话，这篇讲话本质上与约翰·福斯特·杜勒斯在 1950 年代初所做的言辞最激烈的“新面貌”讲话如出一辙。富布赖特在讲话中称，“我们正熬过一个充满危机的时代”，他还补充说，“我们从来没有面对过这样一个对手。苏联一飞冲天，从一个二流不发达国家一跃而虎视眈眈地雄踞于世界之上”。美国虽然十分富有，却没有利用自己的财富维持一个与自身经济实力以及苏联的威胁相当的防御水平。这个错误在于艾森豪威尔总统——他盲目自满，拒绝听从军事顾问们的意见。此外，亚

洲的共产党正处于进攻之势，且苏联正在发动“以我们为主要目标的世界范围内的贸易攻势”（Smith 1964：653，655，656）。

形势的发展为肯尼迪的就职演说做好了铺垫。这篇演说辞藻华丽，奇特地把讲究实效的实用主义与理想主义糅合在了一起，也为肯尼迪担任总统期间特有的风格定下了调子。肯尼迪向整个世界而不单单是向美国人宣称，“为确保自由的存在和自由的胜利，我们将付出任何代价，承受任何负担，应付任何艰难，支持任何朋友，反对任何敌人”（Kennedy 1962：1）。几天后，他在美国国情咨文演讲中更为具体地阐述了这段话的政策含义。他首先用与富布赖特非常相似的措辞概述了世界形势，之后便提出，为了迎接挑战，美国必须“首先……强化我们的军事手段”。他承诺壮大常规部队，提高其灵活作战能力，加快导弹和北极星导弹潜艇计划的实施。其次，要改进“我们的经济手段”，为实现这一目标，就要扩大对发展中国家的援助，建立拉丁美洲进步同盟，并开通与东欧的贸易联系，“以期……有助于重建历史性的友谊联系”。他说，面对如此规模的挑战，“做出的反应必须是空前激烈的，几乎与早年的租借法案和马歇尔计划一样”。最后，“我们还必须加强我们的政治与外交手段”，通过加大裁军力度，支持联合国并与苏联及其他国家合作，“利用科学去创造奇迹，而不是制造恐怖”（Kennedy 1963：23，24，26）。

这篇讲话虽然听起来完全像是在议论冷战的事宜，但肯尼迪仍煞费苦心地强调指出，“我们所面临的最大挑战，依旧是没有卷入冷战之中的世界”——他指的似乎是发展中国家，所以美国必须加强对联合国的支持，“使它成为结束冷战的工具，而不是冷战的舞台”。不过他倒是用一句话阐明了最主要的内容，“第一大障碍仍然是我们与苏联和共产党中国之间的关系”（Kennedy 1962：23）。关于军备竞赛危机、古巴危机和第三世界其他地区所发生的危机，将在后面的两章详细阐述，在此我们尝试谈一下肯尼迪对他政治生涯中占首要地位的问题所持的基本态度。

肯尼迪，正如他自己所承认的那样，接触“自由主义”比较晚，

“一些人20多岁就‘树立’了自由主义思想。我没有。我被淹没在逆流和旋涡之中。只是到了后来我才开始进入主流”（Heath 1976：24）。在他年轻时担任众议员，以及后来任参议员的时候，肯尼迪就一直是提倡在国内与海外均持强硬反共立场的急先锋。他曾经是那些公开谴责美国“失掉”国民党中国的人中的突出代表，也曾在麦卡锡主义问题上随波逐流。以上这些，加上他1950年代对黑人民权运动不冷不热的态度，都表明他对民主党中自由主义一派的事情不会坚定地支持。然而，到1960年大选时，他已经开始参与自由主义的事务了，尽管表现得十分谨慎。

当然，由于各党派的路线方针总处在不断变化当中，所以对美国式的自由主义可以有多种解释。广义地讲，它可以指由洛克派哲学学说和18世纪的学说派生出的一种美国政治文化传统（Hartz 1955：3-32）。单从20世纪的狭义角度讲，它指的是一种改革的政治文化传统，它继承了西奥多·罗斯福和伍德罗·威尔逊的“进步党主义”、富兰克林·罗斯福的“新政”、肯尼迪和约翰逊的“新边疆”和“伟大社会”计划，又对它们进行了改革。再狭义一点，就是指这种“改革传统”的“左倾”部分，但那些自称“自由主义者”（有一个时期，这个词并不为人所忌讳）的人有一个典型特点，即利用这个词的多层含义为自己的目的服务。肯尼迪自称自由主义者，借以表明他的政治立场具有包容性，而不是排他性。事实上他是在重新定义政治事务的核心问题。无论如何，到他执政的时候，在美国国内，自由主义的内涵是政府积极管理经济，促进民权，同时高谈社会理想主义。在国外，它同样意味着积极追求美国的利益，但同时也要兼顾与苏联合作的目标及各民族自决原则。这在本质上与大约40年前伍德罗·威尔逊明确阐述的美国对外政策没有什么区别，这是典型的美国式民族主义与国际主义的结合，只不过肯尼迪的个性和当时的国际形势背景赋予了它新的特点。

毫无疑问，在解释肯尼迪的对外政策时，可能会夸大他那种“朝气蓬勃的理想主义”的重要性。然而，如果不提及肯尼迪新注入

总统这一职位的节奏与干劲，就不可能理解他在决策过程中既好斗又宽容的独特表现。在某些方面，他实际上和艾森豪威尔一样谨慎——如果我们细想一下，就会觉得其实他更谨慎一些，因为他从来没有试图做像艾森豪威尔的“开放天空”计划那样宏伟的事，但是他的许多讲话和政策立场却使世界政治舞台上冷战的对抗性更加鲜明。他的就职演说本身就是向国内听众乃至全世界发出的政治和道义方面的战斗号令，其目的是与苏联争夺优势地位。连他的和解姿态中也充满着具有奋斗精神的豪言壮语。

1961 年，肯尼迪所面对的世界更加纷繁复杂，在许多方面都比 1953 年艾森豪威尔所面对的世界更变化无常，这就使得准确判断对美国利益的各种威胁并制定相应的政策尤为困难。肯尼迪曾在接见《消息报》主编时提出这样的问题：在这样一个新独立国家极易受到苏联“在全世界实现共产主义”目标影响的世界上，民族自决究竟意味着什么（Kennedy 1962：742）？在一个超级大国有能力毁灭对方甚至毁灭全球的世界上，“和平”又有什么意义？苏联与中国的分裂应做何解释？它是否可以为美国所用，或者仅仅是一场派别纠纷，对天下共产党是一家这个基本事实没有丝毫影响？

如果以上各个领域的威胁都出自同一个来源——世界共产主义运动，那么冷战就不可能有所缓和。然而，如果像肯尼迪和他的顾问们所察觉到的那样，共产党集团也在走向分裂，如果发展中国家有自己国家的事情要做，并不急于投进苏联或中国的怀抱，如果军备竞赛的真正危险是核战争本身，也就是说几乎不能指望把核武器投入使用，那么就需要对冷战政策做大的调整。政策就必须更灵活，中心更加单一，更能应付各种不同的威胁。实际上，肯尼迪政府所宣布的政策即被冠上了“灵活反应”之名。然而，正如我们在肯尼迪的国情咨文中所看到的那样，实际所采取的政策却是要在政治、经济和防御各个方面全面强化美国的冷战斗争手段。为什么明明已经认识到了威胁的多样性，但制定政策时却似乎基本上只以单一威胁的看法为前提呢？

约翰·加迪斯提出了一个似乎合理的解释。“在肯尼迪执政期

间"，他写道，"来自各方面的威胁减少了，而防御手段却比他前任所想要的更多"。他接着说，之所以会有这种差别，是因为"肯尼迪和约翰逊政府最害怕的，既不是走向分崩离析的共产主义运动，也不是极力谋求缓和的苏联，更不是国力太弱的中国，而是当众示弱所招致的困窘与羞辱"（Gaddis　1982：213，212）。

可以肯定，肯尼迪在很大程度上要顾及美国的声望，要考虑在潜在的敌人以及盟友眼中树立一个坚定的形象问题。然而，对肯尼迪的两难之境，还可以有另外一种解释，这种解释方法源于一个观点，即积极对外政策目标的制定最终取决于非优先考虑的消极目标。这里所说的消极目标主要是不给共产主义扩大影响范围的机会。积极目标——裁军、缓和东西方紧张状态和促进发展中国家的民族自决——不得不受到不给共产主义取得进展的机会这一基本要求的冲击。当需要在促进积极政策与坚持消极政策之间做出选择时，经常是后者胜出。原因很简单，就是因为在与共产主义的竞争关系中存在着一些固有的不稳定因素，这些因素必然导致采取自我克制策略，而这是一种极其冒险的做法。无论共产党的威胁在减少的势头看起来如何真实，也不大会超出这种可能，即它不过是在耍手段，表面上的减缓掩盖着实际上的扩张。

从这个角度考虑，较之于他的前任，肯尼迪决策时的显著特点是，他有缓和紧张局势的积极愿望，但采用的冷战手段却在增强，这之间存在的差距比较大。这个差距可以说由"自由主义"填补了，它为自我克制策略增添了行动主义、理想主义的积极色彩。事实上，加迪斯的判断也许是成立的。他认为，共产主义的威胁在肯尼迪执政的最后一年呈缩小之势——此时中苏分裂已公开化，导弹危机的结束也打破了禁止核试验谈判的僵局。尽管如此，肯尼迪当政的头两年仍是危机重重。卡斯特罗的革命成果在古巴得到巩固，这标志着"门罗主义"这面墙上出现了一个大缺口。导弹危机表面上似乎是因苏联想重新达到一种对自己有利的核平衡而引起的。苏联在柏林施加的压力，检验了西方对原本明确的欧洲界线划分出现反常情况后所承担

的义务。1961年老挝冲突的爆发，不但对建立中立的老挝的努力构成了威胁，而且也影响到了南越的安定，因为北越把支持激进的巴特寮看作解放印度支那这一更大规模斗争的一部分。纵观整个政策议程，共产党采取的积极行动似乎使任何可能和解的希望都变得渺茫。

赫鲁晓夫所发出的信号也是自相矛盾的。1961年他在维也纳与肯尼迪举行会谈时，在实质性问题上几乎毫无进展，尽管两位领导人之间建立了一种并不真诚但相互尊重的关系，其后还以惊人的坦诚持续交换了两年信件（Beschloss 1991：318－20，326）。柏林危机是维也纳会议上空挥之不去的阴影，再现了1958～1959年那些事件。关于军备竞赛和第三世界冲突，我们留待第七章再讨论，在此先看一下1945年以来未尽的事宜。

赫鲁晓夫1961年之所以制造威胁，与1958年的情况一样，目的是强行推出一种办法，解决两个德国的地位这一悬而未决的问题和其中的西柏林问题。虽然两个德国是事实上的主权国家，但若不用条约的形式将其存在正式确定下来，按照1945年7月波茨坦协定的规定，它们就仍处于四国的管制之下。这样西方人就遇到了如何进入西柏林的问题，因为它坐落在东德境内大约100英里处。西柏林已经成了东德人，尤其是那些职业人士的逃生之路。它也是西方可以从事宣传与间谍活动的基地。赫鲁晓夫威胁说，他将与东德单独签订一份条约，承认它对自己领土的主权，并把柏林通道的控制权移交给新的东德政府。这样，虽然柏林本身将成为一个“自由城市”，但四国的权力将宣告终结。

1961年，赫鲁晓夫也像在1958年一样给西方人规定了六个月的期限，要求他们接受这些条款。不过1958年在艾森豪威尔同意确定最高级会议（即流产的1960年巴黎最高级会议）的召开日期之后，紧张对峙的局面就结束了。而在1961年，在维也纳出现僵局之后，就再无回旋的余地。到了夏季，随着焦虑的不断加剧，肯尼迪让自己，也让美国公众做好了迎接危机到来的准备，此举与1948年杜鲁门的做法非常相似。“对自由的人们的直接威胁在西柏林”，肯尼迪

在电视讲话中宣布，“但那个孤立的前哨不是一个孤立的问题。这种威胁是世界范围的”。他要求国会批准一项紧急国防拨款，扩充兵员，逐步增加征兵人数，把行将退役的舰艇与飞机重新编入现役，已经规划好的民防计划也加快了速度（Kennedy 1962：533，535－6）。

苏联的反应是于8月13日夜间在东西柏林之间竖起了一道带刺的铁丝网，随后又建起了一堵墙。这种反应既富有挑衅性，又在解决眼前的危机中起到了决定性的作用，尽管并不能正式确定柏林的地位。双方都未达到积极目标，但各方都达到了一个消极目标：赫鲁晓夫封锁了西方进入东柏林的通道，肯尼迪则拒绝了苏联提出的签订修改这座城市地位条约的要求。结果与朝鲜的情形一样，从某种意义上讲又恢复了原状，但分界线更明确了，这意味着这座被分割的城市将成为超级大国全球性分歧的一个有力象征。肯尼迪1963年6月访问柏林期间说过一段著名的话。他说，“所有自由的人们，无论他们居于何处，都是柏林的公民”，因此，“作为一个自由人，我骄傲地说‘我是柏林人’”，这番话证实了柏林仍将是检验西方对全球决心的地方（Kennedy 1964：525）。

然而，就在肯尼迪发表此番讲话前十天，他还发表过一次同样重要的公开讲话。在那篇讲话里，他展露给世人的可是一副完全不同的面孔，这说明在超级大国关系中深藏着固有的矛盾。在6月10日对美国大学所做的演说中，他提议再度为维持和平做出贡献，并重新审视美国对待苏联和冷战的态度。这篇演讲虽然没有他就职演说中那些华丽的辞藻，但用语却经过仔细斟酌，且透出要求和解的意向，并突出强调了积极的方面。这次演讲使人联想到的不是令人担忧的柏林僵局，而是导弹危机过后与苏联关系的解冻，其标志有两个方面：一是华盛顿与莫斯科之间建立了“热线”，以便在发生危机时能迅速取得联系；二是在禁止核试验条约（7月签署）的缔结问题上取得了令人鼓舞的进展。值得一提的是，肯尼迪套用威尔逊在1917年所发出的“为民主创造一个安全的世界”的呼吁，提出希望在苏联的帮助下“为适应局势的多样性创造一个安全的世界”（Kennedy 1964：462）。

就表达肯尼迪的意图而言，采取在美国大学演讲方式，既语言直率，又内容一致。然而，作为行动的指南，由于冷战对抗所深具的两个特点之故，他的意图又很难顺利实现。首先，双方限制“多样性”的方式排除了形成一致意见的可能。至于世界上那些早已加入这个或那个集团的国家，它们对“多样性”的容忍是以广泛接受冷战的界线仍是世界政治的决定性因素这一点为前提的。即便脱离了这些集团的国家，如脱离共产党集团的中国，退出北约的法国，也并不意味着要投向另一方。在那些国家，尤其是谋求独立于这个或那个集团之外或斗争尚未有定局的第三世界国家，在超级大国的决策者看来，总是存在着这种危险：对“多样性”的容忍或许意味着向另一方做出让步。

其次，由于美苏冲突所涉及几个关键地区发展速度不同，所以引发的问题也各不相同，一个地区的解决方式，即便是行之有效的方式，在另一个地区则未必能奏效。譬如说，1963年军备竞赛中搞的缓和（虽然是暂时性的、部分性的）对越南的冲突就没有任何影响。同年夏秋两季南越政治危机的爆发和北越压力的逐步增大，使美国踏上了大规模干涉之路。总之，欧洲、军备竞赛和第三世界这三个领域的竞争动因是各不相同的。因此理查德·尼克松和亨利·基辛格尝试运用“关联原则”领导美国走出此种困境不是一朝一夕能做到的，还需要等上好几年。

第七章
核军备竞赛
（1945～1963）

引　言

军备竞赛在人类历史上并不是什么新东西。技术突破暂时给一方带来巨大优势，促使另一方做出相应反应，继而又恢复某种程度上的平衡，这种先例比比皆是。到了近代，这种革新又附上了一个共同点，那就是，一种或另一种新式武器系统的破坏力极其可怕，因此人们坚信它根本就不会被用于战争，只能促使各方达成共识，即必须消灭战争。第一次世界大战前，人们认为潜艇具有巨大的压倒一切的破坏力，尤其是用于对付民用船只时，所以不会有哪个国家认真考虑使用它。在大规模轰炸问题上，人们也深持此见。然而，第一次世界大战时德国的潜艇战，西班牙内战中德国对格尔尼卡的轰炸，第二次世界大战期间各方对民用目标的大规模轰炸，将这些乐观的希望统统化作了泡影，而人类对在肉体上相互毁灭能力的心理适应力似乎极强。

核武器出现之后，事情就起了变化。广岛和长崎的居民有充分的理由怀疑，政治领导人在使用核武器问题上是否真的存在什么限制。不过，广岛和长崎的这种经历倒是没有来过第二回，仅在只有一个国家处于核垄断地位时有过一次，这一点很重要。同样重要的是，它发生在一场漫长的战争进入尾声之时，当时双方对前所未有的高破坏能

力已习以为常。最后还有一点也很重要，那就是，人们虽然知道原子弹的威力比常规炸弹大许多倍，但指导其使用的设计方案仍是“常规性的”。由于对放射性威力知之甚少，投掷原子弹采用的是常规手段（有人驾驶的轰炸机）。根据不久后氢弹（热核弹）的出现所形成的核弹当量来看，对日使用的原子弹当量是很小的。

即便如此，某种全新的东西已进入人类舞台，这几乎是毋庸置疑的。在很短的时间内，一些人足以相信这一事实，并开始宣扬老自由主义管理世界的万应良方（*Nevo Republvc* 1945：366）。约翰·赫西撰写的《广岛》一书，对原子弹在七个人身上所造成的后果做了第一手强劲报道。无论是最初在《纽约人》杂志上连载的文章，还是1946年单独出版的书，都获得了众多读者的青睐（Hersey〔1946〕1986）。伯纳德·布罗迪1945年11月出版的一本小册子，在大多数公众中的知名度虽略逊一筹，但其重要性却毫不逊色，他本人日后也成了或许是美国最主要的核战略家。在《原子弹与美国安全》这本小册子中，布罗迪认为，原子武器预示着，“不单是现代战争的毁灭性，连战争的基本性质”也将发生变化。首先，原子弹不只是“加在本来已经很长的武器单上的又一件更具毁灭性的武器，它预示着武器单上的其他武器相对不那么重要了”。其次，人们还想不出防御这种武器的办法。它似乎抹去了攻击与防御之间的差别。尤其重要的是，“原子弹引起的本质性变化，将暴力在时间上浓缩了。过去，世人通常觉得战争持续四五年是件很可怕的事；如今，他们反倒要为未来战争可能只打几天就结束而骇然了”（Brodie〔1945〕1989：65，67）。关于未来核军备竞赛的特点，布罗迪这本小册子几乎无所不及，它包括威慑理论（“相互确保摧毁”思想的雏形亦在内）、导弹研制、核扩散、军备控制与核查问题等。

布罗迪主要探讨的是“暴力在时间上”的浓缩问题。实际上他预测，核战略将不同于传统意义上的军事战略，核战略的基点是必须防止核大国使用其武器库中的主要武器。核军备竞赛的关键在于它具有一个自相矛盾的特点：是否“获胜”不是靠在战争中打败另一个

国家来衡量，而是靠是否能避免战争来衡量。

尽管产生计算错误或发生事故的可能性无时不在，但由它们引发核战争的事却从来没有发生过。鉴于此，最近有些评论家说过去四十年不是冷战，而是“长期和平”（Gaddis 1986；Kegley 1991）。对于我们从自己特定的角度去理解过去的四十年，这种说法也许有帮助，也许没帮助（本书最后一章将论及此问题），但很难说它符合核时代初期呈现在决策者和普通公民面前的前景。目前因核战争从未发生，人们有一种轻松的预感，与此相比，广岛事件刚过之后那几年人们有焦虑的预感，这两种情况与一件事有关，那就是在判断核武器的重要性问题上存在着很大的不确定性。我们无法确定，是核武器本身而不是其他因素，维持了核“和平”；也无法确定，了解核武器的破坏力是否会阻止一些国家投入战争。

冷战结束以来，关于核事故发生的可能性研究，增强了我们对超级大国核关系中不可预知因素的理解。布鲁斯·布莱尔和斯考特·萨根的研究，揭示了核武器指挥与控制系统中深藏的缺陷。冷战期间，政治家和学者们对威慑所做的理论上的推论，一般都是以这种看法为前提的：在任何危机中，关键性决定因素是领导者的政治意图和能力。布莱尔和萨根提出的证据表明，双方即便全力确保不因疏忽造成导弹误射，在很大程度上还要看运气如何。这不仅因为安全程序本身极易出错，而且因为维持战备状态和对袭击反应能力的必要性不可避免地会将安全推向极限。例如，美国和苏联的核武器指挥系统就“与人们的普遍想法相反，两者都预备一接到警报即发射”，这实际上意味着把发射核武器的权力交给了军事指挥人员。布莱尔写道，总之，“大国的核态势意味着事故随时有可能发生”（Blair 1993；8，9；Sagan 1993：3－4）。

这种结论是否正确，明确做出判断为时过早，但值得注意的是，自从核时代开始之初，反核积极分子，还有一些电影导演和小说家，一直坚持认为那种噩梦般的场景很可能是事故造成的，而不是出于恶意而为之。从某种意义上说，布莱尔和萨根给这种看法镶上了学术的光环。这种事故在冷战期间确实发生过（而且为数不少），但都不曾

引发大的灾难性后果。鉴于此，对历史记载的解释在多大程度上需要根据这种结论做出修正，显然值得商榷。不过，至少从这一点看，冷战中充斥的危险超出了人们的一般想象。

超级大国之间从未实际发生过核战争，军备竞赛的历史也因此而具有双重性。其详细的历史可以通过各方武器的数量和类型来描述，其核战略史则主要是一部有关核武器可能如何被部署的假象史。由于单个国家和人类社会本身都没有经受过互投核弹的后果，战略所采取的都是规划和设想的形式，最深奥的也不过是博弈推演。“防御学者”在美国的出现，是核时代军事战略高度政治化的体现。如果说核武器的硬件仍为军方和国防承包商所独揽，民间分析人士对软件的影响力则小到了战争史上不同寻常的程度。谈及所有这些只想说明，核军备竞赛提出的问题为参与其中的各个国家所关注。终极武器提出的问题也是终极性的。在本章内，我们将对美国和苏联核理论的演变做一概述，进而用这些与1953～1963年间的对抗与谈判史进行一下对照，讨论的主题是这段时间内军备竞赛的动因与不稳定性，以及与之相应的战略原则的演变与军备控制建议方面的变化。

美国的核战略

杜鲁门与消极威慑

尽管有伯纳德·布罗迪这样的人物出来撰文著述，核武器对军事计划的根本含义并没有很快为人们所认识。其一是因为在日本上空投掷原子弹一事似乎证实了空军的下述观点：战略轰炸是在战争中获胜的关键（Freedman 1981：22－4）。其二是因为在继后的四年中没有确凿的证据表明，美国的原子垄断对苏联的行为产生了显而易见的影响，只不过是促使苏联尽快行动起来去发展自己的原子武器罢了。无论原子武器多么“特殊”（杜鲁门政府肯定是这么认为的），好像也没有得到其特殊性应当带来的政治效益，因此不能把核武器看作常规

武器的替代性选择。到了1948年，原子武器虽然已被纳入军事计划之内，但用戴维·罗森堡的话说，杜鲁门还是不愿意，或者说无法“想象原子弹还能是什么，他认为原子弹只是一种最终的恐怖性武器，一种作为最后手段使用的武器”（Rosenberg 1983：11）。

杜鲁门留给艾森豪威尔的遗产是混杂的。发现苏联1949年9月首次进行原子弹爆炸试验后，杜鲁门决定加快热核弹或称“超级炸弹”的研制步伐，生产“战术”核武器，但是在战争中使用这些武器的作战计划却被推迟。当时只要谈到威慑理论，前提都是面对苏联可能发起的袭击应如何进行全面报复性的威胁，根本不去设想苏联新近具备了核武器后相互威慑的状况终将发生。1950年国家安全委员会战略重估报告（NSC68号文件）则恰恰相反，其撰写者写道，“当它（苏联）估计自己已具备足够的原子能力对我们发动突袭，能够将我们的原子优势抵消，形成于自己有利的军事形势时，克里姆林宫有可能会迅速而悄悄地实施打击。两个具有原子能力的大国若以这样的关系存在下去，很可能非但构不成威慑，反而会刺激战争的爆发”（*FRUS* 1950：266）。

上述说法表明，尽管承认原子武器代表着一种新的破坏力，但还是估计到了这种武器有使用的可能。NSC68号文件明确排除了宣布美国“不首先使用”核武器的可能性。另外，认识到苏联人在认为对自己有利的情况下会毫不犹豫地使用核武器这一点也很重要，这样就使得准备对付突然袭击的必要性变得十分迫切，并因此提出了美国在哪些情况下会动用核武器做出反应的问题。等苏联人切实发射了核武器再做出反应，无异于冒险让美国自己的还击能力遭受灭顶之灾。就已知的情况看，目前还没有防御核武器进攻的办法。即便敌方只有一架轰炸机进来，也能造成巨大的破坏。若是乘苏联目前投射核武器的能力有限之际打一场预防性战争，又违背美国文明的规范，世界舆论亦会很难接受。可能的折中立场是不搞预防性打击，而代之以“先发制人”式的打击。这意味着，在战争似乎已迫在眉睫的情况下，美国必须做好首先实施打击的准备。不过，这就需要对敌方的动向有

准确的情报，而这一点尚无法做到。

杜鲁门离任时，战略原则虽然尚未确定，但核僵持的动因已大致显现出来了，其中包括：容易遭受突然袭击、有必要拥有在敌方实施首先打击后的报复能力、获得准确情报极端重要，以及很难想出什么防御核武器的措施。以上因素中的每一项，在 1950 年代均在核计划中有所体现。

从消极威慑转向积极威慑

由于杜鲁门政府采取的核方针是以广义的威胁为前提的，只涉及美国对苏联的常规袭击或核袭击做出反应，因此我们可以将其称为“消极威慑”。在艾森豪威尔与杜勒斯时代，由于杜鲁门的遏制政策受到共和党的批评，美国随之转向“积极威慑”。这种更为激进的大规模报复方针和边缘政策的形成，总的说来与约翰·福斯特·杜勒斯不无关系，但具体而言，他却与核政策的规划关系不大。

要想比较正确地了解艾森豪威尔政府当政时期的核政策，可以看一下国家安全委员会 NSCl62/2 号文件（1953）。如同 NSC68 号文件的内容一样，对政治、意识形态、经济和军事方面的考虑是紧密相连的。不过，在后一个文件中，核焦虑更明显，经济限制也更突出。我们既可以从中看出氢弹时代已经到来，又可以看出艾森豪威尔政府坚持在国防开支方面采取适度的政策。政策制定者们的任务是，在不“严重削弱美国经济或损害我们的基本价值标准与制度”的情况下对付苏联的威胁。由于苏联政权的威力似乎没有因领导人的更换而削弱，苏联用核武器袭击美国的能力也在增长，美国必须形成“强大的军事态势，特别是通过进攻性打击力量形成大规模报复的能力”，并且要加强常规部队，提高情报收集能力，持续稳定地发展经济，另外还要谋求盟国对以上政策的支持（*FRUS*，1952－54：578，582－3）。

明确提到“大规模报复能力”这一术语，并不是这份文件与 NSC68 号文件的唯一不同之处。核技术上已有的和拟议中的发展，已经使有关威胁和对付威胁手段的看法在好几个方面发生了变化。首先，与 NSC68

号文件所持观点截然不同的是，人们这时相信，“原子弹数量的不断增大和发射手段的不断增多……可能造成一种对峙局面，导致双方都不愿意发动全面战争”。其次，“尽管苏联因害怕对方做出核反应而不敢发动局部侵略，但它日益增长的核力量却有可能降低美国用核力量阻止苏联侵略其边缘地区的威慑效果”。这就造成一个主要危险：局部冲突有可能升级为全面战争。为了避免这种情况发生，“美国总体上希望向苏联明确表明哪些行动几乎肯定会导致全面战争，但同时也认识到，当全面战争对双方都更具毁灭性时，再威胁要用全面战争对付局部侵略就没那么管用了”（*FRUS*，1952－54：581）。也就是说，大规模报复同样遵循报酬递减率，其限度由威胁的确实有效性（或无效性）而定，而威胁与挑衅是不成比例的。这份文件的第三个重要特点是它暗含（并未言明）这样一种意义，即在大规模报复威胁不适用的某些局部战争中可能会使用战术核武器（Freedman 1981：82－4）。

1950 年代的发展状况，不但没有使 NSC162/2 号文件所提出的突然袭击的威胁、战略核武器与战术核武器的关系、核对峙的可能动因等问题更清楚，反而使其更复杂了。引起这种不明确状况的主要原因是技术的不断进步，更确切地说，是对技术发展后果的担忧。1955 年到 1962 年这段时间，是政府内外都纷纷进行理论探讨的时期。唯一确定的一点是，不管各方实际可发射的核武器数量有多少，某种类似“恐怖平衡”的东西正在产生，这种情况将美国置于一种自己不熟悉的境地，使它觉得很容易遭受苏联的直接打击（Brands 1989：964）。

技术方面对新思维形成刺激的因素是，双方都可能部署热核炸弹并研制导弹。早在 1957 年苏联人造卫星发射之前，美国就在考虑技术发展可能对导弹发展产生的影响。在这方面，如同在军备竞赛的各个阶段一样，总是政策先行，所依据的是对苏联在各个不同时期可能具备的能力的推测。国家安全委员会 1957 年所承担的一项重要研究项目（盖瑟报告）就表明了这种政策性的研究显然已提前进行了。

在盖瑟小组委员会的成员看来，前景非常令人担忧。苏联的经济明显比美国的经济增长速度快。由于投资集中在重工业和武器生产

上，苏联的军费开支在十年内有可能比美国的多一倍。凭借这个优势，苏联在军事实力上取得了“可观的进步”。他们生产出的裂变物质足够制造“至少1500枚核弹头”，苏联在大力发展近程空军的同时白手起家创建了一支远程空军部队，研制了一系列近程和中程弹道导弹、潜艇载巡航导弹、现代化防空与警戒系统。更有甚者，苏联“有可能在洲际弹道导弹的研制上超过我们”（*FRUS*，1955－57：640－1）。

为了对付以上威胁，该委员会建议采取全面措施，以便加快洲际弹道导弹的生产并给这些导弹配备防攻击的基地，加速各类导弹的生产，改进战略空军司令部的战备状态，研究有限核战争的可能性，发展反弹道导弹系统，尤其是（因为该委员会最初接到的指示是研究对付核武器攻击的民防问题）要启动一项大规模建造防放射性微粒掩蔽部的计划（*FRUS*，1955－57：642－4）。这个委员会1957年4月开始进行这方面的研究，到11月初该研究成果（盖瑟报告）提交给国家安全委员会时，苏联人造卫星上天一事已人人皆知，恰好证实了该委员会最悲观的估计。

对这些耸人听闻的预测，艾森豪威尔的反应是并不以为然。艾森豪威尔本人在他的回忆录中称，该委员会对苏联力量的估计太夸大了，不可能把那份报告作为“主要行动方案”采纳。他写道，“盖瑟报告最后还是有用的，它的作用犹如一只落在政府那些沾沾自喜的人身上的牛虻；报告里还列举了许多事实、结论和意见，等于开列了一张细致详尽的调查清单”（Eisenhower 1966：221，223）。艾森豪威尔的传记作者斯蒂芬·安布罗斯说得比较直截了当。他写道，艾森豪威尔“拒绝了盖瑟报告。他拒不向压力低头，拒不启动建造防放射性微粒掩蔽部计划，拒不扩大常规部队与核部队，拒不惊慌失措。这是他最光彩照人的时刻之一”（Ambrose：1984：435）。事实并未证明该报告的判断是正确的。该委员会那些比较极端的建议——如建造防放射性微粒掩蔽部——确实被搁置起来了，但大多数建议经过修改被采纳实行了。盖瑟报告的主要起草人之一保罗·尼采在他的回忆录中说，“报告中特别重要的建议都被实施了……在以后几年里，我们改善了预警能力，使相当大一部分战略空军

的轰炸机达到了15分钟内即可进入待战状态，部署了我国第一个‘宇宙神’洲际弹道导弹中队，成功地进行了‘大力神’洲际弹道导弹的飞行试验，加快了‘民兵’导弹研制计划的实施，还将两艘‘北极星’潜艇部署到了海上”（Nitze 1989：169）。

盖瑟报告及其相关情况所产生的主要结果是，它使决策者和公众牢牢记住了技术与科学创新是军备竞赛的驱动力这一重要论断，记住了寻求并保持优势的必要性。盖瑟委员会认为，到1960年为止，美国也许还走在前面，但放眼1970年或者1970年以后时期，国家安全委员会所看到的就不是什么双方对峙状态，而是“攻防之间持续不断的竞赛。各方无一承担得起落后于对方或不如对方努力所造成的后果。技术措施和反措施的斗争将永无休止”。不过，盖瑟报告没有详细论及在何种情况下举行军备控制谈判可能会有成效。报告的确暗示，1960年前的这段时间是美国依靠实力进行谈判的大好时机，但没有就苏联人是否有可能认为在这种条件下谈判对其有益做出评估。另外，报告还使人感到，技术上呈不断上升趋势的军备竞赛表明，“不断致力于达成可靠的限制军备协议非常重要”。然而，与报告中强调的众多军事与技术的重要问题相比，这一论述似乎微不足道，不过是朝着也许理想但也许并不现实的目标礼节性地点头示意一下而已（*FRUS*，1995－57：651，652，653）。

实际上，有些人甚至包括该委员会一些人在内，逐渐开始怀疑单凭技术是否能保障安全，于是转而开始倡导以军备控制形式出现的政治解决方案。其中一位便是杰尔姆·威斯纳，此人后来担任了肯尼迪总统的科学顾问（Nitze 1989：168－9）。威斯纳的反应代表了对恐怖平衡的前景可能会有的一种反应。劳伦斯·弗里德曼所言也许不错。他认为，军备控制虽然在1970年代才成为超级大国关系的一个固定特征，但是它在1950年代末就开始对双方政策产生深刻影响，这一点明显体现在禁止核试验协定谈判中（Freedman 1981：200），这方面的情况本章稍后再叙。对恐怖平衡的另一种可能的反应是“形式战略”，这一术语涵盖的范围包括从目标政策到核冲突的理论模式方面的各种考虑。

走向平衡威慑

大约在1957年到1967年这段时期，美国战略思想的显著特征是从积极威慑向平衡威慑转变，前者与“大规模报复”相关，后者与“灵活反应”相连。尽管北大西洋公约组织1967年才将这一新思路确定下来，但它赋予常规部队更加突出的作用。

肯尼迪就任总统时，美国官方理论原则仍是对苏联军事目标和苏联与中国的城市进行大规模核报复。促成其变化的主要因素是苏联能力的上升，确切地说，是想象中的苏联能力的上升。1961年，美国在核弹头数量上以6∶1领先于苏联（3267∶500），而导弹差距远远有利于美国（Sagan 1989：27）。因此，平衡的问题不是因力量相等而引起，而是因为认识到每一方都能经受住第一次打击，然后实施报复性回击。

既然认识到有这种可能性，那么就要回答以下的问题：在何种情况下会发生战争、可能打何种战争以及各方的行为可能受何种“规则”的制约。用赫尔曼·卡恩的话说，如此一来，“思其不可思”就变得与威慑同等重要了。其实，只有各方都相信对方准备对威慑立场中隐含的威胁做出反应，才能真正达到威慑效果。大规模报复的威胁意味着会对城市发动全面打击。在不发生日本袭击珍珠港之类极其严重挑衅的情况下，这种威胁恐怕缺乏可信度（Kaufmann〔1956〕1989：174）。因此，1950年代末期，战略家们把注意力转向了有限核战争概念，所涉及武器不是战略核武器，而是战术核武器（或称战场核武器），至少在战争最初阶段是这样，战争的焦点在于打击敌方的核部队及其他部队，而不是城市。一旦承认有这种可能，必然会合乎逻辑地（假定合理的逻辑是“形式战略”的一个基本组成部分）把战争看成与政治和军事相关的过程。在这一过程中，战争接连升级会“促使”美国下定决心，在升级阶梯和每一阶段与敌方的行动相对抗，也就是说，可以在战争中继续进行威慑。正如亨利·基辛格在1957年出版的一本颇有影响的书中所言，“有限战争政策的先决条件是将政治因素重新引入我们的战争概念，摈弃战争开始政策就应终止这种观点，或摈弃战争的目标可以有别于国家政策的目标这

种观点”（Freedman 1981：102）。

这些设想在很大程度上取决于对另一方做何判断，即看对方如何理解超级大国在僵持局面中所采取的行动。有些民间分析人士提出把博弈论作为超级大国冲突的模式，认为囚徒的两难推论尤其适于说明美苏之间的关系。在这种游戏中，检察官先把两名被怀疑犯有严重罪行的嫌疑犯分别关在不同的囚室里，然后向他们指出，在他们面前摆着两种选择：坦白交代或是保持沉默。其后发生的事，弗里德曼扼要概述如下：

> 假如两人都保持缄默，检察官将以轻罪对他们提起公诉，最后判刑也会比较轻（一年）。假如两人都交代了，同样会对他们提起诉讼，但会建议低于最高年限的（五年）量刑。如果一个交代，另一个不交代，那么，交代的从宽判处（三个月），不交代的依法处以最高刑期（十年）。然后，他把两人单独留在各自的囚室中思考……最后的结果是两人都交代了。由于甲无法与乙密谋，他知道，如果自己拒不开口，将冒被囚禁十年之险；如果他交代了，他只冒被囚禁五年之险。此外，如果乙决定选择对双方好处最大的方案，故而拒不开口，那么甲交代了，就可以改善他自己的处境，尽管这样做在某种意义上是对乙的背叛。博弈论认为，乙同样会做此推断。这种推论方式通常称为极大极小策略，它可以保证你在几种最劣结果中选择最佳结果。
>
> （Freedman 1981：185－6）

当然，这种游戏的规则不利于合作，但从这个游戏看现实中的美苏关系，我们可以说，它真实地反映出了超级大国在利益上存在差异，同时也映照出它们各自的意图上均蒙有意识形态和怀疑的面纱。实际上，它们也是处于不同囚室，正是这点使它们无法采取对双方明显最为有利的合作方案，所以也就达不到削减军备与消除紧张状态的目的。

然而，从另一种意义上讲，这种游戏又与核军备竞赛大相径庭。在现实世界中，没有一个能够施罚的第三方，也没有外部强加于它的

一系列规则。这种游戏的“寓意”其实也许是这样：各方都有能力达成尽可能最好的解决方案——一种双方都同意的限制军备策略。可是，双方为什么在军备竞赛的这一阶段就达不成这种方案呢？答案肯定是：因为它们是囚徒。不过，不是某个制定规则的第三方的囚徒，而是它们自己相互猜疑对方动机的囚徒。各方都把不会用于自己的动机强加给对方，更具体地说，各方都认为自己有自制力，或者说有自我威慑能力，而对方却没有。从这个意义上讲，博弈论所采用的假设，即关于双方处理军备竞赛困境策略的合理性的假设，很不容易转变成政治现实。在现实世界中，如果没有确凿的证据表明苏联人的意图，对能否信任他们也没有切实的答案，那么还是从他们的实际能力与潜在能力来判断他们的行动比较稳妥。

肯尼迪的国防部部长罗伯特·麦克纳马拉采纳了民间战略家的某些结论，其中尤为明显的是对缺乏灵活性的大规模报复方针的批评和在战争中进行威慑的思想。另外，他还接受了“不打城市”的方案（至少在战争初期是如此），理由是实施这一方案有可能在摧毁敌方军队的同时“保留盟国社会的完整及其结构”（McNamara〔1962〕1989：206）。然而，正如格雷戈里·特里维顿所指出的那样，“麦克纳马拉本人几乎刚一采纳这种策略，便开始向后退”（Treverton 1989：193）。之所以会出现这种情况，主要原因有两个。第一，具有煽动性的不打城市（或只打击军事力量）的思想将美国与苏联的核关系放在了一触即发的基础上，因为这种思想似乎意味着要采用首先打击战略（在危机中，为了保障己方核部队的生存，哪一方都想首先打击）。第二，“没有什么证据表明，苏联准备玩‘不打城市’这场游戏”（Treverton 1989：195）。在这种情况下，加之也没有可靠的弹道导弹防御系统，麦克纳马拉转而开始赞同“确保摧毁”方针，该方针最终发展成了“双方确有把握摧毁对方”的思想。按照这种思想，“要想使威慑产生效果，就得发出能对敌方的社会和经济结构造成不可抗拒的损害的惩罚性威胁，而不是依赖在战斗中获胜”（Freedman 1981：192－3）。

战略术语变化的重要性是显而易见的。当时新出现的“确保摧毁”这一战略术语并不意味着不让打击军事力量，只是强调点发生了变化（Sagan 1989：11－13）。在这里，我们主要应当看到的是，肯尼迪政府，后来是约翰逊政府，认识到了有考虑一系列威胁的必要。这些威胁的一个极端是有限战争，另一个极端是全面核战争。前者含有分级威慑的可能，甚至在战争当中也有可能；后者牵涉双方相互实施大规模摧毁问题，这种相互彻底摧毁的威胁可能会对使用终极武器起到威慑作用。可是，按一种奇怪的逻辑，艾森豪威尔政府想象出的噩梦般的前景，即美国容易受到攻击这一点，不管它有多么脆弱，却逐渐被看作国家安全的保证。个中缘由倒不是它制止住了不断发展更加先进、更加强大攻防手段的要求，而是只有认识到美国容易受到攻击，才能积极去寻求克服这一弱点的手段。之所以这样说，是由于无法切实估计出威慑是否起作用。建立核武库无异于办健康保险，以防所有不测，小到身上出疹子，大到车祸致残。尽管越来越大的核武库增加不了安全系数——就像办健康保险保证不了健康一样——但这种方式还是能让我们增加一些安全感。

从理论上说，加强常规防御可以使北约对付苏联常规进攻时有更多可供选择的手段。事实上，北约于1952年在里斯本召开的会议上便讨论过这种方案。不过，“里斯本扩军目标”后来还是被放弃了，因为没有一个北约国家准备承担北约常规部队兵力扩大四倍后所需的费用。后来还是准备依赖部署在欧洲的战术核武器和美国的战略核武器，但这样便意味着苏联从潜艇上发动核攻击时北约别无选择，只能用核武器做出反应。只要苏联的导弹打不到美国的土地上，美国做出核反应的威胁或许确实有效。1960年代初，赞成灵活反应的呼声渐高，部分原因是疑虑的不断增长。苏联具备直接打击美国的能力后，人们怀疑美国为把欧洲从常规攻击中解救出来，是否还会准备首先使用核武器，而置自己的毁灭于不顾（Cromwell 1992：18－19）。

这实际上是一个“延伸威慑”问题，问题的根源还在于地理位置。苏联离可能的战场很近，美国则离得很远。如果说灵活反应战略

起到了什么作用的话，那就是加剧了西方安全的困境。北约若不愿意大幅度增加目前在常规武器上的开支，一旦遭到常规攻击，西方绝对不会放弃首先使用核武器的选择。实际上，北约从来也没有放弃过这种选择。在本书后面几章，我们将进一步看到这种困境的例子。目前我们必须注意的是法国解决这个问题的方式。它退出了北约军事一体化，以示自己独立于美国为欧洲设计的蓝图。退出过程虽然一直到1966年才彻底结束，但早在1959年，戴高乐即决定从北约司令部撤回法国的地中海舰队，禁止美国的核弹头部署在法国的土地上，并拒绝美国人使用法国的火箭试验场地（Werth 1965：311）。

苏联的核战略

苏联的军事战略，如同第二次世界大战后刚开始那几年苏联的许多政策一样，由于受到斯大林主义的束缚而丧失了活力。斯大林对1941年德军大举入侵苏联和后来苏联胜利地赶走德军这段历史所做的论断被纳入了苏联的军事战略。据此，二战后苏联军事战略本应突出强调突然袭击的威胁，但这样做就牵涉斯大林得承认他1941年犯的错误——当时他收到了大量有关德国进行动员的警告，可是却执意置之不理。然而，他不但不承认这是个错误，反而坚持认为：苏军在德军的进攻面前撤退是预定要采取的战略，目的是把德国人诱入圈套。苏军阻止住了德军前进的势头，后来又将德军打败了，这说明突然袭击只是决定战争胜负的一个“偶然”而“短暂”的因素。更为重要的因素则是某些“长期起作用的因素”，譬如“大后方的稳定、军队的士气、师团的数量和质量、军队的装备、军队指挥人员的组织能力等”。意识形态对于苏联获胜具有与军队的实力和素质同等重要的作用。斯大林在1946年的一次讲话中宣称，“我们的胜利意味着，我们苏联的社会制度取得了光辉的胜利，苏联的社会制度成功地通过了战火的考验，证明它有着无可争议的生命力”（Daniels 1985，Vol. 1：295）。

早在斯大林逝世前，这些思想就已经过时了。1953年，苏联已

经有了自己的核武器，在热核武器方面亦将很快获得突破，对远程火箭的研究也已经在进行之中。当时苏联虽然可能尚不具备发动核攻击的能力，但苏军的计划制订人员肯定已明确看到了突然袭击的重要性。其结果是，不管怎么说，在斯大林统治的后期，苏联军事原则与核军备竞赛的现实之间距离越拉越大，因为其军事原则仍是“常规”条件下的，过多地渗透着苏维埃制度优越的教条主义思想。正如戴维·霍洛韦所言，“武器的发展和军事原则存在于两个不同的世界；前者被快速推向前进，后者却停滞不前”（Holloway 1984：28）。

斯大林逝世后，军事领域内那些与他的名字相连的正统观念，如同其他领域的情况一样发生了变化。其中有两个因素加快了军事原则的变化过程：第一个是赫鲁晓夫对斯大林在1941年德国入侵期间领导才能的谴责，结果导致了对其遗留下来的军事原则进行全面重估；第二个是导弹的出现证明突然袭击在核战争中确实能起到决定性作用。斯大林军事思想中的另外两个主要部分——关于长期起作用的因素以及资本主义与共产主义之间不可避免地要发生战争——同样在反思后被放弃了（Freedman 1981：145－54）。关于第一部分，以往都认为，社会主义国家之所以在战争中取得胜利，仅仅因为它们是社会主义国家，这种推断很值得怀疑，所以苏联军方计划制定人员迫切想搞出一种与之不同的战略。至于战争不可避免论，赫鲁晓夫在苏共二十大上明确予以否定，不过仍承认帝国主义有挑起战争的可能性（Daniels 1985，Vol. 2：226）。

在苏联的军事原则中，意识形态仍然发挥着核心作用，不过这时已被植入威慑思想之中。该威慑思想包括两项基本原则：必须防止战争爆发；战争一旦爆发，就必须做好打核战争的准备（而且要打胜）。在苏联核战略的发展过程中，有一个因素或许占有突出的地位，那就是直到1960年代末，苏联事实上在所有核武器领域均落后于美国。苏联人造卫星发射成功带来的明显领先地位，并没有转化成军事优势，因为用于发射卫星的火箭SS－6“太原始，用于达成军事目的很不可靠”。在美国为导弹差距感到焦虑的那个时期（1957～1961），美国估计苏联在1960年年底可能部署洲际弹道导弹500枚，

到1961年年底可能达到1000枚，而美国人在1960年却只部署了30枚，1971年才部署了70枚（Newhouse 1989：122）。

事实上，据摄影情报显示，苏联在1961年拥有的洲际弹道导弹还不到50枚。据后来一份报告称，这50枚中只有4枚被实际部署了。赫鲁晓夫1950年代末关于苏联洲际弹道导弹能力的吹嘘，简言之，纯粹是虚张声势。霍洛韦写道，“苏联无法像美国一样，把自己部队的威慑能力看得那么管用，所以才试图掩饰自己容易遭受攻击这一点”（Holloway 1984：56）。在肯尼迪政府采取的最具挑衅性的行动中，与苏联领导人有关的是揭开了导弹差距的神秘面纱，将苏联人的弱点暴露在了公众面前，使赫鲁晓夫手下的将军们对他怒不可遏。艾森豪威尔没有揭露事实真相的一个原因，是想预先防止一种情况的出现，即苏联明显加快洲际弹道导弹的发展步伐，但结果这种情况还是出现了（Beschloss 1991：66，328－9，350－1）。

苏联在核能力方面的不足，对其整个军事战略的影响无疑是复杂的。不过，有一点显然需要优先考虑，那就是必须赶上美国人。另一点需要优先考虑的是拥有“进行并打赢”核战争的能力，这也是1960年赫鲁晓夫宣布的一项政策（Holloway 1984：39－40）。美国的决策者们自那时就指出，苏联军事学说强调威慑性和攻击性原则，美国只能加强自己的威慑力量予以对付。苏联的民防计划中有大规模撤离城市的规划，这似乎进一步证明苏联确实准备打核战争并精心策划打赢核战争。

然而，正如许多评论家所指出的那样，防止战争与其说是一项军事原则，不如说是一项政治原则。在苏联的军事学说中，防止战争与准备打仗同等重要，它是从资本主义与共产主义之间的战争不再是“不可避免的”这一观点中自然而然地演化出来的。另外，可以说它同样源于苏联对在二战中承受的人力与经济损失的记忆，而美国所遭受的损失却没有那么大。不管怎么说，从谨慎从事的原则出发，苏联必须准备打仗，但同时又必须积极促进和平力量的发展，倘若再能与制止帝国主义侵略这一必须具备的能力相结合，将会有力地防止战争的爆发。总之，苏联人认为自己的基本原则是防御性的。结果，苏联

关于核战略的思想分成了两种，并因此而在西方造成了不少混乱和误解。雷蒙德·加特霍夫对此做过如下论述：

> 在政治层面上，苏联军事学说一向被认为是防御性的。但是，在对战略战役和战术起支配作用的“军事技术层面上”，到目前为止（1987年）一直都是进攻性的（多数大国的军事原则恰恰也是如此）。假如战争来临，在防御性政策（用苏联人的话说，军事学说的政治层面）和进行战争的进攻性战略之间没有必然的矛盾。
>
> （Garthoff 1990：40；Holloway 1984：32－3）

对苏联来说，或许可以加上“没有必然的矛盾”，但从美军计划制订人员的角度去看，还是深深地潜藏着矛盾的。我们面对的是一个相互如何解读对方威慑态势的问题。这一问题又因俄语中有两个词都可以用来翻译英语中的“deterrence”（威慑）一词而更为复杂化了。在这两个词中，一个是“сдержать”，一般用于描述苏联的政策，意为“克制”“抑制”“遏制”“威慑”，基本上带有防御性质；另一个是“угрозить”，这个词一般用于描述美国的威慑概念，内中具有威胁、强制、强迫的含义。有此差别，正如加特霍夫所指出的，自然是为了对自己有利。但他认为，“同时也反映并体现出了一种虽则不同但却真实的‘苏联看法’”（Garthoff 1990：24－5）。

然而，人们可能会问，看法上有误解确实存在，但是否足以解释美苏威慑原则之间的差异呢？双方肯定都认为自己的基本原则是防御性的，但考虑到核威慑中攻防间的界线非常微妙，双方也都在为威慑可能不起作用的情况制订计划。但这并不是说，苏联和美国的战略是相互的映照。恰恰相反，理解上的差距反映出了防御需求和防御能力上的真正差别。加特霍夫注意到，“矛盾的是，苏联人唯一声称占据优势并炫耀自己的核武器以便造成政治压力的时期，恰恰是1950年代末与1960年代初它处于相对最弱的时期”（Garthoff 1990：19）。

这是自相矛盾，还是一个国家发现自己在生死竞争中处境极为不利时通常会采取的姿态呢？况且，苏联人造卫星发射成功与古巴导弹危机之间这段时间，难道不正是形成双方进行核军备竞赛，尤其是导弹竞赛基本动机的时期吗？

这不是一个非此即彼地解释苏联战略的问题——要么是进攻性威慑，要么是防御性威慑；说苏联的战略表面上看是一套，“实际上”是另一套，其实是防御性的，这同样于事无补。我们面对的是一种攻防结合的威慑，而且还有点变化无常。更广义地说，是一种冒险主义与小心谨慎的混合体。冒险主义代表着最高目标，它因感到有必要冒险与美国的优势抗衡而生。赫鲁晓夫在洲际弹道导弹问题上虚张声势，在古巴部署导弹，都是冒险主义的表现。苏联的小心谨慎表现在两个方面：一是走到危机的边缘就后退，例如在柏林和古巴；二是坚持说防止战争是苏联国防政策的指导原则，赫鲁晓夫在许多场合就是这样说的。

地缘政治在美国的战略中起作用，在苏联的战略中同样起作用。苏联从西方“延伸威慑”的困境中确实捞到了一定好处。它不但在常规部队上占有优势，而且还具备打击美国在欧洲基地的能力。有了这两点，它就可以把西欧当“人质”，让美国乖乖地听话了（Freedman 1981：266）。然而，如果说这给了苏联一定优势的话，它本身容易受到攻击这一点，却使它不敢对全面战争与有限战争之间、常规战争与核战争之间过于微妙的差别掉以轻心。为了达到政治目的，苏联或许还能钻西方防御政策含混之处的空子，但是在军事上，它却只能靠总体军事实力——常规力量与核力量——去阻止西方的进攻。苏联人从来不像美国那样，把战争阶段明显的升级（连同随之而生的战争中的威慑和讨价还价概念）看成北约与华约之间战争的一种假设，其原因是主要的、直接的威胁一直都是对着苏联领土本身的。出于同样原因，苏联人一直拒绝相信有限战争可能会在主要大国之间爆发。赫鲁晓夫在他的回忆录中称，“对于那些声称核武器的发展可以阻止战争爆发的人们，我要说，核武器的发展阻止的是有限战争的爆发——也就是说，它阻止的是用常规武器所打的战争”

（Khrushchev 1974：528）。

上述讨论的意义在于，美苏战略原则的主要分歧并非主要是由理解上的差异造成的，尽管这种差异真实地存在。这些军事原则所要应对的实际情况和组织结构情况，才是分歧的主要原因。对相互的立场做多少澄清，都消除不了因各自的安全需求不同而造成的根本利益分歧。军备控制谈判和危机处理之所以如此棘手，原因也正在于此。

裁军还是控制军备？

如第三章所述，国际上 1946 年即试图对原子能实行控制，结果毫无建树。苏联人 1949 年有了原子弹一事，促使美国搞应急计划，着手研制"超级"炸弹，即热核炸弹。苏联人也做出了针锋相对的反应。结果，导致了又一轮的军控努力，双方重提制止军备竞赛，甚至完全终止军备竞赛的建议。1950 年代，核僵持处于很不稳定的状态。这种状态的特点表现为：各国一方面争相通过生产核武器和改进战略原则来获得最大程度的安全，另一方面又提出或做出后来看来过于乐观的裁军建议和重大和解姿态。这种不同欲望同时并存的现象，不仅表明超级大国领导人好战或者是天真，更主要的是表明他们实质上还缺乏谈判文化，游戏规则还没有建立起来。

这一阶段结束时，某些规则已经牢固地被确立，最明显的就是 1963 年的《部分禁止核试验条约》，但它对军备竞赛本身的影响甚微。说来也巧，最重要的"规则"可能就是默契，而不是明确的协议，各方都明白要克制，以免发生有可能将他们带到战争边缘的行动。这也许是古巴导弹危机结出的主要果实吧。同样重要的是，各方逐渐认识到，卫星侦察有可能起到稳定作用，而不是破坏稳定的作用，因为它可以提供一种非官方手段，用以确定相互的军事能力，后来又用在了核查是否遵守军备控制条约上。这一点也应归功于导弹危机后气氛的变化（Gaddis 1987：203－6）。不过，这些谅解得来非易。在《部分禁止核试验条约》达成前的十年，和平攻势与赤裸裸的威胁此起彼伏，不断更迭。

艾森豪威尔走马上任后，决心找出节制军备竞赛的办法。他运用 J.罗伯特·奥本海默的一些思想，打算在联合国大会上发表一个重要讲话。奥本海默是曼哈顿工程的前负责人、原子能委员会总顾问委员会的主席。艾森豪威尔的讲话，包括了奥本海默对军备竞赛“迫在眉睫的可怕危险”的忧虑，并采纳了他这一看法：要想让军备竞赛充分为人们所理解，要想让公众支持为结束军备竞赛所采取的措施，“开诚布公”地对待美国公众十分重要（Dppenheimer 1953：529，530－2）。艾森豪威尔让他的顾问班子筹划一项“开诚布公行动”，结果就有了 1953 年 12 月 8 日他在联合国大会上发表的那篇“和平利用原子能”的讲话。

在讲话的第一部分，艾森豪威尔列举了核军备竞赛方面一些无法回避的事实，起码讲到了这种程度：美国核武库的破坏能力超过了二战期间所投炸弹总和的许多倍。他没有按奥本海默和其他顾问的建议那样透露美国储量的具体数字。他强调指出苏联也在寻求类似的核能力，接着介绍了将核力量从军用转为民用的方法：由两个超级大国将可裂变物质捐给一个国际原子能机构——开始阶段量少一些，然后由一批来自多个国家的科学家找出将这种物质用于电力生产、医药、农业以及其他诸多领域的方法。这是一种化核刀剑为耕犁的绝妙计划。正如艾森豪威尔所言，它可以避免“在世界范围内建立一套完全被认可的核查与控制系统难免会引起的不愉快和疑虑”。考虑到美国所处的领先地位，艾森豪威尔生怕苏联会因为自己处于劣势而担忧，因此他提议，苏联每贡献一个单位的裂变物质，美国便贡献五个（Ambrose 1984：147－9）。

这篇讲话如同第六章述及的“开放天空”建议的命运一样，在听众中引起了极其强烈的反响，却遭到了苏联的断然拒绝。国际原子能机构倒是成立了，但那是 1957 年的事，那时的军备竞赛又向前发展了。斯蒂芬·安布罗斯曾说，“共产党人宁愿让他们的疑心战胜他们的判断力”（Ambrose 1984：149）。此言也许不错，但当时的确很难说是相互理解的时代。可是，要想使这样一个意义深刻的建议获得成功，又非得相互理解才行。关于艾森豪威尔将在联合国就裁军问题发表重要讲话一事，苏联领导人事先也得到了通知，但是艾森豪威尔

的核力量军转民计划还是让他们像美国公众一样大吃了一惊，即便我们知道艾森豪威尔是把这个计划作为通往合作的漫漫长路上一个适度的开始来构思的，其细节也不太重要，重要的是它表明的意向。正如这位总统本人后来所言，“在当时的情况下，这个建议是革命性的”（Eisenhower 1963：254）。艾森豪威尔本人后来再也没提供有关的后续情况。他似乎相信，这篇讲话一经发表，他手下的官员自会拿去落实。最后一点，从苏联人的角度看也许最重要的一点是，该建议未包含制止核武器生产或限制核武器使用的内容（Bundy 1988：293－5）。

查一下 1953 年到 1963 年双方公开或隐晦地发出的核威胁记录，便可对这份建议及其他一些裁军建议略知一二。这类威胁通常隐含在这样的词句里，如“我们将使用一切必要的手段”，或者是“我们定能给予迎头痛击”，但言外之意却很清楚——对方应该认识到，在极端的情况下，会考虑使用任何武器。艾森豪威尔政府就至少四次使用过核“强制”字眼。值得注意的是，这种情况每次都是因与苏联没有直接关系的局部冲突而引起的，而且这些局部冲突没有一次能绝对清楚地表明，是核威胁而不是某些其他因素有效地促成了想要得到的结果，但美国政府却似乎相信是核威胁发挥了作用。有四次使用这种核“强制”的说法都与远东地区有关：1953 年朝鲜战争的结束，1954 年关于越南的日内瓦协议，以及 1954～1955 年和 1958 年就中国两个近海岛屿金门、马祖发生的两次危机（在后两次危机中，共产党中国想夺回国民党占领的两个岛屿）。在这几次事件中，主要目标都是共产党中国（当时还不是核大国），不过至少有一次，即在 1958 年的第二次金门、马祖危机时，赫鲁晓夫也用自己的核威胁回敬过美国。

1961 年夏天柏林发生危机时，苏联施加的核压力要认真得多。在紧张局势达到高峰时，赫鲁晓夫宣布：“我们将（与东德）签订和平条约，任何侵略者如果敢动苏联或我们朋友的一根指头，我们将命令我们的武装部队予以痛击。”他强调指出，这种冲突很容易导致核战争（Bundy 1988：365）。美国人亦曾炫耀过核武力，有人就柏林危

机问美国是否正在考虑使用核武器时，麦克纳马拉回答说，“是的……每当我们感到有必要保护我们的重要利益时，我们就会使用核武器。我们的核武器储量是苏联的好几倍”（Newhouse 1989：157）。

总的来说，核威胁似乎都是用来给其他施加压力的方式助威的。美国深知，东西方关系若没有达到彻底崩溃的地步，盟国一定会反对实际使用核武器，这是一个重要的限制因素。概括地说，各方发出核威胁时，都保证说它不会首先挑起核战争。核外交艺术，如果可以把它看作一种审慎的战略的话，意味着为对方留有余地，允许对方从容易遭受抨击的立场上退回去，而又不在世人眼里威风扫地。

我们观察有关禁止核试验的谈判，不能脱离威胁与反威胁的背景。那些复杂且常常伴有唇枪舌剑的谈判会议虽然开了五年（1957～1963），但促使人们关注放射性微粒沉降后果的事件却可追溯到1954年。那是美国在比基尼岛进行了“布拉沃”氢弹试验之后没几天的事。有报道称，一条日本渔船上的船员出现了辐射病的典型症状，六个月后，其中一人死亡。这一事件在世界范围内引起了公众的注意，引发了对整个裁军，尤其是对核试验的激烈争论。政府本想努力消除公众的恐惧，结果反而使之有增无减，原因是美国原子能委员会主席刘易斯·施特劳斯在一次记者招待会上回答问题时透露，一颗氢弹便可以将纽约这么大的城市彻底摧毁（Divine 1978：6－9，13）。突然把情况暴露给根本没有心理准备的公众，这完全不是J. 罗伯特·奥本海默主张在核武器问题上需要“开诚布公”的本意，但不管怎么说，却保证了核武器以及放射性微粒沉降问题在以后的几年中再也没有远离过报纸的头条。1950年代和1960年代初的禁止氢弹运动即因之而起，而且后来愈演愈烈，声势大得与禁止核试验谈判本身不相上下。不过，《部分禁止核试验条约》一经签署，这些运动便明显丧失了动力。

整个禁止核试验的谈判枝节繁多，这里不便一一述说，但考虑以下三点因素，有助于我们理清脉络。第一点，最初探讨禁止核试验问题是与核裁军连为一体考虑的。实际上，1958年4月之前，美国一直坚持这样的立场：必须先承担核裁军义务，然后才能签订禁止核试

验条约，这一政策反映了美国军方对停止核试验并不心甘情愿的心态。在这方面，他们得到了刘易斯·施特劳斯的支持。相比之下，苏联一直都是把禁止核试验本身看作一种目的。美国的立场在1958年发生转变是几个因素结合在一起促成的：一是1957年美国和苏联均进行了一连串氢弹试验后，公众对放射性微粒沉降的忧虑有所增加；二是苏联1958年3月暂停大气层试验之举，让美国成了众矢之的，人们指责它对核危险不如苏联有认识；三是艾森豪威尔的科学顾问班子走马换将。新班子称为总统科学顾问委员会，由詹姆斯·基利安负责，配备的人员都是支持军备控制的科学家。新班子成立伊始，艾森豪威尔就摆脱了对刘易斯·施特劳斯和爱德华·泰勒等热衷于氢弹人士的依赖（Divine 1978：211－12），因此才有了将禁止核试验谈判与全面核裁军分离开来这一转变。这样，达成禁止核试验条约的可能性就加大了，当然也付出了代价，那就是核武器生产未得到有效的核查。

有关禁止核试验谈判需要考虑的第二点重要因素是由前一点直接派生出来的。在军备竞赛处于高度变化时期，如果结束核试验会使自己处于不利地位，没有哪个国家会乐意这样做，包括忙于搞自己的氢弹试验的英国和法国。于是，参加谈判的各方展开了一场明争暗斗。为了在政治上和道德上占上风，有的还采用了手段高明的暂停核试验这一方法，不过前提是对自己的核武器发展影响最小。“当一方完成了一个系列的核试验时”，约翰·纽豪斯写道，“它停止核试验的意愿就冒出来了，而它的对手肯定会拒绝这种企图，直到它的对手也完成了自己预定要进行的一轮核试验为止”（Newhouse 1989：139－40）。

在这项政治交易中，探测技术也发挥着一定的作用。如果没有侵入性检查手段，地下核试验在达到一定程度前是发现不了的。这一点一经明确，全面禁止核试验的努力就因苏联抵制美国的检查提议而陷入了困境。1960年春，正当双方似乎都愿意就禁止所有大气层试验以及除最小型试验之外的所有地下核试验达成协议时，U－2间谍飞机事件发生了，将已经建立起来的希望击得粉碎（Divine 1978：31－41）。直到发生了古巴导弹危机，这才把苏联和美国领导人的心思重又

集中过来，于1963年最终签订了条约。然而，该条约仅限于大气层试验，这说明技术上的竞争仍然存在，相互信任的程度依然十分有限。

古巴导弹危机，显然是关于禁止核试验问题需要考虑的第三个重要因素。从两者之间的联系可以看出，禁止核试验谈判在多大程度上可以成为超级大国以及它们与各自盟国之间更广泛的关系的晴雨表。从某种意义上说，《部分禁止核试验条约》是“和解精神”的一个不大不小的胜利，正如一位评论家所言，它提供了“一种重要的学习经历，使我们有信心在其他领域取得进展”，同时它也是“继后在1960年代初达成一系列军备控制协议必不可少的促成因素”（White 1987：104）。然而，当我们拿其最后结果与早期的核裁军愿望对照时，就会发现这个条约远非那么令人振奋。条约之所以能达成，只是因为注意的面逐渐在缩小；其次，在很大程度上是因为导弹危机使华盛顿和莫斯科认识到，光是例行公事式地展示一下它们之间的差异，防止不了核危险。不错，这个条约是确立了在特定范围内实行缓和的原则，但它也使缓和所涉及的更广泛领域——军备竞赛获得了合法地位。

正是由于出现了上述这种情况，不少反对裁军的人后来赞成军备控制。这些人总是动摇裁军的基础，把裁军降到一种类似幻想的水平。这一点过去是，现在仍然是军备控制协议的显著特征之一。人们甚至怀疑，军备控制协议反而会对军备竞赛起到促进作用，因为一旦具体规定了什么事不许做，其他一切就会被视为可以做了。这样看无疑有些过分，因为任何一份军备协议都会使人承担义务，这些义务无形中会对行为有所约束，当然，1963年以后，双方的武器堆得比以往任何时候都高，但在后来的岁月里，核武器在1950年代和1960年代初那种傲然不可一世的神气，即便有机会展示，也是少之又少了。

最后要说明的是，如果说禁止核试验谈判是超级大国关系的晴雨表，《部分禁止核试验条约》即增强了美苏双边关系在军备谈判中越来越明显的支配地位。禁止核武器谈判是在联合国主持下开始的，主要在日内瓦举行。麦克米伦政府不再怀疑禁止核试验有可能对英国自行搞的核威慑造成影响后，英国便开始在谈判中发挥举足轻重的调停

作用。具有讽刺意味的是，麦克米伦对打破谈判僵局做出的最重要贡献——他 1963 年 3 月建议美苏两家直接在莫斯科而不必在日内瓦谈判——也许对谈判中超级大国双边格局的形成起到了推波助澜的作用。自此之后，除了 1968 年那份多国条约性质的防止核武器扩散条约外，核军备谈判都是在美苏双边基础上进行的（Sanders 1990：192－3）。

此外，在禁止核试验谈判阶段，各个集团内部也发生了重大变化。自 1950 年代末以来，苏联不愿意给中国提供核武器这一点，就一直是中苏两国之间的主要争论点，《部分禁止核试验条约》的订立则进一步加剧和加深了它们之间的分裂（Crankshaw 1966：116）。已经坚定地开始搞自己核计划的中国人，只能把这份条约看成超级大国的一项阴谋，其目的是阻止其他大国获得自己的核威慑力量。中国人 1960 年就申明，他们是不会被“有关裁军的国际协议”所束缚的（Newhouse 1989：195）。1966 年，中国进行了它的第一次核试验。

法国也是从类似角度看待这一条约的。如果法国签了这份条约，将严重损害法国的核计划。另外，1956 年苏伊士危机给法国留下的创伤也尚未愈合。正因为如此，法国首先要发展自己的核威慑力量，然后才能开始踏上独立于美国的进程。再者，戴高乐对 1962 年所谓的“拿骚协议”怒不可遏。在这份协议中，美国同意将“北极星”潜艇上发射的导弹系统卖给英国。法国虽然也得到了这种允诺，但给法国的条件不如给英国的优厚，这恰巧印证了戴高乐认为英国已经成为美国“卫星国”的看法。戴高乐对“独立的狂热”在他做出的一系列决定中均有所体现，例如拒绝签署《部分禁止核试验条约》、阻止英国进入共同市场、承认红色中国，以及退出北约军事一体化等（Werth 1965：327，Gh. 10）。

与此同时，英国则在苏伊士危机后重新巩固了自己与美国的关系，而且速度惊人，这主要得力于麦克米伦。英国虽然不像戴高乐说的那样屈从于美国的利益，但它仍十分依赖大西洋两岸的关系，甚至在 1964 年选出了一届工党政府之后依然如此。直到英国有意脱离开美国的越南政策之后，这种“特殊关系”才逐渐冷下来。不过，《部分禁止核试验条约》的签订仍可谓一条重要的分界线。1963 年以后，再

找到像艾登1954年在日内瓦或麦克米伦在部分禁止核试验谈判期间那类英国政治家能在美苏关系中发挥作用的例子，恐怕就相当难了。奇怪的是，随着世界向多极转化以及集团内部的日益松动，超级大国的双边关系反倒更为重要，也更具排他性，至少在核武器问题上是这样。

古巴导弹危机

古巴导弹危机体现了之前十年军备竞赛发展的所有特征：它的竞争性、核僵持状态所固有的不确定性、担心“边缘”地区的冲突可能引发中心地区的战争、领导人的重要作用以及影响决策的国内因素的重要性等。但是，这场危机也以极其严酷的方式将紧张状态具体化了，惹得分析家们频频回头去从中寻找超级大国关系中核危险的蛛丝马迹，尤其是超级大国领导人在危机时刻的行为线索。这里只能简略地论述一下有关争论。为了便于导入主要问题，我们先大致看一看1962年10月的形势。

1962年10月，古巴革命已近四载。菲德尔·卡斯特罗在战胜巴蒂斯塔独裁统治后不到一年的时间里，就完全理清了他与共产主义的关系，巩固了他在国内的统治地位。在古巴没收了美国在古巴的财产以及美国对古巴实行贸易禁运之后，古巴与美国之间的相互敌视很快就发展到了不可调和的地步。1959年以前，古巴的经济几乎完全依靠与美国的贸易，但革命后三年内古巴便有效地融入了苏联集团。1962年年初，苏联和东欧已占古巴贸易总量的80%。苏联的武器守卫着古巴的土地，美国人大概不用提醒也知道，那里离佛罗里达海岸只有90海里。

当然，古巴导弹危机也是由苏联的武器引起的。1962年夏天，大量苏联军事装备和人员到达古巴，促使美国戈德华特参议员等人发出了立即入侵古巴的呼吁。肯尼迪没有贸然行动——因为当时美国尚未拿到苏联运入古巴的武器中有“攻击性”导弹的证据。10月17日，肯尼迪还得到赫鲁晓夫关于宣称他无意在古巴部署攻击性导弹的

保证。这个日期很重要。因为此前一天，美国的摄影情报证实古巴确有中程和中远程弹道导弹发射场。肯尼迪迅速行动起来，成立了一个危机处理小组，正式名称为“执行委员会”（或称“国家安全委员会执行委员会”）。该执行委员会几乎不停地开会，直至危机解决为止。

有关此次危机的具体事实执行委员会很快就弄清楚了。执行委员会确定以让对方撤走导弹为目标，大体上也没什么异议。关于古巴境内导弹的部署，执行委员会认为是对美国安全的挑衅性和侵略性威胁，是一种单方面改变军事和政治现状的行为，这种行为是不可接受的。于是，执行委员会立即确定了两个可能的处理方案——空袭和封锁（更准确的字眼是“隔离”，因为从用语来讲，封锁可被视为战争行为）。到了10月20日，星期六，肯尼迪断然决定实行“隔离”。“隔离”的决定是22日星期一晚上公开宣布的，五天后便产生了预期的效果：苏联向古巴运送导弹的势头被制止住了。好几艘开往古巴的苏联船只，包括一艘载有核弹头的船，都掉头返回了苏联港口。然而，“隔离”只是一个潜在的引爆点，此外还有其他的引爆点。古巴境内导弹发射场上的作业仍在继续，而且很可能不久便可以投入作战使用了。谁也不敢断定，核弹头没有被运进古巴，美国准备了入侵古巴的计划，世界各地的美军基地也进入了高度戒备状态。估计美国一对古巴采取行动，苏联便有可能做出反应，地点最有可能是柏林。

危机解决时的紧张程度并不亚于实施封锁行动。10月26日，星期五晚上，赫鲁晓夫向美国发了一封信，内中隐约含有美国可以接受的解决方案——从古巴撤走苏联的进攻性武器，作为交换条件，美国要解除“隔离”，并保证不会入侵古巴。然而，正当执行委员会考虑该如何作答时，克里姆林宫的第二封信已到达美国。这封信显然不如第一封信口气和缓，而且加大了赌注，要求撤走美国最近在土耳其部署的“丘比特”和“雷神”导弹，以补偿苏联从古巴撤走导弹的损失。10月27日，星期六晚上，执行委员会商议之时，紧张状态达到了顶点。接着传来的消息更是火上浇油：一架U－2间谍飞机在古巴上空被击落，飞行员身亡。经过苦苦思索，最后执行委员会拿出的方

案是这样：只当第二封信没收到，对第一封信给予肯定的回答，同时要发出强烈警告，苏联若一意孤行，必须对引起的后果负责。这一招果然奏效。星期日上午，赫鲁晓夫表示同意以他第一封信中阐述的条件为基础。美方则通知苏联，在土耳其的导弹会撤走，不过这一点不算在两国政府的正式协议内。协议的执行虽然花了好几个月的时间，但是到10月28日早晨，眼前的危机总算解除了。

这场危机犹如磁石一般，吸引了不少国际关系理论家和历史学家的注意。理论家中有一位叫格雷厄姆·阿利森，他是把导弹危机作为决策过程来研究的。当然，他对阐明此次危机的事实也很感兴趣。最近有关这方面的研究虽然浩如烟海，但阿利森的研究仍不失为了解此次事态发展的重要起点。不过，他的主要目的还是理论探讨。近年来，在苏联实行“公开性”的氛围下，美苏关于这次危机的联合研究小组有不少发现，使得大家对此次事态发展真相的了解有了突飞猛进的进展。我们似乎可以带着这种新的了解，回过头来考虑一下阿利森所提出的问题。

阿利森的问题实质上是这样的：在具体政策（例如苏联在古巴部署导弹）与其后果之间的关系问题上，这次危机给了我们什么启示？在解释有关外交政策的倡议的起源和结果方面，哪些解释模式最有可能使我们得到最恰当的结果？阿利森详尽阐述了三种概念性方案，第一种是大多数分析家和外行人用的“常识法”。他把这种方法称为“理智行动者模式”（即模式Ⅰ）。使用这一模式者“试图把外交事务中发生的事视为统一的国家政府为达成一定的目的所采取的行动”（Allison 1971：4－5）。

模式Ⅱ和模式Ⅲ以不同方式否定了把单一决策体作为解释事态的着眼点，认为分析者必须重视“产生政府行为的国家内部机制”。模式Ⅱ被称为“组织决策过程模式”，它把注意力集中在“按正常行为模式发挥作用的重要组织机构的做法”上，用以代替模式Ⅰ中对有目的的行动和选择的推断。它要回答的问题是“这一决定是在何种组织背景和压力下做出的”（Allison 1971：6）。模式Ⅲ被称为“官僚决策模式”，它与模式Ⅱ有着紧密的联系，因为它也比较强调政府内部

决策的运作过程，但不是从决策的选择或做法的角度解释事态的发展，而是把它看成“国家政府成员玩弄各种讨价还价把戏的结果”。因此，采用模式Ⅲ的分析家把政治而不是组织决策过程作为解释事态的主要着眼点（Allison 1971：6－7）。

阿利森知道，检验解释方案的优劣，主要是看它解释现实的程度强不强。他提出的问题很多，我们在此只能看一个问题，即苏联为什么要在古巴部署导弹。即便仅限于这一个方面，阿利森的记述也十分翔实，我们只能粗略地一观。就模式Ⅰ而言，在研究苏联为何决定在古巴部署导弹的原因时，阿利森选定了这种观点：这样做是想纠正超级大国之间导弹能力不平衡的状况。更具体地说，是为了增强苏联用导弹打击美国国土的能力（这样做便可以弥补苏联在洲际弹道导弹方面的相对弱势）。他写道，这种假设“可以让我们把这次古巴冒险理解为苏联又一次在使用它前五年一直奉行的策略：旨在纠正战略逆平衡的虚张声势与欺骗策略”（Allison 1971：55）。可是，还有好几个问题用模式Ⅰ解释不清。导弹部署的方法和时机与有目的、有计划的策略假设不符。阿利森列出的未解问题还包括：其一，地对空导弹为什么是在中程弹道导弹发射场完工之后，而不是之前部署的，这一点与人们一般的预计相反；其二，为什么苏联人既没有试图给导弹发射场加盖伪装，也显然没有把美国U－2飞机的飞行考虑在内；其三，肯尼迪就苏联在古巴部署攻击性导弹将造成的后果一再发出警告，为什么苏联人都置若罔闻（Allison 1971：55－6）。

模式Ⅱ能解释清楚哪些模式Ⅰ解决不了的问题呢？阿利森写道：“如果你从旁观者的角度观察一下苏联各个组织的做法，这个看似矛盾重重的谜题中的许多东西就不那么令人费解了。”就苏联的标准作业程序而言，在整个决策过程中，最注重的是保密，尤其是对核政策的保密。明白了这一点，某些异常现象就迎刃而解了：“各个部门都‘各做各知道怎么做的事’。由于对其他部门的活动缺乏了解，无法看到整个行动的全貌，这种现象因之更甚。”装运、卸货和往导弹发射场地运输，这些都是在军事情报部门和克格勃的监督下完成的，但武器一运到发射场，就被

战略火箭部队接管过去了。这些人以前从来没有在苏联境外安装过导弹，于是就选择了自己熟悉的作业方式（也是美国情报部门熟悉的方式）。因为在苏联境内从来没加过伪装，他们也没觉得在此有这种必要。此外，加伪装需要时间，还得冒不能按期完工的风险。地对空导弹则归属另外一个司令部——防空司令部。该司令部也是按自己熟悉的模式进行，与中程和中远程导弹的安装没有关系（Allison 1971：109－11）。简言之，无论这个决定在赫鲁晓夫本人心目中多么一清二楚，在执行政策的过程中却很容易碰到各种压力，给最后的结果造成相当的影响。

模式Ⅲ怎么样呢？阿利森承认，由于对苏联的决策过程知之甚少，对部署导弹这一决定的国内政治背景进行的估计主要是凭猜测。根据模式Ⅲ的方式，阿利森首先指出，1962 年夏季苏联人在古巴积聚武器时，美国公众的反映很不明确，足以令人产生怀疑，不知美国对苏联的警告是否认真。踏入这一模糊领域的苏联领导人各式各样，动机迥异，他们很可能会赞成一种不是为单一目的而是为多个目的服务的政策。从模式Ⅲ的角度去看，阿利森写道，“该决定似乎并非出自什么重大的全面性计划——例如，苏联政府（或赫鲁晓夫）并没有慎重地好好思考一下到底该从哪里试探美国，而是出自这样一种过程：把若干不同的人对各不相关的问题截然不同的理解像滚雪球一样滚在一起，形成一个解决方案”（Allison 1971：237）。这些人中有党的领导人、军队领导人和经济计划的制订者。党的领导人两年来一直在呼吁给予古巴具体的安全保证，军队领导人急于消除导弹差距，经济计划制订者感兴趣的则是在哪里部署导弹可以比较划算地满足苏联的战略需要（Allison 1971：238－44）。

这三种研究方法的差别，并不在于它们对相同的问题给出不同的答案，而在于它们提出的问题有所不同。例如，模式Ⅰ问的是“为什么要在古巴部署导弹?”回答是，“赫鲁晓夫”或“莫斯科”或“克里姆林宫”经过深思熟虑认为这是一种纠正战略上不平衡状况的有效手段。模式Ⅱ和模式Ⅲ转换角度，分别问的是“是何程序导致苏联做出了部署导弹的决定?”“这一决定符合谁的利益?”正如阿利森

所指出的那样，毫无疑问，“最优秀的对外政策分析家都是从这三个概念模式中各取一部分用到自己的解释中去”。但是，这三个模式的含义虽然在某些方面是相互补充的，在另外一些方面则可能是互不相容的（Allison 1971：258－9）。从广义上说，阿利森的目的其实在于对模式Ⅰ足以解答任何问题这一常见的假设提出质疑。模式Ⅰ最适于用来分析长期政策的趋势（Allison 1971：257－8）。若做这种分析，运用理性的判断可谓一种有效而简略的方法。然而，在分析事态发展的具体细节时，用模式Ⅱ和模式Ⅲ则能取得显著效果，因为这两个模式更为注意事态发展过程的组织背景。最能明显体现出各个模式之间差别的，或许是用这三个模式去估计该从古巴导弹危机中汲取什么教训的问题。通过模式Ⅰ得到的教训是，核危机是“可以控制的”；领袖人物可以考虑各种可供选择的方案，并制定出令人满意的有限对策。通过模式Ⅱ和模式Ⅲ所汲取的教训是，“像美国与苏联政府这么大的组织机构之间发生核危机是非常危险的”，这就使得危机管理过程变得“扑朔迷离，险象环生”（Allison 1971：259－60）。

业已发表的许多有关导弹危机的新资料都趋于表明，尽管模式Ⅱ和模式Ⅲ无法取代模式Ⅰ，但阿利森对这两者在理解事态发展方面具有重要意义的评价确有道理。正如人们所预料的那样，关于美国政策虽然也有一些重要的新发现，但最重要的新发现还是在苏联决策方面。由于证据仍处于逐步浮出阶段，不少证据错综复杂，相互矛盾，要想理出个头绪来，起码需要几年的时间。不过，现有的证据足以表明，双方的决策均是在信息不足、主观猜测或错误地理解对方的行动和动机基础上做出的。

第一，从1987年以来的一系列会议（由双方参与解决危机者出席）记录来看，有一点似乎很清楚，苏联在古巴部署导弹的动机混杂不一。甚至到现在，到底主要是为了保护古巴（赫鲁晓夫在他的回忆录中是这样说的［1971：491］），还是为了纠正战略上的不平衡状态，在苏联人中还存在分歧（Blight and Welch 1990：238－43；Lebow 1988：15－16）。另外，如今的研究十分偏重苏联保护古巴的目的问题，对美

国企图破坏古巴稳定的研究也在加强。就连罗伯特·麦克纳马拉都是一方面声称肯尼迪政府没有入侵古巴的意图，一方面又不得不承认，“如果我是古巴人，看了美国对他们国家政府所采取的秘密行动的证据，也会立即相信美国是打算发动入侵的”（Blight and Welch 1990：329－30）。一位同持此见的历史学家所言更明。在分析了美国在“骚扰、孤立和破坏哈瓦那激进政府”方面的所作所为后，他认为，如果美国不搞这些行动，“就不会有古巴导弹危机”。他断言“危机的起因，主要在于一系列镇压古巴革命的活动”（Paterson 1990：256）。因此，一场始于从苏联政策中寻找危机根源的争论，就这样转为从美国政策中找到根源而告终了。后来的一份分析材料认为，“新出现的证据表明，莫斯科和哈瓦那有理由怀疑华盛顿企图入侵古巴，尽管不能证实是否实际做出过下令入侵的决定”（Hershbery 1992：238）。不过，这一论点至少把我们的注意力转到这一危机中的古巴因素上了，这一点我们还要谈及。

第二，在对谢尔盖·米高扬（危机发生时任苏联部长会议副主席的阿纳斯塔斯·米高扬之子）的一次采访中，证实了阿利森对导弹安装方法和时机以及为何不加伪装的假定。米高扬说，“技术人员是军人，他们只知道奉令行事。在国内建这类发射场，对他们来说已习以为常。到了古巴，他们干起来就跟在苏联一样”（Greiner：1990：214）。由于模式Ⅱ比较注重苏联这种无视条件变化的标准作业程序，所以在这里产生了积极的效果。

第三，苏军1962年在古巴部署的兵力，远比美国情报部门掌握的要多。危机期间的最高估计数是1.2万～1.6万人，1963年的事后估计数上升到了2.2万人。事实上，到1962年10月，苏联部署在古巴的兵力达4.2万人（Garthoff 1988：67）。如果美国政府当时知道真实的数目，那么兵力问题“肯定会把局势搅得更紧张”（Garthoff 1989：121）。

第四，关于美国U－2飞机被击落事件又被揭示出许多新的资料。有一种说法（其证据的可靠性还不太令人信服）认为，将手指按在地对空导弹发射器上的是古巴，而不是苏联。据说，地对空导弹发射场被古巴的军队强行占领了，这意味着卡斯特罗决心压苏联人对

美国人做出尽可能强烈的反应。他的这种决心在危机中是一种重要而危险的因素。这种看法被其他一些学者根据苏联官员的说法坚决地否定了。那些苏联官员证实，击落 U－2 飞机的命令是当地苏军指挥官下达的（Trachtenberg 1990：244－5）。在莫斯科的决策中心对苏军地面指挥官明显失控这一重要情况的问题上，同样存在着意见分歧。有些学者提出，既然美国人估计命令来自莫斯科，因此表明这项命令是“赫鲁晓夫蓄意进行挑衅和升级”，那么，它便是危机中最令人激愤的事件。不过也存在着一种对证据的不同解释。这种解释认为，美国执行委员会也没有明确说明击落 U－2 飞机的命令来自何处。不管怎么说，不单是执行委员会决定有节制地做出反应，就连苏联人当时都向美国人保证“这是一次意外事件，以后再也不会发生了”（Trachtenbetry 1990：245，246）。

当然，这次事件发生在危机的关键时刻，正值执行委员会不知对赫鲁晓夫发来的两封信做何反应的时刻。直到最近，人们还认为第一封口气比较缓和的信出自赫鲁晓夫本人之手，第二封信带有克里姆林宫内强硬派的痕迹。这种看法似乎是模式Ⅲ中动因的例证。事实上，如今看来好像是这样：两封信在口气和实质内容上的差异，反映了苏联情报机构对美国进攻古巴可能性的估计所发生的变化。写第一封信时，他们以为美国的进攻迫在眉睫，已经没有在外交上讨价还价的时间了。写第二封信时，进攻迫在眉睫的危险似乎已经过去，苏联领导人这时可以加大赌注，延长讨价还价的过程了（Blight and Welch 1990：342）。美国人决定对第二封信不加理会，在这一点上比苏联人技高一筹。果真如此的话，我们或许可以用模式Ⅰ来解释这一意外事件，认为政策是建立在如何做更有利的理性思考上的。

在那些因新证据的出现而最有争议的问题中，有一个问题是苏联在美国一旦入侵古巴时是否会使用短程核导弹。争论的焦点不在于导弹是否在古巴——导弹确实在那里，这一点似乎已很清楚。有些学者认为，争论的焦点在于当地苏联指挥官是否有权不经莫斯科批准便可使用这种导弹。这个问题技术性很强，无法在此详加讨论，但它涉及

对这一危机的风险程度的估计。关于这个问题的争论，其实在导弹危机研究中一直就存在分歧，只是自1987年以来分歧显著地扩大了。分歧的一方倾向于强调危机中有发生核战争的危险，另一方则倾向于淡化这种危险。总的说来，在谁有权下令使用在古巴的战术核导弹这一具体问题上，证据和论点似乎都倾向于马克·克雷默的观点，即认为当地指挥官自作主张发射导弹的行为是被明令禁止的（Kramer 1993：40，42－6；cf. Blight *et al.* 1993：41，47－50）。这一结论不单从技术和历史的角度看似有道理，而且从它与危机期间整个相互作用模式的吻合程度来说，似乎也顺理成章。

有关美国政策方面新发现的最重要证据似乎恰恰证实，当时有重要力量在努力朝着克制的方面做工作。人们一直认为，肯尼迪不愿意拿美国在土耳其的导弹跟苏联在古巴的导弹做交易，因为这样做显然意味着在苏联的压力面前退缩，实际上等于允许苏联将其在古巴的导弹与美国在土耳其的导弹相提并论的做法合法化。如前文所述，最后选择的策略是告诉苏联人，在土耳其的导弹会撤走，但不是作为古巴交易的一部分。从现在知道的情况看，肯尼迪备有一封给联合国秘书长吴丹的信，信中便提议撤走在土耳其和古巴的导弹。迪安·腊斯克（肯尼迪的国务卿）后来回忆说，“我认为，如果我军在古巴登陆，就会用到这项……计策。苏联在那里陈兵3万或更多，苏联的导弹也在那里摆着。美军在这种情况下登陆，苏联人准认为是重大的升级行动”（Blight and Welch 1990：173－4）。当然，苏联人还是接受了肯尼迪10月27日的提议，撤走在土耳其的导弹成了非正式的口头保证，利用联合国这一计也因此没有启用。不过，这件事的确表明，肯尼迪是做好了为达目的不遗余力的准备，并不是如以前所认为的那样，只想防止危机升级到无法控制的地步。这是为了克制而采取积极行动的例子，消极行动的例子其实也并不难觅——例如，对美国27日迷航误入西伯利亚空域的U－2飞机，或对美国海军舰艇迫使苏联潜艇在古巴周围隔离线附近浮出水面，赫鲁晓夫都决定不做出强烈反应。以上事例与美国执行委员会决定不因U－2飞机在古巴上空被击

落而放慢解决危机的步伐，堪称异曲同工。

最近的研究还揭示出了许多其他细节，但上述几点即可说明引起了哪些争论。随着更多的证据浮现于世，“假如……应该怎么办”的问题还会成倍增长。这也说明阿利森的呼吁从很多方面看都大有裨益，国际关系的研究是应当重新取向，朝着对外政策形成过程方面发展。有这么多证据表明传统做法与官僚程序起的作用十分重要，人格、洞察力和误解这些方面的因素也很重要，倘若再简单地把政策的性质分为统一型、理智型和目的型，就解释不了所有问题了。不过，正如我们所看到的，证据虽不一而是，但不少都印证了这一说法：决策过程中确有许多难以预料的因素，但在关键性的事情上，双方领导人选择的方案还都是非挑衅性的、留有余地的，使对方可以从容易遭受抨击的立场上退回去。

我们可以把决策过程想象成由一个中心及周围环绕的许多外围活动构成。这些活动的发生常常是任意的，也许会把注意力从中心移走，甚至使中心有解体之虞。如果我们把这个中心看作控制力，即决策过程本身是完整无缺的，那么，目前尚难有明确的证据表明各方准备蓄意采取将导致失去控制力的行动。恰恰相反，真实情况基本与此大相径庭。当然，意图并不意味着一切。实际上，即便是在当时，在无法了解到我们现在所知事实的情况下，决策者们也几乎不能不意识到，他们的处境极其微妙，失去控制力就得面临灭顶之灾。这种意识足以使他们在危机的余波中努力去寻找有何办法可以减少无法预料和误解的影响，降低具有潜在危险的偶然事件的作用。在白宫与克里姆林宫之间建立“热线”联系，朝着签署《部分禁止核试验条约》的方向努力，美苏一致同意支持联合国禁止在太空部署核武器的决议，甚至谋求签署防止核武器扩散条约的决心（实际签署则到了 1969 年），所有这一切都大大得益于古巴导弹危机带来的震撼（Garthoff 1989: 134－5）。缓和本身其实也有得力于古巴导弹危机之处。

总之，如果说古巴导弹危机不再称得上是危机处理方面的杰作，那么，夸大失去控制的危险即核战争的危险，同样是错误的。

在整个古巴导弹危机事件中，有一件事确乎始料未及。不管是卡斯特罗还是他的革命，都没有因为这一危机而垮掉。由于这一原因，赫鲁晓夫确有理由认为，苏联“在不打一枪的情况下就取得了……相当大的胜利”（Khrushchev 1971：504）。古巴革命依然是门罗主义之墙上一个美国从来都堵不住的大缺口。1970 年，之后是 1979 年，在古巴又曾爆发两次小型危机，两次都是因苏联显然想增加它在古巴的军事存在而起。在这两次事件中，美国都援用了或许可以称为“‘62’精神”的力量阻止了这些行动。然而，美苏两国在古巴的军事对峙并没有阻止卡斯特罗 1975 年在葡萄牙撤出非洲后派遣部队到安哥拉去支持那里的革命政权。以上这几点说明，必须把古巴导弹危机放到第三世界的革命变革这个背景中去看，它不只是个军备竞赛问题。这也正是我们第八章要探讨的主题。

第八章
美国、苏联与第三世界
（1953～1963）

依赖模式与独立模式

与建国时期的美国相比，第二次世界大战后新成立的国家几乎不占什么优势。在全球通信与运输发达的年代，与主要强国相距遥远已无关紧要。从经济上说，不少新生国家依然受制于殖民地统治时期其宗主国按照自己的利益所确立的那些做法。作为主要原料生产国，前殖民地国家依然十分依赖发达国家准备给付的原料价格，而许多工业品又不得不到世界市场上去购买。从政治上说，除了印度等少数几个国家外，这些新国家都落到了缺乏行政或政治经验的本国领导人手里。此外，许多国家还有着五花八门的种族、部落和宗教群体（印度就是一个例子）。这些群体的存在，阻碍了建立有凝聚力的国家机构和民族感情——这也证明殖民主义列强在划分殖民地的边界时随意性很强。

以上及其他一些相关的困难，使得1960年代和1970年代的所谓“依赖论者”认为，前殖民地国家只不过是将正牌帝国主义换成了“非正牌”帝国主义，或者说新殖民主义。这种看法虽然很有道理，但整个情况却更为复杂。分析一下殖民地衰亡的原因，我们就会清楚地看到这么两点：一是世界各地的非殖民地化进程大不相同；二是后来逐渐被称为“第三世界”的力量的崛起，成为世界势力平衡中一

个重要的独立因素。

亚洲和非洲、加勒比海和太平洋地区的人民“心理和精神上的觉醒”、殖民主义列强维护自己统治地位的意志和能力的衰退，这两者结合在一起，无疑构成了起主要作用的力量。两次世界大战的动乱，又加速了两者的变化过程。在很多事情上，第二次世界大战都是在完成第一次世界大战开始的事情。布尔什维克革命的例子和苏联逐渐上升为世界强国，为政治、社会与经济的发展提供了又一种可供选择的模式，而且这种模式在冷战的环境下肯定是反西方的。即便是认为苏联模式不大适宜的地区，在一定情况下，充满渴望或刚刚独立的国家也可以挑动一个超级大国与另一个超级大国发生争端，以增加自己的政治选择。最后，自决原则及推行这种原则的日益合法化，以及《联合国宪章》中适用于全世界的人权原则，对旧秩序也形成了强有力的挑战，即便是在实际上并不奉行这种价值观的地区也是这样（Bull 1984：224－8）。

如果要考虑各个具体的事例，这些笼统的因素显然还得细化。不过，要理解第二次世界大战后20年中影响第三世界国家的情况，以这些因素为框架大致足矣。在需要细化的部分中，最重要的是搞清地区间的差别和非殖民地化进程与冷战发展的关系。

非殖民地化在亚洲和欧洲的表现形式明显不同。在印度，是否独立就不像如何管理那样成为问题。正如R. F. 霍兰所言，“英国行政统治的崩溃，世界上其他地区对联合王国军事力量的需求，工党1945年在英国大选中的获胜，所有这些都表明，非殖民地化一定会早早到来”（Hollard 1985：74）。菲律宾于1898年被美国占领，1946年根据1934年的一项保证获得了独立。在其他地方，日本战时对东亚、东南亚和南亚大片地区的占领，给了西方殖民主义沉重的一击，使西方殖民者再也没有完全恢复过来。日本取代了西方的统治之后，如果说有什么激发了这些地区纷纷独立的话，那就是事实证明受日本的支配与受西方列强的支配同样不好受。例如，荷属东印度群岛（即后来的印度尼西亚）起初很欢迎日本人，把他们看成将自己从西方统治下解放出来的大救星。但是，日本人不久便将自己的信誉糟蹋

得一塌糊涂，因为“为了满足日本战时的需要，日本军方开始了对印度尼西亚经济的控制”（McMahoh 1981：35）。1945 年，东南亚很快就有人提出了欧洲强国是否能再建殖民统治的问题。法国在印度支那、英国在马来亚和荷兰在东印度群岛随即迅速行动起来，力图夺回对这些领土的控制权，但很快它们就与民族主义运动展开了激烈的游击战争。

在这种形势下，冷战的特点突出表现在两个重要方面。第一，在以上各殖民地境内，共产主义暴动都是一股强大的破坏稳定的势力，即便是共产党在民族主义运动中不占主导地位的地区（如在荷属东印度群岛）也不例外。此外，直到斯大林 1953 年去世前一直占统治地位的斯大林主义政策，也加剧了谋求独立的国家内部的紧张局势，因为这些政策将所有非共产主义的民族主义者均斥之为资产阶级，对共产主义者则坚决支持。第二，美国的态度对非殖民地化的模式有所影响。这里不仅是指美国对共产党在这些东南亚国家内所起作用的态度，而且也包括美国对欧洲势力平衡的态度。在压荷兰人同意东印度群岛独立和压法国人容许越南自治这两件事上，美国准备对荷兰人施加的压力要大得多，原因是印度尼西亚有一位强有力的非共产党民族领袖——苏加诺，而且荷兰人不如法国人抗得住美国提出的与其欧洲政策保持一致的要求。对比之下，越南最强大的独立力量是共产党领导的。另外，美国也需要法国赞同它 1940 年代末在经济和政治上重建西德的政策。法国答应赞成美国的政策，其部分交换条件是，美国降低它反殖民主义政策的调子，大力支持法国重新控制越南的愿望。总之，从一开始，独立斗争的命运就既受内部因素的影响，又受大国密谋策划等外部因素的影响。至于这些力量是如何相互作用的，本章稍后将详细探讨。

非洲的情况则全然不同。除了 1941~1943 年间北非发生过战事外，非洲在第二次世界大战期间没有成为主战场，那里的殖民统治格局也没有遭到像日本占领亚洲地区所造成的那种彻底破坏。非洲的欧洲殖民主义列强——英国、法国、比利时和葡萄牙——肯定没有料想

到局势会朝着很快同意殖民地独立的方向变化。霍兰写道，事实上，“1940年代末和1950年代初是非洲帝国的黄金时期，似乎它自有一种凝聚力和活力”（Holland 1985：128）。美苏两国历史上均与非洲无涉，所以几乎谈不上有什么非洲政策，主要都是任欧洲殖民主义列强自行其是。直至1957年，美国在非洲的33个驻外机构总共才有248名官员，而它在西德一处的外交官员就有256人（Ferrell 1975：193）。1940年代和1950年代，非洲在冷战中并不是什么了不起的因素。让非洲改变了面貌的是1956年的苏伊士危机。至少对英国和法国来说，这场危机既是帝国史上的一个转折点，又是两国与美国关系史上的一个转折点。有关详情我们下文再叙，这里仅指出一点，那就是，在苏伊士危机刚过去那几年，由于欧洲丧失了实行殖民政策的勇气，非洲民族主义的浪潮一浪高过一浪，1957～1964年间，获得独立的国家数量激增。①

与亚洲相比，非洲至此仍未引起超级大国的直接兴趣或干预，只有1960～1965年间的刚果危机是个例外。这场危机与第三世界其他国家的起义和独立斗争（其中最重要的是1959年的古巴革命、老挝和越南的冲突以及非洲的民族主义浪潮）结合在一起，对肯尼迪总统也是一种提醒。当年他在就职演说中曾夸下海口，要帮助“居住在半个地球上的那些生活在茅屋和村落里的正在为摆脱普遍贫困而斗争的人”。然而，对两个超级大国而言，非洲依然明显处于与其利益相关的边缘地区。直到1970年代中期，葡萄牙结束了对安哥拉和莫桑比克的统治，埃塞俄比亚和索马里发生了冲突之后，超级大国才在非洲展开了新一轮比较尖锐的对抗。②

中东和亚洲的情况类似。在打破帝国模式方面，第二次世界大战起到了决定性的作用。不过，这一过程早在国际联盟委托建立托管制

① 这些新生的国家主要有：加纳，1957年；刚果，后称扎伊尔，1960年；乌干达，1962年；阿尔及利亚，1962年；肯尼亚，1963年；尼日利亚，1963年；赞比亚，1964年。

② 这点在第十一章还要述及。

后就开始了，有些国家[1]更早实现了独立，第二次世界大战之前就独立了。有阿拉伯民族主义力量，西方殖民主义的残余终于几近荡然无存。可是，英国依然相信，它在这一地区广泛而长期的经济与政治利益，会使它继续保持可观的影响（Holland 1985：113）。1956 年苏伊士危机发生时，英国在埃及还留有一个庞大的军事基地，用以维护它对运河的控制权。1967 年，英国在亚丁湾附近还保持着势力存在。一直到 1971 年同意海湾酋长国独立（独立后称为阿拉伯联合酋长国），英国才最终离开中东。

英国从中东的撤离既缓慢又冲突连连，但它的撤离恰巧与两件事连在了一起。这两件事的发生，将这一地区从老牌帝国主义的势力范围变成了冷战竞争凸显的场所。第一件是以色列国在 1948 年的建立。这件事激怒了阿拉伯世界，使阿拉伯人与犹太人的宿怨上升到了空前紧张的地步，并且把阿拉伯国家所认为的亲西方势力再次引入了中东。第二件是对石油资源的大规模开发上升到了一个新的水平。对超级大国而言，这两件事大大抬高了它们在这个地区的政治和经济赌注。超级大国日益增长的兴趣、阿拉伯人的民族主义、以色列人对自己的国防表现出的过分自信、英国（还有法国）保持苏伊士运河控制权的决心，这些复杂多变的因素交织在一起，终于在 1956 年酿成了一场危机。这场危机有效地铲除了残余的欧洲势力，从而解决了这方面的问题，但也使得其他因素在那里活跃起来了。1956 年的危机结束后那段时期，苏联加强了它与埃及的关系（我们在后文将会看到，这种关系并没有达到双方都满意的程度），扩大了与其他阿拉伯国家的联系；美国则宣布实行“艾森豪威尔主义”，实质上是把杜鲁门的遏制政策延伸到了中东。冷战就这样在中东降临了。

在拉丁美洲，除了为数不多的几个小国外，对多数国家来说，独立一事不像以上所述那样要解决形式问题。拉丁美洲的主要国家在 19 世纪都已获得了独立（圭亚那和苏里南例外，前者原为英属圭亚

① 埃及、伊拉克和沙特阿拉伯。

那，后者原为荷属圭亚那，这两个国家分别是1966年和1975年独立的）。拉美的独立问题，莫如说是何种内部政治结构和何种对外政策能够保证拉美国家政治和经济稳步发展的问题。对南美这么一个幅员辽阔、变幻莫测的大陆妄加推论，确有不自量力之嫌，但大多数国家共有的某些广泛性特征，也并非无迹可寻。总体来看，它由社会、经济和政治力量极不相等的三部分人群组成：农村和城市的广大贫民，人数虽少但呈上升趋势的中产阶级，人数更少却占优势地位的地主阶级。在大多数国家，地主阶级均占有良田和大部分的资源。军官阶层也许可以算作第四阶级，他们倾向于维持现状，并在危机发生时采取行动恢复原状。

工业发展本来有可能对拥有土地的寡头统治集团的经济和政治势力起到限制作用，但从一开始便受到了抑制，因为地主掌握着大部分能带来出口效益的主要资源，换回的收益不是重又投资到了他们自己的事业上，就是用到了从海外进口工业品上。不过，受1930年代经济大萧条的影响，政治与经济变革的要求有所增加。在武装部队的支持下，1930年代，好几个国家都进行了民族主义革命，原有的政治精英只好与城市中产阶级较为平等地分享权力。第二次世界大战对国内的工业发展又是一个促进，原因不单是对拉丁美洲的原料需求增加了，而且是工业品的进口也不那么容易了。然而，工业化并没有解决农村因农产品价格低和土地占有不平等所造成的危机。人口的迅速增加和农村贫困人口大量迁入城市，使拉美许多国家陷入了一种潜在的爆炸性境况。民族主义革命和工业化也没有带来政治上的稳定，只是把权力在相互竞争的群体中分散了一些而已（Williamson 1992：330－42）。

影响拉丁美洲发展最重要的外部因素是美国企图维持整个半球的政治稳定和经济影响力。门罗主义及其罗斯福推论为这种意向提供了理由，而且自1890年代开始美国还对拉美国家进行了多次直接干涉，1898年对古巴的干涉，20世纪头30年对多米尼加共和国、巴拿马、墨西哥和尼加拉瓜的干涉等。富兰克林·罗斯福的“睦邻”政策，虽然将重点从军事干涉转向了施加经济和政治压力，但其“半球体

系”的实质是要抵制威胁美国势力影响的变革，在这一点上从来就没有发生过动摇。

冷战的出现，如果说起到了什么作用的话，那就是强化了这些义务，尽管美国公布的政策是要建立一种开放式的世界经济体系，如1944年布雷顿森林会议讨论国际经济体系时所设想的那样。1947年和1948年新建立的三个美洲国家机构，不仅表明杜鲁门政府承认民族感情在拉丁美洲的力量，同时也表明他决心将美国在该地区的影响维持在较高水平。第一个是1947年在里约热内卢签订的安全条约，这一条约后来成了北大西洋公约组织条约的样板；第二个是美洲国家组织；第三个是与美洲国家组织一起于1948年在波哥大谈判而签订的经济协议。这三项中的每一项，尤其是最后两项，都是经过与拉美其他国家激烈争论后才达成的。拉美国家的谈判人员竭力要求美洲国家组织宪章中包括这样的条款：“禁止其他国家或国家集团对任何国家的事务进行政治、军事或经济干涉。”作为补偿，美国人坚持要求形成一个决议，宣告“国际共产主义或任何其他极权主义学说”均“与美洲的自由概念格格不入”（Green 1974：177）。这项决议后来成了美国1965年对多米尼加共和国进行干涉的依据。各方在个人财产尤其是外国人拥有财产的地位、拉美国家对自己经济资源的控制程度、美洲国家之间的贸易条款等问题上，同样有过激烈的交锋。正如沃尔特·拉夫伯所言，美国虽然在经济协议的措辞上对拉美国家的要求做了让步，“但它不可挑战的经济实力，对于确定贸易和投资的实际条件，却在很大程度上起着决定性的作用”（LaFeber 1993b：99）。

即将踏入1950年代时，美国对拉丁美洲各国的要求虽然做了一些无关紧要的让步，但已有效地巩固了自己在西半球的影响。1949年宣布的杜鲁门“第四点”对外援助与技术援助计划，对拉美经济所起的作用甚微。对拉美的援助实在无法与按照马歇尔计划给予欧洲的援助相比。此外，随着冷战的步步升级，军事援助逐渐高于经济援助。在继后的十年里，这一趋势在拉美有增无减，这一点与在第三世界的其他地方是一样的。与此同时，美国的私人投资都被吸

引到诸如委内瑞拉石油开发这类明显有利可图的事业中去了，投资量远远超过对拉美制造业的投资（Green 1974：180－1）。简言之，美国对这一地区惯有的兴趣和冷战带来的压力结合在一起，更使美国自认为对拉美有特殊的权力和责任了，同时也使美国相应地对这个半球内发生根本性变化的任何征兆都比较敏感，不管这征兆是源自拉美的民族主义还是苏联的共产主义。美国日后会逐渐认识到，这两者其实并没有真正的区别。

第三世界国家可以说是处于进退两难的困境，这是由如下矛盾引起的：既要实现各个国家发展的愿望，又要面临超级大国搞冷战竞争造成的僵持局面。然而，我们绝不能认为第三世界国家会因此任凭超级大国摆布。从冷战的初级阶段起，南斯拉夫从东欧集团的分离以及印度和埃及在奉行独立于超级大国的中立政策方面所做的努力，就使不结盟的观念喷薄而出。不结盟运动虽然在1970年代才正式形成，但权宜性地奉行不结盟政策，却可以追溯到1955年的万隆会议。出席这次会议的许多国家显然与冷战中的一方或另一方为盟——例如，日本和中国，但会议日程还是反映出了亚洲和非洲国家的态度。这些国家认为，现有的国际组织满足不了它们的利益需求。有一位历史学家指出，1950年以来，不仅是非殖民地化的步伐慢下来了，联合国在接纳新成员国方面也动作迟缓，该组织已“沦为冷战对抗的场所，实际上并没有实行其成员国应具普遍性这一原则”（Lyon 1984：229）。

随后于1961年在贝尔格莱德和1964年在开罗举行的不结盟会议，参加的成员国就更多了，主要是增加了新诞生的非洲国家。在成分如此庞杂的群体中，对很多问题的看法明显存在分歧，这也是不可避免的。后来之所以能达成协议，原因是大家都反对“帝国主义、殖民主义和新殖民主义”，再就是不把反对两大冷战集团的控制放在首位（Lyon 1984：230－2）。不过，不结盟本身就是对两个超级大国的一种挑战，在一定程度上限制了超级大国控制第三世界事务的能力。

超级大国与第三世界：基本估计

19 世纪，对美国的对外政策而言，反殖民主义和不与其他列强发生纠葛具有同样重要的意义。反殖民主义思想深深扎根于美国历史，这是不足为奇的，就连导致美国获得海外领地的事件——1898 年因古巴问题与西班牙交战，也是以反殖民主义为理由的。美国名义上是为了把古巴从西班牙帝国主义的压迫下解放出来才参战的。但因此却获取了几块前西班牙殖民地，最重要的是菲律宾和波多黎各。然而，这一事实并没有根除这种根深蒂固的观念，即认为美国的统治与欧洲列强的统治在方式上是有所不同的。实际上，美国这时已经是一个帝国主义大国了，坚持这种看法是开明和有益的，不能轻易把它忘掉。20 世纪初，虽然出现了一些规模虽小但声势浩大的反帝国主义运动，但上述这种看法还是普遍为人们所忘记。与英国相比，美国的海外领地很小，而且对它的国际经济与政治地位的影响也不像英国那么重要。

既然如此，在美国公众心目中，领地在世界上的地位也就微不足道了。据观察，美国对外部世界的概念，“源于国内的政治文化，而且至今还受它的制约”。由于考虑海外领地的内在特点和对海外领地的需要不那么急迫（就像美国不十分急迫需要对其他国家如中国施加影响一样），美国人的观念几乎完全是建立在自行发展起来的道德观念基础上的。他们相信美国例外论，相信美国肩负着为民主做典范的特殊使命（Darby 1987：170）。一旦走到认为美国就是世界这种地步，种族优越感往往就冒出来了。

以上这些看法，在某种程度上无疑适用于所有国家和所有文化，而美国的经历有两点特别重要。首先是它的极端强烈性，即道德观念的表现与国家利益的概念盘根错节的程度很深；其次是这种强烈性在多大程度上能成为 20 世纪世界政治中的一个因素。当然，强权政治与经济利益的现实不可避免地会介入其间，而美国与第三世界在二战

后的关系史就是这样一个过程：使美国自己的反帝国主义自我意象适应（或者符合）特定的形势和利益的要求。

罗斯福曾强烈谴责过帝国主义。可是就连他也没想过让殖民地很快独立。他是一个渐进主义者，认为必须要有一段准备时间，殖民地才能实行完全独立（McMahon 1981：61）。在1945年2月举行的雅尔塔会议上，他表示同意下述意见：只有经过宗主国同意，才有必要在联合国委托下对前殖民地建立托管统治。若照此办理，譬如说法国，实际上就等于可以重新拥有越南的领土，另外也等于为杜鲁门政府承认法国对越南的要求铺平了道路。在压英国实行非殖民地化方面，美国也同样小心翼翼。最后一点，同时也是最重要的一点，随着冷战的开始和反共产主义日益占据主要地位，反帝国主义在美国对外政策中逐渐降到了次要地位。

然而，这些新情况的出现，并没有将反帝国主义的词语从美国的决策过程中完全抹掉。毫无疑问，在其他情况相同的条件下，美国照样会赞成非殖民地化。另外，在某些事件中，譬如说苏伊士危机，美国还刻意明确地与欧洲帝国主义的做法拉开了距离。从经济上说，欧洲殖民主义的灭亡、殖民关系带给宗主国的优惠贸易条件的完结，确实使美国捞到了不少好处。可是，说到底，美国对正在上升的共产主义的恐惧，还是明显限制了它对自决原则的认可。似乎应当更准确地说，美国感到它不能对第三世界国家政府采取的政权形式漠然置之。在它看来，共产主义在哪里一落足，哪里就会有一种新的、更加危险的帝国主义形式生根发芽，而这一切的根源在莫斯科。于是，遏制共产主义这一消极性原则，在重要性上其实超过了促进民主，美国也因此开始向第三世界的某些领导人和某些运动提供援助和支持，但若不把民主一词的含义延伸到面目皆非的地步，这些运动是无论如何也难以冠以民主字眼的。

反对帝国主义这一点，对苏联的革命学说来说，如同对美国的革命学说一样是很重要的。实际上，按照列宁对马克思主义的诠释，帝国主义是资本主义的主要支柱，世界共产主义革命的发展同样会使帝

国主义走向灭亡。当然，在苏联刚刚诞生那几年，理论工作者中对两者哪个居先不是没有过争论。列宁本人认为，应当在中心城市首先发动革命，并准备支持进行独立斗争的非共产主义运动，或者说民族主义运动，以此作为通往真正共产主义大道上可以落脚的小站。斯大林因受到蒋介石 1927 年屠杀中国共产党一事的冲击深感沉痛，否定了列宁的灵活性政策，认为没有共产党的领导，就不可能完全获得独立。在二战结束后实行非殖民地化的头一个阶段，这一政策在东南亚的确有助于激起轰轰烈烈的独立斗争，但也应当说，它并没有给苏联带来巨大的回报。

赫鲁晓夫的政策标志着又回到列宁的政策上去了。它允许新独立的国家除可选择与冷战集团中的任何一个结盟之外还可做别的选择。其理由是：由于欧洲殖民主义残余未尽，新独立的国家奉行中立主义本身即具有反西方倾向，这将使苏联在国际上处于一个有利的地位。赫鲁晓夫 1956 年在苏共二十大上宣布要建立“和平区”，还有他前一年对万隆会议的坚决支持，为的就是“将亚非国家正在发生的反西方政治倾向引导到有利于社会主义集团的道路上去”（Allison 1988：29）。值得注意的是，与斯大林那种不爱走出国门及与世隔绝的习惯相反，赫鲁晓夫于 1955 年开始对阿富汗、印度和缅甸进行广泛访问。1960 年，他还访问了印度尼西亚，表达了对苏加诺坚持奉行中立主义的敬佩。接着，通过第三世界国家领导人的回访，以及在亚非国家加入独立国家的行列时向它们提供援助，他的个人外交又更上了一层楼。赫鲁晓夫在回忆录里还自豪地谈起过苏联工程师在印度帮助建设钢铁厂的效率如何高，据他说，东道主告诉他，无论是在速度还是在质量上苏联人都超过了德国人同时建造的工厂（Khrushchev 1974：302－3）。在有些国家那里，他在政治上也获得了明显的成功。印度就既不谴责苏联干涉匈牙利，也不谴责它在古巴拿导弹去冒险，而且还支持苏联反对西德重整军备。但在其他一些国家，尤其是在中东，苏联的援助并没有阻挡住这些国家的政府（如埃及）对共产党展开抨击。

对苏联的态度也需要从另一个侧面做恰当的分析。它在支持非共产主义运动方面过分实用主义的态度招致了非议，说它正在放弃社会主义斗争。1950年代末与中国的日益分裂，使得苏联领导人在这件事情上尤其敏感。中苏之间产生裂痕的主要原因是中国对苏联与西方和平共处的政策感到不满。可是，回到斯大林的纯粹革命论上去——这正是中国所要求的——又无异于拿苏联好不容易靠灵活政策获得的影响去冒险。1950年代末，赫鲁晓夫已重新修改了他的第三世界政策，以求适应这种相互矛盾的状况。紧接着要做的就是促进“民族民主阵线”的发展，共产党将参与进去并将在其中发挥越来越大的作用。苏加诺的印度尼西亚便是这方面的典型，那里的共产党人是执政的联合政府的成员（Lowenthal 1984：327－8）。其他第三世界国家成功走上这条路的则很少。实际上，1965年苏加诺名声扫地并被罢黜，主要原因就是他与共产党的联系使军队采取了与他敌对的态度。

至此，我们一定会得出这样的结论：美国和苏联在掌控第三世界非殖民地化进程和如何建国方面显然能力有限。它们在立场方面的潜在弱点，正是通过其政策的负面影响暴露出来的，尤其是美国人的政策，因为他们比苏联人更活跃，冒的风险也更大。超级大国常常发现自己所依靠的人对超级大国利益的忠诚程度是极其令人怀疑的。下面，让我们翻开超级大国对第三世界的干涉史看一看，相信这些难解之处自会澄清。

中东：伊朗、苏伊士和黎巴嫩

冷战时期最大的冲突发生在伊朗，时间是1946年。这是遏制政策在正式得名前一年的实际预演。从那时起，伊朗一直处于动乱之中。国王和一个接一个首相之间的权力斗争，均是围绕着两个相关的重点问题在进行：一个是现代化问题；另一个是对英国英伊石油公司垄断的伊朗石油生产获得更大控制权的问题。

1951年之后，事态发展到了危急关头。拉兹马拉首相被宗教原教

旨主义者暗杀后，穆罕默德·摩萨台随即被任命为首相。新选举的结果使更多激进的民族主义者进入了议会，国王和政府之间的对抗更加激烈了。摩萨台是一个非常自信而且很有号召力的人物，他领导的民族主义联盟是因反对英伊石油公司而结成的。最初美国（杜鲁门任总统期间）一直向他提供经济和技术援助，甚至在摩萨台将英伊石油公司收归国有之后仍是如此，尽管提供的援助规模并不大。英国在石油谈判上的不妥协态度，几乎没有得到美国的支持。华盛顿认为，它在该阶段的作用应当是在各方之间进行斡旋。然而，还没超过两年，美国便认定摩萨台对伊朗的内部稳定和美国的利益都是个威胁。1953 年，美国动用中央情报局策动了反对摩萨台的政变，将实权夺回来还给了国王，民选议会的权力随之降低，结果造成了美国对伊朗国王长期承担义务的局面。直到 1979 年伊朗革命，这种局面才算结束。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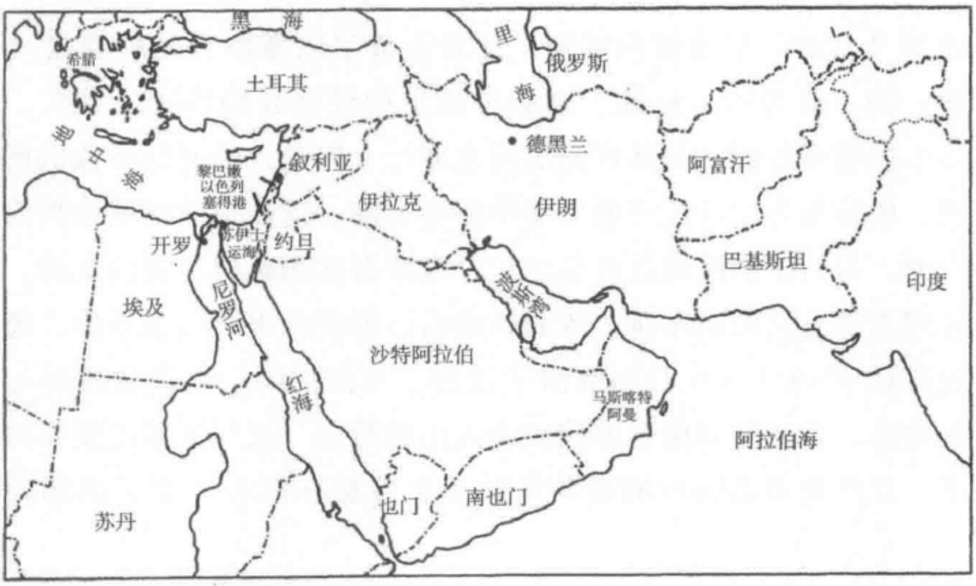


图 8.1　中东与苏伊士危机

资料来源：W. 拉夫伯：《美苏与冷战（1945～1992）》，纽约，麦格劳—希尔出版公司，1993，第 186 页。

是什么原因使美国转变了政策，而且首次动用中央情报局将经选举产生的政府赶下了台呢？其中一个因素是，艾森豪威尔 1952 年当

选后，美国政府换了人马。不单是共和党政府班子（尤其是指新任国务卿约翰·福斯特·杜勒斯）倾向于用更加怀疑的眼光看待第三世界的民族主义，就连国内的反共氛围以及在参众两院占多数的共和党人，都越来越容不得在任何与共产主义沾边的问题上达成妥协。中央情报局当时是由杜勒斯的兄弟艾伦领导的，它的重要性增强后，该届政府的反共色彩更加明显了，而且还带上了鲜明的行动主义倾向。隐蔽活动在1950年代进入繁盛期，成了对外政策方面日益被经常使用的一种重要工具（Rubin 1981：55－6）。

然而，正是由于伊朗国内的事态发展和来自外部的压力交织在一起，才发生了1953年的危机，并导致美国直接予以干涉，尽管是秘密进行的。1951年石油工业被伊朗收归国有后，英国及西方其他石油公司都抵制伊朗石油，因而出现了严重的经济危机。摩萨台的反应是打共产主义这张牌。他宣称，西方如果不帮他，他就转向苏联。在1953年7月的一个关键性时刻，艾森豪威尔以摩萨台是杜德党（共产党）的工具为由，拒绝了摩萨台提出的经济援助要求。其实，摩萨台不过勉强称得上是共产党的盟友而已。但是，随着经济危机愈演愈烈，他发现自己在议会的支持率逐渐下降，这就迫使他越来越依赖共产党。与国王的对抗公开化之后，摩萨台试图赢得议会的支持，让议会同意他直接控制军队。遭到拒绝后，摩萨台采取阴谋手段，通过公民投票于1953年8月初解散了议会。与此同时，他开始改善与苏联的关系，希望这样做会迫使美国人出面帮他。在气氛高度紧张的情况下，共产党方面的示威者与军队于8月初在街头发生了激烈的冲突。

这时，美国恰恰已定好行动方案，打算加快推翻摩萨台的步伐，尽快恢复国王的权力。政变的想法最初是英国人提出来的，1952年美国大选前曾酝酿过，也与中央情报局的资深人士进行过讨论，但因得知杜鲁门的国务卿迪安·艾奇逊肯定会反对采取这种措施，所以迟迟未动。引发这一方案付诸实施的是伊朗国王宣布解除摩萨台职务的命令一事。摩萨台表示拒绝后，他的支持者和共产党人随即上街示

威。国王以为全盘皆输，逃亡到了意大利。恰在此时，美国的计划启动了。首先是向亲国王的民众提供资金，接着这些民众游行到德黑兰市中心，夺取了主要的政府大楼。游行途中，又有数千名支持者加入，以示“在成千上万厌倦了摩萨台政权的混乱状况或对共产党心存恐惧的人中还有大量拥护国王的支持者”（Rubin 1981：77，84，85）。摩萨台被扎赫迪将军取代后，后者的政府很快从美国得到了数额可观的援助。这次政变对石油谈判起到了快刀斩乱麻的作用，结果成立了一个新的瓜分伊朗石油的财团。英国的垄断被打破了。从此伊朗国王的继续存在，不仅在政治上，而且在经济上与美国扯上了重大的利害关系。

在颠覆摩萨台一事上，美国的干涉到底在多大程度上起到了决定性作用，答案莫衷一是。在大多数有关美国对外政策的记述中，都说美国的作用显赫。但是，伊朗问题知名专家巴里·鲁宾却认为，“‘推翻’摩萨台就好比推一扇开着的门”，起关键作用的因素还是摩萨台自己走向了独裁这一点，很多伊朗人对他持敌视态度，这才是真正的原因（Rubin 1981：89）。然而，8月的事态发展还是没有脱离西方抵制伊朗石油国有化这个框架，而美国的石油公司也参与其中。如果认为这一外部压力在把摩萨台推向更为极端的立场方面起到了一定的作用，应该说并不为过。即便不能对这个问题给出一个明确的答案，起码也可以说，这次政变使美国的决策者错将本不该给的巨大信赖给了作为对外政策工具的中央情报局，后文中的几例亦将证明此言不错。

除此之外，伊朗危机还反映出了美国与第三世界国家关系中的某些问题，这些问题今后还会反复出现，其中包括：美国反对第三世界的民族主义者完全掌握对自己国家资源的控制权；很难找到能够在共产主义与右翼独裁之间规划第三条道路而又“可以接受的”民族主义领导人。美国奉行的政策往往造成第三世界国家内部政治向两极分化，加大了走第三条道路的难度。最后美国决定支持的政治力量，其主要吸引力仅在于消极反共这一点。最终结果是建立一种关系，这种

关系表面上会使美国对友好国家的政府具有相当的影响力，实际上对方却占有更大的优势，这一点在伊朗和在其他地方没什么两样。伊朗国王同样是个民族主义者，他也可以利用美国想把伊朗建成中东稳定中心的愿望，去达成他自己巩固对内对外影响的目的，首先是用美国提供武器建设起来的军队去这样做。

最后，伊朗危机及其后果还表明，美国越来越认识到英国在中东扮演着大国角色。然而，考虑到沿着列强那种传统的强制性外交的老路走下去会带来使阿拉伯人产生敌意的危险，美国打算与英国的政策保持距离，甚至于在它寻求确立自己的影响时也是这样。巴格达条约那短暂而奇特的历史，即可尽显这种立场的含糊之处。

该条约最初是在美国赞同下于1954年签署的土耳其—巴基斯坦双边安全条约，美国原计划按照东南亚条约组织的路子搞一个地区性的安全条约，可后来在英国的敦促下加上了伊拉克，次年又加上了英国自己，另外还有伊朗。加进这些国家后，就把美国的计划变成了英国在该地区增强影响力的一种手段。美国相当担心的一点是，这个条约会引起其他阿拉伯国家尤其是埃及的反感，实际情况也确实是这样。美国若加入进去，引发的问题或许会和能解决的问题一样多。面对这样一幅前景，美国决定还是不参加为好，只保持观察员身份。从某种意义上说，美国这时是两面不讨好。该条约没有形成有效的军事与政治能力，在一定程度上是美国没有全力支持之故；由于美国与该条约有关联（尤其是与英国所寻求的目标有关联），美国很容易遭到反西方的阿拉伯国家舆论，尤其是埃及舆论的全力抨击。最近一篇记述称“纳赛尔对巴格达条约的不断抨击，是……他越来越触怒西方和美国领导人的一个原因”（Eilts 1989：355）。

1956年的苏伊士危机所包含的因素有些与伊朗危机相同，但混合的方式却全然不同。中东的民族主义、共产主义幽灵、西方列强的干涉等因素全都在其中起作用。在苏伊士，如同在伊朗一样，对英国控制的资源——在这里是苏伊士运河——实行国有化是西方做出反应的起因。如果说伊朗危机是冷战时期新帝国主义首轮登场的话，那么

苏伊士危机则标志着老牌帝国主义在中东遭到了决定性失败。值得注意的是，在埋葬它的过程中，美国助了一臂之力，艾森豪威尔政府借此重新开始在该地区确立自己的影响。从超级大国政治的角度去看（在观察苏伊士问题的许多角度中，这只是其中的一个），需要回答这样一个问题：是什么原因使得美国在伊朗如此迅速而果断地采取行动去制止激进的民族主义，而在埃及却坚决地要与英国和法国类似的做法划清界限呢？

答案很简单。美国认为，在埃及事件中，如果赤裸裸地炫耀帝国主义的军事力量，共产主义将会坐收渔利。作为笼统的解释，这种说法比其他任何说法都接近于正确，但光靠这一点，很难说明这一事件的复杂情况。简单回顾一下这次危机的发展，我们或许能看得更清楚一些。

纳赛尔是在 1952 年反法鲁克一世国王的政变后上台的，1954 年他当了总理，次年成为总统。对内，他实行社会和经济改革，其中包括打破对土地的垄断、开垦新的田地，以及实行工业化计划，其做法与土耳其领导人阿塔蒂尔克 1920 年代和 1930 年代为土耳其现代化所确定的道路不无相似之处。这项计划的主要项目是在尼罗河上建一座水坝，地点在阿斯旺。有了这座水坝，就可以灌溉新的耕地，并且通过水力发电为工业发展提供电力。对外，他把政策的焦点集中到了从苏伊士运河区撤走 8 万名英军上。英国在那里驻军是根据 1888 年的一项协议做出的安排。作为运河的主要股东，英国根据该协议承担了运河的管理和防务任务，期满时间为 1968 年。

纳赛尔对其政策的两个部分都奉行得同样坚决。让英国撤军相对简单一些。根据 1954 年的英埃协议，英国应当于 1956 年年中从苏伊士撤走军队。这一协议明显对埃及的利益做出了相当的让步，但其中也含有对英国做出的保证，即倘若阿拉伯国家或土耳其遭到攻击，英国有权重返运河区。此外，在氢弹时代，遥远的军事基地似乎也有些过时。纳赛尔在这方面又表现得好像急于和英美两家都维持良好关系似的。在签订这份条约时，用一位英国官员的话说，他似乎是“我

们最理想的人选”（Louis 1989：46）。然而，英国撤军时正赶上纳赛尔推进他的另一个政策——为建设阿斯旺水坝寻找资金。这样一来问题就复杂化了，因为它又直接涉及美国利益。

1955 年，美国对纳赛尔和资助阿斯旺水坝之事的态度急转直下。究其原因，一是因为纳赛尔与捷克斯洛伐克进行武器交易谈判，二是因为纳赛尔强烈反对巴格达条约。1956 年 5 月，埃及承认了共产党中国，此举更加深了美国对纳赛尔的失望感。纳赛尔和伊朗的摩萨台一样，认为主权国家签署符合自己利益的协议，谈不上什么前后不一致的问题。可是，从美英两国的观点看，武器交易问题至关重要，它预示着要打破这一地区的军事势力平衡，而且明确违背了 1950 年的英、法、美三国宣言。这一宣言的目的，就在于限制将武器运往这一地区，除非是运给这几个大国。这样做可以预先防止阿拉伯与以色列之间的敌意进一步爆发。依照一位历史学家的说法，与捷克斯洛伐克的武器交易是导致“苏伊士危机的主要原因”（Hewedy 1989：162）。

如果说这是危机的主要原因，那么危机发生的时间很大程度上则与 1956 年夏天发生的几件大事有关。6 月 13 日，最后一支英军部队撤离了苏伊士基地。7 月 19 日，美国在几个月的拖延之后最终宣布，不为阿斯旺水坝工程提供资助，而纳赛尔却在美国拖延期间答应了美国提出的条件。最后一件是，7 月 26 日纳赛尔宣布将苏伊士运河收归国有。于是，严格意义上的苏伊士危机就此开始了。

后来发生的事人人皆知。试图通过谈判达成一项解决办法的努力持续了三个月，结果毫无进展；接着，以色列、英国和法国在 10 月底 11 月初联合发动了军事行动，想夺回运河，但效果欠佳；联合国在美苏两国的支持下出台了一份决议，要求实行停火并撤出入侵的军队；随后，英国、法国和以色列服从了联合国的决议。

美国的政策出自几个方面的考虑。最直接的是杜勒斯和艾森豪威尔对英国和法国不与美国磋商极为愤慨。其次是采取军事行动的时间与苏联镇压匈牙利起义的时间相巧合，搞得美国根本无法对在埃及采取的军事行动表示支持，因为其目的和苏联人在匈牙利是一样的，显

然都是为了把一名甚得人心的领导人赶下台。值得注意的是，艾森豪威尔在回忆录中叙述苏伊士危机时，不时夹杂着对匈牙利事态发展的剖析。他称那段时间是“我整个总统任期内最多事、最累人的三周”（Eisenhower 1966：58）。

再次，在艾森豪威尔看来，最主要的是，与英法协同行动等于把美国在中东置于站不住脚的境地。如果美国当初遵从了那些要求支持英法的建议，“会把我们引向何处呢？我们现在会不会和它们一样，成为动荡不安的阿拉伯世界中的一个占领国呢？如果是这样，我敢肯定，我们会后悔的”。至于“支持以色列”的要求，“如果政府在选举年连这种建议都推不掉，联合国以后还有什么影响力呢?”（Eisenhower 1966：99）。如果说在中东及其他地区的其他事情上没有这样，那么起码在这件事情上，艾森豪威尔政府把联合国的地位和作用拉来当了挡箭牌。这样，美国就可以放心地与英法两国的行动保持距离，又不必支持纳赛尔。后来证明，在美英很快开始的关系修复过程中，这一点很重要。可是，法国却再也没有恢复对美国的信任，而是在西方联盟的范围内迅速采取了独立的立场，并且加快了研制自己核武器的速度，并最终做出了部分退出北约的决定。

由于反对老牌帝国主义和维护联合国的问题更为突出，美国政策中的反共因素被部分遮掩住了。然而，它并没有消失。正如我们所见，在拒绝支持阿斯旺水坝的建设方面，它确实发挥着作用，加速了纳赛尔将运河收归国有的进程以及危机本身的变化过程。美国对苏联可能会利用这一危机的担忧，在美国倡议联合国大会做出停火和撤军决议的过程中也起着这样的作用。国务卿杜勒斯在国家安全委员会11月初的一份备忘录中写道，“要不惜一切代价，阻止苏联人虚情假意却不无诱惑力地向较小国家表示关心，以夺取世界的领导权”（Bowie 1989：210）。美国之所以倡议做此决议，旨在阻止苏联提出更严苛的方案。苏联方案的大致内容，从克里姆林宫致英国、法国和以色列政府的一封信中可见一斑。这封信在莫斯科的电台播出了。信中问道，“如果英国自己遭到一个更强大、拥有各种现代化毁灭性武

器的大国的袭击，它会处于什么境况呢？当然，这种国家是不会派遣海军或空军到英国的陆地上去的，它们会用其他的手段，譬如说导弹武器……我们完全有决心用武力打垮侵略者，恢复和平”（Campbell 1989：246－7）。在这种情况下，美国对联合国决议的支持等于采取了一个限制损害的做法。

美国同样将苏联一项挑衅性要求顶了回去，其内容是要求美苏联合出兵结束战乱。艾森豪威尔称这一想法“不可思议”。他警告说，“中东若再有新的部队进入，联合国所有成员国，包括美国在内，就得采取有效的对抗措施了”（Eisenhower 1966：90）。总之，美国的政策在形成过程中一直对苏联怀有戒心，防止苏联乘机利用据信是英国和法国所犯的严重错误。

正如赫鲁晓夫后来所言，对苏联来说，苏伊士危机是“一个历史转折点”。此前苏联一直认为近东是英法的势力范围，如今苏联也要担负起协助埃及和其他阿拉伯国家的“神圣使命”了（Khrushchev 1971：431）。赫鲁晓夫的措辞如何且不论，这番言语不是没有一定道理。通过支持建设阿斯旺水坝，苏联在中东和第三世界的其他地区确实赢得了巨大的信誉。另外，从赫鲁晓夫的讲话中也可以看出很多东西。最明显的一点就是，苏联共产党和激进的阿拉伯民族主义建立的伙伴关系，完全是为了某种利益的权宜之计。纳赛尔如果做得到，他是既不会充当美国利益的奴隶，也不会充当苏联利益的奴隶的。总的说来，他能够做到。其原因在于，无论纳赛尔怎么挑衅，苏联总是忍着不与埃及断绝关系。然而，“十年的努力，还有对阿斯旺水坝的经济资助，最后换来的政治报偿”，据说“十分令人难堪。埃及人在政治上几近忘恩负义，只在阿斯旺树了一座大纪念碑”（Eilts 1989：349）。1950 年代末 1960 年代初，在中东那种变幻莫测的氛围中，共产党在埃及、伊拉克和叙利亚的时运突然发生了逆转，苏联根本无力抵挡。1958 年 12 月，伊拉克发生了一次政变，政变领导人承认与苏联关系友好。纳赛尔感到十分吃惊，随即在埃及逮捕了数百名共产党人。在随后的几年里，埃及与苏联的关系明显比

较冷淡。直到1964年赫鲁晓夫访问开罗，表示决心阻止中国在中东不断扩张它的势力，双方的关系才得以改善（Nogee and Donaldson 1988：170－2）。

美国在中东所起的作用，同样深受苏伊士危机的影响。在谴责欧洲国家对埃及进行军事干涉的那两年，美国曾派遣海军陆战队去黎巴嫩，目的是阻止可能发生的反对亲西方政府的政变。黎巴嫩内部不稳定的状况和对外部压力的恐惧，再一次影响了美国的政策。信奉基督教的加米耶·夏蒙总统因谋求修订宪法，以便史无前例地参加第二个任期的竞选，惹恼了穆斯林。示威者在贝鲁特的街上对反对西方和亲纳赛尔表示声援。从外部看，由埃及和叙利亚合并而成的这个短命的阿拉伯联合共和国似乎预示着激进的阿拉伯民族主义在逐渐壮大，而且有望继续发展。最后，也是最重要的一点是，1958年伊拉克发生了一次政变。政变的结果是，亲西方的国王被赶下了台并被残酷杀害，左翼政府登上了权力的宝座。多米诺骨牌似乎开始倒塌了。于是，艾森豪威尔政府决定进行干预，以保住夏蒙总统的统治地位（Spiegel 1985：86－91）。

艾森豪威尔政府是打着所谓“艾森豪威尔主义”的旗号这样做的，这一主义形成于苏伊士危机结束后的那段时期，目的是填补英国和法国离去后留下的“真空”（这是阿拉伯民族主义者深恶痛绝的一种概念）。在请求国会批准这一新政策时，艾森豪威尔说：“美国必须抢在苏联之前去填补中东目前存在的真空。”决议规定设立一项特殊的基金，并规定必要时可以在中东动用军事力量（Eisenhower 1966：178）。实际上，就美国的政策而言，苏伊士危机的最终结果是把美国的地区性中东政策换成了全球性的冷战政策。这一模式在其他地区将会再现。

东南亚

美国一旦做出支持法国平定越南的决定，就等于承担起了一种义

务，而承担这种义务的后果——美国在东南亚实行遏制政策的失败，开始并未预料到。当我们回头去解读历史时，往往会像通常所做的那样，从美国1965年至1973年间在越南所承担的繁重政治与军事义务这一角度，去看待美国1950年代和1960年代初在东南亚的政策。这样去解读，有可能夸大越南早期对决策者的重要性，而低估周边环境的力量，即通过有力地保护日本、南朝鲜和国民党中国来对共产主义进行遏制所起的作用。美国在越南的投入，只是这些主要关注点的附带物。越南本身成为美国政策的焦点是在1960年代，其原因主要不是美国对越南或越南人有特殊的感情，其直接经济利益所占的比重也不大，更多的倒是认为胡志明那种共产主义色彩强烈的民族主义的存续和活力会对美国在东亚的更大利益体系构成威胁。美国所承担的义务是逐步升级的，一直上升到了南越的生存与美国遏制政策的可信性息息相关的地步。如果说美国也是像英国取得帝国疆土那样“一不留神”承担了它在越南那种拓宽了的角色，未免有些过分，但也不无一定道理。美国承担义务不是不遵从“逻辑性”，不过是在其他地方、其他时间和其他情况下罢了。

1945～1950年所发生的几件大事——中国的共产主义革命、苏联的原子弹试验，以及朝鲜战争的爆发——促使美国在印度支那的政策从暗中支持法国变成了向它提供物质援助。然而，为了让美国这种援助与它宣布的反殖民主义的立场相一致，美国仍坚决主张法国应逐步同意越南及其邻国老挝和柬埔寨独立。作为实现这一目标的折中方案，1947年，老挝和柬埔寨被准予在法兰西联邦内实行自治，流亡的越南国王保大1949年重掌权力，回去领导名义上独立的越南共和国。可是，这种花招既难掩盖国王是法国政策的工具这一事实，也解决不了法国人面对的政治或军事问题。

在政治上，由于明显依赖法国和缺乏越南人民的支持，保大很难有所作为。英国外交大臣安东尼·艾登曾指出，保大“宁愿待在赌场，也不愿去内阁会议室”（Edew 1960：80）。就连美国人都觉得难以把他当个人看。国务院一位亚洲问题专家说，他是“一个理应受

到嘲弄和轻蔑的人物，越南人也普遍对他这么看”（Karnow 1984：177）。不过，最糟糕的还是这样一个事实：胡志明是最知名、得到最广泛支持的越南民族领袖。1950 年，他宣布成立了越南民主共和国，并迅速得到了苏联和中华人民共和国的承认。正因为如此，美国才强忍住对保大的疑虑，给予他的政府以外交承认。在军事上，法国人的处境日益困难。法军 1946～1952 年的伤亡人数达 9 万，武元甲将军领导下的越南民主共和国军队对他们的压力越来越大（当时武元甲领导的军队所使用的战术后来用于对付美国军队同样奏效），法国国库日渐空虚，所有这些将法国的资源和国内政治稳定都推向了险境。越南战争爆发后，法国政府走马灯般地更迭不已。

根据马歇尔计划给予的援助于 1952 年结束后，法国支撑战争的能力大幅度下降。不过，在马歇尔计划的援助尚未到期前，杜鲁门政府就决定给予法国直接军事援助了。1954 年，美国已在支付越南战争 75% 的费用。此外，法国那时在战场上已深陷困境，正在谋求通过谈判寻找出路。

另外还有一些力量这时也在促成外交解决方案，最后在 1954 年 4～7 月就印度支那问题召开的日内瓦会议上终于有了结果。当时，斯大林之后的苏联领导人，依照苏联和平共处的政策，想寻求减少世界紧张局势的办法；中华人民共和国想证明自己是一个稳健而有政治风度的国家，同时也想证明自己是世界舞台上一支独立于苏联的政治力量（Karnow 1984：191－2）。这两个大国都准备对胡志明施加压力，促使他通过谈判结束战争。英国自有它寻求战争结束的理由，艾登早就在倡议瓜分越南了。他后来写道，“我主要关心的是马来亚。我想在那个国家尽可能往北的地方切实建立一道有效的屏障”（Eden 1960：87）。在西方列强中，美国最不愿意看到对共产党做出任何让步的解决办法。日内瓦会议之前，当越南民主共和国的部队收紧越南西北角上法国在奠边府地区驻军脖子上的绳套时，杜勒斯拼命说服英国同意用空袭的方式支持法国，另外还想立即组建一个地区性的安全组织，据艾登后来回忆，其目的是“使战争国际化”（Eden 1960：

103－4），结果这两件事都未成功（尽管英国准备在日内瓦会议结束后加入东南亚条约组织）。艾森豪威尔拒不赞成美国在既无盟国参加又得不到国会支持的情况下实施干涉，因此，美国只好勉强走谈判这条路（Ambrose 1984：178）。艾森豪威尔心里牢记着朝鲜的教训，最担心发生与中国作战的可能性。

1954年日内瓦会议的结果，肯定可以纳入战后时期最不令人满意的解决方案之列。没有哪一方感到满意，或许法国是个例外，起码它设法摆脱了难以维持下去的局面。即便如此，由于法军在奠边府的失败，会议期间发生了一次政府更迭，这才使法国接受了政治解决方案。谈判本身是在各方相互极不信任有时甚至是心怀敌意的情况下进行的。

谈判最后达成的协议没有以条约的形式出现，只有一组停火协定，以此结束了越南、柬埔寨和老挝的战争行动。另外还有一份《最后宣言》，里面规定了执行协定的具体方法。在越南，法国人同意将军队撤到17度线以南，越南民主共和国同意撤到该线以北。该线两边的地区都不许再进入其他部队。两年内在全越南举行大选，以实现国家统一。选举过程要在一个国际管理委员会的监督下进行。美国没有签署其中任何一份文件，并表示《最后宣言》中的某些部分与己无关（西贡政权也做出了这种表示）。不过，美国在一份单独声明中保证，它将遵守这些协议。

因此，日内瓦协议充满了意义含糊之处和留有余地的保证。权宜性的暂时安排终将演化成势力范围的固定划分，这一点在世界其他地区已屡见不鲜，越南的事态发展同样没有跳出这个模式。吴庭艳总理——1955年在公民复决中将保大废黜后任总统——根本无意举行全国范围内的选举，美国也没有压他这样做。据说，如果举行普选，胡志明可能会拿到80%的选票。艾森豪威尔在他给首位驻“自由越南”大使的一份备忘录中写道，美国的越南政策是“在越南维持与支持友好而独立的非共产党政权，协助减少并最终根除共产党的颠覆活动和影响”（Ambrose 1984：215）。1954年年底，艾森豪威尔批准

成立美国驻南越军事顾问团，中央情报局也启动了支持吴庭艳与暗中破坏越南民主共和国的计划。吴庭艳总统像保大先前一样不愿听从美国的支配，只是方式不同罢了。不过到头来他还是变成了美国在越南奉行遏制政策的政治工具。尽管他既腐败又专横，但只要看上去还能在南越维持正常局面，美国就支持他。但当他的统治在1963年发生动摇时，美国就密谋将他赶下台并把他杀掉了。

胡志明则通过实行土地改革计划和残酷镇压一切为法国卖过力的嫌疑分子巩固了自己在越南北部的地位，而且他还设法拉苏联人支持他解放越南南方的计划，后一点他在1957年访问莫斯科期间做到了。苏联的援助很快开始与中国的援助并驾齐驱。不过，对后来战争进程发展最为重要的是他1957年下达的在南方建立共产党军队的指示。由于认为采取革命行动的时机尚未成熟，此前他一直没有命令其军队向吴庭艳政权开战。但是，他最终无法抵挡南越共产党（即“越共”）要求对吴庭艳政府采取军事行动的压力。1960年年底，胡志明筹划组建了南越民族解放阵线，全面展开了重新统一祖国的政治与军事斗争。肯尼迪就任总统时，北越已做好准备（Karnow 1984：237－9）。美国若继续维持在南越的地位，付出的代价可要大大增加了。

胡志明从外部和内部破坏西贡政权的能力，使越南冲突与其他地区的冷战冲突具有迥然不同的特色。在朝鲜和欧洲地区，分界线一旦划定，便会相对稳定下来，而且能防守住。在越南，17度线与周围的非军事区根本挡不住北越从老挝和柬埔寨向里渗透（比较而言，南北朝鲜之间的38度线相对保险一些，因为它横跨整个朝鲜半岛）。因此，胡志明总能利用越南南北界线的可渗透性，从老挝和柬埔寨境内施加压力，达到他在越南的目的。胡志明对老挝共产党组织巴特寮的支持是他整个战略中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Smith 1983：169）。肯尼迪上任时，他在东南亚最担心的其实是老挝，而不是越南。日内瓦协议达成后在老挝夺取政权的亲西方政府已于1960年被中立集团推翻。肯尼迪上任后的头一年，由于美国仍在支持被赶下台的政府，巴特寮与中立主义者结盟，苏联和中国在支持反美集团，因此老挝实际

上处于一种内战状态。美国曾考虑过进行干涉的可能性，但随后又将其否定了。由于入侵古巴时在猪湾发生的那种灾难性场面依然历历在目，而且派军队深入老挝境内，后勤供应有很大困难，这两点促使肯尼迪决定通过谈判解决老挝问题。于是，有关各方重返日内瓦，于1962 年拿出了一份脆弱的老挝中立化协议。

如果说老挝问题的结局起到了什么作用的话，那就是使肯尼迪把注意力转到了越南，将越南作为东南亚问题的关键来看待了。考虑到这个国家的地缘政治划分，似乎不可能找到一条不将权力拱手让给共产党的中立解决办法。吴庭艳对老挝问题解决办法的反应是怒不可遏，他不断向美国人施加压力，希望美国继续承担对自己政权的义务。1961 年夏初，肯尼迪决定派副总统林登·约翰逊到南越做一趟实地调查。约翰逊带回来的意见十分明确。他在返回后写的报告中称："美国需要做出基本的决定：是打算采取大规模行动支援该地区的自由之师，迎接共产党目前在东南亚进行扩张带来的挑战，还是干脆认输了事……我建议，我们拟订一份明确而有分量的计划"（Williams *et al.* 1989：194）。同年晚些时候，马克斯韦尔·泰勒将军和总统的国家安全顾问沃尔特·罗斯托又去了一次南越，拿出的意见与约翰逊的相同，并具体提出了派遣 8000 名美国军事顾问奔赴南越的建议，认为舍此便有失去南越的危险。

肯尼迪以他特有的谨慎对这些意见做出了反应。无论吴庭艳这个盟友多么令人反感，都必须支持他，这一宽容的看法被肯尼迪接受了，但他不愿意发动一场看不到头的全面战争。他决定采取的策略包括三个方面：第一，压吴庭艳实行改革，希望南越能借此恢复政治稳定；第二，增加在南越的美国军事顾问的人数，尤其是增加在那里的受过低强度反暴乱作战训练的新型特种部队的人数；第三，采用英国人在马来亚发明的"战略村"计划，把农民从分散的农村集中到比较容易防守的筑垒中心去，以此来孤立越共，打击越共在南越村庄里的支持力量。1962 年年底，美国军事顾问的人数增加了三倍，达到了 9000 人（Herring 1979：85－7）。

正是由于这三个方面的政策均未产生理想的效果，才最终导致约翰逊总统 1964 年决定将美国的干预行动升级为大规模政治与军事义务。吴庭艳极力抗拒成为美国政策的工具，他试图将国内不满的将军、佛教徒和中产阶级专业人士抗议的呼声镇压下去，孰料国内的不稳定局面有增无减。1960 年，他躲过了一次政变，1962 年又逃过了一次暗杀。1963 年，美国已对他彻底不抱幻想，支持一伙将军将他推翻并暗杀了。从军事上说，在越共的进攻和北越的渗透日益加剧的情况下，采取这种反叛乱行动好处甚微。越共 1963 年 1 月袭击了西贡西南 40 英里处的北村。在这次袭击中，一支小小的越共游击队打败了一支规模大得多的南越部队。此事在华盛顿引起了极度恐慌，在越南的美国军事顾问们也为之沮丧（Sheehan 1989：Book Ⅲ）。另外，战略村计划也没有产生理想的效果，部分原因是无法将越南老百姓和越共区别开来（这点与马来亚不同，那里的叛乱分子全是华裔）。另据称，战略村计划常常引起它要保护的人的敌意，反而“把老百姓变成了越共的同情者”（Karnow 1984：257）。

这时，美国政策所面临的问题是，要么把南越放弃给共产党，要么发动大规模攻势打败越共和越南民主共和国，在这两者之间似乎没有稳妥的第三条路可走。期望吴庭艳可以在南越为美国利益服务的这一幻想的破灭产生了十分重要的影响，它带来的结果是，美国不是减少而是更深地卷入了南越的内部事务。常常有人指出，“渐进主义”最能说明 1960 年代中期局部与地区性冲突变成冷战主战场过程的特点。找到一名足以为美国利益服务的南越领导人这种政治需要，与平定这一地区的军事需要这两者都是当务之急，难分轻重。实际上，这两点都导致了战争美国化。越南战争与朝鲜战争有一点很大的不同，那就是法国和英国都拒绝与美国一起干，不管是打着东南亚条约组织的旗号①，还是单独以承担条约义务的名义。林登·约翰逊在 1961 年南越之行后写

① 越南、老挝和柬埔寨都不是该组织的签署国，但均被包括进该条约规定的安全区内。

给总统的报告中承认，东南亚条约组织已经形同虚设。他断言，“东南亚的领导权非美国莫属”（Williams *et al*. 1989：192）。从此以后，美国的政策就被美国在南越所采取行动的合法性问题搅得一团糟。

如果肯尼迪还活着，他是否会像约翰逊一样把战争扩大到这种地步，这一点很难断言。肯尼迪 1963 年 11 月去世时，美国在南越的军事顾问人数已经增加到了 1.5 万人，而且早已直接参加了作战行动，有的是作为直升机和轰炸机驾驶员，有的是直接指挥地面作战。美国政策在相当程度上是受敌方军事行动水平左右的（可惜，人们经常忘记这是推动美国政策的一个主要因素）。从这一点来看，似乎有理由认为，肯尼迪至少也得面对约翰逊 1964 年面对的同样抉择：要么设法从越南撤出，以便减少美国的损失；要么扩大美国的投入。而遏制战略的发展势头和实行理由使这两项选择中的头一项越来越难以被列入当时美国政府的考虑范围。

拉丁美洲：危地马拉与古巴

美国对干涉拉丁美洲似乎比对干涉世界其他地区的异议要少，因为地理条件和传统决定了美国对这一地区具有特殊的兴趣。即便没有共产主义幽灵在徘徊，1959 年菲德尔·卡斯特罗在古巴发动革命时，美国是否会袖手旁观，对此问题难以解答。实际上，古巴革命最初并不是以共产主义的名义爆发的，取得胜利也没有靠苏联的援助。然而，冷战的痕迹在美国决策过程中实在太重了，早在这次革命前，凡是拉美国家对美国利益有影响的改革行为，都会被贴上冷战的标签。古巴革命之前最重要的例子，当属 1954 年的危地马拉。

了解伊朗的情况之后，我们也就不难理解危地马拉事态发展的大致模式：右翼亲美独裁政府被保证实行改革的领导人推翻，继而是政治和经济混乱，最后是在艾森豪威尔政府的支持下通过政变将改革者赶下台，独裁统治恢复如旧，只是细节上略有不同而已。关于事情的来龙去脉，艾森豪威尔是这样叙述的：

> 动乱的状况持续已久，可以追溯到九年前的危地马拉革命。那次革命发生在1944年，结果是独裁者豪尔赫·乌维科将军被推翻，此后共产党就忙着搞煽动，忙着渗入工会、农民组织、报界和电台。1950年，有个叫阿本斯·古斯曼的军官掌了权。不久，他的行为便引起了人们强烈的怀疑，觉得他不过是共产党控制的一个傀儡罢了。
>
> （Eisenhower 1963：421）

在艾森豪威尔看来，怀疑不久就变成了现实。阿本斯没收了联合水果公司名下22.5万英亩闲置的土地，又制定了《土地改革法》。联合水果公司是最大的香蕉生产商，而香蕉占危地马拉出口总量的40%；这家公司还拥有该国42%的土地，并控制着运输系统的大部分（LaFeber 1993b：118）。阿本斯否认他的政府是共产党政府，但艾森豪威尔在他的记述中将这一点“推翻了”。他援引了两位美国官员的说法。第一位是美洲事务助理国务卿约翰·穆尔斯·卡伯特。他“公开说，危地马拉是‘公开在耍共产党的把戏’”。第二位是新任命的大使约翰·普里福伊。他宣称，“我觉得这个人（阿本斯）思想像共产党，说话像共产党。如果他真的不是，共产党没出现之前，他也称得上是了……我表达了这种看法：共产党在危地马拉的影响若不受到抵制，不出六个月，危地马拉就会完全落入共产党手中”（Eisenhower 1963：422）。

即使这种证据很难取信，情况依然是这样：阿本斯像摩萨台在伊朗一样获得了共产党对他的改革计划的支持，教育部和工会也都是由共产党占据主要职位。然而，1954年的情况却表明，阿本斯政府和他的改革计划似乎既没有为共产党所把持，也没有接受苏联的援助。连杜勒斯都承认，“不可能找到能明确将危地马拉政府与莫斯科联系在一起的证据”（LaFeber 1993b：124）。此外，我们很有必要拿这类所谓共产党影响的证据与早在1950年阿本斯当选之前美国政府和联合水果公司严格奉行的排外政策做个比较。在美国的指使下，世界银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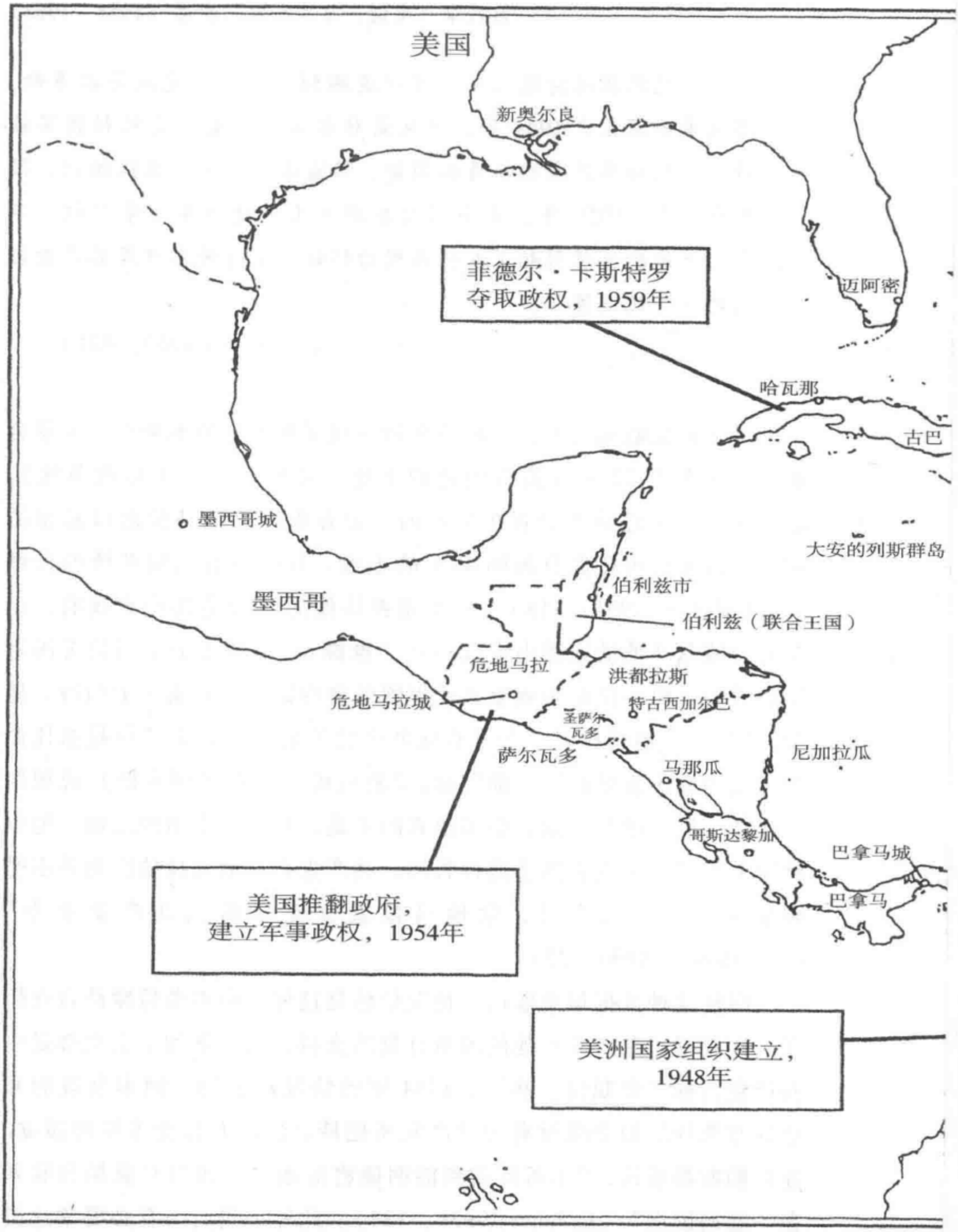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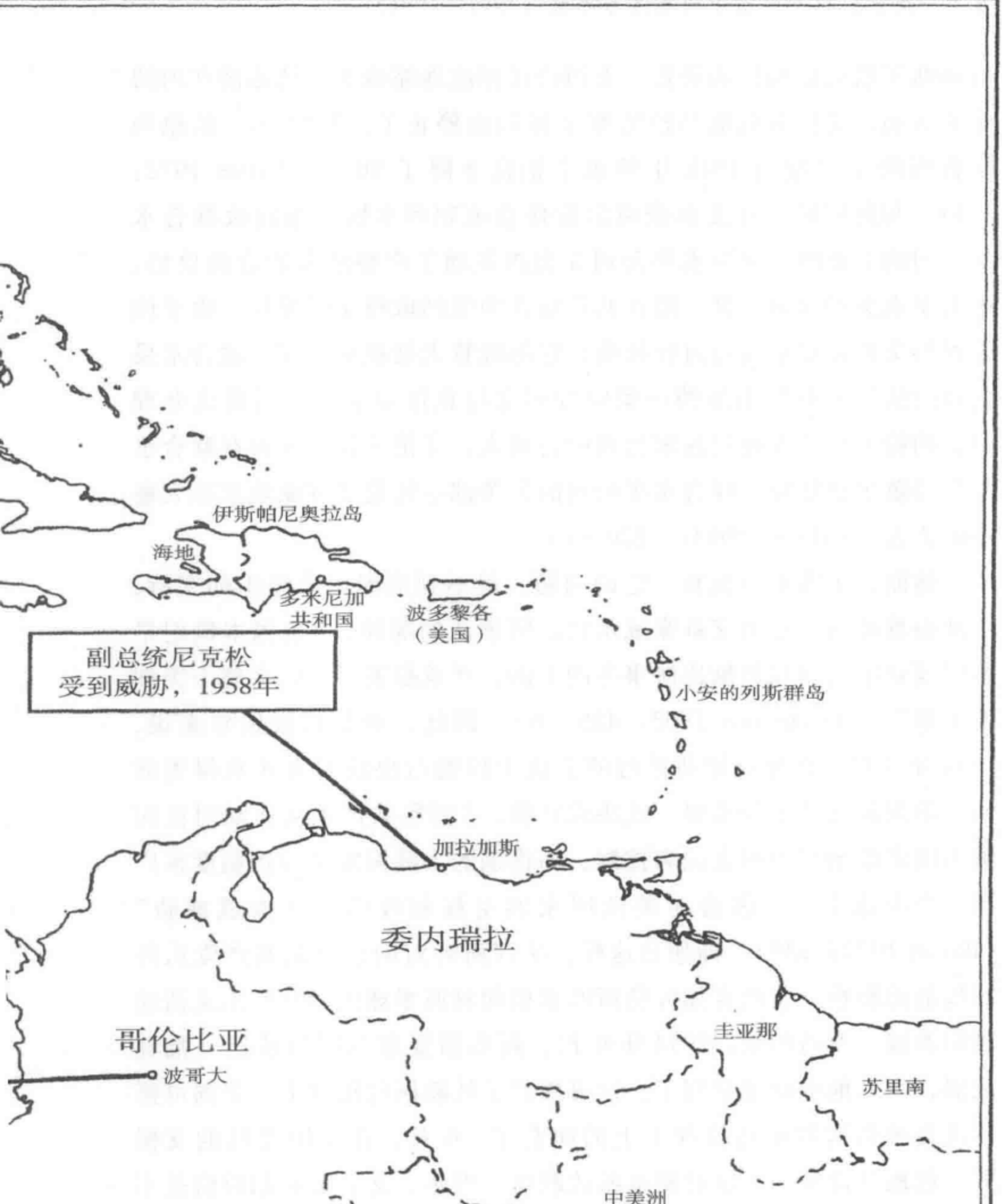


图8.2　1940年代与1950年代美国在中美洲

资料来源：W.拉夫伯：《不可避免的革命：美国在中美洲》，纽约，诺顿出版公司，1993，第88~89页。


伊斯帕尼奥拉岛
海地
多米尼加
共和国
波多黎各
（美国）
副总统尼克松
受到威胁，1958年
小安的列斯群岛
加拉加斯
委内瑞拉
哥伦比亚
波哥大
圭亚那
苏里南
中美洲

行切断了给危地马拉的贷款，美国公司相应地缩减了包括旅游在内的业务活动，美国对危地马拉的军事援助也停止了。1952 年，危地马拉香蕉的出口量与 1948 年的水平相比下降了 80%（Barnet 1972：234）。与此同时，在艾森豪威尔就任总统和阿本斯宣布没收联合水果公司的土地时，联合水果公司在美国发动了声势浩大的宣传攻势，竭力要求美国出面干涉，阻止共产党在中美洲取得主导地位。由于该公司与艾森豪威尔政府过往甚密，它的胜算无疑就增加了。联合水果公司的法律事务是由纽约一家叫沙利文与克伦威尔的公司负责办理的。约翰·杜勒斯曾是这家公司的合伙人，艾伦·杜勒斯曾在联合水果公司董事会任职，联合水果公司的公关部主任是艾森豪威尔私人秘书的丈夫（LaFeber 1993b：120－1）。

然而，干涉本身也有一定的问题。得不到美洲国家组织的支持，干涉很难成功。正如艾森豪威尔自己所承认的那样，“美国本世纪早些时候对中美洲和加勒比海事务的干涉，严重损害了我们在整个美洲的形象”（Eisenhower 1963：425－6）。因此，对艾森豪威尔来说，1954 年 3 月，在加拉加斯举行的会议上以通过决议的方式获得美洲国家组织的支持十分重要。该决议宣称，“国际共产主义运动对任何美洲国家政治机构的支配和控制，即将别的大陆国家的政治制度推广到这个半球上来，都会对美洲国家的主权和政治独立构成威胁”（Barnet 1972：235）。即便是这样，决议所针对的也只是共产党从外部施加的影响，并没有如杜勒斯所希望的对西半球内的共产主义活动表明态度。不巧的是，1954 年年初，阿本斯要求苏联给他运一批轻武器，而且他也确实拿到了。这可撞到了杜勒斯的枪口上，美国可抓住机会来勒紧危地马拉脖子上的绳套了。6 月，在美国飞机的支援下，危地马拉发生了反对阿本斯的政变。当然，艾森豪威尔政府是不会公开承认美国在其中扮演了角色。阿本斯决定向由工人和农民组成的民兵发放武器，危地马拉军队得知后背叛了他，他的垮台也因此而成了定局。取代他的卡斯蒂略·阿马斯将军是美国人训练的，他立即采取行动，扭转了阿本斯的改革势头。与此同时，美国的援助大量流

回危地马拉，联合水果公司也恢复了以往的垄断地位。1954 年 6 月 30 日，杜勒斯在一次电视讲话中佯称，“局势是由危地马拉人自己扭转过来的”（Ferrell 1975：223）。

事实上，人们根本无从得知“危地马拉人自己”喜爱的决议是何种模样。许多因素加在一起所产生的影响使危地马拉及其邻国对主权这个概念不能不产生怀疑。这些因素包括：门罗主义及其罗斯福推论，在冷战气氛中把外部共产主义的影响和国家内部改革不加区别地强行连为一体的做法，以及中美洲各国在经济上相对弱于北边那个美洲庞然大物这个简单明了的事实，等等。需要指出的是，在这次事件中，洪都拉斯和尼加拉瓜都起到了美国训练危地马拉政变分子的训练场和补给站的作用。美国的民主和国际共产主义一样，当觉得它们的关键利益可能受到威胁时，都是没有国界的。

我们很容易把美国在古巴的政策归为危地马拉模式，但它有一点显著的不同：在古巴，这种政策失败了。不过，这样说有点低估艾森豪威尔政府 1950 年代末对拉丁美洲政策所做的重点转移。据沃尔特·拉夫伯所言，这一转移的大环境是两大阵营原有的两极冷战逐渐消失，代之以超级大国之间的形式更为复杂的竞争。这种竞争的特点是：苏联开始实行通过援助和贸易方式谋求扩大影响的新政策；苏联不断加强军事装备和尖端科学的发展，以及日本和欧洲共同市场的发展对美国经济霸主的地位形成了挑战。1950 年代，美国接连出现衰退，国际收支情况日益恶化。这些都表明，无论是政治利益还是经济利益本身，都要求在一个稳定的拉丁美洲实行更为开明的政策，以促进南美大陆的经济发展（LaFeber 1993b：140－1）。应该强调指出的是，这丝毫不意味着冷战的停止。如果一定要说意味着什么的话，那就是竞争更激烈了，因为冲突的领域扩大了，各方也都在寻求新的竞争形式。1958 年 5 月，理查德·尼克松副总统断言，“共产主义的威胁在拉丁美洲比以往任何时候都严重”（Eisenhower 1966：520）。

实际上，副总统尼克松 1958 年在拉美各国灾难性的“友好”之行，是导致美国政策发生变化的一个很重要的直接原因。除了在尼加

拉瓜之外，各处迎接尼克松及其夫人的都是程度不同的反美示威游行，最糟糕的是在加拉加斯。人们朝他们的车队扔石块、吐口水，尼克松还险些被暴民从车里拖出去。这次事件，据尼克松后来回忆说，是他政治生涯中堪称决定性事件的“六大危机”之一。他写道：“加拉加斯给了我们极大的震惊，这一惊我们十分需要，它把我们从危险的盲目自满中惊醒了。”他一回到华盛顿，便提出了一系列建议，包括努力与拉美的舆论制造者建立联系，制订拉美经济进步新计划，尽量远离独裁者而支持真正的民主领导人，同时要认清不适合照搬美国模式的特殊情况，最重要的是要“尊重（拉丁美洲的）传统、价值观念和风俗习惯”。或许是为了使与他共同参与决策的人相信他没有无视现实，他又强调指出，军事援助对确保稳定同样不可或缺。他说，拉丁美洲人民“想站在正确的一边，但他们同样想站在胜利的一边”（Nixon 1962：229－30）。

尼克松指出，并不是所有这些建议都被采纳了，但与其他方面的影响联系起来看，他的建议还是有一定成效的。拉美国家一直想建立一个地区性的银行机构，补充世界银行和进出口银行的不足，美国多年来就是不同意，1958 年却同意建立美洲开发银行了。美国还支持建立了地区性共同市场，并制定了商品稳定协议，目的在于使一直起伏不定的主要产品价格稍稍有所稳定，因为这些产品是很多拉美国家的主要资源。艾森豪威尔政府还有意做出了一些拒绝无条件支持独裁者的表示。对于富尔亨西奥·巴蒂斯塔利用从美国获得的武器（包括B－26轰炸机）镇压反对其政权的游行者一事，艾森豪威尔做出的反应是下令禁止再往古巴运送武器（Rabe 1988：Ch. 6）。与此同时，1959 年约翰·福斯特·杜勒斯去世后，克里斯琴·赫脱继任了他的职位，此人比杜勒斯更愿意接受这些措施。肯尼迪所说的“进步同盟”，在他就任之前其实就已经形成了。

菲德尔·卡斯特罗 1959 年元旦在古巴登上权力宝座时，正值美国的政策在这些方面发生转变之际。因此，古巴革命对美国的政策来说是一场特别严峻的考验。从某种意义上讲，它证实了美国对拉丁美

洲的态度发生了改变的估计。从这场革命中可以看出，独裁政府在民众的不满面前是多么软弱无力，所以需要制定消除这类危险的政策。从另一方面讲，由于这场革命胜利地达到了当前目标，也由于苏联从这一成功中得到了很多回报，美国的决策者又决心启用先前指导过美国在危地马拉行动的排外政策和干涉主义政策，结果是政策上的任何革新都得首先考虑防止共产主义蔓延这个传统的先决条件。卡斯特罗搞的这场革命表明在美国的政策中还是传统的东西获胜。从这个意义上说，“进步同盟”从一出世就注定不会有所作为。不过，这么说也有点言过其实。在古巴革命的头一年，卡斯特罗曾流露过不想与两个超级大国中的任何一个拴在一起之意。他上台后选定的政治方向是什么呢？他最终和苏联结盟，是不是美国的政策把他推过去的呢？这些问题一直萦绕在历史学家的心头，对哪一个问题都找不到绝对肯定的答案。

关于第一个问题，卡斯特罗宣称，在刚上台及上台后那几个月，他并不是一个共产主义者。直至1959年11月，美国一些官员，至少包括中央情报局的一些官员，还不相信他是共产主义者。赫鲁晓夫后来回忆说，卡斯特罗对他们来说是一个未知数，起码在革命后一年的时间里，他在处理与苏联的关系方面非常谨慎（Smith，W. 1987a：43－5；Ambrose 1984：555－6；Khrushchev 1971：488－90）。卡斯特罗最初的经济政策和社会政策——包括土地改革和对美国公司征税在内——都是改良性的，不是革命性的。开始美国并不是完全反对，尽管在美国财产的赔偿安排上存在一些问题。卡斯特罗掌权后，很快就给了共产党以合法地位，但他的政府并不是由共产党控制的。他推迟已答应进行的选举，又大力清洗巴蒂斯塔的支持者，这些都是独裁政府的早期表现，但未必是共产党政府特有的表现。当然，卡斯特罗有可能是在玩骗术，他后来也说过，他一直是共产党人，但这种说法本身也有可能是为了自圆其说，是一种“转弯抹角地表示意图前后一致”的方法，目的是事后能为他选择的航向找个正当的理由（Smith，W. 1987a：45－9）。

然而事实是，1959年年底卡斯特罗转向苏联，走上了与美国相撞的道路。在美国财产补偿问题上的争吵不休，华盛顿对古巴贷款要求的拒绝，以及1960年2月4日苏联部长会议副主席阿纳斯塔斯·米高扬到古巴进行贸易谈判时受到的热情接待，似乎都表明卡斯特罗已决心依靠苏联的帮助了。2月底，卡斯特罗最后一次解决他与美国之间分歧的尝试遭到断然拒绝。一个月后，在美国与古巴那种一触即发的相互指责气氛中，一艘法国军火船在哈瓦那港口爆炸了，卡斯特罗认定是美国破坏分子所为（Miller 1989：73－5）。不久，卡斯特罗收到了东欧集团运来的石油和武器。5月，古巴和苏联正式建立了外交关系。美国随即与古巴断绝了实际经济往来。作为报复，卡斯特罗将美国在古巴拥有的所有工业、银行业和土地业收归国有（Smith, W. 1987a：52－8）。

美国当时对卡斯特罗的反应如果温和一些，两国间是否有可能达成妥协呢？对于这个问题，肯定很难有一个确切的答案。有关共产主义的问题恐怕在重要性上不及下面这件事：卡斯特罗要解决的国内问题，就像以前及后来拉丁美洲那些激进的改革计划一样，一定会引起美国人的反对。是共产党也好，不是共产党也罢，1959年1月时，他的计划无疑十分激进，共产主义这个因素不过是使两国利益冲突更加尖锐而已。有一位苏古关系专家认为，卡斯特罗1959年的转变是两个因素合力促成的，一个是古巴国内要求实行根本性变革的压力越来越大，一个是对1954年危地马拉事件仍记忆犹新，担心美国会直接进行军事干涉。当“双方发出的信号相互矛盾时……两国若处于一触即发的气氛中，各方情愿去注意敌对的迹象而忽略其他”（Miller 1989：66－7）。

然而，还有一种看法同样值得我们注意。这种看法是由一位前美国外交官韦恩·史密斯提出来的，古巴革命期间他就在古巴。他认为，将卡斯特罗推向苏联怀抱的是卡斯特罗的对外目标，而不是他的国内目标。上台伊始，他就希望古巴革命事件会在其他拉美国家重演，从而把他推上“拉丁美洲革命集团领袖而不是加勒比海小岛领

导人”的宝座，成为一个恩克鲁玛或纳赛尔式的极富性格魅力的领袖人物，这种幻想激励着他。当他预想的革命没有成为现实时，考虑到不可避免地要与美国的势力发生对抗，而且美洲国家组织内部对他的意图的怀疑也越来越深，于是卡斯特罗被迫转向了苏联。赫鲁晓夫这时正谋求在第三世界进一步扩大影响，而且还在1960年11月于莫斯科召开的81国共产党会议上表明了这种意向。卡斯特罗这一转变，与赫鲁晓夫的计划正好一拍即合。卡斯特罗1961年4月在古巴实行了全盘苏维埃化，之所以比单纯寻求援助走得更远，原因是他急需军事保护。史密斯指出，“卡斯特罗在猪湾事件的前夜宣布实行社会主义，这不是偶然的。他知道入侵即将发生，无疑也预料到了必将面对美国势力的全力冲击……这样，他认同社会主义的背后动机就昭然若揭了。实际上，他是在对苏联人说：‘我和你们一模一样，是个不折不扣的马克思列宁主义者；如果美国人进攻我，你们可得帮我防守呀’”（Smith，W. 1987a：50，53－4）。

这两种解释或许并不相互排斥。美国的推动因素确实引来了苏联人，更确切地说，导致了苏联人不得不被拉进来的必然后果。不过，史密斯在记述中是把卡斯特罗作为古巴与美国对峙中一个显然十分活跃的人物来描述的。此外，他的记述有助于我们了解美国反应措施的冷酷无情和苏联在冒险保卫古巴方面的心甘情愿。新组成的肯尼迪政府试图在1961年4月的猪湾入侵中搞掉卡斯特罗的拙劣做法和次年苏联人在古巴部署导弹一事，分别以各自的方式映照出卡斯特罗在国内巩固政权方面取得了成功，证明他坚定地与苏联结盟的决定是正确的。如果说这场危机最终使苏联的导弹被撤走了，它同时也使美国做出了不会入侵古巴的保证。简言之，或许可以说，卡斯特罗既被超级大国之间的关系所制约，同时也是它们之间关系的制约者。

毫无疑问，美国当初若准备对古巴实施大规模入侵，赫鲁晓夫一定会坐山观虎斗，还会在宣传上坐收渔利，让美国人赤裸裸的侵略表演在世界舆论面前曝光。实际上，美国势力所受的限制，还为赫鲁晓

夫开辟了其他机会，他当然是高高兴兴地照单全收了。从长远的观点看，苏联得到的好处是否大于它维持古巴花去的费用，这一点尚不得而知。尼古拉·米勒写道，“除了经济负担之外，苏联与古巴的关系还对苏联与其他第三世界国家关系的发展造成了影响”，保守政权、左翼分子（和卡斯特罗一样）对于苏联在美国的压力下从古巴撤走导弹感到非常失望。他们认为，从他们自己经济发展的角度来讲，像古巴这种经济上几乎完全依赖苏联的模式是不可取的（Miller 1989：126）。

非洲：刚果

比利时1960年6月突然出乎意料地决定同意刚果独立，这引起了二战后一场最激烈、最混乱的冲突。由于两个超级大国在刚果都没有重要的经济利益，从这个意义上说，它们显然对此没有什么直接兴趣。然而，这一危机爆发之时，正值美国和苏联都重新争取在第三世界赢得影响之际，而且又处于它们之间关系的关键时刻。巴黎最高级会议刚刚因U－2飞机事件被迫中止，使缓和与很快签订部分禁止核试验条约的希望化为了泡影。英国首相哈罗德·麦克米伦1960年7月在日记中写道，国际气氛“与1914年酷似……如今刚果也许会扮演塞尔维亚的角色。要不是双方都对核大国心存畏惧，我们或许极易重蹈1914年的覆辙”（Mahoney 1983：34）。

联合国在刚果所起的作用使得情况进展与1914年有很大不同。由于有不少相互冲突的力量在起作用，联合国担负的任务并不令人重视。刚果独立没几天，比利时军官手下的刚果士兵便发生了哗变，加之比利时国民在刚果各地受到威胁，比利时军队随即又重返刚果。骚乱初起时，矿产丰富的南方省份加丹加在比利时的默许下分裂出去了。它的退出，等于是在比利时和其他西方矿业利益集团的支持下建立了一个对立的权力中心。联合国最初受命进行的工作，按照联合国秘书长达格·哈马舍尔德的解释，至少是谋求恢复秩序和让比利时撤

军，但不能卷入刚果的内部事务，即不能去协助中央政府收回加丹加。在这种情况下，刚果总理帕特里斯·卢蒙巴请求美国支援，但遭到了拒绝，理由（据杜勒斯所言）是卢蒙巴已经“被共产党收买”，杜勒斯认为，卢蒙巴成功地从苏联获得军事援助即是证明。这样一来，一场本已混乱不堪的非殖民地化斗争，很快又加入了超级大国之间的冲突（Mahoney 1983：37－41）。

此后发生的三件事对理解美国和苏联在刚果的行动十分重要。第一件是苏联与联合国之间的冲突。该冲突是在哈马舍尔德决定对除联合国飞机外的所有飞机关闭机场后发生的。机场一关闭，苏联飞机就无法被派去援助卢蒙巴了。于是，赫鲁晓夫发起了一场反对联合国的运动，他认为联合国是维护西方在刚果利益的工具。为了解决刚果问题，他竭力敦促联合国成立一个三人领导小组，这个小组由“资本主义国家、社会主义国家和这两者之间的那些中立的国家（已经把自己从殖民主义者手中解放出来但尚未结盟的国家）各出一人组成”，结果赫氏枉费了心机（Khrushchov 1974：483）。第二件事是卢蒙巴与联合国的冲突，冲突的焦点还是集中在哈马舍尔德身上。卢蒙巴指控他与比利时人搞阴谋。有人说，卢蒙巴决定与联合国决裂，是“他短暂的生涯中犯下的致命错误……邀请苏联进行干涉，他自己就成了冷战的工具——并最终成了冷战的牺牲品”（Mahoney 1983：45－6）。第三件重要事件是由前两件事派生出来的，那就是，美国越来越认定必须把卢蒙巴赶下台。1960 年 9 月，卢蒙巴被卡萨武布总统解除职务，由蒙博托上校代替。在肯尼迪就任总统后不久，中央情报局协助暗杀了卢蒙巴。暗杀所造成的众多后果之一是，这位象征黑人民族主义的代表人物的死亡在美国激起了种族暴力活动的大爆发（Mahoney 1983：47－8，69－70，72）。

卢蒙巴之死并没有使问题立即得到解决。恰恰相反，据迪安·腊斯克回忆，如果说 2 月的“局势一团糟”，卢蒙巴被暗杀后，“局势只能说是雪上加霜”（Rusk 1990：277）。到 1961 年年中，除了摩西·冲伯领导的已分裂出去的加丹加省外，声称对整个刚果享有统治

权的有两个政府：一个是利奥波德维尔的蒙博托政府，另一个是在斯坦利维尔的由卢蒙巴先前的支持者安托万·基赞加所领导的政府。另外，卢蒙巴之死导致哈马舍尔德的政策发生了显著的变化，他不得不要求联合国发挥更为突出、更加积极的作用，希望以此赢得联合国这个组织内声势越来越浩大的非洲和亚洲代表的支持，同时能够在超级大国面前保持行动的自由。在非洲和亚洲的舆论看来，分离运动是西方帝国主义的产物（Holland 1985：188）。哈马舍尔德对加丹加施加军事与外交压力的决定获得了亚非舆论的赞同，却给美国添了乱，因为美国担心这种政策为苏联人所利用（Mahoney 1983：94－8）。结果，1961 年 9 月，哈马舍尔德本人在从刚果飞往北罗得西亚会见冲伯的途中死于飞机失事。

用一份记述中的话说，哈马舍尔德之死于华盛顿“有一种宣泄效果”（Mahoney 1983：110）。不过，到他死时，他的政策已经形成了势头。美国不顾欧洲的反对，对联合国的一份新决议表示了支持。该决议要求联合国加大力度，终止加丹加的分离运动，阻止基赞加提出领导权的要求。1961 年年底，两个目的均已达到，尽管只是暂时性的。1962 年，冲伯重开内战，终于在 1963 年 1 月将加丹加地区重新纳入了刚果的版图。即便是在那时，亦不免风云再起。辛巴的反叛者（大体属于卢蒙巴的拥护者并得到苏联的支持）发动了反中央政府的起义，还抓了数百名西方人当人质，其中主要是比利时人。这次起义被美国飞机运进去的比利时伞兵镇压下去了。

因篇幅所限，许多事态发展过程和美国对刚果政策的转折变化只能一带而过，不过从大致脉络来看，整个结果还是清楚的，尽管其含义复杂纷呈。美国和苏联最初的干涉，在非洲政治的血管中注射了一针作用强劲的冷战剂。然而，美国继后的政策认识到了非洲民族主义的力量，同时也看到了联合国在避免美国采取脱身而出或直接干涉之类极端措施方面的作用。“肯尼迪在非洲的行为记录”，马奥尼总结道，“清晰地显示出属于例外，不具备美国在第三世界那种反民族主义倾向”（Mahoney 1983：244）。苏联与联合国的意见分歧以及苏联

对刚果内部反政府集团的支持，使它在非洲国家赢得了一些朋友——比较突出的是由加纳、摩洛哥、马里、几内亚、阿尔及利亚、埃及和利比亚组成的卡萨布兰卡集团，但也引起了其他一些非洲国家的反对。由于两个超级大国无一与非洲国家有紧密的历史联系，它们的努力主要不是为了扶植某些领导人或庇护的对象，而是为了不让另一个超级大国在后殖民地时期政治风云复杂多变的非洲大陆上获得利益。

结　论

从以上个案研究中可以明显看出，在大多数情况下，美国比苏联更有直接干涉第三世界国家冲突的准备，这至少体现在派遣部队或使用秘密手段扳倒不友好的政权方面。这一差别有力地说明，美国在全球行使影响力的能力占优势，同时也说明两个大国对各自在殖民地时期结束后的世界扮演的角色构想不同。由于美国试图推进西方式的民主和资本主义制度，所以往往把力量投放在国家的领导者和政权一边，认为这样做会尽可能地延续国家独立前的制度和观念。从这一点上说，美国是个爱维持现状的国家，尽管附有不让殖民主义本身在新的世界秩序中有立足之地这个条件。这种立场其实十分暧昧，它意味着要艰难地跨越理想与实际所得之间的鸿沟。理想的是崇尚自由的反共产主义政府，得到的却是专制的反共产主义政府。这样做的危险是，美国的政策既不会令欧洲殖民主义列强满意，也不会让新独立的国家高兴。前者常常怨恨美国压它们实行非殖民地化，后者虽然想得到援助，但并不想被干涉。另外，这样做也不会使苏联满意，因为它在谋求扩大自己的影响。

在某些方面，苏联的事情要好办一些。它总是站在劣势一方，而且它是反西方的象征（不管是真的还是想象出来的），这些在对别国施加影响的方法上倒是给了苏联比较大的自由度。在许多事例中，它可以顺潮流而不是逆潮流而行。在国际共产主义运动中，苏联不仅拥有意识形态，还拥有政治工具；它日益强大的经济力量，

尤其是重工业，使它拥有以物质援助支持意识形态的手段。最重要的是，在许多事例中，苏联都是美国那种不妥协态度的受益者——例如在摩萨台的伊朗、阿本斯的危地马拉、纳赛尔的埃及和卡斯特罗的古巴。在以上各例中，美国曾动用了力量，无论成功与否，都会让美国在它与许多第三世界国家的关系以及它与苏联的竞争方面付出代价。让美国明显感到不知所措的是，它在第三世界积极努力“做好事”，却往往会遭到抵抗，而苏联的行为却常常被认为与第三世界的民族主义合拍。

事实上，这一历史阶段终结时，苏联在第三世界的得失账单反映的情况很难说比美国的好，说不定还要差一些。苏联在扩大其影响力方面所得的成绩并不可靠（只有在古巴是唯一的例外），而它的损失却相当可观。1960年代中期，两个超级大国面对的是一个变化迅速、日新月异的世界。冷战政治仍是人们关心的问题，但已经越来越不能决定第三世界以及其他地区的事态发展了，因为不结盟已成定局，国际共产主义运动已无可挽回地有了裂痕，欧洲国家，无论是东欧还是西欧，都不顾超级大国的反对而坚决维护自己的利益。对美国来说，遏制政策在越南受到了威胁。因此，看来超级大国似乎需要重新规划了。

第四部分

缓和及其局限性
（1965~1981）

导　言

如果人们相信比较言过其实的关于缓和问题的断言，那超级大国间冷战关系模式就真的该被打破了。当然，如果人们根据一些领袖人物的愿望来判断国际局势的缓和与否，那么这一断言就属于这种情况。格奥尔吉·阿尔巴托夫是莫斯科美国与加拿大研究所的所长，也是1970年代和1980年代克里姆林宫著名的政策顾问。他宣称，“缓和并不是冷战通过其他更加谨慎和安全手段的延续。根据其本质及目标，缓和应是一种反对冷战的政策，其目标不在于通过非核战争手段在冲突中赢得胜利，而在于努力防止和解决冲突，在于降低军事对抗的水平，在于促进国际合作的发展”（Arbatoo 1983：13）。毫无疑问，他的这一说法是为一种政治目的——把苏联的作用与对广大公众有吸引力的缓和概念联系在一起——服务的。他是在1983年说这番话的，当时缓和概念被弄得一团糟，他的话含有一种暗示：美苏关系出现低迷的责任在美国。值得注意的是，局势缓和问题本应该根据当时的现实条件来谈论。这一观点适应了当时广为接受的一种看法，认为美苏关系不外乎两种——冷战或者缓和（事实上，这就是阿尔巴托夫著作的题目）。

实际上，冷战与缓和的分界线从来就没有如此明确过，不过有明显的事实表明，有几个阶段，美苏关系以公开对抗为主流，而在其他阶段，则以谈判为中心议题。本书下面三章的主要任务，首先是分析

1960年代末1970年代初出现的双方试图缓和紧张关系的条件；其次是弄清楚双方取得有限缓和的成功原因。

西方研究缓和的分析家们已经取得了某些一致意见。某些关键的条件（其中包括：1969年苏联已经取得了与美国相匹敌的有效核均势；双方领导的两大军事集团的一些成员国越来越倾向于采取独立的政策路线；经济超级大国的地位相对下降，超级大国作为集团领导者的作用越来越明显）促使两个超级大国都寻求在某些领域，尤其是核武器领域与欧洲安全领域的和解。由于相互承认每一方在确立军备控制措施及建立信任机制方面都做出了很大努力，因此随后出现了某些方面的缓和。比如，（美苏）第一阶段限制战略武器条约、危机管理方面的各种协议，以及在降低欧洲紧张程度等方面的成果。然而，有一种意见认为，缓和之所以没有真正实现，是因为双方都对缓和的范围和目标产生了不可调和的、相互误解的观点。

美国将缓和看作一个全球范围的事，希望超级大国之间关系的广泛变化能够超出军备控制的具体协议所规定的范围，比如能节制苏联在第三世界的野心。"关联"是个概念性的工具，能使一个多层次企业的各方面处于协调一致，在某些领域中给苏联提供一种引诱物（比如贸易条件的改善），希望它能在其他领域做出有益的回应（比如对北越施压，使其能与美国达成妥协）。实际上，美国认为缓和是一种遏制苏联的手段，它可以防止苏联成为一个真正的与美国军事实力相匹敌的超级大国。苏联尽管同样希望缓和紧张局势，但认为减缓核竞赛这个重点领域的紧张形势与维持对第三世界发挥影响的传统目标并不是水火不相容的。总的来说，苏联将缓和看作使其超级大国地位获得认可的一种机会。苏联倾向于认为军备控制与第三世界的问题是两码事，而美国则认为这两者之间是有关联的，"缓和"处在二者之间的夹缝中，只能走向失败。有人说，两个超级大国之间的基本哲学观念不同，所以实行缓和，从一开始就是存在缺陷的（Bowker and Williams 1988：Ch. 3 and 260；Garthoff 1985：Chs 2 and 29）。

这一观点很值得赞扬，它在国际格局的结构性变化与具体的政策

变化之间建立了联系。并认为在就一系列问题进行紧张谈判的时期内，竞争仍具有重要意义。然而，这种观点所强调的重点在很大程度上是两个超级大国间的双边关系，国际格局的变化基本上被看作实行缓和必须考虑的条件。然而，如果我们纵观国际局势全景，那就会发现缓和的重要意义在于调整作为国际格局组成部分的美苏关系与国际格局本身变化特点之间的不平衡状态。

亨利·基辛格在担任尼克松总统国家安全顾问前不久曾发表过一篇文章，认为“今后几年中，美国政策面临的最深远的挑战将是哲学性的，即在一个军事上是两极格局，政治上是多极格局的世界中探索出维护世界秩序的某种概念”（Kissinger 1969：79）。其他人可能会补充认为经济的多极化至少与政治的多极化同等重要，而奇怪的是基辛格似乎并不关心经济。但有一点是毋庸置疑的，即美苏两国在当时情况下还未曾遇到基辛格所指出的那种挑战。在那个时期，美苏两个超级大国大力投资军备竞赛以及在欧洲维持两大军事集团体制，因此，两国都把其政策的重心置于加强双边主义和冷战体制，尽管两国为了在世界政治中对付新的力量而力图加强其政策的灵活性。正如菲利普·温莎所写的那样，缓和“依赖于对势力范围的一种继续认可，以及欧洲现存秩序的永存。任何对这一秩序的威胁都可能迅速变成对缓和自身的威胁”（Windsor 1971：25）。对军备控制也是一样。缓和的一个先决条件是对高风险性的核力量平衡的相互认可。换句话说，也就是具有这样一种意思，即对超级大国来说，缓和就是努力阻止威胁其超级大国支配地位的势力的发展并能够巩固自己居于世界政治核心地位的冷战体制。

本篇对那段时期有关问题的论述反映了那个时期一段非常复杂又充满矛盾的经历，即美苏关系进一步呈现出格式化、相互关联化，偶尔还具有排他性，然而，国际格局在总体上也变得更加多样化、更加动荡和难以预测。下面三章的主题谈的就是这两种力量发生碰撞时互相应对的情况。第九章谈的是 1965 ~ 1973 年缓和形成时期的情况，在此期间，美苏就核武器和欧洲安全问题签署了一些重大协议。这期间国际秩序发生了一些重大转变：中苏发生冲突、世界经济力量对比

发生了变化、第三世界动荡引发了新的挑战。第十章回顾了美苏关系中看似不寻常的大事：在缓和形势下因美国与共产主义较量而引发了花费时间最长、付出代价最大的越南战争。最后，在第十一章中，我们将探讨美苏两个超级大国在1970年代中后期相互信任逐步丧失而导致1980年代初所谓的新冷战或者第二次冷战的原因。事实上，这段时期，在世界政治的真正冲突中，超级大国之间的冲突减少了，而冷战政治与新兴的世界政治之间的冲突相对地多了一些，在新兴的世界政治领域中，冷战已逐步成为一个无关紧要的问题。

第九章
缓和的形成
(1965～1973)

国际环境

在没有诸如战争或革命这类大事的情况下，要想了解促使国家关系发生重大变化的多种力量的作用过程真不是一件容易的事。在缓和的情况下，这种作用过程体现在1971～1973年间达成的一些核军控协议与欧洲安全协议。但这些正式的协议并没有穷尽“缓和”一词所包含的意思。缓和是一个过程，同样也是一整套的条约。缓和出自超级大国关系相互竞争的本质，即使在缓和已经生根的情况下，竞争也仍是这些关系的一个重要特点。缓和的一些成分在和平共处传统和各方为争取签署1963年《部分禁止核试验条约》的斗争中早已存在，其另一些成分则存在于大国冲突的模式中。超级大国的关系是结构性的，在这种结构中，超级大国制定政策时，相互关系的因素对竞争的影响不少于对和解冲动的影响。这种冷战互动关系使一方对另一方的一举一动都保持着高度的警惕。我们的任务是解释1960年代后期至1970年代初期两个超级大国为什么会在它们之间的分歧十分突出的领域——首先是核武器和欧洲安全——表现出和解的兴趣。

缓和的关键在于全球、双边和国内问题的发展交叉在了一起。在全球层面上，明显的例子就是1960年代中期中苏关系破裂并发展成

公开的对抗。1964年中国研制出了原子弹，两年后，毛泽东发动了“文化大革命”，它迫使苏联的政策制定者们额外投入大量的军事与意识形态资源来对付来自东方的不断增长的威胁。1968年“文化大革命”的势头没有减缓，没有给苏联带来任何喘息之机，恰恰相反，1969年中苏边境发生了几起严重冲突，迫使苏联在1969～1973年间将远东地区的兵力从25个师增加到45个师，并部署了新型核导弹和作战飞机以对付中国。更糟糕的是，在这个节骨眼上，中国开始与美国进行接触。这一新的挑战在这三个大国之间形成了复杂的三角关系，在其中，据说美国掌握着王牌，它可以与另外两个国家一起搞缓和，也可以在它们中间挑拨离间，从中渔利。关于这一点我们以后还要谈到。无论如何，在冷战游戏中一个有实力的新的独立角色的出现改变了另两个角色之间的动态关系。

这段时期发展的另一个重要事态是，世界经济格局的变化对美国产生了严重的冲击。日本与欧洲经济实力的增长，加上很大程度上因越南战争的巨额开支而导致的美国经济的衰退及通货膨胀，都严重地削弱了美国的贸易地位，并使美国自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束以来在国际经济体制中所占的比重被压缩。1960年代后期，美国从日本和欧洲进口量的不断增加使原来对美国有利的贸易平衡被迅速打破，统计数据表明，到1970年代初期，美国的对外贸易自二战结束以来首次出现了赤字。除1973年和1975年以外，这种状况一直持续到1970年代末及其以后（Kemp 1990：148）。贸易赤字和通货膨胀的不断上升给美元造成很大压力，而迄今为止美元的坚挺和稳定一直是布雷顿森林体系（国际货币及金融体系）最重要的支撑。欧洲人为了保持手中的美元价值，纷纷将美元兑换成黄金，美国面临着黄金从诺克斯堡（美国1936年修建的金库所在地——译者注）外流的失控前景。结果到1971年，尼克松决定停止履行美元兑换黄金的义务，并实行与外币之间的固定汇率体系。自此以后，尽管早些时候曾努力就实行新的固定汇率进行过谈判，但美元还是出现了浮动。不过后来的美元贬值并没有使它失去在世界货币体系中的优越地位，其中原因是“贬

值……给了出口业一个喘息之机……并使利润得以维持”。不仅如此，为了保持美元的价值，美国上调了美元的利率以吸引外国资本，特别是从石油生产国所得到的收益（Kemp 1990：186）。

然而，与旧的以黄金为基础的货币体系相比，这些措施并没能完全弥补所失去的稳定。高利率对支撑美元来说是必要的，但却减少了工业投资与利润，如一些谋求获得快速回报的投机资金。这些都发生在1960年代的“大社会”改革鼎盛时机，耗费了大量的联邦预算，而预算中的部分资金是通过贷款得来的。联邦政府因而吸收了在总体经济中越来越多的可用于借贷的基金，从而进一步压缩了私有行业的投资。汤姆·肯普指出，从此以后，这种“反工业化”现象就使传统的所谓“烟囱”工业陷入了困境（Kemp 1990：187）。从国际全局来看，所得到的最重要的结果是美国的经济相对外部力量来说显得越来越脆弱，或者说，考虑到时间因素及各国经济“相互依赖”性的增加，美国经济在新的国际关系中越来越脆弱（Keohane and Nye 1997）。

这两个发展趋势共同发挥作用产生了一个新的全球性体系，冲突的界限不再像冷战高峰时期那样轮廓鲜明。实际上，美国与苏联都在自己占统治地位的势力范围内——美国在世界资本主义体系中，苏联在世界共产主义体系中——成了被挑战的对象。集团内部凝聚力一定程度的丧失（促进缓和的国际环境的第三个重要因素）考验了迄今为止一直支配联盟管理的各项政策。

在西方，有迹象表明，法国长期以来一直憎恶美国的领导地位及其对欧洲的影响力。1966年，戴高乐让法国退出北约军事机构时，他还向苏联表示亲近。这两个政策是紧密相关的，他下定决心要维护法国在欧洲的领导地位，这在某种程度上也是法国的民族主义宣言，此举旨在重新获得法兰西的大国地位。法国的这一政策也源于欧洲一个广泛流行的观点，即重大的政治与安全决定应由欧洲人——其中包括苏联人——自己来决定。最后，戴高乐的欧洲观——从“大西洋延伸到乌拉尔山脉”——意在摆脱集团对国际政治的严密控制。1966年，戴高乐访问了莫斯科并在接下来的两年中

出访了几个东欧国家，他谋求在东西方的隔阂间架起一座桥梁。如果说他的努力失败了，一部分原因在于苏联1968年入侵捷克斯洛伐克，另一部分原因是法国已不再具有完成如此重大政治使命的国际地位，即说服苏联进行认真的谈判（Garthoff 1985：107－8）。这在欧洲分裂的核心问题——德国问题上表现得特别明显。只有德国自己在美国的支持下才能够解决这个特别的难题。

碰巧的是，在1966年基督教民主联盟和社会民主党形成"大联盟"体制后，德国的局势使这个冷战中央战场的紧张局势实现缓和成为可能，尽管这种缓和是暂时性的。"大联盟"则被认为"标志着（德意志）联邦共和国成长阶段的终结"（Marshall 1990：55）。与苏联及东欧国家关系的一种新的灵活性在1966年签署的《和平备忘录》中有所显示，它保证同阿登纳时期（1949～1963）的正统思想实现温和的分离。当时西德还没有正式放弃"哈尔斯坦主义"（按照该理论，联邦德国拒绝考虑与民主德国或者除苏联外其他承认它的国家发生关系），但开始与罗马尼亚、南斯拉夫发生贸易关系，致力于向实现缓和与非军国主义化方向发展，并开始摆脱1949年形成的僵化的教条（Marshall 1990：58）。威利·勃兰特1969年担任西德总理后，"哈尔斯坦主义"才被勃兰特的新东方政策正式放弃，西德与东方集团建立了新的暂时妥协关系。

这些举措的更大的意义在于它表明，联邦德国现在准备以一种在二战后最初几年内（当时联邦德国受到几个占领国的监护）看来是不可能的方式来保卫自己独立国家的地位。那种对联邦德国的监护当时虽然仍有些作用，尤其是在柏林问题上，但随着联邦德国经济的快速增长和政治上的逐步稳定，这种监护已逐渐被认为不合时宜了。同样重要的是，美国人怀疑这一做法会有危险。"对我来说似乎是这样"，基辛格在他的备忘录中这样回忆道：

> 勃兰特的新东方政策在很多人看来是个要求实现缓和的进步政策，但一不小心就会转变成一种新的典型的德意志民族主义。从俾

> 斯麦到拉巴洛，德国民族主义外交政策的精髓就是游刃自如地活动于东西方之间。与此相反的是，自 1940 年代以来，美国（对德国）的政策一直将联邦德国置于西方、大西洋联盟及后来的欧洲共同体一边。
>
> （Kissinger 1979：409）

基辛格与尼克松最终“认识到这是不可避免的”，并开始与勃兰特进行建设性的合作（Kissinger 1979：410），这标志着承认德美关系现在必须建立在一种新的更加平等的基础上。更为突出的是，有人建议尼克松和基辛格应该“采取措施与苏联发展一种美国式的缓和关系，以防止出现以联邦德国为主导与苏联达成欧洲式的缓和，它会将美国排除在外，从而分裂西方联盟”（Garthoff 1985：109）。

如果说联邦德国谋求在联盟内取得独立会对美国的领导地位构成挑战，那么这种情况也只不过是导致某种担忧而已，如同 1960 年代末许多观察家所说北约内部“出了毛病”会引起种种担忧那样（Kissinger 1979：81－6）。它的起因是欧洲国家与美国对安全需要及国防政策的理解出现了分歧。自 1960 年代中期以来，美国一直要求将欧洲常规防御的责任转交给联盟的“欧洲支柱”国，这也是美国对越南战争的投入不断增加，国会要求紧缩军费开支以及认为欧洲爆发战争的可能性很小等诸多因素综合作用的结果。美国还要求其欧洲的北约盟国进一步扩大防务合作，但收效甚微，因为对欧洲国家的领导人来说，这似乎暗示着美国对欧洲防务的核担保程度降低了。从欧洲部分撤军、与苏联之间的双边核控制看上去就像是美国为减缓对欧洲的防务责任而开的药方。为了保障西欧的安全，美国会冒本土遭受核攻击的危险吗？这个问题一直存在，现在则被追问得更加迫切了。

用基辛格的话来说，欧洲人对美国力图“垄断有关核问题的重大决策权”不满，他们对任何可能削弱美国核保护伞可信度的举动都心存疑虑。对此，基辛格尖刻地指出，“我们的盟友总体上就像是鸵鸟一样，它们不愿面对已经变化了的战略关系，也不愿意在防务方面做出更大的努力，以满足美国复杂的有时还是诡计多端的企图，而

美国的这种企图事实上主要还是应对不可抗拒的技术发展所产生的结果（即与苏联之间的核缓和）”（Kissinger 1979：84）。实际上，在缓和时期欧洲政治合作快节奏地向前发展时（1973年英国、爱尔兰共和国和丹麦加入欧洲经济共同体）——在加强了的欧洲支柱的基础上，美国防务政策进一步下放权力的计划没有取得什么进展（Cromwell 1992：Chs 3－4）。美国对欧洲经济共同体保护性的贸易政策感到不满，而欧洲又不愿分担不断增加的防务责任，这两方面事实上都持续不断地刺激着美欧关系。简言之，大西洋两岸关系充满了极大的模糊性，而这必将给缓和进程带来重大影响。处理好盟国间的关系是对付苏联的一个重要方面。

“铁幕”那边的形势也发生了变化，尽管这些变化不可避免地呈现出不同的形式。众所周知，莫斯科是限制其集团内部多样性的。然而，到1960年代中期，这些限制逐步表现出松动。阿尔巴尼亚在1961年，罗马尼亚在1963年开始与苏联脱离关系。阿尔巴尼亚在一定程度上与中国坚决地站在了一起。而罗马尼亚与苏联关系的脱离不是彻底的，它成功地实现了与经互会的一体化，而且受到法国从北约部分撤出的鼓舞，它在这个东方集团内部发挥着独立的军事作用。罗马尼亚仍然与莫斯科保持着正式的然而是疏远了的关系（Fejtö 1974：151－64，315－18）。

在靠近冷战前线的地方，莫斯科不能容忍这种谋求独立的企图，然而甚至在这里也出现了值得注意的争论，起初争论集中在经济改革问题上，后来则拓展到了政治与意识形态领域。费伊特写道，赫鲁晓夫的继任者勃列日涅夫和柯西金在处理与那些人民民主国家的关系时，采取了一种更加务实和谨慎的做法，鼓励“打破束缚，集中精力解决国内问题的倾向”（Fejtö 1974：192）。加速实现工业化，增加与西方的贸易交往，开放旅游业并与西方（首先是法国和德国）进行政治接触，这些都使东方集团国家感受到了东西方生活标准的差异，促使它们要求改革，以满足现代化的需要。

1966年联邦德国发动外交攻势，主动提出与东欧各国建立贸易关系，并可能在外交上承认东方集团国家，这对该集团造成了冲击。对

此，匈牙利和捷克斯洛伐克做出了赞成的反应，而波兰和民主德国则持坚决反对态度。（Steele 1985：96－7）这些外部压力对捷克斯洛伐克的国内政治影响很大，国内自由化运动则走得更远。据费伊特观察，原因是“处在欧洲心脏地带的捷克斯洛伐克的国内形势好，工业、学术及技术发展水平高，其传统的自由、民主的本性是毁灭不了的”（Fejtö 1974：213）。东方集团内部对多样性的限制在捷克斯洛伐克暴露得最充分。

1968 年 8 月，亚历山大·杜布切克的“人道社会主义”的破灭在东西方关系的各个层次都引起了强烈反响。此事加深了苏联与中国间的隔阂，暂时阻止了美苏关系朝着缓和方向发展的势头，最重要的是它向东西方国家传递出一个明确的信号，即苏联不能容忍在其最敏感的中心地带存在任何对东方集团完整性构成的威胁。如果说有什么比 1956 年镇压匈牙利叛乱还令人震惊的事，那便是“勃列日涅夫主义”的有限主权论。捷克斯洛伐克与匈牙利不同，它坚持说自己没有离开华约或者告别社会主义的企图。

然而，捷克斯洛伐克悲剧的国际环境与 1956 年大不相同，这次并没有扭转东西方缓和的发展趋势。经过“相当一段时间”后，缓和反而以更迅速的节奏向前发展了。其中部分原因在于集团内部凝聚力的重新建立，使苏联领导从实力地位出发更坚定地向着缓和的方向迈进；另一部分原因在于重要的西方国家领导人，特别是勃兰特坚持认为缓和有可能在有限的范围内实现，苏联可能在一些争议较少的领域“更愿意做出让步”（Marshall 1990：65）。此外，1968 年美国大选后新政府刚上台，1969 年联邦德国也举行了大选，两国新政府都承诺要与苏联举行谈判。基辛格 1969～1973 年的备忘录中有关捷克斯洛伐克问题的三份备用参考材料长达 1500 多页，这些材料表明，他认为 1968 年 8 月事件及其影响只不过是大国政治大戏中的插曲而已。

一般来说，东西方集团内部的变化意味着东西方关系易受西方与西方、东方与东方紧张关系的影响，这使两个超级大国在追求缓和的时候，还得用一只眼睛紧紧地注视着自己的盟国。换句话说，超级大国间缓和的成功在很大程度上要依靠对各自盟国的遏制。

对实现缓和具有重大意义的第四个因素是越南战争。关于这个重要事件的本身足以写上满满一章，但我们在这里仅列出一些基本要点。我们已经看到，越南战争的费用已经开始影响美国的经济，到1968年，该战争的军事进程及国内的反对意见促使美国高层对一些基本问题进行重新评估，不仅包括对越南的政策，还包括美国自1947年以来推行的全球遏制政策。1969年尼克松入主白宫后，要求美国减少其世界警察责任的呼声越来越高。参议员曼斯菲尔德要求美国政府从欧洲撤出美国大批驻军的提议得到了普遍支持，这个建议首先是在1966年提出的，随着美国对越南战争的认识逐渐清晰，这个愿望也变得更加迫切，尽管没能实现，但还是对政策制定者产生了持续的压力，使其重新考虑美国在海外承担的军事义务（Garthoff 1985：115）。尼克松与基辛格设计了一个使苏联陷入相互依赖的网络方案——“关联”，旨在促使苏联清楚地认识到在有关美国的一些重大问题上美苏双方存在“关联”。美国摆脱越南战争——或称“光荣的和平”——的需要，几乎不可能撇开苏联的关系而孤立地来考虑，因为莫斯科与河内的关系对于北越的作战来说是至关重要的。到底缓和是保证美国从越南撤军的一种手段，还是美国从越南撤军是实现缓和的一个先决条件？对历史学家们来说，这是个“先有鸡还是先有蛋”的问题，可能难以解决，但几乎毋庸置疑：它们之间存在着某种联系。

尼克松政府选择的“战争越南化”政策在微观上代表着更大的政策——“尼克松主义”。这就引发了新的国际劳动分工问题，即需要美国的盟国在地区防务中分担更多的责任，以便让美国腾出手来处理更大的战略性问题，实际上这是又回到了艾森豪威尔—杜勒斯时期的政策——通过安全协议网络来确保美国的利益（Boioker and Williams 1988：56）。用尼克松自己的话来说：

> 1960年代，我们采取的常规态势的基础是所谓的“两个半战争”原则，据此，美军应能同时维持北约为期三个月的常规

> 前沿防御以及维持朝鲜半岛或东南亚防止中国全面进攻的防御，并能应付一个小型的突发事件。然而，美军从来就没有达到过这样的力量水平。
>
> 为了努力协调我们的理论与能力，我们选择了最佳方案，即所谓的“一个半战争”战略。按照这一战略，和平时期，我们将维持一支能执行一般任务的部队，足以在欧洲或者在亚洲应付一场共产主义的大规模进攻，同时能在亚洲援助盟国对付除中国外的其他国家的威胁，以及在其他地方应付一场突发事件。
>
> （Chace 1973：44）

很显然，这一决策的一个重要新特点是修改了对中国“威胁”的评估。美国最初卷入越南冲突的基本理由——遏制中国扩张的需要——已不再可信。正如基辛格评述的那样，与约翰逊政府相反，“尼克松政府从一开始就没有列举或者暗示过我们卷入越南战争是出于反华的动机；我们不同意这种分析；我们不需要额外增加敌人”（Kissinger 1979：168）。当然，这并不排除寻求中国的帮助去说服河内和解，因为这两个共产党国家在意识形态上有联系，在这个意义上，对中国敞开大门就与对越政策有关联了。

最后，越南问题还影响到美国与其西欧盟国的关系。英国工党政府对美国的越战政策口头上勉强表示赞成，但却不愿出兵参战。其他北约国家更没有提供什么帮助，而且对美国国内学生的反战浪潮一言不发。反战浪潮与美国国内广泛的政治抗议活动结合在一起，于 1968 年达到高潮。中立国，如瑞典则成为美国人谋求逃避服兵役的安全庇护所。美国在越战中的孤立（只有澳大利亚、韩国和一些小国支持它）与其在朝鲜战争中的情况形成了鲜明的对比。这不仅仅是因为越南战争缺少联合国的授权（朝鲜战争有），而且还因为欧洲国家已不再像朝鲜战争时那样，认为共产党国家在亚洲的侵略意味着它也可能在欧洲这么干（Urwin 1989：196－7）。就美国与欧洲的关系而言，越南战争正如很多其他方面的问题一

样，完全是个耗资巨大的无底洞。

第三世界曾发生过一系列对缓和产生重大影响的冲突，越南战争只是其中的一起冲突。1970 年代后半期，在缓和滑坡的情况下，安哥拉、非洲之角、阿富汗和中美洲都爆发了要求实行革命性变革的新的运动（第十一章将进行讨论），在缓和的早期阶段，中东地区正在酝酿着新的冲突。从 1967 年的 6 天战争到 1973 年的 10 月战争及其以后，阿以冲突给超级大国的调解工作造成了持久的挑战。事实上，1967 年，因以色列战胜阿拉伯国家使中东冲突不断加剧所导致的两极分化使两个超级大国发生了直接争执，但两个超级大国看来都希望避免在该地区发生对抗（Bowker and Williams 1988：99－100）。在签署基本原则协议（目的是建立一个防止危机的行为机制）的一年内，美苏在 1973 年 10 月阿以战争的关键阶段发生了冲突。苏联威胁将进行单方面干预，强制实现停火，引发了美国一场影响世界范围的核警报。鲍克和威廉斯指出，这起事件没有进一步升级，“但问题仍然存在……超级大国的行为在一定范围内仍有与缓和，特别是与 1972 年和 1973 年最高级会议所建立的防止危机的基本原则相一致的地方”（Bowker and Williams 1988：110）。

1971 年的印巴战争也曾出现过类似的紧张状况，但这里还牵涉到了中国的利益。东巴基斯坦谋求独立，印度对此持同情态度，而西巴基斯坦企图血腥镇压东巴基斯坦的自治运动，从而引发了印巴战争。中国长期以来一直是巴基斯坦的盟友。1971 年的上半年，苏联与印度签订了安全条约。美国政策对次大陆冲突的关注程度远不如它对据说苏联打算羞辱中国一事的关注程度。为防止这一事态的扩大，尼克松和基辛格命令一支海军特遣部队前往孟加拉湾。战争的结局——巴基斯坦战败，东巴基斯坦（现在的孟加拉国）获得独立——与两个超级大国在危机期间的诡计并没有多大关系，毫无疑问，苏联在这场超级大赌博中是以胜利者的姿态出现的。然而，更广泛地看，地区冲突的爆发显示出缓和的脆弱性，同时也暴露出超级大国惯于透过带有冷战色彩的棱镜来看待此类冲突。

影响缓和发展的主要国际因素是苏美双方军事力量的对比：1960年代后半期出现了苏联核武器数量迅速增加的情况。表9-1中的数字清楚地显示了苏联核武器生产的动态与美国核武器生产的停滞状态的比较。然而，这些粗略的数据仅反映了其中的部分内容。进一步研究的结果，苏联的核力量要比美国大得多，原因是苏联偏爱重型导弹。到1972年美苏签署（美苏）第一阶段限制战略武器条约时，苏联的SS-9型洲际弹道导弹的投掷重量大约是美国最大的民兵-3型导弹的四倍。然而，美国在三位一体的三大战略武器（洲际弹道导弹、潜射弹道导弹和轰炸机）方面仍握有优势，美国还首先开发出了多弹头分导再入飞行器，民兵导弹可以携带3枚弹头，海神潜射弹道导弹则可携带10枚弹头，从而增加了美国弹头的数量。美国于1970年率先部署多弹头分导再入飞行器，苏联直到1975年才开始部署此类武器。所有这些在两个超级大国武器库中的不对称因素成为美苏在第一阶段限制战略武器谈判中争论的重点。这方面的问题后文将进行讨论。

表9-1 美苏的核武器数量对比（1967～1969）

单位：枚

	1967年1月	1968年9月	1969年11月
美国			
洲际弹道导弹	1054	1054	1054
潜射弹道导弹	576	656	656
轰炸机	650	565	525
总　数	2280	2275	2235
苏联			
洲际弹道导弹	500	875	1140
潜射弹道导弹	100	110	185
轰炸机	150	150	145
总　数	750	1135	1470

资料来源：Labrie 1979，p. 11。

尽管两国在武器实力方面存在差异，但当1969年两国首次尝试就武器问题举行谈判时，双方都意识到最重要的现实问题是：苏联在很多方面已经赶上了美国。如果此时再出现与1962年古巴导弹危机

相类似的情况，那么苏联再次退却的可能性很小。事实上，苏联武器库迅速增长的原因主要是出于一种认识，即1962年时苏联的战略核武器不如对方，使苏联在政治上处于明显的劣势。简言之，两个超级大国核力量的势均力敌迫使美国不得不承认苏联作为一个超级军事大国的地位，这也鼓舞了苏联的信心，使它相信现在可以从实力地位出发与美国讨价还价了。美苏两国对军备竞赛势头的不同理解（美国认为自己曾处于领先地位现在被赶上甚至被超越，苏联则认为自己是后来居上者）是影响两国军备谈判态度的基本因素。双方都面临着这样的难题，即在不失去己方现有优势的情况下适应对方的要求。有一种观点认为，把核关系看成一种竞赛已不再是合理的，也不再有利于保障安全。即使双方只是在名义上表示赞同这一观点，双方也不会轻易放弃这一观点。

缓和的国内因素

各国都不会对其外部环境的变化自动做出反应。事实上，内部对外部刺激因素做出反应常有一个相当长的过程，一个重要的原因是官僚机构及政治体制中存在着严重的惰性。在缓和形势下，美苏政策的变化是非常复杂的，因为各自国内政治的变动节奏和频率是不相同的，并且还会受到各种不同压力的影响。

在美国，选举政治常常要求新政府提出——至少是在语言文字上——一套与上届政府不同的政策。当然，如果选出总统的政党发生了变化，如1952年、1960年和1968年的情况，那么这一首要的事情就具有特别重要的意义。在上述例子中，新政府都宣布了“新”政策——艾森豪威尔的“新面貌”，肯尼迪的“新边疆”，以及尼克松的“谈判时代”，尽管这些新政策都可以被理解为“遏制”这一主题的各种不同的方略。在这几个例子中，新政策不仅仅被认为是对预料的外部威胁的变化所做出的反应，而且还是一种解决国内政治问题的手段。1952年，朝鲜问题是套在杜鲁门政府脖子上的一个沉重的

负担，艾森豪威尔在竞选中宣称，他将“到朝鲜去”，从而捞到了巨大的政治资本，显然，这只是在表面上显示出举足轻重的姿态，事实上几乎没有什么实质性内容。1960年竞选时，肯尼迪将艾森豪威尔政府描绘成一个思想贫乏的僵化政府，他大打导弹差距牌，保证弥补这个差距，并着手解决国内重建问题。1968年，反战示威浪潮高涨，种族骚乱频繁，美国国内局势一片混乱，尼克松向美国中产阶级（后来被他称为“沉默的多数派”）保证并宣布他有一个体面地结束越南战争的“计划”。如同在他之前的艾森豪威尔一样，尼克松没有披露该计划的内容，但他提出的新方略在选举竞争中产生了很大的分量。

对苏联领导层来说，美国的选举政治严重影响苏联制定的政策的稳定性，并且还带来了另外的问题，即政治活动并不会随着选举的结束而结束。在美国政府中，到底是谁当家，是总统、国会，还是公众舆论？当总统承诺签署的条约需要经过对总统的权力和特权满怀忌妒的参议院来批准时，其可信度还有多高呢？尼克松政府对此深有体会，针对这种情况，尼克松政府展开了雄心勃勃和复杂的外交政策活动，同时还意识到必须对指挥系统实施严密的控制。

但其结果与预料的相反。这一精心选定的解决问题的办法使白宫的政策制定权进一步集中，剥夺了名义上重要的内阁成员如国务卿参与制定对越南及缓和等政策的决定权，并采取由国家安全顾问基辛格直接与河内和莫斯科接触的“秘密渠道”外交（Isaacson 1991: Ch. 10）。这可能在短期内使谈判过程简单化，但同时也使权力出现了危险的集中，尼克松最终因此而引火烧身。对消息泄露及任何负面言行的极端敏感在尼克松的白宫圈子中造成了一种被围攻的心理。最臭名昭著的是，这种心理在1972年6月发生的潜入民主党总部的事件中反映了出来，白宫工作人员原指望通过这一拙劣做法能窃取情报，帮助尼克松赢得竞选连任，并实现其政策的连续性。“水门事件”并不是一起孤立的事件，而是一种被称为“帝国总统”思想滋长的后果（Schlesinger 1974）。显然，在1973年成功达到巅峰之际［尼克松政府完成了（美苏）第一阶段限制战略武器条约的谈判，对中国敞开了大

门并与北越签署了和平协定]，尼克松的成就遭到了质疑。从1973年年初到1974年6月引咎辞职，尼克松一直受到弹劾的威胁，他本人及其政策也一直处在国会和媒体的持续压力下。即使在他辞职后，这种后续的影响仍然没有停止，如国会拒绝支付对南越进行军事援助所需的资金，最终导致南越在1975年被北越击败；又如接受苏联有条件改善贸易条款的要求，答应给苏联犹太人签发移民签证，这“侵犯”了缓和进程。后文对此将有详细记述。正如詹姆士·蔡斯所观察的那样，“在外交政策中，有一点永远不应该被忘记，那就是政治支配政策，手段必须是务实的，结果必须是合乎道德标准的”（Chace 1973：5）。

如果苏联对一位名声显赫、功勋卓著的世界领导人因像“水门事件”这样非常细小的不端行为而被迫下台感到难以理解的话，那是因为苏联领导人自身实际上几乎不受公众舆论和政府反对派压力的监督。但这并不意味着苏联领导人的领导地位就不会受到挑战，这些挑战主要来自苏共内部的其他精英分子，而这种斗争又是以对庞大的苏共结构体系造成尽可能小的破坏为前提的。

斯大林的逝世给苏联带来了混乱，为克服混乱苏联花了好几年时间。同样，赫鲁晓夫下台后，苏联出现了一段集体领导时期。赫鲁晓夫之后，由于其国内政策失败以及人们认识到苏联在古巴导弹危机中被击败，苏联建立了三驾马车领导体制，勃列日涅夫任苏共中央总书记，柯西金任总理，波德戈尔内任最高苏维埃主席团主席。柯西金起初主要负责经济改革，他放弃了赫鲁晓夫下放生产和分配权力的不成功的有争议的政策，着手再度实现经济的集中管理。然而这并不意味着回归斯大林主义。柯西金的改革包括有限引入对管理人员的激励机制，使他们在一定范围内有权决定他们的利润该如何分配，同时为进一步调整供求关系还调整了经济计划。此外，比赫鲁晓夫时代走得更远的是，为扭转苏联技术落后的局面，苏联决定购进西方设备并鼓励西方公司前来苏联建立制造业工厂。位于斯塔夫罗波尔①的菲亚特汽

① 年轻的米哈伊尔·戈尔巴乔夫的家乡。

车厂就是最明显的一个例证（Hosking 1985：364－5）。

在勃列日涅夫担任苏共领导人时，党的纪律及正统的意识形态管理非常严格。赫鲁晓夫时期因实行文化解冻，亚历山大·索尔仁尼琴写的《伊万·杰尼索维奇一生中的一天》一书得以公开出版（1962），1965年文化解冻被制止，安德烈·西亚夫斯基和尤利·丹尼尔两位作家因“反苏宣传”而被推上了审判台，两人被判刑送进了劳改营，后来还被流放。

一般来说，赫鲁晓夫之后苏联时期的口号是“加强一致性”，即在赫鲁晓夫时期的经验主义之后，强调加强苏联领导层的团结和稳定。勃列日涅夫与柯西金之间的斗争持续了一段时期，到1968年中期，在苏联领导层中，勃列日涅夫终于成为在外交和内政两方面都发挥支配作用的人物（Breslauer 1987：Chs 8，9 and 10）。事实上，局势缓和时期恰好与勃列日涅夫排挤柯西金、争夺对外政策首席发言权的时期相巧合。1967年，柯西金在美国与美国总统约翰逊举行了会晤，原计划在第二年约翰逊总统还要与他举行首脑会晤，讨论军备控制问题，但后来因苏联入侵捷克斯洛伐克，这次会晤被取消了。到与尼克松政府举行谈判时，形势已经发展到勃列日涅夫去参加首脑会晤比较合适了，因为他已经巩固了自己在苏联领导层中的地位。加特霍夫写道：“1971年8月，美国对苏联希望举行双边会谈的新兴趣做出反应，在基辛格的建议下，尼克松第一次给勃列日涅夫而不是给柯西金写信。”基辛格通过秘密渠道与苏联进行接触，他所掌握的信息表明：1971年春季苏共第二十四次全国代表大会之后，勃列日涅夫在制定苏联对外政策中起了“新作用”（Garthoff 1985：95）。所以尼克松与苏联的三次首脑会谈（1972年5月、1973年6月和1974年6月）都是与勃列日涅夫举行的。

因此，在这个实现缓和的关键时期，与美国政局不稳的情况相比，苏联领导层变得更加稳定而有力。缓和的命运则与两国国内局势的差异紧密相关。1970年代后半期，就在苏联领导宣布继续坚持缓和路线时，福特和卡特总统却为维持缓和进行着艰苦的努力，原因是国内一些有影响力的集团对缓和感到不满，此外，尼克松留给他的继

任者的部分遗产是一个地位被削弱的总统和一个分裂的权力机构。与此形成鲜明对比的是，勃列日涅夫则不断巩固了自己的地位，事实上，1970年代后半期苏联政策的新突破使美国对缓和不再抱幻想。当时两个超级大国国内环境不仅迥然不同，而且还出现了相互抵触的理解，从而加大了维持缓和的难度。实力削弱的美国对看来信心十足并采取攻势的苏联加深了猜疑；大胆的苏联领导此时感到可以利用一下对它有利的“国际关系中的‘有关因素’”，例如怂恿古巴干涉安哥拉内战，与此同时又反对致力于实现同美国的缓和。

缓和的理论

如果有人认为缓和的大势是因尼克松入主白宫而全面形成的，那就错了。尽管美国当时对全球政治有广泛的战略考虑，但却没有详细的操作计划。尼克松在他就职时讲道：“在经历一段对抗时期后，我们正进入一个谈判时代。”虽然这些措辞非常含糊，但反映出尼克松和基辛格态度的重大转变。毕竟，他们都是冷战老兵，两人的早期职业生涯都开始于两个超级大国意识形态斗争高度紧张的年代。尼克松是1946年选举产生的共和党人占统治地位的第80届国会的新议员，他曾声嘶力竭地批评杜鲁门政府在中国问题上的失误。作为众议院非美活动委员会的成员，他怀着极大的热情继续奉行阿尔杰·希斯的路线。作为艾森豪威尔的副总统，尼克松始终扮演了意识形态斗士的角色，他是艾森豪威尔政府中务实的政治家。

基辛格的早期著作反映出他在处理与苏联关系的问题上具有相当大的对抗性。事实上他的第一本书，即对1815年维也纳会议之后“欧洲的协调一致”的研究，强调的一个前提是对不同类型的民族国家要加以区别，如同19世纪上半叶那样，它们都与冷战有关联。他是这么写的：

> 不论哪里出现一个强国，它总是认为，如果它注重国际秩序或者规范国际秩序的方式具有强迫性，它与其他大国的关系将是

> 革命性的。在这种情况下，问题不在于在一个将出现瓦解的国家体系内化解分歧，而在于国家体系本身……一个革命国家的显著特性是它不仅能感受到威胁（这种感受能力是建立在主权地位基础上的国际关系中一个国家所固有的），而且认为除了它自己外，没有其他国家可以保障其安全。只有绝对安全——压倒对手——才能有效地保障安全，因此一国寻求绝对安全的欲望对所有其他国家来说就意味着绝对的不安全。外交这门限制使用武力的艺术在这种环境下不能发挥作用。
>
> （Kissinger 1957：2）

按照这种构想，革命的法国就是这样一个国家，苏联也是这样的国家。基辛格进一步写道，“因为在革命情况下，相互竞争更多关注的不是调和分歧，而是其亲信的颠覆活动。外交要么被战争，要么被军备竞赛所取代”（Kissinger 1957：2）。基辛格在写这段文字时，其实他可以更好地描述一下冷战。

根据这样一个构想，即充分准备好以便应付与革命的国家打交道过程中可能遇到的情况，有人肯定会问基辛格，他为什么确信1960年代末苏联与中国的关系出现这种情况是可能的，也是必然的呢？部分答案肯定在于国际秩序的变化（上面已经讲过），这种变化全面地暴露了美国力量的局限性。基辛格在他的备忘录中写道，“考虑到我们面临的问题，我们的资源不再是无限的；相反，我们必须设定优先发展的重点，包括精神上的和物质上的。1950年代和1960年代我们曾尝试为一些特殊问题制定最终解决方案，现在我们面临的挑战是重塑一个我们可以永久承担义务的世界秩序，发挥美国的作用。认为我们已尽了最大努力的错觉是无助于实现这一目标的”（Kissinger 1979：57－8）。此外，中苏关系的破裂证明了早先美国对单一的共产主义意识形态威胁的猜测是多余的。现在的主要威胁是苏联的力量，而不是共产主义的意识形态。当基辛格步入尼克松政府的办公室时，他将苏联的战略称作一种“残酷的机会主义”（Kissinger 1979：119）。

了解基辛格思想变化的另一线索就是他的哲学观的内涵。他确定国家和国家体系特征的准绳是19世纪欧洲外交体现出的那种合法性及稳定性。在基辛格的著作中充满了“秩序”“权力”“稳定”“均衡”“合法”这些专用术语——对“现实主义者”来说，国际政治中的最终决定性因素是实力之争和实现国家间利益均衡之争。基辛格的见解及他的规范性构想扎根于这种哲学观中，并且只需要进行少许调整就能将现实主义的概念用于变化了的国际形势。

然而，这并不意味着意识形态不再在基辛格对国际事务的思考中发挥作用，只意味着它仍然是内在的而不是外在的。正如有人所说，实用主义就是简单地把你的伦理观当作理所当然的事，因此现实主义作为对国际事务的一种观点简单地将意识形态看作理所当然的事。消除国内公众对苏联意识形态的厌恶已没有必要，对像基辛格和尼克松这样货真价实的冷战斗士来说尤其如此。在银行中储存了大量的意识形态，这是多年的投资，它们可以参加“现实”的实力斗争。

在尼克松和基辛格看来，压倒一切的现实是美国受到多重压力的支配。尼克松回忆说，“当我回顾1960年代美国的外交政策时，我感到它好像是被人控制的人质一样，首先是肯尼迪政府时期陷入了冷战，接着是约翰逊政府时期陷入了越南战争。我们一次只全力解决一两个问题的倾向已经导致所有阵线上政策的恶化”（Nixon 1978：343）。因此政策必须是多层面的，不同的要素间应保持协调。然而，在这个广阔的计划范围内，苏联是美国利益关注的首要焦点，基辛格敦促说，美国对它应该运用三个基本原则：“就事论事”“克制”和“关联”（Kissinger 1979：128－9）。这些原则中的第一项原则主张力避举行那种准备不充分的首脑会议和会谈，这些会谈只议“总体气氛”而不谈具体紧张局势的原因；第二项原则渴望营造一种双方都不谋求单方面优势的氛围。

第三项原则——“关联”包含了尼克松和基辛格外交方针的精髓，这一原则出台以来受到了各方的大量评论。正如基辛格所描述的那样，“关联”是个无懈可击的观点，它确认外交政策及国际关系中的某些情况：

以我们的观点来看，“关联”以两种方式存在：当某位外交官在谈判中有意识地将两个独立的事物联系在一起时，一种情况是以其中一个作为另一个存在的杠杆，第二种情况是以两者的现实联系作为依据，因为在一个相互依赖的世界中，一个主要大国的多个行动之间必然有关联，且会产生超出直接相关的事或地区的影响。

（Kissinger 1979：129）

基辛格认为新政府在上述第一层意义上采取了关联方法，他写道：“当我们在解决越南战争问题上取得进展时，苏联则在某些利益领域也取得了进展，比如，中东、贸易和军备控制等方面。”但他又补充道：“在更为重要的意义上，‘关联’是一种现实，而不是一种决断……我们认为‘关联’与整体战略和地缘政治概念是同义的。”尼克松政府能够凭借的最终手段是“将我们的外交政策从过分扩张与孤立之间的波动中解脱出来，并为国际利益概念打下坚实的基础”（Kissinger 1979：129，130）。

基辛格显然有意低调处理“关联”的第一层意思，也许是因为它似乎暗含了威胁性。同样很清楚的是，基辛格无意扩展“关联”的范围来改变一个国家内部结构或社会准则。这种“关联”的概念可能会在没有对苏联的行为产生实际影响的情况下加剧紧张气氛。基辛格坚决反对从道德或意识形态角度将政策合法化，他从国家结构和地缘政治的角度来看世界，这一点前文已经指出。因此他对国会在一些事情上坚持要给予苏联最惠国地位以及满足苏联愿望的做法（如允许苏联犹太人向美国移民等做法）感到非常沮丧（Litwark 1984：152－3）。

然而，如我们已经讲过的，苏联人对“关联”的理解认为，它在概念和实践方面都是惩罚性的，其本质中“大棒”要远远大于“胡萝卜”。“关联”的目的在于约束苏联。事实上其部分目的正是如此。在这层意义上，“关联”就是用一只手去买另一只手卖掉的东西（两手并用），就是说承认苏联的平等地位。“关联”的用意在于用公

开采取控制甚至是强制的手法改变“苏联的行为”。关联的模糊性表明了缓和本身的模糊性。在原则上，按照美国的理论，缓和意味着人们已经承认：世界正朝着多极化方向急剧变化，共产主义威胁正在扩散，新经济力量的地位在上升，这一切已超越了冷战固定不变的界线。然而，事实上，苏联不仅仍然是美国外交政策关注的重点，而且一个接一个的事件表明，美国领导人对共产主义威胁的基本认识几乎没有变化。

尼克松在他的备忘录中非常清晰地揭示了缓和双方一些鲜为人知的真相。在责备肯尼迪和约翰逊的“一次只全力解决一到两个问题”的做法时，尼克松又补充道：“我感觉不应该有需要优先考虑的单一的外交政策。”他还做结论说：“我观察了美国在世界上的地位，并审视了美国与其他国家间的关系，发现1968年我担任总统前面临的核心问题与1947年我随赫脱委员会（与马歇尔计划有关）首次前往欧洲时一样。美国现在同当时一样，仍然是自由世界抵御共产主义世界侵蚀和侵略的主要力量”（Nixon 1978：343）。简单地说，美国的缓和政策还远未从这一旧的遏制共产主义势力扩张的首要问题中摆脱出来。

苏联实现缓和的方针同样也反映出其一贯的基本特点，当赫鲁晓夫的名字从大众生活中消失时，“和平共处”政策被再次使用，该政策的渊源可以追溯到列宁时期。和平共处的最初意思暗含着：在布尔什维克革命之后，世界范围的社会主义革命没有取得胜利的情况下，如果社会主义想生存下去并实现繁荣，苏联就必须与资本主义国家共处。避免战争——尤其是在核时代——是必要的，但即便如此，苏联还应做好必要的战争准备，以应付可能爆发的战争。和平共处从来就不是一个消极的理论，它包括必须在内部加强团结，还包括尽可能扩张社会主义的地盘。1969年6月，各国共产党在莫斯科召开国际会议，会议通过的声明是这样解释和平共处的：

> 和平共处政策不否认任何受压迫的人民通过其认为必要的手段——武力的或者和平的……为实现自由而战的权利。这一政策

> 并不意味着墨守社会政治现状，或者削弱意识形态斗争观念。该政策有助于在一国或者世界范围内反对帝国主义的阶级斗争。
>
> （Daniels 1985：Vol. 2：355）

也许更为不祥的是，这一文件还称，“迫使帝国主义分子承认不同社会制度的国家可以实现和平共处需要通过斗争，而捍卫和平与这种斗争有着不可分割的联系”（Daniels 1985，Vol. 2：354－5）。因此，一个看上去没有什么威力的理论（如美国的“关联”理论）实际上深深地暗含着威胁。所以对美国人不采纳苏联人的和平共处这类术语也就没有什么可惊讶的了；对美国人来说，和平共处这一术语看上去是如此的平淡无奇，完全是欺人之谈，这一观点早在1960年乔治·凯南先生与赫鲁晓夫交换意见时就表达出来了。具体内容刊载于美国期刊《外交事务》上（Kennan 1960：171－90）。然而，基辛格还是同意了这一术语，那是在1972年的一次新闻发布会上，他说明了与苏联关系问题的基本原则协议（Garthoff 1985：293）。事实上，这一术语已经出现在基本原则协议文本中，该文本阐述了前十年美苏关系所走过的历程。

自赫鲁晓夫积极地与西方国家领导人进行对话以来，苏联对国际环境及美国实力的理解发生了重大变化。鉴于苏联存在易受西方核力量打击的弱点，赫鲁晓夫的狂暴态度几乎不能隐瞒他心中沉重的焦虑。然而，在他的继任者领导下，这个弱点在很大程度上得到了克服。这一变化与遍布全世界的民族解放斗争相结合，就置西方国家于防御地位，从而使苏联领导人相信“力量的天平”正倒向有利于自己的一方。“帝国主义的实力政策”与帝国主义推行该政策实际能力之间的矛盾变得越来越明显。帝国主义既不能重新获得已失去的历史主动权，又不能阻挡世界的发展。人类的主要发展方向是由世界社会主义体系、国际工人阶级和所有革命力量决定的。更为特别的是，还有这样的分析，“美帝国主义这个最强大的帝国主义国家在越南遭到惨败，这是个具有历史意义的事实（Daniels 1985，Vol. 2：352）”。

然而，正如缓和理论的两大权威学者指出的那样：“苏联的思想

教育是：当资本主义认为其力量遭到不可逆转的多方面的威胁时，资本主义世界就到了最危险的时刻。”因此战略均势的出现要求提高警惕，而不是去冒险（Bowker and Willvims 1988：31）。进一步讲，核均势的取得使各方改变了对国防政策中军备控制作用的评估。1964 年，约翰逊总统提出，只要苏联的地位不及美国，且这一状况继续下去，苏联就会处于劣势。1969 年，双方的相对实力以及双方竭力避免爆发核战争的心态，成为双方外交政策中压倒一切的优先考虑问题，使得军备控制谈判成为突出的议事日程（Bowker and Willvims 1988：37－8）。

苏联的缓和政策，如同美国的一样，具有两面性。它不需要消除与美国的激烈竞争而引起的疑虑，就可能与美国达成和解。此外，“关联”与和平共处这两个概念之间发生冲突的潜在可能性已非常明显。“关联”概念的基本要义在于：外围发生的事件可能会对中心产生极其重要的影响，因而两个超级大国都必须尽力避免点燃导火索；和平共处的基本要义在于：世界范围的社会主义目标的不断实现与以重建超级大国关系为中心的实践并非是不一致的。换句话说，正如肯尼思·戴森所讲的那样，“西方对苏联和平共处的特定概念有了了解，同时苏联对西方缓和概念的扩张性感到震惊，并有了防备（Dyson 1986：37）”。

很显然，仅用理论还说不清缓和的全部故事，但它却能使人感悟出指导双方实际政策的一种观念。实际上，两个超级大国都经历了观念上的一场冲突，认为世界正变得越来越复杂和多样化，且双方长期经历所产生的直觉提醒它们要注意另一方可能利用新的力量对比所提供的机会谋取优势。其结果也许是不可避免地就会奉行一种看似矛盾的政策：如果可能就实行缓和，如果必要就进行冷战。

缓和的实践

超级大国

我们可以将美苏间达成的所有协议划分为三大类：第一类是经

济、文化和科技合作；第二类是危机的防范和控制措施；第三类是军备控制。后者所占的比重最大，但弄清另外两大类在整个缓和的动态过程中所起的作用也非常重要，因为美苏两国对它们的价值有着迥然不同的看法。

1972 年 5 月，尼克松与勃列日涅夫就第一类协议内容进行的首次首脑会谈（像就另两类协议的内容进行的会谈一样）为缓和打下了重要基础。双方签署的协议为在医疗、公共卫生、太空探测、科技研究和环境保护等领域中进行合作提供了可能（Nogee and Donaldson 1988：269－70）。但这几个领域的合作事件本身都不具有促成或破坏缓和的特性。也许它们只反映出普遍流行的观点，即建立非政治性联系的国家间——彼此将对方只看作人民而不是国家——不大可能发生政治或军事冲突。然而，它们对那些受到影响的人民来说却关系重大，并具有重要的象征意义，如果政治关系出现滑坡，那么这种关系就很容易遭到破裂或者降级。

影响更加深远的是美苏商务联合委员会的建立，其目的在于实现两国贸易关系的正常化。就在美苏实现首次首脑会谈后的 10 月，有关的一些计划就在签订对双方都有利的贸易协议方面结出了果实——解决了苏联所欠美国的债务，这笔债务缘于战时租借法案，当时苏联借此获得了银行贷款以购买美国的技术和农产品。此外，以苏联偿还租借法案债务为条件，美国将给予苏联最惠国地位，允许苏联商品进入美国，并减少关税。毫无疑问，苏联在经济领域的收益要比美国大，苏联急需得到美国的粮食和技术，而对美国来说，经济关系主要是实现缓和这个大目标的调节手段。

对苏联的粮食销售问题首次暴露了缓和的脆弱性。1972 年 5 月首脑会晤后不久，苏联开始与美国的粮食公司就购买美国大批小麦及其他农产品事宜进行谈判。由于得到大量美国贷款的援助及农业部的支持，截至当年年底，苏联以低于世界标准的价格购买了美国大量多余的粮食。没有参与此次交易的美国国会对此做出了反应，指责尼克松政府遭到了苏联的愚弄。所谓的“特大粮食被劫案”激怒了国会，

于是国会开始在美苏签订新贸易协议方面对尼克松政府发起反击，而处理该问题即给予苏联最惠国地位问题是在国会权力影响范围之内的。在接下来的两年中，国会坚持将给苏联最惠国待遇与放松对苏联犹太人移民限制问题挂钩，将自己的“关联”方式强加于美苏关系，而苏联犹太人移民问题是自其被认为干涉苏联国内政策以来就一直被基辛格明确否定的“关联”方式。参议员亨利·杰克森和众议员查尔斯·瓦尼克促使国会通过了1972年贸易议案修正案，将移民条件与最惠国待遇问题结合在一起，并与另一个给予苏联低利率贷款修正案挂钩，其结果是减少了对苏联的粮食销售，苏联否定了最初的贸易协议。正如雷蒙特·加特霍夫所说，“关联”已经“泛滥成灾”（Garthoff 1985：305－11，453－63）。在美国，由于国内压力而攻击这种缓和做法的事例很多，上述事例只是其中的第一起。

这一事例也反映出美苏关系在这个急剧变化时期反复无常的特性：苏联为了维持其在自治及行动自由方面至关重要的利益，准备在一些重大问题上做出让步，而美国（或至少是其政府中的一个派系）强调即使在一些对美国的国家利益并非至关重要的问题上也要坚定立场。双方需求的不对称性是影响缓和形势变化的重要因素。

危机预防及控制机制从字面上看对重塑两个超级大国的关系具有潜在意义。它可以使指导两国间交流的基本原则具体化。的确，这些基本原则本身并不能实现它们渴望产生的转变。像古巴导弹危机之后建立“热线”一样，它们一方面意在以此反映从事实中得来的经验教训，另一方面，也反映出双方愿意采取措施汲取这些教训。然而，由于这类协议设定了行为准则，如昆斯伯里拳击基本规则那样，它们可以在具体协议问题上协力，营造信任气氛，并相互认可合作的可能性和局限性。

范围最广的这类协议就是1972年5月首脑会晤时签署的美苏关系基本原则协议。该协议使双方致力于实现创造“促进世界紧张关系缓和及加强全球安全与国际合作”条件的广泛目标。接下来还有12个原则，其中最重要的原则就是，“双方确信，在这个核时代，只能在和平共处的基础上处理相互关系，舍此没有其他可替代的方法。

在相互尊重主权、平等、不干涉内政和互利的基础上，美苏在意识形态和社会制度方面的差异并不妨碍双方正常关系的发展”。其余的一些原则要求相互保持克制，避免危机，忠实履行所有双边和多边条约，双方还承诺为裁军及在经济、科学和文化领域中进行合作而共同努力。这些原则包含的内容极其广泛（text in Grenville and Wasserstein 1987：456 - 8）。

从美苏相互关系的所有表现来看，很显然，两国对基本原则协议的理解有着不同的侧重点。据报道，勃列日涅夫认为这甚至比（美苏）限制战略武器条约“更加重要”，而尼克松与基辛格则不这么看。加特霍夫指出，尼克松没有参与起草和讨论基本原则协议。是基辛格在5月首脑会谈前参与了讨论，显然尼克松认为基本原则协议不是行为准则而是判断美苏关系进展的一般准则，不应该照字面意思逐字予以解释。不仅如此，美国方面在制定基本原则协议时没有参考白宫以外的其他官员的意见，而苏联则让主要外交政策制定机构全面参与了该协议的准备工作（Garthoff 1985：291 - 8）。

围绕预防核战争协议问题也有一些相似的态度和情况，该协议签署于第二年（即1973年6月）华盛顿第二次首脑会晤期间。实质上，这次首脑会谈将基本原则协议应用于处理有关降低“核紧张”的具体事宜，尽管该协议明显没有包含双方承诺“不首先使用核武器”的内容，苏联长期以来一直主张这一政策，但美国却一直抵制，理由是苏联可能对欧洲发动常规进攻，因此美国感到有必要保留动用核武器的选择。无论如何，同基本原则协议一样，美苏间的共同点要比显而易见的分歧少。

该如何解释美苏在对待基本原则协议和预防核战争协议问题上的差异呢？毫无疑问，美国的立场源于其对苏联的善意所持的长期怀疑态度。苏联在雅尔塔会议文件中对在波兰进行自由选举的承诺，苏联对大西洋宪章和解放欧洲宣言的支持，除了在东欧强制实行共产主义之外，其他全是空谈。尽管这些历史片段已经被埋葬，它们对尼克松、基辛格这一代领导人来说不可能被完全埋葬，根据基辛格的现实

主义及美国自己外交政策传统的道德准则，更多的人认为这类一般承诺很容易做出，也很容易违背。就具体问题所达成的协议是一回事，而普济主义者的花言巧语则是另一回事。意味深长的是，危机预防措施如预防公海事件的海上协议的最成功之处同时也是其最受限制之处。与此相比，基本原则协议未能经受住早期的考验：在1973年10月爆发的阿以战争中，两个超级大国都参与了冲突。

限制战略武器谈判产生了两个截然不同的协议：一个是限制战略核武器临时协议，另一个是反弹道导弹条约。这两个条约都是在1972年5月举行的莫斯科首脑会晤期间签署的。复杂曲折的谈判花费了双方两年时间，这种状况主要是美国方面造成的，因为基辛格与苏联大使多勃雷宁的秘密渠道与美国第一阶段限制战略武器条约谈判小组经常缺乏协调。美国的谈判小组由杰拉德·史密斯领导，事实上，他对基辛格谈判立场的要点一无所知，结果造成他和他的同事们对达成的协议感到不太满意。雷蒙特·加特霍夫是史密斯谈判小组成员之一，他后来还是限制战略武器谈判中一位具有学者风度的首要权威人士，他认为签署限制战略核武器临时协议是"一次重大失利"。

该临时协议只能有效地阻止陆基洲际弹道导弹发射架在数量方面的核军备竞赛。即使这种限制（限制美国的陆基洲际弹道导弹为1054枚，限制苏联的为1618枚）也因该协议在其他方面所做的规定而变得毫无实际意义了。首先，尽管对潜射弹道导弹也进行了限制，但对其设定的限额很高，若要达到此限额，还需要显著增加潜射弹道导弹的数量。美国对潜射弹道导弹的立场非常含糊，基辛格似乎还没有明白它们的重要意义，在谈判的某个阶段准备将它们排斥在协议之外。苏联与美国不同，它当时正忙于加速扩充潜艇数量和建造潜射弹道导弹，因此它赞成美国这一立场。在后来的谈判中，虽然对潜射弹道导弹的数量重新规定了限额，但是苏联计划发展这类武器的数量在此限额之内，因而得以有效保留。

该临时协议的第二个特点是，它虽然规定了弹道导弹发射架的限额，但却没有禁止多弹头分导再入飞行器。起初美国提议禁止多弹头

分导再入飞行器，但这个问题受到一些条件的限制，如苏联不接受以现地核查的方式来验证是否遵守协定。再说，美国主动提出这一建议也是作为一个谈判策略，并不是一个坚定的主张。真实情况是，美国早在1970年就准备部署多弹头分导再入飞行器，如果现在加以禁止，那将阻止美国处于明显优势地位的这一武器系统数量的增长。苏联清楚自己在这一领域落后了几年时间，所以同美国一样对谈判限制多弹头分导再入飞行器没有热情（Bowker and Williams 1988：70）。结果是一个军备限制规则仅包含了少数几个有效限制措施，而且该规则对武器现代化没有加以限制。然而不管怎么说，作为一个公开的“临时”协议，它已经提出了一个设想，全部条约的条款将在美苏第二轮限制战略武器条约谈判中加以敲定，结果如何我们将在第十一章中说明。

反弹道导弹条约在很多方面都是比较成功的，因为它比较明确地规定了哪些做法是被允许的，哪些是不被允许的。同时允许各方部署两套反弹道导弹系统，一套部署在全国指挥中心周围，另一套部署在其他地点。该条约还对双方拦截导弹的数量进行了限制①。而且，该条约还全面禁止反弹道导弹系统的发展、试验及部署，不论是海基、空基、太空基，还是陆地机动型反弹道导弹系统都一律禁止。那为什么双方愿意接受这样的约束呢？这可能有两个原因：首先是双方在该领域中都没有明显的优势，处于相对均衡状态，签署条约就比较容易；其次是反弹道导弹系统的技术状况还不足以确保这种系统能够提供综合性防御。如果出现与此相反的情况，尤其是一方处于明显的优势地位，那么双方都不大可能愿意放弃反弹道导弹系统的发展，因为放弃发展这种武器系统将使它们的进攻型导弹的威力变得脆弱。在这方面，防御系统对进攻能力有重大影响。所以反弹道导弹条约就与签订有关进攻型导弹的协议密切相关。事实上，如果没有反弹道导弹条约的限制，那双方都可能不会考虑对进攻型武器系统加以限制。1980年代初，里根政府提出“星球大战”计划，其初衷就是建立一个综

---

① 1974年在符拉迪沃斯托克进行的谈判中将各方的反弹道导弹系统减少为一套。

合性的防御盾牌，这一举动重新提出了反弹道导弹问题，这至少暂时使战略进攻武器的谈判陷入停滞状态，这是双方技术上的差距影响达成协议可能性的另一例证。

美苏第一阶段限制战略武器会谈的有关协议内容只反映了一部分实情，而其背后的政治动态却是很重要的。主要协议是在 1972 年 5 月莫斯科首脑会议上达成的，这是尼克松出于战略考虑设定的时间，目的是想对总统大选活动产生最大程度的影响。有些理由说明反导条约本来可以早在 1970 年签署的。这表明美国方面对谈判的安排不仅是出于大选考虑，而且还反映出尼克松一基辛格决心按照美国谈判小组本身设定的要点严格处理会谈中的实质性问题。苏联方面也同样受到国内因素的制约，1970 年和 1971 年，苏联农业大减产，粮食和家畜饲料供应紧缺，而且 1970 年 12 月，波兰爆发了粮食骚乱（起因是面包和肉类供应紧缺，导致粮食价格上涨）。暴乱被镇压后，盖莱克取代了哥穆尔卡，虽然解决了眼前危机，但却暴露出了东方集团粮食生产不足的问题只能靠进口来解决。所以苏联渴望与美国达成粮食协议，如果西摩·赫什的话可信，美国也有意将向苏联提供粮食与签订第一阶段限制战略武器条约联系起来（Hersh 1983：339－40 and Ch. 25 *passim*）。

其他一些有影响的事件也有助于解释 1972 年在签署实质性协议方面取得的成功和随后所遇到的困难。从 1972 年开始，使情况复杂化的因素包括：前文已经提及的贸易谈判的破裂，以及在近两年期间“水门事件”曝光使尼克松在政治上显得越来越脆弱。尽管 1973 年华盛顿首脑会晤（会谈达成了预防核战争协议但被贸易阴影笼罩）和 1974 年的首脑会晤（会谈的内容是将限制战略核武器临时协议转变成第二阶段限制战略武器条约，但几乎没能取得什么进展）不是因美苏双方充分利用 1972 年的有利形势而举行的，然而幕后活动的因素对 1972 年首脑会晤的成功却发挥了重要作用：这就是美国向中国敞开了大门。此事因 1972 年 2 月尼克松出访北京而众所周知。尽管尼克松主要优先考虑的问题可能是越南问题，但苏联看到了美国此

举的重要意义。尼克松访问北京后，苏联很快采取措施安排勃列日涅夫与尼克松举行“5月首脑会晤”（Garthoff 1985：242）（本书第十章与越南相关的一节将论述美国的对华政策问题）。上述情况充分说明了美苏两国的内部需求与外部压力之间相互影响的复杂关系。

对此没有什么可以惊讶的。在国际政治的真实世界中，不仅各种动机不可避免地混杂在一起，而且一个领域永远不可能与另一个领域完全隔绝。在这个意义上，也正如基辛格评述的那样，不论公开的意图如何，事物之间总是有关联的。美国搞缓和的明显特点是认为相互竞争的力量和意图的杂乱状况可以用一种连贯的有秩序的方式来调整。在有些领域据说“关联”的因素起了作用。苏联承认它已经向北越施加了压力，要求它与美国达成协议，但苏联并没有允许美国1972年对河内和海防布雷和实施轰炸，以致破坏了美苏首脑会晤计划。尽管苏联否定了1974年与美国的贸易协议，但对犹太人移民经过一段时期的限制后，到1970年代中后期，这些限制也有所放松（Garthoff 1985：1003）。

然而，现在还不清楚在一个领域施压与另一个领域取得有益结果之间是否有简单关系。在越南事例中，苏联决定不理睬美国1972年春季的挑衅性军事行动，这可以被看作苏联将问题区别对待的一个例子，而不是与美国有关联的结果（Bowker and Williams 1988：75）。这也不是所谓的苏联对北越施压是对美国军备控制决议的一种简单回报。在贸易与苏联犹太移民问题之间的关系上，因果关系仍然不是十分清楚：1970年代末，是否因为美国没有给予苏联“最惠国待遇”，苏联才放松对犹太人移民的限制。有人认为苏联同意美国在某些领域中的要求不是出于直接利害关系，而是出于这种见解，即在某些领域的妥协意愿将在总体上缓解紧张关系并能增加在某些重要问题上达成协议的可能性，这种看法似乎有些道理。然而，有人认为在这些事例中选择权在苏联，而不在美国，这种看法也是有争议的。至少，并没有一个统一的利用杠杆的模式可以应用于产生预期的结果。不论何种情况都有足够的事例可以说明“关联”没能起作用，尤其在第三世界，这给美国提出的主张投下了疑云。

欧洲的缓和

欧洲的缓和在一些基本方面与超级大国间的缓和不同，前者在很大程度上与领土及具体政治纷争有关，如柏林的地位问题。有效的欧洲缓和意味着解决二战遗留下来的没有了结的问题。这使得欧洲缓和的焦点显得很清楚，而这些焦点在美苏缓和中甚至在核武器领域并不明显。因此，军控协议中存在很多模糊问题，如核查问题（处理这方面的问题有赖于“国家技术手段”或者间谍卫星）、武器现代化问题和导弹的规模问题。而且该军控协议对限制战略核武器临时协议完全省略的领域，如多弹头分导再入飞行器和美国前沿基地系统（主要指美国部署在欧洲的轰炸机力量）只字未提。此外，超级大国间缓和的其他方面，比如危机预防措施、贸易问题和引导超级大国关系的总原则的阐述等还普遍存在模糊不清的问题，在说明欧洲缓和的主题——解决领土和政治问题方面，几乎没有明确的准则。

还有另一个重要的区别：当联邦德国与东方集团都渴望能进一步改善关系，欧洲的缓和肯定会向前发展时，欧洲缓和的实质就在于正视过去的历史。它涉及已经存在的状况，即战后欧洲的分裂以及由此引发的反常情况：分裂的柏林深陷在民主德国，还有 1945 年苏联采取断然措施，强制更改德波、苏波边界线。当然，这些问题的解决会产生影响深远的后果，如果苏联能预见到这一点，它肯定会重新思考是否应该参与这些事宜。正如本书第十三章所提到的，1980 年代后期，苏美双方达成了和解的协议，消除了双方 1970～1972 年会谈中存在的那些分歧，这在某种程度上促进了东方集团共产主义体系的瓦解。这种看法有待论证。然而，欧洲缓和的过程使欧洲内部关系的调整变成了一段真实的历史。同超级大国的缓和相比，它部分地说明了欧洲缓和为什么会持久。

第三个区别似乎来自与威利·勃兰特的政治个性相符合的政治地理学。西德临近冷战前线，这使联邦德国领导层倾向于政治现实主

义，而这在推行基辛格现实政治的美国领导圈子中并不总是很明显的。当然，勃兰特本人是个现实主义者，他决心以精神上而不是实际上统一德国的观点精明地与苏联进行谈判，但他的政治对手认为他建立政治圈是徒劳的。在西德人的眼中，勃兰特主张的“一个民族两个国家”的形式表明，他承认了苏联的基本要求，即德国的分裂应被看作合法的。勃兰特得到的让步回报——两德人民可以更自由地流动——几乎没有能够补偿放弃西德是个独立国家这一基本原则所造成的损失。但勃兰特的让步——肯定是让步——所体现的现实主义比建立在力量和国家关系基础上的现实主义含义更深刻。它的出发点是：要意识到强权政治可能设置种种障碍，同时应看到通过真诚的让步可以超越那些障碍。勃兰特对苏联的意图几乎不抱什么幻想，而且他还能将其他人几乎看不出来的东西看得清清楚楚，那就是承认现状可以起到改变现状的作用。

西德的东方政策体现在三个重要的双边协议中，即分别与苏联、波兰和东德签订的协议。与此相平行，四大国在柏林举行会谈达成了四方协议，在会上 35 国（除美国和加拿大外全是欧洲国家）协商决定将欧洲缓和冠以欧洲安全与合作会议（简称欧安会）的名称。

1970 年 8 月，西德与苏联在莫斯科签订了第一个双边条约，其中两个主要条款——相互放弃使用武力和相互承认所有欧洲国家的边界不容侵犯——满足了苏联长期坚持的要求，即承认 1945 年苏联强行划定的波兰—东德边界，此边界在战前的边界以西 100 英里处的奥得河与尼斯河流域。半年后，西德和波兰签订的第二个双边条约中进一步确认了这一方案。这些条约看来完全是片面的，西德方面对这些条约的认可提出了条件，即要达成一份有关柏林问题的可接受的协议。第三个双边条约——东西德间的条约——花费的谈判时间更长，直到在 1971 年强硬的东德领导人瓦尔特·乌布利希被比较温和的埃里希·昂纳克取代后才得以签订。当条约在法律上没有得到全部承认时，两国同意互派常驻代表团（而不是大使）并同意双方申请联合国成员国资格。有的条款还规定东德进口西德商品时免收欧洲经济共

同体的关税（Nogee and Donaldson 1988：260－2）。

1971年9月签署的四方协议中有关柏林问题也有类似的妥协。这次仍然是因为乌布利希下台起到了催化剂作用。但西德与东德都没能实现各自的最高要求：西德要求西柏林应被视为西德完整的一部分；东德则要求柏林应该被建立成一个广义上独立的实体。协议确认，西柏林“仍然不是德意志联邦共和国法定的一部分，也不能受其统治”。此外，条约还在总体上规定增进东、西柏林间的联系，并具体明确了西柏林的常住居民出于“同情、家庭、宗教、文化、商业原因或者旅游”原因可以去东柏林访问或旅游。至关重要的也是西方最关心的是，苏联同意西柏林与西德间的通道应“不受阻碍”，从而排除了苏联在1948年、1958～1959年和1961年几次柏林危机时曾使用的武器（Grenville and Wasserstein 1987：197）。

由于这些条约的签订，制定解决欧洲政治与安全问题的综合性方案的障碍就被排除了。实际上，西方长期以来一直抵制苏联要求召开这样一种会议的愿望——可以追溯到1954年莫洛托夫的提议，其原因在于它们怀疑苏联会利用这个机会使西方联盟出现动摇并最终迫使美国从欧洲撤军。碰巧出现了欧洲缓和与超级大国缓和的协调一致——这至少体现在勃兰特总理根据与美国签署的一系列广泛的协议非常小心地推行他自己的东方政策，从而提前促成了这个结果。然而，关于美国正式承认欧洲现状是否明智的问题，美国一直持怀疑态度，而且对欧安会做出的决议几乎没有什么好评。

欧安会的最后文件于1975年8月在赫尔辛基签署，它包括三个协议或称“三个篮子”，第一个是关于欧洲的安全问题；第二个是关于经济、科学、技术和环境方面的合作问题；第三个是关于人道主义及其他领域的合作问题。第二个篮子相对没有什么争议，但第一个和第三个篮子所包括的条款，如果从字面意义上讲，对美国和苏联都造成困难。第一个篮子保证各方达成“指导参与国之间关系的原则宣言”，内容包括尊重自主平等权、制止威胁或使用武力、边境不可侵犯、和平解决争端、不干涉内政、尊重人权和基本自由、坚持人民自

决、国与国之间保持合作以及在国际法范围内履行国际义务（text in Gren ville and Wasserstein 1987：463－7）。

第三个篮子对第一个篮子中的人权部分进行了扩充，除了人们可越国境来往外，规定各方都致力于促进信息和思想领域的交流。新规定还简化了家人团聚和跨国婚姻所需要的手续（text in Grenville and Wasserstein 1987：469－71）。

如果根据该协议背后的政治因素对它做出解读，那么从各种现象来看，《赫尔辛基最后文件》为东西德关系的全面正常化开出了良方。实际上，每一条款都有一种支撑的东西。举例说，支撑苏联致力于实现民族自主的东西是勃列日涅夫在东欧实施的有限主权论；支撑苏联致力于人权及人民更自由往来的东西是苏维埃制度和“铁幕”，这些概念宽泛的名词几乎没有明确的界限，至少在初期是如此。然而，同意这些条约对苏联来说要冒一定的风险，因为这些条约使人们产生的期望只有通过变革才能实现，而这些变革可能给苏维埃制度造成危险。冒这样的风险是值得的，因为某些安全措施已经被纳入这些条约的其他部分，比如，不干涉他国内政的原则。此外，苏联在人权领域的让步因在其他领域有所收益而得到了补偿，如承认政治及领土现状，反对德国的复仇主义，以及得到西方进一步加强与苏联经济合作的承诺。

苏联没有预见到的是《赫尔辛基最后文件》中第三个篮子的规定会成为东方集团内部持不同政见者的兴奋剂和西方压力的焦点，前者的后果比后者更为严重，前者的后果是在苏联和其他东方集团国家建立了多个赫尔辛基协议监督执行小组。西方国家在人权问题上的压力，就像卡特政府所做的那样，至少在短期内引起了美苏关系紧张。

这里我们又看到另一个具有讽刺意味的事情：将欧安会看作缓和高峰的苏联从长远看可以说失去的东西最多，而在很大程度上只将欧安会看作自我炫耀场合的美国，却成了最终获益的长期赢家。此外，两个超级大国都没能看到缓和作为一个过程已达到了可能打破冷战的程度。

结论

本章一开始就指出，缓和时期的特点是，冷战体系日益背离缓和所追求的更广泛的全球效应。缓和本身在两条平行轨道上进行：美苏双边关系趋于形式化，而西德与东方集团之间的关系趋于正常化；欧安会将两者结合在一起。当有人声称缓和失败了（常有这种情况）时，一定要想到与过去相比，现在超级大国之间的关系已通过定期接触机制进行协调，从首脑会议到与条约监督机制相关的低层会议，再到1974年欧洲开始的常规裁军谈判，再加上不断增长的学者、商人和旅游者的交流，这样就建立起了一种谈判文化，并在很大程度上被保持了下来，即使是在1970年代末1980年代初超级大国关系恶化的时候也是如此。此时在缓和继续发展的情况下，对美苏两国的官僚机构都能带来既定的利益，那些对缓和的价值持怀疑态度的人也不可能完全放弃这种利益。

然而，当时并不很清晰的是，美苏关系的正常化与对冷战没有直接影响的因素之间存在的辩证关系，这些因素影响着超级大国之间的关系并渗入它的基础。其中最重要的是战略核武器谈判的核心内容，这是因为存在发生可怕的核事故的潜在可能性或者紧张关系不能解决时爆发战争的可能性，忽略了美苏关系中不易受到两极调解约束的问题——突出的是经济问题和第三世界的发展问题。换句话说，某个时候美苏双边关系正常了、成熟了，其对世界政治的影响力也就趋于下降了。为了解决这个问题，卡特总统的初步计划是试图根据南北关系而不是东西关系来调整美国的对外政策。但他的这一计划未能付诸实施，这并不反映他处理问题的单纯性，而是反映了两个超级大国内部冷战怪癖的顽固性。这个主题将在第十一章中论述。在第十一章中，我们将论述缓和时期超级大国关系中有关亚洲的问题。

第十章
越南战争与超级大国的三角斗争

引　言

对西方，特别是对美国来说，越南战争一直被认为是美国特有的问题。对这场战争最广泛的看法——如在电影、文献资料、小说和第一手报道中所反映出来的那样——大多是着眼于越南战争给美国社会所造成的影响。历史学家，除了某些特殊人物，都倾向于着重论述存在的问题，诸如美国是怎样卷入越南战争的？美国为何战败了？越南战争的教训是什么？

把上述问题作为重点是不难理解的。总的来说，美国在越南的经历无论是从国内角度还是从外交角度来看，都是其第二次世界大战后历史中举足轻重的大事。1968 年对美国来说不仅是战事急转直下的一年（当年北越发动了“春节攻势”，突袭了美国驻西贡大使馆），也是国内危机丛生的一年：种族骚乱和学生抗议活动达到了高潮。在许多美国领导人看来，这些问题已经威胁到了美国的社会基础。林登·约翰逊退出了 1968 年的总统大选，这表明美国政府在国内外的信誉降低了。

当美国人提到“越南”这个词时（如今仍然如此），他们所指的不是距其海岸线几千英里之外的那个国家，而是指与美国打这场战争

的惨痛后果相关的全面社会冲突。我们可以看到，实际上意见分歧比估计的更加复杂，尽管民意调查显示，意见分歧并没有像舆论报道的那样明显，事后人们各自对危机和分歧的看法并没有改变（Erikson *et al.* 1980：70－1，94，162，172）。

在战后许多年中，当谈到“越南综合征”时，人们总是强调战争引起了美国在外交和国内事务中的严重分歧。美国卷入越南战争和战争的逐步升级被说成是为了对抗共产主义的全球威胁而采取的一种举措。在越南实行该政策所付出的代价最终破坏了意见的一致性，否定了支持该政策的一些判断，并出现了在一个时期内无法对使用美国力量的目的和方法做出决断的情况。关于越南战争时期的政策和战后的政策的实际差别程度也有分歧意见。有充足的理由认为，尽管战败使人震惊，但越南战争的后果没有改变美国政策的基本模式。无论怎样，占主导地位的意见认为，越南战争时期的政策与越南战争后的政策没有连续性，并认为这场战争事实上是美国失败了，不过要强调提出的是，这场战争只是美国经历中的一个片段。

对于研究国际关系问题的专家来说，美国在越南战争中的经历只是需要研讨的诸多问题中的一个。为了全面了解这场战争，加布里埃尔·科尔科写道，“我们需要经常观察和考虑更大的动向及其相互关系，把它们看成统一的大背景中的重要组成部分”（Kolko 1986：6）。美国在1960年代末卷入越南战争时最明显的时代背景特征是，苏联和中华人民共和国的矛盾日益尖锐。其根源，正如我们看到的，始于1950年代，但是到1969年理查德·尼克松入主白宫时中苏两国矛盾达到了高潮。此后四年多，美国寻求在越南实现“光荣的和平”，同时美国也寻求同苏联和中国保持一种缓和的关系，其目的是利用中苏间的分裂，但同时又不疏远任何一方。三角外交和战争越南化是两种相关的政策。根据这种情况，对越南战争的理解应集中在对下述两个问题的理解上：其一，美国为什么会相信极其重要的美国利益在越南遇到了危险？其二，这些利益同美、苏、中三国之间关系的变化有什

么联系？强调这两个问题的同时要注意到这样一个严酷的事实，即北越坚持要实现在共产党统治下统一越南的目标。

越南与美国的国家利益

有关美国在越南的国家利益概念并不是一成不变的。事实上，美国对其目标含义的改变在很大程度上说明了战争的进程。进一步来说，把宣布的政策与实际执行的政策联系起来考察，不难看出制定政策者在平衡目的和手段时遇到的困难。我们与其按战争年代顺序，不如按制定政策者经常引用的目标来论述美国的政策。

有关第一个目标，我们必须追溯到 1952 年，那时美国的目标是“阻止东南亚国家被纳入共产主义轨道”（*Pentagor Papers* 1971：27）。这里强调的是整个地区，而不是某个国家，这与多米诺理论相一致，同时也符合美国冷战时期外交政策的重点，即将共产主义视为广泛范围内的敌人。另一个有重要意义的问题是目标本身的模糊性——是在已存在的共产主义疆界内遏制共产主义，还是包括消除共产主义向外扩张的影响，后者也许意味着美国将从根本上进行更加积极并更具扩张性的进攻。

当然，遏制共产主义的发展并不能称为一种政策，更不能称为一种战略，而只是一个目标。正如约翰·加迪斯指出的，“战略的运用是目的和手段相统一、意图和能力相协调、目的和资源相联系的过程”（Gaddis 1982：ⅷ）。基于这一定义，林登·约翰逊使战争逐步升级：1963 年美国在越南只有 1.6 万名顾问，而到了 1968 年，美国投入越南的地面部队已经超过 50 万人。这种大规模的增兵，只是为了实现所期望的目标。亨利·基辛格在一篇有影响的文章中指出了这一问题，该文章是在尼克松总统宣誓就职的当月发表的。他说：“美国的军事战略遵循这样一个经典理论，即胜利是靠控制领土与消耗对手力量相结合而取得的。”美军被部署在南越边界（目的是防止北越进行渗透）和据说是有大量组织起来的北越力量的地区。消灭敌军



图 10.1　越南与东南亚大陆（1954～1975）

资料来源：W. A. 威廉姆斯等：《越南战争中的美国：历史文献》，纽约，诺顿，1989，第 2 页。

部队，游击队便会因“孤立无援而衰败”。“不幸的是”，他继续写道：“该政策没有认识到游击战与常规战争之间的区别，游击战依靠对民众的控制，而常规战争则依靠对领土的控制。大批南越人都居住在湄公河三角洲（南部地区）和沿海平原地带，而大多数美军部队则部署在边界地区和中部高原地区，那里人烟稀少。”基辛格在结论中说道：

> 北越的各种理论著作中都提到，美国无法在其控制领土的同时做到保护居民。美国通过消耗敌人来赢得军事胜利的战略，产生了越南战争独有的特点：军事胜利不能转化成持久的政治优势……其结果是，美国的安全概念与越南村民的经验毫无共同之处。
>
> (Kissinger 1969：102 –3)

此外，绥靖计划本是为了加强南越政府对农村的控制，但是这一目标并没有实现。农村发展计划以及推行由肯尼迪提出的哈姆雷特战略计划，起到了破坏当地社会结构的作用（使数百万难民流入城市），却没有达到赢得当地民众民心这一军事与政治目的（Kolko 1986：236 –51）。

实际上“打败共产主义”意味着即使不是从根本上消灭北越，也要打败北越。问题是，共产主义在南部也很有根基，其存在形式是“越共”（或越南共产主义者），另外还有其政治组织——民族解放阵线。美国遭受的挫折在于击败南部越共的进程缓慢，主要原因在于越共部队经老挝和柬埔寨持续不断地被运送到南部，这使美国考虑应直接增加对北越的压力。从 1965 年开始，轰炸北越成为美国军事战略的一部分，开始时美国尽量避免对河内以及海防港进行攻击，后来在尼克松总统的授权下，美军开始对河内和海防港进行轰炸。此举是为了尽早达到如下两个目的：一是对在战争越南化政策下美军分阶段撤出进行必要的补偿；二是要通过此举迫使北越回到谈判桌前来。

尽管美国投入了大量的兵力并加大了对北越的空袭力度，但贯穿美国战略的总思路仍延续了朝鲜有限战争的概念。在约翰逊使战争进一步升级的过程中，他的这一做法在某种程度上蒙骗了美国公众的舆论，他一方面关注着中国的反应，另一方面注视着美国国内舆论的看法。如果击败共产主义要冒同中国全面开战以及美国全民都要投入战争之险，那就不是明智的选择。遏制共产主义在越南的发展遇到了两种障碍，这两种障碍在朝鲜战争中都不存在：其一，北越在南部有很稳固的立足点，北越的骨干分子从1950年代末就渗透到了南部，南越的农民并不理会美国为赢得民心所做出的努力，他们毫不为之感动；其二，印度支那的地理位置不可能把南越同其邻邦柬埔寨和老挝分隔开。理查德·尼克松关于越南战争的论点中至少有一点是正确的，这一论点是：这是一场印度支那战争，而不仅仅是越南战争。从这一角度来看，1970年尼克松决定入侵柬埔寨并向老挝派兵与这一论点有必然的联系，但他此种做法的结果是无效的，而且起到了破坏作用。尼克松的政策——扩大了现行有限战争政策的范围——无法摆脱因国内反战呼声渐高所产生的种种限制，也无法削弱北越抵挡惩罚和继续进行战斗的能力。

政策制定者把美国攻击的第二个目标称为“建立独立的，没有共产党存在的越南”，换句话说就是“使南越人民过上更加美好、更加自由的生活”（*Pentagon Papers* 1971：278，432）。这一目标看起来和前文论述过的那个目标相一致，但两者间也有很重要的差别。差别之一是，第二个目标是建立国家，这一目标是积极的，而不只是消极地将共产党清除出去。差别之二是，第二个目标的任务是使南越政府保持政治稳定，而不是使用军事手段清除南越的共产党。正如我们看到的，达到这一目标确实需要使用军事手段。但最终取得成功的标志是要在南越建立一个稳定的自治政府。美国该政策的核心是保持同南越政府的关系，以及帮助南越政府改善其同本国人民之间的关系。

美国在越南的三种做法使其没有达到目标。首先，美国对数届南越政府尤其是在1963年推翻吴庭艳政府后的做法，使人怀疑美国已

放弃了帮助南越建立独立的自治政府的计划。当然，美国不可能总是发号施令者。美国不断向吴庭艳之后的历届政府施压，要求他们进行改革，铲除政府中的腐败和重用亲属现象，力求以此来增加南越人民对政府的支持，但是收效甚微。美国一方面谋求对南越政府的有效控制，以达到其自身的目的，另一方面也意识到如果南越政府想在美军撤出后站稳脚跟的话，还是需要自力更生。最终结果是，美国对南越政府的影响大到了使其无法实现自治，但又不足以替代一个独立和稳定政权作用的地步。这一情况，再加上美国和南越在经济及军事方面的关系（这两种关系是影响南越独立和稳定的另外两种制约因素），使“越南”战争在很大程度上变成了美国战争。

其次，从经济角度来看，南越在很大程度上受制于美国，它不仅要依靠美国的直接经济援助，就连作战所需的基础设备也要从美国进口。战争对南越农业生产的破坏进一步加重了从美国进口物资的依赖。在管理美国援助物资的南越官员中腐败成风。随着战争的深入，建立自治的南越政府的可能性越来越渺茫（Kolko 1986：223－30）。

最后，同样的问题也困扰着南越的军事部门。在战争初期，当美国军人以顾问身份出现在南越时（至少表面看来如此），南越军事领导人和这些美国顾问之间的关系是很尴尬的。南越部队士气低落，南越军事领导人以降低伤亡率作为奖励的依据，结果各部队都不愿冒险，这种状况使美国的顾问们深感沮丧（Sheehan 1989：Book Ⅲ）。约翰逊总统将战争美国化，他用将指挥权转交美军的方法来“解决”这一问题，但同时又使另一个问题凸显出来，即剥夺了南越军队特有的自治梦想。1971 年，南越部队在没有美国地面部队支持的情况下，向老挝发起了进攻（前一年通过的美国国会修正案禁止美国向柬埔寨和老挝出兵），这次行动遭到了惨败。用斯坦利·卡诺的话来说，只要南越政府“奖励忠诚而不奖励能力的话”，战争越南化就不会实现（Karnow 1984：630）。

美国和南越在政治、经济和军事方面的混乱关系逐渐破坏了建立南越自治政府的目标。实现这一目标的困难之一是，在 1960 年代中

期美国改变了其要优先考虑的事。1964 年 3 月，美国国防部部长麦克纳马拉给约翰逊总统写信，信中称美国的目标是帮助建立起“一个独立的、没有共产党存在的越南”（*Pentagon Papers* 1971：278）。仅仅一年后，麦克纳马拉手下负责国际安全事务的助理国防部长约翰·麦克诺顿，将美国优先要考虑的事总结如下：

> 70%——使美国免遭令人感到羞辱的惨败（美国享有保证人的美名）；
>
> 20%——使南越（及其邻近的）领土免遭中国侵占；
>
> 10%——使南越人民过上更美好、更自由的生活。
>
> （*Pentagon Papers* 1971：432）

即使有人认为这种按比例分配的方案仅为个别政府官员的观点，应该还有不同的分配方案，但从此种分配方案中已能明显看出，美国做决定时，保持自己的声誉和威望已成为决定性的因素。这就好比是一种有力的否决权，尽管反战者一再呼吁美军撤出越南，但政策制定者仍倾向于排除单方面撤军的选择。有意义的是，建立独立的南越政府这一目标所使用的手段本身也成为一种目的，这给美国的参与提供了间接的正当理由。美军不撤就是为了实现这一目标。实际上，同加强美国在敌友眼中的实力和威望相比，越南本身的问题已不再重要。

在这种情况下，约翰逊使战争进一步升级，而这只会增大手段和目的之间的差距，因此实际的判断是，美国实现其目标的可能性越来越小。这使政府只得实行这样一种战略，即渡过难关的唯一方法就是增大兵力的投入。林登·约翰逊最后认识到，该战略只在 1968 年 2 月北越发动的“春节攻势”产生结果后才得以实现，其时美国在越南的统帅威斯特摩兰将军要求再往南越派驻 20.6 万人的部队，当时美国在南越部署的兵力达 54.3 万人。“春节攻势”使北越遭受了重创，但与美国在信誉上遭受的损失相比，这算不了什么。重要的是，北越的军队发动了这次攻势，并且深入到了南越的腹地，甚至打到了

美国大使馆的院子里。理查德·尼克松在回忆录中提到越南战争时写道，“有关我们是否应进一步介入越南战争的争论随着‘春节攻势’和11月1日轰炸的停止而结束。这些事件使我们决定不再更深地陷进去。无论我们事业的功过是什么，无论我们打赢战争的机会有多大，对于下届总统而言，已不用考虑是否撤军的问题，需要考虑的是怎样撤军以及应该在越南留下些什么”（Nixon 1986：96）。

从这一点上来说，当理查德·尼克松在1969年1月就任总统时，美国的三个目标——遏制共产主义在东南亚的发展，建立一个稳定和自治的南越，保持美国在盟友和对手中的信誉——都变得很难实现。使战争越南化就是为了实现上述三个目标。美国想要实现这些目标，其最高战略是在美国撤军的同时与北越进行和谈，正如尼克松所说，这样做是为了赢得“光荣的和平”。无论怎样，这样做至少会给美国指出一条从越南撤军之路，并如美国所希望的那样，至少能使它的一些重要利益得到维护。

尼克松政府所受压力的很大一部分来自国内舆论。1970年春，美国入侵柬埔寨后，反战示威活动达到了新的高潮。5月，四名学生在肯特州立大学惨遭国民警卫队杀害，激起了公众强烈的义愤。这些事件发生的时机是很耐人寻味的。同年2月，基辛格在巴黎同北越高级官员雷杜图举行了秘密会谈，他力求通过谈判解决问题。此后三年中，基辛格穿梭于巴黎和美国之间，他与雷杜图会谈的具体内容其同僚都不得而知，因为基辛格只向尼克松本人报告。

基辛格的努力因为一些因素的干扰而被大打折扣。首先，北越在时间上占有优势。北越先是同法国作战，后来又同美国作战，前后历时超过了25年，因此无论谈判怎样拖延，北越都能奉陪，可以一直耗到美国感到疲倦为止。相反，尼克松的时间却是有严格限制的——时间的限度要取决于美国国会和公众的耐心，另外还要符合竞选总统的政治要求。随着1972年总统大选的临近，尼克松感受到了时间的紧迫性。北越人也意识到了这一点，因此他们在1972年春天发动了大规模的攻势，该攻势一直持续到6月，这使基辛格感到压力很大，

使他不得不尽快解决问题。多亏美国的轰炸和直升机支援，处于困境的南越部队才得以免遭军事灾难。此时，在南越境内仅剩下几千名美国士兵（Karnow 1984：640 – 3）。

时间因素使短期和长期的军事问题都更加突出，这些问题从一开始就使美国的军事行动遭到破坏。一位军事专家写道，从长期来看，美国的遏制以战略防御的形式表现出来，并通过战术进攻得以加强。而北越实行的则是战略进攻，间或采取战术防御来巩固其战果（Summers 1982：Ch. 10）。北越不惜以重大伤亡为代价换取胜利，而美国是不可能这样做的，这就使北越的长期优势得到了进一步加强。就短期而言，为配合美国地面部队分阶段撤出，美国不得不依靠轰炸来增加谈判的筹码，并以此来支援南越的地面作战行动。

无论如何，前一段时期的轰炸并没有取得实际的成效，这是因为北越时常变换指挥中心，以及难以确定北越的重要经济目标。在约翰逊执政期间，北越已能够利用美国舆论对轰炸政策的厌恶之情，使美国政府限制了轰炸的地区范围和空战的规模。约翰逊反对军事顾问有关轰炸河内和海防港的建议，而尼克松却接受了此类建议。在 1972 年同北越的两次关键性谈判期间，尼克松命令 B – 52 轰炸机轰炸了河内地区。第一次轰炸发生在 5 月，这使得谈判有了突破性进展；第二次轰炸发生在 12 月，这次轰炸使曾在 1972 年最后几个月一度陷入僵局的谈判最后达成协议。虽然轰炸在其中起到了很大作用，但这并不是促使谈判达成协议的唯一因素。中国和苏联向北越施加的压力同样重要，具体情况将在下一节中详细介绍。此外，轰炸政策不仅在美国国内引起了很大争论，而且还妨碍了战争越南化这一目标的实现。

1973 年 1 月，美国和北越达成最后协议的条件说明美国借以进行战争的政治及军事基础很脆弱。从美国的角度来看，成功签署协议的标准是美国能够从越南“光荣”地撤出，并在南越留下一个军事上和政治上可靠的政权。然而结果却是：协议签订了，但是和平并没

有实现。

从表面看来，协议的达成是因为北越做出了重大让步。北越放弃了早先一贯坚持的政治和军事问题同时解决的立场，另外还放弃了以南越阮文绍总统下台作为停战条件的要求。如果北越仍把这些问题作为停战的先决条件，美国是不会答应的，因为答应这些条件将使南越的前途处在风雨飘摇之中。如果在阮文绍不愿接受这种条件，而美国方面又对阮文绍领导能力感到怀疑的情况下，以牺牲阮文绍的利益为代价签署协议的话，必将使人们对战争的合理性提出质疑。正如尼克松总统给基辛格的信中提到的，“阮文绍必须是心甘情愿地接受该建议，否则我们不能强迫他这样做”（Isaacson 1992：454）。实际上，阮文绍并不是心甘情愿接受该建议的，直到 1973 年 1 月协议达成前几个月，基辛格和尼克松不得不以与北越讨价还价相同的精力来说服阮文绍接受这些建议，在美国的一再劝说下，阮文绍可以说是别无选择。最后的协议将军事和政治问题分开处理，这使美国如愿以偿。首先是停战，美军撤出越南，双方交换战俘，之后是北越与南越进行双边谈判，建立“民族和解委员会”，随后对国家统一问题进行投票（Karnow 1984：648）。这个令人乐观的解决方案，无论怎样也掩盖不了美国做出实质性让步的事实，即美国答应停火后北越部队仍可留在南越。这意味着北越一旦重新发动战争，南越将无法应对，另外美国国会在 1973 年 3 月通过的决议规定，即使在北越违反停火协议或协议中其他内容的情况下，美国也不应向南越提供任何的资金援助。实际上，阮文绍和南越只能自力更生——这是对战争越南化政策的决定性的最后考验。结果是，两年后北越部队攻克了西贡，实现了用武力统一越南的目标。

基辛格在回忆录中写道：“我那时相信，现在仍然相信，协议能够生效。”他和尼克松同样认为：“最终，南越因美国的政治立场而失败，并不是败在东南亚作战前线。”基辛格将其归咎于因“水门事件”而垮台的尼克松政府；尼克松则将其归咎于“国会的不负责任”（Kissinger 1979：1470；Nixon 1986：15，165）。事实上，美

国政府宣布的政策（该政策坚信能使美国实现其目标）与越南实际的军事和政治状况早已存在着“信用差距”。1968年国防部部长麦克纳马拉签发的五角大楼文件——一份研究越南战争的冗长的内部报告——于1971年被《纽约时报》披露，该文件揭露了自肯尼迪当政以来，美国官员中盛行的自欺欺人和欺骗公众之风。在对文件进行分析时，汉纳·阿伦特指出了制定政策者对事实无动于衷的态度。凡是有悖于政府战争计划的新闻、情报和建议都被忽略和压制了。她说，制定政策者不尊重事实，将印象政治凌驾于事实政治之上。阿伦特把这种现象概括为“两种说谎艺术的新流派”——“其中一派是政府中负责公共关系的官员，这部分人显然是些庸碌之徒，他们根据麦迪逊大街上的流言蜚语干事情”；另一派是从大学和思想库中进入政府的“专业解决问题者”。这两派都很厌恶“意外情况”，而致力于制定忽略事实或窜改事实的命令，实际情况和主观愿望之间的差距要靠公共关系来弥补（Arendt 1971：30－1，34）。

有关该问题的另一种争议较少的解释是，美国对其力量的局限性认识不足。美国和北越的态度形成了鲜明的对比。众所周知，有史以来，北越一直处于“被征服国和附属国”（主要是中国的附属国）的地位（McGregor 1988：12）。北越的资源有限，它意识到自身在力量和资源方面与美国存在巨大差距，对中国和苏联持续援助的依赖性必然在一定程度上影响北越的政治和军事战略。这些制约因素使北越致力于实现使印度支那摆脱西方帝国主义压力的目标，同时它还提倡策略的灵活性，主张充分发挥政治上的创造性。

北越与中苏冲突

如果不是因为北越有一位英明的领袖，北越早就成为中苏冲突的牺牲品了。胡志明推行的政治和军事战略是，在不疏远这两个共产主义大国中任何一个的基础上为北越谋求利益。胡志明尽可能地在中苏分裂中保持中立，而且还使这两国都积极为北越谋利益（Zagoria

1967：102－4）。此外，地理位置使北越不得不与上述两国保持良好关系：北越主要从苏联进口重型军事装备，而这些装备主要又得经中国运入。在中国“文化大革命”和中苏决裂（1965～1969）期间，苏联和中国不断因运输问题而发生冲突，这使运输遇到了严重阻碍，导致比较严重的损失。实际上，中国和苏联都不愿意让这种事情发生（Funnell 1978：147－50）。

1965～1968年，中苏两国在越南军事战略以及和谈问题上发生了争执，这使北越处于两难境地，北越要同时顾及两国的感受。在军事上，北京方面主张北越实行毛泽东的持久游击战战略，而苏联则建议实行常规战战略，这反映了中苏两国在意识形态以及物质资源方面的差别。更糟糕的是，这种分歧加速了河内领导人和南方的民族解放阵线之间在军事战略方面的分裂。在和谈问题上，苏联和中国的观点也不一致：苏联希望加快结束战争的步伐，使问题得到政治解决，而中国则敦促北越“坚持打持久战，不要妥协和投降”（Funnell 1978：156－60，161）。苏联入侵捷克斯洛伐克，中国对苏联进行了强烈谴责。此时，中苏分裂加剧使北越受到了最严峻的考验。河内对苏联入侵捷克斯洛伐克的支持使河内与北京的关系恶化，但还没有达到公开破裂的程度。到1969年，北越已明显对其最大的援助国苏联实行了政策倾斜（Pike 1987：106 and Ch. 6），但这并没有切断北越与中国的关系。

有人说，中苏两国对河内的复杂意图仅限于对越南战争的看法，这是不正确的。两个大国均有自己的打算，越南只不过是它们各自图谋计划中的一部分。它们都想以此来改善彼此间以及同西方国家之间的关系，从而在世界中取得有利地位（Zagoria 1967：27－30）。但北越也是实实在在的受益者，北越一直使两国对其援助不断，同时它也对中苏两国任意发号施令有所抵制。北越继续从两国得到最大利益，它深知两国都不会在越南冲突中冒外交政策之险。另一方面，北越的策略运用也受一些环境条件的制约，其中重要的制约因素是共产主义大国同美国的关系。

美国向中国开放

随着1969年尼克松就任总统，国际关系有了实质性的变化。我们已经注意到，美国与苏联缓和关系的部分目的在于谋求苏联向北越施压，让其坐到谈判桌前来，以尽早结束战争。而美国向中国开放也有相同的目的。在美苏关系缓和的基础上，美国同中国改善关系要比改善同越南的关系更重要。事实上，在尼克松就任美国总统之前，中国已经表达了这种愿望，即它想避免越南战争升级为某种形式的中美战争，因此两国在1966年签署了一个被称为避免冲突的协定。据报道，中国提出了三个条件，美国均表示接受：第一，美国不得攻打中国；第二，美国不得侵略北越；第三，美国不得轰炸红河排水道系统（Litwak 1984：40）。这首次表明了美国已在重新考虑其不承认共产党中国的政策，在接下来的三年中，美国进一步采取试探性措施，开通了与中国的谈判渠道。

理查德·尼克松执政期间所取得的成绩令人意外，甚至可以说是令人震惊。自1949年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以来，这位先是众议员，后来成为参议员，最后就任副总统的尼克松，公开反对承认中华人民共和国，坚决支持台湾国民党蒋介石政府，态度比任何人都坚决。也许正如西摩·赫什所说的，“如同其他一些主要外交问题一样，尼克松对中国的态度是实用主义的，而不是基于理性认识的”（Hersh 1983：350）。早在1954年，我们就发现尼克松开始走中间路线，当时一派人主张美国别无选择，只有对共产党中国发动战争；另一派人则主张承认毛泽东领导的中华人民共和国，并与中国开展贸易往来，以诱使中国断绝同苏联的关系（Chang 1990：111 - 12）。此外，如果人们分析一下1961 ~ 1968年身为非官职公民的尼克松的思想记录，就可以看出那时他已认为不能否定共产党中国存在的事实。中华人民共和国的核能力在增强，已成为亚洲的政治实体，最重要的是中国不再依靠苏联，所有这些促使尼克松正视现实（Nixon 1978：272 - 3，

282 -3, 371 -4)。1967 年，在一篇名为《越南战争后的亚洲》的文章中，尼克松指出：考虑到中国日益强大，“从短期来看……这意味着实行一种严格限制、不给好处和施加压力的政策，旨在说服中国，只有遵守国际社会的基本准则，其利益才能得到保障。从长期来说，这意味着将中国重新纳入国际社会——但是应把它视为一个发展中的大国，而不是世界革命的中心”（Nixon 1978：285）。

尼克松的时间表因如下三件事而显著提前了：第一，有迹象表明，中国本身对同美国会谈很感兴趣；第二，美国找到了从越南战争中撤出的机会（原先认为在北越采取行动之后中国会入侵越南，这一看法现在有了改变）；第三，从尼克松本人来说，他赢得大选后，需要在外交上有个人的壮举。

中国的动机

尽管在“文化大革命”期间国内的事情牵扯了中国绝大部分精力，但中国领导人也在寻找途径来摆脱外交上的孤立局面。他们这样做，并不完全是因为同苏联关系恶化。中国越来越意识到自己的大国地位，1960 年代末，中国四处游说试图加入联合国，意识到联合国大会的许多成员国已认为台湾在联合国中代表整个中国是不正常的（中华人民共和国在美国放弃了反对意见后，最终于 1971 年加入联合国）。中国需要技术上的援助来开发石油资源，这使中国最终向堪称石油技术先锋的美国敞开了大门。在“文化大革命”开始前的 1966 年，由美国的中国问题专家倡导，美国国务卿出面提出了一个建议：允许中国学者和科学家访问美国。但此事因中国开始搞“文化大革命”而被迫搁置（Spence 1990：628 -9）。上面已经指出，1966 年，中美就越南问题达成了避免冲突协议。最终，在 1968 年 11 月尼克松当选为总统的几天内，中国要求其外交人员与美国驻波兰大使重开会谈，该会谈自 1950 年代中期开始，断断续续地进行过多次。像历次会谈一样，此次会谈只是尝试性的，并不成功，但显示了中国在不断

调整对西方的政策。1969年的中苏边境危机，以及“文化大革命”势头的减弱，使中国加快了与西方沟通的行动进程。

这些行动后面的大背景是毛泽东洞察到三个超级大国之间力量对比有了变化。美国的力量有所削弱，苏联的力量在增强，而中国自身的力量也在增长，这些情况使国际力量对比发生了重大变化。1960年代末，中国的主要威胁来自苏联，而不是美国。正如约翰·吉廷斯所言，毛泽东在1960年代末的论点同他在1930年代面对日本企图在亚洲谋求霸权时的看法相同：“一个人必须辨别出主要矛盾”或是主要敌人（那时是日本，现在是苏联），然后应同威胁较小的敌人（两次都是美帝国主义）联合起来对付主要敌人（Gittings 1982：74）。实际上，毛泽东的理论是要实现美国1950年代一些制定政策者已经觉察到的期望——毛泽东会成为亚洲的铁托。但此目标的实现费时良久，部分原因是毛泽东在使中国独立于苏联时遇到了困难，另一部分原因是美国经过很长时间后才认识到中苏关系破裂的实质。

找到退出越南战争的方法

尼克松政府结束越南战争的决定是向中国开放的一个重要因素。尼克松政府放弃了前几届政府关于北越是中国扩张的一匹悄悄行驶的战马的观点。尼克松利用中国希望同美国改善关系的愿望，希望中国在解决越南问题上能提供帮助。中国领导人口头上继续严责美国，特别是当1970～1971年，美国将战争扩大到柬埔寨和老挝时更是如此，但在幕后，北京领导人仍和美国保持着联系，该联络渠道是在尼克松就任总统后不久开通的。中国评价尼克松的撤军时说：“美国从越南撤军的态度是认真的。”此外，加特霍夫指出：很明显，中国“做出了很大努力来说服越南人妥协”（Garthoff 1985：255）。中国不惜冒同北越疏远之险，表明了中国已将改善中美关系作为一个首要的重点。

尼克松：个人因素

在向中国开放问题上，尼克松的个人因素也很重要。这方面的一些决定是出于尼克松的本意，而非基辛格的倡议。1971 年 7 月尼克松任命基辛格为特使，对北京进行了秘密访问，为六个月后尼克松的访华奠定了基础。尼克松在最新的自传中写道，“基辛格开始时对加快对华开放步伐持怀疑态度，而尼克松固执地坚持要推进这一创举”（Isaacson 1992：336）。无论怎样，在实施这些开创性行动前，必须做精心准备。1970 年代初在华沙重开了中美大使级会谈，此后通过中间人（罗马尼亚的齐奥塞斯库和巴基斯坦的叶海亚）与中国有了进一步联系，尼克松想要传达的信息是，他准备就中美关系的症结所在——台湾的地位问题同中国展开会谈。1970 年 4 月，中国出人意料地邀请美国乒乓球队访问北京（这就是所谓的“乒乓外交”），尼克松以放松中美贸易上的限制作为回报。

尼克松很明智地认识到，他的访华是具有历史意义的。在他起程的前几天，他在白宫会见了法国作家安德烈·马尔罗，马尔罗在 1930 年代认识了毛泽东和周恩来，并和他们时有联系。总统回忆录中记录了这位作家对尼克松说的最后几句话，这无疑更坚定了总统的决心。马尔罗说：“我不是戴高乐，但我知道如果戴高乐在这里的话，他会说：所有知道你将做何事的人都将向你致敬。”后来，尼克松在日记中写道，在飞往中国的途中，“我们从全国各地得到的消息，使我有种神圣的感觉”（Nixon 1978：559）。尽管在谈到中国之行时，尼克松很谨慎，也很现实，但这也不能掩盖他因取得成就而骄傲的事实。同苏联缓和关系是一种交易，虽然是重要的，但只不过是一种交易。向中国开放是令人愉快的，这种心情源于他个人取得的成就。至少从表面看来，他个人做出了很大努力，也取得了很大成效。尼克松很欣赏周恩来总理，他对勃列日涅夫则没有这种感觉。尼克松写道：“勃列日涅夫有很强的政治能力和铁腕手段，而周恩来身上兼备

文雅与坚定两种气质，这在当今政坛上实不多见”（Nixon 1978：619）。

毫无疑问，尼克松的成就感还来自其中国之行给苏联造成的压力，尼克松刚刚结束访华，苏联很快就确定了当年末美苏首脑会谈的具体日期。另一个同样重要的成就是有关台湾问题，中美双方商定将在不违反基本原则的情况下，对此事进行会谈。当然，在尼克松访华前，基辛格就已明确了美国的立场，正如基辛格提到的，国务院在1950年代就制定了一个没使用的备忘录，乍看起来在此问题上双方似乎仍处于对峙状态。上海公报为会谈做出了结论，美国和中国在台湾问题上的立场在公报中都有所涉及，两者之间的分歧显而易见。中国坚持说，“台湾是中国的一个省”“解放台湾是中国的内政，别国无权干涉”“全部美军必须从台湾撤走”。美国方面则声称：

> 美国认识到，在台湾海峡两岸的所有中国人都认为只有一个中国，台湾是中国的一部分。美国政府对这一立场不提出异议。它重申美国对由中国人自己和平解决台湾问题的关心。考虑到这一前景，它确认从台湾撤出全部美国部队和军事设施的最终目标，在此期间，将随着这个地区紧张局势的缓和逐步减少其在台湾的武装力量和军事设施。
>
> （Grenville and Wasserstein 1987：305）

美国做出了最大的让步，美国已承诺最终将从台湾撤军——虽然具体日期没有确定，但1955年以来美台安全条约表明，美国仍在充当台湾保护神的角色。此外，公报的最后一句话（随着这个地区紧张局势的缓和）反映了美国希望中国能认识到中国与结束这种紧张局势的主要来源——越南战争之间的利害关系（Garthoff 1985：238）。

很显然，有关台湾和其他问题的协定远不能使中美关系全面正常化。直到1978年，卡特政府才在外交上承认了中国。无论怎样，在经历了两年的冷漠关系后，双方恢复了接触，这使双方都感到了内外

关系上的很大变化。基辛格在总结这些事件时说，“第二次世界大战后的两极格局已经结束了”（Kissinger 1979：1096）。

关于这件事对尼克松政治命运的影响很难说清楚。他虽平安躲过了右翼分子掀起的对他“抛弃”台湾的抗议风暴，但他在与中国关系问题上的巨大成就并没能在此后两年内使他免于因“水门事件”而导致的信誉丧失，他终于遭到了一败涂地的噩运。中国同苏联一样，对取得这样大成就的政客在美国国内政治的祭坛上成为牺牲品而感到不解。毛泽东在同尼克松的会谈中，屡屡表现出对这位资本主义“右翼”领导人的偏爱。毛泽东对尼克松说，“在最近的大选中，我投了你的票”（Nixon 1978：562）。毛泽东的“投票”范围指的是国际舞台，但尼克松必须在国内获得稳固的支持，尼克松在制定外交政策时使用的方法是幕后外交，秘密而又出人意料——这在外交领域是奏效的，但并不适用于国内。

越南：胜利的代价

有关越南战争的论述总是集中于讨论美国的失败及其对 1970 年代美国制定政策的影响上。我们将在第十一章里对此进行详述。在这一章里，我们不仅将探讨越南共产党胜利的原因，而且还将把讨论范围扩展到整个印度支那，因为柬埔寨和老挝共产党在西贡当局迅速垮台后大获全胜，胡志明在 1975 年实现了解放印度支那的梦想。共产党的胜利并没有增进东南亚各共产主义政权间以及中苏间的团结，而是使它们相互间的矛盾更加突出。如果美国继续保持在东南亚驻军的话，多少还可以掩盖东南亚相关各方之间在意图方面的许多冲突。

中国对越南的民族主义一直有所感觉。约翰·吉廷斯指出，中国援助了北越的反美战争，“中国这样做只是想使北越继续起到缓冲地带的作用，并非想帮助北越解放南方”（Gittings 1982：85）。一个强大而团结的越南，特别是得到苏联有力支持的越南，对于想要在东南亚称雄的中国来说是个威胁。越南在战时对老挝在军事和政治方面的

影响进一步减弱了中国的威力，这使中国为了寻求平衡，不得不在柬埔寨制造影响。中国共产党和柬埔寨的红色高棉在观念上是类同的。红色高棉从1970年开始领导推翻美国支持的朗诺政权的起义，并最终在1975年夺取政权，东南亚国家对红色高棉的做法看法不同。红色高棉领导人波尔布特在1977年发动了使柬埔寨"民主化"的血腥运动，另外还对有争议的柬越边境地区发动了袭击和大屠杀。1978年12月，越南对此做出反应，派兵入侵柬埔寨。随后，越南占领了柬埔寨首都金边，并将红色高棉赶下了台，因为波尔布特的关系，中国仍然承认红色高棉为合法政府（美国也同样如此），并对越南的侵略发动了短时间的反击。越南得到了苏联的有力支持，苏越协议在1978年签署，中苏决裂最终在东南亚有了灾难性的结局（McGregor 1988：35－41）。

当越南想要在经历了30年的战争后重建国家的时候，胜利却引发了另一场斗争。美国拒绝了越南提出的有关将30亿美元战争赔偿金作为和谈先决条件的要求，这使越南失去了急需的重建资金（Karnow 1984：28）。在越南经济恶化、政治压制加强的情况下，数千名越南人乘船逃离家园，但其中很多人遭海盗掠夺，还有一些人死于饥饿，这使越南进一步陷入了孤立和经济混乱状态。胡志明所提倡的自由与和平遭到重创。如果不是局面如此糟糕，越南当局一定会宣称，美国一直以来所担心的共产党在东南亚的胜利已经实现。这说明了在东南亚起主导作用的是民族主义，而不是共产主义，战争的结果充分证明了这一点。

在1978年这一关键时刻，美国打了"中国牌"，美国同中华人民共和国建立了正式的外交关系，这正是该地区冲突在全球产生的后果。苏联对美国的这一做法非常气愤，认为在第二次限制战略武器会谈中止的情况下，这种做法进一步恶化了美苏关系。那么，关于美国深陷越南战争时缓和成为突出问题的看法以及越南战争结束后会开始出现缓和局面的说法是不是无稽之谈呢？关于只有当各方意识到其讨价还价的筹码不够时，才会实现缓和的说法是否更符合逻辑呢？很明

显，影响缓和形势的不只是越南问题。但越南战争与缓和之间肯定不是一种偶然的联系。解决越南战争问题是实现缓和的必要条件。有鉴于此，中华人民共和国和苏联有共同的目的，即双方都在争取对河内和华盛顿产生更大的影响。双方的这种竞争并没有否定继续支持至关重要的北越解放斗争的需要。对于美国而言，它需要中国和苏联的帮助，以便从越南战争中脱身，美国谈判代表竭力向苏联说明对中国开放并不是一种反苏行为。一旦越南问题得到解决，至少待美国从越南战争脱身后，其他方面的冲突就凸显出来了。1960 年代末到 1970 年代初这一短时期内，越南战争一直是超级大国三角关系平衡的中心点。这个中心点一转移，这种平衡也就不复存在了。

第十一章
压力下的缓和
(1973～1981)

引 言

我们常被告知，缓和失败了，其标志是1980年代早期“第二次冷战”的到来，以致我们往往忘记，缓和在很大程度上已成为制度化的东西，其表现为持续不断的削减武器（核武器与常规武器）谈判、贸易往来，更主要的是1971～1975年间谈判和协议中建立起来的那种期望和行为模式。显然，这些并没有压倒东西方关系的根本特征即竞争性。同样明显的是，到1970年代末，缓和政策的许多具体结果看来都是空洞的。

然而，重要的是准确界定缓和的局限性在哪里。第一，要指出美国和欧洲国家对此的看法一直不同，而且分歧越来越大。诚然，欧洲国家的立场未能始终如一，但基本上坚持了缓和（至少是它们所理解的缓和）的基本原则，坚持的时间要比美国人长得多。第二，与第一点不无关系的是，美国人把“缓和”从他们的政治词语中摒弃之时，苏联人至少在口头上还继续谈论缓和。第三，从缓和方面后退并不意味着简单地回到高度冷战，或许只是表面显示的一种姿态，而且也并不始终如此。缓和已构成东西方关系的一个新底线，它的某些特点长期不变。这主要是因为它们植根于全球政治和

经济结构的改变之中，而这种改变在1970年代后期和整个1980年代一直起作用。缓和不仅仅是一套具体的协议，而且是由这些协议产生出的一种行为模式。因此，要问的问题不是为什么缓和失败了，而是从缓和的形成到实施过程中，东西方冲突到底采取了什么形式。

回顾1970年代后半期，同1950年代一样，我们看到的是美苏国内形势发展的截然不同的趋势。这个问题在第九章中已经提到，但仍有必要在此进一步阐述。在1950年代，美国国内政治呈现出连续性（艾森豪威尔是二战之后里根任总统之前唯一一位连任两届的总统），而苏联则由于斯大林之后领导人的更迭而经历了一段不稳定时期。1970年代的情况正好相反：尽管勃列日涅夫日见衰迈，苏联仍能沿老路前行；而水门事件后的两届美国总统（福特和卡特）相对而言较弱。1980年代又来了个180度大转变：美国出现了连任两届的一位总统；苏联则是勃列日涅夫后走马灯式的领导更迭（安德罗波夫、契尔年科和戈尔巴乔夫），预示着权威的丧失乃至整个苏联的垮台。

这种相反的走向理所当然地体现在两个超级大国的政策中。总的来说，通过了解那些年美国政府在国内受到的压力，就可以很好地解释美国的政策。理查德·梅兰逊分析了二战后的民意测试结果指出，从1940年代后期到整个1960年代，外交政策是美国公众注意的焦点；而从1976年开始，经济问题成为最紧迫的课题。当然，外交政策从来不仅仅是公众的反应，但公众舆论是外交政策的一个制约因素，特别是当领导的信誉受到质疑之时。所谓“越战综合征”——厌恶冒险干涉和无限度地承担义务——并不意味着要杜绝任何积极的外交政策，而是增强了对外交政策受国内因素制约的认识。

在美国人看来，1970年代后期苏联的表现就是向外扩张势力和扩大影响。从安哥拉到非洲之角再到阿富汗，苏联人都表现出对那些国家或地区的冲突进行干涉（不管是直接动手还是借助古巴人之手）的欲望，行动规模之大前所未有。而这些只不过是比较明显的事例。

不管人们如何看待这些冒险行为的意义（我们将会看到，对此众说纷纭），苏联的这些行为与美国政策的混乱形成鲜明的对照。在详细分析1970年代后期美苏关系之前，让我们先看一下是什么动力促使美苏领导人制定政策的。

美国：一个领袖受制约的国家?

1970年代，美国国内经历了经济、社会和政治危机，其综合效应是阻止了国家前进的势头。前面已经提到经济方面的问题，它促使尼克松于1971年结束了黄金与美元的自由兑换。与此相关的是人们既担心经济衰退，又担心通货膨胀，从而使“新政”（更广义地讲是凯恩斯理论）动用政府开支摆脱经济衰退的办法不合时宜。不管怎么说，出于政治上和经济上的考虑，尼克松政府否定了这条路。

1970年代美国政府还受到两大压力。一是1960年代“大社会”计划的实施使越来越多的穷人和失业者受益，但政府的福利开支却大幅度增加。二是欧佩克组织于1973～1974年实行的石油禁运使油价猛涨四倍，为通货膨胀火上加油；这也使美国人认识到，他们对自己无力控制的外部世界的依赖性有多么大。美国经济的相对衰落在1970年代更为明显（Chafe 1991：447）。

1960年代，美国国内在社会和文化方面都存在深刻的分歧。尽管1970年代街头示威和其他形式的大规模抗议活动日趋减少，但“文化斗争”（Kulturkampf：德语，原指1873～1887年间罗马天主教会和德国政府之间围绕教育和教职任命权进行的斗争——译者注）还在继续。如果说在1960年代左翼势力持政治斗争牛耳的话，那么到1970年代，尼克松政府已使右翼势力在政治和道德领域的斗争中举足轻重。尼克松的下台使右翼势力集团更加千方百计地努力扭转自由主义传统，并推出全国知名人士向公众宣传保守思想。右翼势力的胜利以1980年罗纳德·里根大选获胜为标志，但其基础是在1970年代奠定的。

在政治上，从越南撤军和“水门事件”削弱了尼克松总统的威信，使人们不再信任政府。福特对尼克松的赦免证明是个灾难性的失误，使自己的政府步履维艰，最终导致他在1976年的大选中失败。吉米·卡特曾发誓要清理华盛顿，使国家机构和价值重获信任，但无力成功。他与国会之间的矛盾使早在尼克松时代就已经存在的政府行政与立法两大部门之间的紧张关系更为复杂。

在国内政策方面，卡特总统估计会遭到国会的挑战。尽管他不喜欢这样，并想方设法进行抵抗，但他料定国会将对立法提出修正案，而这种修正案可能完全违背法案的初衷。卡特的能源政策就是这样的一例。不过，外交政策在传统上一直是行政范畴的事情，只受宪法的正式约束（如由参院批准条约），并向国会申报执行外交政策所需资金。而1970年代的一个特点就是国会决心限制行政部门在外交政策众多领域的权力，尤其是实施战争的权限。国会限制行政部门权力的主要手段是实施不予拨款权。它通过的法案包括：《战争权限法》（1973）、削减侵占柬埔寨所用的资金（1970）、否决为挽救南越政权垮台提供资金（1975）、拒绝向安哥拉内战美国支持的一派拨款的《克拉克修正案》（1975）。此外，还有我们在第九章中已提到的《杰克逊—瓦尼克修正案》（1972），它允许向苏联提供最惠国贸易待遇，条件是苏联允许国内的犹太人有权移居国外。

诚然，总统显示了他有能力保住执行部门传统的特权。例如福特总统面对1975年柬埔寨扣押美国货轮“玛亚古兹”号而采取救援行动。虽然美方人员伤亡不小，但此事显示出福特政府在重大利益面临危机时毅然决然采取行动的决心。

但是，政治较量是在涉及更大、更复杂事物的领域中进行的，例如国家安全和美苏关系。吉米·卡特总统一上任，就决心不再把苏联问题乃至整个东西方冲突看得太重。当然，核武器控制（如有可能可推广到整个武器的削减）仍是重中之重；但卡特意识到，在美国政策中“强调苏美竞争”已经扭曲了美国同第三世界许多国家的关系，甚至到了这种程度，即美国同它们打不打交道都取决于“它们是否支持

反共路线”（Carter 1982：142）。根据“三边委员会”（该委员会是由洛克菲勒基金会资助的研究组织，其人员由企业界、学术界和政界三方人士组成，卡特本人是成员之一）做出的结论，美国面临的最大挑战是如何应对下述情况的变化，即由以美国经济处于霸主地位和苏美核对抗为特征的冷战时代转向美国经济和军事实力相对衰退的时代的这种变化。美国当前面临的挑战是：如何发展同西欧和日本的经济协调与合作，如何开发发展中国家的经济资源。美国未来的关键是南北关系而不是东西关系（Bowker and Williams 1988：168－9）。

这些假设基于一种信念：人权问题必须置于外交政策议程的中心。卡特在他的回忆录中写道：“历史表明，只有在外交政策中强调道德并致力于自由和民主时，我们的国家才能成为最强大、最有成效的国家。”这不是在理想主义和现实主义之间，也不是在道德和行使权力之间进行选择的问题；“对我来讲，展示美国理想主义是处理外交事务时的实际而现实的态度，而道德原则则是行使美国权力和发挥美国影响的最佳基础”（Carter 1982：142，143）。基辛格—尼克松的外交政策恰恰相反。实际上——布热津斯基指出——人权政策对卡特之所以有吸引力，部分原因是它“显示出卡特的外交政策同基辛格—尼克松的外交政策有截然不同之处”（Brzezinski 1983：49）。

在推行这种政策时，卡特遇到国内外形势发展带来的阻力。发展中国家是苏联炫耀实力、进行干涉的区域，这种情况使南北问题与东西问题难以分开。

卡特对人权问题的重视也没有得到预期的回报。这个政策在政治上是不偏不倚的，因而引发了美国国内自由派和保守派双方的不满。正如马兰逊所说，它在实施中无论如何不可能不偏不倚，因为现实中总有一些势力比其他势力能更有效地抗拒美国杠杆。另外，因为卡特决心把人权同其他问题分割开来，它便成了“一个令人恼怒的反常现象，而不是和谐战略的一个有机组成部分”（Melanson 1991：117）。在与苏联的关系上这一点尤为突出。苏联人认为美国的人权政策是对其内政的干涉。卡特高度强调道德，这只能恶化而不是缓和

美苏的紧张关系。卡特本人也承认，他的人权政策“使我们（美国与苏联）之间的关系紧张起来，并妨碍了其他某些分歧的顺利解决”（Carter 1982：149）。

看来，卡特又无奈地被拉回到冷战的老议程。施加这种压力的是一股强有力的思潮，这股思潮来源于当时刚成立的“当前危险委员会”。该委员会沿袭了它第一次成立于1950年时的老名称。保罗·尼采是该委员会新老两届的元老之一。他是《国家安全委员会68号文件》（1950）的主笔，也是1970年代后期对缓和政策有影响的评论家（Talbott 1989：59，151－61）。另一主要成员是亨利·杰克逊。他是民主党参议员，他曾竭力主张必须以苏联给予犹太人移居国外的权利为条件才能给苏联最惠国贸易待遇。如此看来，保守派对卡特的挑战不仅来自民主党外部，也来自民主党内部。“当前危险委员会”认为，美国的外交政策应把对苏遏制放在首位，卡特对缓和政策的修正是错误的和危险的。把1970年代后期就美国外交政策的争论说成是“三边委员会”同“当前危险委员会”之间的舌战是不足为过的。

但是，夸大1970年代后期美国外交政策的软弱性也是不明智的。卡特摒弃了以越南战争和颠覆智利总统阿连德为代表的激进主义，他毕竟为美国构想出一种积极的、建设性的角色。他的国家安全事务助理兹比格纽·布热津斯基把卡特政府的外交政策总体上定位为“有建设性的参与全球事务”（Brzezinski 1983：53）。卡特外交政策的主要成就——巴拿马运河条约和使埃及同以色列坐到一起的《戴维营协议》——都基于下述认识：使看来不共戴天的利益集团达成和解是对美国力量的真正考验。在短短几年间，他发现自己又回到了遏制政策和强权政治的老路上，但这并不是经过一段时间的静止后回到激进主义，而是从自由主义的国际主义回到保守主义的国际主义。

苏联：一个领袖不受制约的国家？

本书前面有一章曾经提到，从1960年代后期到1970年代早期，

勃列日涅夫在苏联的统治地位越来越稳固。其中原因并非完全没有反对派，而是他不让他们得逞。同赫鲁晓夫一样，勃列日涅夫对党中央书记处的控制是他控制决策程序的关键。但与赫鲁晓夫不同的是，勃列日涅夫更加谨慎，避免在政策上出现突然的、风险大的变化，也更善于满足政治局提出的各种利益要求。这些利益集团的一个重要部分是军界高层领导及其在政治局的支持者，正是他们在 1964 年推翻赫鲁晓夫的政变中发挥了重大作用（Gelman 1984：76－9，92－5）。

从表面上看，赫鲁晓夫大力发展苏联导弹的政策迎合了军方的需要，但实际上从两方面看他并不成功。一是他过分炫耀苏联的导弹实力（在古巴导弹危机中尤为突出），结果暴露了苏联的弱点，而不是长处；二是他不但忽视了其他军种，而且执意限制它们的发展，因为他认为，在导弹时代，其他军种只能退居次要地位。尽管他未能完全贯彻这种政策，但已使他和军界一些主要领导的关系疏远了。与其相反，勃列日涅夫认为，苏联的安全要求武装力量均衡发展。这一观点部分是基于国内考虑，想以此赢得各军种的拥戴，但显然通过古巴导弹危机他也认识到，苏联超级大国地位的确立、与美国均势的取得，都必须基于苏联有能力向全球投放武力。因此，苏联的扩军备战从 1965 年至 1980 年代初期从未中断过，而且它始于苏联经济相对来说健康发展之时。只是到后来，它对国家造成的重负才显现出来（Gelman 1984：79－87）。

这就是苏联在 1970 年代中后期向外投放武力的背景。勃列日涅夫的野心通过一系列行动收到了效果，也表明他有信心使“各种力量的综合作用”朝有利于苏联的方向发展。对苏联在第三世界活动的解释以及这种活动对缓和的影响，西方观察家众说纷纭。危言耸听者认为，苏联对激进政权和左翼颠覆运动的支持是其综合战略的一部分，该战略旨在削弱乃至消除西方在一些战略要地的影响。西方决策者最担心的则是从阿富汗经伊朗、阿拉伯中东地区一直到非洲之角这一所谓“弧形危机地带”酝酿着变革。1977 年苏联运输机空投古巴军队对埃塞俄比亚进行干涉（两年前安哥拉事件的重演），苏联在南

也门获准建设海军基地，与此同时苏联海军在印度洋频繁活动，最突出的是1979年苏联对阿富汗的干涉，所有这一切都表明，根据最坏的估计，苏联正在有条不紊地向南推进，最终目标是波斯湾，进而控制中东地区的石油资源。在伊朗革命和扣押美国人质事件之后，苏军紧接着又入侵阿富汗，很多美国人认为，这最终证实了对苏联意图最坏的解释。

1975年印度支那落入共产党之手，1979年尼加拉瓜发生桑地诺革命，之后是萨尔瓦多的叛乱。以此为背景来观察上述事件，它们就显得威胁性更大。尽管苏联对这些事件的影响可能是间接的，它们也构成“苏（联）得而西（方）失”这一模式的一部分。此外，第三世界国家在联合国要求建立“经济新秩序”的呼声日益高涨，而巴勒斯坦恐怖主义又为国际冲突注入了令人不安又无法估量的活力。后面这两件事都不能被看作苏联直接挑起的，但客观效果是助长了“苏得而西失”的形势。

对缓和政策不满的人不仅包括很多共和党人和诸如“当前危险委员会”一类的压力集团，而且还包括执政的民主党中越来越多的成员。在这些人看来，天平绝对倒向了苏联一边。还有，危言耸听分子对苏联外交政策所做的解释又相应地运用于对苏内政的研究中。学术界有些人对勃列日涅夫时代的政治局进行了分析，发现它在1974～1975年间就缓和政策经历了一场危机，曾直接威胁到勃列日涅夫的领导权。批评者指责道，缓和政策对苏联毫无回报，美国国会就对苏贸易和信贷强加不能接受的条件就是证明。可以说，为回避这种批评并保住自己的领导地位，勃列日涅夫转而对“缓和”的概念大加限制，这就意味着在东西方关系的各个领域减少合作，而在全世界推进苏联利益方面采取更加咄咄逼人的态度（Gelman 1984：148－50，162－4）。

但是，对1975年后的苏联政策还有别的解释。首先，人们可以对下述观点提出质疑：1974年后，苏联对军控乃至整个东西方关系的态度有质的变化。1974年12月所谓“大转变”后，苏联在《赫尔辛基最后文件》上签了字，而且看起来至少同美国一样希望就第二

阶段限制战略武器谈判达成协议（Bowker and Williams 1988：199）。至于第三世界，可以说，无论是苏联直接插手还是间接获利的各次危机，都有各自的根源。动乱的发生取决于当时当地的情况，而不是受苏联的旨意所为。它们也没有一个相同的模式。“弧形危机地带”的说法不过是西方头脑发热者的杜撰。即使常被形容为“赤裸裸的侵略”的入侵阿富汗事件，苏联也可能只是出于自身防范的考虑（Halliday 1981：Ch. V）。

从这一角度看，苏联在第三世界的冒险也不总是获利。莫斯科对第三世界的主要出口物——武器，“与其说是显示了苏联的实力，不如说是暴露了苏联的弱点”，它表明苏联在经济上无力与西方竞赛。限制苏联影响的另一个因素是“第三世界许多国家越来越不愿意卷入两个超级大国之间的对抗”（Steele 1985：177，178）。入侵阿富汗是苏联这一时期最引人注目的干涉行动，它不仅使第三世界许多领导人与苏联拉开了距离，而且也得罪了西方。

按一位分析家的说法，1970 年代后期发生变化的“不是苏联的政策，而是国际环境”（Bowker and Williams 1988：199）。苏联一贯采取机会主义政策，机遇出现时它绝不会放过，而 1970 年代后期是与两个超级大国利益攸关的地区极不稳定的时期。按照这种观点，苏联的政策自然要对此做出反应。

对苏联政策的这两种解释各持一端，很难调和，但仔细分析双方的观点，就可以看出有交叉之处。危言耸听派的哈利·戈尔曼并不否认“苏联领导的行为中有防卫的因素”（Gelmar 1984：16）；对立派的弗里德·哈利迪则承认，“在恶化国际环境、导致‘新冷战’方面，苏联肯定起了作用”（Halliday 1981：113－14）。由此可以得出结论：苏联越来越想扩展自己的势力，因为它既有机会又有手段。但是，决定其对外干涉时机和特点的不是它有什么周密的计划，而是机会主义。苏联的政策或许是见机行事，不过对于西方观察家来说，它的威胁性并不因此而降低，因为苏联做出有效反应的能力毕竟大大提高了。

1970 年代美苏两国在利益和观点两方面的日趋对立，并不表明

缓和政策的破产，而是暴露了过于乐观的高期望值与实际效果之间的差异。缓和政策促使双方承担了新的责任和义务，同时也制造了紧张局势的新源泉。双方对对方破坏新行为规则的举动都极度敏感。如第九章所说，从这个意义上讲，缓和政策带来的自相矛盾的结果使双方难解的结拉得更紧而不是更松了。双方都声称希望两国关系有所缓和，但都没有达到目的。恰恰相反，缓和的态势及其后事态的发展使它们对对方更加戒备，尽管世界变得更为复杂，超级大国也更难对其进行控制。

军备控制与战略核论战（1974～1981）

在充分发挥第一阶段限制战略武器谈判的作用方面存在互相关联的两个困难。一是在第一阶段限制战略武器谈判没有涵盖的战略核武器领域，双方这种武器的数量和质量都有发展，从而提高了威胁程度，需要认真对待，这还没有涉及双方竞相发展中程和战区核武器方面的情况（此问题将在第十二章研究欧洲时予以讨论）。二是部分由于以上事态的发展，关于核战略的辩论引起了对1960年代美国提出的威慑理论本身的怀疑。有些人大声疾呼，说"相互确保摧毁"不足以为威慑提供足够的基础，主张必须能够打赢一场核战争，主要理由是这是苏联战略的核心。麦克乔治·邦迪指出，有人从"相互确保摧毁"这—英文述语中取每个英文词的首个字母组合成一个英文单词（MAD）"疯子"，其目的在于嘲弄这一理论，此人并不是反核的左翼人士，而是一名右翼分子（Bundy 1988：552－3）。

第二阶段限制战略武器谈判的命运与这两个挑战密不可分。卡特收回待参议院批准的第二阶段限制战略武器谈判协议的直接原因是1979年12月苏联入侵阿富汗，但实际上在本轮谈判的几年中，各派政治力量都表示反对谈判，尤其是保守派。

1976年美国国内就第二阶段限制战略武器谈判度开的唇枪舌剑

在《外交事务》这本杂志上被报道得很清楚。辩论由保罗·尼采挑起。此人在自己的长期政治生涯中，无论是从政还是在野，都是一位很有影响力的人物。他的文章《在缓和时代确保战略稳定》主要代表了“当前危险委员会”的观点。该委员会于同年重新组建，当时尼采为它撰写了不少文章（Bundy 1988：556－9）。

他的文章的具体内容相当复杂，但主题思想十分明确：第一阶段限制战略武器谈判并没有带来战略稳定，“相反，完全可以预料，按照限制战略武器谈判协议的条款，苏联将会继续追求核优势，这不仅表现在武器的数量上，而且还表现在它提出了打赢核战争的理论上”（Nitze 1976：207）。1974 年签订的《符拉迪沃斯托克协定》（它是第一阶段限制战略武器谈判的后续会谈，意在导向第二阶段限制战略武器谈判）中显示的战略均势很有欺骗性。根据这一协定，双方战略武器都受同样数量的限制，即各保持在 2400 个发射架和重型轰炸机的总体水平，多弹头分导再入飞行器则限制在 1320 个。这一做法掩盖了苏方比美方大得多的“投掷重量”，《符拉迪沃斯托克协定》对此只字未提。苏方的 SS－19 和 SS－8 导弹的投掷重量各为美方最大型导弹“民兵Ⅲ型”导弹的三倍和七倍，这就使苏方在投掷重量方面至少占有 2∶1 的优势（Nitze 1976：220）。苏方还有新型的“逆火”式轰炸机。与当时美国一直占明显领先地位的武器装备相比，苏联的这种轰炸机是一个突破性的发展。

与数量本身同样重要的是这种不平衡可能对威慑带来的影响。尼采写道，威慑力量是否足够，其衡量标准之一是“我们对苏实施报复性打击时，是否有能力将其人口和工业置于人质的地位，尽管苏联会想方设法避免这些目标受到打击”。总之，如果苏联有某种办法能保护其人口密集地区免受美国核导弹打击，美国核导弹的威慑价值就会相应地削弱。而实际上，看来苏联确实有这种手段，它以大规模民防结构的形式出现。同反弹道导弹系统一样，有效的民防系统的作用令人不安，因为它可使进攻性武器失效。1972 年反对反弹道导弹系统的论点同样可以运用到民防上（Nitze 1976：223）。

但是，尼采的文章接着说，更严峻的考验是由于苏联在投掷重量方面占优势，故而在美苏双方核武器对射中苏联可能占优势，尼采设想了一场大规模核战，然后根据当前数据向前推算，进而得出结论：到1977年，“在苏联对美发动打击军事力量的进攻（目标为美方的核武器而非人口密集地区的打击）之后，美国也以打击对方军事力量进行反击，此后苏联的力量仍足以摧毁中国的与欧洲北约的核力量，并攻击美国居民与常规军事目标，而在此之后所剩的投掷重量仍大于美国”。尼采补充道，1977年后，“苏联这种进攻后的优势将迅速增大”（Nitze 1976：226）。

总之，美国面临着一个“脆弱的窗口”，这应验了尼采1950年的预言。当时他说，四年之后将出现“最危险的一年”，只能靠大力加强美国威慑力量的效率和生存能力来对付这种情况。在美国，任何大规模的民防措施从政治角度说都是不可能实现的，尽管尼采估计将来有一天苏联的威胁，足以需要建立这一体系。这个问题更现实的一点是：美国必须首先提高其导弹准确率（在军事术语中叫作“硬目标杀伤力”），以对付苏联在投掷重量上的优势。其次要降低美国战略核力量的脆弱性。这意味着要研制某种机动发射系统，同时修建数量大大超过导弹数的掩蔽部，导弹可以在这些掩蔽部之间按任何模式和时间间隔自由移动（Nitze 1976：227－31）。

尼采的文章引起许多人的反驳，我们这里只集中讨论简·罗德尔的观点，因为他逐条地反驳了尼采的看法。这位分析家曾在国家安全委员会效力。他首先声称，尼采明显高估了苏联投掷重量的重要性，同时低估了美国的优势。美国不仅在导弹的精度上比苏联强，而且在潜射导弹方面也占有优势。苏联人强调重型导弹，恰恰暴露了他们在微型化技术（多弹头分导再入飞行器所必须具备的技术）和潜射导弹方面的劣势。如果以弹头数量而不是以投掷重量作为衡量标准，那么美国则具有明显优势（Lodal 1976：463－9）。

至于《符拉迪沃斯托克协定》所规定的限制，也并不明显有利于苏方。苏联战略武器的总量比美国更接近协定的限额，看来“他

们原计划进一步扩充潜艇、轰炸机和机动导弹的数量”。如此说来，该协定“对苏联的战略计划很可能会起限制作用”。另外，如果说美国在重型导弹方面对苏做出了让步的话，那么苏联也同意不再纠缠美国的前进基地系统（欧洲战区的陆基和舰基轰炸机，能打到苏联本土），该系统同英法各自的威慑力量一样，早就是而且将继续是苏联的心腹之患。无论如何，不管这次交易在战略上有什么真正的效果，双方都坚持的“总体平衡”原则反映出了政治上的而不是军事上的考虑。第一阶段限制战略武器谈判结束后，美国国会就坚持所有新的军控协议都必须明确规定数量上的均衡。五角大楼之所以支持这一要求，不是出于军事考虑，主要是基于下述认识：“接受任何不是数量均势的协议将会‘在政治上造成’美国处于战略劣势的感觉”（Lodal 1976：470－1，470）。

关于尼采论及的战略均势的其他因素，罗德尔指出，苏联的“逆火”式轰炸机“远没有我们的 B－52 重型轰炸机厉害”，“逆火”式轰炸机的航程短，有效载荷小，构不成大的战略威胁。最后一点，苏联的民防体系尽管比美国的规模大，但也不大可能把苏联人的伤亡大幅度降低（Lodal 1976：473，477）。

罗德尔的结论是：民防体系也好，尼采所极力推荐的陆基导弹的机动发射系统也好，既不能提高美国的防护能力，也不会增强威慑力量。两者都会耗资巨大，还可能带来无法克服的技术难题。最主要的是不能放弃“限制战略武器谈判”，否则只能加剧美苏之间的紧张关系……削弱而不是增强美国的安全（Lodal 1976：474－5，477，481）。

在当今时代，这最后一句话至关重要。尼采曾宣称，他毫无放弃军控谈判的意图，但他坚信，“我们面临的现实是基于《符拉迪沃斯托克协定》的第二阶段限制战略武器谈判协议将不会为按目前趋势进行的后续谈判提供坚实的基础”。他写道：“不是如果，而是只有美国立即采取行动改变即将形成的战略失衡，才能迫使苏联放弃对优势的追求，回到通过谈判达成有实际意义的限制和削减战略武器协

议”上来（Nitze 1976：208）。实际上，尼采要阐明的是：达成新条约的先决条件就是美国建立足够的军事力量。

这一论点同尼采1950年主笔的“国家安全委员会第68号文件”（对国家安全的一项开创性评估）之间有惊人的连续性。当初他就发现，与加强美国的安全相比，谈判绝对是第二位的。到了1976年，他又发出警告：“不可把‘限制战略武器谈判’看成处理核战略问题的妙方。”他写道，我们必须“以‘限制战略武器谈判’开始之前看待美国核战略态势的眼光”来观察美国今天的核战略态势，“以便决定美国需要一种什么样的核战略，以及需要一种什么态势去支持这一战略”。缓和，特别是苏联所解释的那种缓和，不是美国安全需求的指南。在苏联人眼里，“缓和同我们以前所说的‘冷战’没有多大区别”（Nitze 1976：222，210）。

当然，尼采那时并不负责决策，但他提出的问题在很大程度上预见到了其后三年军控谈判中美方的立场。卡特总统本人的观点（至少开始阶段如此）以及他的首席谈判代表保罗·沃恩克的观点都与罗德尔而不是与尼采相近，但尼采所强调的看法对国会和媒体有巨大影响，而且对第二阶段限制战略武器谈判协议的最后文本，特别是对国会批准程序都发挥了实际的作用。这些观点也影响到1980年里根的竞选和他上任前的过渡班子。第二阶段限制战略武器谈判准备期间，卡特的主要问题是他决定不再继续进行两项新武器系统——B－1轰炸机和中子弹——的研制，而批评他的人则认为这两项武器对恢复战略均势至关重要。他们主张，最起码也应保留它们作为与苏联讨价还价的筹码。

第二阶段限制战略武器的谈判漫长而曲折。《符拉迪沃斯托克协定》之后的谈判，在福特任期内由于双方就苏联的“逆火”式轰炸机和美国的空射巡航导弹问题发生意见分歧而陷入了僵局。苏联人想把它们列入《符拉迪沃斯托克协定》所限定的2400个发射架之内，而美国人不同意这种做法。后来走马上任的卡特政府一开始就做出错误的判断，提出两个方案供苏方考虑：一是建议大幅度削减战略武

器；另一个是总体上退到《符拉迪沃斯托克协定》的原则，不过也包括某些额外的削减。两个方案都被苏方拒绝，他们不同意其内容，也是由于建议提出的方式使他们不快，因为卡特政府在赴莫斯科参加第二阶段限制战略武器谈判的第一次会谈之前就公布了自己的谈判立场。用布热津斯基的话说，此举旨在“使更多的人理解我们建议的建设性”。事后他承认这是个错误，因为公开宣布大幅度裁减的计划“或许会给莫斯科留下一个印象，即苏联如果接受这些建议，就等于向卡特单方面让步”（Brzezinski 1983：163－4，164）。显然，苏联人发现，美国已经改变了基辛格式的善于幕后活动的不声不响的外交方式。这使苏联感到不安，甚至觉得是个威胁。

卡特上台第一个月里美苏关系的另一个令人不快的事件是卡特在苏联的人权问题上摆出了炫耀的姿态，尤其是卡特在给苏联物理学家、持不同政见者安德烈·萨哈罗夫的回信中对他深表同情。卡特还在白宫会见了刚刚被释放的苏联持不同政见者符拉基米尔·布科夫斯基。第二个月，苏联逮捕了在莫斯科的赫尔辛基协议监督执行小组的领导人，于是人权和军控的联系骤然凸显出来。苏联的立场很明确：不接受把两者联系起来的任何做法。威廉·海兰德指出：“莫斯科认为人权问题是对其内政的威胁，对外交政策的影响倒在其次。”然而卡特政府的表态却含混不清。先是布热津斯基声称人权同军控“有机联系”，之后卡特马上予以驳斥（Hyland 1988：207，205）。这一事件表明，卡特政府内部的务实派（以赛路斯·万斯为代表）与思想意识派（以布热津斯基为代表）之间的分歧越来越大。卡特本人的倾向时左时右，有时甚至二者兼备：一方面宣布坚决维护人权，另一方面又拒绝把人权同最重要的军控谈判联系起来。

就如此复杂的问题谈判几年很难说能有什么突破。不过，按布热津斯基的说法，谈判的一个重要转折点是苏联同意美国的建议，允许各方部署一种新型的洲际弹道导弹，这样美国就可以继续部署 MX 导弹了（Brzezinski 1983：326）。MX 导弹是一种新型的洲际弹道导弹，设计为机动基座，被视为解决所谓美国战略威慑力量易受攻击的办法

之一。苏方做此让步之时（1978年7月），卡特尚未就部署MX导弹一事做出果断决定。直到1979年6月维也纳首脑会晤（签署第二阶段限制战略武器谈判协议）之前不久，卡特才做出决定。此事表明他受到会谈内外的双重压力。卡特不情愿地向这些压力做出让步。关于部署MX导弹的前景，他在日记中写道，“这是一个不得不面对的令人作呕的前景，大量的钱浪费在五花八门的核武器上了”（Carter 1982：241）。

然而到此阶段，很明显，卡特最亲密的顾问（包括布热津斯基和国防部部长哈罗德·布朗）都同意参谋长联席会议和参议院主要领导人的看法，即如果不部署MX导弹并采取其他步骤加强美国的防御能力，第二阶段限制战略武器谈判协议就会对美国的安全构成威胁。而且，要想让参议院批准这个协议，条件肯定是落实这些措施（Brzezinski 1983：336－7）。具有讽刺意味的是，尽管保罗·尼采在参议院做证时反对这个协议（主要是因为它没有解决苏联在战略武器投掷重量方面占优势的问题），但他对总体战略形势分析的主要部分于1979年中期被卡特政府所接受，此外，需要研制一种带多点发射系统的新型洲际弹道导弹（MX导弹）的建议也被采纳了（在此说明一点：这种MX导弹的部署方式后来证明不可行，而且造价昂贵，最后被里根政府放弃了；MX导弹实际上就部署在老式民兵导弹的发射井里，这与它原来的设计思想大不相同）。

说卡特政府采纳了尼采战略思想的主要部分，还有一层意思，就是吸收了他关于核战计划的观点。布热津斯基说，威慑理论是在1960年代初期提出的，当时美国在战略上对苏联拥有明显优势。到了1977年（也就是在尼采看来苏联优势明显增长的那一年），布热津斯基忧心忡忡，不得不建议采取一系列措施，这些措施都基于下述假定：核战不一定就是“短暂的、暴风雨般的，甚至会导致世界末日的来临”。这种“战略更新”计划最终以第59号总统令的形式，于1980年7月颁布，实际上从1977年以来一系列总统令一直在为此做铺垫。这些总统令“涉及一场长期战争的动员、防御、指挥和控

制，也涉及按我们选择的战争目的灵活使用我们的武装力量（包括战略部队和一般任务部队）”（Brzezinski 1983：461）。

虽然布热津斯基坚持说第59号总统令是强化而不是背离威慑思想，但看来它明显是一种核作战理论。实际上，布热津斯基后来回顾这一事情时还是坚持这种说法（Garthoff 1985：790）。从这个意义上说，第59号总统令可被视为对“相互确保摧毁”战略的背离。很多人就是这样理解的。它因而成为1980年代中期日益高涨的反核战运动的主要攻击目标。

第59号总统令表现出的变化基于下述假定：苏联的军事学说是准备打核战争，而且认为能打赢核战争。实际上，虽然苏联军事学说确实认为有发生核战争的可能，并认为这种战争一旦爆发，就要争取打赢，但正如一位专家所说，“种种迹象表明，他们认为即使打赢了一场全球核战争，这种胜利也无疑是一场大灾难”（Holloway，in Bundy 1988：562）。不容置疑的现实是双方都有脆弱性，这就意味着防止大战爆发是主导他们的军事思想。实际上已有人指出，即使苏联最尖刻的评论家也承认苏联接受威慑的现实，尽管苏联拒绝接受“相互确保摧毁”理论（Bundy 1988：562）。再说，有些人（尤其是罗纳德·里根执政期间）声称相信“脆弱窗口”的说法，但如果人们“听其言更要观其行”，就会看到他们实际上对所谓苏联的战略优势增长采取放任不管的态度。到里根执政末期，美国洲际弹道导弹的总投掷重量实际上比他刚上任时减少了（Bundy 1988：563）。我们很快再回来讨论理论上的咄咄逼人与军控行动上的务实主义之间奇妙差异。这里只提一点就足够了：限制战略武器谈判的代表与其批评者之间存在相互容纳的余地。

第二阶段限制战略武器谈判协议的条款体现了《符拉迪沃斯托克协定》的指导原则，但也包含下述的一些新内容，反映出每一方对对方优势领域的担心。发射系统总量不得超过2250个的限额得到重申。双方还同意到1981年年底降至2225个。同样，《符拉迪沃斯托克协定》规定的1320个多弹头弹道导弹和携带远程巡航导弹的重

型轰炸机的限额也得到确认，只是细节有所变化。除了这些对双方数量的等额限制以外，该协议还把苏方“重型”导弹限制在目前的308枚，对苏方可由各类导弹携带的弹头数量也予以限制，并禁止双方试验或部署新的洲际弹道导弹系统（但每一方可部署一种新式轻型洲际弹道导弹系统）。该协议还包括建立信任的各种措施（如事前告知洲际弹道导弹发射试验），以及核查与反欺骗的条款。该协议到1985年年底之前一直有效（USACDA 1982：242－3）。

还有一个协定，即禁止部署（但不包括试验）射程超过600公里的陆基和海基巡航导弹。另外勃列日涅夫还给卡特写过一封信，向他保证“逆火”式轰炸机的生产肯定会限量，而且不再增加其航程和有效载荷。这就消除了美国对“逆火”式轰炸机可能被改装为战略轰炸机的担心。该协议的第三部分也是最后部分是双方承诺继续朝“第三阶段限制战略武器谈判”和进一步削减战略武器的目标努力。

在评论者看来，该协议有“致命的缺陷”，即使它的拥护者也不愿意鼓吹它的优点，最多也只能说它减缓了战略武器发展的速度。尽管美国参议院一直没有批准该协议，里根政府和苏联领导在它的有效期——1985年——过后还在继续遵守它，实际上，如前面所指出，里根任职期间美国的洲际弹道导弹的投掷总重量还下降了。

对此可有两种解释。一种解释是，虽然有种种缺陷，该协议还是反映了两个超级大国之间确实存在战略均势。从这个意义上说，它有重要的象征意义，而又因为这种象征在政治上十分重要，所以它有助于稳定。公开违背这个协议就意味着肆意破坏均势。因此，尽管协议的批评者无比愤怒、大喊大叫，尽管苏联入侵阿富汗后卡特中止了该协议的批准程序，但两个超级大国为了自身利益还是都不愿自己被视为打破均势的一方。

另一种解释是，协议无伤大雅。规定武器的限额相当高，超级大国的战略计划基本未被触动。一位评论家在1983年指出，“从武器的研制到应用于战争的时间相当长，因此迄今为止，第二阶段限制战略武器谈判未能如其初衷那样阻止两国政府在战略核武器领域

的任何行动”（Edmonds 1983：166）。这种观点不难被证实，只要注意到下述事实就行了：就协议涉及的大多数武器种类来说，是需要增加数量才能达到规定的限额，而不是减少数量才能达到限额（USACDA 1982：272－4）。实际上，正如雷蒙德·加特霍夫指出的那样，如果该协议的评论者真的关心严格的均势，他们本应该主张批准该协议，因为“要达到双方同意的同一水平，苏方就必须拆除约250个作战单元，而美国一个也用不着拆除”（Garthoff 1985：823）。

或许以上两种解释都有道理，因为该协议反映了两个超级大国间战略武器上的大体均势，而且也允许它们相当自由地研制各自的新武器项目。无论是哪种解释，成问题的不是战略均势本身，而是慷慨激昂地反对美国批准该协议与在实际行动上接受它的规定这两者之间到底有没有那么大的差距。围绕第二阶段限制战略武器谈判而兴起的喧嚣反映了人们对美苏政治关系这一更大问题的不安。本章的其余部分将研究欧洲、中东和第三世界的冲突，以便找到这种关系恶化的线索。

欧洲进退维谷：西方与东方

亨利·基辛格曾庄严宣布，1973年是“欧洲年”。人们相信，越南战争即将结束，美国可以把注意力转到亟待修补的美欧关系上来。基辛格提出“欧洲年”的理由有以下几点：“欧洲力量的增长、正在形成的核均势、紧张局势得到一段时间缓和、我们经济的相互依赖程度越来越大。”基辛格的结论是：所有这一切都“出现在已经变化的心理环境之中，这种心理环境往往会削弱盟国凝聚力的道德基础”（Kissinger 1982：725）。美国与欧洲领导人的磋商将会产生一个“大西洋宣言”，作为双方关系改善的框架。

实际情况是：虽然1974年7月最终签署了“大西洋宣言”，但正如基辛格所言，到此时，“经过一年的争吵，该宣言的道德和心理

意义都丧失殆尽”。基辛格把这种失败的原因部分归咎于理查德·尼克松的威信下降（“水门事件”愈演愈烈，最终导致尼克松在1974年8月辞职）。不过还有其他原因，即在中东局势、与苏联的关系、欧洲政治统一等问题上美欧之间存在重大的政策分歧（Kissinger 1982：193，729－35。）。

苏联从来不玩弄“欧洲年”之类的花样，因为根本不允许东欧国家有任何程度的自治，也就不需要玩弄这种象征性的花样。1968年苏联对捷克斯洛伐克的入侵以及同时出炉的勃列日涅夫主义限定了东欧国家对外活动的范围。然而集团内部效忠与否则是另一码事。查尔斯·加蒂指出，1968年后，“大部分捷克斯洛伐克人和大部分波兰人、罗马尼亚人、匈牙利人、东德人一样，对任何苏联乃至俄罗斯的东西都采取无比蔑视的态度”（Gati 1990：48）。另外，欧洲的缓和，尤其是《赫尔辛基最后文件》中关于人权的条款，为东欧集团内持不同政见的组织提供了斗争手段。在东欧国家和苏联出现的赫尔辛基协议监督执行小组尽管饱受骚扰和残酷镇压，但由于它们与苏联签署的国际条约有联系而拥有道义上的合法地位。这种地位在时机成熟时就会发挥巨大的政治威力。

这样，在“铁幕”两边，都存在有待解决的问题，而这种问题在1970年代后期又大大增加了。紧张局势有三个根源：战区核武器的现代化、西欧的欧洲共产主义和1980～1981年的波兰危机。

虽然美国的北约盟国总的说来支持限制战略武器谈判，但它们对美国保证提供核保护伞的可信度本来就担心，会谈加剧了这种忧虑。1977年10月在伦敦的一次演讲中，西德总理赫尔穆特·施密特说：“限制战略武器谈判把美苏的核战略均势纳入了条约。换句话说，限制战略武器谈判使它们的核战略能力中立化了。在欧洲，这就使东西方之间在战术核武器与常规武器上不平衡的问题更加突出”（Yost and Glad 1982：536）。卡特政府也认识到在欧洲的核武器与常规武器方面东西方的差距越来越大，他的解决办法大体是建议北约所有国家每年将军费开支增长3%。该建议于1978年成为正式决定。

更具体地说，北约领导人认为需要加强北约的能力，以阻止苏联在欧洲战区的进攻。在决定增加军费预算之前很久，福特政府就发起了对中子弹和“强辐射武器”的讨论，将此作为加强北约抵挡苏联进攻能力的一种手段。福特于1976年批准研制这两种武器，但1977年6月《华盛顿邮报》泄露了这一内情，于是在公众中引起轩然大波。

美国同欧洲盟国间关系的多变性在强辐射武器事件中得到充分体现。雷蒙德·加特霍夫指出，该武器本身并不是炸弹，而是一种由火炮或短程导弹发射的弹药，“虽然它有赖于爆炸产生强辐射，但辐射效果比它将要替代的弹药大不了多少，然而爆炸的破坏性却要小得多”（Garthoff 1985：851）。公众将其称为“典型的资本主义武器”，因为它只杀人而不损坏财产。该武器最重大的意义或许在于它证实了许多欧洲人的担心，即美国正准备在欧洲打一场核战争。消息一经泄露，立刻成为日益高涨的西方反核战运动的攻击目标，西方反应之强烈不亚于苏联。

不过，对北约内部关系最大的破坏是强辐射武器泄露事件使西德施密特总理陷入尴尬境地，他渴望加强北约战区力量的立场由于自己所属政党——社会民主党——内部强烈反对强辐射武器而复杂化了。施密特本人虽然看来赞成部署这种武器，但在公开场合他又显得很勉强。于是卡特政府决定，在欧洲方面未公开表示支持之前不再继续研制这种武器。其中西德的支持尤为关键，因为大部分强辐射武器将会部署在那里。到1978年年初达成妥协：西德公开宣布愿意接受在本土部署这种武器，条件是该部署必须同与华约的军控谈判联系起来。如果两年内谈判达不成协议，此种武器的部署就开始进行（Yost and Glad 1982：534）。

事后证明，这样做的结果对各方都是很大的损失。正当西德外长根舍到达华盛顿准备就协议最后定稿时，始终对强辐射武器不满意的卡特总统却宣布推迟其研制。正如布热津斯基所言，卡特此举“在国内、在欧洲都自毁信誉”，而卡特与施密特的个人关系也因此进一

步恶化，再也未能恢复（Brzezinski 1983：301）。

围绕强辐射武器产生的紧张关系远远超出了一件武器系统的具体问题。它暴露了美国同西德在缓和与苏联威胁的问题上有不同的利益考虑和看法。西德的态度极其含糊，它既渴望缓和（西德一位国防部官员在“强辐射武器”事件炒得沸沸扬扬之时说，“我们不想给苏联人一个口实，好像我们在加剧东西方紧张局势”），又渴望确保美国对西欧防御的承诺（Yost and Glad 1982：534）。这种不明确的态度同样也表现在延续时间更长因而争执得也更厉害的中程核武器部署的问题上。

西方围绕中导问题争执的起因是苏联决定在欧洲部署一种新型中程导弹，即 SS－20 导弹。首批该型号导弹于 1976 年在欧洲部署。此举激起施密特总理于次年发表讲话，对欧洲安全深表忧虑；在苏联人看来，这件事不过是用一种新型的、精确度更高的导弹来替代过时的 SS－4 与 SS－5。据格奥尔吉·阿尔巴托夫说，为对抗西方的“前进基地系统”（该系统主要由有人驾驶的轰炸机和潜射导弹组成），这是必要的，其目的是通过提高西方发动“有限”核打击代价的办法来加强苏联在欧洲战区的威慑力（Arbatov 1983：123；Garthoff 1990：72）。美方的“前进基地系统”（以及法英的“独立”核威慑力量）一直是苏联的心头之患。虽然它们都定为战区级武器系统而不受限制战略武器谈判的限制，但却具有打击苏联本土的能力，因此被苏联人看作战略威胁。

核军备竞赛中常出现这种情况：只要一方看到现状被对方改变，对方对此情况所做的解释与辩护就不一定能起多大作用。西方领导人和军事筹划者就把苏联部署 SS－20 导弹看成对现状的危险改变，如果不是从严格的军事意义来讲，至少在政治上是如此。在欧洲，特别是在西德，人们把它视为旨在使西欧与美国分离，因为它对美国“延伸威慑力量”的有效性播下怀疑的种子。根据这种情况，面对苏联的压力，又没有美国为拯救欧洲而不惜一战的承诺，西欧很可能单独与苏联达成和解。

但是，有些分析家怀疑苏联人是否有此企图。加特霍夫就写道："苏联人并不想用其地区核力量来公开或隐蔽地威胁西欧，相反，他们强调指出，正是他们认为，无论多么有限地使用核武器都会不可避免地导致核大战"（Garthoff 1990：73）。

但是，无论苏联的观点如何，一个明显的事实是：很多欧洲人把SS－20导弹的部署看作一种核讹诈，他们的对策只能是再次寻求美国的承诺，而不是寻求同苏联的和解（这种对策完全符合逻辑，足以打消对"苏联部署SS－20导弹会分裂美欧"的疑虑）。因此，北约经反复讨论后于1979年做出决定，在欧洲部署巡航导弹和"潘兴"Ⅱ型导弹。此决定不单是针对苏方SS－20导弹的。关于欧洲战区核力量现代化的问题已讨论多年，但苏联的这一行动加速了北约这种决策的步伐，也使问题更鲜明地摆在人们面前。另外，强辐射武器的受挫无疑使卡特以及后来的里根政府决心继续其导弹部署计划。部署被安排在1983年。

说到这里，我们必须停下来把这个复杂问题的头绪进一步理清。首先，具有讽刺意味的是：当初本来是欧洲人（尤其是赫尔穆特·施密特）强烈要求做出的这种决定，后来却被看成美国强迫西欧各国政府接受巡航导弹和"潘兴"导弹的部署。造成这种怪事的部分原因是欧洲公众舆论对建议部署这类武器日益不满。中程核武器的部署成为公众对核问题攻击的首要目标，反对的激烈程度是1950年代末1960年代初以来未曾见过的。或许不那么令人惊奇的是：苏联人对北约部署中程核武器的反应比西方对SS－20导弹部署的反应有过之而无不及。他们发动了一场声势浩大的运动，企图利用西方领导人在自己国内社会舆论面前的脆弱性。事态的这种发展使西欧各国政府陷入被动，促使北约下决心"两手都要抓"：一手抓新型导弹的部署，一手抓与苏联就中程核武器进行的谈判。

与此相关的一个问题是：如果施密特敦促部署新型中程核武器是基于政治而不是纯军事的原因（Bundy 1988：567－8），那么他后来的观点受到由中程核武器的部署所带来的东西方关系骤然恶化的影响

就不足为奇了。紧随中程核武器对抗而来的是1979年年末伊朗革命和苏联入侵阿富汗。这种现实使施密特对缓和的命运更加担忧。他既不愿与他国一起因阿富汗事件制裁苏联，又想在巡航导弹和“潘兴”导弹的部署问题上开倒车。布热津斯基相当气愤地回忆说，施密特甚至“心存中止部署战区核武器的想法”。他接着说：“我担心，这将进一步削弱西欧对核倡议的支持。”1980年11月，施密特宣布西德“将不会如承诺的那样每年把军费开支提高3%”，他与卡特的关系降到了最低点（Brzezinski 1983：309，311）。

最后，必须注意中程核武器的部署同有限核战争之间的交叉关系。针对美国军事计划制定者和布热津斯基本人连篇累牍的讲话，苏联发言人坚决声明，他们拒绝接受任何关于核战争可保持有限的说法（Arbatov 1983：92－8）。西方的苏联问题专家或许会断言，“有些人根据苏联军事学说和武器项目就认为苏联正在推行实战战略，这是完全错误的”（Garthoff 1990：74）。即使在美国国防系统内部，也有人（例如卡特的军控署长保罗·沃恩克）或许会向国人保证：关于苏联主张打核战争的谈论“只停留在抽象的阶段，根本不现实”（Pipes 1981：135）。然而这种许诺对于日益壮大的缓和怀疑派起不到什么作用。他们的代表人物是理查德·派普斯，他是哈佛大学历史教授，后为里根总统顾问。在首次于1977年发表的一篇文章中，他极其详尽地阐明自己的观点：苏联认为它可以打核战争，而且能够打赢核战争。后来他又补充说，他颇感欣慰地注意到卡特总统签署了第59号总统令，这说明总统同意他的观点（Pipes 1981：135）。

实际上，有限核战争问题同威慑理论一样，为超级大国之间以及各自内部的政治斗争提供了肥沃土壤，因为围绕它有种种难以估计的因素。技术的发展自然有其作用，战区和战场核武器日趋成熟使人们认为核战争不一定会发展成全面战争（至少在狭义的技术意义上是如此）。但技术精度上的进步使核理论具有更大的伸缩性，这只能起到扩大政治上互不信任的潜在领域的作用。总之，中程核武器的现代化看来只能降低核门槛，从而使两个超级大国在其他领域发展关系

（尤其是欧洲的政治发展方面）更加困难。

西方的欧洲共产主义现象虽然短暂，但却造成了政治上的不稳定。它起源于两方面的事态发展：一个是纯偶然的，另一个则是长期存在的。偶然因素指的是1974年葡萄牙的革命和次年西班牙多年的独裁者佛朗哥将军之死。前者是一场军人领导的政变，它结束了由安东尼奥·萨拉萨尔开始并在他1968年去世之后由马尔塞洛·卡埃塔诺博士继续的长达40年之久的专制统治。政变在两方面带来与美国直接相关的影响。一是新的统治集团有共产党人入阁；二是新政权迅速行动使葡萄牙的殖民地获得独立。其中就有安哥拉，那里反葡萄牙统治的独立运动已有十几年。实际上，葡萄牙军界面对安哥拉难题早就一筹莫展，这也是他们发动政变的主要原因之一。不管怎么说，安哥拉独立的结果是内战爆发，原来反殖民主义运动的三大派变友为敌，其国际影响将在下一节讨论。

至于葡萄牙的国内形势，美国决策者最关心的是作为北约一员的葡萄牙政府中的共产主义幽灵。美参院多数党领袖迈克·曼斯菲尔德在1975年访葡之后担心地说："由于共产党渗透进里斯本政府，北约的防务机密很可能会被泄露给苏联。"他指出，"北约核计划小组"的一次会议于1974年11月取消，"显然就是出于这种担心"（Facts on File 1976：5）。好在这种担忧时间不长，经过一段时期的政治不稳定，葡萄牙的公众舆论开始反对共产党。1976年一部新的民主宪法诞生了，在随后的大选中温和的社会党人获得了胜利。

西班牙的情况也是如此。40年独裁统治的结束不可避免地引起政治体制的错位。不过，在先后举行的公民投票和民意测验中，都有一部分人赞成恢复君主制。在佛朗哥之后的西班牙，在错综复杂的争夺权力斗争中，共产党拥有相当强的竞争实力，即使在1977年取得合法地位之前也是如此。不过这已是一个失去某些革命传统而至少在策略上倾向实用主义的政党。重要的是，它欢迎君主立宪制，目的主要是不给极右派任何借口以武力来摧毁左派。在1977年举行的大选中，共产党名列第三，其民众支持率为9.2%，在立法下院获20席

(Mujal－Leon 1978：248－52)。

但是，也同葡萄牙的情形一样，在佛朗哥之后的西班牙，左派最终的赢家是社会党而不是共产党。不过，在1970年代后期，西班牙的共产党势力在东西方关系中也起过某种重要作用。这一方面是因为有一段时间看来共产党有可能在另一个北约成员国中掌握一部分政权；另一方面是因为西班牙共产党领导人在推进欧洲共产主义思想方面向来是一马当先。也就是在这方面，伊比利亚半岛的局势同法国和意大利的局势交叉起来了。

西欧的共产主义是从1948年发展起来的。当时法国共产党总书记莫里斯·多列士曾经说，如果苏联人开进欧洲，他会欢迎的。虽然西欧共产党人对苏联镇压1956年匈牙利起义表示赞同，但心存很大疑虑。具有讽刺意味的是：同年早些时候，意大利共产党总书记陶里亚蒂曾宣布"多中心主义"，极力主张各共产党自治，同时认为需要承认共产主义制度也有缺陷，包括"对民主权利的无端限制"。这就意味着对非共产党的左派势力采取更积极的态度，同时否定苏联在国际共产主义运动中的领导地位（Griffith 1978：398，399）。虽然当时法国共产党拒绝接受陶里亚蒂的修正主义立场，但到1960年代中期，它也接受了多中心主义的基本原则。1968年苏联人侵捷克斯洛伐克，法共和意共都公开表示强烈反对。

如此说来，欧洲共产主义只不过是给老思想起了个新名字。它在1970年代的东山再起源于1976年在东柏林举行的欧洲共产党会议。西班牙共产党领导人圣地亚哥·卡里略1977年发表的《欧洲共产主义与国家》一书对欧洲共产主义有非常全面的阐述。在此书中他申明："极为重要的是各共产党超脱苏联而取得独立地位，以及发展鲜明的民主道路的理论和实践"（TöKéS 1978：473）。欧洲共产主义的政治状况表现为意法两国共产党通过选举获得了越来越大的权力，以及它们同北约与欧共体的妥协。在1976年的大选中，意大利共产党在公民投票的支持率上几乎与最大政党基督教民主党平起平坐（分别为34.4%和38.7%），从而出现两党联合执政的可能。布热津斯基

回忆说，这种所谓的“具有历史意义的妥协”标志着意大利外交政策将“明显转向中立”。不过实际情况是，在随后的大选中，意共的得票减少，基督教民主党不愿同它联合组阁。意共同社会党左翼的结盟尝试也同时流产。结果到 1980 年，意共成为“孤立的反对党”（Brzezinski 1983：312，313）。

多年来，法国共产党也主张各党自治，但不如意共始终如一。1970 年代中期法共态度又非常坚决，正如有人分析的那样，“主要是因为 1972～1974 年间突然出现共产党可能掌握国家政权的局面”。这正是与民众支持率骤然上升的社会党联手组成左翼内阁的好机会。但如同欧洲其他地方类似的尝试一样，法共也因为内部在战略和策略上争执不休而失败。四分五裂的左派在 1978 年的大选中失利（Tiersky 1978：161，162，140）。1980 年大选后，社会党人密特朗总统任命四名共产党人入阁。即便如此，法国外交政策仍坚定地倾向西方（Steele 1985：80）。

余下的问题是：如何评价欧洲共产主义在东西方关系中的作用呢？东西方领导人都不喜欢欧洲共产主义。还能回忆起 1930 年代“人民阵线”的西方人可能会认为，西欧共产党转而致力于自由主义的民主和多极化，这只是一种策略而已。这些人或许会发现，只要研究一下 1976 年东柏林会议所表达的观点，他们自己对欧洲共产主义的怀疑就会得到证实。在那次会议上，法国共产党同西班牙共产党一道，谴责苏联对西方过分温和、在意识形态上声讨资本主义力度不够、支持西欧社会主义变革又太软弱。总之，他们认为苏联对从大国缓和中谋利比发挥革命先锋的作用更感兴趣（Tiersky 1978：154）。还有，当意共保证支持意大利留在北约时，有多少人会相信呢？还有其他疑问围绕着欧洲共产主义，而在它们背后是一种总的忧虑，担心欧洲共产主义会威胁东西方分权的这种脆弱的组织结构。

另外，西欧各国的共产党越来越顺应议会制，这一点又使苏联非常不安。欧洲共产主义似乎把马列主义的实质抽得一干二净，而且公开反苏。一位苏联作者愤怒攻击卡里略的《欧洲共产主义与国家》

一书。他认为，卡里略罪大恶极之处在于他企图“为独立的西欧社会主义模式辩解，把它说成使东欧政权‘民主化’的最有力的手段”，这比帝国主义的任何攻击都更“恶毒、更具颠覆性”（Levgold 1978：377）。

或许不难理解的是，当时两个超级大国都很难看清欧洲共产主义可能代表着促成缓和局势的力量，其实这种情况在某种程度上是它们自己精心策划所造成的结果。各自集团凝聚力的下降既是缓和的成因，也是缓和的结果。更具体地说，正是因为欧洲的缓和协议将欧洲的分裂稳定了下来，促进了紧张局势的缓和，从而为“铁幕”两边的多元主义创造了更宽松的环境和东西方越来越多的沟通。

对于东欧各国人民来讲，多元主义以及同西方沟通的加强既是希望，又是危险。希望是指有机会从西方获取更多的贷款和信贷，提高生活水平，有望通过赫尔辛基协议实现自由化，总的来讲是有机会重新成为“欧洲的一部分”（TöKéS 1978：490）。危险在于：事态如沿着这个方向发展，可能会激怒苏联。因此，东欧国家的领导肯定要在对立的两者之间保持一种微妙的平衡。他们在这方面已有长期的经验，这是一种保持稳定的重要力量。然而到了 1970 年代，出现了一些新的难以估计的因素，使事态不那么容易被控制了。

除了缓和的大环境、《赫尔辛基最后文件》和欧洲共产主义的崛起以外，鲁道夫·托克斯还列举出 1970 年代发生的对东欧有重大影响的两个事件：一是由于 1973 年“欧佩克”实行石油禁运，油价提高了四倍，导致全球能源危机；二是持不同政见者的东山再起（TöKéS 1978：438）。这两件事对波兰的影响最大。波兰或许并不是东欧国家的典型（考虑到这些国家内部的巨大差别），但仍可作为这个地区事态发展的领头羊。

与其他东欧国家（如南斯拉夫或罗马尼亚）相反，波兰的面积、在东方集团经济中的重要地位，以及处于西方入侵苏联必经之地的地理位置，使它成为苏联安全至关重要的因素（Gati 1990：48 –9；Dawisha 1990：74 –5）。斯大林在雅尔塔会谈期间就多次提到波兰地

理位置的重要性。波兰与俄罗斯（后来的苏联）历史上积怨甚深，这主要是因为俄罗斯是波兰多次被肢解的罪魁祸首，二战后苏波关系更趋紧张。特别要指出的是：二战结束重划边界时，波兰边界西移，占了一部分原属德国的地方。波兰担心德国会收复失地，只得依赖苏联保证其安全。如果说有什么事使苏联人更加坚持苏波联系极端重要的话（因为正如蒂莫西·加顿·阿什所说，边界问题的解决有效地免除了波兰共产党当局对西德复仇主义的担忧），那就是在这种背景下西德在1970年分别同波兰和苏联签约，承认二战后波兰的边界（Garton Ash 1984：319）。不管怎么说，看来很明显，波苏“特别关系”的基础并不是对社会主义意识形态的忠贞不渝，而是对强权政治现实的实用主义的认可（Dawisha 1990：70）。

也正是在1970年，波兰出现1956年危机以来第一次政治大动乱。那一年的示威游行——1976年再次重演——矛头主要针对经济问题，尤其是食品价格。这两次事件并未导致持续不断的群众抗议运动，但在1976年危机期间，一些知识分子成立了“保卫工人委员会”，其活动基本未被当局禁止（Garton Ash 1984：17－21）。1970年代后期的经济危机使波兰的国内气氛发生了决定性的变化，1980年出现了团结工会。此前的几次危机都通过向西方借款部分得到解决。到1970年代末，波兰已债台高筑，无力偿还，1979年第二轮的油价上涨使波兰的经济难上加难。食品和其他消费品短缺，后果尤为严重（Dawisha 1990：169－73，179－82）。

正是这种形势激怒了波兰工人，他们愤起抗议，其规模和强烈程度是1956年以来未曾见过的。运动的组织核心是团结工会。它于1980年8月在格但斯克造船厂成立，几星期之内就发展成为全国性的革命力量，得到知识阶层和天主教教会的支持。到8月底，政府被迫宣布该组织合法。几天之后，波兰领导人爱德华·盖莱克辞职。

起初，团结工会还尽量向当局保证它的“社会主义新生”论坛并不意味着放弃社会主义制度或共产党的领导；但对团结工会的地位和目标的表述，不可避免地带有模糊性。莱赫·瓦文萨后来写道：

“当时我们对党派政治不感兴趣。我们并不想自己掌权或通过自己组成的政府重建秩序。”另外，团结工会领导层内部辩论的问题之一就是要不要改变“共产党单独决定各级政府关键部门的人选（不仅是政治领域，还包括民政、警察以及军事领域），也就是‘党即法’的制度”（Walesa 1987：145－6，147）。瓦文萨一直把团结工会说成是个“工会”，但当局认为它对独立地位的要求带有政治性质，是要颠覆共产党政权。

与1956年的情况非常相似，苏联向波兰当局施加压力，要他们自己动手镇压反对派。处理匈牙利和捷克斯洛伐克危机的模式（即苏联直接镇压）也可以作为最后一招运用于处理波兰在1980～1981年出现的情况，但那样做对苏联在世界（包括共产主义阵营）舆论中威信的危害会比前几次危机更大。另外，如一位权威人士所说，苏联的入侵“很可能酿成与该国的工人阶级和整个民族交战的局面”。不过，苏联也确实做了这种准备，而且有两次——1980年12月和1981年3月——苏联领导马上就要决定出兵干涉。但最后苏联决定再等等看，同时向波兰总理雅鲁泽尔斯基将军反复施加压力，要他恢复秩序。后者于1981年12月宣布团结工会非法，并实行军事管制。于是勃列日涅夫主义得到重申，尽管不像1968年那样具有爆炸性（Bialer 1986：223；Gati 1990：53－5）。

事态的发展引起两种反应。第一种反应是与1956年时相反，1981年遭镇压的反对派虽被击倒了，但并未退出政治舞台。尽管团结工会的很多领导人被拘留或监禁，但在整个1980年代，团结工会一直是一支强大的力量，积极开展地下斗争（Garton Ash 1984：271）。不仅如此，1981年12月企图使团结工会和政府达成妥协的天主教教会继续开展团结工会的大部分工作，“为政府和人民提供一条合法的渠道”，来实现团结工会的主要要求，包括释放政治犯、提高生活水平和实行政治改革（更充分地考虑非共产党的利益）。1989年4月解除对团结工会的禁令应主要归功于教会的努力，特别是教皇约翰·保罗二世（此人是波兰人，原为沃伊蒂瓦红衣大主教）的努力。他在1987年间先在梵

蒂冈接见雅鲁泽尔斯基将军，同年后期又亲访波兰（Dawisha 1990：167，168）。1989年波兰共产党政权垮台，人民顺理成章地选择了团结工会来组织新政府（这些事件将在第十三章讨论）。

第二种反应涉及东欧事件与缓和这个大环境的联系。蒂莫西·加顿·阿什在记述团结工会和波兰革命时指出，面对团结工会的崛起，西德政界领导人和知识分子陷入尴尬境地。团结工会领导“被捕并被投入拘留所”那天，西德总理施密特恰好在会见东德共产党领导人埃里希·昂纳克。西德的知识分子没有几个站出来公开抗议取缔团结工会。施密特本人几天之后在议院发表谈话时也对此含糊其辞。加顿·阿什指出，其中真情是西德领导人对缓和抱希望太大，面对波兰局势自然为难。如果他们对团结工会的事业表示支持，就会给作为其“东方政策”的重要成果即西德同东方集团关系的改善投上阴影（Garton Ash 1984：316－19）。

西德实行“东方政策”的初衷是期望东西方关系的缓和会有助于东欧政权走向自由化。它根本没有想到会出现下述情况：变革自下而起、当局镇压反对派并重申正统、东欧领导人利用“缓和”（尤其是西方的经济援助）来“巩固和加强自己的统治”。“东方政策”的缺陷在于：没有搞清楚它究竟是为东欧各国的政府服务，还是为那里的人民服务（Garton Ash 1984：321－4）。

与西德对波兰事件的反应截然相反，当1980年12月看来苏联即将对波兰进行武装干涉时，美国在西方世界率先抗议。按布热津斯基的说法，苏联之所以最终没有采取行动，主要是因为美国将其情报公布于众，表明苏联军队正在苏波边界移动。而这种观点也从苏联专家那里得到部分证实（Brzezinski 1983：465－8；Bialer 1986：223）。在美国看来，波兰是继阿富汗之后钉在“缓和”棺材上的又一个钉子。

美国和西德对波兰事件的不同反应很说明问题。首先，它证实了前面所阐明的一个观点，即1970年代后期东西方关系的一个显著特点是超级大国与其欧洲伙伴之间在利益和看法上都有分歧。波兰事件只是分歧点之一，另一个是苏联入侵阿富汗事件。更早还有1973年

10月中东战争期间美国发出核警告，从而引起西欧国家的不满（将在下一节讨论）。回顾美国同西欧在这些以及其他领域的争论，美国国会研究部建议：

> 欧洲人更倾向于把缓和看成“可分离的”，更倾向于保护缓和给欧洲带来的成果。而承担西方在世界上大部分军事负担的美国，从自身利益出发，更倾向于把缓和看成“不可分离的”，对苏联在欧洲之外的行动需要西方在欧洲框架内做出反应。
>
> (Stuart and Tow 1990：89)

欧洲人，尤其是西德人，只看到缓和政策的可分离性，根本不考虑美国的忧虑，这将把保证它们安全的主要关系（即同美国的关系）置于危险境地；另一方面，在波兰和阿富汗一类的问题上，与美国亦步亦趋又会使它们与莫斯科的关系处于危险境地，而欧洲的继续缓和取决于这一关系。因此，西德在法国的帮助下谋求一种中间道路，以保证同两个超级大国都保持良好关系。正如德国一位历史学家所指出，放弃缓和政策，西德损失最大，如果东西方关系恶化，“东方政策”带来的很多收益（如东德与西德之间贸易和探亲往来的增长）将会付之东流。因此，超级大国之间哪怕“最少量的缓和”也是继续欧洲缓和形势的决定因素（Haftendorn 1986：140－2）。

控制不住的冲突：第三世界

两个超级大国的领导人及其智囊团都很难接受下述观点：第三世界的不稳定源于另一个超级大国行动以外的因素。即使苏联人承认（他们的一位著名分析家就是这样认为的）苏联或美国都控制不了“第三世界的巨变过程”，但这种承认并不改变苏联的基本观点，即1970年代第三世界动乱的根源在于美国支持的新殖民主义(Trofimenko 1981：1026，1022－7)。而在美国方面，到1970年代

末，那些对缓和政策持批评态度的即将成为里根总统的顾问的人则认为，苏联对第三世界怀有野心是不容置疑的。理查德·派普斯把苏联对第三世界的政策视为属于所谓“大战略”的范畴，其目标是谋求控制靠近西方重要供应线的国家。其要害地点（与“弧形危机地带”的地理界线一致）包括红海的南入口（进而通往苏伊士运河）和霍尔木兹海峡（进而通往波斯湾）（Pipes 1981：187－8）。两个超级大国都发现自己很难抗拒其全球主义的心理，一有新危机出现，就认为对方在作祟。这样，它们的行动往往把第三世界的危机转换为超级大国的对抗，尽管冲突开始时只限于当地。

在1970年代，两个超级大国有多次机会在第三世界直接碰撞。人们会情不自禁地发现这种碰撞有个模式。亨利·特罗菲缅科这位苏联著名的美国问题专家把这些动乱看作“反新殖民主义革命的过程，反映出大部分发展中国家要求政治和经济独立的愿望”。他说，这是“摆脱依赖外国、获取民族解放与社会经济解放斗争的第二阶段”（Trofimenko 1981：1022）。

这种观点不无道理，至少体现在下面这个事情上，即发展中国家确实越来越意识到普遍存在的自身经济问题——具体说来就是来自工业化国家的产品价格上涨，而许多发展中国家赖以生存的出口商品价格却下跌。再加上对国外的债台高筑、1973年阿以战争后能源开支骤增，以及总的感觉是全球财富分配不公，在1974年的联合国大会上，77个发展中国家就这些问题发出了呼吁，最终形成建立“国际经济新秩序”的建议。后续的会议（有些是联合国发起的，有些则不是）展开一系列就此建议的北南对话，不过直到1970年代末这些会议的实际成效甚微。以维利·勃兰特为首的独立委员会起草了一份报告，名叫《北方—南方：生存纲领》，于1980年发表，它对这些问题被提上国际议事日程起到了一定推动作用。

如此说来，经济危机是贯穿第三世界各国政治危机的一条红线，但各地区的不稳定有各自的具体形式与根源。如此庞大而复杂的问题只能概括地阐述。我们观察它时要记住两个问题：一是该地区的内部

条件，二是美苏竞争的特点，最后以超级大国在第三世界得失的大体平衡为结局。我们将从三次危机谈起——安哥拉、非洲之角和阿富汗（都涉及苏联或苏联与古巴的直接干涉），然后转到伊朗革命、阿以冲突和尼加拉瓜革命（超级大国的对抗采取了较间接的形式）。

安哥拉

1974 年葡萄牙革命后，葡萄牙宣布安哥拉独立，随即引发了南部非洲的冲突。早在计划的独立日（1975 年 11 月）之前，安哥拉的内战就爆发了。“安哥拉民族解放阵线”“争取安哥拉彻底独立全国联盟”和“安哥拉人民解放运动”这三派力量开始争夺军权和政权。这些组织之间与其说有政治分歧，不如说只是部落不同。而外部势力对它们的支持也证明国际政治可以产生多么奇怪的伙伴关系啊！美国开始支持“安哥拉民族解放阵线”（名义上三派中最左的一派），认为它是最强的一派；中国也支持“安哥拉民族解放阵线”，但于 1975 年夏撤出；“安哥拉人民解放运动”得到苏联的支持；而南非帮助“争取安哥拉彻底独立全国联盟”。

5 月，苏联开始向安哥拉空运古巴部队，到年底空运的部队人员越来越多，最后达到 11000 人，以对付支持“争取安哥拉彻底独立全国联盟”的南非部队（该部队由 5000 人组成）。大量古巴人的涌入足以使天平朝“安哥拉人民解放运动”方向倾斜，到年底它已夺得政权。在宣布正式独立之后，“安哥拉民族解放阵线”和“争取安哥拉彻底独立全国联盟”在南非的支持下联手继续开展斗争。

苏联和古巴干涉的动机是什么？为什么美国没有采取行动支援“安哥拉民族解放阵线”和后来的“争取安哥拉彻底独立全国联盟”？关于第一个问题，虽然古巴不可能单独进行干涉，但显然它也有干涉的强烈愿望，而不仅仅是作为苏联的代理人（Isaacson 1992：676）。中国和美国对“安哥拉民族解放阵线”支持的规模比较小，也没有军队介入。苏联曾扬言，它的行动是对中美行动做出的反应。苏联的

动机，除想随着自己军事力量的增强来加强在第三世界的影响力以外，也担心中国在非洲的影响力可能加强，更担心在第三世界的竞争中中美可能联手对付苏联（Garthoff 1985：528）。

关于第二个问题，美国的反应受到两方面的限制。首先，事态的发展出乎它的意料，它没有准备对策，只能给“安哥拉民族解放阵线”有限的支持。即使回过头来看，亨利·基辛格显然仍认为安哥拉没有什么意义。他在回忆录中只提到过三次安哥拉，每次都是一带而过。美国后来看重安哥拉，主要是由于苏古的干涉，而不是因为安哥拉本身对美国利益有多么重要。其次，越南战争刚刚结束，美国国会不希望再来一次对外干涉。1975 年 12 月，国会拒绝授予政府权力和手段采取这种行动。

还有，在安哥拉独立后的内战期间，美国面临的一个难题是，支持“安哥拉民族解放阵线”和“争取安哥拉彻底独立全国联盟”就意味着同南非结盟，要知道那时黑非洲正发动猛烈的舆论攻势，反对残留在非洲大陆的白人少数派统治。罗得西亚要求结束白人少数派统治的呼声高涨，“西南非洲人民组织”为摆脱南非而获得独立正在纳米比亚加紧开展游击活动，南非本国反对种族隔离的抗议愈演愈烈，所有这一切对美国的压力越来越大，致使美国认为，支持南非实现在该地区的野心所冒的政治风险太大。

关于这个问题，一些评论家已指出了安哥拉局势在促使美国对其南部非洲政策做出重大调整时所起的作用。亨利·基辛格 1976 年 4 月在赞比亚的卢萨卡发表讲话，宣布美国对非政策的方向性改变，其基调是“坚决反对少数白人的政权，给新兴的黑人国家以经济援助”。福特政府对南部非洲政策的调整（后为卡特政府所继承）虽然遭到国内保守派的强烈反对，其实是对抗苏联在非洲影响的全新手段，也可以说比此前尝试过的办法都更有效。新政策的具体结果之一是基辛格对罗得西亚僵局开展的穿梭外交。罗得西亚总理伊恩·史密斯从 1965 年单方面宣布从英国统治下获得独立以来，一直实行少数白人统治。基辛格则穿梭兜售罗得西亚过渡到多数人（黑人）统治的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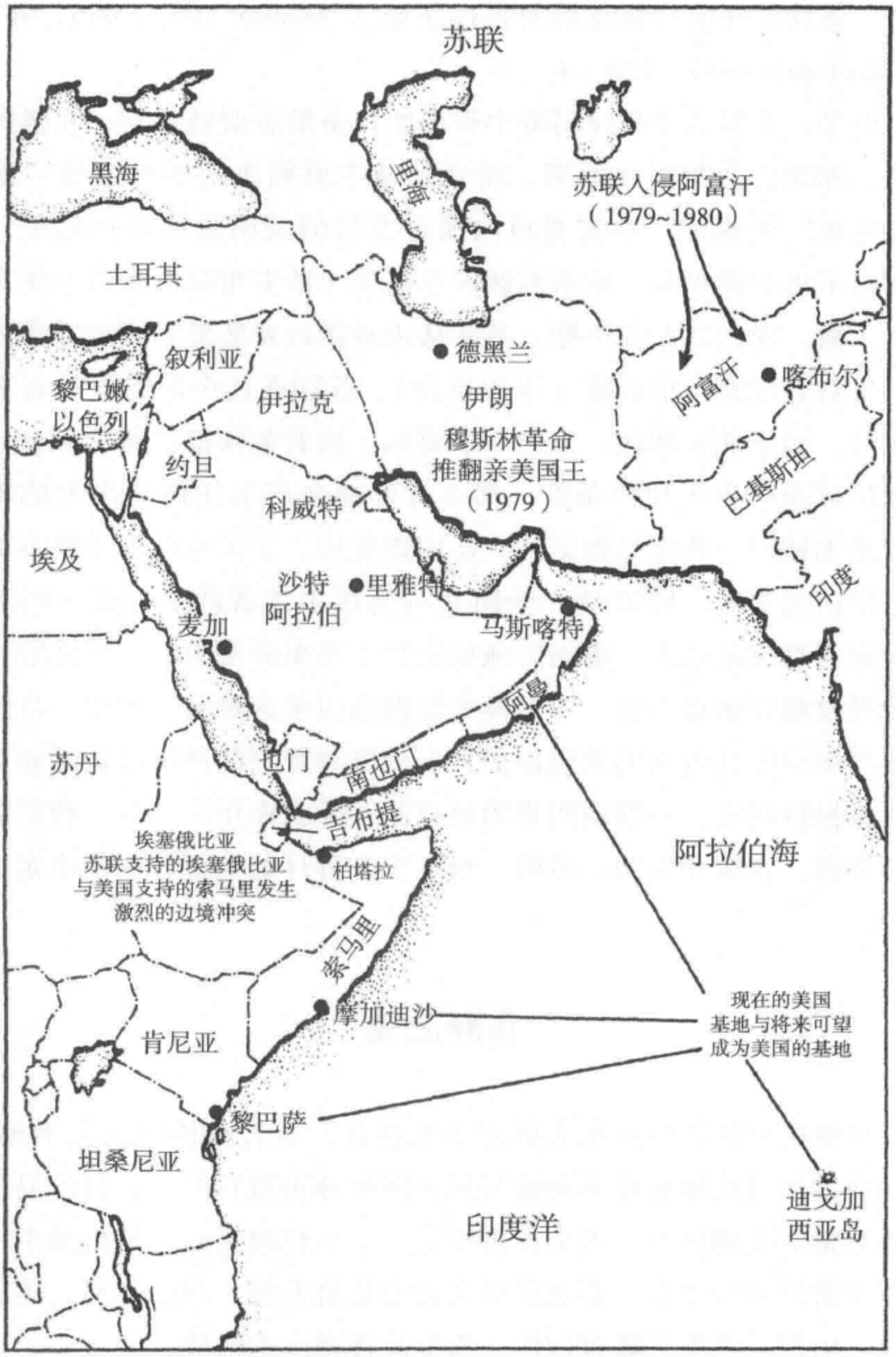


图 11.1　近东的动乱（1980）

资料来源：W. 拉夫伯：《美苏与冷战（1945～1992）》，纽约，麦格劳－希尔出版公司，1993，第 297 页。

计划。该计划在卡特执政期间得以实施（Isaacson 1992：686，687－92；Edmonds 1983：153－4）。

但是，美国从安哥拉局势中得出的一条最重要结论是：它坚定地认为，苏联已背叛缓和政策，特别是基本原则协定所规定的“避免挑起危机”的承诺。在安哥拉内战爆发后的美国总统大选之年，福特政府不再奢谈缓和。然而苏联并不认为干涉安哥拉同致力于缓和有什么矛盾。勃列日涅夫声称，苏联从未承诺过要放弃对解放斗争的支持。反对者常常会指责说（不无道理），苏联在这个问题上的言论空洞无物。如果确实如此，人们不禁要问：倘若美国把苏联约束自己在非洲的行动作为军控的条件，那么有可能会产生任何层次上的缓和吗？毫无疑问，答案是否定的。还应该指出，美国在对外干涉方面也不是清白无辜的。1970 年，为阻止马克思主义者萨尔瓦托·阿连德成为智利总统候选人，美国暗地里进行了不懈的努力。三年之后，阿连德被推翻并惨遭杀害，不过没有证据表明美国参与了此事。尽管阿连德的倒台有其内部的重要原因，但美国对智利的严厉经济封锁和向反对派提供资金，对削弱阿连德政权起了重大作用。另外，我们后面将会发现，在缓和期间，美国一直在千方百计地阻挠苏联在中东发挥作用。

非洲之角

安哥拉的某些特点在非洲之角也存在，尽管整体情况大不相同。苏联和古巴对埃塞俄比亚和索马里之间的冲突进行干涉，很容易从国际政治角度找到理由，因为苏古是应一个主权政府而不是内战中一派的要求而采取行动的。苏联还尽力避免危机升级。尽管如此，美国大多数人仍把它看作苏联进行的一次危险性很大的冒险。

由于索马里支持欧加登（埃塞俄比亚的一个省，主要居民是索马里人）的独立运动，埃索两国之间的战争于 1977 年爆发。很明显，索马里想吞并欧加登。1977 年 2 月门格斯图在埃塞俄比亚上台执政，

对两国冲突的发展和战争中国际结盟的特点起到关键作用。1974 年海尔·塞拉西皇帝被迫退位后，左派“临时军政委员会”接管了政权，门格斯图的崛起是这个组织内部激烈斗争的产物。他上台以后，美国对埃塞俄比亚的长期支持受到严重影响，一是因为该国多次出现严重侵犯人权的事件；二是由于门格斯图很快伸出触角，想与苏联做军火交易。此外，迄今为止一直是苏联盟国的索马里开始谋求同美国改善关系，以便获得武器以及对它在埃塞俄比亚欧加登省发动的独立运动的支持。1977 年 7 月，美国同意向索马里输送“防御性武器”。这一宣布被广泛理解为对索马里吞并欧加登企图的赞同（Steele 1985：241）。

1977 年夏天有一段时间，在欧加登纠纷的前景尚不明确时，苏联同两国都保持着关系，想从中调解。确实，在 8 月之前，苏联向埃索两国都提供武器。但是，当索马里领导人西亚德·巴雷明确表示要以武力夺取欧加登时，苏联立即停止向他提供武器。大约在同时，考虑到索马里已进军到欧加登，美国也宣布撤回向它提供武器的承诺。只是到了 11 月，当索马里的入侵已深入欧加登时，苏联和古巴才做出决定，要出兵干涉，支援埃塞俄比亚。

于是出现了传统联盟大逆转的局面——美苏对调伙伴关系。不过这个过程并不完全同步。到 1978 年春季，苏古的干涉对索马里部队被驱逐出欧加登已起到了决定性作用，而美国仍拒绝向索马里提供武器。美国又一次支持了输家，或者说同安哥拉的情形一样，美国有意不与苏古针锋相对。这样做是有充分理由的，主张做出比卡特更强硬反应的布热津斯基也承认这一点。他回忆道，“名义上索马里人在欧加登毕竟是侵略者，这一事实妨碍了我们支援它”（Brzezinski 1983：178）。

苏联在非洲之角的行动包含自我克制与积极进取两种机会主义因素。克制表现在一旦达到把索马里部队赶出欧加登的目标，便决定不再支持埃塞俄比亚侵入索马里的计划。这一政策引起埃塞俄比亚领导人的不满，不过这个代价对苏联是值得的，因为把对埃塞俄比亚的支

持限制在把索马里部队赶出欧加登与“非洲统一组织”的立场是一致的，这样做利大于弊。

另外，苏联的机会主义立场明显地体现在1978年后一段时间支持埃塞俄比亚镇压北部厄立特里亚省反叛分子的独立运动。名义上苏联的立场是通过谈判解决分歧，但实际上苏联又忍不住要帮助埃塞俄比亚镇压厄立特里亚的反叛分子。这种机会主义的做法源自下述情况：厄立特里亚位于红海沿岸，埃塞俄比亚仅有的几个港口都集中在那里，由此可以弥补苏联人丢掉索马里柏贝拉港的损失（Steele 1985：242）。这次行动的结果是厄立特里亚的反叛分子被暂时镇压下去了，但却导致了一场长期的游击战争。

在随后的几年里，苏联同埃塞俄比亚的关系并不融洽。它们在许多问题上有分歧，概括起来说就是：实用主义的关系仅以狭隘的共同利益为基础，为了自身的政治和战略目的而互相利用。苏联对埃塞俄比亚政治的影响主要局限在安全问题上，在其他方面，埃塞俄比亚民族主义对门格斯图的影响要胜过他对马列主义的忠心耿耿（Halliday 1981：97－8）。

美国对非洲之角的介入最多也是间接的。同安哥拉的情形一样，也是对苏联行动的反应，而不是真正关心索马里的利益。美国政策的一个重要方面是这场危机暴露了布热津斯基和万斯之间的分歧。这种分歧是以非常公开的争论形式出现的，双方争论的问题是，把苏联在第三世界的行动与限制战略武器谈判联系起来是否明智？布热津斯基从一开始就主张要更坚定地支持索马里，他一直认为埃索争端“绝不仅是边界冲突”。他写道，“与苏联在南也门的影响和军事存在联系在一起，它对我们在中东（尤其是阿拉伯半岛）的地位构成严重的潜在威胁”（Brzezinski 1983：178）。在卡特政府中，唯有他持这种观点，他对同事们不愿意承认他所认为的现实情况自然感到非常失望。在一次记者招待会上回答问题时，他提出苏联的干涉会使限制战略武器谈判“复杂化”的观点。卡特总统随后做了澄清，卡特总统否认因为苏联对非洲之角的干涉美国有放缓军控谈判的意图。但是他

又说，苏联的政策“会挫伤美国人民对苏联的言论与和平意愿的信任，也会使批准限制战略武器谈判的基本原则更加困难。”万斯的态度则毫不含糊，他认为，“限制战略武器谈判同埃塞俄比亚的局势没有关系”（Brzezinski 1983：185）。

从表面上看，总统在这场争论中偏向布热津斯基，至少万斯是这样认为的。对万斯来讲，限制战略武器谈判远比埃塞俄比亚的小插曲重要。“我们正在搬起石头砸自己的脚”，他在回忆录中写道，“我们硬把非洲之角的复杂形势纳入东西方关系，又为美国政策规定了一个不能实现的目标——肃清苏古在埃塞俄比亚的影响。这样就造成一种错觉，好像我们失败了，而实际上我们成功了”（Vance 1983：88）。他说的“成功”是指结束了索马里对欧加登的入侵，又迫使苏联阻止了埃塞俄比亚侵入索马里。但这个标准在布热津斯基看来，是忽视了非洲之角危机中最重要的事实——苏联和古巴的干涉。

这种错综复杂的局面造成的后果是多方面的。实际上美国对非洲之角的政策接受了万斯的观点，即不把苏联的行动看作“苏联大战略的一部分，而只是企图利用到来的机会”（Vance 1983：84）。但在非洲之角危机过后，布热津斯基的观点又占了上风。有意思的是，两人做法上的区别还表现在各自回忆录中对 1978～1979 年美中关系正常化的叙述上。布热津斯基开始论述这个专题时先介绍了非洲之角危机那些“动乱的岁月”。他写道：吸收这些事件的教训，“我们开始更系统地研究与中国建立战略磋商关系以求与苏联达到平衡的可取性”（Brzezinski 1983：189）。在这个问题上，布热津斯基得到国防部部长哈罗德·布朗的支持。相反，万斯没有从美苏全球竞争的角度看待美中关系正常化的政策。他写道：“我认为，中国是个大国，在 20 世纪的最后 25 年将发挥重要作用，它绝不仅仅是美国同苏联抗衡的一个砝码”（Vance 1983：79）。不难判断，苏联人完全是用布热津斯基的观点来看待美中关系正常化的，把它说成超级大国全球对抗的一步棋。苏联所以会产生这种看法，是因为当时在同一年发生了中国对越南的短期战争（见第十章）、非洲之角冲突和限制战略武器谈判

进展缓慢等情况。美国人打“中国牌”的确切意思，按照格奥尔吉·阿尔巴托夫的说法，就是“西方想从我们同中国关系不和中渔利”（Arbatov 1983：167）。

阿富汗

人们常常援引布热津斯基的话说：“限制战略武器谈判已埋葬在欧加登的沙漠之中。”如果此话不差，那么阿富汗事件使阿富汗成为限制战略武器谈判的第二个埋葬地。1979年12月25日，苏军涌入阿富汗，这是二战以来苏作战部队在华约地区以外的首次部署。苏联人声称，他们是应阿富汗领导的要求而去的。苏军迅速占领了喀布尔，几小时后哈菲祖拉·阿明的政权被推翻，阿明被杀身亡，巴布拉克·卡尔迈勒取而代之。苏联人和卡尔迈勒本人都否认他是苏联的傀儡。苏军在阿富汗待了近十年，日渐陷入四面楚歌，喀布尔成了他们牢固占领的唯一地点。苏军部队战斗死亡达14000人。有些报道说，非战斗死亡的人数与此不相上下（White 1990：175；Goldman 1992：198）。

苏联对阿富汗的入侵严重破坏了自己的国际声誉和东西方关系。它不可避免地招致西方领导人的谴责，欧洲共产党人也一致痛斥苏联。美国抵制了1980年在莫斯科举办的奥运会，并禁止向苏联出口谷物。最要命的是，卡特总统中止了参议院准备批准第二阶段限制战略武器谈判协议的工作。事态的这种发展证实了西方对缓和政策持批评态度的人的担忧，同时也损害了赞成缓和政策的温和派（如万斯）的地位。同越南战争一样，阿富汗战争对西方和东方的影响远远超出了其地理概念。

苏联外长葛罗米柯以其特有的泰然自若的语气回忆说，“众所周知，这些军队的介入纯属一个国家对另一个国家进行的邻居般的帮助”（Gromyko 1989：240）。格奥尔吉·阿尔巴托夫同样以避重就轻的口气进一步解释道：

> 我们派军队到那里是为了两个相互密切联系的目的：一是帮助阿富汗革命后成立的政府抵御外部的侵略；二是防止阿富汗成为我们南部边界上的反苏基地。
>
> （Arbatov 1983：190）

阿尔巴托夫提到的阿富汗“革命”指的是发生在1978年推翻穆罕默德·达乌德政权的政变。达乌德是阿富汗前国王的表弟，他自己也是于1973年在左翼阿富汗人民民主党的支持下发动政变上台的。但他上台后立即抛弃了伙伴，不实行他曾承诺的改革。1978年推翻他的正是阿富汗人民民主党。该党由两大左派组织联合组成，执政后又分裂开来，其中以哈菲祖拉·阿明为首的一派掌握了政权。阿明上台后开始实施激进的政策，包括席卷全国的破坏性很强的土改和清除伊斯兰教的种种举动。这些变革引起民众的强烈不满，1979年邻国伊朗的伊斯兰革命的影响又对此起到推波助澜的作用。一位作者写道：“到1979年春，莫斯科已面临困境，在它入侵阿富汗前夕更是进退维谷：是减少损失，撤回对一个越来越不得人心的不稳定政权的支持呢，还是帮助它维持下去呢？”1979年夏秋两季局势陡然恶化，促使苏联实行军事干涉（Steele 1985：124 and 121－5）。

有人企图弄清苏联干涉阿富汗的动机是进攻性的还是防御性的，如哈里·格尔曼所指出，这是徒劳的。入侵阿富汗是一种先发制人的行动，旨在保住刚刚取得的却又是十分脆弱的胜利，即1978年的阿富汗革命（Gelman 1984：169－70）。如此说来，这一行动是防御性的，因为不采取行动就会影响苏联的安全，也会在国际上被看作苏联的失败；这一行动又是进攻性的，因为满足了苏联的需要就意味着可以单方面突然改变地区的乃至“全球的”力量对比。说这一行动涉及全球，不仅是因为西方有意把它看作与苏联对非洲的干涉如出一辙，而且还因为——用戈尔曼的话说——苏共中央政治局本身就把它视为“近年来发生在世界各地的有利于苏联的一系列变化的又一个

变化”（Gelman 1984：170）。

评估苏联入侵阿富汗对缓和的影响并不像看起来那么容易。从任何角度看，苏联的行动都是挑衅性的，从缓和的角度看更是如此。据报道，出兵阿富汗的决定是由少数人即不超过四名苏共中央政治局委员做出的，不过这在苏联重大外交决策中也不算什么出格之事。但在一些重要方面，这次干涉背离了苏联在第三世界的常规。这次军事卷入的规模空前，而且不同于干涉安哥拉和非洲之角，苏联谋求直接控制阿富汗政府，尽管喀布尔的独立本来就是神话。这表明，苏联把阿富汗看作与自身利益息息相关，如同墨西哥之对美国利益一样。当然，外国观察家很难确定这种新模式会不会推广到其他地方。世界对此事件的反应也应该从这个角度理解。

但外界的反应也不一致。前面已经谈到，欧洲人——尤其是德国人——的言行都不愿危害缓和局势。确实，如一位德国作家所指出，许多欧洲人把美国对这一事件的反应看作发泄自己无力解决伊朗人质危机而感到的愤怒和沮丧（Haftendorn 1986：139）。赛勒斯·万斯支持美国所有的反措施，同时担心欧洲人“会错误地认为缓和政策（可以）孤立于其他地方发生的事件”。不过他也不愿意放弃缓和。他写道：“我向欧洲人保证，卡特政府不准备破坏缓和的结构，也不会中止同东方的往来。”万斯做结论说，回顾美国政府内部的分歧，阿富汗事件“对我主张的政策无疑是一个严重的挫折。根深蒂固的反苏主义与控制美苏两国危险竞争的需求这两者之间的脆弱平衡再也不能维系下去了。天平倒向主张对抗的一方。尽管在我看来，这种对抗更多地停留在口头上而没有诉诸行动”（Vance 1983：393，394）。

万斯最后这段话的意思好像是说，苏联对阿富汗的干涉尽管不能容忍，但对美国的利益并未构成严重威胁。显然卡特并不同意这一观点。他宣布实行“卡特主义”，其要旨是“任何外部势力控制波斯湾地区的企图都将被视为对美利坚合众国根本利益的攻击，这种攻击将受到用一切必要手段——包括武力——的反击”（Carter 1982：483）。

实际上，“卡特主义”背离了依靠地区盟国确保美国利益的“尼克松主义”，而退回到1957年的“艾森豪威尔主义”。这种改变的主要原因之一是愈演愈烈的伊朗危机。本来尼克松政府曾把伊朗看作中东地区的稳定力量。如此说来，卡特对阿富汗事件的反应部分是出于对其邻国伊朗局势的考虑。

伊朗革命

伊朗革命的全部内容远不只是1970年代的那种直接危机。在此之前，伊朗还经历了传统的伊斯兰文化与西方化的世俗观念和制度的冲撞。冲撞的形式之一是殖民主义；另一个是土生土长的自上而下的现代化，像1920年代和1930年代阿塔图尔特领导下的土耳其那样。伊朗国王在同一时期采取的也正是这后一种模式；其子在1953年复位之后，在石油税收不断增加的刺激下，继续推行这种模式。然而在伊朗，现代化也好，西化也好，都只能是部分的，最多只能在社会上层推广，不会触及宗教领袖和人民大众。

1970年代出现了对伊朗的发展具有决定性影响的新因素，这就是尼克松政府根据“尼克松主义”决定把伊朗国王塑造为中东地区的稳定力量。美国影响的主要手段是出售军火，尽管这既不能保证国王坐稳江山，也不能保证他对美国的利益唯命是从。实际上，国王同其他石油输出国抱成一团，在1973年阿以战争后坚持提高石油价格，尽管在战争结束后的封锁期间伊朗继续向美国提供石油（Rubin 1981：140）。在同年早些时候，国王成功实现了石油生产的国有化，也就实现了1950～1953年摩萨台执政期间追求的目标。国王对美国武器的依赖给美国带来的好处都被美国越来越依赖于外国（包括伊朗）的石油所抵消（Rubin 1981：139－40）。美国对国王严厉镇压持不同政见者的政策毫无办法。

在伊朗国内，反对国王独裁统治的运动在1970年代日益壮大，但每当即将就任总统的卡特问及伊朗国内践踏人权和民众持续骚乱的

情况时，国王的回答总是（用吉米·卡特的话说）：满足抗议者要求的“努力不够，只能导致更大的不满”（Carter 1982：438）。然而，看来美国未能对其伊朗政策做任何根本性的调整。美国的情报机构也未能就1979年伊朗的大动乱提醒卡特政府早做准备。1978年1月在伊斯兰教圣地库姆发生一系列大规模骚乱之后，8月美国中央情报局的一份评估报告还做出结论说：伊朗“不处于革命之中，甚至也不处于革命的前夜”（Carter 1982：438）。

1978年11月，伊朗发生大罢工，最后迫使国王任命一位总理，并赋予他管理国家的某些实权。巴赫蒂亚尔总理首先采取的行动之一是敦促国王离开伊朗，后者虽有些犹豫，最后还是离开了。与此同时，阿亚图拉·霍梅尼这位长期流亡巴黎的宗教领袖的追随者们以他的名义发动大规模的示威游行，霍梅尼也宣布准备回国。1979年2月1日，他回到德黑兰。在此后的几个月中，伊朗政府的首脑名义上仍是巴扎尔甘总理（巴赫蒂亚尔因不为霍梅尼所接受已被免职），但实权已操在霍梅尼手中。

1979年11月，面对霍梅尼及其追随者实行激进的伊斯兰革命的强烈要求，政府总理的地位岌岌可危。美国越来越被视为“邪恶之本、反革命之源”，而1979年11月卡特政府允许国王来美国就医的决定更使激进分子感到这种对美国的称谓是名副其实的。这种局面导致了伊朗的“二次”革命，其标志是革命卫队在美国驻德黑兰大使馆扣押美国人质（Rubin 1981：Ch. 10）。长达一年之久的人质危机发生在伊朗的伊斯兰革命进行之时，它对卡特总统内外政策的各个方面都有重大影响。这绝不是巧合。对霍梅尼来说，美国代表着最后的邪恶，而与此相对的是伊斯兰革命将最终得到确认。

苏联毫不掩饰地欢迎伊朗革命，并尽其所能在这个国家培养反美情绪——只要坚定革命的方向，就知道这本不是什么困难的事情。只是当伊朗革命把矛头对准伊朗人民党（即共产党）时，莫斯科才表示抗议，但并不打算把事情弄大。对人质危机事件，苏联支持联合国决议对扣押人质的谴责，但正如万斯所指出，这种“法律上的正确

立场”掩盖不了下述事实：苏联“显然在利用伊朗形势达到自己的目的”（Vance 1983：380－1）。

伊朗危机中苏联扮演的角色一直是美国决策者关注的重要因素，尽管拖了很长时间的人质事件牵扯了他们的主要精力。苏联入侵阿富汗之后，苏联对伊朗进行军事干涉的可能性一直是卡特政府议事日程上的议题（Brzezinski 1983：451－2）。把伊朗危机从这一地区的整个危机中分割出来是不可能的；即使苏联没有直接挑起动乱，它也能从美国利益受到侵扰中获利。作为应对，这种情况产生了“卡特主义”。这是“艾森豪威尔主义”的一个变体，而“艾森豪威尔主义”也是“杜鲁门主义”的一种地区性应用。

阿以冲突

在更加错综复杂的阿拉伯—以色列争端中，美国最终较成功地实现了排除苏联影响的目标，尽管成功来得不那么直接，而且付出了代价。在1967年“六日战争”中以色列打败阿拉伯之后，苏联重估了它在中东的立场。在那次战争中，苏联没有给阿方任何具体帮助，如今准备帮助埃及重新武装，并协助训练它的部队。苏联在埃及的军事顾问最多时达两万人。人们已经注意到，苏联的目的与其说是挽回1967年阿方战争失利的面子，不如说是自己想在中东扮演一个裁判长与和平使者的角色（Steele 1985：195）。实际上，苏联想谋求与美国旗鼓相当的地位，而美国在尼克松执政时期同以色列建立了密切关系，并在中东地区大力推进和平计划。尼克松的意图是既想确保以色列的安全，也想讨好阿拉伯人。尼克松的观点与传统的见解不同，他认为1967年战争对苏联利益来说并不是一次失败。战争的结果是，“他们（苏联人）成了阿拉伯人的朋友，而我们成了他们的敌人”（Spiegel 1985：179－80）。

在1973年“十月战争”（亦称“斋月战争”）之前、之中和之后的数年中，美国在中东始终推行一种微妙平衡的外交政策。用基

辛格的话来说，就是“削弱苏联的影响、降低阿拉伯激进派的地位、鼓励阿拉伯温和派、确保以色列的安全”（Spiegel 1985：172）。苏联在埃及的影响对这种政策是个打击，但苏埃关系相当脆弱，部分原因是埃及想把以色列人从1967年占领的埃及领土上赶出去，而苏联不愿意提供他们需要的型号和数量的进攻性武器。埃及对苏联在外交上维护阿拉伯国家利益的明显不给力也不满意。看来苏联不顾阿拉伯人的利益，热衷同美国串通勾结。在1972年举行的莫斯科首脑会议上，美苏发表了一份联合公报，内容是解决阿以冲突的总原则，但事前未与埃及磋商。公报的发表激怒了埃及总统安瓦尔·萨达特，促使埃及做出决定，驱逐大部分苏联顾问（Garthoff 1985：315－16）。

对苏联这种戏剧性的斥责并未导致苏埃两国关系的彻底破裂，因为双方互有利害关系：埃及需要武器收复西奈半岛，苏联则需要在以色列的阿拉伯对手中这个人口最多、武力最强的国家继续发挥影响，争取在中东地区扮演主角。在当年后期，苏联恢复了对埃及的武器供应，包括提供反坦克导弹（Steele 1985：196）。

始于1973年10月6日的“斋月战争”对该地区的阿以对抗以及两个超级大国间的对抗都是一场严峻考验。按照1967年那场阿以战争（以色列一方速胜）经验来期望打赢一场战争，被证明是不可靠的。埃及和叙利亚联军发动突然袭击，在战争初期取得了压倒以色列的优势，但自己在人员和武器装备方面也付出了沉重代价。阿以双方都急切要求各自的超级大国盟友给予支援。在提供支援方面，苏联的反应比美国迅速，而美国稍加犹豫后迅速赶上并超过了苏联。于是，开战一周之后，以色列收复了失地并开始处于上风。

随后是一系列激烈而复杂的磋商在莫斯科与华盛顿之间以及超级大国与各自的盟友之间进行。看来美苏都不想让任何一方取得明显胜利，因为它们知道，达成对各方都能接受的解决方案取决于双方一定程度的均势。10月22日，在联合国的调停下，交战双方就停火条件达成协议。但好景不长，没过几天，危机非但没有解决，反而呈加剧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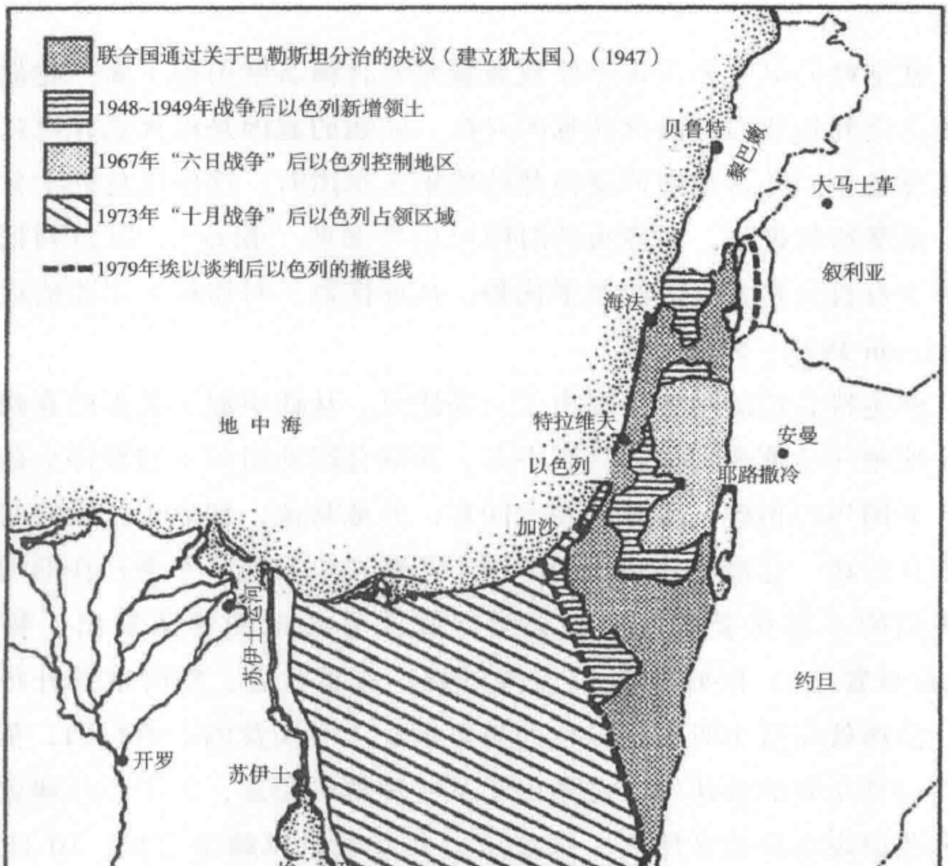


图 11.2 中东（1967～1979）

资料来源：W. 拉夫伯：《美苏与冷战（1945～1992）》，纽约，麦格劳－希尔出版公司，1993，第 278 页。

之势。

基辛格同以色列人讨论停战条款时的含糊态度引起了新一轮战事和美苏之间短暂而充满火药味的对抗。问题的起因是停火选在以色列军队准备包围并击败在西奈西部的埃第3军团时，这使以色列十分恼火。基辛格曾说过，对停火的时限可以有某些“松动”，以色列把它理解为有机会扩大自己的军事优势，从而恢复了对埃第3军团的攻势（Isaacson 1992：527－8）。

萨达特总统的对策是提出了一项建议，从而引起了美苏的直接对抗。他呼吁美苏两国都派兵到中东，在联合国的组织下监督停火的执行。美国当即拒绝，而苏联表示同意，并威胁说，如果美国拒绝与苏联联合行动，它准备单独出面干预。苏联在中东地区军事存在的前景是美国所不愿接受的，于是美国向驻世界各地的部队发出了警报（包括核警告），同时令第82空降师处于戒备状态，随时准备开往中东。然而就在这个时候，以色列被迫停止了对埃及的军事行动；基辛格在与莫斯科的会谈中，也做出了某些和解的姿态，其中包括建议允许苏联派观察员监督停火。这些压力合起来足以解除危机。10月25日，在联合国安理会关于停火和恢复到10月22日态势的决议的基础上结束了战争。

表面上看来，在这一系列事件中，“缓和”是个输家。美苏此前刚刚达成协议，双方承诺不挑起危机，也不以武力相威胁。然而看来虽然两方都有能力实施自己的威胁，但威胁的主要用意是起到外交作用。有人指出：“苏联发出威胁不过是老一套，每次阿以战争末期都要来一次。”而且一位主管近东事务的前副国务卿还注意到，苏联的这一次威胁比起前几次来“要温和一些”。战争过去几个月后，基辛格也把美国给部队发出的警报说成是“我方故意的过激反应”（Spiegel 1985：164）。基辛格在回忆录中对缓和在此次战争中的命运是这样评价的：

> 很明显，缓和未能阻止一场危机的出现。这与我们一些名气

> 大小不一的评论家所声称的相反，因为他们忘记了缓和不是友谊，而是与对手之间建立关系的战略。我们自己的中东政策的主要目的毕竟是削弱苏联的作用和影响，正如苏联极力削弱我方的作用和影响一样。但是，我坚信，缓和降低了危机（意识形态的分歧使这些危机几乎不可避免）的连续性。而且我坚信，在此过程中，我们推进了美国的国家利益。
>
> （Kissinger 1982：600）

这次危机本应导致对缓和气氛的破坏，但事实并非完全如此，因为战争的结局表明基辛格成功地赢得了安瓦尔·萨达特的信任，也基本上把苏联排除在战后任何谈判之外。

解决争端的第一步是1973年12月召开的日内瓦会议，交战各方（除叙利亚外）都出席了会议，外加美国和苏联。会议第一次使阿拉伯国家的代表和以色列的代表面对面地坐在一起，因此很引人注目。但它收效甚微，只是提供了一个使不同观点得以公开发表的场所。随后很快就出现了基辛格的穿梭外交，这种方式虽不起眼，但更为实际。此后的两年中，亨利·基辛格在中东各国穿梭往来，努力解决交战各方（包括叙利亚）在避免军事接触和达成领土协议方面的分歧。他的努力在解决直接由战争引起的问题方面基本是成功的，不过远不能解决阿以冲突，有些人还指责他贪图近利而牺牲真正解决问题的进展。但这种指责低估了中东政治问题的复杂性，甚至可以说“棘手性”，也低估了穿梭外交取得的进展所需要的技巧。卡特、里根、布什和克林顿几届政府都将证明，要想在解决中东问题上取得进展，只能靠一步一个脚印的努力；即使在每个阶段，老问题解决了，又会出现新的问题需要处理。

无论如何，穿梭外交的这一时期或许是基辛格外交影响的顶峰，也肯定是他名气最大的时候。在此次阿以战争进行期间，直到1974年8月尼克松被“水门事件”弄得焦头烂额之时，美国的中东外交很大程度上掌握在基辛格手中。这种情况一直持续到福特执政期间。

最近为基辛格写传记的一位作家写道，基辛格外交活动的结果是把美国树立为“该地区外交上起决定作用的力量”（Isaacson 1992：572）。

如果说基辛格的外交带有浓厚的个人色彩，那么卡特也是如此。卡特与萨达特的关系非同一般。卡特回忆说，“从我第一次见到安瓦尔·萨达特，我们两人就建立了一种随和自然的友谊”（Carter 1982：284）。这虽然不是促成关于中东问题的《戴维营协议》的唯一因素，但也是一个重要因素。

详细讨论《戴维营协议》显然超出本书的范围，但应该考虑到苏联因素对理解戴维营会谈的过程和结果是相当重要的。最初，卡特政府解决阿以冲突的建议是重开日内瓦会议，这当然意味着要给苏联一个角色。1977 年 10 月，美苏发表联合公报，提出解决中东问题的总原则。卡特事先没有给公众舆论打招呼，于是公报的建议立即引起以色列以及美国国内亲以派的抗议。他们既反对苏联插手，又对公报向以色列施压要它承认巴勒斯坦权利的内容不满（Quandt 1986：122－3）。

只要卡特坚持日内瓦会议的框架，看来谈判只能陷入僵局。打破僵局的不是卡特，而是萨达特。萨达特在 1977 年 11 月采取主动，前往以色列与贝京总理举行了有历史意义的会见。12 月，贝京回访埃及。具有讽刺意味的是，正是由于这两次访问未能奠定和解的基础，才“把美国带回和平进程的中心舞台”（Spiegel 1985：343）。贝京和萨达特都认为，没有美国的参加，没有美国发挥调停作用和在谈判中所起的积极作用，谈判就不可能取得进展。结果，经过八个月的紧张外交活动，终于在 1978 年 9 月贝京、萨达特和卡特相聚在戴维营。《戴维营协议》有两个部分。第一部分是为“全面而长久地解决中东冲突”建立了一个框架，包括一个“和解的基础，它不仅运用于埃及与以色列之间，而且适用于以色列与每个想以此为基础同它谈判和解的邻国之间”。协议还规定约旦河西岸和加沙地带实行自治，并承认“巴勒斯坦人民的合法利益及正当要求”。协议的第二部分为埃以

和约规划出了一个总框架（Quandt 1986：377，Appendix G）。

实际上，只有《戴维营协议》的第二部分得到贯彻。埃以和约于次年3月签署。卡特与萨达特都不愿意出现埃以单独媾和的情况，主要是因为这样做可能会得罪阿拉伯世界其他国家。而实际上它们就是这样做了。威廉·匡特既参加了戴维营会谈，又是其历史的主要撰写人。他写道，“一旦阿以和解，就不再有什么东西能促使贝京建设性地处理巴勒斯坦问题了”（Quandt 1986：323）。总之，《戴维营协议》分裂了阿拉伯世界，非但没有解决巴勒斯坦问题，反而使这个问题更尖锐化了。

《戴维营协议》还导致埃及同苏联的正式分裂。安德烈·葛罗米柯通常以平和的语气回首往事，但在谈到《戴维营协议》时，他把激愤和蔑视全发泄到了萨达特身上，说他“出卖了巴勒斯坦以及所有阿拉伯人民的利益，并且把埃及领土交给美国人支配”。萨达特的“政治生命彻底完蛋了……他有歪曲事实的非凡能力……他一生狂妄自大，当上总统之后将其发展到了病态程度”（Gromyko 1989：272－3）。戴维营会谈之后，直到1980年代，阿拉伯世界处于分裂状态，巴勒斯坦解放组织战斗精神越来越强。苏联便开始设法利用一直没有解决的巴勒斯坦问题从中渔利了。

古巴危机与尼加拉瓜危机

我们已经看到，对美国来说，1979年处处响起警报。苏联入侵阿富汗与伊朗革命一下子把美国人的担心聚焦到中东，但中美洲地区也是美国关注苏联威胁的重点地区。1979年那里爆发了两次危机，一次为期很短，另一次则在里根政府执政期间产生了重大影响。

第一次危机的起因据说是在古巴“发现”了已做好战斗准备的苏军的一个旅（人数为2500～3000名）。实际上，这次危机是由美参院外交关系委员会主席弗兰克·丘奇参议员在9月初的一次讲话中突然提出的，而他讲话的依据是国务院的一份通报。国务院发现苏联

在古巴的军事力量有所增加，其中包括他当时认定的一个新部署的苏军旅。在国务院尚未准备好对此做出反应之前，丘奇就把事情给捅了出去。其结果——按布热津斯基的说法——是“灾难性的”（Brzezinski 1983：347）。到10月，华盛顿的报纸和无线电广播全是耸人听闻的报道。此时，卡特总统宣布他已得到苏联的保证，说该旅只是一支“训练部队”，而且苏联无意扩大它或提高它的战斗力，在此之后人们才松了一口气。美国当时本应采取措施加强战备，特别是加强对古巴的戒备，但总统说没有必要“回到冷战”状态（Brzezinski 1983：351）。

实际上，苏军的这个旅从1962年以来就一直驻扎在古巴，这一点只要查查9月的情报记录就能得到证实（Carter 1982：264；Vance 1983：362－3）。这场危机完全是为美国国内政治的需要而有意制造出来的。参议员丘奇是位自由主义人士，在对外政策上一直持鸽派立场。他的这种做法显然是为了在1970年代后期鸽派备受指责和日趋保守的大环境下赢得右翼的信任，以便在1980年选举中连任。人们估计，反对缓和、反对批准第二阶段限制战略武器谈判协议的人会拿这次危机大做文章，他们也的确这样做了。这次危机只不过是缓和账单上的又一笔账。

比起古巴危机来，同年早些时候发生的尼加拉瓜革命就不那么为公众所注意（在卡特回忆录中占的篇幅也较少），但从长远来看，它的影响更大。尼加拉瓜革命对里根来说就好比肯尼迪1959年碰上了古巴革命，都是西半球政治中的一颗毒瘤。不过一开始，美国政府很愿意同推翻索摩查家族40年独裁统治的新政府共处。而开始阶段的尼加拉瓜新政府以自称马列主义者的桑地诺分子为核心，又包括一些保守派，它也不愿重蹈古巴的覆辙而沦为苏联的附庸。卡特政府立即送给新政府2000万美元的援助，尼加拉瓜也欢迎美国企业人士来尼投资（LaFeber 1993b：237－8，239）。

但到了1980年后半年，美国与尼加拉瓜却以不可阻挡之势开始分道扬镳。这种情况同1959～1961年间古巴的情况十分相像。出现

这种情况有以下几个原因：革命继续朝左的方向发展，新政府担心索摩查分子反攻、经济崩溃以及来自美国越来越大的压力。关于第一个原因，尼加拉瓜新政府宣布把已承诺的大选推迟到1985年，同时统治集团中的温和派纷纷逃往国外。这些都是向美国发出的警报。在美国看来同样为不祥之兆的是：尼加拉瓜建立了一支桑地诺部队，桑地诺分子又支持萨尔瓦多的左翼反叛运动。关于尼加拉瓜的经济问题，美国国会花了八个月的时间就援助尼加拉瓜的一项提案进行辩论，提案附有很多尼加拉瓜不能接受的条件。当时尼加拉瓜已同苏联建立了关系，并达成了一项对尼加拉瓜极为有利的贸易和援助协定（LaFeber 1993b：239－40）。

到1980年11月美国总统大选时，美尼关系虽然冷化，但还有活动的余地。但这种余地，正如我们在第十二章中将会看到的，很快也就消失了。

发生在1979年的上述一连串危机对卡特总统来说可真是一种坏情况。它们使1980年的总统大选在很大程度上成了对卡特外交政策的一次全民公决。人质事件久拖不决的痛苦使卡特在政治上受到很大束缚，1980年4月实施的援救行动以失败而告终，还搭上了八条美国人命，更使人感觉到总统软弱无能。右派指责卡特丢了尼加拉瓜，甚至一向被许多人视为显然是卡特外交政策成就之一的“巴拿马运河条约”，也被敌对的共和党人攻击为大倒退，说这是放弃了美国在该地区传统而正当的角色（“巴拿马运河条约”规定到2000年将运河的主权交还巴拿马，同时保证运河的中立地位以及美国的安全利益不受损害）。我们已经看到，阿富汗局势戏剧性的发展证实了美国的缓和政策怀疑派的看法，也使第二阶段限制战略武器谈判协议的批准程序夭折。但如果我们更超脱一些就会发现，实际情况要比受大选驱使所呈现的景象还糟。

如果把超级大国在第三世界的得失情况排列一下，大体可以得出这样的结果。第一，在阿以冲突中，美国抵制苏联的影响总的说来是成功的；当然这并不等于美国可以为所欲为，因为悬而未决的或看来

无法解决的问题太多了，巴勒斯坦问题就是最明显的一个。第二，美国在伊朗事件中显然是个输家；但从长远来看，宗教原教旨主义对冷战双方的利害关系还很难讲，而美国在伊朗的尴尬处境并没有给苏联带来多大好处。第三，在安哥拉和非洲之角，苏联和古巴的干涉行动没有受到美国相应行动的干扰，主要是因为后者不愿在越战刚刚结束时就立即再次介入冲突；但苏联也未能从对这几个国家的军事行动中得到什么具体的好处，应该说，苏联在安哥拉和埃塞俄比亚也没有什么收获。苏联向这些国家提供的武器并没有使它们在政治或经济上更稳定，只能帮助支撑它们摇摇欲坠的政权，拖延处理存在的根本性问题。一旦冷战结束、苏联迅速撤离，让这些国家自行其是，这些问题就立即变本加厉地显现出来了。同样的命运也降临在苏军撤退后的索马里，我们将在第十三章论及。第四，在中美洲，当美国政策再次因越战失利而陷入困境时，苏联对支持桑地诺分子与萨尔瓦多的反叛分子采取的挑衅性行动也持谨慎态度。第五，在东南亚，美国实际上已经脱离那里的冲突；但苏联的盟友越南不久与柬埔寨打得不可开交（见第十章）。中国支持柬埔寨。而中国越来越靠近美国，成为苏联的最大威胁。

不可否认，以上提到的种种后果在1980年代初并未全部显现出来。但是，第三世界已经成为相互竞争政治势力的大拼图，它使人对“可把美苏竞争看成一场简单的零和游戏”的观点产生怀疑

结　论

本章一开始，作者就提出把“缓和”说成一场失败就是把复杂的事件看得过于简单化了。显然，缓和有其局限性，主要表现在两个超级大国都有各自的根本利益。在军控方面，双方的根本利益并没有大的冲突；尽管1979年后两国都喊着要退出军控谈判，实际上谈判还在继续。我们已经看到，欧洲的缓和在1970年代越来越脱离了“超级大国缓和”的轨道。在那些“政策地区”（最明显的是在第三

世界），缓和遇到最严峻的考验，因为相对而言，在那些地区，超级大国很少有共同利益，各自利益的界定也不甚清楚，可能做出的反应难以预料，它们对自己的控制能力也没有太大把握。曾在美国国家安全委员会中担任亨利·基辛格助手的一位官员认为，考虑到缓和遇到越来越多障碍这一事实，“基辛格—尼克松的设计居然在很大程度上还能存活下来，实在令人惊讶”（Hyland 1988：12）。我们将在第十二章分析这一评价。

第五部分

冷战与国际政治：结局（1981~1991）

导 言

冷战的终结阶段对历史学家来说是一个严峻的考验。1980 年代初期冷战对抗加剧，但到那个十年结束时，冷战体系却瓦解了，而且正是以许多政策策划人——如乔治·凯南——所期望的那种方式瓦解的。在 1940 年代末，他们曾预测国际形势的发展前途灰暗，其结果是苏联瓦解。这是否表明遏制政策在总体上是正确的？特别是里根总统强硬的冷战政策是正确的？或者表明苏联瓦解是其内部腐败的结果，是东欧事态发展的结果？是戈尔巴乔夫的特殊政策的结果？或者是所有这一切共同起作用的结果？

第十三章将详细论述这些问题，在这里我们必须将前几章的一些思路归纳一下，指出它们认为的 1980 年代的主要特点。在前几章中反复谈到的一个话题就是两个超级大国的力量对比差距越来越大，尤其是它们对相互之间的关系的关注日益加强，世界政治局势不断变化。进一步讲，军事竞争和意识形态对抗、两极对立和争夺势力范围，以及将世界上所有的冲突和问题都归入冷战范畴的冷战政治已经与世界政治的新力量不相协调。超级大国的领导人多次指出，东西方竞争的加剧妨碍了解决南北方矛盾的许多重要计划的实施。缓和政策表明，人们部分地承认冷战已经过时，双方都宣称要努力减少相互关系中的危险因素，以适应更加复杂的国际环境。结果，尽管在相互关

系中取得了一些进展，但他们仍未能打破冷战模式。

1980 年代是个重要的年代，这有种种原因，其中不无重要的一点就是在 1980 年代末各国政府都不能不承认国际环境日趋复杂。他们认为冷战加剧是必然的。里根总统恢复冷战的行动对于苏联共产主义的消亡明显产生了某些作用，但他同时也使美国付出了代价。其中之一就是里根为他的后任者留下了巨额的财政赤字，使美国经济承受外界压力的能力比他上任时更脆弱了，到里根第二个任期的末尾，美国已经变成了一个纯粹的债务国。总而言之，里根实行“新的冷战”或“第二次冷战”促进了相互依赖意识，实际也促成了“相互依赖”的现实。

许多政治家和国际关系专家谈论“相互依赖”已经有若干年了，他们是说现在国家的自主权相对地减少了，超越国家事务的重要性相对地增大了。亨利·基辛格在 1975 年的一次讲话中强调说：“处理传统事务的方式已经不够用了，出现了许多崭新的事物。能源、资源、环境、人口、空间和海洋利用等问题现在与军事安全问题、意识形态问题，以及在传统上属于外交事务的领土纠纷问题同等重要”（Keohane and Nye 1977：26）。

世界在加速划分为许多经济集团，在这些集团中大量的硬通货和资本每天都在超越国家的边界而流动；许多庞大的跨国公司的资源超过了世界大多数国家的资源；环境灾害（酸雨、核事故失控、向江河湖海倾倒污水和垃圾等）已经没有国界；战争、饥荒和压迫造成的越来越多难民企图到新的国家去谋求新生活，在这样的世界上（上面仅列举了几项新事物）很难想象一个国家能够提供解决日益增多的大量问题的办法。

当然，相互依赖的衡量标准从来都是国际生活的事实，然而我们不应认为国家现在并不重要了。从某种观点看，战后时期的中期，观察家们觉得国际政治气候正在发生质的变化，他们将其称为“相互依赖”。或许更确切一点说是美国的观察家认识到了相互依赖关系。实际上，这不仅反映在美国有大量这方面的理论著作，而且还反映在

人们对美国力量首先是经济力量的局限性日益清醒的认识上。其他国家认为相互依赖就是“经常要付出代价”，并且在实际上是“限制自主权的关系”（Keohane and Nye 1977：9）。对美国来说，1960年代末1970年代初美元疲软，越南战争付出的政治代价和军事代价，以及1973～1974年的石油危机之后，在感觉上产生了一种不愉快的新鲜事，即美国已经成了一个“普通国家”，当时出版的一本书的书名就是这么写的（Rosencrance，1976）。

随后，现实世界的变化激发了理论思考，这一思考远远超出了产生它的条件。新理论的中心观点就是经济力量与军事力量的区别。实际上，跨国主义（超国家主义）或复合的相互依赖关系的理论家们的一个重要贡献就是他们对力量重新下了定义。

在对国际关系持传统的或者所谓现实主义观点的人看来，世界曾经是由许多或多或少独立的国家组成的。它们之间的关系是以一种力量竞争的形式表现出来的，其中决定性的——尽管不是唯一的——手段就是军事实力。然而，这种模式很难解释日本和德国在国际上的重要性，它们的力量是以经济而不是以军事为基础的。日本人打入美国的汽车和电子产品市场，以自己的方式对美国构成了与苏联军事力量一样的威胁。核武器对付不了这种威胁；现实主义者也不能轻易地认识到跨政府组织或国际集团（如经济合作与发展组织、石油输出国组织、关贸总协定和欧洲共同体等）日渐增长的重要性，也不会认识到日益加剧的经济和金融的相互渗透。最后，相互依赖的现象削弱了现实主义者关于对外和对内政策存在明显区别的论断。用主要的相互依赖理论家的话来说，在相互依赖的政治中对内和对外政策是紧密地联系在一起的，国家（民族）利益的概念——传统派的指导原则——越来越难以有效地被使用（Keohane and Nye 1977：8）。

如果以为相互依赖的理论与实践会轻而易举地取代传统的或者现实主义者的理论与实践，那就大错特错了。例如，在某些情况下，军事力量仍然是决定性的因素。民族国家在许多方面仍然是主要的国际单元，民族主义正如人们常指出的那样，过去是、现在仍然是一个

“持久现象”（Holsti 1988：228）。基欧汉和奈强调指出，现实主义者的观点可能是正确的或者大部分是正确的，但经常发生的错综复杂的相互依赖关系将提供一种更好的“现实图像”。它取决于当时的情况（Keohane and Nye 1977：24）。然而，在越来越多的情况下，错综复杂的相互依赖模式比现实派的模式更适合现实。

如果这一点只具有理论价值，那么就没有理由用它来对里根时代的国际关系进行历史检验了。所以用它来检验，是因为它有助于更明白地了解对里根对外政策的主要攻击论点。简而言之，里根处理国际问题的方法更接近于传统的模式，而不是错综复杂的相互依赖模式。他的方法显然是民族主义和单边主义的，主要依赖国力的军事方面（军事力量），对国际组织极不信任。里根的对外政策是有意复活“缓和”以前的对苏联和对世界政治形势的方针。然而，实际上在那个十年（1980 年代）中期他已经迫不得已地做了许多妥协和让步，其中原因之一就是他的政策违背了相互依赖的现实。但这并不表示里根接受了相互依赖的思想理论，至少在经济领域，这只能表明他向现实靠拢了一步。冷战的终结突然使这些现实成了人们关注的焦点。但这并不表明军事力量作为美国或任何别的国家对外政策中决定性工具的作用已经终结。1991 年的海湾战争就是军事力量在一定条件下仍然具有重要作用的一个明显例子。它表明曾经是冷战时期较量中心的现实的军事定义正在发生转化。换句话说，国家安全可以不再是唯一的军事含义。

在以后各章中，冷战的最后阶段看来并不简单地只是美苏关系的变化，而是全球政策大转变的时期。最后一章提出了一些关于这些变化走向的设想和探索性的意见。

第十二章
里根主义与共产主义幽灵

权力的过渡

对罗纳德·里根来说，来自苏联的威胁在30年里没有什么变化。里根目睹了众议院非美活动调查委员会在1940年代末的活动并持拥护态度。他于1981年当上总统后，一直视苏联为国际舞台上贪得无厌的入侵者和邪恶之徒。在1980年代，他最为明显的态度不是反苏，而是极端反共。他从骨子里、从意识形态上对共产主义深恶痛绝。他不接受这种说法，即苏联是个大国，具有威胁性，而认为从所有的基本要素来说它乃是个普通的民族国家。在这方面，他和美国领导层中占主导地位的实用主义格格不入，无论是保守派人士抑或开明人士；也与1960年代中期以来持现实主义观点的大部分学者格格不入。即便是抱有理想主义的吉米·卡特，在谋求与苏联达成协议时也遵循实用主义路线。卡特即使带有理想主义风格，他那广泛的普济主义与里根好战的保守信条毫无共同之处。这在他们对待人权的态度上表现得尤为明显。卡特宣布了一项单一的标准，该标准对友邦和敌国大体上都适用。而里根则明显不愿对友邦施加压力，不管这些国家的政府或其人权记录是好是坏（Dallin and Lapidus 1987：222）。简言之，里根是二战后历任美国总统中在意识形态方

面最毫无顾忌的一位。

正是本着这一基本哲学，里根怀着两条坚定的信念走马上任。信念之一，美苏关系的缓和，尤其是在卡特时期的缓和，是美国向苏联屈服的产物，这是一段心酸的往事；信念之二，苏联的威胁是全球性的。这两条信念使人们想起约翰·福斯特·杜勒斯。他在 1950 年代早期攻击遏制政策，说它是消极的，他还尖锐地批驳关于任何国家都可能在冷战中保持中立的观点。对杜勒斯和里根来说，至少在他们那些最好战的演说里，有关共产主义威胁是不可或缺的。

还有一些事例可以证明里根主义与共和党批评民主党在冷战早期的外交政策之间有联系。其中最鲜明的例子是在 1985 年 2 月雅尔塔会议 40 周年纪念日上重提雅尔塔问题。共和党在 1952 年竞选中对民主党的一项主要指控就是它在雅尔塔会议上出卖了东欧。如第六章所述，在艾森豪威尔政府上台后的第一个月，控制国会的共和党提交了一项“受制民族决议案”，目的在于强迫新政府承诺废除雅尔塔协议及反对随后苏联对东欧国家的控制。1953 年 3 月斯大林死后，该决议案被撤回，但保守派依然对雅尔塔问题耿耿于怀，里根当选又形成了要求重新考虑雅尔塔协议的气候。1985～1986 年间保守派和开明派学者在《评论》和《纽约书评》的版面上展开了一场激烈的争论（Kuniholm 1987：55－7）。

当然，在 1980 年代美国政府与 1950 年代相比更不可能冒险发动战争将苏联从东欧驱逐出去。然而，在雅尔塔会议 40 周年纪念会上，里根总统的确表达了这样的观点：“雅尔塔会议之所以重要是因为欧洲的自由一直还没有完成。”他说，这不是个领土或疆界的问题，而是关系到民主与独立的问题。“雅尔塔会议象征的一种疆界即自由和压迫之间的分界线永远不能被合法化，我在这里毫不迟疑地宣布，我们希望摧毁这一疆界”（Reagan 1987，Ⅰ：119）。

很显然，无论是在里根的心目中，还是在知识分子们那晦涩难懂并时常带有恶意的关于雅尔塔的议论中，很成问题的并不仅仅是这一段历史，成问题的还有当前美国外交政策的基础。里根主义在其非常

意识形态化的形式下与实用主义——无论是开明的抑或保守的——最大的不同在于，里根主义者认为雅尔塔会议完全可能产生另一种结果，因而现在的形势也可能完全是另一种样子。这并不意味着要冒核战争的危险去解放东欧，但它的确意味着要采取积极的甚至是侵略性的政策，使苏联的行径发生改变。

在上面所提的基本框架里，里根主义的对外政策着重体现在一个主题上，即恢复美国强大的经济和军事实力。军费的增长数目是非常令人震惊的。卡特政府最后一年在军费开支方面的国防预算是 1714 亿美元，而里根政府最后一年的预算申请（1989 年 1 月提交的 1990 财年的预算）则超过了 3000 亿美元。军费开支的"实际增长"数目（考虑到通货膨胀因素）更明显、更惊人。尽管军费开支见涨的趋势早在卡特时期就已经开始了——1979 ~ 1981 年的实际增长额分别是 4.0%、3.1% 和 4.8%，而在里根的第一个任期内预算的年增长额则分别为 7.8%、7.3%、4.2% 和 9.5%。在他的第二任期仍然维持着这种上升趋势。看一下国防开支在国民生产总值中所占的比例也可得出同样的结论（Smith 199：63 -4）。

与国防预算增长和现有兵力增加相关的一个问题是要妥善使用军费和兵力。干涉主义和单边主义至少在原则上是里根处理外交事务的主要特征。只是这些原则没有自动转化为行动罢了。里根提出雅尔塔会议在领土方面的重要性与意识形态方面的重要性是不同的，这与他总的外交政策立场是一致的，即一个鲜明的意识形态立场是必需的，但这经常要和它所受限制的实际相结合。"手里拿着大棒大声说话"可能是他的座右铭，但说话嗓门大，可能就用不着大棒了。里根政府所采取的干涉行为——1982 年出兵贝鲁特，1983 年出兵格林纳达以及 1986 年轰炸利比亚——在行动的规模与持续时间上都有严格限定。这些行动都付出了代价：前两次有人员伤亡，三次行动在许多方面都有损于政治信誉。虽然在贝鲁特有 200 多名海军陆战队员死于恐怖分子的炸弹，但是这三次行动对美国本土都没造成什么损失。

尽管言辞激烈，里根政府在采取对外举措时却非常谨慎，因为这些举措有可能招致长期或无限度的责任。所以这么做部分原因在于国会的限制，另一部分原因在于当局认识到美国民众对失败，尤其是那类久拖不决的行动的承受力低下。这意味着，当政府觉得在承担一些最重要的义务——如支持尼加拉瓜的反政府武装——无法和民众达成妥协时，便会采取秘密行动或迂回路线。

在处理与苏联的关系这个中心问题上，事实也同样证明，里根政府做的比说的要灵活一些。1980 年代后半期美苏关系进一步缓和，导致两国签署了《美苏消除两国中程和中短程导弹条约》（简称中导条约），并为削减战略武器条约的签订打下了基础。这部分内容将在第十三章中阐述。但在此值得一提的是，里根当局采取军控举措是在米哈伊尔·戈尔巴乔夫上台以前。与此同时，他在国防政策的其他领域采取了坚决的毫不妥协的态度，里根总统拒绝谈判有关战略防御计划的问题便是最好的例子。这在一定程度上表明里根政府的总方针是：即使要谈判，也要以实力做后盾。

在里根政府的对外政策中，意识形态方面的义务和实际做法之间的不协调也清楚地体现在里根班子的组成上，它是由意识形态专家和实用主义者混合组成的。意识形态专家中有国防部部长卡斯珀·温伯格、苏联事务顾问理查德·派普斯和助理国防部长理查德·珀尔。所有这些人在确定当局的军控立场及与苏联的关系上都起着重要作用。然而，1980 年代结束时，他们的作用日渐消退。仅在两年后，派普斯就离职了，温伯格于 1987 年在签署中导条约前夕辞职。1982 年乔治·舒尔茨取代生硬粗暴的亚历山大·黑格被任命为国务卿，在最高层的外交决策中增加了讲求实际的温和的保守成分，并使办事总让人觉得不稳当的里根政府增加了稳当成分。

人们从里根那带有鲜明意识形态特色的演讲中得出的关于其外交政策的最终评语是，外交政策对里根而言起码在他执政初期并非其首要关心的事。在里根任总统的第一年，他没有就外交政策做过重要演讲。他的当务之急是内政，首先是重振经济。当然，经济复兴对外交

政策有重大影响。他认为，1970 年代美国经济疲软是使美国丧失实力和国际影响力的原因。里根在 1981 年宣称，“一个国家对世界发展所做的最大贡献就是在国内实行运行良好的经济政策”（Cohen 1987：127）。然而，国内关心的首要问题对外交政策来说是民族性的而非国际性的，是单边性的而非多边性的。

可以想到，苏联领导人当时对新当选的美国总统怀有极大的兴趣。卡特令他们非常失望。“我们很快发现，”安德烈·葛罗米柯回忆道，“他很难把握苏美关系哪怕是最基本的特征”（Gromyko 1989：288）。苏联人预料里根在这方面可能会做出明显的改善。苏联领导人总的说来认为共和党比民主党强，一是因为前者在意识形态方面立场明确；二是在谈判军控协议方面共和党比民主党更有能力。“简单地说”，一位研究苏联的专家说道，“苏联领导人希望看到另一个理查德·尼克松入主白宫”（Bialer 1986：319）。然而，苏联所看到的却是这样一个政府，正如葛罗米柯所描述的，“它极尽所能地破坏其前任的工作，对他们所签订的协议一个接一个地进行致命性抨击”（Gromyko 1989：296）。

如果勃列日涅夫不死于 1982 年 11 月，或他的两个继任者尤里·安德罗波夫和康斯坦丁·契尔年科上台后不早死的话，很难讲未来会发生多大的变化（尤里·安德罗波夫死于 1984 年 2 月，康斯坦丁·契尔年科死于 1985 年 3 月），至少戈尔巴乔夫上台给苏联当时和过去所造成的许多麻烦很有可能推迟数年才会来临。不管怎么说，里根采取进攻性外交政策而引起两国关系最紧张的时期（1982～1984）正与苏联在勃列日涅夫死后权力过渡引起的问题相重合。正如第十一章提到的，这与 1970 年代的情况恰恰相反，当时美国的领导变动频繁，而苏联的领导却是稳定的、信心百倍的。

指出存在这一状况比深入理解为何会造成这一状况要容易得多。当然苏联领导人的更迭总是会伴随着党内相当一部分人的沉浮和政府结构的调整。担任共产党总书记只是整合政府权力机构过程的开始。一个新的领导人必须亲自掌握主要部门，将志同道合的人安置到具有

战略意义的职位上，并满足有势力的支持者的需求，使反对者保持中立或将其铲除。苏联领导人的更迭相对而言毕竟很少见，其特征是含糊易变和无法预测的（Bialer 1986：82－4）。

但是所有的最初迹象都显示，安德罗波夫将在苏维埃制度上留下自己的烙印。他上台之初便被誉为意志坚强的党的领导人，对苏联政治有丰富的经验，并且早在他担任克格勃头子时便和东欧国家关系密切。但是，同时他也被认为思想比较新潮，赞成改革。他向世人展示他准备解决经济停滞、政治和经济官员腐败，以及酗酒等社会衰败迹象。酗酒在整个1970年代越来越成为学者们讨论的话题。安德罗波夫还很关心一大批有影响力的中年官员的利益。这些人通往高层职务的道路被一群70多岁的老头子阻挡住了。正像一位西方学者在1980年所说的，这种情况不仅在外交政策机构中存在，在其他部门也同样存在。鉴于这些主要决策者均已高龄，他说很可能“到1980年代初，苏联的外交政策高层骨干会来个大换班”（Hough 1980：126－7）。霍夫的看法被证明基本正确。安德罗波夫对老人掌权带来的问题十分清楚，只是他没有来得及彻底改变它。简言之，安德罗波夫上台的开局景况表明——正如美国许多现实家所言——它一定会加强而不是削弱苏联（Bialer 1986：84－97）。

然而，在1983年夏，安德罗波夫心脏病发作并死于第二年年初。接替他的契尔年科又倒退到了勃列日涅夫时代。他年逾古稀并且疾病缠身。为什么当时会越过一个更年轻的候选人戈尔巴乔夫而选择了契尔年科？一种说法是，要在比较年轻、经验较少的戈尔巴乔夫（他1978年当选为政治局委员）和众所周知的契尔年科二者之间挑选一人，当时在政治局里仍占主导地位的老资格们当然倾向于更保险一些。契尔年科平淡无奇，当过勃列日涅夫忠诚的副官，他定会依从老资格们的愿望。“选择契尔年科”，比亚勒写道，“是老一代‘最后的欢呼’”（Bialer 1986：101－2，103）（此处借用了一个美国电影的名字——译者注）。

很显然，安德罗波夫当时没有足够的时间来完全打破勃列日涅夫

时代的政治模式。然而，同样明显的是，契尔年科的掌权时间很可能是短暂的，这便意味着谁是主管政治局的第二把手，谁就可能是接班人。这个问题非常突出。在罗伊·麦德维杰夫所著的戈尔巴乔夫传记中，作者认为，由契尔年科担任领导人的任命之所以长期拖延，不是因为争论由谁来继承安德罗波夫，而是因为政策的定向，尤其是安德罗波夫的改革政策是否还要继续。麦德维杰夫认为，乌斯季诺夫、葛罗米柯和戈尔巴乔夫等人所以同意由契尔年科来接班正是出于这样的考虑：契尔年科不能随便恢复到勃列日涅夫时代，不能批斗安德罗波夫，将他贬得一无是处（Medvedev 1988：138）。从这一点来说，当时选择契尔年科来担任领导人非常明智；这对那些老资格们来说可不是一个简单的胜利。在契尔年科掌权期间，戈尔巴乔夫实际就是他的副手，主持政治局的诸多会议并做了许多重要的出访，如他于 1984 年 12 月出访英国。“我喜欢戈尔巴乔夫先生”，撒切尔夫人说，“我们在一起能谈成一些事情”（Roxburgh 1991：22）。这位英国前首相的言论证明了这样一个事实，即对西方人来说，戈尔巴乔夫很可能是第一位和他们相像的战后苏联政治家。这使他在国外声名鹊起，而且起初也没有影响他在国内的声誉。不管怎么说，随着戈尔巴乔夫的上台，苏联领导层的稳定性就结束了。

从美国决策者的立场来说，苏联换掉老资格的领导人的意义比不上戈尔巴乔夫上台之前苏联外交政策的连续性来得重要。即使是戈尔巴乔夫，也并没有在上台后就进行激烈的变革，有关这部分内容我们将在第十三章介绍。然而，显而易见，在苏联领导人变更期间，苏联国内和国外观察家更加关注的还是勃列日涅夫时代遗留下来的惨淡经济和社会状况。在论述里根主义和美苏关系以前，我们必须首先对这两个大国在 1980 年代初的一般经济状况做一个评估。共产主义的确日益成为一个“幽灵”，但这里所说的并不是马克思和恩格斯在《共产党宣言》一开头所说的“一个幽灵，共产主义的幽灵，在欧洲游荡”的意思。共产主义正日渐成为一个没有实质内容的阴影，而不是一种可带来新面貌的革命精神。

超级大国的经济形势回顾

第六章一开始就提到了对两个超级大国的经济状况及相关排序的评估。其中提到，在1950年代到1960年代初，美国在许多方面占有绝对优势，不过苏联宣称它正在缩小与美国的差距，这一说法得到了西方世界的某些认可。然而到了1980年代初，苏联经济在各个方面都陷入了困境，这已经成为不可否认的事实。勃列日涅夫的继任者安德罗波夫在他的第一次讲话中就提到，“在我们的国民经济中存在许多问题，而这些问题早就应该得到解决。我现在还没有解决问题的现成办法。但是我们党中央的全体同志将会找出答案”（Edmonds 1983：216）。据报道，1982年8月安德罗波夫在接见前来莫斯科访问的波兰代表团时将这个意思讲得更加明白，他说：“苏联的经济状况并不比波兰好多少。苏联的年轻人存在着日益严重的问题，他们正变得越来越厌恶政治，态度消极，只关心他们自己”（Shultz 1993：124）。

事实上所有的经济指标都证明苏联经济萧条，效率不佳。1970年代后半期国民生产总值增长率急剧下降。这一时期只有2.7%的增长率，而在1966～1970年间的增长率是5.2%。工业生产、投资、生产率和消费的增长率都呈下降趋势，有时甚至是负增长或者接近负增长。即使石油生产——它是战后促使苏联经济增长的关键因素——这一无价资源在1970年代后期也停止了增长。只有天然气产量呈现大幅度上涨，但它上涨的原因是为了弥补石油产量的下降（Dibb 1988：72－3，77，79）。

农业本来就是苏联的老大难问题，多年来农业一直增长缓慢，1979～1982年又连续四年干旱，收成不佳，于是从美国和加拿大进口谷物对苏联来说意义重大。然而在苏联入侵阿富汗后，卡特实施谷物禁运，这对苏联来说同样具有重大意义（具有讽刺意味的是，里根却解除了禁运，这一点我们以后还会谈到）。还有一点

值得指出的是，农业下降的这几年正好是米哈伊尔·戈尔巴乔夫被任命为政治局委员，主管农业的时期。这在一定程度上说明了他的政治能力以及运气很好：他借口农业遭受自然灾害而没有受到责备。命运在1982年再次出手帮了他，1982年11月勃列日涅夫去世，而那年也是农业在连续几年歉收之后最糟糕的一年。在这种情况下，麦德维杰夫写道，“让死者来承担农业和经济不振的责任当然比谴责依然活着的而且声誉不错的人自然得多”（Medvedev 1988：118）。

数字只能说明一部分事实。影响苏联经济发展前景的主要问题是钢铁等老工业领域的设备更新缓慢，引进新产品和工艺如计算机和现代化信息系统的速度缓慢。据估计，在1980年代初，美国在计算机的使用方面以25∶1的优势领先于苏联（Bialer 1986：77）。出于政治和技术上的原因，苏联对计算机，甚至复印机的配给量有严格限制。结果导致苏联在计算机革命席卷工业化国家的关键几年里无法跟上西方国家的步伐。

苏联人的生活水平和“生活质量”也同样显得光景惨淡。正如前面提到的，消费品的增长率在1981～1982年间迅速下降，接近于零，而且这些商品的质量一直很差。同样令人震惊的是，自1970年代以来苏联的医疗保障条件恶化，婴儿死亡率上升，人均寿命下降（Nye 1990：124）。还有一项额外的负担是军费开支，其从1960年代初期占国民生产总值的10%～12%上升到1980年代中期的13%～14%，据有些人估计甚至达18%（Dibb 1988：84）。

总的景象是，苏联的经济和社会体系即使没有立即陷入危机，但已深受严重的体制弊病的危害。这些弊病很多是长期的，而且从一开始就被植入苏维埃制度之中（有关这些体制问题将在第十三章论述戈尔巴乔夫的改革时提到）。事实上，这也是解决这些弊端难度极大的一个原因。如果将战后时期看作一个整体的话，人们就会看到，苏联经济一度运行得很好。不仅整个国家从二战的废墟中恢复过来，人民生活水平也达到了战前不敢想象的程度。重工业生产

在很多方面取得了显著成绩，只是消费品类和农业发展慢一点。然而，在1980年代初，越来越多的人认识到：苏联的经济从绝对意义上来讲发展得很缓慢，与西方发达国家相比，更是严重落后，特别是在处于后工业经济前沿领域的科技方面，如计算机和信息系统等发展更慢。1980年代没有人再敢像赫鲁晓夫在1960年代那样宣称：十年内苏联将赶上甚至超过美国。

鉴于上述情况，美国领导人一直坚信苏联很强大就令人奇怪了。他们所以如此，有三个原因。第一，苏联不断向世人表示，就像它在二战中对付希特勒所做的那样，它愿意为了捍卫国家安全做出牺牲。当美国军方的决策者评估苏联的军事实力时，他们判断的依据是苏联导弹、坦克和潜艇的数量，而不是鞋子的质量、婴儿的死亡率和等待购买主食的人们所排的长队。就像美国国防部部长卡斯珀·温伯格在1987年宣读他的国防年度报告《苏联军事力量》中所特别提到的，在整个1970年代，一直到1980年代，苏军的武器无论在数量上还是质量上都一直呈上升趋势。他认为，苏联不仅“长期坚持列宁的格言，即数量产生质量”，而且每年“我们都面对一个技术上更为先进的苏联，一方面它通过非法与合法渠道取得西方技术，另一方面苏联自己科技的尖端化程度也在不断提高”（Weinberger 1987：3）。

第二个原因和第一个并非毫无关系，尽管存在着很多制度性弊病，苏维埃制度依然生存了几十年而没有崩溃。勃列日涅夫时代似乎更是稳定的典型。的确，这一点早就被指出过，“这18年是俄国历史上最稳定的一段时期，当然也是苏联历史上最稳定的时期”（Edmonds 1983：214）。这一点无疑部分地说明了西方的苏联学家们没有预见到苏联制度崩溃的原因。苏联严密的政治结构不会因民众的不满而显得脆弱可击。相反，它似乎具有很好的社会纪律和内聚力。苏联的一些持不同政见者受到西方世界的许多关注，但他们的抗议活动对苏联人民大众的日常生活却没什么影响力。这正是苏联领导层所希望维持的局面。当个别持不同政见者的行为造成不良国际影响时，如“臭名昭著”的索尔仁尼琴，苏联领导人只需将此人驱逐出境就

可简单地将这个难题扔到国外去。一个能够做出如此大胆举动的政府并不是那么容易陷入困境的。

美国担心苏联强大的第三个原因是美国自身的经济状况令人焦虑。1980 年代，美国地位下降的话题一直是新闻头条。尽管这一问题早在 1970 年代后期就已经引起了公众争论，但保罗·肯尼迪《大国的兴衰》一书的出版吸引了更多公众的注意。肯尼迪的书具有说服力，不仅因为他对这个主题阐述得比较全面，还因为该书出版的时间与 1987 年秋美国股票行情的偶然暴跌相吻合。事实上，他在书中主要不是分析美国，而是对文艺复兴以来一些现代大国的兴衰进行了广泛的、历史性的研究。然而，引起极大兴趣和争论的是这本厚达 550 页书的最后 20 页。在名为“相对衰落的美国”的最后一节里，作者在这本书基本主题的框架内对美国的现状和可能的前景进行了评估。其基本观点是各大国兴衰的历史表明，经济力量和军事力量二者之间具有密切关系；各大国企图通过过度增强军事实力，来保护和拓展自己的利益；将制造财富的资源用于军事目的，“长期看可能削弱国力”。“如果一个国家进入了经济相对衰落的时期，那么‘帝国过分扩张’的困境将变得严重起来”（Kennedy 1988：ⅹⅵ），美国就是这样。该书的弦外之音并非指美国活该出现经济大幅衰落。书中写道：

> 美国的经济衰落并不是那么明显，被掩盖在其当前强大的军事力量和成功地在全球推行美国式的资本主义和美国文化之下。即使美国沦落到只能吃自己老本的份上，在将来很长一段时间里，美国在一个多极化的世界上也会仅仅因为它的幅员辽阔而仍然是个举足轻重的大国。
>
> （Kennedy 1988：533 –4）

很显然，肯尼迪的书触及了一种文化中的一根敏感神经。这种文化在一方面忧虑经济下滑和社会腐败，另一方面又相信美国能够克服

这些困难间艰难地摆动着。肯尼迪的看法事实上触及了两种论点：一是学院派批评家，他们和肯尼迪一样关心长远的问题；二是另外一些学者，他们重视里根当政年间所面临的现实问题。当然这两种论点时时穿插在一起，但是必须注意到，肯尼迪在一个问题上和对他批评最尖锐的学院派评论家——其中最著名的是约瑟夫·奈——是站在一起的，他认为美国当时所面临的问题是向世界新秩序大转变中的一部分；在这个新秩序中，经济力量的全球性转变削弱了美国独立行动的能力。举例来说，尽管奈反对将“下滑”这个词和美国的国力联系在一起，但他提到“在一个相互依存的时代，按照全球性单边主义战略来指导美国的外交政策是不可能的”。具体讲，里根采取单边主义政策已经证明是弄巧成拙，事实上在有些情况下里根也不得不勉强承认国际机构的作用（Nye 1990：254）。

当时在关于美国国力是否下降的争论中确实存在三种观点：一是美国在适应新秩序的过程中面临长期的结构问题，根据历史上的先例，谁也不能保证这样做会成功；二是美国“命中注定要做领导者”，如果它愿意它就有迎接相互依存的挑战的能力（奈）；三是迄今为止美国所面临的问题都是局部性的和相对短期的，可以通过采取有力措施来解决（里根）。

里根的观点在古怪性方面和另外两点有交叉之处。从某种意义上说，里根本人是个“下降论者”，他承认美国经济运行不佳，但他不认为这是经济体制问题，而是“纳税和消费”政策的产物，该政策最终可追溯到富兰克林·罗斯福的新政。政府以社会支出形式出现的义务太多、税收太重、政府规章太多等束缚了商业的手脚，使它无法生产本来能够生产的商品，无法提供它本来能够提供的工作岗位。“要使美国再度强大”就要释放美国潜在的生产力而不是迎合世界经济状况。结果是，为了维护美国独立行动而制定的政策反而削弱了美国的这种能力。

减少税收和撤销对商业的管制是明智之举，它带来了 1980 年代中期的经济繁荣。除了振兴经济，还有一个目标是使美元坚挺，这在里根执政最初几年成了美国在全世界地位的象征。卡特执政期间美元

遭受沉重打击。1978 年美元下跌时，总统的经济顾问委员会宣布“当局认为刻意保持美元的价值并非合适之举”。该委员会以此表明它无意采取行动来阻止美元贬值。而在里根当政期间，事实则恰恰相反：当局无意干预美元升值，巨大的财政赤字意味着必须通过借贷维持财政，当时利率非常高，这便吸引了大量国外资金，从而使美元升值。根据一项统计，“在里根第一个任期的四年内，根据国际货币基金组织的计算，美元的平均价值和其他几个主要工业大国的货币相比上升了 60%，在 1985 年春达到了最高值”。这导致美国出口商品价格昂贵而进口物品却很便宜，有利于贸易逆差趋于平衡（美国的贸易逆差从 1980 年的 250 亿美元上升至 1984 年的 1100 亿美元）。不仅仅是美国的国内债务日益得到外国投资者尤其是日本和阿拉伯产油国投资者的资助，而且贸易逆差也得到他们的资助（Cohen 1987：122，127，128，129）。1986 年，美国结束了超过 60 年的债权国地位，变成了一个纯债务国。

导致美国在 1980 年代预算赤字猛增的另一个重要因素是军费开支的巨额增长。从理论上讲，自 1985 年起，日渐增长的预算赤字将由格拉姆—拉德曼赤字削减法案控制。制定该法案的目的是强制性地逐渐减少每年的预算赤字，到 1993 财年应将预算赤字控制为零。事实上该法案强调的是，1993 年以前，每年节省预算的 50% 必须来自国防预算。在老布什当政期间，格拉姆—拉德曼法案终于被告上了法庭。结果是，无论是里根政府还是老布什政府都没有达到格拉姆—拉德曼法案的目标。

政府支出持续增长，再加上从理论上反对增加税收（加税是弥补赤字最明显的途径，老布什被迫用过这一招，尽管在这之前他做了某些承诺），以及事实上的减税使财政赤字持续上涨。因减税而增加的财力没有被用于能增加新的就业机会的投资，而是都被用到购买消费品（很多是进口的）上去了。

显然，美国在 1980 年代所面临的经济困境不能都归咎于里根总统的政策。不管是经济下降还是相互依存关系的到来，基本情况就是

美国处于难以控制的过渡时期的阵痛之中，而里根所采取的政策只是缓解这种阵痛，但并没有消除它。

武器与人

里根的国防预算对国防承包商来说是天上掉下来的馅饼，而且在短期之内有利于 1981～1982 年经济衰退结束后的经济复苏，就像 1941 年美国进行战争动员有利于美国走出“大萧条”一样。国防预算的增加对武装部队士气的影响也很重要。军方赞同里根的观点，即缓和削弱了军队的战斗力和威望，特别是在卡特当政时期这一点尤为明显。卡特时期美国外交政策的失败、面对苏联的侵略美国表现得消极被动，以及在伊朗人质危机中美国意志的瘫痪，所有这一切都可通过紧急加强军备而颠倒过来。实际上，不管是好是坏，事实确实如此。尽管里根的政绩在他离任后众说纷纭，但他在公关方面取得了成功。这使他安然度过了许多风暴，而这些风暴可以淹没那些能力较弱的交际者。

增加国防预算并不仅仅是为了支持当时的遏制战略，还为了在与苏联的竞争中重新夺回主动权。加强常规部队和核部队的建设，其目的不是要增强对苏联的防御能力，而是要加强美国对苏联的常规进攻能力，而且还包括增强干预第三世界的能力。在核部队的建设方面，在增加武器数量的同时进行战略调整，采用“打击军事力量”方针（Posen and Van Evera 1987：89－98）。在卡特政府时期就可以找到这些变化的某些例子。在伊朗人质危机和苏联入侵阿富汗之后，卡特采取行动实施一项早已做出的决定——组建快速部署部队，并且在核战争方面准备采取“打击军事力量”的方针和作战理论（我们在第十一章中已经提到）。里根政府只是将这一系列举措向前推进了几步。在探讨这些变化对美苏两国核武器谈判带来的影响之前，有必要简单回顾一下从里根入主白宫到他和戈尔巴乔夫在 1985 年 11 月第一次会晤这段时间美苏关系的大致情况。

1981 年，在里根总统宣誓就职后的几个月里，没什么迹象证明新当局要对苏联采取新举措。国家安全委员会主席威廉姆·克拉克和国防部部长卡斯珀·温伯格坚决反对这样做；亚历山大·黑格领导下的国务院和里根本人也对采取新举措不感兴趣。苏联入侵阿富汗产生的余波和在波兰继续实施军事管制给两国的谈判蒙上了阴影。然而，来自欧洲和某种程度上来自美国国内的压力（核"冻结"运动得到了民众的支持）又使当局不得不采取有限的措施来推动两国间的谈判。到了这年的年底，当局做出决定，表示愿意遵守《第二阶段限制战略武器条约》的条款。与此同时，由于发生了限制战略武器谈判向削减战略武器对话的象征性转变，据称，美国准备就战略核武器问题和苏联重开谈判（Dalliw and Lapidus 1987：226 - 227）。在中程核力量问题上，里根提议"零方案"，即如果苏联将它的 SS - 20 导弹撤出欧洲，美国将不部署巡航导弹和"潘兴"Ⅱ导弹。苏联拒绝了这一提议。

1982 年，美苏两国继续在许多领域举行谈判，但没有取得进展。11 月，刚刚取代黑格主持国务院的乔治·舒尔茨与苏联外长葛罗米柯在华盛顿会晤。事后舒尔茨向总统报告说："葛罗米柯明确表示想和我们保持对话"（Shultz 1993：123）。

1983 年，这一年无疑是美苏关系的最低点，不仅与里根执政的以后几年相比是如此，而且与前 20 年的美苏关系相比也是如此。尽管 2 月里根作为总统第一次接见了苏联官员——苏驻美大使多博雷宁，但在 3 月里根就发表了苏联是"邪恶帝国"的演说，并宣布要实施战略防御计划（SDI 或"星球大战"），这一切直接与和解的势头相冲突。这年夏天，里根写给安德罗波夫的一封信略微透出一点缓和的姿态，信中宣称要承担"维护和平"和"消除核威胁"的义务。但这点姿态很快就因为苏联 9 月将一架误入其领空的韩国客机击落而烟消云散了（Shultz：1993：360，361 - 71）。两个月之后，美国第一批巡航导弹和"潘兴"Ⅱ导弹按计划部署到欧洲，其后果是苏联终止了和美国的所有谈判。"15 年来，美苏之间第一次不再就任何问题

进行谈判”，斯特罗布·塔尔博特如此写道（Talbott 1984：4）。

1984 年，在这个大选年里可以看到里根当局开始发生重大变化。大选本身也是促成这种变化的一个因素，因为在韩国客机事件之后所进行的民意调查显示，有 51% 的美国人不赞成里根对外交事务的处理方式，只有 41% 的人赞成他的做法。在与苏联的关系这个特定问题上，一位观察者说，“公众的观点大致平均地分散在两点上，即一方认为里根处理与苏联关系的方式会增加发生战争的可能（43%），另一方则认为会降低这一可能（42%）”（Oberdorfer 1992：70）。此外，美国早已采取措施以确保美国能从实力地位出发进行谈判，用肯尼迪在其就职演说中的话来说，美国“有实力进行谈判”。人事上的变动——不仅指前面已经提到的理查德·派普斯的离任，而且还指国家安全委员会主席威廉·克拉克的下台——有助于为新的举措扫清道路。里根总统在 1984 年 1 月所做的演讲中，以其所特有的朴实方式列举了美苏两国人民共同的品质，尽管该演讲被苏联领导人斥之是为了大选而玩的“老一套花招”（Oberdorfer 1992：72－3），但确实指明了前进的道路。尽管这一年还有其他一些障碍，如苏联退出洛杉矶奥运会，但到了这年年底，双方已经为 1985 年 1 月在日内瓦举行部长级会谈，继续谈判削减战略武器问题打下了良好的基础。

1985 年，这一年的大事就是米哈伊尔·戈尔巴乔夫于 3 月成为苏联的领导人。与此相比第二重要的事情就是由爱德华·谢瓦尔德纳泽取代了老迈的葛罗米柯担任苏联外长，他很快就和乔治·舒尔茨建立了很亲密的关系。在很短的时间里就在谈判桌上就削减战略武器的提案达成了共识，其削减规模之大是一年前所不敢想象的。有关这一部分将在第十三章中讨论。

然而，并非所有的进展都沿着同一个方向。同样是在 1985 年，里根政府明确表示，它并不打算因为《限制反弹道导弹系统条约》（简称反弹道导弹条约或反导条约）的签署（1972）而停止开发战略防御计划。而且对苏联领导人来说，一直存在的一个问题是：里根对两国的合作关系究竟有多大的诚意，他会放弃当初仅仅为了让本国人好听而

说的话吗？他在 1983 年 3 月的演说中将苏联称为“邪恶帝国”，仅仅只是因为他所面对的听众是狂热的基督教徒，所以觉得有必要说他们爱听的话吗（Reagan 1985，Ⅰ：364）？那么又如何解释下面这段估计是掉以轻心的讲话：“我亲爱的美国人民，我很高兴地告诉你们，今天我签署了一项法令。根据这项法令，俄国将被彻底消灭。我们将在 5 分钟后对它进行轰炸”（Oberdorfer 1992：85）。这段讲话是里根于 1984 年 8 月进行广播讲话的一段试音，他以为这段试音不会被录下来。但愿苏联人因为不知道有这个玩笑话而宽恕他。

事实上，里根明确地认为苏联共产主义是最坏的事。但这一点并不意味着里根的这一态度完全支配了他在核武器谈判中的做法。里根的处世哲学不同于开明派，在一些重要方面也不同于极端保守派，但在中程核力量的谈判问题上他和保守派的观点极为接近。

正像我们在第十一章所看到的，卡特政府在中程核力量问题上实施的是双轨措施：一方面继续部署导弹，一方面继续与苏联谈判。而里根政府在中程导弹问题上提出了一个简单的公式，即众所周知的“零方案”。该方案建议苏联撤回其 SS－20 导弹（包括针对中国的），作为回报，北约将不部署巡航导弹和“潘兴”Ⅱ导弹。苏联人接受这一建议的可能性极小，因为这对他们意味着单方面的让步，而北约只是被要求不采取某个新行动。此外，苏联的撤出将会给美国部署在前沿的武器系统和英法的核威慑力量留下可乘之机。然而，谈判却在继续进行，到了 1982 年夏天，美方中程核力量谈判小组的头目保罗·尼采似乎和他的苏联谈判对手达成了一项妥协方案，即为了平衡起见，苏联减少一部分 SS－20 导弹，而北约则进行有限的导弹部署。该计划被里根政府推翻，北约于 1983 年 12 月按原计划部署了中程核导弹（Talbott 1984：Ch. 6）。1987 年，戈尔巴乔夫督促苏联接受了最初的“零方案”的实质，这才用快刀斩乱麻的办法解决了裁减中程核力量的难题。

有关战略防御计划问题的谈判更困难，因为它涉及核战略争论的核心问题，争论的焦点之一是有关两个超级大国核武库“均势”的

内涵。自1960年代以来，苏联一直在加强军事建设，结果使两个超级大国的军力达到了大致平衡，也就是说，两方都拥有承受第一次核打击并利用剩余武器进行决定性报复打击的能力。1972年反导条约的签署表明双方都认识到，以当时的技术水平，不可能进行有效的防御或者说能够完全防御核导弹的袭击。然而，随着导弹精度的提高，再加上部署了越来越多的多弹头分导式再入飞行器，已经有可能有效地瞄准来自敌方的洲际弹道导弹并将其摧毁，从而无须在承受第一次核打击之后进行报复。在1970年代后期和1980年代，“导弹易受攻击”的说法越来越多。有人甚至认为，如果一方能够对对方的军事力量实施精确打击，从而解除其武装，那么这将引诱各方首先实施打击。这种逻辑似乎使核作战的概念更接近核计划的中心思想。

里根总统似乎不在意核战略理论的细节，但是他对导弹的易受攻击性这个明显的事实却印象深刻。他对此的忧虑可以追溯到1967年，当时他参加了一次由爱德华·泰勒所做的讲座，爱德华·泰勒是个核物理学家并对美国氢弹的发展有着重要影响。泰勒长期从事关于防御弹道导弹的研究，并非常热衷于建设这样的防御系统。“正是这个讲座”，乔治·舒尔茨写道，“给了罗纳德·里根第一个思想火花，后来发展成为战略防御计划”（Shultz 1993：261）。还有一点同样重要。里根在1980年总统大选时参观了北美航空航天防御司令部，该司令部是美国对核攻击做出反应的指挥中心。当他得知苏联的洲际弹道导弹只要击中距指挥中心周围几百码的地方就会摧毁该司令部，并且对这样的导弹攻击没有办法防御时，他明显地感到恐慌。从那时起里根就下定决心要研究弹道导弹防御的可行性。

战略防御计划本身的发展具有几个显著的特征。第一，它的诞生主要是里根个人的构想和个别工作在新技术尤其是空间技术最前沿的科学家的雄心壮志相结合的产物。1983年3月23日里根宣布这一方案的讲话并没有经过策划创新性政策的通常渠道。国防部的主要人员，甚至总统的技术顾问，都是在该演讲的前几天才被告知这个方案的。与其他类似的提案不同，这一方案的产生过程是“由上而下的”

(Smith, S. 1987: 151)。毕竟，该计划在公布于众时还只是个别人头脑中的一些想法，它还没进行过事先必要的可行性研究就被宣布出来了。

战略防御计划的第二个重要特征是它独出心裁的勃勃雄心。里根以为这样一个用相互确保生存取代相互确保摧毁的方案能最终结束核军备竞赛。尽管在当时情况下进攻能力很重要，但防御能力在道义上更容易为人所接受，而且能最终真正地缓解核紧张态势。他说：

> 保护生命难道不比报复杀人更好吗？难道我们不能通过利用我们的聪明才智达到一个真正持久的稳定来表明我们对和平的渴望吗？我想我们能。事实上，我们必须要做到……我愿意和大家分享一个能给我们的未来带来希望的构想。我们将实施一项计划来对付苏联可怕的导弹威胁，它就是战略防御计划。让我们借助于技术的力量，正是靠着技术，我们的工业基础才如此雄厚，我们今天的生活质量才如此之高。
>
> 如果美国人民知道他们的安全并非基于美国能对苏联战略弹道导弹的袭击即时报复，而是基于美国能够在苏联导弹抵达美国本土或盟国领土之前将其拦截从而遏止苏联进攻的话，那会出现什么情况？
>
> (Reagan 1985, I: 442)

然而，很快就有人对战略防御计划方案提出质疑。里根的设想基于确保能建成一个全面的防御盾牌。但是几乎没有科学家或军事专家能确证这一想法，即使有这样的人，他们又不得不面对一些棘手的、反对该方案所基于的乐观假定的论点。按照里根的设想，该防御体系的任何部件都必须是百分之百的可靠与精确，绝不能出现来袭导弹未被发觉或未被摧毁的情况；战略防御的指挥和控制系统面对任何干扰都必须保持完好无损；即使是一枚洲际弹道导弹突防也能造成无法估计的损失，并可能破坏该系统的理论基础。总而言之，该系统必须是

以极其精确的标准运行。

如果说在硬件的要求方面遇到了前所未有的困难，那么软件方面也是如此。当时并不具备控制这样一个系统的计算能力。即使上述这些困难都得到了解决，那还存在着苏联采取对抗措施的可能性。战略防御计划的空基部件——设在卫星上的传感器和X射线激光器——易于遭受导弹攻击。如果苏联打算进攻，那么这些空基部件将是其首要的攻击目标。其他的一些较为简单而且不昂贵的对抗措施，诸如部署假目标和干扰物（金属箔片），也可用来扰乱甚至可能压制防御雷达和瞄准系统。对苏联而言，在这方面比较简便的方法就是制造大量进攻性导弹破坏战略防御计划。换句话说，苏联对战略防御计划做出的必然反应便是加强核竞赛，而不是像那些战略防御计划的拥护者所说的暂停核竞赛。当然，对苏联来说还有另外一个选择，那就是开发自己的导弹防御计划，事实上苏联的确早已致力于这方面的研究。这样做也会使军备竞赛升级，还可能把军备竞赛延伸到太空（Smith，S. 1987：154－9）。

然而，很快就清楚了，战略防御计划最初就是想象力的产物。除了上面已经提到的问题以外，花费也是一个很大的障碍。根本不可能预测建造整个系统需要花多少钱，但可以确定的是，需要长期消耗大量资源。国会不愿考虑这笔巨额开支，有影响力的社会舆论的反对之声以及北约盟国的怨声载道，所有这些加起来，节制了战略防御计划的初始方案，把它变成了一个比最初方案规模小得多的研究项目。事实上，前国防部部长麦克纳马拉在1980年代撰写的关于核问题的许多辩论文章中，有一篇就曾提到，当时的确有两个“星球大战”计划：其一是里根在1983年的讲话中提出来的，要建成一个“滴水不漏”的防御盾牌；其二是只对特定的军事目标和居民点进行局部性的防御。战略分析家在充分考虑了经济、政治和技术制约因素之后，认为第二个“星球大战”计划基本上是一个合理可行的方案。但实施的结果却远远背离了甚至推翻了里根的原始设想。里根当初提出“星球大战”计划，是想用其替代核威慑，而不是对核威慑的补充。

他在1983年3月的讲话中说，如果美国不是以防御系统替代进攻系统，而是在进攻系统的基础上增加防御系统，那么苏联将会认为这具有侵略性，“没有人愿意那样做”。因此，后来实施“星球大战”计划二而放弃“星球大战”计划一自然在苏联引起了极大的怀疑，甚至导致了新一轮的进攻性武器竞赛（Charlton 1986：11）。麦克纳马拉认为苏联人这样理解情有可原，因为他们觉得美国实施“星球大战”计划是为了拥有第一次打击能力（McNamara 1986：99－103）。由于里根总统继续谈论他的“星球大战”计划一，好像该计划仍然在讨论之中，这便让公众困惑不解。

据像罗伯特·麦克纳马拉这样一些长期在公共事业机构供职的人回忆，1980年代中期的形势带有令人不快的嘲讽意味。20年前曾经发生过一次类似的争论，但在那场争论中，美苏的情况正好相反：在1960年代中期是苏联投入大量资源实施弹道导弹防御，美国的反应则是进行多弹头分导再入飞行器的研究。据麦克纳马拉回忆，实施该项目“完全是为了对付苏联反弹道导弹的发展”（Charlton 1986：26）。换句话说，美国只需要回顾一下自己的历史就可以发现苏联会采取什么招式来对付战略防御计划，那就是增加进攻性武器。后来发生的事件具有更大的嘲讽意味。1967年，麦克纳马拉和苏联部长会议主席柯西金在新泽西州的葛拉斯堡罗进行会谈，当麦克纳马拉指责苏联发展弹道导弹防御系统有损于两国的核均衡时，柯西金慷慨激昂地回答说，“防御是道德的，进攻是不道德的”（Charlton 1986：27）。这句话后来被罗纳德·里根在提出“星球大战”计划时加以引用。

战略防御计划真正的意义在于，它与中程核力量问题一起凸显了美苏核关系中尚未解决的基本问题。它使人们对1960年代中期提出的威慑理论感到怀疑。里根提出战略防御，是对相互确保摧毁概念的最明显的挑战。里根从来没有对1972年的反导条约表示过满意，而且他还明确表示绝不允许反导条约阻碍战略防御计划的实施。反导条约的内容规定得非常明确，双方“都不允许部署保卫本国领土的反弹道导弹系统，并不能为实施反导防御提供基地，而且不得在该条约

第三条规定以外的某个地区部署反导防御系统（第三条规定双方各自可部署两个固定而有限的反导系统）”。第五条专门对涉及战略防御计划的几个要害问题做出了禁止的规定：双方均不得研制、试验及部署海基、空基、太空基和陆基机动的反导系统或者部件（Garthoff 1987：109，110）。就连战略防御计划最忠诚的拥护者也不能否认，开发战略防御系统，即使是一个规模较小的系统，也违反反导条约。

然而，这里仍然有些问题，如在反导条约的限制性规定内，可以引进多少有关战略防御计划部件的研究和试验。美国政府的律师们提供了一个“广义的解释”，按照这一解释，据称“在新物理概念”的基础上试验和研制反导系统是反导条约允许和认可的（Garthoff 1987：3）。对里根当局的军控立场持批评态度的专家，尤其是那些参与反导条约谈判的人，则强烈反对这种“解释”。1985年初在一家颇有影响的杂志《外交事务》上发表的一篇文章中，一些制定外交政策的重量级人物，如麦克乔治·邦迪、乔治·凯南、罗伯特·麦克纳马拉和杰拉德·史密斯（美国反导谈判小组组长）宣称，总统的选择“要么是‘星球大战’，要么是军控”（Bundy, *et al.* 1984－85：264－78）。简言之，对一些著名的外交政策专家而言，战略防御计划不仅破坏了威慑，还会破坏此后的军控原则。正是军控使相互确保摧毁成为可以忍受的方案。

1980年代，从一个不大可能的来源——罗伯特·麦克纳马拉自己——对威慑提出了又一个挑战。麦克纳马拉在离职后所撰写的关于核问题的文章令人困惑。不管他对1970年代和1980年代美国各届政府的核政策的批评多么有力，在某些方面他的批评有悖于他的决策记录。事实上，麦克纳马拉在1980年代的文章对他参与制定的延续25年之久的战略原则的理论依据产生了怀疑，不过这一点一直有争议。

核心问题是麦克纳马拉在1980年代中期所做的一系列讲演中提出的“均衡”概念。他说，有许多谣言威胁到美国的安全，其中有一种说法是苏联拥有核优势。一个对美苏两国武库的调查显示，虽然一个超级大国在某些方面占有优势，而另一国却在另一些方面占有优

势，总体而言，并不存在会在二者之间造成失衡的危险。那些声称美国存在“易受打击窗口”的人是上当受骗了，“事实是目前两国的力量均衡”。接着，麦克纳马拉进一步为均衡辩解。他写道：“当双方均被遏止发动战略进攻时，便意味着存在力量均衡（因为他们认识到战略进攻会导致报复性打击，而这种打击会对首先攻击者造成无法承受的损失）。”以古巴导弹危机为例，当时在核弹头的拥有量上美国以 17:1 的比例对苏联占有优势。麦克纳马拉宣称，“无论我们的优势是 17:1，还是 5:1 或 2:1，甚至我们处于 1:2 的劣势，对我们的行动产生的影响是一样的。因为在这种情况下，无论是美国还是苏联都不认为美国会使用或威胁使用核力量来达成政治目的”（McNamara 1986：44，45）。

反对核武器竞赛的批评家们无论当时还是现在都会称赞这种观点，但是有人会问，如果较少的导弹就可以达成威慑目的，那么在实践中有什么必要建设一个拥有几千枚导弹的核武库而不是几百枚导弹的核武库呢？在武器竞赛的关键阶段作为美国核政策设计者的麦克纳马拉和后来从历史学家和哲学家的角度评价美国 1980 年代核窘境的麦克纳马拉有明显的不同。正是麦克纳马拉将系统分析专家和博弈论专家请进了国防部，也是麦克纳马拉领导了 1960 年代美国核武器的大发展和现代化，指挥创建了含有合理和均衡思想的威慑理论。如果“均衡”真的意味着拥有少量核武器就足矣的话，那么核武器竞赛就没有任何意义了。

直率地指出这一点无疑将使复杂问题简单化。人会随着环境的改变而改变自己的观点，在任何情况下都不要以为麦克纳马拉在 1960 年代是鹰派，到了 1980 年代则变成鸽派了。麦克纳马拉在他担任国防部部长期间，在许多方面都对军队的勃勃野心起了节制作用。最后在 1967 年北约关于“灵活反应”战略大辩论中，麦克纳马拉坚持在威慑无效后有选择地使用核武器而不是进行“大规模报复”，他曾坚决主张加强常规防御，以便在苏联发动常规进攻时，减少美国对实施核反击的依赖（Newhouse 1989：162－5；Charlton 1986：17）。然而，

麦克纳马拉在1980年代大肆宣传的观点留给人们这样一个问题：为什么无论是他还是他的继任者都不能遵循他修改后的"均衡"原则所提供的逻辑，即少量的核武器就足以遏止力量强大得多的对手？

对这个问题有三种可能的答案。第一，仅仅是因为有太多的不可知因素。怎么会确信拥有较少核弹头的国家能够遏止一个拥有更多核弹头的对手？怎么会知道苏联在发生真正的危机（而不是博弈推演）时会做出什么反应？尽管相互确保摧毁战略对苏联的方针政策和可能做出的反应提出了假设，但并没有人能确切地知道上述任何一点。当时所知道的或者应当想象到的是，美国的政策制定者们倾向于从最坏的情况着想，即苏联准备打赢一场核战争。在这种情况下，做好两手准备，尽可能地和对手的武库持平则显得较为明智。第二个答案可能和政治有关。或许在知道一枚现代核弹头的毁灭能力后，可以通过一个具有说服力的事例为实施威慑提供一个代价最低的途径。然而，从政治角度而言，持这种观点的人易被指责为玩忽职守。数字游戏是美苏相互评估对方的军事实力和政治意志的关键要素，它一直被用于军备竞赛。在这个意义上，核武器和常规武器除了在摧毁能力上有明显不同外，核军备竞赛和以往的常规军备竞赛并无不同。

为什么最低代价的威慑不能作为一个实际操作方案，这个问题的第三个答案便是麦克纳马拉的灵活反应战略。依赖少量核弹头来实施威慑，使军事决策人只有有限的选择：要么完全反应，要么不反应，或者是以色列人所谓的"参孙选择"（Hersh 1991：137n）。不管愿意不愿意，看来只能在美苏武库的大致均衡上实施威慑。

对麦克纳马拉在1980年代的立场还有一种更深的理解。结合里根总统对威慑战略的异乎寻常的看法，我们可以认为，麦克纳马拉在1980年代的观点（从整体上来看）就是军备竞赛的基本原理是空洞而危险的。自1970年代末期以来美苏关系日渐紧张，人们越来越关注核问题，其规模之大是自1960年代初以来所未见。在美国，其表现形式是核"冻结"运动；在欧洲，包括东欧，各国的反核运动分子联合起来成立了"欧洲核裁军"组织。怀疑论者怀疑上述两个组

织是否能对政策产生直接影响；而这些组织的拥护者，尤其是拥护“欧洲核裁军”组织的人们则宣称这些组织已经对东西方关系的大气候产生了实质性影响，甚至有助于冷战的结束（Thompson 1990：139－46）。不管这些说法是否属实，有一点是无疑的，那就是政府和专家们都认为有必要对公众关于核危险的忧虑做出反应。舒尔茨辩解道，事实上战略防御计划“作为人民大众无可置疑的一项胜利，是对日益强大的核冻结的批驳，也是对那些认为里根当局正冒失地将整个国家推向核灾难泥潭的人的有力驳斥”（Shultz 1993：259）。里根正是利用战略防御计划向世人证明他是个爱好和平的人。麦克纳马拉也意识到美国国内外的公众舆论已经改变了，已经与他在 1980 年代中期的文章中所表达的看法明显不同，当时戈尔巴乔夫正将自己塑造成寻求与西方建立新关系的新型苏联领导人。“我们确定必须改变政策”，他写道，“持这一观点的有各种团体和个人，包括核冻结运动的拥护者、总统、天主教和循道宗教的主教们、美国顶尖科学家的大多数人、苏联领导人米哈伊尔·戈尔巴乔夫、第三世界和新独立国家的领导人，如拉吉夫·甘地和去世的奥拉夫·帕尔梅”（McNamara 1986：79）。简言之，关于核武器争论的基础已经彻底改变了，这一点在政治层次的各个方面都有所反映。

烦恼不堪的西方盟国

自 1948 年实施马歇尔计划并于次年成立北约以来，美国与西方盟国的关系经历了一个复杂的演变过程。某些与生俱来的特点决定了这种关系会不时出现紧张与多种解释。美欧关系中最重要的一点就是西欧各国在安全方面依赖美国。就像我们在前几章中看到的，扩展威慑的问题总是让欧洲人怀疑美国能否冒着自身毁灭的风险来保卫欧洲。在分担责任问题上还有争议，在对一些影响与东欧集团关系的重大问题的看法上也有分歧。这些问题随着西欧经济实力的增强以及随之而来的西欧自行其是的可能性增大而日趋严重。

在美欧关系中会出现问题的第二个特点，就是欧洲共同体作为一个主要的生产与贸易集团的崛起。人们还记得，在实施马歇尔计划的时候，美国非常赞成欧洲经济一体化的想法。然而最后美国无可奈何地接受了与原来的经济恢复计划相去甚远的欧洲一体化。欧洲在1950年代兴起的经济合作运动曾得到美国的大力支持，其发展的高潮就是于1958年建立了欧洲经济共同体。在此后的十年间，美国，尤其是肯尼迪政府赞同大西洋共同体的想法，欧洲在该共同体中被当作平等的伙伴或者说“欧洲支柱”（Cromwell 1992：16）。这种说法在后来的几十年中被美国官员反复提到，然而事实却是当欧共体成立并在贸易上超过美国时，美国越来越感到欧共体对美国利益是一大威胁。在1970年代和1980年代，关于欧共体的贸易保护主义政策和政府对农业补贴等经济问题的争论成了美欧贸易日程上令人厌烦的老生常谈。美国人没有忘记，一个经济上日渐繁荣及日趋一体化的欧洲仍然拒绝承担更大份额的防务责任。

美国与西欧关系的第三个重要特点和前两个有直接的关系，那就是与经济有关的组织和与安全有关的组织之间缺乏合作。显而易见，欧共体成员和北约成员并不是一回事。从大西洋共同体的角度来看，最主要的区别当然是美国对欧共体的事务没有直接发言权，但在北约内部的决策方面美国起主导作用。威廉·克伦威尔写道：“在经济领域的欧洲主义和安全领域的大西洋主义之间存在着不对称”（Cromwell 1992：14－15）。

欧洲从来都没有大力发展自己的安全体系，尽管它曾在这方面做过努力。其中一个例子是西欧联盟，它的起源可追溯到1948年，但最后失败了。为了建立欧洲安全“支柱”也做过许多其他的尝试，但都没有成功，其失败的原因很多。国家不同是失败的一部分原因。法国应该对1954年欧洲防务共同体（它可能是最有希望的事业）的垮台负责。英国众所周知的大西洋主义倾向使它不愿将自己卷入欧洲事务，因为这可能会影响它与美国的关系。但是欧洲安全支柱迟迟不能成形还有一个同样重要的原因，那就是美国不愿意看见出现任何不

是严格在北约框架之内的组织。成立欧洲防务共同体的主张是美国所愿意接受，甚至是极力赞同的，因为它符合上述条件（西欧防务共同体的指挥和部署权都掌握在北约盟军最高司令手里）。西欧防务共同体对自己采取的军事行动没有规定，从这个意义上讲，它对北约的领导权（亦即美国的领导权）没有威胁（Cromwell 1992：8－14）。

然而，1983～1984 年当西欧防务共同体被再次提起时，情况已大不同于 1950 年代了，它使美国担心“在北约内部出现一个欧洲核心”。事实上，重提西欧防务共同体的一个动机便是西欧担心美国正考虑减少驻欧美军。另一个动机是担心戈尔巴乔夫上台以来两个超级大国的军控谈判进程日益加快，会使欧洲易遭攻击。战略防御计划也引起了同样的焦虑，因为该计划的目的在于保卫美国本土，而不是欧洲。最终，尽管费了大量时间进行关于欧洲内部防务合作的协商，甚至考虑了建立欧洲军团的前景，西欧联盟成员国还是难以对安全问题做出欧洲协调一致的反应。总之，一考虑到欧洲的安全问题，欧洲总是意识到一个强烈的需要，那就是要承认北约和由此而来的大西洋关系是首要的（Cromwell 1992：171－9）。

上述情况表明事情与过去有很大的连贯性。然而，在 1980 年代，因竞争和相互依赖的组合作用而导致的美欧关系紧张达到了新水平。部分原因是欧洲越来越可以不依赖美国而独立存在；另一部分原因是缓和的后期出现的紧张关系因里根趋于实行单边政策而加剧。我们在第十一章中已经看到，伊朗革命、苏联入侵阿富汗和 1980～1981 年间的波兰危机造成了美国和欧洲严重的意见分歧。在里根担任总统期间，又有类似的分歧产生，其中最主要的有：关于战略防御计划、欧洲参加苏联天然气管道建设以及美国对利比亚政策的争论等。

欧洲各国的领导人对战略防御计划提出了和美国国内的批评家相同的批评意见。该计划可能破坏反导条约（英国外交大臣杰弗里·豪将该条约称为“安全的拱顶石”），可能导致军备竞赛扩展到太空，并可能导致新一轮进攻性武器的竞赛。然而，来自欧洲官方的不同意见很快受到了遏制，部分原因是里根明确表示不会在战略防御计划的

原则问题上妥协，还有一个原因是里根政府给了点甜头，它不但与许多欧洲国家签订了研究开发合同，而且还与日本和以色列签订了开发合同。该研究项目的技术风险极高，各国之所以参加是因为有极大的经济潜力。法国出于政治原因拒绝参与共同开发研究，但提出了自己的高科技计划，这反映了法国一贯的分离方针，因为它认为美国一直对欧洲实施军事独裁（Boutwell 1988：88－9）。

如果说美国实施战略防御计划和欧洲的反应还在盟国关系的既定模式之内，那么在这个例子中，鉴于早已存在的紧张关系，美国的单边政策加剧了欧洲对均衡削减战略武器前景的忧虑。然而，欧洲的这种反应并不持久。正如一位观察家所言，具有讽刺意义的是，当欧洲诸国领导人“听说在1986年雷克雅未克的首脑会议上由于美国拒绝在战略防御计划上妥协而导致美苏未达成在未来五年内削减核武器50%、未来十年内削减全部弹道导弹的协议时，都不约而同地长舒了一口气”。但是这并没有消除他们的忧虑，即觉得战略防御计划可能是“大幅度地削减战略核武器从而有助于东西方关系稳定”的障碍（Boutwell 1988：90，91）。欧洲对战略防御计划做出的反应将大西洋关系（欧洲诸国对美国的怨恨和依赖的结合物）中原有的所有分歧都翻了出来。

关于天然气管道的争论源自1982年，在该争论中欧洲处于优势。尽管美国努力将它解释为一个安全问题，但它充其量也只能与安全间接相关。此外，美国的手伸得太长了，现在不得不从暴露的地方撤回来。苏联的西伯利亚天然气管道项目承诺给西欧七个参加国提供其所需天然气总量的大约20%，并与其签订了关于技术设备的具体合同。此项目所增加的就业机会是西欧诸国迫切需要的，因为当时西欧诸国国内正面临高失业率：英国失业率为14%（自1954年以来就居高不下），而德国失业率则达到了前所未有的8%。美国公司原本也希望加入，但里根上台后，宣布禁止美国公司参与该项目。到了1982年夏天，该禁令又扩展到美国在欧洲的分公司和利用美国许可证生产商品的欧洲公司（Shultz 1993：135－6）。

美国认为，与苏联打交道会使欧洲容易屈服于苏联的压力，而且

转让技术和资金会减轻苏联的经济困难，增加其外汇储备，加强其承受防务负担的能力。当欧洲诸国指出美国这一政策与里根撤销美国谷物外销苏联的禁令的做法明显不一致时，美国的回答是，天然气管道会增加苏联的外汇储备，而美国卖谷物给苏联则会消耗苏联的外汇。这一解释轻而易举地抹杀了美国农场主院外集团要求停止谷物禁运而加诸当局的政治压力所起的作用。不管怎么说，欧洲做出的反应是强烈反对美国对欧洲指手画脚。正如威廉·克伦威尔所指出的，该问题已经超出了东西方关系的问题，是“美国对位于欧洲主权国家领土范围之内的公司行为实施境外管辖的一个严重挑衅事件”（Cromwell 1992：120）。当美国宣布对违背其禁运规定的欧洲公司实施制裁时，该事件终于发展到了顶峰。既然欧洲公司是按照自己国家政府的规定行事的，那么很明显这个事件只能在政府级进行解决。1982 年 11 月，美欧达成了一项决议，根据该决议，美国取消制裁，作为交换条件，欧洲同意不再和苏联签订新的天然气协定并加强对“战略性项目转让”的控制，而西欧各国和苏联已经签署的协议则继续有效。达成该决议的实际意义在于让美国“体面地撤销它的制裁政策”（Cromwell 1992：122）。

欧洲对 1986 年轰炸利比亚的反应是西方盟国在对付国际恐怖主义方面有较大意见分歧的一部分。自 1960 年代后期以来，国际恐怖主义就呈上升趋势（see figures in Kegley 1990：15）。虽然最为严重的事件源自中东冲突，但这种现象已经扩大到了全世界。有人说，恐怖主义是弱势人群和被剥夺政治权利者的政治。它的震撼力使得这类人群最起码在短期内可以引起世界的关注，其影响甚至和这些组织的规模不成比例。美国常常是国际恐怖主义分子的攻击目标，但是这类攻击事件很少在美国本土发生。这就使这一问题复杂化了，既然这类危机的解决一般都在美国的直接控制之外，那么如何对付恐怖分子袭击或是敌对情况的问题就变得非常棘手。1980 年营救在德黑兰被扣的美国人质的行动失败，表明实施这类冒险行动难度极大，代价也很高。

里根总统在他第一个任期之初就宣布，恐怖主义是他的政府要解

决的首要任务。但在实践中，他在实施高风险政策方面是非常谨慎的（Rubin 1987：450）。然而，一旦查明恐怖行动的根源，里根当局却又会采取果断行动。对付利比亚的卡扎菲上校就是一个例子。事实上，一旦确定恐怖主义活动是受某国支持的，例如有证据表明利比亚支持了 1985 年在罗马和维也纳机场的爆炸活动，做出有力反应的问题就简单多了。自 1981 年以来，美国便采取行动对付卡扎菲对恐怖团伙的支持，因为他的这一做法严重影响了美国和利比亚的经济和政治联系。1981 年和 1986 年美国海军和利比亚军队在锡德拉湾发生冲突。1986 年年底，在西柏林的一家迪斯科舞厅发生爆炸后（据说是由驻东柏林的利比亚特工策划的），美国决定轰炸利比亚的军事目标和卡扎菲的寓所。虽然卡扎菲安然无恙，他的养子却被炸死了（Rubin 1987：452-3）。

此次空袭是由从美国航母上和英国数个基地起飞的飞机实施的。英国是唯一对美国行动提供坚决支持的欧洲国家。法国和西班牙不允许美国轰炸机飞越其领空去利比亚。此次空袭受到广泛谴责，被称作一次“兰博式”的行动，这种做法很可能加剧而不是减少恐怖主义事件的发生。后来，尽管欧共体对利比亚采取了比较严厉的措施，但这也难掩欧洲和美国在对付恐怖主义问题上的明显分歧。克伦威尔做了适当的概述，他说，“欧洲强调要减少恐怖主义冒险，采取更强有力更一致的措施，将反恐怖主义行动控制在欧洲的范围之内”，而美国则与此相反，它强调要“从根源上”处理利比亚资助的恐怖主义。美国这种主张的问题在于很难获得有责任的真凭实据（Cromwell 1992：129，127-30）。欧洲采取这种立场无疑是考虑到这样一个客观事实，即发生在欧洲的恐怖袭击比发生在美国本土的要多。这样就将此类事件变成了国内安全事务，而非外交政策。

在整个 1980 年代，关于大西洋联盟内的关系紧张到何种程度，美国和欧洲的观点有明显的不同。关于这一问题完全相反的两种意见在 1980 年代出版的两本书中说得很明白。一本是 A. W. 德波特著的《处在超级大国中间的欧洲》（1986 年第二版），另一本是约翰·帕

尔默写的《没有美国的欧洲》（1988）。德波特的副标题“持久的平衡”向世人展示欧洲在二战后所建立的两极格局是非常稳定的，该格局有效地显示出了力量的现实，应当坚持下去。西方联盟和其东方对手在过去的年代里所经受的来自内部和外部的挑战并没有改变这种格局的基本态势。这本书的第一版于1978年面世。作者于1986年再版时说，“在过去八年里所发生的动乱事件仅对这一格局产生了很小的影响”，因此他不认为需要改变他原先的判断（DePorte 1986：viii，ix—xvi）。

德波特曾在美国国务院工作过，他认为美国在欧洲所起的作用是必要而正确的。他写这本书的部分目的是呼吁“支持美国继续在欧洲发挥作用”（DePorte 1986：xv）。与此持相反观点的约翰·帕尔默是欧洲人，他是伦敦《卫报》的编辑。他认为：“大西洋联盟，这个自1945年以来有两代美国人和欧洲人在其中从孩提长大为成人的经济、军事和政治世界，眼看着走向崩溃。”帕尔默的副标题是“大西洋关系的危机”。他在指出“战后美国的经济垄断地位是现实力量反映”的同时，认为欧共体日渐增强的经济能力正在将欧洲推到与美国敌对的位置，全世界正迅速分裂成为几个贸易集团。帕尔默认为欧洲还没有充分发挥出自己的经济潜力——它依然还是个“比较巴尔干化的经济”，而且在制定共同的欧洲外交和防务政策方面更不顺利。如果欧洲的潜力能够全部发挥出来，即使没有美国，欧洲也依然可以生活得很好。事实上，帕尔默暗示道，鉴于大西洋联盟在防务问题、与东方集团的关系以及经济政策等方面充满了矛盾，欧洲应该做好准备走自己的路。即使大西洋主义的“解体”不是不可避免的，那它也是极端可能的。在帕尔默看来，出路在于将左派民主运动和建立真正的、超越国家和民族界限的“欧洲主义”相结合（Palmer 1988：1，11，13，193）。帕尔默的书和德波特的书一样，都是为了进行政治号召而写的。

美国和西欧关系的实际情况就处于这两种极端观点之间的某一点上。事后想来，当时德波特明显低估了结构性变化的可能性。他所欣

赏的“大西洋主义”促使他过分看重促使该体系继续存在下去的因素，而看轻了导致该体系改变的因素。而帕尔默的主张则促使他做出完全相反的结论。二人各自从在大西洋关系框架内发挥作用的各种力量中提取了一些相互矛盾的东西来支持自己的观点。事后看来，从1989～1991年东方国家的演变迫使西欧国家和美国重新审视双方关系的基础方面来讲，帕尔默的判断更为准确一些。

但是，也不能说冷战后世界的新形势只是在“大西洋主义”和“欧洲主义”之间做出一个简单的选择。在欧洲，欧洲主义意识形态的形成是与生俱来的，并伴随着各民族间的竞争，仅仅几个欧洲国家所代表的残留的大西洋主义并不能完全解释这个问题。帕尔默在他的书中恰当地描述了欧洲国家在协调1980年代的外交和防务政策方面所遇到的困难。东欧剧变之后，它们试图对南斯拉夫的状况达成一致的反应，但几乎没有取得什么进展。即使在欧共体从结构上讲最容易达成一致的经济领域，在1990年代早期前景也不妙，统一货币的努力没有成功。

一句话，共产主义的崩溃以及冷战的结束并没有解决大西洋联盟内部存在的问题。然而也不能说这又给大西洋联盟增添了麻烦。有许多可能的途径可供大西洋联盟选用，以适应1990年代欧洲的安全形势，不过在1993年中期欧洲形势尚没有一个明确的方向。

东欧国家的命运及其与苏联的关系将在第十三章中讨论，但在这里有必要先提一下它们在1980年代早期的发展情况，因为这段时期对后来发生的事件颇有影响。其中最重要的，对所有东欧国家都产生很大影响的是苏联对东欧国家的能源供应（石油和天然气）进行的一次造成重大损失的改变。苏联过去一直以低于世界市场价的价格将能源产品卖给东欧各国，其多余的则在世界市场上出售以换取硬通货。然而，1980年代初世界油价暴跌，苏联遂于1982年宣布要立即将对东欧的能源供应削减10%，企图以加大在世界市场上的能源出口额来弥补硬通货的损失。正如约翰·克雷默所言，“这一举动预示着还有更严重的问题在后面等着，那就是自1985年3月

米哈伊尔·戈尔巴乔夫上台后，东欧国家的日子更难过”（Kramer 1990：4；and see Medvedev 1988：227 - 38）。维持东欧大帝国的代价一直是苏联的一个负担。而去除这一负担的努力则加重了东欧诸国经济早已存在的困难。如同我们已经知道的，最值得一提的是波兰。在经历了 1980 ~ 1981 年的危机后，它在 1980 年代中期一直处于一种令人不安的平静状态。

上述例子清楚地说明了铁幕两边两大联盟的主要区别。东欧诸国在主要经济资源、安全和保持政治一致方面不得不依赖于苏联，这使整个东欧集团死板而脆弱。西方联盟关系中所固有的相互推动与牵引，在东方联盟中几乎不存在。尽管人们长期忧虑这种相互推动的关系在不造成严重损失的情况下能支持多久，它依然是大西洋联盟相对比较成功的一个条件。

超级大国、中东和中美洲

中东在 1980 年代一直处于混乱之中，因此美国对中东的政策出现某些混乱和前后矛盾并不令人惊讶。但是，里根政府起初坚定地主张继续解决其前任认为是首要大事的中东问题。里根在 1982 年 9 月所做的一次关于政策的重要演讲中宣布，他的政府在成立之初有两件大事要解决：

> 第一是该地区（指中东）面临着苏联及其代理人的战略性威胁，其最好的证明是苏联对阿富汗的野蛮入侵。第二则是以色列与阿拉伯邻国的和平进程。关于苏联的威胁方面，我们已经进一步努力和我们的友邦与盟国实施一项联合政策：遏制苏联及其代理人在该地区的进一步扩张；而且必要时，我们将采取防御行动反对他们。至于阿拉伯与以色列之间的冲突，我们认为戴维营框架是解决该问题的唯一途径。
>
> （Laqueur and Rubin 1984：657）

当然，这两条政策主线是紧密相连的。《戴维营协议》不仅仅显而易见地将苏联人排除在外，而且为阿以冲突和巴勒斯坦问题的解决提出了一个途径，而该途径和苏联的意见颇为不同。“埃及和以色列之间的单独交易”，葛罗米柯当时说，“解决不了任何问题”。只有一个国际会议做出的“全面”安排才能带来公正而持久的和平。戴维营立场和苏联立场二者之间最重要的本质上而非程序上的区别在于，苏联赞成在约旦河西岸和加沙地带成立一个巴勒斯坦国，而戴维营方案则倾向于建立一个和约旦联合的自治政府（Laqueur and Rubin 1984：618）。苏联在1982年9月又一次重申了自己的立场，当时勃列日涅夫宣布了他的中东和平计划，这显然是对里根演讲的直接回应（Golan 1990：107－9）。

在此，我们最好牢记美国和苏联对中东问题的立场，因为在1990～1991年的海湾战争和苏联解体之后，中东和平的方案便开始浮出水面，它正是美苏两方立场的混合物。该方案包含了国际因素，因为该和平进程是在国际会议的支持下发生的。该方案采取一步一步走的方式，即在国际框架内让以色列和其众多阿拉伯邻国进行一系列单独的双边会谈。然而，在这个过渡期间，阿以冲突却日渐加剧，达到了似乎任何方案都行不通的程度。

1982年，即里根和勃列日涅夫宣布各自计划的那一年，以色列入侵黎巴嫩，将该地区拖到了爆发全面战争的边缘。事实上，里根和勃列日涅夫的计划正是为了解决此类危机。在黎巴嫩危机中各种势力都在活动。经过几年的内战后，黎巴嫩事实上处于一种无政府状态。一直到1970年代中期以前，黎巴嫩的各种宗教组织——包括马龙派天主教，逊尼派、什叶派穆斯林和德鲁兹教派——的历史性配置使黎巴嫩成了一个“各种团体和利益集团达到了奇妙的均衡”的地方。这样的历史性配置之所以崩溃，固然有其重要的内部原因，但以色列和叙利亚的野心，加上巴勒斯坦解放组织的情况，也使黎巴嫩的内部危机难以与其周边的紧张局势分离开来（Hourani 1985：1，14－16）。巴解组织的领导人及其许多“战士”自从1970年被约旦驱逐

后，就驻扎在黎巴嫩南部地区。1981 年，巴解组织加强了炮轰与越界袭击，对以色列北部的居民点造成了持续性威胁。还有一个更重要的军事威胁，那就是叙利亚在黎巴嫩南部部署了苏制地对空导弹。以色列于 1982 年 6 月入侵黎巴嫩，就是为了消除这两种威胁。然而，以色列此次入侵所用的兵力规模之大，长驱直入贝鲁特行动之深远，表明它企图控制黎巴嫩的政治形势。

美国在制定中东政策中经常面临一个问题，就是作为中东和平的制造者，它必须在支持以色列和维护自己在阿拉伯国家中的信誉之间保持平衡。以色列的入侵使上述问题更加尖锐。当务之急是被以色列入侵军队包围在西贝鲁特的巴解战士的命运问题。美国政府内部对这个问题的态度存在着严重的分歧。国务卿亚历山大·黑格拒绝对以色列表示强烈的谴责，这使他在政府中日渐孤立，最后被迫辞职，由乔治·舒尔茨取而代之。接下来便是美国自 1958 年黎巴嫩危机以来第一次对中东事务实施直接军事干涉。美国海军陆战队作为多国部队的一部分，被派遣去保护巴解战士从贝鲁特安全撤离。以色列入侵两个月以后，巴勒斯坦解放组织撤出贝鲁特，乘船去了突尼斯，并在那里建立了总部（Spiegel 1985：412 – 18）。

然而，危机并没有就此结束。黎巴嫩新当选的总统被暗杀，从此黎巴嫩的各种团体恢复了残忍的凶杀斗争。此后不久，驻扎在萨布拉和沙提拉的巴勒斯坦难民营周围的以色列军队允许长枪党部队（同情以色列的黎巴嫩天主教民兵组织）进入难民营，并杀死了几百名平民。由此引起的强烈声讨迫使以色列成立了一个专门委员会调查此次暴行，此举意在安抚以色列的朋友，但对消除以色列与其敌人之间的隔阂却没起什么作用。在此次事件之后，紧接着美国派遣海军陆战队再次进入贝鲁特，但在第二年 10 月又一次被迫撤出，原因是一辆满载炸药的卡车开入美国海军陆战队设在贝鲁特的总部实施了一次自杀性袭击，杀死 241 人，另有许多人受伤。此后，国务卿舒尔茨努力斡旋，达成了一项让以色列军队撤出黎巴嫩的协议。然而，随着以军的撤出，黎巴嫩的内部纷争却日渐加剧。让事情变得更复杂的是，刚

刚和苏联达成大宗军火交易的叙利亚拖延从黎巴嫩撤军，并煽动德鲁兹民兵袭击黎巴嫩政府军。如此一来，在新当选总统巴希尔·杰马耶勒被刺后，无论在哪个方面，黎巴嫩政府的稳定性都陷入了严重的危机（Spiegel 1985：421－7）。

如此多的紧张与混乱事件所造成的结果是自相矛盾的。当时美国政策所关心的是努力限制以色列政策对美国在中东地位所造成的损失。结果美国和以色列彼此达成妥协，导致阿拉伯各国异常愤怒。中东冲突似乎越来越无法解决了。

将这种令人不乐观的形势转变到和平解决的途径上来花费了七年的时间。这一过程非常复杂，而且主要与三件事有关：一是约旦河西岸的巴勒斯坦人反抗以色列统治的起义；二是苏联发生剧变；三是1991年海湾战争的影响。

巴勒斯坦人的起义始于1987年，所造成的影响是激发了巴勒斯坦人民要求自治的道义上和政治上的呼声，并将以色列置于国际舆论的法庭之上，因为国际舆论经常在晚间的电视节目中揭露以色列对付起义的野蛮行径。在这种背景下，巴解组织发现放弃对以色列进行武装斗争的历史责任可让自己得到更多的利益，于是重新考虑了自己的政治立场。1988年12月，巴解组织领导人亚西尔·阿拉法特宣布巴解组织的政策实行历史性转变。他在日内瓦的一次演讲中满足了美国为开展与巴解组织的对话而提出的三个条件：承认以色列的生存权、遵守联合国第242号和第338号决议（主要是号召承认该地区所有国家的主权和领土完整）以及放弃恐怖主义。

至于苏联方面，在1988～1989年间，戈尔巴乔夫的立场发生了虽然小却很有意义的变化。苏联在外交政策上坚持戈尔巴乔夫“新思维”基本原则的同时，变得越来越务实，对美国的建议不再持一定反对的态度。戈尔巴乔夫不再像以前那样顽固地同巴解组织站在一起，不大坚持一定要建立一个独立的巴勒斯坦国。他还对美国和巴解开展对话表示欢迎。事实上，苏联对巴解施加压力是巴解最终转变立场的一个重要原因（Golan 1990：274－8）。总之，由戈尔巴乔夫

“新思维”引起的冷战紧张形势的缓解，使人们对中东和世界其他地区事务的固定立场发生了松动。

使中东的政治力量重新组合的第三个因素是巴解组织在海湾战争中支持伊拉克，这是一个在政治上损失巨大的决定。为了重建自己中东主要活动家的信誉，亚西尔·阿拉法特被迫做出让步。“妥协”——1991 年 10 月一家报纸的头条这样描述——“是阿拉法特手中唯一的武器”（*Guardian*, 19 October 1991：10）。那个月的晚些时候在马德里召开的国际会议以及随后在华盛顿和莫斯科召开的会议上，初步形成了解决中东问题的主要原则。与此同时，黎巴嫩的亲伊朗团体所拘留的剩余的西方人质也获得释放。

当然，没有什么能确保取得最后胜利，有很多协商与讨价还价的实际工作是在幕后而不是在公开场合进行的。这个过程多亏有美国国务卿詹姆斯·贝克和其他一些较不为人知的中间人的周到考虑和精心安排。当 1993 年 9 月巴解和以色列最终就相互承认和巴勒斯坦人在约旦河西岸和加沙地带建立自治政府达成协议时，人们才知道在中间起关键作用的是挪威外交部部长。然而，不管中东的和平进程如何缓慢与蹒跚，在上面提到的力量重新组合中所发生的重大转化毕竟为调解提供了比过去 40 年优越得多的条件。所以直到 1993 年年底，以色列和阿拉伯世界的温和派面对这两个阵营中持强烈反对观点的抗拒派仍得以维持和平进程的势头。

里根反对尼加拉瓜桑地诺政权的执着程度，可以和肯尼迪反对古巴卡斯特罗统治的执着程度相媲美。支持尼加拉瓜的反政府武装（桑地诺政府的反对派）对里根而言是个信义问题，是一项不能妥协的义务。里根较为有名的或者说是臭名昭著的言论是将尼加拉瓜反政府武装的“自由战士”比作美国的开国元勋。里根的观点得到了一些主要官员的支持。乔治·舒尔茨记得 1982 年他赴欧洲访问回来后不久偶然遇到中央情报局局长比尔·凯西。当谈到中美洲时，凯西悲叹道：“我们在迄今为止国家所面临的最为重要的外交政策问题上很有可能吃败仗。你不应该去欧洲访问，而应在美国巡回演讲，向人们

发出警告并寻求人们支持在这个最重要的问题上采取强硬措施”（Shultz 1993：285）。口头承诺协商解决，反映了国务卿舒尔兹的影响，而非里根的个人主张。里根政府的行径表明，他们一直是在努力阻碍或避免和平磋商，因为这样做会让桑地诺派依然执政。甚至国会限制对尼加拉瓜反对派的支持的意图也被抛在一边。如同1987年有关伊朗—尼加拉瓜反对派的听证会所显示的，里根当局某些人所实施的是个人外交政策，所追求的目的与美国国会和人民的愿望（根据民意调查显示）相违背。总之，里根的尼加拉瓜政策是极度的冷战思维和美国对有权干涉“自己后院”事务的传统观念的集合体。

里根当局之所以对尼加拉瓜会采取这种政策是因为担心尼加拉瓜会变成又一个古巴。因此，桑地诺政权不仅本身是危险的，而且它还可能为苏联在中美洲进一步拓展影响打开方便之门。尤其令人担忧的是尼加拉瓜支持萨尔瓦多民族解放阵线的暴动。

苏联和古巴给尼加拉瓜提供了多少支援？它对维持桑地诺政权究竟有多大意义？据说苏联给尼加拉瓜提供了大量武器，但对尼加拉瓜索要的米格战斗机等重型武器却给得很少。古巴也是尼加拉瓜武器的重要提供者。桑地诺武装之所以能发动1979年革命，卡斯特罗的军队对他们的训练可谓功不可没。桑解阵革命胜利后，在支援尼加拉瓜方面古巴始终保持着比苏联高的姿态。苏联的经济援助不可小视，但拉美其他国家对尼加拉瓜的援助则更为重要。所有迹象显示，苏联尽管愿意对能够自力更生的尼加拉瓜提供援助，但并没有视其为自己关键利益之所在，所以并不准备像支持古巴一样支持尼加拉瓜。这不仅是因为第二个古巴会给苏联经济带来沉重的负担——对古巴的援助每年花费苏联80亿～100亿美元，还因为里根政府明显决意不允许此种情况发生（LaFeber 1993：292－4；Luers 1986：839－40；Nogee and Donaldson 1988：199－200）。

冷战的结束，尽管没有改变古巴和尼加拉瓜的政权现状，却将它们置于一种新的环境之中。来自苏联的援助减少了，苏联的充分理由是不愿和美国在该地区搞大规模对抗。但这和下面的观点并不冲突，

即苏联的援助依然足够支撑武装动乱。随着冷战的结束，苏联取消了对尼加拉瓜的援助，使得尼加拉瓜国内对桑地诺政权的支持趋于崩溃。在1990年举行的自由公开选举中，桑解阵失败，这大出桑解阵自己和国外观察家的意外。回想起来，苏联对尼加拉瓜的援助在1982～1987年间起了很大的作用。此外，苏联的援助与其对拉美政策进行广泛的重新评估有关。苏联在尼加拉瓜1979年革命中只起了微不足道的作用，鉴于桑解阵革命成功，苏联的决策人在革命问题上越来越倾向于古巴的观点，即强调农村游击队的武装斗争重于城市共产党领导下的政治斗争（苏联自1960年代以来就持这种观点）。一位苏联官员在1982年写道，“尼加拉瓜人民民主革命的胜利是1980年代拉美群众运动中一个巨大的成功……这标志着该大陆的革命斗争进入了一个新阶段”（Luers 1986：831－2，840）。正是在这个框架内苏联于1980年代中期形成了对尼加拉瓜的政策。

然而，这一结论并不能回过头来证明里根关于苏联对尼加拉瓜局势的影响是最主要因素的观点是正确的。这个结论也不能使里根免受下述指控，即他的政府严重破坏了拉美国家在中美地区实施和平计划的愿望。这些计划中最值得一提的是所谓的“孔塔多拉计划”，该计划建议：撤出所有的外部援助，停止对交战双方的武器销售，相关各方举行谈判讨论民族和解问题，该计划还为重建中美洲的经济提出了经济计划。里根当局一开始对该计划表示支持并宣布准备签字，但后来又出尔反尔，对它在中美洲的友邦——哥斯达黎加、洪都拉斯和萨尔瓦多——施加压力，让它们跟着美国走，拒绝签署该计划。第二个“孔塔多拉计划”于1986年也遭到了同样的命运（Smith，W. 1987b：97－8，100－1）。同样重要的是“阿里亚斯计划”的命运。该计划于1987年由哥斯达黎加总统提出，他因此而获得诺贝尔和平奖。该计划和“孔塔多拉计划”大致相同，但增加了要加强国内民主化包括实施选举的建议。中美洲国家包括尼加拉瓜在内都接受该计划，里根政府却坚决反对任何可能会使桑解阵重新执政的建议。不仅如此，苏联当时在戈尔巴乔夫的领导下，也大幅度地削减了对尼加拉瓜的援助

（LaFeber 1993：341-5，340）。最终，在布什当政时期，由于国会一直拒绝给尼加拉瓜反对派提供军事援助，苏联也完全停止了对尼加拉瓜的援助，尼加拉瓜问题才终于在“阿里亚斯计划”框架内得以解决。正如前面所提到的，桑地诺政权在1990年举行的大选中遭到了惨败。

里根的政敌，包括一些史学家和评论家在内，对苏联在尼加拉瓜冲突中的作用不予以重视，原因不仅是觉得有必要对里根的错误观点进行更正，还因为该事件在国内的巨大反响。对美国的中美洲政策的评价离不开对里根政策对国内政治进程影响的判断。无论是过去还是现在都很难对里根的中美洲政策做出适当的评价。里根当局一直在设法绕过国会对援助尼加拉瓜反对派的限制。许多人认为，这种做法是蔑视宪法所规定的国会和总统之间的权力均衡（Draper 1990）。国家安全委员会的官员所玩弄的花招，即和伊朗做军火贸易以求释放人质，并将这笔钱用于资助尼加拉瓜的反对派，是里根政府肆无忌惮违规行为中最明显的例子。此外里根在1986年11月的一次记者招待会上不顾舒尔茨的强烈反对，竟声称对伊朗出售武器是正确的（因为伊朗已经减少了它对恐怖主义的支持），而且他还要“继续这么干”。这一切表明他要么是极端天真，要么是听了错误的汇报，或者两者兼而有之（Shultz 1993：830）。然而，托尔委员会在关于里根“不受约束”的管理作风的报告中所做出的令人诅咒的结论，以及长达数周的关于伊朗与尼加拉瓜反对派问题的公共听证会，使美国公众对里根的做法只是小有微词。里根的个人威望，再加上他似乎和制定政策的细节没有关系，盖过了他的部下所造成的损失。

结　论

关于里根对结束冷战所起的作用将在第十三章中进行讨论。在此仅对他关于外部世界的总态度做个评估。罗纳德·里根坚定地、信心百倍地推行了为数不多的几项大计划。与缓和的设计师们相比，里根对在国际政治中起作用的力量的看法相当单纯。恢复美国的经济和军

事实力及坚信苏联或苏联鼓动的共产主义是世界上绝大部分问题的根源，这两点是里根外交政策的指导思想。里根比二战后的任何一位美国总统（除了里根十分敬佩的杜鲁门）都更坚定地认为当今世界实质上是个两极世界。事实上，在1983年4月的一次为激发人们支持援助尼加拉瓜反对派的演讲中，里根引用了杜鲁门在1947年所做的阐述杜鲁门主义的演说，杜鲁门在其中一段中说，人们必须在“两种生活方式”中做出选择：一种是基于绝大多数人意愿的方式，另一种则是将少数人的意愿强加于大多数人的方式。在引用杜鲁门的“我认为美国的政策应该是支持自由的人们反抗少数人以武力或外部压力强加的奴役”这段话时，里根说这些话在今天和在1947年时一样有价值（Reagan 1985，Ⅰ：604－5）。

从历史的角度评价里根，有一种观点认为他在总统任期内企图贬低富兰克林·罗斯福的内政和外交遗产，并在可能的情况下废除它。在对内政策方面，这意味着改变自新政以来的潮流，实施中央集权和政府职能的扩展。在这个方面不能说他取得了成功，尤其是因为国债高筑，迫使政府不得不花大力气来应付。至于外交政策方面，他的最终目标是推翻雅尔塔协议。而事实上，在里根离开白宫后不到一年，“铁幕”就破碎了。里根的政策对此究竟做了多大贡献，我们将在第十三章中讨论。

第十三章
戈尔巴乔夫与世界新的动乱
（1985 ~ 1991）

引 言

1985 年 3 月米哈伊尔·谢尔盖耶维奇·戈尔巴乔夫上台时，世界总的秩序，尤其是美苏关系没有多少迹象表明要发生革命性变化。虽然戈尔巴乔夫代表着苏联领导的新一代——他是二战之后成长起来的第一任苏共中央总书记，但当时人们的期望总的来说是在苏联传统的老框架之内实行自由化，而不是彻底改革苏维埃制度，更不是背叛这一制度。戈尔巴乔夫发表于 1988 年的《改革》一书已为世人广泛阅读。诚然，这部论著坚定不移地反斯大林，对勃列日涅夫时代的停滞不前也持严厉的批评态度，但它并不反对社会主义。他在书中写道：通过“改革”和“公开性”，“社会主义的理想会获取新的推动力，而这样做的途径是回到列宁的理想，列宁永远活在亿万人民的心中”（Gorbachev 1988：131，25）。

总的来说，西方观察家对戈尔巴乔夫的改革会把苏联引向何方并不比他本人更有先见之明，这也不足为奇。发表于 1988 年的一篇分析苏联经济的文章断言，尽管苏联的国力日衰，并在国内、在东欧都面临许多困难，但它“现在并没有（未来的十年间也不会）经历一场真正的制度危机，因为它还拥有政治和社会稳定这一尚未使用的资

源，这一资源足以使其经得住可预见的最严重的困难”（Dibb 1988：260）。1989 年发表的、由西方一位著名的苏联问题专家撰写的研究报告《俄国与公开性》得出结论说：“人们有理由相信，公开性时代如今已走到头了。不能指望今后会取得多大的进展。”这位专家认为，若果真有更戏剧性的、具有深远历史意义的进展，“那简直会是一个奇迹，因为文化革命不仅涉及一个政治精英集团被另一个政治精英集团所取代，而且涉及整个民族心态的持久而剧烈的变革。这种情况将来某时或许会出现，或作为某一剧烈震荡的产物，或众多微小步骤的最终成果，或随着一代新人走上政治舞台而出现。苏联目前的变革看来似乎并不是历史议程的组成部分”（Laqueur 1989：311）。

此类论述不胜枚举，但列举这些言论的目的并不是对它们未能预见到 1989 年乃至以后的事件而幸灾乐祸，而是指出潜流于地下的事件进程同我们认识它们的能力之间存有巨大的差距。为某类情况设计的认识框架遇到当前谁也无法估计将来怎样发展的情况时则一筹莫展。苏联问题专家长期以来一直在辩论苏维埃制度是否有能力调整自己，即实行一定程度的“多元化”，以适应不断变化的形势，而苏维埃制度中看来最令人百思不得其解的特色就是“其政治制度的高度稳定性”（Cohen 1985：146）。虽然也有人不同意这种观点——其中有兹比格纽·布热津斯基，他的一篇文章挑起了一场激烈的辩论（Brzezinski 1969：1－34，151－63）。但这种“稳定”的信念在勃列日涅夫停滞不前的时代看来仍在加强。1986 年，塞韦伦·比亚列尔发表了一篇颇有分量的研究苏维埃制度的文章。他在文章一开头就写道，“（苏维埃）政权现在看来不会有社会或政治解体的危险，1980 年代后期也不大可能。因此，我们必须研究在后斯大林时代使这一政权稳定而且如今仍在发挥这种作用的那些因素”（Bialer 1986：19）。据说，坚持“苏维埃政权正处在危机之中”观点的人被描绘成“反苏分子”（Goldman 1992：51）。

在第二次世界大战后国际体制这一更为广泛的问题上，需要做出解释的看来仍然是“稳定”。戈尔巴乔夫上台一年后，美国历史学家

约翰·路易斯·加迪斯发表了一篇名曰《长期和平——战后国际体制中的稳定因素》的文章。其基本论点是：冷战体制尽管有种种危险，却已经被证明为出奇的稳定，“至少在时间跨度上可与著名的、至今仍令人留恋的俾斯麦和米特尼奇的19世纪的国际体制”相媲美。他还补充说，“与那些早期的体制不同的是，（冷战体制）在出现40年之后，仍然看不出有解体的迹象”（Gaddis 1986：100）。而造成这种40年无大战局面的是多种因素的共同作用，其中包括结构因素（主要是两极格局与双方核武器的大体均衡）和行为因素（双方都同意遵循诸如尊重彼此的势力范围、避免直接军事对抗之类的“游戏规则”）。加迪斯虽没有对这种体制能持续多久做出预测，但他断言，冷战体制有资格长期存在。

人们对苏联的解体竟然毫无预感，这表现了社会科学的局限性。1989～1991年发生各种事件后，指责社会学家最激烈的正是加迪斯本人（Gaddis 1992/3）。话说回来，革命性的变化，就其本性而言，带有很强的不可预见性。有人曾说过，“人们从来不希望革命发生在自己身上，而只是希望发生在儿孙身上”（Brinton〔1932〕1965：66）。即使回过头来看，也很难看清可以说明革命的种种相关因素，更不能肯定地说我们能准确理解这些因素的相互关系。

对革命起因最恰当的论述或许仍然是德托克维尔的那段话：革命并非出现在独裁体制镇压最残暴、苛政最横行之日，而是发生在它们谋求改革自己之时。意识到自己的弱点（首先是经济方面的）则是谋求改革的原因。为了发动改革并使之合法化，旧体制会对反对派在政治上做出某些让步，从而削弱了自己政权的基础。这种模式或许过于笼统，但它确实是理解戈尔巴乔夫执政时期政策的一个用得着的出发点。

不过，苏联国内事态的发展并不是事情的全部，同样重要的还有苏联与其东欧“外部帝国”以及与整个世界（尤其是美国）的关系。把这三个方面综合起来加以分析，将有助于解读苏联崩溃与冷战结束之间的关系。下面我们就逐一研究。

苏联与共产主义的崩溃

未等尘埃落定，分析学家就开始从苏联历史的深处为“戈尔巴乔夫现象”寻求解释。共产主义的终结和苏联的解体尚未成定局之前，有些人士就已经用长远的历史眼光来观察戈尔巴乔夫执政头两年（从1985年3月算起）所推行的改革了。他们心目中的影像大致是1930年代以来苏联的社会变化，而这种变化并未带来政治制度相应的变革。那时苏联的城市化和经济现代化以前所未有的速度进行，这种进展是政府促成的，但又不完全为政府所控制。社会变化之快超出了国家体制的适应能力。最重要的是：“城市化的进程需要发展科学技术与知识分子阶层”，而政治制度的禁锢又提供不了这种土壤。于是，在陈旧的政治教条和机构的外壳之下，出现了一个平民社会。一位名流极力把它描绘成“一个网络和机构的集合体，或独立于政府之外生存与活动，或是能够就全国或当地的问题形成自发性的独到见解的正式团体”（Lewin 1991：49，80）。鉴于苏联社会内部这种新生力量遭到旧的政治体制和价值观念的反对，显而易见，这就埋下了冲突的种子。

戈尔巴乔夫经常与那个“科学技术与知识分子阶层”对话，也为他们讲话。对那些人来说，“行动的自由、职业的选择和在众多领域享有多项选择”比马克思列宁主义的口号有更实用和更直接的意义。在城市生活紧密而复杂的结构中，这种“个人领域”具有新的重要意义。然而，在“一个强制性的社会大环境”中，成长和自己做主的机会几乎不存在（Lewin 1991：64，65）。直言不讳地说，戈尔巴乔夫的改革就是要把潜在于苏联社会中的创造力从民主集中制几十年铁腕的压制下解放出来。用他自己的话来说（这种话在老一辈的共产党员听来无疑是地地道道的资产阶级言论），“如今我们的主要工作是振奋个人精神，尊重他们的内心世界，赋予他们道德的力量。我们正尽力调动全社会一切知识潜力和文化潜力，用以塑造社会

活跃分子，他们将拥有丰富的精神境界、有正义感、有良心”（Gorbachev 1988：30）。

这种从社会学角度理解戈尔巴乔夫现象回避了某些问题（例如该现象为何在那一特定时期出现），但它确实有助于理解下述事实：苏维埃制度尽管有明显的惰性，但仍然能产生戈尔巴乔夫这样的人物（Lewin 1991：129）。这里涉及一些长期起作用的重要因素，让我们研究一下苏联经济，就能证明这种说法。

戈尔巴乔夫上台时，苏联经济并没有处于崩溃的边缘。1980 年代后期的灾难性衰退乃是戈尔巴乔夫政策的直接结果。不过，如果体制上不存在严重缺陷，崩溃也不会发生，这是显而易见的。这些缺陷有的是苏联指令性计划经济所固有的，其中危害性最大的是中央计划体制毫无灵活性，鼓励生产量而不是生产力的发展，在生产和管理技术上鼓励保守而不是革新。马歇尔·戈德曼写道，苏联的中央计划体制“只有在处理慢速运转的基本技术时”才能发挥最好的作用。一旦技术变革的步伐加快，“苏联的中央计划人员就跟不上日新月异的创新速度了”（Goldman 1992：36）。

一个相关的问题是：在这种经济体制中供求之间不存在任何合理的关系。其部分原因是中央计划体制本身，这种体制把决定经济整个需求的职责完全放在了中央。但它也是中央计划人员最初确定这些需求的特定方式的结果。从斯大林的第一个五年计划开始（1928 年），他着眼于使苏联经济赶上 20 世纪的步伐，便优先发展重工业，而不是发展消费品生产。苏联中央计划人员主要致力于生产资料（煤炭、钢铁、机械）和军事装备的大规模生产，而在这两个领域消费者的需求没有什么分量。

这种努力可以被认为取得了成功，至少在一定程度上是成功的，尽管在人力上付出了巨大的代价。另一个代价是使“优先发展重工业”扎根于苏联的经济思想，产生了弊远大于利的后果。其实早在 1970 年代，计算机和自动化革命席卷西方但绕过苏联（除在军事领域）时，计划经济的积极作用就已经到头了。即使在军事领域，苏

联也发现自己难以与西方并驾齐驱（Dibb 1988：266）。苏联之所以未能对高科技革命做出反应，不完全是由于经济的僵化，还有政治上的原因。即使一台复印机也能对信息的集中控制构成威胁，计算机网络如果掌握在个人甚至企业管理者手中，便有可能把自主权的程度大大提高！

农业在苏联一直是个难题。1930年代的强制集体化造成生产效率低下，也给农民带来许多苦难。作为对策，农民便把尽可能多的力量放在经营合法分到的自留地上。自留地上的生产效率比国营集体农庄要高得多，因为在集体农庄谈不到提高产量的积极性。同苏联经济生活的其他领域一样，农业中的这种“黑经济”长期以来对国家经济起着釜底抽薪的作用。很多农产品（30%，有时甚至高达50%）或损失在分配过程中，或烂在地里，简直骇人听闻。这进一步迫使这个地大物博、完全可以自给自足的国家越来越多地依赖于进口食品（如谷物）（Goldman 1992：50）。

所有这些情况在整个苏联历史中或多或少地始终存在。这样就出现了两个问题：为什么苏联没有早点儿解体？又为什么这些情况偏偏在1980年代成为严重危机？第一个问题的答案一部分在于压制和政治纪律这个传统，它使苏联一个接一个的政府能迫使老百姓做出牺牲，而这种牺牲在更开放的社会里是不能被容忍的。但还有经济上的原因。用戈德曼的话来说，那就是：“由于苏联拥有丰富的资源（主要是石油），它能够掩盖其根本制度上的缺陷。”出口石油换取的硬通货收入被用来掩盖食品和机械生产的不足，从而失去了进行根本改革的动力（Goldman 1992：50－1）。

至于第二个问题，答案是，这是1970年代末1980年代初苏联农业收成不好、某些关键工业部门的产量下降，以及整个经济增长缓慢等因素综合作用的结果，而且这种情况又发生在军费开支递增的时期。自1976年以来，苏联的预算一直有赤字，这种情况直到1988年在“公开性”的压力下才被披露出来（Goldman 1992：63，79，129－30）。经济的停滞不前同时带来公共服务质量和公众道德

下滑，它们的危害性同样不小，戈尔巴乔夫在他发表于1988年的《改革》一书中也强调了这一点。而苏联当局却一直在虚构“没有问题”的假象。实际上，“日复一日的现实世界与虚构的繁荣世界”差别越来越大（Gorbachev 1988：22）。苏联的形象是一个主要依靠军事实力支撑的超级大国，迪普说得好：“是一个不完全的超级大国。”

不过，以上提到的社会和经济状况本身并不能说明共产主义为什么会在苏联崩溃，即使1970年代末1980年代初经济形势的每况愈下，也并不一定导致戈尔巴乔夫执政时期的政治危机，实际上正是戈尔巴乔夫做出的一系列决策才导致了这种结果。我们可以把这些决策分为三类：公开性、政治体制的调整和经济结构的调整。戈尔巴乔夫提出的改革倡议绝非独出心裁，此前苏联已有先例，如1920年代的“新经济政策”和1950年代至1960年代初赫鲁晓夫的改革。戈尔巴乔夫最初的举措也没有什么民主可言，仍然沿用苏联（俄罗斯）传统的自上而下的改革模式。简言之，戈尔巴乔夫上任第一年的措施“与前任领导十分相似”（Medvedev 1988：186）。戈尔巴乔夫领导的重要特色在于他把改革推进到不可逆转的方式，摆脱了人们熟悉的“先实行部分自由化，然后再进行整顿”的循环圈。

人们原以为，戈尔巴乔夫的主要目的是恢复苏联经济，但是其政策最初最明显的，也是最有戏剧性的效果都来自对媒体的松绑。批评政府官员和“自我批评”是苏联生活的老传统，但实际上只能在很小的圈子里进行，比如说，通常限制在《真理报》和其他类似报刊的“读者来信”栏目上，内容则不超出个别官员和机构的具体缺点和玩忽职守，绝不会扩展到对苏维埃制度的批评。尽管戈尔巴乔夫明确表示要比自己的前任给人们更多的自由，但他也并不想把“公开性”作为全面谴责苏联生活的一种提示。用他自己的话说，“公开性”之所以必要，是为了推进社会环境的民主化，推进社会变革和经济变革（Gorbachev 1988：75）。一句话，“公开性”只是一种手段，用来使体制的调整合法化。从这个意义上讲，它是朝着“把公众的认可作为政

府管理的基础”这一主张迈出了一步，尽管只是一小步。然而，已有人指出，自由化“显然不是民主化”（Bova 1991：119）。戈尔巴乔夫的意图显然是想使民众对他的想法表示认可。正如一位观察家所指出的那样，“公开性”并不意味着无限制的言论自由，而只是“有权批评妨碍戈尔巴乔夫改革的绊脚石”（Roxburgh 1991：36）。这在很大程度上将取决于戈尔巴乔夫是否能控制已经扩大了的舆论工具。

以上叙述证实了伴随对媒体和其他文化表达手段逐步放松控制而来的自由的这种特殊含义。批评从人们熟知的戈尔巴乔夫当政之初的那些主题——“揭露管理不当、做假账、挪用公款、行贿受贿和任人唯亲”——很快就扩展到了对共产党本身和高层所享有的特权的抨击（Roxburgh 1991：37）。1987年1月，戈尔巴乔夫在中央全会上发表重要讲话后，“公开性”便扩展到文化领域。1950年代被赫鲁晓夫禁止出版的帕斯捷尔纳克所著《日瓦戈医生》一书，于1987年由苏联一家文学出版社出版；一部据说是描写斯大林主义的虚幻电影《忏悔》于1987年公开放映；可以公开重新审查苏联的历史，开始是试探性的，但最后演变为对苏联历史的全面复审，要求释放政治犯的呼声日益高涨。1986年年底，被流放在西伯利亚的物理学家安德烈·萨哈罗夫被释放，允许他返回莫斯科。这一决定是戈尔巴乔夫自己做出的，显然没有与政治局商量（Roxburgh 1991：45－6，53，59，60－61，63－4）。这一步骤与对苏联法律观念的全面修正是一致的。这种修正导致了法律的“人道主义化”和现代化，最终还首次引进了事先假定被告无辜的原则（White 1990：38）。

有些观察家（如第一个为戈尔巴乔夫写传记的尤里思·麦德维杰夫）把事态的这些发展仅仅看成赫鲁晓夫反斯大林运动的继续，只不过注入了新的活力罢了。麦德维杰夫在一部发表于1988年的著作中写道，“戈尔巴乔夫的态度可谓小心翼翼”（Medvedev 1988：303，300－6）。鉴于后来的事态发展，看来倒是麦德维杰夫的评价过于谨慎了。但他提醒人们，一旦“公开性”迈开步伐，戈尔巴乔夫往往会大大落后于拥护改革的公众舆论。不仅如此，一旦松绑，新

释放出来的公众舆论朝哪个方向走就不一定控制得住了。谁也不能保证自由发表的意见就一定支持改革，1988 年 3 月，《俄罗斯苏维埃报》刊登的一篇忠心捍卫社会主义原则和苏联历史的长篇文章就证明了这一点。由于这家报纸是俄罗斯加盟共和国的官方喉舌，并部分掌握在苏共中央委员会手中，该文被视为政府内部反改革势力的宣言（Roxburgh 1991：84）。

虽然戈尔巴乔夫能够挫败这一破坏改革的企图，但这篇文章的发表仍然说明了一个令人不安的事实："多元化"既释放出政治上可接受的力量，也释放出政治上不可接受的力量，使它们都登上了政治舞台。戈尔巴乔夫早在 1986 年夏天就说过，"公开性"之所以必要，是因为"我们没有反对派，同志们"（Roxburgh 1991：84）。但是，随着"公开性"进程的发展，"反对派"的含义也发生了微妙的变化。起初，戈尔巴乔夫把自己设想为反对派——反对旧政权、反对苏联历史的流毒。然而，他的议程表一旦确立，问题就变成他是否愿意允许别人反对他这个"反对派"了——不管来自想要他走得更快更远的人，还是想要他急刹车甚至走回头路的人。下面我们将会看到，在一定程度上，"公开性"对戈尔巴乔夫的政治改革和经济改革建议都不利。

"公开性"合乎逻辑的结局应该是接受反对共产党的合法性，最终废除苏联宪法中关于共产党"领导作用"的第 6 条。苏联共产党远远超出了西方观念中的政党，它代表着国家政权，渗透进政府的立法和行政各个部门，实际上也渗透到社会生活的各个领域。难怪当初戈尔巴乔夫没有想过要修改宪法第 6 条，因为那将意味着把苏维埃制度连根拔掉，而他的初衷是使社会主义复兴，而不是破坏它。一直到 1990 年 3 月，戈尔巴乔夫才在巨大的压力之下同意废止宪法第 6 条。

戈尔巴乔夫政治改革的初步尝试是更换关键岗位上的官员，但这种做法并没有超出传统的模式。人事变更是巩固政权的必行步骤，但因为戈尔巴乔夫显然打算比他的前任们走得更快更远，以使其改革不可逆转，他最终走到了政治体制的结构改革已成为不可避免的地步。他从未设想把党的机构一扫而光，不管怎么说，保守派对他的改革日

益增长的对抗有些是来自他亲手提拔的人员，如利加乔夫。利加乔夫此时已成为党内反改革运动的领导人。该运动在1988年年初发展到顶峰，其标志就是前面提到的《俄罗斯苏维埃报》刊登的那个长篇文章。戈尔巴乔夫此时只能期望用破坏保守派的组织基础来击败他们，于是就有了他在1988年6月党的十九大上提出的一揽子改革方案。

戈尔巴乔夫的这些改革是最终结束一党统治的重要步骤，不过不是全部。它们的效用主要是开始了一个把党从政府的立法和执行机构中剥离出来的过程。监督政府各部委工作并与之重叠的一大堆党的委员会被撤销。一个名叫“人民代表大会”的新立法机构被赋予选举最高苏维埃的职能，而此时的最高苏维埃不像原来的最高苏维埃那样，而是连续召开会议（Roxburgh 1991：96）。这当然还不能算作完全意义上的议会制度，人民代表大会中，33%的代表是留给党和其他公众组织的。尽管如此，党的作用被大大削弱了，被部分民主化了；而且，职能机构中反对戈尔巴乔夫的势力被大大削弱了，如一位评论家所指出的那样，“这或许不是偶然的”（White 1990：36）。

但是，戈尔巴乔夫对民主化的立场总是模棱两可，这种态度蕴藏着危险。在他推进体制内部民主化的过程中，却将越来越多的权力集中于自身。或许这是不可避免的，它是苏联和俄罗斯独裁统治和自上而下搞改革的传统。也许只有靠发表虚张声势的演说、威胁要辞职与掌握实际上是“独裁”的权力（如1990年新设“总统执行委员会”）才能启动笨拙的苏维埃官僚主义机构的改革，并在启动之后能够控制它的工作。启动自由化的进程并使其向充分的民主发展将会带来中央失控的危险（Bova 1991：118－22）。尽管如此，人们仍然会看出下面这种现象的讽刺意味：戈尔巴乔夫一方面不遗余力地推进民主选举人民代表大会的代表，同时又拒绝把自己交给民众选举。这样做的损失主要是在右派中失去信誉，他们越来越把鲍里斯·叶利钦看作自己的领导人。而左派也愤愤不平，他们认为戈尔巴乔夫成功地利用自己的地位来破坏苏联乃至整个东欧的共产主义事业。从1989年年中往后，苏联的演变过程与东欧共产党垮台的势头密不可分，后面这个问题我们将在下一节讨论。

不管戈尔巴乔夫多么愿意终结苏联在东欧建立的外部帝国，但保存苏联本身的完整则完全是另一码事。对苏联内部加盟共和国以及加盟共和国内部某些民族主义组织要求自治的愿望，他只是时有察觉。在关键时刻，他对这种愿望持公开反对的立场，赞同对民族主义情绪采取高压政策，至少没有制止这种做法。人们经常说，戈尔巴乔夫的最大弱点是他未能认识到“多民族问题”的重大意义。事态的发展表明，这种指责不无道理。

亚美尼亚和阿塞拜疆就纳戈尔诺—卡拉巴赫地区（原为亚美尼亚一部分，但划归了阿塞拜疆，为阿塞拜疆所管辖）的争端于1988年首次爆发。该地区的亚美尼亚人要求从阿塞拜疆分离出去，并入亚美尼亚苏维埃共和国，这激起了阿塞拜疆人的强烈反应。一开始，戈尔巴乔夫对亚美尼亚的困境表示同情，但也仅此而已。实际上，在1988年12月亚美尼亚发生灾难性大地震后戈尔巴乔夫到那里巡视时，他的讲话拉大了自己同亚美尼亚人的距离。当时他说，卡拉巴赫的形势正被“那些不择手段的人、蛊惑人心的政客、冒险家、腐败分子、黑衫党分子……以及权欲熏心的大胡子们”所利用（Roxburgh 1991：123）。戈尔巴乔夫表示站在阿塞拜疆一边时，心中无疑想的是如果亚美尼亚实现自治，将会对数量越来越多的其他要求分治的民族主义组织树立什么样的样板。在把纳戈尔诺—卡拉巴赫地区置于莫斯科直接控制之下的企图失败之后，阿塞拜疆在该地区的控制得到加强，这一问题遂陷入僵局。而到此时，“原来住在阿塞拜疆的亚美尼亚人大多逃离该共和国，而留在亚美尼亚的阿塞拜疆人也所剩无几”（Roxburgh 1991：152）。

格鲁吉亚要求独立的呼声对苏联的中央控制来说或许是个更大的挑战。如果它能实现独立，整个苏维埃联盟的完整就成问题了。1989年4月，格鲁吉亚首府第比利斯发生群众示威游行，有20人被苏军士兵打死。虽然开枪命令发出时戈尔巴乔夫正在休假，而且他对这次暴力事件也深表遗憾，但他同样不愿答应格鲁吉亚完全独立的要求。1989年8月，苏共中央就民族问题制定出一个新的纲领，一方面承

认需要对各加盟共和国加大放权，另一方面又重申苏共的领导地位和民主集中制的原则（White 1990：144－5）。戈尔巴乔夫下定决心坚持上述原则，不让加盟共和国独立。

然而，他的保守派对手认识到，如果没有“公开性”、如果苏共中央的统治没有受到削弱，加盟共和国中的民族主义本来就不会有出头之日。1990 年下半年，保守派向戈尔巴乔夫发起诸多攻击，其中之一就是认为他要为苏维埃联盟看来无可挽回的分崩离析负责。在那年下半年关键的几个月里，戈尔巴乔夫做出了回应。他极力迎合保守派，开始实施一系列新措施，恢复克格勃和军队的大权，强化中央集权，将五年来在某些问题上他一直依赖的自由派顾问打入冷宫。在这次大倒退中首先离去的是爱德华·谢瓦尔德纳泽，他于 1990 年宣布辞职，口中发出了“独裁即将来临”的警告（Beschloss and Talbott 1993：295－6）。

戈尔巴乔夫同时还宣布，将用武力镇压民族主义运动。从 1990 年 3 月立陶宛宣布独立以来，他一直对其实行经济封锁。1991 年 1 月，苏联国防部宣称要向立陶宛和其他实行分裂主义的加盟共和国派出伞兵部队。名义上这是为了强制执行征兵，但从部队对民族主义媒体所采取的行动来看，他们的目标是民族主义。部队袭击维尔纽斯电视台并造成 13 人死亡，戈尔巴乔夫坚持说，这不是他下的命令，但他在此前几个月的言论显然是鼓励而不是制止这种行动。几天之后，拉脱维亚又发生了同样的事件（Sixsmith 1991：97－101）。

上述事件构成 1991 年 8 月反戈尔巴乔夫政变的背景。如果说戈尔巴乔夫始终不能使自由派相信他是真正的改革家，那么他同样也不能使保守派相信苏联在他控制下是安全的。1990 年他实际上已经背弃了改革派，而 1991 年他又摇摆到改革派一边。“8 月政变”的直接原因是即将签订一个新的“联盟条约”，它将使组成苏联的 15 个加盟共和国享有很大的自治权。这在保守派看来无异于苏联自行解体（Sixsmith 1991：Ch. 3）。

戈尔巴乔夫左右摇摆的结果是他在 1991 年遭受了来自两方面的

打击，先是保守派，后是自由派。第一次打击就是那场政变。政变失败了，但他在自由派中的地位并未因此得到加强，而恰恰相反。倒不是他们怀疑他本人卷入政变，看来这不太可能，尽管对戈尔巴乔夫久怀不满的那些人很容易这样指责他（Sirsmith 1991：ch. 9）。真正的原因看来是他对强硬派的姑息迁就导致了政变的发生。的确，政变的主要策划者中有些保守派分子是戈尔巴乔夫提拔任命的，包括国防部部长德米特里·亚佐夫、内务部部长鲍里斯·普戈和副总统根纳季·亚纳耶夫，后两人是1990年12月才被任命的。政变的主要策划者中还有军队的代表，他们对戈尔巴乔夫决定从阿富汗撤军，并于1988年12月宣布单方面裁减苏联常规部队早就心怀不满（Sixsmith 1991：Ch. 5）。而且，政变过后，戈尔巴乔夫看来并未意识到一切都已改变这一事实。在回到莫斯科当天举行的记者招待会上，他仍然为共产党辩护，这显然与鲍里斯·叶利钦与政变策划者勇敢抗争的气氛极不协调（Sixsmith 1991：125）。随政变流产而来的就是苏联本身的最终瓦解。

如果说受事态发展压力的推动，戈尔巴乔夫最终尚能把政治改革推行下去，使旧体制解体，但他却未能把苏联推入重建阶段。他的努力只是一种破坏而不是重建的行为。这也并不为奇。因为戈尔巴乔夫自己生长在苏联的过去，更重要的是重建苏联政治的条件尚不具备，那需要在所需机构的类别上、在向民主过渡的速度和方向上、在各加盟共和国与民族主义组织在联盟中的地位等问题上达成某种共识。而当时在这些重大问题上没有形成共识。确实，“公开性”和“民主化”的作用就是培养多样性和差异性，而不是建立共识！不过，最重要的是，共识最有可能产生于成功，至少出自“改革最终必将成功”的许诺。然而在苏联，改革的直接结果是混乱，又以经济为甚。如果说经济崩溃本身还不是共产主义垮台的原因，那么政治崩溃则暴露了苏联经济固有的弱点并加速了经济的滑坡。这是因为，正如乔治·肖普林所指出的那样，“苏维埃体制的中心在于：它强行建设一种完全由政治决定的未来，其他一切领域——经济、社会、法律、美学、宗教，等等——都在意识形态决定的目标之下，不论是否适宜，

必须服从政治标准”（Schöpflin 1990：4）。如果去掉政治上的理由，经济就失去了它赖以运转的法则和依据。

不管怎么说，戈尔巴乔夫的初衷是提高苏联经济体制的效率，而不是使其解体。理顺中央计划与制止私人贸易是他改革的最初成果（Goldman 1992：89－90）。同他继续前任安德罗波夫的政策，开展严格的禁酒运动一样，这些措施从严格的经济角度来看成效甚微，并不能满足“改革”和“公开性”所激发出来的要求实施更激进改革的呼声。实际上，戒酒运动使大部分工人离心离德，人们被迫去进行家庭酿酒，结果又导致白糖奇缺，又由于官方制裁酒的销售，政府的税收损失了大量卢布。1988年，销售伏特加酒的禁令有所松动（White 1990：204－5）。

1987年颁布法律，宣布私人农业和合作企业合法化，真正的经济改革就此开始了。虽然这些措施还附有种种限制，此类组织比起中国的类似改革来也发展缓慢，但总算在摆脱共产主义传统束缚方面迈出了一大步（Goldman 1992：118－20）。

不过，影响更深远的是“企业法”的颁布，因为它关系到苏联经济的主体——国有企业。该法于1988年1月生效，旨在把决策权从中央各部委下放到企业本身。这并不是私有化措施，因为国有制没有变，而且国家仍然是企业产品的主要买主。企业主真正得到的权利是可以把一定比例——15%左右——的产品卖给任何买主。经理们对工资也有了更大的控制权（Goldman 1992：118－20）。总之，同戈尔巴乔夫提出的许多其他政策一样，这一举措意在跨越计划经济与市场经济之间的鸿沟，后者将激发经营者创新，生产出高质量的产品。

同样不甚明了的还有使苏联经济向外资开放的试探性的起步。这方面改革的关键步骤是1987年1月颁布的《合资企业法》。开始它规定外资的所有权不能超过49%，但在1990年又修订该法，允许外资的所有权达到100%。这一步的潜在意义十分深远，正如一位观察家所说“具有爆炸性”（Hough 1988：66）。苏联的“保护主义”历来都不仅仅是一个政策选择，而一直是面对一个虎视眈眈的资本主义世界如何坚持共产主义的原则问题。虽然苏联同西方一直有贸易往

来，而且从1970年代初起就呈递增趋势，但这种贸易始终在国家外贸部的严格控制之下，而且主要限于苏方出售石油和其他自然资源。允许合资就意味着废除部委的垄断性控制，以便使苏联企业同外国投资商直接建立起更为灵活的关系。它还意味着苏联经济对外国经济的运作方式（包括投资方把利润拨回本国的做法）开放，并同其他国家直接进行经济竞争，最终它会要求卢布成为可兑换的货币。所有这些同计划经济都是格格不入的（Hough 1988：66－72）。

合资企业同样发展缓慢，部分原因是苏联的官僚主义制度对西方投资者来说是道关卡，另一个原因是一旦合资企业有望成功，当局就手痒起来，拼命征税，结果企业利润下降，扩大生产的兴趣全无。"麦当劳"在莫斯科的遭遇就是一例（Goldman 1992：165－9）。

同国内经济政策一样，戈尔巴乔夫在对外经济关系上也是只走到破坏旧体制的地步，他没有能够为经济管理的新模式打下坚实的基础。这部分地要归咎于该问题固有的难度。苏联从事的是一场前所未有的摆脱计划经济的试验，而对资本主义市场经济，戈尔巴乔夫只能"以其昏昏，使人昭昭"，结果可想而知。众所周知，他对"私有财产"之类的概念深恶痛绝，这足以表明他在放弃共产主义方面不准备走多远。

其结果，至少在短期内，是经济的混乱，甚至可能是共产主义世界和资本主义世界最严重的混乱。苏联本身在1991年"8月政变"后的解体加重了这种转折期的痛苦。一方面中央计划体制被中止，另一方面又没有建立起市场体系取而代之，物价飞涨（有些是政府高额补贴废除后的必然结果，有些则反映出"市场"究竟意味着什么），物品日益短缺（包括必用品和非必用品），通货膨胀失去控制，人们对向市场经济转变的速度看法不一。所有这些现象表明，1987～1991年间的苏联经济乱作一团。如马歇尔·戈德曼所指出：在一个生产者已做好准备、单等市场条件成熟的国度，"休克疗法"（向市场资本主义的骤然转变）或许行得通（Goldman 1992：253）。苏联不是这种情况。苏联的工业总是根据国家的指令和时间表来进行生产的，而且在资金、

投资、信贷、预算和货币等方面也不存在必要的控制手段。

然而，戈尔巴乔夫当时以及叶利钦后来面临经济决策困难的根本原因是政治问题。政治上的可能性决定着经济改革的限度。无论经济方面有什么理由，政治上的谨小慎微决定了行动上的小心翼翼。在实践中，行动上的小心翼翼意味着左右逢源：一方面试图满足改革的愿望；另一方面又怕得罪反对改革的人。在这种相互矛盾的形势下，怎么能期待政策的一致性呢！不过，戈尔巴乔夫的国内政策倒有一个大致是共性的主题，那就是一种信念，即任何依靠暴力或压迫来维持生存的制度都不值得维护。这种信念最终决定了苏联共产主义的灭亡。他把这种原则运用于东欧，东欧集团就出现了类似的结果。实际上，除一两个国家外，全世界的共产主义莫不如此。

东欧的革命

历史学家往往把重大事件的前兆和预测罗列起来，以便对事件进行解释。例如，人们可以指出从 1945 年以来东欧不满苏联统治的种种迹象，以表明 1989 年出现的危机实非一日之寒。诚然，注意到东方集团从苏联强行控制以来不时出现的关系紧张自然很有必要，但 1989 年共产主义崩溃来势如此之凶猛，使人一下子难以理解，任何解释都苍白无力。其速度之快、范围之广，对政治变革的现有理论都是一种挑战。它对东西方关系带来巨大影响，只此一举，“冷战”观念就成了多余的东西。

这些事件引人注目的表现不只是共产主义作为意识形态的崩溃，在东欧人民——如果还不是政府——心目中，共产主义意识形态早已流于形式。同样重要的是：苏联也不再愿意使用自己的国力来制止东欧事态的发展。没有战争的压力就如此陡然放弃皇权，实为罕见。由于苏联在东欧的霸权地位乃是冷战的根源、由于欧洲的分裂很大程度上决定了东西方关系，这种分裂的终结自然是具有世界意义的事件。

尽管如此，此前四十年间东方集团内部的冲突仍然是导致 1989

年革命的重要原因之一，这样说或许有使历史归于平淡之嫌。导致共产主义崩溃的原动力从1950年代中期以来就一直存在，也可以说是这个集团从形成之日就有的。1947～1953年东欧的斯大林化就是把一种异国文化和异国意识形态强加于这些国家，而这些国家不仅各不相同，而且在政治思想、文化联系和贸易往来上往往更倾向于西方而不是东方（Brzezinski 1989：105；Gati 1990：3－6）。即使是1940年代后期分管意识形态的波共书记雅各布·贝尔曼那样亲苏的东欧领导人也回忆说：斯大林化猖獗之时，波兰领导人试图尽量“减轻”其最坏的影响，“那时我们知道斯大林化是不可避免的，但我们努力使其带上欧洲的特色。这是一种尝试，试图保卫……我们与西欧的文化联系……在任何情况下都不让自己封闭在世界的某一部分”（Dawisha 1990：18－19）。

赫鲁晓夫的自由化运动是在不牺牲东方集团的政治和军事完整性的前提下容忍民族主义的压力。查尔斯·加蒂写道，斯大林之后的苏联领导在寻求“霸权主义旧习与正慢慢兴起的务实灵活性相结合的中间立场”（Gati 1990：35）。霸权主义的旧习决定了对1956年匈牙利和1968年捷克斯洛伐克的反叛进行镇压，而务实的灵活性则决定了对南斯拉夫闹独立性、罗马尼亚的若即若离以及阿尔巴尼亚转而与中国结盟表现出勉强的容忍。它同时也意味着承认民族的传统力量，包括波兰的天主教教会和匈牙利比较自由的经济与社会政策（Dawisha 1990：166－7，176）。

这种政策所带来的微妙平衡或许以波兰为例能得到最好的说明。波兰在东欧国家中既是反对苏联最强烈的国家，又是在安全方面对苏联最敏感的国家。波兰在1956年所以没有受到苏联的直接干涉，是因为他们选出了一位新领导人——瓦·哥穆尔卡，他能不靠苏联的帮助而“管理”好国家。然而哥穆尔卡绝不是苏联的走狗。他推行的自由化政策——包括废除农业集体化——引起了苏联人很深的疑虑。不过，只要不影响波兰在华沙条约中的作用，苏联对波兰国内政策某种程度的“修正主义”尚可容忍。苏波关系一直相当紧张。

1980～1981年出现的类似形势导致了类似的后果，至少在开始是这样。团结工会成立于1980年造船工人罢工期间，很快就获得了独立于共产党和国家机构之外的准政党地位，其成员占全国总人口的三分之一以上。1981年12月下旬，团结工会要求就与苏联的军事关系和一党制原则进行全民公决。苏联领导对此惊恐万分，本想直接出兵干涉，却发现一位波兰领导人雅鲁泽尔斯基准备自己实施镇压（Gati 1990：52－5）。雅鲁泽尔斯基实行军事管制、宣布团结工会非法之后，其地位得到巩固，因而苏联允许在一定的范围内推行一种"波兰式的"解决办法。

但是，1981年与1956年的形势有三点重要区别，这些区别有助于解释波兰及整个东欧以后的事态变化。第一是经济问题，它导致了团结工会的兴起，更是1970年代后期以来整个东方集团不断加剧的经济总危机的一个组成部分。工农业生产的滑坡——部分原因是上面论述苏联经济时曾提到的那些问题，部分原因则来自外部（如全球石油涨价）——导致东欧国家的经济出现负增长或接近负增长。增加进口的必要性——而这只能靠贷款来支持——使这些国家对西方银行负债累累，背上沉重的包袱（Dawisha 1990：169－73）。与此相反，在1950年代，尽管起点很低，东欧国家的经济却一直呈上升趋势。如此说来，经济滑坡如果算不上1989年政治危机的重要原因，至少也起了重要的促进作用。

第二，与斯大林之后的解冻时期相比，政见不一在1980年代更加司空见惯了。尽管团结工会已被打成非法组织，它仍然是一支强大的地下力量，是对抗雅鲁泽尔斯基政权的核心。此外，天主教打着团结工会的改革旗号成长起来，继续团结工会未竟的事业（Dawisha 1990：167－8）。雅鲁泽尔斯基一方面准备镇压反对其政权的公众游行，另一方面又容忍非法地下出版物在波兰广为传播。不过他对现实的让步并没有加强其统治的合法性。恰恰相反，他努力满足日益不满的波兰人民的要求只能使解除对团结工会的禁令成为刻不容缓的问题。

除波兰以外，捷克斯洛伐克持不同政见的知识分子成立了“77—宪章”，以监督执行《赫尔辛基最后条件》中关于人权的规定，它对当局不断提出挑战。同苏联的类似组织一样，“77—宪章”也受到严厉镇压。但是，由于西方人把这些组织同苏联和其他东欧国家已签署的条约联系起来了，使东欧各国当局非常难办，因为对这些组织实施高压具有很大的风险性。戈尔巴乔夫上台后，这些组织成了他改革的支撑点。而最为重要的或许是：团结工会和“77—宪章”都为1989年年底成立的新政府提供了关键的人选，其中最有名的自然是波兰的莱赫·瓦文萨和捷克斯洛伐克的瓦茨拉夫·哈维尔。后者作为“77—宪章”领导人之一，曾被监禁多年，后来在1989年又作为“公民论坛”的领导人东山再起。“公民论坛”这个组织推动捷克斯洛伐克过渡到了民主政体。总之，在1980年代的形势下，持不同政见者又死灰复燃。

与第二点紧密相连的最后一点是，1985年戈尔巴乔夫上台后在苏联搞“公开性”和“改革”，破坏了东欧国家旧政权的合法性，对那里的反对派是个公开的巨大的鼓舞。在波兰和匈牙利，“公开性”比在苏联和东欧其他国家走得更快更远。到1988年中期，两国已接近失控的状态，共产主义只剩下个空壳。波兰和匈牙利的变革得以进行的关键因素是苏联1988年做出的关于不干涉、不扶植东欧国家不得人心政权的决定（Dawisha 1990：208）。它意味着勃列日涅夫“有限主权论”的终结，意味着真正允许“走不同的社会主义道路”（据说戈尔巴乔夫认为某种形式的社会主义将在东欧继续存在）。

作为莫斯科与东欧国家关系已发生变化的标志是，1988年9月，苏联取消了苏共中央专设的“社会主义国家共产党和工人党联络部”，其职能由“国际部”接管。这就是说与东欧国家的关系如今已是“外交”关系了。

戈尔巴乔夫为何做出这种决定？众说纷纭。一种说法是他相信共产主义很得民心、能以某种形式存在下去；另一种说法是他只想精简军事机构以节约开支；第三种说法是他像某些人所认为的那样，想把

罗马尼亚、保加利亚、民主德国和捷克斯洛伐克这些国家反对改革的领导人推下水，让他们要么学会游泳，要么淹死——最好是淹死（Gati 1990：163）；还有种说法是他仅仅是怀疑苏联是否还有能力迫使这些国家的领导臣服。

毫无疑问，上述每一条理由都起了一定作用，但如果我们把戈尔巴乔夫的决策放在更大的背景下来观察，我们很可能会发现，坚持勃列日涅夫主义将会使人们对戈尔巴乔夫在国内外政策上试图做的每一件事都产生怀疑。既然他把自己的领导建基于在国内实施改革的原则与重新定义“社会主义”的工作上，又怎么能够把共产主义的教条强加于别国呢？如果不允许东欧人民有发言权，苏联国内的民主化又有什么信誉可言呢？再说，戈尔巴乔夫在其论著《改革》一书中和在东欧以及其他地方的演说中都曾大谈“欧洲大家庭”的思想。“我越来越深切地感到”，他写道，“集团与集团之间的对抗是人为的、是暂时的，‘铁幕’的概念已经过时”（Gorbachev 1988：194）。即使在此阶段，戈尔巴乔夫仍然不愿意考虑完全取消东西方社会制度上的差别。尽管如此，他的“泛欧洲”的提法也使他完全不可能重复苏联1968年对捷克斯洛伐克的做法。

外交政策对重新实行勃列日涅夫主义也明显是个限制。这个问题在下一节将详加讨论，这里只挑明一点即可：早在1986年11月，苏共中央政治局就通过决议从阿富汗撤军，这是认识到这场战争打不赢，而且国内负担过重的结果（*Washington Post*，16 November 1992：1）。如今苏联领导人不可能实施代价无疑更高的对外干涉。此外，大约与此同时，苏联领导已经宣布对军事思想进行根本性的修正，提出了“合理够用”的原则，1987年12月苏联签署中导条约就是这一思想的体现。随后在1988年，苏联表示准备在欧洲进行不对等的常规力量裁减。当时一位观察家写道，苏联“大胆决定把计划建基在下述假定上：世界大战可以通过政治手段加以避免，因此欧洲不再是苏美安全考虑的核心”（McGwire 1989：15）。或许换一种说法更恰当，即考虑到戈尔巴乔夫上任以来苏联战略重点的转移，对东欧事务

不予干涉与其说是深思熟虑的决策，不如说是无能为力之举。

一旦东欧共产党领导获悉他们不能再指望苏联的帮助来维持政权，自然会采取一系列步骤来保卫自己的权力，并且取得了不同程度的成功。在波兰，雅鲁泽尔斯基屈从于公众的压力，于1989年1月取消了对团结工会的禁令。随后他再次让步，同意在6月举行全民选举，不过仍保留共产党控制立法的议会下院的权利。在实际选举——四十多年来东欧的第一次自由选举——中，团结工会的候选人赢得上院几乎所有的席位（只有一席旁落），共产党则颗粒无收（Gati 1990：167）。更令人震惊的是戈尔巴乔夫直接干预了1989年8月波兰共产党与团结工会之间的谈判，当时由于共产党拼命想组织政府，谈判陷入僵局。在戈尔巴乔夫的督促下，共产党参加了团结工会领导的政府（Dawisha 1990：155）。

1988年5月，卡达尔·亚诺什被免去党主席的职务，这在匈牙利共产党内外引起了一场激烈的辩论，到1989年2月，导致共产党失去领导地位的政治团体获得合法地位。同年春夏，匈牙利政府的权威日见削弱，它为提高威望所制定的每一个措施结果都适得其反。最显而易见的例子是1989年5月取消匈牙利和奥地利间的安全防护带。或许可以说，此举是1989年秋天东欧共产主义垮台的直接导火线。那年9月，匈牙利当局允许几千名东德游客越过边界到西德去（Gati 1990：167－75）。这些人用自己的脚投票表明——如果还需要证明的话——“铁幕”是用来禁锢人民于国内，而不是像共产党当局反复声称的那样，是防止外部资本主义的。

接下来如同识破魔术师的戏法一样，幻想突然而有决定意义地破灭了。不过这其中毕竟没有魔术，只有一双灵巧的手和看似真实的动作。东德当局企图用埃贡·克伦茨换下埃里希·昂纳克来保住这个幻想，这显然是10月第一周戈尔巴乔夫来访时表示同意或施加压力的结果。东德的这种做法沿用了苏维埃制度的老传统，即“尽量避免重新分权所带来的高昂的政治代价，改换领导人而不改变政策”。这一招头一年在匈牙利已经试过，卡达尔·亚诺什被换掉；同年在捷克

斯洛伐克也上演过，用雅克什代替胡萨克；1989 年 11 月在保加利亚又重演——托多尔·日夫科夫离职退休（Schöpflin 1990：7）。

事后证明，这些措施不过是权宜之计。东德和其他东欧国家受到的压力是要求抛弃共产主义，其中以捷克斯洛伐克为最甚。那里的政府在 11 月曾企图镇压群众的示威游行，抗拒不可避免的结局的到来。苏联再次施加压力，不让他们用武力镇压示威游行，结果，12 月政府垮台。不到一个星期，一位名叫瓦茨拉夫·哈维尔的持不同政见者当选为捷克斯洛伐克共和国的临时总统。只有在罗马尼亚，这场变革采取了暴力形式。其原因可能是齐奥塞斯库的独裁特别专横、特别严厉，再就是他不理会莫斯科的施压。12 月，经过一场短暂而血腥的内战之后，齐奥塞斯库夫妇被搜捕到，随即被处决。

变革成什么样子呢？东德是个特例。这个政权完全由苏联一手包办，是否合法一直是个问题。1989 年 11 月柏林墙一倒，德国重新统一的问题就提上议程，无论戈尔巴乔夫还有西方许多观察家开始对此多么不以为然，但实际情况是，在东德人民和西德政府的共同推动下，事态自然而然地向这一方向发展。戈尔巴乔夫只能顺水推舟，在 1990 年年初参与谈判。有人曾经说过，“如果说冷战结束在某一特定时刻，那或许就是……戈尔巴乔夫（1990 年 7 月）同意德国在北约的框架内实现统一之时”（Beschloss and Talbott 1993：238）。

尽管东德融入西德后可能出现社会和经济困难，但从长远看形势是乐观的。不过，这样的解决办法对其他前“人民民主国家”不适用。他们想要什么很明确，但如何达到这个目的就不那么明确了。看到名目繁多的政治组织和运动在东欧兴起，一位名叫加顿·阿什的英国观察家于 1990 年 2 月指出：

> 如果你听一听这些不同政党在政治、经济、法律和国际关系这些原则问题上说些什么，你就会发现它们在根本上出奇地一致。在政治方面，它们都在讲，没有什么“社会主义民主”，只有民主。而民主对他们意味着多党制，就如同当今西欧、北欧和

> 南欧实行的那种议会民主。它们都在说没有什么“社会主义法律”，只有法律。而法律对它们意味着法制，它为宪法规定的立法独立所保障。
>
> （Garton Ash 1990：21）

把这些愿望变为现实是一项极其艰巨的任务。共产主义的硬壳一旦去掉，自由得以释放，具有破坏性的社会和种族冲突便随之而来，使此项工作尤为艰难。在南斯拉夫，自1980年铁托去世后，共产主义慢慢消亡，国家陷入一连串内战，1989年后四分五裂。到1992年年底，捷克与斯洛伐克和平地一分为二。波兰、匈牙利、保加利亚、罗马尼亚和阿尔巴尼亚（该国共产党的领导比其他几个国家多坚持了几个月）都面临可怕的经济问题，其状况与苏联不相上下。

共产主义的崩溃，不可能用单一的理由来解释，但崩溃的方式表明，它的意识形态和体制结构固有的僵化使其缺乏适应形势变化的能力。武力——更确切地说是武力的威胁——使它坚持了下来。一旦这种威胁消失，东欧社会一直存在的要求变革的因素就会充分表现出来。导致共产主义崩溃还有一个重要原因，那就是东欧人民明显与共产主义离心离德而渴望自由。

到目前为止，我们一直在集中分析导致共产主义崩溃的内部压力，其实这些内部因素同国际环境的因素是互动的。下面我们就谈谈外部因素。

美国、苏联与冷战的终结

探究冷战结束的原因时，有人会把美国政策的作用列在首位。持这种观点的人认为，里根总统摒弃“缓和”，决心“重振美国”，这就为乔治·布什在任期间戏剧性的表演打下了基础。更具体地说，里根在1980年代前五年的扩充军备，尤其是他对“战略防御计划”的

执着，迫使苏联要么因拼命同美国并驾齐驱而破产，要么争取和解。戈尔巴乔夫选择了后一种做法，以便集中精力和资源用于国内调整，尽管后来证明这不足以修补创伤。总之，在苏联历史上这一关键时刻，美国的精神和物质力量使力量对比朝有利于其的方向转化。

美国国内对这个问题的讨论不可避免地带有浓厚的政党色彩。实际上，正是它作为1992年美国总统大选的热门问题出现才引起乔治·凯南在《纽约时报》上发表文章，题为《是共和党赢得了冷战吗？荒唐之至!》，凯南对这种历史性的说法及其所反映的情绪都提出了质问：

> 说美国哪届政府对地球另一个大国的内部政治大动乱进程有能力施加决定性的影响，那简直是幼稚之谈。任何大国对另一大国的内部发展都没有这样大的影响力……任何人——任何国家、任何政党、任何个人——都没有“赢得”冷战。冷战是一种长期的、代价昂贵的政治较量，是由双方对对方的意图和力量的不实际和夸大的估计而促成的……这种冲突如今已正式终结自然是件值得庆幸之事，但人们也应该冷静地思考一下自己在它的产生和持续中曾起过什么作用。硬把它的终结说成某个人的伟大胜利是不合时宜的，把它归功于美国的某个政党更不恰当。
>
> （Kennan 1992：A21）

作为对凯南的回答，曾任里根政府苏联事务顾问、哈佛大学历史教授的理查德·派普斯问道，为什么要否认布什“认识到在他任期发生的这一喜事”呢？他对凯南“一个国家没有能力对另一个国家的内部发展起决定性的影响”这一观点表示质疑。他认为，凯南自己的遏制理论基于下述假定：遏制会“鼓励苏联从内部爆炸”（Pipes 1992：A28）。

从本章以上几节的论述中可以明显看出，凯南强调共产主义崩溃的内因大体是正确的。不过，凯南和派普斯都有些各持一端。他们“要么这样，要么那样”的论点忽略了苏联内部的变化和1980年代

整个国际环境之间极其重要的互动作用。对苏联起作用的外部因素不只是里根和布什两届政府的特定政策（当然，它们也起到了一定作用，这点我们下面将会论及）；同样重要的还有苏联阵营与非共产主义世界之间力量对比的变化所带来的更广泛的影响。这后一种影响既涉及经济衰退方面，也涉及非物质方面，如西方文化对苏联阵营内部的吸引力。

谈到经济方面，在1980年代后期，人们往往都把注意力集中在美国经济的相对衰退上，紧随1987年秋季华尔街股市大暴跌之后保罗·肯尼迪发表的《大国的兴衰》就是这样。但是，从东西方比较来看，苏联的经济衰退可说是更为重要，因为它发生在世界经济体系（尤其在贸易方面）总体增长的大背景之下。苏联在世界产业和世界贸易中的份额在1970年代呈下降趋势（Kennedy 1988：430－2；Brzezinski 1989：35－6）。而且，它的出现是在缓和政策带来东西方贸易量增长之时。这种一升一降的原因之一，是贸易发展最快的是亚洲新兴工业化国家，而不是东欧集团；另一个原因是东西方贸易大都是单向的，在东西方贸易所有类别中（苏联石油除外），东欧集团的出口下降而进口增加，这种逆差靠从西方借贷弥补，结果在1970年代这些国家欠下了西方巨额债务（Van der Wee：1987：398－9）。自给自足有其局限性，而克服这种局限性的努力又往往会削弱而不是增强东方集团承受内外压力的能力。实际上，苏联在同资本主义世界的关系中扮演了一个相当于发展中国家的角色——原料的供应者和日益增长的债务的牺牲品。苏联外长爱德华·谢瓦尔德纳泽在1990年春提出问题："作为这个星球上婴儿死亡率差不多最高的国家，我们有什么值得骄傲的呢"（Oberdorfer 1992：438）。实际上，在1980年代中期，苏联在这方面的世界排位是第50位，不过这也够可怜的了（See Oberdorfer 1992：214）。

具有讽刺意味的是，苏联对社会主义经济活力——特别是增长能力——的看法逐步改变，最明显地体现在它对发展中国家的经济评估上。1980年代初，苏联许多经济学家已经开始放弃那种传统观点，

即接受西方投资的发展中国家不可避免地会成为半殖民地附属国。如杰里·霍夫所指出，许多学者甚至声称，“这些国家融入世界经济会带来比自给自足和走社会主义道路更大的增长率”（Hough 1988：58）。按照列宁主义原则，这种观点是彻头彻尾的异端邪说。然而从许多发展中国家1970年代中期以来经济发展的实际情况来看，它还是很有道理的。亚洲、非洲和拉丁美洲的共产党国家或“走社会主义道路”的国家确实经历了严重的社会和经济衰退（Brzezinski 1989：213－24）。相反，发展最快的是接受资本主义和实行现代化的国家，其中最令人瞩目的是环太平洋的几个新兴工业化（或新独立）国家和地区——中国台湾、中国香港、新加坡、韩国、马来西亚和印度尼西亚。

同样的测试应适用于发达的社会主义国家，这种说法从纯经济学角度来看不足为奇，但从政治角度看却站不住脚，尽管到1983年或1984年有些经济学家在评论发展中国家时似乎有此倾向。他们如今又反对自给自足（哪怕是间接的）而主张苏联集团逐步融入世界经济体系。在某位专家看来，这一事实表明，某些高级官员接受了他们的观点（Hough 1988：59）。

能做出这种比较对共产主义信仰来说具有很强的颠覆性，苏联集团国家通过电视、广播、旅游和流行音乐越来越多地接触到西方文化（例如西德的电视节目在东德和捷克斯洛伐克被广为收看），也起到了这种作用。从1970年代后期起，“自由欧洲电台”曾在前往西方旅游的东欧人中间做过民意调查，结果表明，对某种形式的西方民主的支持远远超过对共产主义的信仰（Halliday 1990a：19；Brzezinski 1989：138）。这种证据的意义虽然很难衡量，但没有理由怀疑它的大体可靠性，单是从1989年东欧人民喜获解放后的行动中就足以得到证明。认识到处于相对弱势最终推翻了马克思列宁主义一条最根本的定理：苏联共产主义代表未来。从某种意义上说，它也等于证实了托洛茨基的信念，即在资本主义的汪洋大海中，一个共产主义小岛终究会被淹没的。

以事态的这种发展为背景，里根和戈尔巴乔夫就核武器开始谈

判，并于1987年12月达成两大国之间的第一个削减军备的协议——中导条约，后来又产生了关于战略核武器以及常规武器的更广泛的协议。我们在第十二章已经看到，两个超级大国关系中这一重大转折的某些必要的基础工作，实际上在戈尔巴乔夫1985年3月上台之前就已经完成了。

尽管如此，也不宜夸大美苏关系的变化速度。特别需要指出的是：在两国谈判过程中，美方对戈尔巴乔夫动机的怀疑一直到1989年秋才消除。里根的军控顾问保罗·尼采在签署中导条约整整一周年后的1988年12月写道，军控的目的是稳定，但“削减军备本身并不一定有利”。他还说：“我们必须永远牢记，我们的安全政策必须以苏联的实力为依据，而不能以心里希望的或口头表达的意愿为依据。迄今为止，没有证据表明苏联的军事实力有所改变。”而且，他又补充道，“对某些人呼吁‘帮助戈尔巴乔夫摆脱困境’，我们应该置之不理”（Nitze 1988：4，6）。即将上任的布什总统似乎同意这种观点。他任命的国务卿詹姆士·贝克利用其首次外交政策讲话（就在布什就职仪式之前）“发出了放慢与苏联修好步伐的信号”（*Guardian*，18 January 1989：8）。国防部部长切尼对戈尔巴乔夫疑心更重。他在1989年5月指出，这位苏联领导人很可能改革失败，被强硬派取代（*Guardian*，3 May 1989：26）。尽管布什和贝克急忙表态与切尼的说法保持距离，后者的言论仍代表美国相当一部分公众舆论。以上事实意味着，虽然中导条约取得成功，但从1985年至1989年秋，美苏关系仍带有冷战的某些基本特点，至少在美方是这样。

布什当选之后，一直到1989年9月才恢复军控谈判。此时东欧已陷入混乱，几个月后，东西方关系的整个结构完全改变：华约迅速瓦解，德国重新统一在望，东欧国家要求苏联军队从它们的国家撤出。到1990年3月，西方一位军备专家指出，“鉴于自身在国内的地位每况愈下，戈尔巴乔夫先生几乎放弃了讨价还价的任何企图。此时此刻，如果西方稍加坚定地表明某一立场，它很快也就成为苏方的立场”（Freedman 1990：22）。

从这种角度观察，就会发现一位评论家表述的下述论断不无道理：美国人“保持强硬，最终得到报偿”（Gaddis 1989：11－14）。不过，重要的是必须清楚美国“从实力地位出发进行谈判”的政策究竟有何斩获。从大的方面来说——如凯南在其信中提到的——它有效地结束了冷战；从小的方面来说，它迫使苏联在军控谈判中做出前所未有的让步，中导条约就是最明显的例子。这两个结果都基于同一个最根本的说法，即美国政策是导致苏联政策出现关键性变化的决定性因素。不过，这里还有一种说法，那就是：这些年苏联政策可用“一系列让步”来一言以蔽之。这两种说法都值得质疑，而质疑的最好办法就是分析一下两个大国谈判的记录。

1985～1989 年的苏联外交自然是一个走下坡路国家的外交，但实际内容要比“走下坡路”的意思复杂得多，也有趣得多。首先，如果说美国的强硬政策是达成中导条约及其以后各项协议的唯一或主要因素的话，那么人们就有理由质问：为什么它没有在戈尔巴乔夫上任之前起到这种作用呢（Risse Kappen 1991：163）？显然，这种结果既产生于美国的压力，又来自苏联在国际关系领域执行了新的政策。因此，我们有必要谈谈戈尔巴乔夫在外交政策上的“新思维”。

“新思维”是戈尔巴乔夫 1986 年 1 月在苏共二十七次代表大会上宣布的。其新意主要反映在下述论断上：鉴于对大规模毁灭性武器没有可靠的防御办法，安全越来越成为一项“政治任务”，只能依靠“政治手段”来解决。因此，苏美关系必须以相互依存与合作为基础。既然面临共同危险，那就要采取“共同安全”的措施。基于上述思想，苏联对外关系的哲理出现根本性变化，即从阶级斗争以及资本主义与共产主义的冲突不可调和的构想转变为世界各国面临共同挑战而相互依存的构想。戈尔巴乔夫又提出“合理够用”的概念，作为考虑军备控制和军备裁减的基础，并把上述哲理扩展到军事领域。这不仅意味着明确摒弃攻击性意图和攻击性武器，而且表达了不对等裁减武器和常规部队的愿望，这种立场是此前双方在武器谈判中不可想象的

（Oberdorfer 1992：159－61，231）。

把这些哲理变为政策就不像宣布理论那样简单了。美国经过多年才打消自己的怀疑态度和国内（尤其军界）的对抗情绪。戈尔巴乔夫把他的“新思维”落实到改变政策时，他的声望在国外与日俱增，在国内却每况愈下，这其中一个重要原因就是“新思维”的戏剧性结果恰好出现在共产主义在东欧崩溃和苏联经济危机愈演愈烈之时。

使美方谈判人员确信戈尔巴乔夫说话算数的具体政策变化包括苏方的几次让步，正是这些让步最终达成的中导条约。1987年12月在华盛顿签署的这个条约规定，双方撤除在欧洲的所有中程核武器——苏方的SS－20导弹，美方的巡航导弹和“潘兴”Ⅱ导弹——并建立一套严格的核查措施。苏方第一个重大调整是决定使中导条约与战略核武器协议“脱钩”；第二个是不再坚持把美方同意中断“战略防御计划”的开发作为达成中导条约的前提；第三个是苏联接受侵入性极强的核查手段；第四个是放弃保留用于对付中国的100枚SS－20导弹的愿望，第五个是表明同意把英法核威慑力量排除在中导条约之外。实际上，苏联全盘接受了里根在1981年提出的“零方案”的所有要点。

虽然大部分步子是苏联迈出的，但这并不表明美国强硬路线大获全胜。戈尔巴乔夫的判断是：苏联继续反对“战略防御计划”只会带来提高美国国会对它的支持率的危险。实际情况正是这样：戈的立场松动后，美国国会果然动议限制对“战略防御计划”拨款，并限制该类武器的开发与空间试验。1985年，美国就“战略防御计划”是否违反了1972年签署的反导条约展开激烈辩论，戈尔巴乔夫这样做实际上等于参加了这场辩论。美国政府的律师得出结论是：如果广义地来理解反弹道导弹条约，那么，“战略防御计划”的研制和试验应该是被允许的（不过部署是不被允许的）（Garthoff 1987：96－107）。这一结论引起军控专家们的质疑（though not deployment），但得到里根政府中要员的支持，如国防部部长温伯格和军控谈判代表尼采。结果里根政府采取调和立场，一方面保留对反导条约的广义解释，另一方面又宣布暂时遵守对它的狭义解释（Oberdorfer 1992：123－7）。“战

略防御计划”仍作为美苏关系中的一根刺留在日程上，但由于戈尔巴乔夫采取了“战术退却”的策略，又因为美国国内人们对“战略防御计划”仍存疑虑，这根刺被拔掉了。

核查也被证明是把双刃剑，因为按照核查的规定，美国军方和美国军工企业的一些绝密领域也要接受详尽的检查。消除军方对核查的传统忧虑既是苏联，也是美国必须面对的问题（Oberdorfer 1992：233－4）。普遍的看法是，虽然反弹道导弹条约被称颂为军备谈判的一大突破，但也受到美国和欧洲持批评态度的人的非议，他们认为，“非核化”使欧洲面对苏联显得更脆弱，而且还离间了美欧关系。毕竟，建议在西欧部署中程导弹——巡航导弹和“潘兴”Ⅱ导弹——的部分初衷就是为了消除欧洲人对此的恐惧感。总之，中导条约的谈判不是单行道。从戈尔巴乔夫一方来看，它并不是对美国的一个让步，而是按照“共同安全”的原则实施控制过程的一部分。从这个意义上来说，它同苏联国内的改革并行不悖。失去控制只是发生在此之后，而且是两方面的失控。

外交上“新思维”的另一个同样重大或许是更为重大的实际后果是从阿富汗撤军的决策。卷入阿富汗的战争常常被描述为苏联的越南战争。爱德华·谢瓦尔德纳泽在撤军后说：“撤出阿富汗的决定是（调整苏联外交政策的）第一步，也是最困难的一步。其他一切都由此而来。”1992 年解密的文件表明，戈尔巴乔夫在 1986 年 11 月向政治局建议做此决定，大约九个月后向美国通报。这些文件还表明，美国 1986 年向阿富汗游击队提供“毒刺”导弹是促使戈尔巴乔夫下此决心的决定性因素（“毒刺”是一种抵肩发射的武器，在游击队同苏武装直升机的战斗中发挥了相当大的作用）。实际上，早在 1985 年 10 月，苏共中央政治局就制定出了对阿富汗的新政策，内容同 1965 年尼克松的越南化计划极其相似。苏联的政策是以撤军为根本目标，在短期内则要“更有力地实施战争，同时要努力扩大阿富汗政府的政治基础”（*Wasbington Post*，16 November 1992：A16）。

正是这一政策的失败，加上美国提供给游击队高技术武器，促使

戈尔巴乔夫下了决心。此举或许也反映出他如何看待当初做出干涉决定的方式。当初的决定是在1979年政治局举行的一次小范围会议上做出的。虽然戈尔巴乔夫在此前不久已进入政治局，但那次会议他没有参加。他当时最关心的是国内为这场战争所付出的代价——大量的开支和人员伤亡。到1989年中期撤军完成时，苏军的死亡人数达15000人。

要贯彻撤军决定也不是那么容易，所以戈尔巴乔夫是在对军界关键领导进行清理之后才宣布这个决定的。1987年西德大学生马蒂亚斯·鲁斯特驾机直飞莫斯科红场的破天荒事件，使这次清理工作容易多了。鲁斯特当时驾驶一架塞斯纳单引擎飞机从芬兰出发，成功地穿越苏联防空的天罗地网。他的这一壮举使苏联国防部部长和防空军司令丢掉了乌纱帽。戈尔巴乔夫的权威因此进一步加强，他接着做出了撤离阿富汗的决定。1989年2月15日，最后一支苏军部队撤出阿富汗，比他1988年年初公开宣布这一决策时下达的期限大大提前了。不过苏联的军事援助一直持续到1991年年底（美国对游击队的支援也是如此）。此时苏联已经解体，从政治和资金上都不可能再继续支持喀布尔政权。1992年4月，喀布尔政权被赶下台（*Wasbington Post*，16 November 1992：A16）。

最后，“新思维”给外交政策带来的重大变化还包括苏共中央的“提纲”，这是1988年苏共第十九次代表会议通过的，同年戈尔巴乔夫在联合国大会发表演说时阐述得十分清楚。“提纲”的部分内容重申了1986年苏共二十七大宣布的对国际主义的新解和军事学说的修正，但这次是全新的表达，并伴有到2000年全面核裁军的具体建议。戈尔巴乔夫在联大演说中还戏剧性地宣布苏联将单方面裁军50万，并从东欧撤出10000辆坦克、8500门火炮和800架战斗机（White 1990：159－61；Oberdorfer 1992：316－19）。

正是事态的这些发展为1991年7月达成第一阶段削减战略武器条约和1993年1月达成第二阶段削减战略武器条约铺平了道路，尽管不是一帆风顺。从1982年开始，在里根政府执政期间，举行过一

系列峰会和具体的会谈，削减战略武器的谈判举步维艰。此后又由于布什在处理同苏联的关系时小心翼翼、东欧发生革命、最后苏联解体，使谈判一误再误。特别是苏联的解体带来了新的问题：第一阶段削减战略武器条约签署不久，便出现了三个“新的”核国家——乌克兰、哈萨克斯坦和白俄罗斯。这三个新独立的国家面对一个强大的又被认为是怀有敌意的俄罗斯都感到不安全，因此拒不批准这一条约。当美国和俄罗斯达成第二阶段削减战略武器条约（建议到2003年之前双方把战略核武器削减到现有水平的1/3）时，乌克兰和白俄罗斯仍不批准第一阶段削减战略武器条约。由于第一阶段削减战略武器条约被批准之前第二阶段削减战略武器条约不能生效，到1993年年初，战略核武器谈判的前景仍不明确。

《纽约时报》在评估核控前景的文章中谈到另一个与此相关的问题。这就是：在冷战后世界新局势不稳定的背景下，美国同俄罗斯的双边会谈只能涉及核危险的一部分。乌克兰和白俄罗斯也并不是问题的全部。在1991年之前，核扩散的问题主要被苏美对抗这一严酷事实所笼罩，“而如今，是伊朗、伊拉克、中国、朝鲜、以色列、南非、利比亚、巴基斯坦、阿尔及利亚和印度这样的小规模核力量构成大威胁”（*New York Times*，10 January 1993：E3）。

尽管戈尔巴乔夫的“新思维”产生了他并不想看到的后果，“新思维”以及落实“新思维”的行动仍然打开了为美苏关系重新定向的大门。这也是美国对政策做出某些调整的结果。正如《新闻周刊》所指出的，戈尔巴乔夫的让步很可能是“败军之将的明智之举”（Oberdorfer 1992：319），然而出现这种结局，也应部分地归功于美国对自己、对苏联看法的改变。

看起来有些自相矛盾的是，里根总统这位冷战的坚强斗士，居然也在1986年10月雷克雅未克首脑会议期间凭一时高兴，同意销毁所有核武器。要知道，三年前他还把苏联称作“邪恶帝国”。这种180度的大转弯岂不令人吃惊！可是当戈尔巴乔夫重新提起“战略防御计划”时，里根的兴头马上消失了。戈尔巴乔夫坚持要求美方必须

把“战略防御计划”的研究限制在实验室之内。里根的回答是：“我已经答应美国人民绝不放弃‘战略防御计划’”（Oberdorfer 1992：203）。

作为冷战斗士的里根同作为最终废除核武器的倡导者的里根看起来自相矛盾，实际上并非如此。我们在第十二章已经谈到，里根从未真正相信“相互确保摧毁”理论能作为美国防御的基础。在一次视察北美防空司令部时，他惊奇地发现，那里竟然没有针对苏联导弹的防御。他之所以对“战略防御计划”紧紧抓住不放，既想把它作为保护美国的手段，又想以此打破相互威慑的僵局。他的出身和经验，使他数次与防御专家那种官样文章，尤其是核威慑理论那种神秘莫测的科学背道而驰。众所周知，他不关心细节，不愿意设身处地从苏联角度思考问题。他无法理解，怎么会有人反对一个新的防御系统呢？他忽略了一个事实：任何确保美国安全的防御系统，如果行得通，就会使苏联的攻击力量失去作用。无论如何，里根对核平衡的威慑深恶痛绝，对美国科技有能力为此拿出解决办法充满信心。这使他去玩弄较激进的美苏冲突解决方案，而他的顾问们往往考虑得更为谨慎。有人说，在雷克雅未克首脑会议期间，里根和戈尔巴乔夫曾“发生过一次争论，都称自己最致力于建立一个无核世界的梦想，互不相让”。里根的顾问们在一旁看得目瞪口呆（Mandelbaum and Talbott 1987：175）。雷克雅未克首脑会议的这种场面被公开报道之后，很多评论家立即表示松了一口气——就无核世界终究没有达成协议。据说，否则不但西方在常规部队上比起东方集团来将处于劣势，而且“永远废除核武器根本是不可能的，因为制造核武器的技术会永存”（Mandelbaum and Talbott 1987：175）。里根异想天开的主意虽然夭折了，但他的激进主义举动却在一定程度上打破了外交常规。

里根愿意重新考虑美苏关系的另一原因在于下述这个经常被提到的事实：政治上偏右的人——同里根差不多的尼克松可算一个——比自由派更容易做出这种选择，因为他们不用害怕别人攻击自己不是美国的真正保卫者。里根在其第一任期间大力扩充军事实力，可以说，

为自己第二任赢得了谈判的权利。意识形态斗士的里根做了充分表演，务实主义的里根就可以从容登台了。如同国内事务一样，在外交上，那些热切期望里根政府在白宫乃至在整个国家最终会尊崇保守主义的人，肯定会失望的。另外，如加迪斯所指出，里根对苏联的看法始终是模棱两可的：他对苏联的威胁一直抱极端悲观主义态度，但同时又有“极强的自信心”，坚信资本主义必将战胜共产主义（Gaddis 1992：123）。

顽固性与愿意考虑做出重大改变这两方面在里根身上的奇妙结合本不会有什么结果，但实际上确有建树，这是由于国务卿舒尔茨和其他政策顾问能将其大致的想法变为具体的谈判立场。舒尔茨同苏联外交部部长爱德华·谢瓦尔德纳泽的关系在作用上不亚于里根同戈尔巴乔夫的关系，因为后两者之间的四次首脑会议都是经前两者多次会晤做出准备的。另外，在里根连任总统期间，美苏双方做出的人事变动也具有重要意义。为迎接1987年12月在华盛顿举行的美苏首脑会议，里根撤换了在“战略防御计划”乃至整个军控问题上持鹰派立场的国防部部长卡斯帕·温伯格和副部长理查德·佩里，起用了两位比较温和的人士（Oberdor fer 1992：265－6）。同样，在布什政府中，把两国关系改善的大环境转变为可行的协议，国务卿贝克功不可没。贝克在美国决策中的作用可与谢瓦尔德纳泽在苏联决策过程中的作用媲美。贝克同谢瓦尔德纳泽的关系与舒尔茨同谢瓦尔德纳泽的关系一样密切。人们指出，他们对改善美苏关系的共同贡献主要在于私下督促“各自的老板不要听信国内鹰派的意见”（Beschloss and Talbott 1993：61）。

总的来说，结论应该是：美国的政策对苏联政策的变化虽有重大影响，但问题绝不简单是美国的强硬路线使苏联做出让步的。美方也迈出了步子，以适应苏联变化带来的新的现实。

如果研究“对于结束冷战，苏联的国内因素和外部因素哪个更为重要”这一更广泛的问题，同样应该避免肯定任何一方而否定另一方的结论。苏联共产主义的自身衰败应被视为主要原因；但对这个问题不能孤立来看，必须考虑到整个苏联集团的经济倒退，以及经济

倒退给这个“不完全的超级大国”在世界上的政治地位所带来的后果。这个后果不但反映在苏联自身的解体上，而且也反映在苏联扶植的共产主义世界的崩溃上。

冷战终结与大千世界

导致冷战结束的事态发展对整个国际体系都有影响。其中最明显的是：苏联越来越没有能力继续援助社会主义政权和别国的造反运动，这就部分解决了某些所谓“地区性冲突”。之所以还有必要用“部分”这个词，是因为这些冲突得以解决，只意味着它们远离了超级大国对抗的战场；国家内部的问题依然存在，在很多情况下仍需要外界组织（如联合国）予以干预。如果说冷战之后有一个什么“世界新秩序”的话，那么这个秩序的原则只是被部分地勾画出来了。

安哥拉是最先感受到苏联减少对第三世界援助的国家之一。自从1975年古巴在那里部署军队以来，该国内战不断，一方是古巴支持的“安哥拉人民解放运动”领导的政府，另一方是得到南非支持的反对党“争取安哥拉彻底独立全国联盟”。到1988年12月内战才接近尾声：安哥拉、古巴和南非签订协议，规定随着纳米比亚的独立，古巴军队要分阶段撤出安哥拉（南非对纳米比亚的主权要求源于1919年“国联”做出的一项决定，把这个原德国殖民地交给南非。该决定后来在1978年被联合国中止，但南非一直不服从）。南非同意纳米比亚独立标志着它最终服从了联合国1978年的决议，但它是有条件的，这就是：古巴军队离开安哥拉。1991年5月，最后一支古巴军队撤出安哥拉，“安哥拉人民解放运动”和“争取安哥拉彻底独立全国联盟”签署和平协议，结束内战。1992年9月，在联合国的监督下举行大选，结果“争取安哥拉彻底独立全国联盟”获胜。尽管不能说这个国家的和平与稳定有了保障，但“安哥拉人民解放运动”领导同意尊重选举结果（*Manchester Guardian Weekly* 29 November 1992：16）。这样，安哥拉17年以来第一次摆脱了军事冲突。不过好景不长，1993年内战再起。

在东南亚，军事冲突虽然结束了，但并没有带来国内的和平，情况甚至还不如安哥拉。在苏联的压力下，越南在 1989 年 1 月同意从柬埔寨撤军。越军是 1978 年为把“红色高棉”领导人波尔布特赶下台而进入该国的。虽然越南军队于 1989 年 9 月撤出，但柬埔寨仍是一片混乱，红色高棉（此时联合国仍承认它为柬埔寨合法政府）力图东山再起。此外，越南撤军并不意味着越柬战争的正式结束。只是到 1991 年 10 月，联合国维和部队支持一个由四方组成的新政府之后，战争才正式结束。实际上，根据 1991 年在巴黎达成的协议，柬埔寨简直成了联合国的监护国，通过一系列复杂和不寻常的安排，柬埔寨最高国民议会“把确保落实联合国决议所需要的一切职权都交给了联合国”（Helman and Ratner 1992－93：15）。

解决柬埔寨问题的一个重要方面是苏联与中国和解。我们在第十章已经看到，1978 年越南对柬埔寨的入侵把苏中分置于对立的两方，使双方本已存在的敌对态势进一步恶化。苏联停止支持越南促成了中苏就柬埔寨问题以及改善两国关系的广泛问题举行会谈。戈尔巴乔夫于 1989 年 5 月访问北京。就此次访问戈尔巴乔夫宣称，苏中关系“正进入一个质变的新阶段”。其标志是双方达成了各自减少驻中苏边界地区的部队，并按照国际法解决领土争端的协议（White 1990：172－3）。

在中美洲，美苏关系的调整也带来重大影响。其中最重要的是苏联撤回对古巴的支持，从而削弱了古巴对尼加拉瓜以及对萨尔瓦多叛军的支援。尼加拉瓜“桑地诺民族解放阵线”领导的政府一直受到来自美国对“康特罗”叛乱分子的支持和美国经济封锁的压力，最后被迫同意于 1990 年 2 月举行大选。出乎“桑地诺民族解放阵线”意料之外，同样也使布什政府感到惊奇的是，“桑地诺”在大选中败于反对党联盟。1990 年 6 月，布什宣布“挺进美洲”的倡议，并在同年 12 月对拉美进行了为期六天的访问。据报道，“拉丁美洲已做好准备，同美国发展新型的经济关系，此时自由市场政策之风已席卷整个拉美，华盛顿针对经济集团的快速变化也做出调整”（*Guardian*，

12 December 1990：5）。第二年秋天，通过联合国的斡旋，萨尔瓦多政府同叛乱分子之间达成协议，该国长达11年的实际上的内战遂告结束。菲德尔·卡斯特罗的古巴成为拉美唯一的社会主义前哨阵地，不过，由于美国继续对古巴实行经济封锁，苏联又停止援助，古巴的经济和政治前景可谓风雨飘摇。

冷战结束最明显的受害者或许是埃塞俄比亚和索马里。从1970年代后期美苏在非洲之角掀起战争以来，埃塞俄比亚一直接受苏联的援助，而索马里则从美国得到支持。只要苏联继续支持埃塞俄比亚的门格斯图政权，维系西亚德·巴雷在索马里掌权就符合美国的利益，重要原因之一是索马里的伯贝拉港是美国海军的战略基地。苏联放弃埃塞俄比亚后，美国随即撒手索马里。西亚德·巴雷的政府于1991年1月垮台，饱经部落冲突的索马里陷入一片混乱。门格斯图虽然保住了政权，但埃塞俄比亚依然内战不断。旱灾和饥荒使这两个国家的情况雪上加霜，国际救援也只能是杯水车薪。1992年年底，美国派出25000人的军队去索马里，以便确保国际援助的食品能送到饥民手中，但这只能解燃眉之急，并不能解决索马里政治混乱的问题。有一种观点认为，埃塞俄比亚和索马里是"令人不安的新现象"之两例，这种现象就是："失败的国家完全没有能力作为国际大家庭成员继续生存下去"（Helman and Ratner 1992－93：3）。

如果说冷战结束对世界的影响有什么启示的话，那就是对于苏联和东欧，同样也对于第三世界，与其说是民族主义作为世界政治的主导力量东山再起，不如说是暴露了民族国家的脆弱性。更准确地说，它暴露了民族国家的要求同其内部种族主义组织要求之间的深刻矛盾。在那些国家里，共产主义曾被用来遏制对立的种族或宗教组织的愿望。民族主义——作为某种意义上的民族社会与国家之间的稳定因素——实际上没有出现就夭折了。很明显，民族国家的危机已不限于原共产主义国家和与苏联集团结盟的国家。不过，危机在这些国家表现得尤为突出。对它的影响，整个国际社会将在未来数年中不得不严肃对待。

第十四章
结束语

稳定问题

1989～1991 年期间发生的事件为历史上所罕见。这些转折点改变了我们对未来和过去的看法。作为结束语，让我们在这里回顾一下 1989～1991 年发生的剧变是怎样对冷战和未来形势产生影响的。

冷战的结局打破了几乎所有观察家的预料和所有原来以为冷战是一个稳定格局的人的观点。理论家们长期以来一直在辩论是两极格局有利于稳定，还是多极格局有利于稳定（Deutsch and Singer 1964; Waltz 1964）。冷战的时间拖得越长，两极格局比多极格局更稳定的观点似乎越有道理。关于两极格局有利于稳定的最有分量的论著之一是约翰·加迪斯撰写的《长期和平：战后国际格局保持稳定的要素》（1986）一书。该书在冷战结束的前几年刚刚出版，此后不久，当时的一些重要问题就成了冷战格局不稳定的根源。许多记者和学者争先恐后地发表文章，解释这一表面看起来牢不可破的结构为什么会突然之间土崩瓦解。

回顾起来，稳定理论涉及两类问题。第一，当时有一种倾向，认为美苏关系或者更准确一点讲东西方关系，在本质上是对称的。相互竞争的意识形态（每一方都毫不隐讳地认为自己与对方不同）、平行

的联盟体系、欧洲被巧妙地分割为两部分、实力不相上下的核武库以及第三世界的冲突因受冷战支配而几乎都被两极化等，所有这一切都使东西方对抗出现了平衡和对称，尤其是核武器似乎将东西方关系冻结在固定不变的状态中。第二，也是与稳定理论相关的问题，人们明里暗里认为，冷战的两大对抗者相互“需要”，实际上冷战对每一方来说都是有用的。有人说，“美国是靠斯大林主义使自己的冷战总战略合法化”（Cox 1986：26）。

上述两种观点都不是完全错误的。在超级大国的关系中存在若干令人注目的对称因素。同样明显的是，双方的领导人都利用对方的威胁来证明自己的政策和战略是正确的。问题不在于是否存在这些特点——它们显然是存在的，而是这些特点可以在多大程度上用来解释超级大国的关系。两种观点都倾向于决定论，都不易于接受变化，尤其是促成共产主义失败的变化。这些理论还低估了冷战不能起作用的方面。这不仅对超级大国如此，对那些成了冷战战场的小国来说也是一样（Brecher and Wilkenfeld 1991：85－104）。

鉴于冷战格局的瓦解，对战后年代要做出适当的解释看来必须满足两个要求：首先，它必须在考虑到维持稳定的力量的同时，也考虑到促使变革的力量；其次，它必须考虑到美国和苏联在国际格局中的地位和所扮演的角色不同。

正如前几章中所述，冷战冲突的根源在于美苏力量的严重不对称。这不单单是由于苏联的经济力弱，美国的经济力强，而且还由于它们所拥有的力量种类不同和使用力量的方式不同。在冷战的开始阶段，美国的经济力量占压倒优势，尽管所占的比重在相对下降，但它一直占优势，这是事实。美国具有核优势，这也是冷战头20年的一大特点。然而，苏联的相对经济弱势被它在常规军事力量方面的优势和后来不断增强的核力量、地理上邻近潜在冲突的主要战场，以及自给自足的经济发展所补偿，这使它能够有效地抗住西方的经济压力（至少在1970年代初期是如此）。自给自足的经济和共产主义制度最终没有维持下去，这不仅是由于苏联集团内部在经济上长期存在着结

构性问题，而且还由于苏联集团和西方的经济增长率不同。此外，还由于苏维埃制度在意识形态上的吸引力在那段时间里减退了（这个吸引力来自苏联因获得第二次世界大战胜利而享有的声誉和新独立的第三世界国家中一些追随者对苏联的信任）。相反，西方文化和经济模式却显示出了卓越的可输出性和对世界许多地区的适用性，尽管当时美国和西方在政治上总的说来还处于守势。

鉴于上述情况，下述观点看来是有道理的，即美苏关系中的问题不是存在一个体系，而是存在着两个相互重叠但并不相同的体系。一个是冷战体系，其特点是：欧洲被地缘政治所分割，而且这种分割延伸到第三世界的部分地区；双方都有核武器；意识形态冲突。另一个是世界资本主义体系，其特点是：生产和贸易日益扩大；在经济上的相互依赖不断加强；建立起了管理各种跨国事务的国际“机制”（Keohane and Nye 1977：Chs. 3 and 4）。正如第一章中所述，国际关系理论的发展反映出了这种分叉。现实主义产生于冷战早期，但被诸如肯尼思·华尔兹这样的新现实主义者所继承和发展，现实主义强调国家间的关系，认为美国和苏联在两极格局中的政治和军事支配地位以及所谓的力量均势是保持体系稳定的有效力量。多元论产生于1970年代的经济多极世界，它强调跨国进程尤其是跨国经济发展的重要性在上升，美苏双边关系及与其相关的军事/安全问题的重要性在下降，以及作为主要体系力量的相互依赖性。人们都说：“相互依赖是许多多元论者的观点，力量均势是许多现实主义者的观点”（Viotti and Kauppi 1993：243）。

值得商榷的是，持这两种理论的人都辩解说，他们的观点在现实中是有道理的，但是无论哪一种论者又都不能使他们的论点完全符合实际，实际是：苏联因受冷战格局的制约，维持自己的能力是有限的，而美国则从不受制约，因为它能获得全世界的资源。比如，美国能够一面打冷战，一面赚大钱。换句话说，我们可以说苏维埃制度在战火中诞生，斯大林将其发展为国家集权的军事指挥体制，它经受了第二次世界大战（伟大卫国战争）的考验和冷战的锻炼，它主要是

一个为战争而持久动员起来的社会，而且是仅仅在战时才有效的社会。这就是它显示出来的力量和长期弱势的根源。或许可以说，这正是极权主义、希特勒帝国和苏联共产主义的真正含义。值得注意的是，美国社会中的军事工业联合体从来都不会像苏联的军事体系那样包含一切的现实。

如此说来，冷战体系是动态的（资本主义体系在发展），它与冷战本身相辅相成。冷战还没有发展到严重崩溃的阶段就被超越了。但具有讽刺意义的是，由于冷战的代价对美国来说不像对苏联那么沉重，美国就没有像苏联的继承国那样有更多的理由来抛弃那些支持冷战时期政策的观点。实践证明，要使冷战条件下制定的政策适应世界政治的新形势是很困难的。

塑造未来

谈论冷战后世界的许多文章都认为，对许多观察家来说，要把他们对冷战的解释与对从冷战后产生的秩序（或混乱）的看法区分开来几乎是不可能的。例如，那些倾向于认为冷战体系是稳定的从而认为冷战时的所有危险基本上都是可控的人，强调东欧和中欧如今新的松散状态的危险性。将冷战称为“长期的和平”的人（约翰·加迪斯就是其中一个）就认为冷战后时代的前途堪忧（Gaddis 1986 and 1990b：19）。

功能主义者（其观点是没有美苏双方的相互作用，冷战中的对抗就不会发生）对冷战结束也感到困惑。他们曾经认为：“没有苏联，在战后时期要在全球范围恢复资产阶级统治是不可能的，或者说，斯大林主义是资产阶级称霸的必要条件”（Cox 1986：36）。首先，美国在战后世界获取绝对和相对经济实力的必要条件都是由第二次世界大战造成的：战争使美国的经济得到发展，同时又使其竞争对手的经济遭到暂时的破坏。这并不是说，冷战的出现没有加强美国的扩张主义锐气或影响美国的政策取向，而是说美国并不完全是因为苏

联的刺激才采取以上政策的。其次，与上一点密切相关的是，功能主义者的论点认为——像许多诠释冷战的观点所说的那样——只有超级大国才是国际舞台上的重要演员。然而可以肯定地说，战后资本主义的复兴主要是由于西欧和日本资本主义的内部活力和发达的工业基础。没有这一条件，马歇尔计划就一定不会实现。

最后，尽管苏联的灭亡对美国在1990年代的政策制定是个明显的挑战，美国并没立即失去制定新政策的手段。正如我们在下面将会看到的，在冷战后的世界中，不管是好是坏，美国又回到了冷战前的政策。实际上，这些政策从来就没有消失过。正如第二章中所述，美国的对外政策传统在冷战中继续发挥作用，并且大部分在冷战后仍然在起作用。

然而，也有许多评论家完全是用冷战的眼光看待冷战后的世界。他们原来企图使人相信冷战是一个稳定体系，他们认为冷战结束只会带来不稳定。这种观点中最有影响的是约翰·米尔希梅尔对冷战后的欧洲极其悲观的预测。他认为：对共产主义消亡幸灾乐祸是不对的。1945年以来欧洲没有发生战争是下述三个因素起作用的结果：在欧洲大陆的军事力量分成了两极；组成欧洲两极的两个国家（美国和苏联）的军事力量大体上旗鼓相当；这两个大国各自都拥有大量核武器。假如两个超级大国撤出中欧，其结果可能是在欧洲国家之间出现力量失衡和“容易产生不稳定”的多极体系。被冷战有效遏制了的极端民族主义的危险将会增加战争的可能性。防止这种结局的最好办法就是对“核武器扩散实行管理”，因为核武器被认为是1945年以来防止欧洲发生战争的“最有效的遏制手段”（Mearsheimer 1990：6-7，20-1，31）。米尔希梅尔后来就苏联解体后俄罗斯和乌克兰之间发生冲突的可能性提出了类似的看法。他认为，欧洲拥有少量核武器可能更稳定的传统观点是十分错误的，因为“乌克兰一宣布独立，实际上就被悄悄地推向建立自己的核威慑力量的道路”（Mearsheimer 1993：50）。

对米尔希梅尔颇有争议的观点的不同看法成为对冷战时期国际政

策理论争论的焦点。斯坦利·霍夫曼反驳说，米尔希梅尔的分析中关于两极化必然导致稳定的抽象概念和教条式的断言简直是一幅新现实主义漫画。结构要素本身并不能说明结果。霍夫曼指出，任何结构都能够导致和平或者战争，这取决于主要当事国的国内特点，取决于它们的优先选择和目标，以及它们之间的关系和联系（Hoffmann 1990：191－2）。罗伯特·基欧汉以相互依赖理论做出回应，这一理论对他自1970年代以来的研究工作很有帮助。基欧汉认为，米尔希梅尔实际上在用英国哲学家霍布斯关于国际冲突不受约束的观点看问题，他低估了国际机构“对世界政治，尤其是对当代欧洲政治的影响”。世界上现在没有，过去也不曾有过其强制力堪与一个国家政府在自己领土内拥有的强制力相媲美的全球性机构，但这一事实并不意味着不存在进行合作的诱因，也不意味着两极冷战结构和核武器的强制力是制约各国1945年以来雄心壮志的唯一因素，“国际机构的性质和力量也是期望值的重要决定因素，因此也是国家行为的决定因素”。因此，基欧汉做出这样的结论：“在各国正常遵守国际机构的规定和准则时，它们就表达了继续进行合作的愿望，因而就强化了对稳定的期望”（Keohane 1990：193）。

若将上述有点抽象的观点与1989年以来欧洲的形势联系起来看，拒绝对从冷战残骸中产生的政治和安全结构做出教条主义的判断似乎是明智的。说美国在欧洲的作用产生于冷战时期，并不是说美国现在在欧洲没有作用了。相反，许多欧洲人，特别是原苏联集团的欧洲人，都坚持认为美国的存在应当继续下去。华沙条约组织的瓦解也不表明北约现在就是多余的了，有迹象表明北约可能成为全欧洲的安全组织。1994年1月在布鲁塞尔召开的北约首脑会议上，就讨论过吸收某些东欧国家——首先是波兰、匈牙利、捷克共和国和斯洛伐克——加入北约的问题。当时，北约将它们作为“和平伙伴”，希望它们有朝一日成为正式成员国。

同时，鉴于1993年12月大选后俄罗斯民族主义高涨以及持续的经济和政治混乱，包括东欧某些国家但不包括俄罗斯的北约可能成为

欧洲不稳定的根源。有人甚至预测扩大了的北约与被孤立的俄罗斯之间的对抗将会导致一场新的冷战。在老“铁幕”以东数百英里之外的地方又将筑起一道新的“铁幕”。显而易见，克林顿总统肯定是考虑到了这一前景才三番五次地向俄国人保证北约东扩将是一个缓慢的渐进的过程。在做出这种保证的同时，还答应进一步协调七国集团（或工业最发达的主要国家）与俄罗斯的关系。最后，1994 年 1 月北约首脑会议后克林顿访问莫斯科时有消息报道说，美俄两国达成协议，停止将各自的战略核导弹瞄准对方。总之，在风云变幻莫测的形势下，双方显然都在小心谨慎地从已知领域走向未知领域。由于俄罗斯和前南斯拉夫地区处于持续不断的危机状态，发生不稳定和冲突的潜在危险仍然很大。

以上考虑不可能包括冷战后出现的各种可能性。冷战后起作用的力量十分多样，使未来充满变数。例如，全球经济的变化表明，世界正分化为许多庞大的不断增长的排他性贸易集团，如由美国、墨西哥和加拿大组成的北美自由贸易集团（1993 年正式成为北美自由贸易联盟），以日本为中心的亚洲集团和欧洲共同体等。最极端的看法是，经济竞争将主宰世界政治，美国和日本被描绘成不共戴天的对手。按照这一看法的预测，美国将“与日本再次发生战争”(Friedman and Lebard 1991)。

关于未来和美国在未来地位的一种大相径庭的观点认为，冷战的终结给美国留下了一个“单极机遇”，在此期间美国的政治和军事力量是全球唯一有效的稳定力量。查尔斯·克劳特哈默尔写道，“例如在波斯湾，是美国采取了迅雷不及掩耳的单边行动，于 1990 年 8 月阻止了伊拉克对整个阿拉伯半岛的有效控制”（Krauthammer 1990－91：24）。弗朗西斯·福山对未来的看法可能是人们议论最多的一种观点，他认为冷战结束就是“历史的终结”。他强调说，不仅国际冲突从此将会停止，作为冷战特征的基本意识形态冲突也将成为过去；西方的自由民主将盛行，而且似乎很可能成为“人类思想进化的终点”和“人类政体的最后形式”（Fukuyama 1992：xi)。各种推断不

仅仅限于对西方的未来持乐观态度。塞缪尔·亨廷顿在一次令人想起阿诺德·托因比文章的争论中，提出冷战后世界的断层线横亘在各种文明或文化之间，而不是横亘在民族国家之间或经济集团之间（Huntington 1993）。

没有办法完全调和这些不同的观点。它们利用不同的力量层面（经济的、政治的、军事的和文化的），使用不同的分析单元（民族国家、经济集团、文化），而且以不同的哲学观念（唯实论、唯心论和多元论）为基础。然而，在所有这些推断中有两点是相同的：第一，都认为无论民族国家的作用如何下降，它们仍然起作用；第二，都十分关注美国在新的世界秩序中的地位。

民族主义是个矛盾的事物，一方面，主权观念似乎明显地从两个方面受到削弱：跨国行为从民族国家政府的手中夺走了关键决策领域，与此同时，种族和宗教冲突正在从内部侵蚀着许多国家。然而，另一方面，维护民族同一性——使民族国家的边界与民族的同一性相一致——的主张却从来没有如此强烈。作为冷战终结的一个结果，苏联的加盟共和国获得独立，增加了新国家的数量。实际上，第二次世界大战后的整个时期是民族国家激增的时期，其数量从1945年的约50个增加到1994年的184个。从这个意义上讲，20世纪后半期比19世纪更称得上是“民族主义时代”。

然而，这里说的并不是民族国家对抗其他政治组织形式的问题，或者说并不仅仅是一方以牺牲另一方而求得发展的问题，这里说的是民族国家与世界政治中的新生力量特定的互动方式问题。冷战后国际政治的一个重要特征是，人们越来越认识到主权是一个可协商的量，而不是一个绝对的值。这在实践中是如何运作的，从联合国的活动中可见一斑。在1990~1993年期间，联合国实施了四次大规模的干预行动：海湾战争以及在索马里、柬埔寨和波斯尼亚的维和行动。有些观察家将海湾战争视为冷战后世界的新国际主义范例。随着苏联在联合国安理会的否决权永远消失，联合国现在可以按其创始国设想的方式，即作为集体安全组织行事了。真正的国际主义已准备好在长期耽

搁之后登上世界政治舞台。与此相反，有些人却认为海湾战争恰恰是美国为达到自己的国家目的而挟持联合国的一个事例。

实际上，海湾战争对上述两种观点来说都不是一个范例。海湾战争中，多国联盟毫无疑问是靠美国的巨大压力达成的，但同时也是靠海湾地区各国的赞同达成的。海湾战争既不是真正的国际主义在其中发挥作用的事例，也不简单是美国民族主义野心的事例，它实际上是这两者之间的一种临时平衡的事例。为了达成遏止伊拉克侵略这一得到广泛国际支持（至少在完成将伊拉克部队赶出科威特这一紧迫任务之前是如此）的特定目标，地区性需要与美国的国家目的相吻合了。由于存在这种一致性，联合国就成了一种合适的工具。

联合国干预的其他事例清楚地表明，海湾战争是一个特殊事件，并不是国际主义行动的新范例。尽管没有保证只要联合国干预，在索马里就一定会实现政治和经济稳定，但到了 1993 年年底已经明朗，美国的大规模介入不能保证实现这种结局。索马里内部有些关键集团反对美国介入，而且地区各国在干预的手段和目标方面也缺乏一致意见，这些都可能削弱试图拯救处于水深火热中的索马里的行动依据。同样重要的是，在美国国内，反对美国扩大介入的呼声日益高涨。1993 年 10 月，克林顿政府宣布，美国将在 1994 年 3 月底以前从索马里撤出美国的部队。在索马里问题上比在海湾战争问题上更难使美国人民相信，美国的利益处在严重危机之中。简而言之，离开其他至关重要的因素（如地区和当地的意见一致），无论是国际主义（如联合国所体现的），还是运用美国力量都不能保证达到所期望的结局。

柬埔寨问题也有所不同，但表现出了相同的基本点：国际主义行动如果考虑到当地和地区的需要和利益，就很可能取得成功。联合国派往柬埔寨的使团在构成上反映了各方面的利益：使团的团长是一位日本外交官，而维和部队则包括来自泰国、马来西亚、印度尼西亚、印度、荷兰（该地区的前殖民国）和澳大利亚的军人，军事指挥官由澳大利亚派出。一句话，在那里做到了将国际主义、地区主义和当

地需要卓有成效地结合在一起。

在波斯尼亚，有利于解决冲突的条件看来几乎不存在。从当地层面来看，在1992年战斗打响后的两年里，塞族、克族和穆斯林三方的血腥冲突使他们除了勉强容许联合国的人道主义行动之外，在外部干预方面几乎难以达成任何一致意见。直到1994年年初，经过各种组织的持续调解，才终于达成了短暂的停火。1994年2月，波斯尼亚塞族部队对萨拉热窝的穆斯林进行了受到广泛报道的灭绝人性的炮击，促使联合国借助北约的部队和飞机实施了强制介入措施，暂时遏制住了波黑塞族的野心。这种形势能否长期维持下去，国际社会建立的新举措能否由萨拉热窝扩展到波斯尼亚的其他部分，这一切还有待观察。

重要的是，在这些个案中，国际社会做出的努力是为了民族国家（就前南斯拉夫而言，是未来的民族国家）的利益，目的是维护其统一和主权。同样重要的是，不可能将这一过程与强权政治考虑分割开来。在这个意义上，国际主义与民族主义之间的传统对抗不再存在了。无视国家间力量冲突现实的理想的国际主义，同基于国家的雄心不受任何超国家力量影响之推断的现实主义观念一样，都无法理解在国际政治中发挥作用的力量。如果说冷战后的世界上存在国际主义行动的新事例的话，那就是要求每次新的行动都必须是就国家、地区和国际利益之间的关系进行专门谈判的结果。

以上讨论的言外之意是，虽然美国“注定领导世界”，但未必在每件事情上美国都能领导世界，即使它自己想这样做。美国的经济力量、军事实力和政治影响力都表明，它在许多国际冲突和地区冲突中将会担当重要角色。然而，与冷战时期相比，在实施干预方面，美国通常可以有多种选择，至少在表面上有选择的自由。没有了苏联的威胁，美国进行这种选择的理由是什么呢？

1993年9月，克林顿总统的国家安全顾问安东尼·莱克在一次讲话中说明了这种理由，他认为理由就是这符合美国的对外政策传统，同时也符合全球形势的需要。他首先关心的是阻止孤立主义的任

何念头——孤立主义是美国当前可能做出的一种选择。他坚持说：这是一种迷惑人的选择。他指出，对外和对内政策的界线“已经消失了”。他又说，美国对外政策的选择要有助于确定：

——美国人的实际收入是每26年翻一番（就像他们在1960年代那样），还是每36年翻一番（就像他们在1970年代后期和1980年代一样）；

——拥有大规模杀伤武器的25个国家，其数量今后将会增多还是会减少；

——在20世纪最后25年里导致2000多美国人伤亡的恐怖主义，作为一种威胁在21世纪的头25年里将会扩大还是会缩小；

——世界各国解决地区纠纷、人道主义需要和对付环境恶化威胁的能力今后将会提高还是下降。

（Lake 1993：2）

在阐明了美国的利益和理想之后，他概述了新时代要求美国参与世界事务的四个显著特点：世界广泛接受美国的核心观念（民主与市场经济）；美国在全球处于主导地位；种族冲突激增；信息流和人类生活本身的节奏加快。前两点吸引美国参与，后两点则迫使美国参与。然而，参与必须在新的基础上实施。在冷战时期，美国遏制对市场民主的全球威胁；现在美国则应设法扩展市场经济与民主的范围，尤其是在对美国有特殊重要意义的地方。“扩展”是遏制的继承，扩展就是要“扩展世界上民主与市场经济的自由社会”（Lake 1993：3-4，5）。

可能有人会问，扩展是否具有像遏制一样的修辞和政治力量，因为这个词缺乏明确具体的中心；同时，恰恰由于它缺乏明确的中心，它有故意模糊美国的实际利益与其他大国利益的区别之嫌。难道扩展不就是“天定命运论”（19世纪为美国向外扩张辩护的资产阶级史

观——译者注）和伍德罗·威尔逊的“为了民主要使世界安全”的观念在20世纪末的翻版吗？扩展似乎十分危险地近似于种族中心主义，容易使人笼统地界定美国的利益。最起码这种新理论展示出了美国对外政策在过去一个半世纪中所具有的基本连贯性。

如上所述，假如冷战后世界的主要困境是全球的、地区的和国家的利益之间的紧张关系，那么协调这几方面的关系就是全球稳定的必要条件。不反映现实力量格局的结构是支撑不下去的。因此，美国既然拥有巨大的优势力量，那么现在要看的就是，它将以慷慨的还是狭隘的态度来使用这种力量。

参考文献

Acheson, D. (1969) *Present at the Creation: My Years in the State Department*, New York: Norton.

Acton, E. (1986) *Russia*, Harlow: Longman.

Adler, S. (1961) *The Isolationist Impulse: The Twentieth Century*, New York: Collier.

Allison, G. (1971) *Essence of Decision: Explaining the Cuban Missile Crisis*, Boston: Little, Brown.

Allison, R. (1988) *The Soviet Union and the Strategy of Non-Alignment in the Third World*, Cambridge: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Alperovitz, G. (1985) *Atomic Diplomacy: Hiroshima and Potsdam, The Use of the Atomic Bomb and the American Confrontation with Soviet Power*, 2nd edition, New York: Elizabeth Sifton Books.

Ambrose, S. (1984) *Eisenhower the President, 1952–1969*, London: Allen and Unwin.

Ambrose, S. (1988) *Rise to Globalism: American Foreign Policy Since 1938*, Harmondsworth: Penguin.

Arbatov, G. (1983) *Cold War or Détente? The Soviet Viewpoint*, London: Zed Books.

Arendt, H. (1971) 'The Art of Lying: The Pentagon Papers', *New York Review of Books*, 18 November, 30–9.

Barnet, R.J. (1972) *Intervention and Revolution: The United States in the Third World*, London: Paladin.

Barraclough, G. (1967) *An Introduction to Contemporary History*, Harmondsworth: Penguin.

Beschloss, M. (1986) *Mayday: Eisenhower, Kennedy and the U-2 Affair*, New York: Harper and Row.

Beschloss, M. (1991) *Kennedy v Khrushchev: The Crisis Years 1960–1963*, London: Faber and Faber.

Beschloss, M. and Talbott, S. (1993) *At the Highest Levels: The Inside Story of the End of the Cold War*, London: Little, Brown.

Bialer, S. (1986) *The Soviet Paradox: External Expansion, Internal Decline*, New York: Knopf.

Bialer, S. and Mandelbaum, M. (1988) *The Global Rivals*, London: I.B. Tauris.

Blair, B. (1993) *The Logic of Accidental Nuclear War*, Washington, DC: The Brookings Institution.

Blight, J. and Welch, D. (1990) *On the Brink: Americans and Soviets Reexamine the Cuban Missile Crisis*, New York: Noonday Press.

Blight, J., Allyn, B. and Welch, D. (1993) 'Kramer vs. Kramer: Or How Can You Have Revisionism in the Absence of Orthodoxy', *Bulletin* of the Cold War International History Project, Issue 3, Fall: 41 (continues on 47–50).

Blum, J.M. (ed.) (1985) *Public Philosopher: Selected Letters of Walter Lippmann*, New York: Ticknor and Fields.

Boutwell, J. (1988) 'SDI and the Allies', 87–109 in J. Nye and J. Schear (eds), *On the Defensive? The Future of SDI*, Lanham, Md.: University Press of America.

Bova, R. (1991) 'Political Dynamics of Post-Communist Transition: A Comparative Perspective', *World Politics* 44, No. 1, October: 113–38.

Bowie, R. (1989) 'Eisenhower, Dulles, and the Suez Crisis', 189–214 in W. Louis and R. Owen (eds), *Suez 1956: The Crisis and its Consequences*, Oxford: Clarendon Press.

Bowker, M. and Williams, P. (1988) *Superpower Détente: A Reappraisal*, London: Royal Institute of International Affairs/Sage.

Boyle, P. (1993) *American–Soviet Relations from the Russian Revolution to the Fall of Communism*, London: Routledge.

Brands, H. (1989) 'The Age of Vulnerability: Eisenhower and the National Insecurity State', *American Historical Review* 94, No. 4, October: 963–89.

Brecher, M. and Wilkenfeld, J. (1991) 'International Crises and Global Stability: The Myth of the "Long Peace"', 85–104 in C. Kegley (ed.), *The Long Postwar Peace: Contending Explanations and Projections*, New York: HarperCollins.

Breslauer, G. (1982) *Khrushchev and Brezhnev as Leaders: Building Authority in Soviet Politics*, London: George Allen and Unwin.

Breslauer, G. (1983) 'Why *Détente* Failed: An Interpretation', 319–40 in A.L. George (ed.), *Managing US–Soviet Rivalry: Problems of Crisis Prevention*, Boulder: Westview.

Brinton, C. ([1932] 1965) *The Anatomy of Revolution*, New York: Vintage.

Brodie, B. ([1945] 1989) 'The Atomic Bomb and American Security', 64–94 in P. Bobbit, L. Freedman, and G. Treverton (eds), *US Nuclear Strategy: A Reader*, London: Macmillan.

Brown, S. (1988) *New Forces, Old Forces, and the Future of World Politics*, Washington, DC: Brookings Institution.

Brzezinski, Z. (ed.) (1969) *Dilemmas of Change in Soviet Politics*, New York: Columbia University Press.

Brzezinski, Z. (1983) *Power and Principle: Memoirs of the National Security Advisor 1977–1981*, New York: Farrar, Straus and Giroux.

Brzezinski, Z. (1989) *The Grand Failure: The Birth and Death of Communism in the Twentieth Century*, New York: Scribners.

Buchan, A. (1972) *Power and Equilibrium in the 1970s*, London: Chatto and Windus.

Bull, H. (1977) *The Anarchical Society: A Study of Order in World Politics*, London: Macmillan.

Bull, H. (1984) 'The Revolt Against the West', 217–28 in H. Bull and A.Watson (eds), *The Expansion of International Society*, Oxford: Clarendon Press.

Bundy, McG. (1988) *Danger and Survival: Choices About the Bomb in the First Fifty years*, New York: Vintage.

Bundy, McG., Kennan, G., McNamara, R. and Smith, G. (1984–85) 'The President's Choice: Star Wars or Arms Control', *Foreign Affairs* 63, No. 2, Winter: 264–78.

Calvocoressi, P. (1991) *World Politics Since 1945*, 6th edition, London: Longman.

Campbell, J. (1989) 'The Soviet Union, the United States, and the Twin Crises of Hungary and Suez', 233–53 in W. Louis and R. Owen (eds), *Suez 1956: The Crisis and its Consequences*, Oxford: Clarendon Press.

Carr, E.H. (1942) *The Twenty Years' Crisis, 1919–39: An Introduction to the Study of International Relations*, London: Macmillan.

Carter, J. (1982) *Keeping Faith: Memoirs of a President*, New York: Bantam Books.

Chace, J. (1973) *A World Elsewhere: The New American Foreign Policy*, New York: Scribners.

Chafe, W. (1991) *The Unfinished Journey: America Since World War II*, 2nd edition, New York: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Chang, G. (1990) *Friends and Enemies: The United States, China, and the Soviet Union, 1948–1972*, Stanford: Stanford University Press.

Charlton, M. (1984) *The Eagle and the Small Birds: Crisis in the Soviet Empire from Yalta to Solidarity*, London: BBC Publications.

Charlton, M. (1986) *The Star Wars History: From Deterrence to Defence, The American Strategic Debate*, London: BBC Publications.

Chen, J. (1992) 'The Sino–Soviet Alliance and China's Entry into the Korean War', Working Paper No. 1, Cold War International History Project, Woodrow Wilson Center, Washington, DC, June: 31 pages.

Chomsky, N., Steele, J. and Gittings, J. (1982) *Superpowers in Collision: The New Cold War*, Harmondsworth: Penguin.

Churchill, W.S. (1953) *The Second World War: Triumph and Tragedy*, Boston: Houghton Mifflin.

Cohen, B. (1987) 'An Explosion in the Kitchen? Economic Relations with Other Advanced Industrial States', 115–43 in K. Oye, R. Lieber, and D. Rothchild (eds), *Eagle Resurgent?: The Reagan Era in American Foreign Policy*, Boston: Little, Brown.

Cohen, S. (1985) *Rethinking the Soviet Experience: Politics and History Since 1917*, New York: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Cox, M. (1986), 'The Cold War and Stalinism in the Age of Capitalist Decline', *Critique* 17: 17–82.

Cox, M. (1990) 'From the Truman Doctrine to the Second Superpower *Détente*: The Rise and Fall of the Cold War', *Journal of Peace Research* 27, No. 1: 25–41.

Crankshaw, E. (1963) *The New Cold War: Moscow v Peking*, Harmondsworth: Penguin.

Crankshaw, E. (1966) *Khrushchev*, London: Collins.

Crockatt, R. (1993) 'Theories of Stability and the End of the Cold War', 59–81 in M. Bowker and R. Brown (eds), *From Cold War to Collapse: Theory and World Politics in the 1980s*, Cambridge: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Crockatt, R. and Smith, S. (1987) *The Cold War Past and Present*, London: Allen and Unwin.

Cromwell, W. (1992) *The United States and the European Pillar: The Strained Alliance*, London: Macmillan.

Dallin, A. and Lapidus, G. (1987) 'Reagan and the Russians: American Policy Toward the Soviet Union', 193–254 in K. Oye, R. Lieber, and D. Rothchild (eds), *Eagle Resurgent?: The Reagan Era in American Foreign Policy*, Boston: Little, Brown.

Daniels, R. (ed.) (1985) *A Documentary History of Communism*, Vol. 1 *Communism in Russia*, Vol. 2 *Communism and the World*, London: I.B. Tauris.

Darby, P. (1987) *Three Faces of Imperialism: British and American Approaches to Asia and Africa, 1870–1970*, New Haven: Yale University Press.

Dawisha, K. (1990) *Eastern Europe, Gorbachev and Reform: The Great Challenge*, Cambridge: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Department of State ([1949] 1967) *United States Relations With China With Special Reference to the Period 1944–1949*, Vol. I, Stanford: Stanford University Press.

DePorte, A. (1986) *Europe Between the Superpowers: The Enduring Balance*, New Haven: Yale University Press.

Deutsch, K. and Singer, J. (1964) 'Multipolar Systems and International Stability', *World Politics* 16, No. 3: 390–406.

Deutscher, I. (1960) *Stalin: A Political Biography*, New York: Vintage Books.

Deutscher, I. (1961) *The Great Contest: Russia and the West*, New York: Ballantine Books.

Deutscher, I. (1970) *Russia, China, and the West, 1953–1966*, Harmondsworth: Penguin.

Dibb, P. (1988) *The Soviet Union: The Incomplete Superpower*, London: International Institute for Strategic Studies/Macmillan.

Divine, R. (1965) *The Reluctant Belligerent: American Entry Into World War II*, New York: John Wiley.

Divine, R. (1978) *Blowing on the Wind: The Nuclear Test Ban Debate 1954–1960*, New York: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Djilas, M. (1962) *Conversations with Stalin*, New York: Harcourt Brace.

Dobson, A. (1988) 'The Kennedy Administration and Economic Warfare Against Communism', *International Affairs* 64, No. 4, Autumn: 599–616.

Dougherty, J.E. and Pfaltzgraff, R.L. (1986) *American Foreign Policy: FDR to Reagan*, New York: Harper and Row.

Draper, T. (1990) 'The Constitution in Danger', *New York Review of Books* March 1: 41–7, and responses May 17: 50–3.

Drucker, P. ([1956] 1971) 'America Becomes a "Have-Not" Nation', 556–68 in R. Goldwin (ed.), *Readings in American Foreign Policy*, 2nd edition, New York: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Dukes, P. (1989) *The Last Great Game: USA Versus USSR*, London: Pinter.

Dulles, F.R. (1972) *American Policy Towards Communist China*, New York: Thomas Y. Crowell.

Dulles, J. (1954) 'Policy for Security and Peace', *Foreign Affairs* 32: 353–64.

Dumbrell, J. (1990) *The Making of US Foreign Policy*, Manchester: Manchester University Press.

Dyson, K. (1986) 'European *Détente* in Historical Perspective: Ambiguities and Paradoxes', 14–55 in K. Dyson (ed.), *European Détente: Case Studies of East–West Relations*, London: Frances Pinter.

Eden, A. (1960) *Full Circle: The Memoirs of Anthony Eden*, London: Cassell.

Edmonds, R. (1983) *Soviet Foreign Policy: The Brezhnev Years*, Oxford: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Edmonds, R. (1991) *The Big Three: Churchill, Roosevelt and Stalin in Peace and War*, New York: Norton.

Eilts, H. (1989) 'Reflections on the Suez Crisis: Security in the Middle East', 347–61 in W. Louis and R. Owen (eds), *Suez 1956: The Crisis and its Consequences*, Oxford: Clarendon Press.

Eisenhower, D. (1963) *The White House Years: Mandate for Change, 1953–1956*, London: Heinemann.

Eisenhower, D. (1966) *The White House Years: Waging Peace, 1956–1961*, London: Heinemann.

Erikson, S., Luttberg, R. and Redin, K. (1980) *American Public Opinion: Its Origins, Content, and Impact*, 2nd edition, New York: Wiley.

Etzold, T. and Gaddis, J. (eds) (1978) *Containment: Documents On American Policy and Strategy, 1945–1950*, New York: Columbia University Press.

Facts on File (1976) *Portuguese Revolution 1974–1976*, New York: Facts on File.

Fejtö, F. (1974) *A History of the People's Democracies: Eastern Europe Since Stalin*, Harmondsworth: Penguin.

Ferrell, R. (ed.) (1975) *America in a Divided World, 1945–1972*, New York: Harper and Row.

Fitzpatrick, J.C. (ed.) (1940) *The Writings of George Washington*, Washington, DC: US Government Printing Office, Vol. 35: 214–38.

Foot, R. (1985) *The Wrong War: American Policy and the Dimensions of the Korean Conflict, 1950–53*, Ithaca: Cornell University Press.

Freedman, L. (1981) *The Evolution of Nuclear Strategy*, London: Macmillan/International Institute for Strategic Studies.

Freedman, L. (1990) 'Parade's End', *New York Review of Books* 37, March 29: 22.

Friedman, G. and Lebard, M. (1991) *The Coming War with Japan*, New York: St Martin's Press.

FRUS (= *Foreign Relations of the United States*) (1945) Diplomatic Papers: 194–6.

FRUS (1947) Vol. III, British Commonwealth/Europe.

FRUS (1950) Vol. I, National Security Policy, 234–92.

FRUS (1952–54) Vol. II, National Security Affairs, Part I: 577–97.

FRUS (1955–57) Vol. XIX, National Security Policy: 638–61.

Fukuyama, F. (1992) *The End of History and the Last Man*, London: Hamish Hamilton.

Funnell, V. (1978) 'Vietnam and the Sino–Soviet Conflict, 1965–1976', *Studies in Comparative Communism* XI, Nos. 1 and 2, Spring/Summer: 142–69.

Gaddis, J. (1972) *The United States and the Origins of the Cold War, 1941–1947*, New York: Columbia University Press.

Gaddis, J. (1982) *Strategies of Containment: A Critical Appraisal of Postwar American Security Policy*, New York: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Gaddis, J. (1986) 'The Long Peace: Elements of Stability in the Postwar International System', *International Security* 10, No. 4, Spring: 99–142.

Gaddis, J. (1987) *The Long Peace: Inquiries into the History of the Cold War*, New York: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Gaddis, J. (1989) 'Hanging Tough Paid Off', *Bulletin of the Atomic Scientists* 45, No. 1, January: 11–14.

Gaddis, J. (1990a) *Russia, the Soviet Union and the United States: An Interpretive History*, 2nd edition, New York: McGraw-Hill.

Gaddis, J. (1990b) 'Beyond the Triumph of Liberty', *The Guardian* (London), 1 June: 19.

Gaddis, J. (1992) *The United States and the End of the Cold War: Implications, Reconsiderations, Provocations*, New York: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Gaddis, J. (1992/3) 'International Relations Theory and the End of the Cold War', *International Security* 17, No. 3: 5–38.

Gardner, L. (1993) *Spheres of Influence: The Great Powers Partition Europe, from Munich to Yalta*, Chicago: Ivan Dee.

Garthoff, R. (1985) *Détente and Confrontation: American–Soviet Relations Nixon to Reagan*, Washington, DC: Brookings Institution.

Garthoff, R. (1987) *Policy Versus the Law: The Reinterpretation of the ABM Treaty*, Washington, DC: Brookings Institution.

Garthoff, R. (1988) 'Cuban Missile Crisis: The Soviet Story', *Foreign Policy* 72, Fall: 61–80.

Garthoff, R. (1989) *Reflections on the Cuban Missile Crisis*, revised edition, Washington, DC: Brookings Institution.

Garthoff, R. (1990) *Deterrence and the Revolution In Soviet Military Doctrine*, Washington, DC: Brookings Institution.

Garthoff, R. (1992) 'Why Did the Cold War Arise, and Why Did it End?', 127–36 in M. Hogan (ed.), *The End of the Cold War: Its Meaning and Implications*, Cambridge: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Garton Ash, T. (1984) *The Polish Revolution: Solidarity*, New York: Charles Scribner's Sons.

Garton Ash, T. (1990) 'Eastern Europe: The Year of Truth', *New York Review of Books* 37, February 15: 17–22.

Gati, C. (1990) *The Bloc That Failed: Soviet–East European Relations in Transition*, Bloomington: Indiana University Press.

Gelman, H. (1984) *The Brezhnev Politburo and the Decline of Détente*, Ithaca: Cornell University Press.

Gittings, J. (1982) 'China: Half a Superpower', in N. Chomsky *et al., Superpowers in Collision: The New Cold War*, Harmondsworth: Penguin.

Golan, G. (1990) *Soviet Policies in the Middle East: From World War II to Gorbachev*, Cambridge: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Goldman, M. (1992) *What Went Wrong with Perestroika*, New York: Norton.

Gorbachev, M. (1988) *Perestroika: New Thinking for Our Country and the World*, London: Fontana.
Green, D. (1974) 'The Cold War Comes to Latin America', 149–95 in B. Bernstein (ed.), *Politics and Policies of the Truman Administration*, New York: New Viewpoints.
Greenstein, F. (1982) *The Hidden-Hand Presidency: Eisenhower as Leader*, New York: Basic Books.
Greiner, B. (1990) 'The Cuban Missile Crisis Reconsidered, The Soviet View: An Interview with Sergo Mikoyan', *Diplomatic History*, No. 2, Fall: 205–21.
Grenville, J. and Wasserstein, B. (eds) (1987) *The Major International Treaties Since 1945: A History and Guide With Texts*, London: Methuen.
Griffith, W. (1978) 'The Diplomacy of Eurocommunism', 385–436 in R. Tökés (ed.), *Eurocommunism and Détente*, New York: New York University Press.
Gromyko, A. (1989) *Memories*, London: Hutchinson.
Guardian (London) January 18, 1989: 8.
Guardian (London) May 3, 1989: 26.
Guardian (London) December 12, 1990: 5.
Guardian (London) October 19, 1991: 10.
Haftendorn, H. (1986) *Sicherheit und Stabilität: Aussenbeziehung der Bundesrepublik zwischen Ölkrise und NATO–Doppelbeschluss*, Munchen: DTV.
Halle, L. (1967) *The Cold War as History*, New York: Harper and Row.
Halliday, F. (1981) *Soviet Policy in the Arc of Crisis*, Washington, DC: Institute for Policy Studies.
Halliday, F. (1983) *The Making of the Second Cold War*, London: Verso.
Halliday, F. (1990a) 'The Ends of the Cold War', *New Left Review* 180, March/April: 5–23.
Halliday, F. (1990b) '"The Sixth Great Power": On the Study of Revolution and International Relations', *Review of International Studies* 16, No. 3 July: 207–22.
Halliday, J. and Cumings, B. (1988) *Korea: The Unknown War*, London: Viking.
Harsch, J. (1950) *The Curtain Isn't Iron*, London: Putnam.
Hartz, L. (1955) *The Liberal Tradition in America*, New York: Harcourt Brace.
Hastings, M. (1988) *The Korean War*, London: Michael Joseph.
Hathaway, R.M. (1981) *Ambiguous Partnership: Britain and America, 1944–1947*, New York: Columbia University Press.
Heath, J. (1976) *Decade of Disillusionment: The Kennedy–Johnson Years*, Bloomington: Indiana University Press.
Helman, G. and Ratner, S. (1992–93) 'Saving Failed States', *Foreign Policy* 89, Winter: 3–20.
Herken, G. (1980) *The Winning Weapon: The Atomic Bomb in the Cold War 1945–1950*, New York: Alfred Knopf.
Herring, G. (1979) *America's Longest War: The United States and Vietnam, 1950–1975*, New York: Wiley.
Hersh, S. (1983) *The Price of Power: Kissinger in the Nixon White House*, New York: Simon and Schuster.
Hersh, S. (1991) *The Samson Option: Israel, America, and the Bomb*, London: Faber.
Hershberg, J. (1992) 'Before "The Missiles of October": Did Kennedy Plan a Military Strike Against Cuba?', 237–80, in J. Nathan (ed.), *The Cuban Missile Crisis Revisited*, New York: St Martin's Press.
Hersey, J. ([1946] 1986) *Hiroshima*, Harmondsworth: Penguin.
Hewedy, A. (1989) 'Nasser and the Crisis of 1956', 161–72 in W. Louis and R. Owen (eds), *Suez 1956: The Crisis and its Consequences*, Oxford: Clarendon Press.
Hoffmann, S. (1990) Correspondence, *International Security* 15, No. 2: 191–2.

Holland, R. (1985) *European Decolonization 1918–1981: An Introductory Survey*, London: Macmillan.

Hollis, M. and Smith, S. (1991) *Explaining and Understanding International Relations*, Oxford: Clarendon Press.

Holloway, D. (1984) *The Soviet Union and the Arms Race*, 2nd edition, New Haven: Yale University Press.

Holsti, K. (1988) 'Interdependence, Integration or Fragmentation: Scenarios for the Future', 216–30 in C. Kegley and E. Wittkopf (eds), *The Global Agenda: Issues and Perspectives*, 2nd edition, New York: Random House.

Hoopes, T. (1974) *The Devil and John Foster Dulles*, London: André Deutsch.

Horowitz, D. (1967) *From Yalta to Vietnam*, Harmondsworth: Penguin.

Hosking, G. (1985) *A History of the Soviet Union*, London: Fontana.

Hough, J. (1980) *The Soviet Leadership in Transition*, Washington, DC: Brookings Institution.

Hough, J. (1988) *Opening up the Soviet Economy*, Washington, DC: Brookings Institution.

Hourani, A. (1985) *Political Society in Lebanon: A Historial Introduction*, Cambridge, Mass.: Center for International Studies, Massachussetts Institute of Technology.

Howard, M. (1985) 'Introduction' to O. Riste (ed.), *Western Security: The Formative Years, European and Atlantic Defence, 1947–1953*, Oslo: Norwegian University Press.

Howard, M. (1989a) 'Ideology and International Relations', *Review of International Studies* 15, January: 1–10.

Howard, M. (1989b) 'The United Nations and International Security', 31–45 in A. Roberts and B. Kingsbury (eds), *The United Nations, Divided World*, Oxford: Clarendon Press.

Hunt, M. (1987) *Ideology and US Foreign Policy*, New Haven: Yale University Press.

Huntington, S. (1993) 'The Clash of Civilizations?', *Foreign Affairs* 72, No. 3, Summer: 22–49.

Hyland, W. (1988) *Mortal Rivals: Understanding the Hidden Pattern of Soviet–American Relations*, New York: Simon and Schuster.

Isaacson, W. (1992) *Kissinger: A Biography*, New York: Simon and Schuster.

Jacobsen, C.G. (1982) *The Nuclear Era*, Nottingham: Spokesman.

Janis, I. (1972) *Victims of Groupthink*, Boston: Houghton Mifflin.

Jensen, K. (ed.) (1991) *Origins of the Cold War: The Novikov, Kennan, and Roberts 'Long Telegrams' of 1946*, Washington, DC: United States Institute of Peace.

Jervis, R. (1976) *Perception and Misperception in International Politics*, Princeton: Princeton University Press.

Jones, J.M. (1955) *The Fifteen Weeks*, New York: Harcourt Brace.

Kahn, E.J. (1975) *The China Hands: America's Foreign Service Officers and What Befell Them*, New York: Viking Press.

Kaplan, L. (1985) 'An Unequal Triad: The United States, Western Union, and NATO', 107–27 in O. Riste (ed.), *Western Security: The Formative Years, European and Atlantic Defence, 1947–53*, Oslo: Norwegian University Press.

Karnow, S. (1984) *Vietnam: A History*, Harmondsworth: Penguin.

Kaufmann, W. ([1956] 1989) 'The Requirements of Deterrence', 168–87 in P. Bobbit, L. Freedman, and G. Treverton (eds), *US Nuclear Strategy: A Reader*, London: Macmillan.

Kegley, C. (1990) 'The Characteristics of Contemporary International Terrorism', 11–26 in C. Kegley (ed.), *International Terrorism: Characteristics, Causes, Controls*, New York: St Martin's Press.

Kegley, C. (ed.) (1991) *The Long Postwar Peace: Contending Explanations and Projections*, New York: HarperCollins.

Kegley, C. and Wittkopf, E. (1987) *American Foreign Policy: Pattern and Process*, New York: Macmillan.

Kemp, T. (1990) *The Climax of Capitalism: The US Economy in the Twentieth Century*, London: Longman.

Kennan, G.F. (1947) 'The Sources of Soviet Conduct', *Foreign Affairs* 25, July: 566–82.

Kennan, G.F. (1960) 'Peaceful Coexistence: A Western View', *Foreign Affairs* 38, January: 171–90.

Kennan, G.F. (1967) *Memoirs 1925–1950*, Boston: Little, Brown.

Kennan, G.F. (1992) 'The G.O.P. Won the Cold War? Ridiculous', *New York Times*, October 28: A21.

Kennedy, D. (1980) *Over Here: The First World War and American Society*, New York: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Kennedy, J.F. (1962), *Public Papers of the Presidents of the United States: John F. Kennedy 1961*, Washington, DC: US Government Printing Office.

Kennedy, J.F. (1964) *The Public Papers of The Presidents of the United States: John F. Kennedy 1963*, Washington, DC: US Government Printing Office.

Kennedy, P. (1988) *The Rise and Fall of the Great Powers: Economic Change and Military Conflict, 1500–2000*, London: Unwin Hyman.

Keohane, R. (1990) Correspondence, *International Security* 15, No. 2: 192–4.

Keohane, R. and Nye, J. (1977) *Power and Interdependence: World Politics in Transition*, Boston: Little, Brown.

Khariton, Y. and Smirnov, Y. (1993) 'The Khariton Version', *Bulletin of the Atomic Scientists*, 49, No. 4: 20–31.

Khrushchev, N. (1971) *Khrushchev Remembers*, Boston: Little, Brown.

Khrushchev, N. (1974) *Khrushchev Remembers: The Last Testament*, Boston: Little, Brown.

Khrushchev, N. (1990) *Khrushchev Remembers: The Glasnost Tapes*, Boston: Little, Brown.

Kimball, W. (ed.) (1984) *Churchill and Roosevelt: The Complete Correspondence*, Vol. 3, London: Collins.

Kissinger, H. (1957) *A World Restored: The Politics of Conservatism in a Revolutionary Age*, New York: Grosset and Dunlop.

Kissinger, H. (1969) *American Foreign Policy: Three Essays*, London: Weidenfeld and Nicolson.

Kissinger, H. (1979) *The White House Years*, London: Weidenfeld and Nicolson.

Kissinger, H. (1982) *Years of Upheaval*, Boston: Little, Brown.

Kolko, G. (1986) *Vietnam: Anatomy of a War*, London: Allen and Unwin.

Kramer, J. (1990) 'Eastern Europe and the "Energy Shock" of 1990', Paper delivered to the Conference of the British International Studies Association, Newcastle-upon-Tyne, December.

Kramer, M. (1993) 'Tactical Nuclear Weapons, Soviet Command Authority, and the Cuban Missile Crisis', *Bulletin* of the Cold War International History Project, Issue 3, Fall: 40–6.

Krauthammer, C. (1990–91) 'The Unipolar Moment', *Foreign Affairs* 70: 23–33.

Kuniholm, B. (1980) *The Origins of Cold War in the Near East: Great Power Conflict and Diplomacy in Iran, Turkey, and Greece*, Princeton: Princeton University Press.

Kuniholm, B. (1987) 'The Origins of the First Cold War', 37–57 in R. Crockatt and S. Smith (eds), *The Cold War Past and Present*, London: Allen and Unwin.

Labrie, R. (ed.) (1979) *SALT Handbook: Key Documents and Issues, 1972–79*, Washington, DC: American Enterprise Institute.

LaFeber, W. (1993a) *America, Russia, and the Cold War, 1945–92*, New York: Knopf.

LaFeber, W. (1993b) *Inevitable Revolutions: The United States in Central America*, New York: Norton.

Laird, R. and Hoffmann, E. (eds) (1986) *Soviet Foreign Policy in a Changing World*, New York: Aldine.

Lake, A. (1993) 'Remarks to Johns Hopkins' School of Advanced International Studies', United States Information Service, US Embassy, London, September 22: 13 pages.

Laqueur, W. (1989) *The Long Road to Freedom: Russia and Glasnost*, London: Unwin Hyman.

Laqueur, W. and Rubin, B. (eds) (1984) *The Israel–Arab Reader: A Documentary History of the Middle East Conflict*, 4th edition, New York: Facts on File.

Larson, D. (1985) *The Origins of Containment*, Princeton: Princeton University Press.

Lattimore, O. (1945) *Solution in Asia*, Boston: Little, Brown.

Lebow, N. (1988) 'Provocative Deterrence: A New Look at the Cuban Missile Crisis', *Arms Control Today*, July/August: 15–16.

Leffler, M. (1984) 'The American Conception of National Security and the Beginnings of the Cold War, 1945–48', *American Historical Review* 89, April: 346–400.

Leffler, M. (1992) *A Preponderance of Power: National Security, The Truman Administration and the Cold War*, Stanford: Stanford University Press.

Lenin, V.I. (1925) *Collected Works of Lenin*, Moscow, Vol. XVII.

Levgold, R. (1978) 'The Soviet Union and West European Communism', 314–84 in R. Tökés, (ed.), *Eurocommunism and Détente*, New York: New York University Press.

Lewin, M. (1991) *The Gorbachev Phenomenon: A Historical Interpretation*, Berkeley: University of California Press.

Liska, G. (1987) *Re-thinking US–Soviet Relations*, Oxford: Blackwell.

Litwak, R. (1984) *Détente and the Nixon Doctrine: American Foreign Policy and the Pursuit of Stability, 1969–1976*, Cambridge: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Lobanov-Rostovsky, A. (1965) 'Russian Expansion in the Far East in the Light of the Turner Hypothesis', 79–94 in W.D. Wyman and C.B. Kroeber (eds), *The Frontier in Perspective*, Madison: University of Wisconsin Press.

Lodal, J. (1976) 'Assuring Strategic Stability: An Alternative View', *Foreign Affairs* 54, No. 2, April: 462–81.

Louis, W. (1989) 'The Tragedy of the Anglo-Egyptian Settlement of 1954', 43–71 in W. Louis and R. Owen (eds), *Suez 1956: The Crisis and its Consequences*, Oxford: Clarendon Press.

Low, A.D. (1976) *The Sino–Soviet Dispute: An Analysis of the Polemics*, Rutherford, N.J.: Farleigh Dickinson University Press.

Lowe, P. (1986) *The Origins of the Korean War*, London: Longman.

Lowenthal, R. (1964) *World Communism: The Disintegration of a Secular Faith*, New York: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Lowenthal, R. (1984) 'The Soviet Union and the Third World: From Anti-imperialism to Counter-imperialism', 323–33 in H. Bull and A. Watson (eds), *The Expansion of International Society*, Oxford: Clarendon Press.

Luers, W. (1986) 'The Soviets and Latin America: A Three Decade U.S. Policy Tangle', 824–52 in R. Laird and E. Hoffmann (eds), *Soviet Foreign Policy in a Changing World*, New York: Aldine Publishing Company.

Lundestad, G. (1978) *The American Non-Policy Towards Eastern Europe, 1943–1947*, Oslo: Norwegian University Press.

Lyon, P. (1984) 'The Emergence of the Third World', 229–37 in H. Bull and A. Watson (eds), *The Expansion of International Society*, Oxford: Clarendon Press.

McCagg, W. (1978) *Stalin Embattled, 1943–1948*, Detroit: Wayne State University Press.

McCarthy, J. (1951) *America's Retreat from Victory: The Story of George Catlett Marshall*, New York: The Devin–Adair Company.

McGregor, C. (1988) *The Sino–Vietnamese Relationship and the Soviet Union*, London: International Institute for Strategic Studies, Adelphi Paper 232.

McGwire, M. (1989) 'About Face in Europe', *Guardian* (London) November 15.

McMahon, R. (1981) *Colonialism and Cold War: The United States and the Struggle for Indonesian Independence, 1945–1949*, Ithaca: Cornell University Press.

McNamara, R. ([1962] 1989) 'Speech to NATO Council, Athens, 5 May', 205–22 in P. Bobbit, L. Freedman, and G. Treverton (eds), *US Nuclear Strategy: A Reader*, London: Macmillan.

McNamara, R. (1986) *Blundering into Disaster: Surviving the First Century of the Nuclear Age*, New York: Pantheon.

Mahoney, R. (1983) *JFK: Ordeal in Africa*, New York: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Manchester Guardian Weekly, November 29, 1992: 16.

Mandelbaum, M. and Talbott, S. (1987) *Reagan and Gorbachev*, New York: Vintage.

Mark, E. (1981–82) 'American Policy Toward Eastern Europe and the Origins of the Cold War, 1941–46', *Journal of American History* 68: 313–36.

Marshall, B. (1990) *Willy Brandt*, London: Sphere Books.

Mastny, V. (1979) *Russia's Road to the Cold War: Diplomacy Warfare and the Politics of Communism, 1941–45*, New York: Columbia University Press.

Matusow, A.J. (ed.) (1970) *Joseph R. McCarthy*, Englewood Cliffs, N.J.: Prentice-Hall.

May, E. (1973) *The Lessons of the Past: The Use and Misuse of History in American Foreign Policy*, New York: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May, E. (ed.) (1993) *American Cold War Strategy: Interpreting NSC 68*, Boston: St Martin's Press.

Mearsheimer, J. (1990) 'Back to the Future: Instability After The Cold War', *International Security* 15, No. 1: 5–56.

Mearsheimer, J. (1993) 'The Case for a Ukrainian Nuclear Deterrent', *Foreign Affairs* 72, No. 3, Summer: 50–66.

Medvedev, R. (1982) *Khrushchev*, Oxford: Blackwell.

Medvedev, Z. (1988) *Gorbachev*, Oxford: Blackwell.

Mehnert, K. (1964) *Peking and Moscow*, New York: New American Library.

Melanson, R. (1991) *Reconstructing Consensus: American Foreign Policy Since the Vietnam War*, New York: St Martin's Press.

Merk, F. (1966) *Manifest Destiny and Mission in American History: A Reinterpretation*, New York: Vintage.

Miller, N. (1989) *Soviet Relations with Latin America 1959–1987*, Cambridge: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Mosely, P. (1960) *The Kremlin and World Politics: Studies in Soviet Policy and Action*, New York: Vintage.

Mujal-Leon, E. (1978) 'Communism and Revolution in Portugal', 271–313 in R. Tökés (ed.), *Eurocommunism and Détente*, New York: New York University Press.

Munting, R. (1982) *The Economic Development of the USSR*, London: Macmillan.

New Republic (1945) 'World Government', September 24: 366–7.

New York Times (1993) 'Beyond START: A New Level of Instability', January 10: E1, E3.

New York Times (1993) '1st Soviet A-Bomb Built From US Data, Russian Says', January 14: A12.

Newhouse, J. (1989) *The Nuclear Age: From Hiroshima to Star Wars*, London: Michael Joseph.

Nitze, P. (1976) 'Assuring Strategic Stability in an Era of *Détente*', *Foreign Affairs* 54, No. 2, January: 207–32.

Nitze, P. (1988) 'Security and Arms Control: A Number of Good Beginnings', *NATO Review* 36, No. 6, December: 1–6.

Nitze, P. (1989) *From Hiroshima to Glasnost: At the Centre of Decision*, London: Weidenfeld and Nicolson.

Nixon, R. (1962) *Six Crises*, New York: Doubleday.

Nixon, R. (1978) *The Memoirs of Richard Nixon*, London: Sidgwick and Jackson.

Nixon, R. (1986) *No More Vietnams*, London: W.H. Allen.

Nogee, J.L. and Donaldson, R.H. (1988) *Soviet Foreign Policy Since World War II*, New York: Pergamon.

Nove, A. (1970) *An Economic History of the USSR*, Harmondsworth: Penguin.

Nye, J. (1990) *Bound to Lead: The Changing Nature of American Power*, New York: Basic Books.

Oberdorfer, D. (1992) *The Turn: From the Cold War to a New Era*, New York: Touchstone Books.

Oppenheimer, J. (1953) 'Atomic Weapons and American Policy', *Foreign Affairs* 31, No. 4, July: 525–35.

Owens, J. (1990) 'The Legacy of Reaganomics', 36–59 in M. Pugh and P. Williams (eds), *Superpower Politics: Change in the United States and the Soviet Union*, Manchester: Manchester University Press.

Padover, S.K. (ed.) (1943) *The Complete Jefferson*, pp. 384–86, New York: Duell, Sloane and Pearce.

Palmer, J. (1988) *Europe Without America? The Crisis in Atlantic Relations*, Oxford: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Paterson, T. (1988) *Meeting the Communist Threat: Truman to Reagan*, New York: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Paterson, T. (1990) 'The Defense-of-Cuba Theme and the Missile Crisis', *Diplomatic History* 14: 249–56.

Pelling, H. (1988) *Britain and the Marshall Plan*, London: Macmillan.

Pentagon Papers (1971), New York Times Edition, New York: Bantam Books.

Pike, D. (1987) *Vietnam and the Soviet Union: Anatomy of an Alliance*, Boulder: Westview Press.

Pipes, R. (1981) *US–Soviet Relations in the Era of Détente*, Boulder: Westview Press.

Pipes, R. (1992) Letter to the Editor, *New York Times*, November 6: A28.

Pollard, R.A. (1985) *Economic Security and the Origins of the Cold War, 1945–1949*, New York: Columbia University Press.

Posen, B. and Van Evera, S. (1987) 'Reagan Administration Defense Policy: Departure from Containment', 75–114 in K. Oye, R. Lieber, and D. Rothchild, (eds), *Eagle Resurgent?: The Reagan Era in American Foreign Policy*, Boston: Little, Brown.

Quandt, W. (1986) *Camp David: Peacemaking and Politics*, Washington, DC: The Brookings Institution.

Rabe, S. (1988) *Eisenhower and Latin America: The Foreign Policy of Anti-Communism*, Chapel Hill: University of North Carolina Press.

Reagan, R. (1985) *Public Papers of the Presidents of the United States: Ronald Reagan: 1983*, Book I, Washington, DC: United States Government Printing Office.

Reagan, R. (1987) *Public Papers of the Presidents of the United States: Ronald Reagan, 1985*, Book I, Washington, DC: United States Government Printing Office.

Remnick, D. (1993) *Lenin's Tomb: The Last Days of the Soviet Empire*, New York: Random House.

Risse-Kappen, T. (1991) 'Did "Peace Through Strength" End the Cold War? Lessons from INF', *International Security* 16, No. 1, Summer: 162–88.

Rockefeller Brothers Fund (1958) *International Security: The Military Aspect*, Garden City, N.J.: Doubleday.

Rosenberg, D. (1983) 'The Origins of Overkill: Nuclear Weapons and American Strategy, 1945–1960', *International Security* 7, Spring: 3–71.

Rosencrance, R. (1976) *America as an Ordinary Country*, Ithaca: Cornell University Press.

Roskamp, E. (1977) *The American Economy, 1929–1970*, Detroit: Wayne State University Press.

Roxburgh, A. (1991) *The Second Russian Revolution*, London: BBC Publications.

Rubin, B. (1981) *Paved With Good Intentions: The American Experience and Iran*, Harmondsworth: Penguin.

Rubin, B. (1987) 'The Reagan Administration and the Middle East', 431–57 in K. Oye, R. Lieber and D. Rothchild (eds), *Eagle Resurgent? The Reagan Era in American Foreign Policy*, Boston: Little, Brown.

Ruggie, J. (1986) 'Continuity and Transformation in the World Polity: Toward a Neorealist Synthesis', 131–57 in R. Keohane (ed.), *Neorealism and its Critics*, New York: Columbia University Press.

Rupnik, J. (1989) *The Other Europe*, London: Weidenfeld and Nicolson.

Rusk, D. (1990) *As I Saw It*, New York: Norton.

Sagan, S. (1989) *Moving Targets: Nuclear Strategy and National Security*, Princeton: Princeton University Press.

Sagan, S. (1993) *The Limits of Safety: Organizations, Accidents, and Nuclear Weapons*, Princeton: Princeton University Press.

Sainsbury, K. (1985) *The Turning Point: Roosevelt, Stalin, Churchill and Chiang Kai-shek, 1943: The Moscow, Cairo, and Teheran Conferences*, Oxford: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Saivetz, C. and Woodby, S. (1985) *Soviet–Third World Relations*, London: Westview Press.

Sanders, D. (1990) *Losing an Empire, Finding a Role: British Foreign Policy Since 1945*, London: Macmillan.

Schaller, M. (1986) *The American Occupation of Japan: The Origins of the Cold War in Asia*, New York: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Schlesinger, A.M. (1963) 'The One Against the Many', 531–8 in A.M. Schlesinger and M. White (eds), *Paths of American Thought*, Boston: Houghton Mifflin.

Schlesinger, A. (1974) *The Imperial Presidency*, New York: Popular Library.

Schöpflin, G. (1990) 'The End of Communism in Europe', *International Affairs* 66, No. 1, January 1990: 3–16.

Schöpflin, G. (1993) *Politics in Eastern Europe*, Oxford: Blackwell.

Schulzinger, R.D. (1984) *American Diplomacy in the Twentieth Century*, New York: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Seward, W. (1849) *Life of John Quincy Adams*, Philadelphia: Porter and Coates.

Sheehan, N. (1989) *A Bright Shining Lie: John Paul Vann and America in Vietnam*, London: Jonathan Cape.

Sherwin, M. (1977) *A World Destroyed: The Atom Bomb and the Grand Alliance*, New York: Vintage Books.

Sherwood, R. (1948) *Roosevelt and Hopkins: An Intimate History*, New York: Harper and Row.

Shulman, M. (1963) *Stalin's Foreign Policy Reappraised*, Cambridge, Mass.: Harvard University Press.

Shultz, G. (1993) *Turmoil and Triumph: My Years as Secretary of State*, New York: Charles Scribner's Sons.

Singer, J. (1969) 'The Level-of-Analysis Problem in International Relations', 20–9 in J. Rosenau, (ed.), *International Relations and Foreign Policy*, New York: Free Press.

Siracusa, J. (ed.) (1978) *The American Diplomatic Revolution: A Documentary History of the Cold War, 1941–47*, Milton Keynes: Open University Press.

Sixsmith, M. (1991) *Moscow Coup: The Death of the Soviet System*, New York: Simon and Schuster.

Smith, D. (ed.) (1964) *American Diplomatic History: Documents and Readings*, Vol. II, Lexington, Mass.: D.C. Heath.

Smith, R. (1983) *An International History of the Vietnam War*, Vol. 1 *Revolution Versus Containment, 1955–1961*, London: Macmillan.

Smith, S. (1987) 'SDI and the New Cold War', 149–70 in R. Crockatt and S. Smith (eds), *The Cold War Past and Present*, London: Allen and Unwin.

Smith, S. (1990) 'The Reagan Legacy and the Bush Predicament', 60–81 in M. Pugh and P. Williams (eds), *Superpower Politics: Change in the United States and the Soviet Union*, Manchester: Manchester University Press.

Smith, W. (1987a) *The Closest of Enemies: A Personal and Diplomatic Account of US–Cuban Relations Since 1957*, New York: Norton.

Smith, W. (1987b) 'Lies About Nicaragua', *Foreign Policy* 67, Summer: 87–103.

Smith, W.B. (1950) *Moscow Mission*, London: Heinemann.

Spanier, J. (1977) *American Foreign Policy Since World War II*, New York: Praeger.

Spence, J. (1990) *The Search for Modern China*, London: Hutchinson.

Spiegel, S. (1985) *The Other Arab–Israeli Conflict: Making America's Middle East Policy, From Truman to Reagan*, Chicago: University of Chicago Press.

Steele, J. (1985) *Soviet Foreign Policy: The Limits of Power*, Harmondsworth: Penguin.

Stuart, D. and Tow, W. (1990) *The Limits of Alliance: NATO Out-of-Area Problems Since 1949*, Baltimore: Johns Hopkins University Press.

Stueck, W. (1981) *The Road to Confrontation: American Policy Toward China and Korea, 1947–1950*, Chapel Hill: University of North Carolina Press.

Summers, H. (1982) *On Strategy: A Critical Analysis of the Vietnam War*, Novato, Calif.: Presidio Press.

Talbott, S. (1984) *Deadly Gambits: The Reagan Administration and the Stalemate in Arms Control*, New York: Knopf.

Talbott, S. (1989) *The Master of the Game: Paul Nitze and the Nuclear Peace*, New York: Vintage.

Taubman, W. (1982) *Stalin's American Policy*, New York: Norton.

Thomas, B. (1969) 'What's Left of the Cold War?' *Political Quarterly* 40: 173–86.

Thompson, E.P. (1990) 'The Ends of Cold War', *New Left Review* 182, July/August: 139–46.

Tiersky, R. (1978) 'French Communism, Eurocommunism, and Soviet Power', 138–203 in R. Tökés (ed.), *Eurocommunism and Détente*, New York: New York University Press.

Tökés, R. (1978) 'Eastern Europe in the 1970s: *Détente*, Dissent and Eurocommunism', 437–511 in R. Tökés (ed.), *Eurocommunism and Détente*, New York: New York University Press.

Trachtenberg, M. (1990) 'Commentary: New Light on the Cuban Missile Crisis?', *Diplomatic History* 14: 241–7.

Treverton, G. (1989) 'From No Cities to Stable Vulnerability', 190–204 in P. Bobbit, L. Freedman, and G. Treverton (eds), *US Nuclear Strategy: A Reader*, London: Macmillan.

Trofimenko, H. (1981) 'The Third World and the US–Soviet Competition: A Soviet View', *Foreign Affairs* 59, No. 5, Summer: 1021–40.

Truman, H.S. (1955) *Year of Decisions*, Garden City, N.Y.: Doubleday.

Truman, H.S. (1963) *Public Papers of the Presidents of the United States: Harry S. Truman, 1947*, pp. 176–80, Washington, DC: US Government Printing Office.

Tucker, R. (1972) *The Soviet Political Mind: Stalinism and Post-Stalin Change*, London: Allen and Unwin.

Ulam, A. (1968) *Expansion and Coexistence: The History of Soviet Foreign Relations*, New York: Praeger.

Ulam, A. (1973) *The Rivals*, London: Allen Lane.
Ulam, A. (1983) *Dangerous Relations: The Soviet Union in World Politics, 1970–1982*, New York: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Urwin, D. (1989) *Western Europe Since 1945: A Political History*, 4th edition, London: Longman.
USACDA (1982) *Arms Control and Disarmaments Agreements*, Washington, DC: United States Arms Control and Disarmament Agency.
Vadney, T.E. (1987) *The World Since 1945*, Harmondsworth: Penguin.
Van der Wee, H. (1987) *Prosperity and Upheaval: The World Economy 1945–1980*, Harmondsworth: Penguin.
Vance, C. (1983) *Hard Choices: Critical Years in America's Foreign Policy*, New York: Simon and Schuster.
Viotti, P. and Kauppi, M. (1993) *International Relations Theory: Realism, Pluralism and Globalism*, New York: Macmillan.
Volkogonov, D. (1991) *Stalin: Triumph and Tragedy*, New York: Grove Weidenfeld.
Walesa, L. (1987) *A Way of Hope*, New York: Henry Holt.
Walker, M. (1993) *The Cold War and the Making of the Modern World*, London: Fourth Estate.
Walker, S. (1990) 'The Decision to Use the Bomb: A Historiographical Update', *Diplomatic History* 14: 97–114.
Wall, I. (1991) *The United States and the Making of Postwar France*, Cambridge: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Wallace, H. (1943) *The Price of Victory* in *Prefaces to Peace*, New York: Simon and Schuster *et al.*
Waltz, K. (1964) 'The Stability of the Bipolar World', *Daedalus* 13, Summer: 881–909.
Waltz, K. (1979) *Theory of International Politics*, New York: Random House.
Waltz, K. (1986) 'Reflections on *Theory of International Politics*: A Response to my Critics', 322–45 in R. Keohane (ed.), *Neorealism and its Critics*, New York: Columbia University Press.
Ward, B. ([1955] 1962) *The Interplay of East and West*, New York: Norton.
Washington Post (1992) 'Dramatic Politburo Meeting Led to End of War', November 16: A1, A16.
Weathersby, K. (1993) 'Soviet Aims in Korea and the Origins of the Korean War, 1945–1950: New Evidence From Russian Archives', Working Paper No. 8, Cold War International History Project, Woodrow Wilson Center, Washington, DC, November: 33 pages.
Weinberger, C. (1987) 'Preface' to *Soviet Military Power*, (pp. 3–5) Washington, DC: US Government Printing Office.
Wells, S.F. (1985) 'The First Cold War Buildup: Europe in United States Strategy and Policy, 1950–1953', 181–97 in O. Riste (ed.), *Western Security: The Formative Years, European and Atlantic Defence 1947–1953*, Oslo: Norwegian University Press.
Werth, A. (1965) *De Gaulle*, Harmondsworth: Penguin.
Whelan, R. (1990) *Drawing the Line: The Korean War, 1950–1953*, Boston: Little, Brown.
White, B. (1987) 'Britain and the Rise of *Détente*', 91–109 in R. Crockatt and S. Smith (eds), *The Cold War Past and Present*, London: George Allen and Unwin.
White, S. (1990) *Gorbachev in Power*, Cambridge: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Wight, M. (1979) *Power Politics*, Harmondsworth: Penguin.
Williams, W., LaFeber, W., Gardner, L. and McCormick, T. (eds) (1989) *America in Vietnam: A Documentary History*, New York: Norton.
Williams, W.A. (1972) *The Tragedy of American Diplomacy*, New York: Dell.
Williamson, E. (1992) *The Penguin History of Latin America*, Harmondsworth: Allen Lane, the Penguin Press.

Wilson, W. (1983) *The Papers of Woodrow Wilson*, Vol. 41, edited by A. Link, Princeton: Princeton University Press.

Windsor, P. (1971) *Germany and the Management of Détente*, London: Chatto and Windus for the Institute for Strategic Studies.

Wolfe, B.D. (1964) *Three Who Made a Revolution*, 4th edition, New York: Dell.

Yergin, D. (1980) *Shattered Peace: The Origins of the Cold War and the National Security State*, Harmondsworth: Penguin.

Yost, D. and Glad, T. (1982) 'West German Party Politics and Theater Nuclear Modernization Since 1977', *Armed Forces and Society* 8, No. 4, Summer: 525–60.

Zagoria, D. (1967) *Vietnam Triangle: Moscow, Peking, Hanoi*, New York: Pegasus.

Zuckerman, Lord (1987) 'Technology for a Cold War', 24–34 in R. Crockatt and S. Smith (eds), *The Cold War Past and Present*, London: Allen and Unwin.

相关链接
更多信息请查询：www.ssap.com.cn

世界社会主义研究丛书

研究系列

社会主义：理论与实践（精）
李慎明　主编
2001年4月

社会主义的历史、理论与前景（上下册）
靳辉明　主编
2004年5月

且听低谷新潮声：21世纪的世界社会主义前景
李慎明　主编
2005年2月

古巴社会主义研究
毛相麟　著
2005年10月

美国民主制度输出
刘国平　著
2006年8月

戈尔巴乔夫的改革与苏联的毁灭
谭索　著
2006年9月

当代资本主义国家共产党
聂运麟　等著
2007年11月

苏联演变的原因与教训
周新成　张旭　著
2008年2月

美国保守主义及其全球战略
姜琳　著
2008年3月

民主社会主义思潮批判
周新城　著
2008年4月

变革与转型时期的社会主义研究
聂运麟　著
2008年5月

执政党的经验教训
李慎明　等编
2008年5月

帝国主义历史的终结
王金存　著
2008年6月

十月革命与当代社会主义
李慎明　主编
2008年11月

叶利钦的西化改革与俄罗斯的社会灾难
谭索　著
2009年6月

美元霸权与经济危机
李慎明　主编
2009年7月

欧洲社会民主主义的转型
何秉孟　姜辉　张顺洪　编著
2010年5月

国际金融危机与当代资本主义
李慎明　主编
2010年6月

国际金融垄断资本与经济危机跟踪研究
何秉孟　主编
2010年7月

世界在反思：国际金融危机与新自由主义全球观点扫描
李慎明　主编
2010年7月

“颜色革命”在中亚——兼论与执政能力的关系
赵常庆　主编
2011年1月

历史在这里沉思：苏联解体20周年祭
李慎明　主编
2011年9月

信仰危机与苏联的命运
蔡文鹏　著
2011年12月

世界在反思之二——批判新自由主义观点全球扫描
李慎明　主编
2012年2月

相关链接

更多信息请查询：www.ssap.com.cn

研究系列（续）

美国中亚战略20年：螺旋式演进
杨鸿玺　著
2012年9月

"改革新思维"与苏联演变
李瑞琴　著
2012年9月

世界在动荡、变革、调整
李慎明　主编
2012年11月

世界在反思（3）：当代资本主义评析
李慎明　主编
2012年12月

探索与变革：资本主义国家共产党的历史、理论与现状
聂运麟　主编
2014年6月

世界格局与我国安全战略
李慎明　主编
2014年9月

世界社会主义和左翼思潮：现状与发展趋势
李慎明　主编
2014年10月

谈如何正确看待斯大林
张捷　著
2015年3月

社会主义是人类历史发展的必然
李慎明　主编
2015年5月

尼泊尔共产党（毛主义者）的历史执政及其嬗变研究
汪亭友　著
2015年6月

参考系列

全球化与现代资本主义
[古巴] 菲德尔·卡斯特罗　著
王玫　等译
2000年11月

古巴雄师卡斯特罗的青少年时代
[古巴] D. 施诺卡尔
P.A.塔维奥　编
宋晓平　杨仲林　译
2000年11月

改革年代：苏联东欧与中国——戈尔巴乔夫现象
[澳] 科伊乔·佩特罗夫　著
葛志强　马细谱　等译
2001年6月

第三次世界大战——信息心理战
[俄] B.A.利西奇金
JI.A.谢列平　著
徐昌翰　等译
2003年9月

论意识操纵
[俄] 谢.卡拉-穆尔扎　著
徐昌翰　等译
2004年2月

苏联的最后一年
[俄] 伊·麦德维杰夫　著
王晓玉　姚强　译
2005年1月

大元帅斯大林
[俄] 弗拉基米尔·卡尔波夫
何宏江　等译
2005年9月

富国陷阱
[英] 张夏准　著
肖炼　倪延硕　等译
2009年1月

俄罗斯、中国与世界
[俄] A.P. 雅科夫列夫　著
孟秀云　孙黎明　译
2007年5月

参考系列（续）

文明的对话
[保] 亚历山大·利洛夫 著
马细谱 等选译
2007年9月

欧洲社会主义百年史
[英] 唐纳德·萨松 著
孟秀云 孙黎明 译
2008年1月

幻想破灭的资本主义
[日] 伊藤诚 著
孙仲涛 等译
2008年6月

总司令的思考
[古巴] 菲德尔·卡斯特罗 著
徐世澄 宋晓平 等译
2008年1月

世界规模的积累
[埃及] 萨米尔·阿明 著
杨明柱 杨光 李宝源 译
2008年11月

富国陷阱（修订版）
[英] 张夏准 著
肖炼 倪延硕 等译
2009年1月

富国的伪善
[英] 张夏准 著
严荣 译
2009年1月

苏联的最后一年（增订再版）
[俄] 罗伊·麦德维杰夫 著
王晓玉 姚强 等译
2009年6月

从“休克”到重建：东欧的社会转型与全球化－欧洲化
[法] 弗朗索瓦·巴富瓦尔 著
陆象淦 王淑英 译
2010年3月

卡斯特罗语录
[古巴] 萨洛蒙·苏希·萨尔法蒂 编
宋晓平 徐世澄 张颖 译
2010年6月

资本主义为什么会自我崩溃?
[日] 中谷岩 著
郑萍 译
2010年7月

英国共产主义的失落
[英] 拉斐尔·塞缪尔 著
陈志刚 李晓江 译
2010年8月

解体：二十年后的回忆与反思
李慎明 主编
栗瑞雪 等译
2011年12月

新自由主义的兴衰
[巴] 特奥托尼奥·多斯桑托斯 著
郝名玮 译
2012年2月

资本主义全球化及其替代方案
[英] 莱斯利·斯克莱尔 著
梁光严 译
2012年3月

亲历苏联解体：二十年后的回忆与反思
李慎明 主编
张树华 等译
2012年5月

捍卫苏联的最后一搏：“国家紧急状态委员会”反对戈尔巴乔夫
[俄]根纳季·亚纳耶夫 著
胡昊 译
2012年11月

帝国的消亡：当代俄罗斯应从中汲取的教训
[俄] 叶·季·盖达尔 著
王尊贤 译
2013年1月

资本主义十讲（插图版）
[法] 米歇尔·于松 著
沙尔博 插图 潘革平 译
2013年4月

全球化资本主义与日本经济
[日] 鹤田满彦 著
张迪 译
2013年4月

美国社会主义传统
[美]约翰·尼古拉斯 著
陈慧平 译
2013年11月

参考系列（续）

资本主义还有未来吗？
伊曼纽尔·沃勒斯坦 等著
徐曦白 译
2014年4月

苏联军队的瓦解
[美] 威廉·奥多姆 著
王振西 钱俊德 译
2014年7月

欧洲激进左翼政党
[英] 卢克·马奇 著
于海清 王静 译
2014年9月

多极世界与第五国际
[埃] 萨米尔·阿明 著
沈雁南 彭姝祎 译
2014年11月

苏共二十大："秘密报告"与赫鲁晓夫的谎言
格雷弗弗 著
马维先 译
2015年1月

西方情报机构与苏联解体
戴维·阿尔贝尔兰·埃德利 著
孙成昊 张蓓 译
2015年1月

相互竞争的经济理论：新古典主义、凯恩斯主义和马克思主义
[美]理查德·沃尔夫 [美]斯蒂芬·雷斯尼克 著
孙来斌 王今朝 杨军 译
2015年6月

皮书系列

2005 年世界社会主义跟踪研究报告——且听低谷新潮声（之二）
李慎明 主编
2006年3月

世界社会主义跟踪研究报告——且听低谷新潮声（之一）
李慎明 主编
2006年5月

2006 年世界社会主义跟踪研究报告——且听低谷新潮声（之三）
李慎明 主编
2007年3月

2007 年世界社会主义跟踪研究报告——且听低谷新潮声（之四）
李慎明 主编
2008年3月

世界社会主义跟踪研究报告（2008~2009）——且听低谷新潮声（之五）
李慎明 主编
2009年3月

世界社会主义跟踪研究报告（2009~2010）——且听低谷新潮声（之六）
李慎明 主编
2010年2月

世界社会主义跟踪研究报告（2010~2011）——且听低谷新潮声（之七）
李慎明 主编
2011年3月

世界社会主义跟踪研究报告（2011~2012）——且听低谷新潮声（之八）
李慎明 主编
2012年3月

世界社会主义黄皮书 世界社会主义跟踪研究报告（2012~2013）
李慎明 主编
2013年5月

世界社会主义黄皮书 世界社会主义跟踪研究报告（2013~2014）
李慎明 主编
2014年3月

相关链接
更多信息请查询: www.ssap.com.cn

居安思危·世界社会主义小丛书

忧患百姓忧患党：毛泽东关于党不变质思想探寻
李慎明　著
2012年7月

“普世价值”评析
汪亭友　著
2012年7月

戈尔巴乔夫与“人道的民主的社会主义”
王正泉　著
2012年7月

古巴：本土的可行的社会主义
毛相麟　著
2012年7月

新自由主义评析
何秉孟　李千　著
2012年7月

俄国十月社会主义革命
陈之骅　著
2012年7月

西方世界中的社会主义思潮
姜辉　于海青　著
2012年7月

当代拉丁美洲的社会主义思潮与实践
徐世澄　著
2012年7月

民主社会主义评析
周新城　著
2012年7月

历史虚无主义评析
梁柱　著
2012年7月

越南社会主义定向革新
谷源洋　著
2013年5月

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与实践
罗文东　著
2013年5月

居安思危：苏共亡党的历史教训（八集党内教育参考片解说词）
李慎明　总撰稿
2013年5月

全球化与共产党
卫建林　著
2013年5月

怎样认识民主社会主义
徐崇温　著
2013年5月

俄罗斯的私有化
张树华　单超　著
2013年5月

查韦斯的“21世纪社会主义”
朱继东　著
2013年5月

苏联历史几个争论焦点的真相
吴恩远　著
2013年5月

毛泽东对新中国的历史贡献
李捷　著
2013年5月

毛泽东与马克思主义中国化
李崇富　著
2013年5月

《共产党宣言》与世界社会主义
靳辉明　李瑞琴　著
2013年5月

马克思主义与社会主义的历史命运
王伟光　著
2013年5月

忧患百姓忧患党：毛泽东关于党不变质思想探寻（修订版·大字本）
李慎明　著
2013年7月

马克思主义与社会主义的历史命运（大字本）
王伟光　著
2013年8月

谈谈民主、国家、阶级和专政
王伟光　著
2015年1月

中国经济体制改革的方向问题
刘国光　著
2015年1月

抽象的人性论剖析
有林　等著
2015年1月

中国道路和中国模式
侯惠勤　著
2015年1月

社会主义在探索中不断前进
周新城　著
2015年1月

列宁帝国主义论及其当代价值
顾玉兰　著
2015年1月

老树：在革新中腾飞
柴尚金　著
2015年1月

建国后毛泽东对中国法治建设的创造性贡献
迟方旭　著
2015年1月

西方文明东进战略与中国应对
李艳艳　著
2015年1月

俄罗斯联邦共产党二十年
刘淑春　著
2015年3月